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伊雷什·贝拉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匈〕伊雷什·贝拉著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汤真　万紫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Illés Bela

KÁRPÁTI RAPSZÓDIA

根据Grace Blair Cardos 英译本 "Carpathian Rhapsody" (Corvina Press, Budapest, 1963) 转译；插图系 Hincz Gyula 所作。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5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13/16 插页 14
198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书号 10208·115 定价 2.10 元



作 者 像

译 者 前 记

伊雷什·贝拉(1895—1974)是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生于卡沙(现属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小镇贝雷萨斯和索莱瓦度过童年。一九一六年,在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应征入伍,同时开始为进步的文学期刊《西方》撰稿,发表了一些带有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小说。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他全身心投入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指挥布达佩斯郊区的武装部队,跟反动派战斗,并在这期间,加入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他逃亡国外。一九二〇年,受命回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数度被捕。次年流寓奥地利。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侨居苏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事写作,长期担任革命作家国际联盟(总部设于莫斯科)的秘书和秘书长。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他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参加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战争,曾几次负伤。随苏联军队到达匈牙利后,他负责编辑一份叫做《匈牙利新闻》的前线报;布达佩斯解放后,又负责编辑《新生》;当时,他已是一名上校,获得了多枚勋章。

胜利复员后,伊雷什·贝拉为恢复国内的文艺生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创造性的努力,使他成为匈牙利作家的先锋,当选为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文学新闻》的主编。

他写了许多政论和短篇小说（大部分短篇收集于他的《邂逅》、《马太·扎尔卡》和《我们是人民》这几个集子中）。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强盗苏哈依》、《蒂萨河在燃烧》、《祖国的光复》，以及他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创作的伟大的三部曲《喀尔巴阡山狂想曲》(《新葡萄酒》、《林中人》和《格杰里·萨科维支的王国》)。这个三部曲于一九四一年在苏联出版，很快被译成十几种外国文字，使作者获得了世界声誉。匈牙利解放后，在国内更是一版再版，被认为匈牙利现代小说中无与伦比的成就。一九五〇年，作者因为这本作品而荣获科苏特奖金。

匈牙利人民长期内受封建压迫，外受异族奴役——从十六世纪起，匈牙利就先后为土耳其、奥地利侵占。一八四八年，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科苏特的领导下，进行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匈牙利共和国。但历时仅一年半，匈牙利又沦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一八六七年，《奥匈协定》订立，建立了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三月无产阶级起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年八月被颠覆，恢复君主立宪政体，从此全国受法西斯独裁者霍尔第统治，到一九四〇年，成为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喀尔巴阡山狂想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段时期在匈牙利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东北部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一些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奥匈帝国所谓“和平时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灾难深重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继承科苏特的光荣传统，为摆脱外族欺凌和国内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艰苦斗争的光辉历程。

三部曲通过一个破落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孩子格查的成长，他对旧社会的种种窳败腐朽的切身感受，和他作为一个知识

分子走上与工农相结合、投身革命活动的曲折道路，描写了匈牙利无产阶级第一次谋求自身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第一部《新葡萄酒》不仅描写了世界驰名的匈牙利葡萄酒产地贝雷萨斯的风土人情，而且广泛刻画了从工人到资本家，从玩弄权术的政客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等不同阶级的人物，对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发生的种种事件的不同态度，深刻揭露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展示了一幅风雨欲来、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在第二部《林中人》里，随着主人公格查一家坎坷命运的发展，故事的中心移到了下喀尔巴阡山的山村佩梅蒂。那里，地处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交界，居民有犹太人、匈牙利人和讲乌克兰话的罗斯人，他们不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就是逃避反动统治的亡命之徒，多年来，在偏僻的原始森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贫苦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哈布斯堡王朝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竭力在这个地区煽动民族沙文主义，迫害少数民族，并悍然跳上德国黩武主义者的战车，向俄国发动进攻，从而引起林业工人反剥削反迫害的斗争，并与全国无产阶级一起，与布达佩斯的工人运动遥相呼应，逐步揭开了革命的序幕。第三部《格杰里·萨科维支的王国》叙述格查如何进入大学，应征入伍，宣传革命思想，受到军官镇压，出狱后参加武装斗争，战败受伤，转入地下这一段波澜起伏的经历，以及世界大战后，下喀尔巴阡广大人民对法、捷统治下的所谓“自治”政权和实行假民主的美国爪牙萨科维支总督的合法斗争；并通过格查的奶兄弟米科拉领导红卫军与外国占领军浴血战斗和最后被俘、英勇就义的故事，反映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三部曲所描绘的画面，由城市小镇到原始森林，由穷乡僻壤到首府布达佩斯，进而铺展至多瑙河两岸和匈牙利大平原；上

自国会内阁和外国占领军司令部，下至山村茅舍和市镇贫民窟，都一一刻画，广泛展现；其笔触所及，让民族败类的丑行，警察宪兵的凶恶，资本家的贪婪，流氓的无耻，国际反动势力的狼狈为奸和内部的相互倾轧，小资产者的彷徨和觉醒，知识分子的走向革命，工人阶级的前仆后继，革命家的宁死不屈，红卫军的英勇战斗，交相映演，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采而又激动人心的图景。我们在书中看到，在战争和革命风暴的严峻考验下，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如何升降沉浮，或满腔义愤，或趁火打劫，或献身革命，或出卖灵魂，或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生死友谊，或因立场不同而由恋人变为仇敌；崇高与卑鄙，善良与丑恶，风雨雷电，刀光剑影，汇成一支跌宕起伏，时而令人振奋，时而令人悲愤的时代交响乐。

“狂想曲”一词，本来是一个音乐名词，是一种以富有民族特色，形式自由奔放为特点的史诗性的器乐曲。一九五七年，伊雷什·贝拉在他的《蒂萨河在燃烧》的后记中说：“由于描写了有趣的历史文献，在不小程度上我又成了编年史的作者。”《喀尔巴阡山狂想曲》也是一部编年史式的作品。而作者采取“狂想曲”这种手法来写“编年史”，使他可以更好地刻画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更好地剖析整个社会，同时也使作品更易于真实地反映生活。第一人称的叙述，朴素的笔触，真挚的感情，在在使读者感到，三部曲尽管故事不无虚构，但显然带有作者自传的色彩。至于作者观察的敏锐，结构的巧妙，辛辣的讽刺，轻松的幽默，以及仿佛与读者促膝交谈娓娓道来的文体，都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三部曲的故事发生于五六十年之前的一个欧洲国家，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从来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而书中描写的一个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进步的思想感情和走过的曲折而光荣的道路，读来则更使人感到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斗争是多么相似又相近。我们相信，这本书将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汤　真

1981年6月于百花洲

目　次

第二部　林　中　人

第三部　格杰里·萨科维支的王国

第　一　部

新葡萄酒

加里波第和威廉皇帝

我们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两幅彩印画。一幅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伟大的自由战士，穿着他的著名的红衬衫。另一幅是威廉二世，威风凛凛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装腔作势地朝天翘着尖胡子。我们拥有这两幅画像，决不是偶然的。加里波第和威廉皇帝都有一番使我父亲非常钦佩的丰功伟绩。父亲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到了晚上，一天劳累之余，他会安静地吸着他的长烟斗，一口口喷着烟雾，反来复去、详详细细地讲述加里波第的英雄业绩和威廉皇帝的豪侠行为。我们孩子们对这两人的故事都已听得滚瓜烂熟，但父亲一开口讲，我们总是很高兴的：

“要是你们问，我干吗这样喜爱加里波第这位伟大的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的英雄，嗯，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可以原原本本讲给你们听。”

父亲认为，加里波第热爱匈牙利人更甚于意大利人，他为生来是个意大利人、不是匈牙利人而始终感到遗憾。对加里波第来说，任何别的事情，是没有办不到的，可是，对于发生这种偶发事件，他却毫无办法加以纠正。这位穿红衬衫的无畏的英雄，在把德国狗赶出美丽的意大利之后，引用父亲的话来说，加里波第制订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将给加里波第的名字带来不朽的荣誉，给我们可怜的匈牙利人带来无限的幸福。加里波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反复审查他的计划，这里

改一下，那里改一下，直到觉得已万无一失为止。于是，他给匈牙利著名的自由战士、当时正在伦敦过亡命徒的艰辛生涯的拉约什·科苏特①写了封信。加里波第邀请科苏特到罗马去作客，假若他（科苏特）不想去，又没有工夫去的话，那就请他允许他（加里波第）去朝见住在英国雾都的这位热情的匈牙利人。此信及时地发出了，几个星期后，这位意大利的英雄也就启程了。

那个计划使科苏特很高兴。加里波第打算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让一千个穿红衬衫的意大利人和一千名穿镶金边制服的匈牙利轻骑兵，在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登陆，把奥地利人赶出匈牙利，就跟他在意大利所干的那样。这位热情的匈牙利人为这个计划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而他是直接听可靠的人士说的），可是，很可惜，这个计划到底没有实现。这两位英雄在胜利之后如何办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加里波第要科苏特当匈牙利国王，可是科苏特对这话连听也不愿听。他不愿做国王，他不做！

"那不是干傻事吗！"母亲驳斥道，她一边听着，一边补着鞋子。

父亲猝然停住了。

父亲生来有个脾气，他愤怒了，或者生气了，就默不作声。他硬是不开口。一旦他不讲了，要他再讲是很难的，不过有时候也会再讲下去。于是，我们知道，科苏特虽然拒绝当国王，却把圣斯特凡②的王冠奉献给了加里波第。可是，加里波第也无意当

① 拉约什·科苏特（1804—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一九四九年匈牙利宣布脱离奥地利帝国独立，成立共和国，出任元首。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他曾两次发动起义，均未成功。1890年拒绝奥匈帝国对他的特赦，不肯回国。死于意大利。

② 圣斯特凡（即斯特凡一世，1001—1038），匈牙利第一个国王。

国王。在这当儿，如果母亲插嘴说："那不是干傻事吗！"那么，这故事就完结啦，我们可以从我们出生时奥地利皇帝仍旧统治着匈牙利这一事实，推断出加里波第的计划最后是流产了。在这种场合，父亲就一言不发了，他只是掏空他的烟斗，喝上两三杯贝雷萨斯葡萄酒，就上床睡觉了。不过，要是母亲不打岔，容许那位穿红衬衫的意大利人拒绝圣斯特凡王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听到，这两位英雄在拥抱告别时，双方都哭了，而他们既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匈牙利也就依然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欺凌了；在家里，父亲一向管哈布斯堡王朝叫做"匈牙利人民的葡萄虫"。

这句话说明了一切，第一，父亲是"独立和一八四八年党"①的拥护者，第二，他的职业是种植葡萄树；因此，他把有害的葡萄虫——以及德国佬——看作是人类最可恶的敌人。他十分珍视葡萄酒，憎恶葡萄虫，但爱也罢，恨也罢，都不能解释他跟加里波第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那些熟悉我祖父的浪漫史的人才清楚。

我祖父二十二岁时，于一八四九年参加了科苏特的军队。在帝国的温狄斯格拉支将军和沙皇的巴斯凯维奇将军扼杀匈牙利的自由后，祖父就逃亡到了意大利。这位亡命的匈牙利自由战士是一个犹太人，一心想当犹太教教士。也许是这个原因，更可能是由于他有一个好嗓子，他依靠同一教派的人的照顾，一连两三年都不用干活，并能过着悠闲的生活，这样，一直到意大利的葡萄酒使他跟一个那不勒斯街的歌女搞到了一起。他们恋爱的细节，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祖父不顾他同一教派的人的反对，恋上了他的心上人后，就只好去工作了。他成了一个木

① 一个反对一八六七年与奥地利妥协的主要原则的政党（一八四八年是爆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革命的一年）。

匠。后来，为了摆脱他钟爱的对象，他在一条船上充当厨师，来到了南美洲。有一段时候，他是阿根廷的一个侍者，之后，他在那儿开了一家马扎尔①酒菜馆。他攒了一点钱，娶了一个意大利一犹太血统的领唱者②的女儿，就是我的祖母，而我祖母最引为自豪的，就是她认识加里波第的妻子。

一八六七年，当匈牙利的贵族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奥地利皇帝成了匈牙利国王时③，祖父告别了南美洲，回到他出生的树木遍布的喀尔巴阡山来了。他用南美洲带来的钱，从一个回奥地利去的前帝国官吏那里买进了一座葡萄园。一回到祖国，祖父对神学的热诚又重新抬了头。他穿着镶边的匈牙利制服，埋头钻研犹太《圣经》，同时也喝了大量的葡萄酒。他把学术研究和喝酒巧妙地联系了起来。他会一连几小时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摩西山上产的新贝雷萨斯葡萄酒是绿黄色的呢，还是黄绿色的呢。自然罗，在思索之间，他是喝酒的。没多久，他的面色由于绿黄色的酒或者黄绿色的酒而变成红褐色了，他那副巨大的骨架，也因为饱经风霜后，过了几年安静生活而弯曲了。过了六十岁，他开始回想起来，他本人在小时候就认识科苏特。快七十岁时，他甚至记得曾经多次见过加里波第。他十七个儿子中，他埋葬了十六个。只有我父亲，家中最小的一个，总算在他去世时还没有死掉。是他继承了那几座葡萄园。是父亲在祖父的坟上

---

① 马扎尔族是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② 指教堂歌咏班的领唱者。

③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于十八世纪侵占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人民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科苏特领导下，进行了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匈牙利共和国。后匈牙利又沦为奥地利的一部分。一八六七年成立了奥匈帝国。

竖了一块墓碑，碑文上说，死者“是一个有一颗匈牙利的心的犹太教士，他至死也是一个科苏特和加里波第的忠诚斗士”。

除了这几座葡萄园和对科苏特与加里波第的崇拜之外，祖父还留给我们一幢房子和一个很大的果园。果园中的骄傲，是那棵科苏特树，一棵老大的杏树。在我小时候，这棵树光开花不结果。贝雷萨斯人都知道，在巴斯凯维奇入侵之前，拉约什·科苏特曾在这棵树底下跟他的将军们商谈了一个通宵。当这棵树枯死了的时候，父亲把空心的树干捐赠了国立博物馆，可是博物馆拒不接受这项礼物。粗暴的博物馆长以这样一句话回答了父亲的爱国举动：拉约什·科苏特从未到过贝雷萨斯，并劝我们把这棵树烧掉。这个答复不仅使父亲生气，而且把全市镇都激怒了。那个住在我们隔壁的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叫父亲直接去向国王控告。要不是父亲生来认为对待无礼的最好办法是保持沉默，现下这棵科苏特树既已处于危急关头，他是很可能会这样办的。于是，母亲就把这棵科苏特树当木柴烧掉了。

上面讲过，我们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座很大的果园。那是真的。不过，这也是真的，当那棵科苏特树枯死时，我们的果园可已不是很大——而只是大一点罢了。没过多久，父亲把大半个果园作为屋基卖掉了。有人认为他在这件事上赚了大钱，那是搞错了。父亲出售祖父的果园，不是想发财，相反，是因为他越来越穷了。

“日子不好过呵，”父亲老是说，埋怨政府。

反过来，母亲却埋怨父亲。

“多产点酒的事，你啥也不做，就只晓得多喝点儿。”

“葡萄产多少，是上帝的事，”父亲发表意见了。“至于喝嘛，那可是——”

父亲说话，向来是一副慢声慢气的腔调。另一方面，母亲却口齿挺锋利。她不停嘴地责备父亲，唤他是懒鬼，不过——如同她向我们孩子们承认的——已不象刚才那样生气了。

"你们的爸爸象个老太婆，要不是这个索命鬼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在这个家里，至少也是个男子汉啊。"

耗尽我母亲精力的这个索命鬼就是我。这件事，我在童年时代反复听讲过多次。我一生下来，就犯了谋杀罪。事情是这样的，贾诺西大夫、接生婆克蕾克斯"阿姨"和我母亲都断定了我将在什么时候降生，细心地做好了接待我的种种准备。可是我却没有准时到达。我的外婆认为生外孙是非到场不可的，她从布达佩斯打了个电报来："星期一早晨七点到。"父亲到火车站接外婆去了，女佣人到市场上买东西去了。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在煮牛奶。但是我把计划打乱了。我不让母亲来得及去请接生婆，甚至也没让她来得及躺下。她坐在起居室中间一块五彩的乌克兰乡下毛毡上，我就在那儿一头冲进了这个世界。当外婆来到时，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可真会管家啊！牛奶沸出来了！"

他们发现母亲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待起得来床时，她的口齿迟钝了，完全成了一个年轻的老婆婆。她后来一辈子都很容易激动。很可能还有点神经病。听到什么突然而起的响声，就会明显地发抖。听到打雷，她会呜呜咽咽哭起来。

自然罗，一切都怪我，间接的也是怪这家里没有一个男人能牢牢抓住这几座葡萄园，不让它们溜掉。我外婆给我取了"索命鬼"这个绰号。

外婆跟我父亲一样，也很钟爱高贵的传统。尽管父亲是个

彻头彻尾的匈牙利人，外婆却夸耀她的西班牙家世。她和她去世的丈夫是从萨洛尼卡来到匈牙利南部的巴耶的。她的祖国语言是西班牙语——中世纪的西班牙语——她只会说结结巴巴的匈牙利话。尽管外婆的祖先是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迫害，于一四九二年从西班牙逃到萨洛尼卡来的，可她一直到今天还说西班牙话，穿西班牙服装，是一个中世纪的西班牙女人。聪明的依莎白拉女王和刚毅的费迪南，始终是外婆讲的故事中的英雄，也就是说，不是别人，正是那两个人把犹太人撵出西班牙的。

"外婆，依莎白拉对你们这样坏，你干吗还这样欢喜她啊？"

外婆没提防到会提出这个问题。她想得出神了。

"伊莎白拉使西班牙变得伟大啊，"她最后说道。

当时我是相信她的。不过，这个回答却使我很费解。

"可她对你们都很坏啊，"我坚持说。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王，"外婆说。

"可是——"

她那苍白的面孔突然羞红了。

"你不懂，你就闭嘴吧。"

要说嘛，那也是对的。

外婆是个瘦小、灵活的女人。我们——她的外孙们——觉得她有点儿古怪；但那些泛泛之交的人，却都认为她疯疯癫癫。我们是根据她的言谈来推断的；别人是根据她的穿着判断的。你倒想想看，在贝雷萨斯这个匈牙利的内地市镇里，有穿匈牙利人的镶边服装的，有穿乌克兰人的无袖绒衣和便鞋的，有穿犹太人的束腰长袍和戴狐皮帽的——可现在，在这个市镇的没有铺石子的街道上，却看见了一件按中世纪西班牙公主画像上的式样裁制的衣服，其引起的轰动，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都不愿跟

外婆一起上街，因为人家都会笑我们，不过，我们都欢喜跟她一起在家里。她会讲身穿天鹅绒长袍、头发光滑柔软的公主们的精彩故事。不错，她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冒火。她大发雷霆时，会狠狠地掴人家的耳光，但过了一会儿，她又会吻他。

为什么鼎鼎大名的萨洛尼卡的犹太教士的后裔要迁居到巴耶这个匈牙利市镇上来，这我不大清楚了。我只晓得——当外祖父被推选为巴耶的犹太教士后，他就跟萨洛尼卡的亲属断绝了一切交往。之后，乔斯·西维拉一共只给巴耶的犹太人当了三个月的精神上的指导者。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到多瑙河去洗澡——淹死了。他的寡妻写信跟萨洛尼卡的亲属重修旧好，每月收到他们由维也纳的银行汇来一百弗罗林①。

母亲的哥哥福洛普·西维拉大夫是索莱瓦（一个离贝雷萨斯四五小时路程的村子）一个区医官。那里不种葡萄，布满森林的大山，峰巅上的积雪只在六月才融化。母亲小时候曾在索莱瓦度过几个夏季；威廉皇帝的画像，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母亲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有个名叫维尔玛的美丽的教师住在索莱瓦的福洛普舅舅家里。维尔玛小姐和母亲——她本人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成了知心朋友。

母亲对维尔玛小姐的金红色的头发和蓝中带灰的眼睛不胜羡慕，维尔玛小姐对母亲的黑杏眼和乌黑的头发也心醉神迷。

维尔玛小姐后来到了布达佩斯，在那儿青云直上。她结识了国会议员迪佐·班菲男爵——而且没过多久，维尔玛小姐就成了男爵夫人。后来，班菲男爵还成了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他被任命为匈牙利的内阁总理，维尔玛小姐现在已被称为“阁下”了。

① 弗罗林，奥匈帝国货币单位，合一百克劳采，值英国的两先令，亦即德国、荷兰货币盾及匈牙利货币福林。

劳累了一天后，父亲会坐下来，一边抽着长烟斗，一边反复讲述维尔玛和班菲如何认识、恋爱和结婚的故事。这个故事父亲讲得如此津津有味，但我只记得，匈牙利内阁总理和他的金发夫人的幸福也曾一度笼罩了阴影。我们知道，维尔玛在结婚前是一个教师。换句话说，她曾靠劳动维持生活。因此，显而易见，那些匈牙利公爵、伯爵和男爵的妻子们，都不肯让这个做姑娘时因为干活而“糟蹋了自己”的女人进入她们的社交界，尽管她已当上了男爵夫人。

“那是很明显的，”母亲说。

“这也是很明显的，”父亲突然生气了，“由于这些个贵族婊子的态度，搞得维尔玛和她那位尊敬的丈夫很痛苦。”

“叫我就不会责备她们，”母亲顶了一句。

父亲要不是太生气的话，他本来是会吹嘘一下威廉皇帝的。

这位德意志帝国的强有力的统治者，有一次碰巧来到了布达佩斯，父亲详细讲开了。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①为了向他的显赫的客人表示敬意，在皇宫里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那位德国大使向德国皇帝泄露了内阁总理和匈牙利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又是引用父亲的话），那位威风凛凛的德国皇帝说，这一件象弗朗西斯·约瑟夫这样的老官僚几年工夫也处理不了的事，他五分钟内就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呢？吻一吻手——行一个优美的、王室的吻手礼。

父亲的故事，简洁地说，就是在那个辉煌的舞会上，威廉皇帝偏偏只吻了班菲夫人的手，也就是我们维尔玛小姐的手，而没有吻别的女人的手。这样吻过手之后，匈牙利所有的公爵夫人、

① 原是奥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奥匈合并后，成了奥匈帝国的皇帝。

伯爵夫人和男爵夫人，就都把维尔玛看作是她们社交界中同等的一员了。

威廉皇帝吻手的消息传到贝雷萨斯时，父亲坐下来给维尔玛男爵夫人写了一封措词很优美的信，祝她走运，永远幸福、健康。班菲夫人对这封词藻华丽的信不给答复，当然罗，这使父亲感到很痛心。不过，这种痛苦并不妨碍他对威廉皇帝的拳拳之忱。

“老弟，”有一次，当父亲又讲述威廉皇帝吻手的故事时，福洛普舅舅听了说道，“看来，你捐献那棵科苏特树时，国立博物馆跟你说的话，你是全都忘啦。我怕你什么时候要是去把维尔玛的手捐献给国立博物馆的话，他们会说，威廉皇帝从来就没到过布达佩斯，他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班菲夫人这个人哩。”

不消说，父亲根本不睬福洛普舅舅这一番怀疑的评论。他照样尽心竭力地培养我们孩子们时而对加里波第、时而对威廉皇帝的狂热的崇敬之情。

这样，直到有一天，父亲从墙上取下德意志帝国皇帝那张画像，把它撕个粉碎——事实如此——掷进了厕所。

这是怎么啦？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的朋友

那棵科苏特树还在的时候，父亲从早春直到晚秋，都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物的伸展的枝桠下，接待他的朋友和同伴。这个会客室里，摆了一张露天桌子和四把粗笨的白身凳。春天，会客室装饰上了那棵古树盛开的繁花。夏天，会客室围上了忍冬的须蔓，那些叶子给那疲惫的树干挡住了风。秋天，金黄的树叶子掉进了菜盘和酒盅里。那些崇拜科苏特的、或者想讨好父亲的客人，会捡起几片树叶子，拿回家去当作永久的纪念品。父亲的朋友们在这儿消磨时光，喝酒，玩牌；他的同伙也一样地喝酒，谈政治。根据"同伙"这个词儿，你可以明白，那就是每隔五年进行议员选举时投艾姆列·乌拉依的票的人。

艾姆列·乌拉依是"独立和一八四八年党"的国会议员，是由贝雷萨斯市和蒂萨哈特区的公民们选举出来的。父亲是为乌拉依进行竞选的重要人物——事实上，几乎还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理所当然，许多支持乌拉依的村民都会来向父亲讨教。而父亲是既不吝教言，也不惜葡萄酒的。他的教言是否高明，我不得而知，但我可以断言，酒是挺好的。很可能，正是这酒树立了父亲的政治威望。

乌拉依每年都到贝雷萨斯来旅行，逗留上几个星期，在他的几个有名的拥护者家里吃中饭或晚饭。他也常常在吃中饭或晚饭时光临我家。我第一次见到艾姆列·乌拉依时，我准已有五

岁了。

他来吃中饭。他是一个高个子，宽宽的肩膀，红润的脸膛，灰白的头发。他有一把很美的又浓又黑的翘胡子。乌拉依吻了母亲的手，送给她一瓶布达佩斯香水。他跟父亲亲切地握手，并且叫父亲感到很意外，他竟还赠送了一只很大的海泡石烟斗。他开玩笑地拍拍我的头，是作为补偿吧，又送了我一顶挺华丽的红色的轻骑兵帽。

我们在那棵科苏特树下面吃中饭。树上缀满了粉红色的花。

吃饭时，我跟平常一样喋喋不休。有几次，我准是胡说八道了，以致我们尊敬的客人终于对我提出了警告：

"扯谎的人会长个红鼻子。"

我当场就要证实一下这句令人惊异的断言。

"扯个谎吧，叔叔。让我看看你的鼻子会不会变红。"

父亲瞧瞧我，又瞧瞧客人，担心这一下他们的友谊要完蛋啦。可是，乌拉依却哈哈大笑了。

"嗬，孩子，我扯个什么谎好呢？"他问道，一面从他的脸上擦拭笑出来的汗珠。

"你就说个谎，说苹果是这棵杏子树上长的。"我提议道。

乌拉依高声大笑，笑得眼泪都从腮帮上滚下来了。

"巴林特太太，"他对我母亲说，"我们能把这个小家伙培养成为一个大臣哩——不是国会议员。他会成为匈牙利的第一个独立党的大臣。"

父亲咬着胡子，深为感动。母亲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这个未来的大臣，骄傲得眼睛都闪闪发光了。母亲对于父亲的竞选活动(他已为此花掉了半个果园)向来不以为然，可是从此以后，她

却怂恿丈夫加劲搞政治活动了。之后，在这棵科苏特树下面，葡萄酒也耗费得更多了。

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父亲的朋友们吧。乌拉依，当然，并不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是他的理想。父亲的朋友是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参事巴洛克和小泰马斯·艾舍，——拉科治[①]时代著名的自由战士泰马斯·艾舍的后裔。

巴洛克参事和父亲早就是军队中的弟兄——打那时起就建立了他们的友谊。他们还有别的一些共同的特性。巴洛克跟父亲一样，也是艾姆列·乌拉依的热诚的信徒；此外，他甚至比父亲更加贪杯——也更不会喝醉。巴洛克叔叔的鼻子是紫铜色的，即使他有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实话——虽然那是很难得的。巴洛克叔叔认为，管理这个城市的并不是盖什市长，而是他这个普普通通的参事；实际上，连那个有无上权威的州长古拉克西，也经常向他请教来着。这位参事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喜爱的话题——他夸耀说，在家里，巴洛克的屋里，当家作主的是他，而不是他的老婆。别的男人出门都提根手杖或者拿把雨伞摆摆阔气，巴洛克可才不呐；他不管去上班或者去访亲问友，右手总是提一个柳条篓子盛的五升装的大酒瓶子。这位参事向这个瓶子讨教，远比古拉克西州长向参事讨教来得勤。冬天和夏天，巴洛克都穿着一双有踢刺的轻骑兵靴子，穿金银边的裤子，轻骑兵的斗篷式短外衣，戴一顶有帽带的帽子。而且——我差点忘记了——他的胡子修得跟拉约什·科苏特的画像和雕像一个样。

---

① 拉科治·费伦茨(1676—1735)，匈牙利一七〇三至一七一一年农民起义的领袖。这次起义的目的是保卫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他跟父亲的朋友、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形成最明显的对照。你知道，马科维茨留的是一把装饰着皇帝和国王弗朗西斯·约瑟夫的脸庞的那样的胡子。因为不用否认，父亲的朋友马科维茨是政府党的拥护者，何况，还是为它进行竞选活动的人。当选举又开始时，父亲就在我们的顶楼的窗上挂出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我们敬爱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艾姆列·乌拉依万岁”，在马科维茨的屋子上，就一定会升起一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上面写着“我们敬爱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山陀尔·洛尼亚伯爵万岁”。当父亲把染着红色的羽毛分给每一个汤姆、迪克和哈里①，让他们作为反对党的支持者的标志插在帽子上时，马科维茨就分送雪白的羽毛——政府党的记号。

乌拉依胜利了，击败了洛尼亚。

选举的结果一公布，父亲就嘲弄他的政敌、邻居和好朋友马科维茨。反过来，马科维茨也取笑父亲。

“你笑什么？你的伯爵又输掉了。”

“我是笑你，”马科维茨回答道。“乌拉依重新当选，叫你又花费了五桶自己的葡萄酒。我的伯爵是失败了——给我却带来了一点好处。约斯卡，你对政治一窍不通。”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赢了的人？”父亲怒冲冲地喊道。“而你戴维却懂？你，输掉了的人？”

“对啦，”马科维茨叔叔笑道，“正象你所说的。”

父亲的第三个朋友，小泰马斯·艾舍不住在贝雷萨斯。他住在塔巴村，离贝雷萨斯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据传说，塔巴是大泰马斯·艾舍的故乡。塔巴村的村民是他们著名的老乡的忠

① 普通人的名字。

实党徒，全部都是库鲁茨①。当他们驱马进城前来选举他们的代表人时，骑在前头一匹马上率领着马车队的青年人，穿的就是一件拉科治时代的服装。乌拉依给塔巴村的村民捐赠了这身服装，还送了他们一面海绿色的旗子，旗上写有一行金字："塔巴现在是，永远是库鲁茨！"

同时代人都没有留下一张这位大泰马斯·艾舍的画像，这个拉科治的农民将军的赤脚士兵的大军，挥动棍棒和鹤嘴锄，曾摧毁了帝国的军队。贝雷萨斯一带的人民，象他们的祖先一样，对这位赤脚将军十分崇敬。由于没有他的画像，因此对于他是个什么长相，没有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概念。罗斯人②的伐木工确信艾舍穿的是鹿皮鞋和农民的粗绒无袖长袍。匈牙利农民们的想象力使他穿上了迎风招展的白亚麻布裤子。

我们的泰马斯·艾舍，当塔巴村的村长已经二十年，不用说，他是欢喜穿匈牙利服装的，而且，他还着了他的远祖的紧身镶边裤。他的衣着上唯一非正统的项目，是一双在拉科治时代只有高贵的士绅们才穿的黄靴子。他象拉科治一样，蓄着垂肩的长发。他难得进城来，来了就到我们家吃午饭。吃过了饭，他和父亲会来上一两杯葡萄酒。

艾舍和父亲俩都是默默地喝酒。艾舍不爱言谈，也不欢喜别人跟他谈话。他来了，要是碰到巴洛克在我们家，他就会多待一会儿；要是马科维茨在座，他就提前告辞了。艾舍叔叔老是带点礼品来——白吃饭是有失塔巴村长的身份的。他有时带来黄

---

① 库鲁茨是十七、十八世纪为匈牙利的自由斗争的战士。传说中的泰马斯·艾舍是那些战争中的费伦茨·拉科治第二的将军之一。这个字用在这里，是表示"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爱国者"。

② 斯拉夫人的一支，即所谓"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油，或者一篮鸡蛋，有时带来一对小鸡或者鸭子。他给我的礼物，是他通常跟成人们握手那样地握握手。

我是一个谦虚的人，没有把艾姆列·乌拉依列为父亲的朋友。由于另一个原因——虚荣心——也许我也不该把费克斯凯叔叔列入。因为费克斯凯与其说是父亲的朋友，不如说是个被保护人。费克斯凯叔叔继承了父亲所有旧衣服和破鞋子。每当他来我们家时，一盆汤、一杯酒、满满一烟斗烟总是等着他的。

费克斯凯叔叔住在吉普赛区。吉普赛区的正式名称是迪克街，可是贝雷萨斯的市民们向来管它叫吉普赛区。即使那条街上也许压根儿就没住一个吉普赛人。吉普赛乐队的指挥杰诺斯·贝雷吉·基斯，住在拉科治街，他的乐队队员们住在艾舍街的一幢房子里。那些补锅子修壶子的吉普赛人，也都住在澡堂公园后面维克河畔的一些帐篷里。住在吉普赛区的人，只在收获时节和选举运动期间才喝葡萄酒，虽然——如同父亲告诉我的——他们没有投票的权利。有一回，我当着马科维茨的面问道，那些住在吉普赛区的人为什么不投票。父亲回答说："因为他们不纳税。"

"他们为什么不纳税？"

"因为他们不愿干活，"醋坊老板回答道。

至于费克斯凯叔叔，我不知道他是愿干活还是不愿干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干活。他不能干活了。他的右臂从肩膀起整个儿都没有了。小时候，我常常想，他是打仗变成残废的吧，可事实并非如此。费克斯凯曾在蒙卡契步兵团服役——父亲和巴洛克叔叔也在那里吃过同样的烤得很蹩脚的皇帝的面包——他回家来时身体很健壮。

费克斯凯的胳膊，是在索莱瓦的堆木场里干活时为试用一

把新花样的锯子而丢掉的。费克斯凯叔叔要求赔偿，可是法庭判决说，事故是费克斯凯叔叔粗心大意造成的，并不是由于工厂老板的疏忽。既然事故的责任在他，他也就不能得到赔偿了。

父亲为他的朋友去拜访了法官。

"这事我无能为力，"法官告诉他。"要是费克斯凯应给予赔偿，那么工厂里的罗斯工人丢掉了一只手，弄瞎了一只眼睛，就都会前来要求赔偿啦。巴林特先生，你肯定不是想叫一个匈牙利的工厂去给那些罗斯工人付赔偿费吧！"

不，那我父亲也不希望这样。这样，费克斯凯叔叔离开蒙卡契医院，就在贝雷萨斯的吉普赛区，跟那些因不愿干活而不纳税的人一起住了下来。

我不顾母亲严格的禁令，常常跟费克斯凯叔叔一起在整个吉普赛区到处溜跶。费克斯凯叔叔断言，在吉普赛区一条街上的房子里住的人，就差不多有全贝雷萨斯的人那么多。

有一天，我大胆地进入了费克斯凯的住所。他住的是一个单间，只有一扇孤零零的小窗户。地上扔着两条草垫子；靠窗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摊着一张报纸，摆着半个面包，两三个洋葱头，一只破玻璃杯里盛着盐和红胡椒。屋里的气味很难闻。

费克斯凯跟一个远亲、一条腿的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合住这间屋子。阿兹泰洛斯曾在德国和瑞士，后来在布达佩斯干活，是个多年的印刷工人。阿兹泰洛斯回到贝雷萨斯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现在他是一个卖报人，可是，费克斯凯说，他收入微薄，几乎难以餬口。

"他是因为思乡才回到贝雷萨斯来的吧？"我问道。

我很欢喜思乡这个词儿，虽然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并无一点概念，因为我有生以来就没离开过我的家，最远只到过索莱瓦。我四岁时，曾到过索莱瓦，那时得了百日咳病。

“思乡？”费克斯凯惊讶地喊叫道。“见鬼，不！他给放逐了。那个流氓班菲——”

“哪个班菲？”我惊惶地问道，“你说的流氓不是维尔玛小姐的丈夫吧？”

费克斯凯啐了一口唾沫，没有回答。

为了岔开这个话题，他叫我看看排在窗台上的阿兹泰洛斯的书。看来，这个贝雷萨斯卖报人不但看匈牙利语的书，还看德语和法语的书哩。

费克斯凯也看得懂意第绪语①的书。要是一个可敬的路德派②的匈牙利人懂得意第绪语，会使人感到惊奇，那我必须承认，一上来我看到这情况，也感到很奇怪。这是说，在我熟悉索莱瓦的体制之前，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索莱瓦的堆木场和铁路建筑队里雇有说匈牙利话、乌克兰话和犹太话的工人。犹太人组织了一个什么自学团体，匈牙利工人和乌克兰工人也都参加了。尽管意第绪语把他们难住了，使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费克斯凯会看意第绪文，会讲意第绪语，使我很诧异，但他知道我对神圣的犹太文竟一字不识，却更加感到惊讶。

“呃，你是算哪门子犹太人啊？”他非常愤怒地问道。

“我是匈牙利人。”我一本正经地坦率告诉他。

费克斯凯不能在我身上实验一下他的犹太知识，感到很扫

---

① 一种犹太人日常使用的国际语。为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

② 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派的创始人。

兴。但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所有的摩西律法[1]和全部犹太文化中，家里只拿两件事看得很神圣：父亲严格遵守在犹太安息日[2]里休息，母亲煮美味可口的炸熏鱼[3]。父亲的朋友巴洛克和费克斯凯，都十分喜欢炸熏鱼。马科维茨则安息日休息一下就心满意足了。他一吃炸熏鱼就呕吐。他有胃病。每当马科维茨看我们当着他的面，狼吞虎咽地吃母亲烹饪的这个拿手好菜时，他就感到给丢在一边，成了局外人。有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跟费克斯凯同住的那个卡尔曼·阿兹泰洛斯来到了我们家里。他给父亲送来一份布达佩斯的反对党的报纸，给马科维茨一份政府党的报纸。

阿兹泰洛斯长得矮矮墩墩，不蓄胡子，脸修得光光的。他留着剪得很短的栗褐色头发。我猜想，他身上所穿的东西，衣服啊，鞋子啊，全是费克斯凯穿旧了的。

"哼，全贝雷萨斯都少不了——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婊子养的，"当阿兹泰洛斯转身走的时候，马科维茨骂了一句。

阿兹泰洛斯无意中听到了马科维茨这句话。他转过身来，一言不发地瞪了马科维茨一眼。他有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

"这个下流的社会主义者，"阿兹泰洛斯走后，马科维茨又咕哝了一句。

社会主义者？我很欢喜这个很特别的词儿，它听来挺悦耳的。我问父亲社会主义者是什么意思。父亲耸耸肩膀，不作回答。

"呃，你为什么不教教你的儿子，约斯卡？"马科维茨气冲冲

---

① 摩西是《圣经》中传说的希伯来人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其手。

② 犹太教以星期六为礼拜天，即安息日。

③ 这是犹太人一般在节日吃的佳肴，或译炸鱼团，是用大蒜、葱头等及麦粉和鱼肉调制后炸煮而成。

地问道。"你把威廉皇帝的画像挂在你的屋里，可你对于威廉的金玉良言却从来不讲讲。说到班菲时，你反反复复地净讲他吻了她的手，或者跟他结了婚，或者天晓得他跟你的维尔玛干了别的什么事，而就不讲讲他当时正因为搞得这些个流氓不敢轻举妄动，这才保卫了这个国家。换了我是他啊，我会活活剥掉这些下流胚的皮。下流胚，他竟用那双白痴的眼睛那样瞧着我。"

"社会主义者，格查，我的孩子，"醋坊老板对我比较温和地说，"正如威廉皇帝说的，社会主义者是无国籍的流氓，我完全同意威廉皇帝说的——无国籍的流氓。"

无国籍的流氓？这个词儿听去多逗人啊。我想问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可看到马科维茨真的生气了，我只好遏制了自己的好奇心。

要知道，巴洛克叔叔在背后管马科维茨叫"红头马贩"，而且每当打牌争吵起来时，甚至当面也这样称呼他。不错，醋坊老板的胡子和头发确实是赭褐色的。他因为患有一种慢性病，使得他的眼睑上也有一道红圈圈。至于说他是马贩子，马科维茨的主要职业本来就是做马生意嘛。他自称是醋坊老板，显然是因为这个称号好听一点。马科维茨获得老板这个称号，是由于他有一个又聋又哑的男仆，在他院子中一个东倒西歪的车棚里为他酿醋。这个醋坊老板，象巴洛克一样，不管冬天夏天，都穿靴子。他虽然没穿马裤，却穿了一条条纹裤，两个裤脚管刚够塞进他的靴筒里。一件藏青的双排钮扣的外衣，一条旧得褪成灰白色的黑领结，一顶瘪塌塌的绿色宽边帽，是他的一身日常打扮。他裤子扣子从来不好好扣一下，有人提醒他时，他就哈哈一笑。

马科维茨有九个孩子。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萨穆大概大一岁，米克沙只比我小两天，特丽兹比我们俩晚出生十四个月。

马科维茨的女儿特丽兹，长着红红的腮帮，褐色的头发，圆圆的脸庞，是我的第一个爱人。我记不起这场初恋是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记得，马科维茨家果园里的果树，尽管跟我们家的一样，长得果实累累，当我在恋爱时，我却还是天天给这位特丽兹小姐送去苹果、梨子和李子。我还记得，不管我给我的爱人送去多少水果，这位马科维茨小姐总还要向我要。因此，不用说，我为我的初恋而感到痛苦，因为我的装满水果的荷包可不是运货的马车啊。

我第一次谈恋爱时，已经五岁了。

五岁时，我跟大多数贝雷萨斯的孩子一样，在游泳教师霍蒙纳的指导下，学习游泳了。那条又狭又浅的维克河懒洋洋地流经贝雷萨斯。胖鼓鼓的秃头游泳教师霍蒙纳站在河边的一个木排上，嘴里不停地咂着酸水果糖。当地的报纸登过一条新闻，说霍蒙纳游泳，连一玻璃杯的水也游不过去。十分可能，霍蒙纳并不会游泳，但这丝毫无损于他多年来给贝雷萨斯青少年传授游泳技巧的功绩。

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教师。待把他的学徒们集合在木排上，霍蒙纳就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直挺挺地俯下身去，做游泳示范动作了。我们孩子们都扑卧在给太阳晒得又干又烫的木排上，就此学会了初步的划法。接着，等我们吸收了游泳的基本理论后，霍蒙纳就把我们一个个扔进了水里。

"游啊，"他命令道。

我们吓得尖声直叫，挥着手臂，巴扎巴扎又快又猛地划去，吞下了半江又黄又浊的维克水。

霍蒙纳努力保持着身子平衡，站在木排边沿上，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看到一个在水里挣扎的孩子，他就拿竹竿朝他一伸，

喊道：

“抓住，小家伙！”

一些确实没有游泳天才的孩子，上过一二堂课，就跟霍蒙纳分手了。游泳教师可不会为这些孩子而掉眼泪，因为他早已预先收了学费——每人两福林。不过，每年被证明为具有游泳天才的另外一些学生，也始终没有学会游泳，因为到刚开始单独游泳时，他们就淹死了。譬如，和我同时进入霍蒙纳的学院的米克沙·马科维茨，就是这样。天晓得怎么一来，米克沙钻到木排底下去了，直到过了一个小时，霍蒙纳才在三个渔夫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把他拖了出来。这时，游泳教师的学生们全都逃散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蹲坐在一棵柳树的树干上，观看着抢救工作。我甚至根本没想到米克沙·马科维茨已经没有了。我嚼着面包和黄油，要不是记起了马科维茨叔叔早上让我们到维克河去时说的话，我才不会着急哩：

“要是你到吃中饭时还不回家，我就撕掉你的耳朵。”

可是，这时可怜的米克沙已躺在灼热的木排上了。正是在这个木排上，他三天前学会了初步的游泳动作。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呆瞪瞪的眼睛——一切都变成漆黑了。一个渔夫背我回到家里，母亲在床边守了我三天。

出了这件事，游泳教师的学校关闭了几天。后来，过了一星期，由于霍蒙纳的远亲、古拉克西州长的帮忙，又重新开始教练了。到了八月里，我学会了蛙泳，也会狗爬式了。为了打赌，我横渡了维克河，还歇也不歇地游了回来。

秋天，父亲让我进了当地小学校的一年级。

匈牙利王国的法律规定，孩子不到六岁不得上学。父亲去拜访了山陀尔·托罗斯校长，他是一位暗中拥护独立党的匈牙

利绅士。父亲请他对我通融一下。

"请想一想，先生，我讲的这个孩子，艾姆列·乌拉依说过，是个有朝一日会当大臣的孩子。一个独立党的大臣！到那一天，贝雷萨斯学校——也许整个市镇——都将为我的格查而感到骄傲哩！"

这一番话并没有效果，于是，父亲——在醋坊老板的劝告下——就给山陀尔·托罗斯送了一小桶葡萄酒。这一番话奏效啦。

在学校里，我不仅从哈尔莫斯先生那里学会了读、写、算，而且获得了对天地万物的一个固定概念。哈尔莫斯先生从来不刮胡子，而且长年不断地患感冒。

我学习后才知道，匈牙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帽子，那我们的国家就是帽子上的花束。"① 我还学习到，匈牙利人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勇敢的人，这个星球上别的民族的人，都是既羡慕我们，又害怕我们。哎呀，我还学习到：这个地球上别的民族的人，都妒忌我们和憎恨我们——事实上，他们正在策划谋害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象匈牙利人那样高贵。

最坏、最卑鄙的敌人是俄国佬，莫斯科人。当哈尔莫斯先生一讲到俄国佬时，我的心目中就会出现一个红胡子、斜眼睛的人，他双手龌龊，衣服肮脏，蹲伏在一棵粗大的树干背后，握着一把刀，窥视着匈牙利。俄国佬那熊爪般的手中握着的那把刀，活象屠户的切肉刀。我是多么憎恨莫斯科人啊！

哈尔莫斯先生拿他的俄国佬把学生们吓得如呆如痴，但他

---

①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诗。

转瞬间又给我们解除了疑惧：

"在这个地球上，匈牙利人不用怕任何敌人，因为他知道，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国王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以及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匈牙利的轻骑兵，在匈牙利人睡眠时，都在守卫着。要是俄国佬来打我们，匈牙利人就会把这个卑劣的种族消灭掉。我们将连吸奶的孩子也不饶过。"

是的，我凭着一切神圣的东西起誓，我一定连婴孩也不饶过。因为我爱古老的匈牙利王国，甚至超过我爱特丽兹·马科维茨，而我恨俄国佬，更甚于我恨别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

我学习得非常好。哈尔莫斯教师说我是"一年级的得奖学生"，一年级的教室在新教堂院子里古老的学校大楼的底层。年终时，我带着记载我的光荣分数的成绩单，外加一本得奖的书籍，回到了家里。父亲、母亲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欢喜若狂。

只有我们的家庭医生依斯特凡·贾诺西不高兴。

"夏天你得把这孩子送到山里去才好。"这位善良的大夫建议道。

贝雷萨斯

我们的左邻贾诺斯·华加是个州检察官，他的女儿伊波蕾，送给了我一本讲述贝雷萨斯兴建史的绿面子的小书。

贾诺斯·华加是个挺讨厌的家伙。如果我向他敬礼的话，他理也不理我，或者，至少是不回礼。如果我不向他敬礼的话，他又立刻注意到了，他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帽子叫胶水粘住了。真叫人难受，因此，我就避开他。

另一方面，我却非常敬爱伊波蕾·华加，因为她的茶褐色头发上经常戴着一朵花；她的衣服和双手有一种讨人欢喜的香味，而且，她还时不时地给我糖果，有时候还给巧克力。伊波蕾小姐是贝雷萨斯的美人，可能还是全州的美人。她的眼睛是紫葡萄色的，她的嘴唇比玫瑰花还红，每当那匀称的长手指拍我腮帮的时候，我就心醉神迷——可能是由于紫丁香的香气，更可能是由于幸福。可爱的伊波蕾小姐！伊波蕾第一次给我一块巧克力，我拿它给了特丽兹·马科维茨。第二次，我分了一半给特丽兹。之后，特丽兹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了——巧克力也罢，水果也罢。

伊波蕾·华加经常有一群女朋友来看望她。当她们来到时，我隔着栅栏向她们喊"我吻你的手"①时，她们都会向我文雅

① 吻手是奥地利上流社会对女人的礼节。君主政体时期，在匈牙利也变得时行了。显然是上流社会开的头，渐渐普及于各阶层。

地回个礼。这许多姑娘，没有一个比得上伊波蕾小姐。我自己只认得她的女朋友之中的一个。那姑娘名叫杰拉尔丁，是贾诺西大夫的女儿，她凭着那一双长烟管般的腿，跳得比马戏团的演员还高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当我隔着栅栏向杰拉尔丁问好时，她招招手叫我过去，她问我，我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黑，是不是我在眼睛上擦了黑皮鞋油？我赌咒发誓说，我从来也没在眼睛里擦过黑皮鞋油，可是杰拉尔丁不信地摇摇她那长着乱蓬蓬的金黄头发的脑袋。接着，为了表示并不妒忌我的墨黑的眼睛，她在我的翻领上插了一朵月季花。

看了伊波蕾给我的那本绿封面的书，我知道，贝雷萨斯完全是靠一桩奇怪的事情发迹的。很早很早以前，现在是贝雷萨斯的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名叫萨斯的牧人放牛的草原。唔，凡是有母牛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一头公牛，而萨斯的牛群里却有两头公牛。公牛出于本性，都欢喜跟母牛在一起。它不能容忍身旁再有另外一头公牛。有一天，牧人萨斯的这两头公牛大打出手，互相猛烈攻击了。它们抵着脑袋，用前脚扒着土地，在一阵狂怒中，几乎把地面都翻了过来。牧人萨斯抓起一根弯柄棍，挡开了这两头畜生。这时，他在那块给翻腾过的地上，发现了一枚很大的金币。在弯腰捡这枚金币时，他又看到了第二枚，接着第三枚，第四枚。萨斯抓过一把铲子掘了起来。不一会，他就发现了满满一桶金币，那是遥远的古代、也许是阿提拉①王朝时埋在这里的。萨斯从地洞里搬出那个桶子，用卖掉金币所得的钱，建造了一个市镇。因为埋桶子的地方叫贝雷克②，而发现者的名字叫萨斯，这个市镇就给命名为贝雷克萨斯。后来名字给改成了

---

① 阿提拉(406—453)，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王。

② 匈牙利语“贝雷克”是“小灌木林”的意思。

贝雷萨斯；这是谁的过错，我就说不上了。

也许是牧人发现的那个桶子很小，也许是建筑师大大地欺骗了这个市镇的创建者，因为贝雷萨斯毫无任何迹象可以证明，造这个市镇曾花了许多金币。整个市镇，能夸耀的就只有四幢两层楼的房子——其余的都是平房。好多房子都是草屋顶——跟吉普赛区那些房子一个样。许多屋顶都是木瓦盖的；难得有砖瓦。只有两条街有沥青人行道，另外三条，都是石子路。其余的大街小巷都没有铺过路面。倘若在冰雪融化或者秋雨淅沥的时节，你敢到贝雷萨斯的街上去走走，那可不能担保不会出事。这个市镇里那些可以称之为美的东西，倒并没有花费牧人萨斯很多金子。街道两边植着古老的七叶树和刺槐树，有的树象士兵一样排成一行，有的树长得杂乱无章，就象在市场上做了一天生意，喝了一两杯酒后成群结队地出来的农民赶的马车一样。刺槐花簇散发着芳香，栗树花好象彩色的蜡烛。夏天，一层灰濛濛的尘埃笼罩着这些树木，因为在这个牧人萨斯的市镇上，再没有比街上的尘土更多的东西了。星期天，当住在近郊的绅士们乘着轻便马车上市镇来，以及每逢周三，邻近的农民驾着运货马车来赶集时，赫赫有名的贝雷萨斯的灰尘就升到了半天高。贾诺西大夫在当地的«贝雷克报»上，展开了反对灰尘的斗争。贾诺西大夫认为灰尘是这个市镇的耻辱和灾祸，还是肺病的温床，建议这个市镇应购买一辆洒水车，夏季里给街道洒洒水。盖什市长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答复了贾诺西的文章，题目是«何处有经费？»。

晚上，街上亮起了油灯。光线既暗淡，时间也不长。街灯只点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市镇就笼罩在一片黑暗和寂静中了。只有月亮才会前来任意地破坏这片黑暗，还有那些浮荡青年，才

有权利来破坏这片寂静，在半夜里为市镇上已到结婚年龄的姑娘演奏小夜曲。杰诺斯·贝雷吉·基斯的吉普赛乐队会悄悄地站在昏昏欲睡的房子前面，奏起这个曲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姑娘，
她是我心爱的恋人……

奏过第二支歌，那个给奏唱小夜曲的姑娘，就会一连擦亮三根火柴。这是她知道小夜曲是为她而奏唱的信号，她以此表示对这番殷勤的感谢。

老是有人前来给伊波蕾·华加奏小夜曲，当然罗，吵得整条街的人都不得安睡。给伊波蕾奏小夜曲的，多半是州政府的小秘书弗朗克·华萨赫莱；他夸耀地脚穿一双黄鞋罩，头戴一顶饰着一簇野猪鬃的蒂罗尔①帽，右边的腰上吊着一根狗鞭子。贝雷萨斯的人认为华萨赫莱是镇上的喝酒大王，据说，他在全州欠的债也欠得最多。此外，他还是镇上最有名的排犹主义者；他经常向有钱的犹太人借钱，喝醉了酒，就放他的狗去咬穷犹太人。在我读完小学二年级（跟一年级时一样取得了优异成绩）那年，华萨赫莱在五月份时，几乎天天夜里都偷偷摸摸地跟杰诺斯·贝雷吉·基斯的乐队一起，来到伊波蕾·华加的窗底下。六月里，华萨赫莱也天天夜晚奏唱小夜曲，不过不是在伊波蕾·华加的窗底下，而是在马丽卡·斯扎波的窗底下。

州税务局长斯扎波那幢可爱的瓦顶新房，坐落在艾舍街的拐角上，靠近平格西·克列勃斯酒店，离我们家不远。从那儿，我们听见正在奏乐曲“只有一个姑娘……”。

---

① 奥地利西部一州。

有一天晚上，乐曲把我们吵醒了，父亲对母亲说：

"华萨赫莱不是在对斯扎波家那个姑娘奏小夜曲，而是在对斯扎波太太故世的哥哥遗留给马丽卡的五千福林奏小夜曲。"

半醒半睡中，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心里很纳闷，华萨赫莱对着演奏的那五千福林，怎么竟会擦亮三根火柴呢。第二天早晨，我很晚才醒来。贾诺西大夫正跟母亲在屋里一起喝咖啡。我对客人偷偷望了一眼，连忙闭上了眼睛，因为我知道，要是贾诺西大夫看到我已经醒来，准会不让我再睡在床上的。

"想想看，巴林特太太，那个可怜的姑娘当场就死啦。"

母亲哭了，她的眼泪滴在咖啡杯里。我半睁着眼睛，看到贾诺西大夫竭力板着面孔，可他又板不成，他自己也差点要哭了。

父亲进来了，贾诺西大夫告诉了他华加家发生的事。大清早，华加就到维克河去钓鱼了，伊波蕾走进她父亲的卧室，取来了他的猎枪，用一根带子的一头系住枪机，把另一头拴在她的脚上，拿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当女仆听到一声枪响，奔进屋里去时，伊波蕾已经死了。现在他们正在为她做殡葬准备。

我放声大哭。母亲徒劳地吻着安慰我，贾诺西大夫给了我一块有很浓的烟草味的焦糖，但我一见这块糖，想起了伊波蕾小姐给我的很好闻的糖果，反而哭得更厉害了。父亲给我喝了一杯葡萄酒，我这才又睡去了，一睡睡到靠中午才醒来。

两天后，半个市镇的人都聚集在华加的院子里和屋门口。有几个绅士甚至从乡下赶到镇上来参加伊波蕾·华加的葬礼。我跨着双腿，坐在栅栏上，听新教的卡洛斯神父致了悼词。卡洛斯老头赞扬可怜的伊波蕾：她跟她取作名字的花① 一样地可爱、

---

① 伊波蕾，在匈牙利语中意为紫罗兰。

淑静；她是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而全市镇的人都象母亲钟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喜爱她。

卡洛斯致词完毕，合唱指挥者戈夫列克吟唱了：

永别了，永别了，
亲爱的父亲，
我们要及时准备好。
上帝保祐你，亲爱的父亲，
我现在离你而去了，
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要及时准备好。……

死去的伊波蕾·华加告别生活的这首歌，我只听到这里为止。我从栅栏上滑落下来了，失去了知觉。

我患了神经质热病，病得很厉害，一连八天卧床不起。第九天上，我起来了，照照镜子，看到镜里有个陌生人在直盯着我。那个陌生孩子的头发、鼻子、嘴巴都跟我的一样——可他又不象是我。他的眼睛，也许只是他的眼色，已变得如此异样，整个容貌都叫它给改变了。

“这孩子的眼睛好象一个老头的眼睛，”我后来常常听人家这样说。

“上帝才喜欢长了这种眼睛的人呐，”我的奶妈马鲁莎一边说，一边象乌克兰人那样在身上划着十字。她是我恢复健康后几天从索莱瓦到贝雷萨斯来的。四岁以前，我爱马鲁莎胜过爱我自己的母亲。现在她是难得到我们家来了，因为她住得离贝雷萨斯很远——在索莱瓦。她是到贝雷萨斯来接我走的。

马鲁莎早晨到，下午我们就动身上索莱瓦去了。我们两个

人，马鲁莎奶妈和我，单独坐在一节二等车厢里。马鲁莎摸着我的头发，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张宽阔的雀斑脸。小小的鼻子，厚厚的嘴唇，马鲁莎的脸也许一点儿也不美，但她笑起来的时候却很可爱，甚至是令人陶醉的。当我凝望着她时，我就渴望自己重新变为一个小孩子，跟马鲁莎的关系仍旧同我们住在一起时那样。奶妈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她开始用美妙清晰的女低音唱了起来：

当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奶妈挺宠爱我。

我又变成小孩子，变成四五年前那样的一个小毛头了，那时，天天晚上，马鲁莎都唱着这首歌摇着我睡去。我头枕在马鲁莎的膝上，睡了一大半路程。

晚上七点钟，我们到达了索莱瓦。我本是到索莱瓦去住两个月的，结果却在福洛普舅舅和艾尔莎舅母家里待了两年。

索　莱　瓦

我在火车上虽然已睡了一觉，到达索莱瓦时，还是感到很疲乏。艾尔莎舅母马上给我在福洛普舅舅的书斋的一张大皮沙发上铺了一张床。在沙发的上方鸽灰色的墙上，挂着两张黑框的铜版画。两张都是肖像画。在我脱衣上床之前，福洛普舅舅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说画上一个是荷兰哲学家，名叫斯宾诺莎①，另一个是德国的犹太诗人亨利希·海涅。在睡梦中，我看见斯宾诺莎在一个豪华的舞厅里吻着班菲夫人——金发的维尔玛小姐——的手，她长得活象艾尔莎舅母。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艾尔莎舅母就把我叫起了床。她让我吃了一大片黄油面包，喝了两杯生牛奶，那牛奶刚从母牛乳房中挤出来，还热乎乎的。我的两个表兄弟正在院子里等着我。卡罗莱，福洛普舅舅和艾尔莎舅母的儿子，年纪跟我差不多。乔奇，他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大哥，从美国回来的费迪南舅舅。乔治大约比我大六个月。我们坐在垃圾堆旁边的那几个空葡萄酒桶上，一会儿工夫，就开始吵架了。我作为有一万人口的贝雷萨斯的一个骄傲的儿子，开始贬抑起只有五千人口的索莱瓦村来了。卡罗莱听了很生气，他一听乔奇说贝雷萨斯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肮脏的村子罢了，就起劲地表示同意。乔奇自己住在有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四万人口的卡沙，费迪南舅舅在那儿当舞蹈教师。我抗议说，贝雷萨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标明在地理书上就是明证，可是乔奇却不以为然地把手一挥：

“说什么地理书上写了的……你以为课本上说，一只猫是一头母牛，猫就会长角了吗？”

艾尔莎舅母看见我们坐在垃圾堆旁边，就撵我们到街上去。

“到森林里去玩吧。”

在索莱瓦，不管你往哪里走，只消十分钟工夫，就可以来到森林里。森林密布的大山，围着这个尽是木瓦或麦草屋顶的土墙小屋的村庄。山巅上罩着一层雪。只在拉托卡河滚滚南流穿过两山间一块楔形地去跟蒂萨河汇合的地方，山坡上的森林才断了短短一截子。那儿，有一个筑了两个粉红色烟囱的堆木场，每个烟囱都比新教教堂镀锡的楼塔还要高。

早晨，雪呈粉红色，下午，呈紫红色。要是云层遮住了太阳，雪就变成蓝灰色了。六月的山坡，一片苍翠，深浅如画，墨绿的是松树，鲜绿的是栎树枝，柠檬色叶子的是椴树，银光闪闪的是白杨树。刮北风，吹来松树香；刮南风，在松树香中混合着椴树和刺槐树的芬芳。

当我们正站在那里争论着，不能决定上哪儿去好的当儿，又来了一个新伙伴。米科拉——奶妈马鲁莎和牧师的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的儿子——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刺猬作礼物。

奶哥米科拉比我十足高出一个头。蓝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满脸的雀斑。他那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两片厚嘴唇间闪闪发光。

一眼就可以看出，我这位穿粗绒布裤的赤脚奶哥和穿城市服装的卡罗莱是互相嫌恶的。

马鲁莎奶妈的儿子加入到我们这一伙时，卡罗莱的栗色脸上掠过了一个怪相，而米科拉却假装不认识卡罗莱。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似的，米科拉一来就担当了领导者。我们和米科拉一起在冷冷清清的街上跑去时，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哪些房子是罗斯人住的，指给我们看，哪些是匈牙利人的和犹太人的。他告诉我们那些山的名字，给我们指出了拉托卡河最深的地方。

“那座山是谁的？”我指着一座山峰问道。

“伯爵的，”米科拉答道。

“那个双峰山呢？”

“伯爵的。”

不管我指哪一座山，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伯爵的。”

最后，想听点别的什么，我指指那个堆木场的烟囱：

“那个锯木厂是谁的？”

“伯爵的，”米科拉还是一成不变地回答。

“等一等，不能让你再这样讲下去，”我暗暗下了决心，指指一个茅草屋。

“那是谁的？”

“伯爵的，”米科拉冷冷地说。

“那个猪圈呢？”我喊道。

“不是猪圈——那是一幢房子，”米科拉平静地答道，“索莱瓦的每一幢房子都是伯爵的。只有三个神父——罗斯的、匈牙利的和犹太的——有自己的房子，还有那个药房老板和犹太大夫也是。”

“你扯谎，米科拉。”

米科拉脸红了，耸了耸肩膀。没想到，卡罗莱来帮米科拉了。

“你连这个都不晓得，他们在贝雷萨斯的学校里是怎样教你的啊？在索莱瓦，一切东西都是伯爵的；不但在索莱瓦，而且在哈斯法尔瓦、波莱纳和伏洛克也是。那条拉托卡河也是伯爵的。只有得到了伯爵的准许，人们才能在拉托卡河里捕鱼或者行船。”

“贝雷萨斯可没有这样有钱的人，”我承认道。“就是银行经理贝泰兰·卡采曼也没有这么富啊。这个伯爵住在哪儿？他住这样的小房子？”

米科拉没吭声，卡罗莱却哈哈大笑了。

“好蠢！伯爵住在维也纳，住在国王住的那条街上。”

“伯爵是匈牙利人，”米科拉说。

“他是奥地利人，”乔奇纠正他说。“欧文·桑邦-布汉姆伯爵。”

乔奇讲起这件事来，好象他一清二楚，仿佛他还认识那个伯爵哩。很可能，他听说过这个住在维也纳的索莱瓦伯爵的事情，因为他比我早四天就来到了索莱瓦。

“嗯，那么……”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那么……”

我拿不准到底要说些什么，所以最后就说了这样一句：“嗯，好吧，我们来玩点什么吧。”

“好啊，我们来玩。”

我们在拉托卡河岸上玩捉人游戏。米科拉的礼物，那个刺猬，可挺叫人伤脑筋。我不抓紧的话，它会掉到地上；我的胳膊夹得紧了，它又刺我的肚子。

“我们来游泳吧，”我提议道。“那个伯爵禁止游泳吗？”

“不。”

我们匆匆脱掉了衣服。我的伙伴们都不会游，他们就留在

靠岸的地方，在浅水滩里泼水打滚。我一个人向河中心游了去——说实在的，这是不大安全的冒险。拉托卡河并不很宽，但流得很急。那水流倒还没有什么，危险的是那些向锯木厂顺流漂去的木头。你不得不保持警惕，要不然，若是叫一根十三、四米长的木头撞到肋骨上，那就谁都会好长一段时间无法游泳。没一会儿，我就发现，要防备那些浮木，最好的办法是爬到一根木头上去。我攀登到一段巨大的椴树木上，两脚挂在水里，骑着它前进。那两个男孩，胳肢窝下夹着衣服，沿河跟着我跑。

来到锯木厂不远的地方，我骑木头骑够了，决定下来了。机器的辘辘声和蒸汽锯尖齿的锉磨声，喧闹得湮没了汩汩的水声。

我想从我这匹椴树马上下来，游回到岸上去——但我办不到。一段段木头在我周围漂浮着，互相撞击，互相拦阻——我知道，要是我跳进河里去的话，那就完蛋了。我甚至不得不把两条腿抬上来，免得叫一段发狂的木头撞成残废。

"喂，你们！孩子们！"我喊了起来，"我下不来啦。"

孩子们笑了。后来，他们商量了一下，明白了这局面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逗人，他们就大呼大叫起来了。

"救命啊！救命啊！"

乔奇和卡罗莱站在岸上，呼喊着；米科拉向锯木厂飞跑而去。

太阳早已把我的头发和身体晒干，现在晒得我的背脊都痛了。可更糟的——倒不是我身上的水不见了；而是拉托卡河的水也似乎消失啦。堵塞的木头已严严实实地遮没了水面。前面给堵住了路，浮来的木头就停下来，急着想往前面移动。于是，一段木头就竖立起来，爬到前面一段木头的背上去了；接着，那段木头把翘起的木头猛地一摔，它飞掉了。我蹉缩着身子的那

根椴树木生性还比较温和——我用不着怕它。可怕的倒是那些分量轻的枞树木头。

米科拉回来了，跟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穿粗绒布衣服的赤脚罗斯人。他们俩都急得气喘吁吁。

“该死呀，你这个贱骨头，”跟米科拉同来的那人威胁地喝叫着。

他左手朝我扬扬拳头。他的右手提着一根又长又细的竹竿，竿子上的钢尖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这罗斯人熟练地拿竿子往岸边的一段浮木上一戳，纵身一跳，就上了那段木头。他从这段木头跃到那根木头，尽可能成之字形地向我靠近过来。他跳的时候，就咬着牙齿，停住了喊叫；但当他一站到我蹲伏着的那段木头上时，就又咆哮开了。

“你这个恶辰恶时生的人啊！我真恨不得把你一拳打成肉泥！别抖了，你这个小讨债鬼，爬到我的背上。箍紧了，要是你掉下去，我可不管。别扼住我的喉咙，要不我就拧断你的脖子。哎呀呀，天哪——”

我紧紧趴着这个瘦长的罗斯人的背脊，平安地到了岸上。我的救命恩人可并不是轻轻地放下我，而是把我往沙岸上一掼。我闭着眼睛，半死不活地躺了几分钟。

米科拉抚平了我的头发。“父亲的力气挺大，是吧？”他骄傲地问道。

这我才知道，原来那个该死的罗斯人就是米科拉的父亲，神父的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

待我恢复过来，能够穿上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刺猬逃掉了。

“准是你干的好事，米科拉，”卡罗莱说。“格查一辈子里就

只有这么一只刺猬，你就不会好好看管住它？”

米科拉一声不吭。乔奇吃吃笑着；他知道应该怎么个笑法才能使人家听了沉不住气。为了免得再纠缠在这只刺猬上，我建议大家来玩点儿什么。

“我们来玩警察和强盗吧——这游戏最好玩了，”乔奇附和道。

“好！米科拉和我当强盗，你们两个当警察。”我提议说。

“两个强盗和两个警察？那不行。”卡罗莱反对道。“我们索莱瓦这里是四个、至少也要三个警察对一个强盗。”

“倒是真的，”米科拉同意道。“现在警察可多呐，尤其是快要选举市长了。”

选举这个字眼钻进我的耳朵，立刻提醒了我：我是搞竞选运动的负责人的儿子。

“索莱瓦要选举了吗？好哇！形势怎么样——谁会赢，是独立党候选人还是政府党候选人？”

米科拉惊异地瞧瞧我。他说匈牙利话虽然说得几乎跟我一样流利，却听不懂我提出的问题。

“你是想知道，我们会选乌克兰人还是选匈牙利人当市长吧？”他用问话回答了我的询问。

“格查不可能问这样的问题的，”卡罗莱代我回答道。“他知道市长一定是匈牙利人。只有傻瓜才不知道。”

米科拉不作声了。

他是强盗，我们三个是警察。

这游戏没玩上多久——我们把强盗捉住了。在贝雷萨斯，按照这个游戏的规矩，玩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在索莱瓦，却有不同的规矩。我的两个表哥挥起拳头就向那个强盗扑了上

去。米科拉也许是不知道这游戏还有这一套，也许是不承认这一套。卡罗莱狠狠地揍他的脸，他也回手使劲地猛打卡罗莱，直打得卡罗莱趔趔趄趄向后退。乔奇从背后向米科拉扑上去，一场恶战开始了。两个打一个。我虽然是一个警察，心里却有点偏袒强盗。这时，卡罗莱发出一声喊叫：

“打这个下流的罗斯人！”

“打啊，马扎尔人！”

于是，三个好战的匈牙利人，一个劲地殴打一个孤零零的罗斯人。米科拉回家去了，衣服撕破了，鼻子流血。

已是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也回家了。家里，他们已经知道我怎样在拉托卡河里骑木头的事。我想，准要挨一顿鞭子了。可福洛普舅舅只是说：

“你游泳游得这样好，是件好事，格查。不过，从此以后，可别忘了，只能游到你能游得回来的地方为止。”

我所期待的暴风雨，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爆发了。

马鲁莎奶妈看到米科拉撕破了裤子，鼻子在流血，严厉地盘问了自己的儿子：到哪里去了，干了什么事。米科拉一五一十地供认了。

“是这样？”马鲁莎对儿子大发脾气，“哦，我把格查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你打他啊？你等着吧，你这个淘气鬼！”

于是，马鲁莎奶妈就拎着米科拉的耳朵，一点也不夸张，把他领到西维拉家来向我陪罪了。

我们还在吃中饭，怒冲冲的马鲁莎拖着绷着脸的米科拉来到了。从马鲁莎颠三倒四的叙述中，福洛普舅舅好不容易才了解到出了什么事，不过他终于搞清楚了。

“别骂米科拉了，彼特鲁塞维茨太太，”他以一种少有的很高

的声音说道，“我才要向他道歉呐。”

他摸摸米科拉的金黄头发，在他面前的盘子里放了很大一块蛋糕。

“吃吧，米科拉。”

米科拉摇摇头表示拒绝。

福洛普舅舅跟他握了手。

“我说，彼特鲁塞维茨太太，什么都好好的。我要向米科拉道歉呐。现在你们回家去吧——别打米科拉了。”

在离开这屋子时，马鲁莎奶妈吻了我的脑门。

“你们干吗打米科拉？”只剩下了我们几个人时，福洛普舅舅严厉地问道。

一片寂静。卡罗莱和乔奇用胳膊肘你推推我，我碰碰你，叫对方先说，可他俩谁也不开口。我回答了福洛普舅舅。

“因为他是罗斯人，”我说。

“因为他是罗斯人？”福洛普舅舅惊奇地问道，“那是打他的理由？”

“这就行了嘛，”我吓得大声说道，“米科拉是罗斯人，我们是匈牙利人。”

“哼！因为他是罗斯人，所以你们就打他。你是匈牙利人吗，你说？根本就不是！说啊，格查；因为你是个匈牙利人，就凡是罗斯人你都要打？”

“凡是罗斯人，”我喊道，激昂得发狂了，“凡是非匈牙利的人都要打。”

“好主意，妙主意。”福洛普舅舅说。“好，干吧。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因此，我不是匈牙利人。你的舅母是奥地利人，一个生于蒂罗尔的奥地利人。她也不是匈

牙利人。你的奶妈是罗斯人；米科拉的父亲也是罗斯人，是他今天把你从河里背了出来。我想，这暂时够了吧。打啊，马扎尔人！打我们呀。”

一时间，我目不转睛地直望着福洛普舅舅；接着，我哭了。

在家里，如果我哭了——我为什么事感到难为情时，经常会哭——父亲，母亲，或者别的人，都会立刻来哄我。父亲给我钱，母亲会吻我，给我蜜饯。

福洛普舅舅可不来安慰我——他和艾尔莎舅母离开了屋子。那两个男孩早已逃走了，只留下了我一个人。

我走进那个墙上挂着两幅画像的房间，蜷缩在沙发上，自个儿哭着睡去了。

选 举 市 长

当我醒来时，一个陌生人跟福洛普舅舅面对面坐在桌旁。

“过来，格查，”看到我已醒来了，舅舅说。“让我给你向尼盖西神父介绍一下。我的外甥，格查·巴林特，世界上最热诚的匈牙利人。”

尼盖西神父咧着嘴笑笑，伸出了手。

索莱瓦的这个匈牙利牧师，长得很魁伟，坐着也比我高出一个头。他那修得光光的脸，没有一点教士的影子，看去倒更象个军人。后来，福洛普舅舅告诉我，尼盖西活象一个扮演首都军官的外省演员。

也许，尼盖西自己也说不清他那双深陷的小眼睛是什么颜色。他的稀薄的头发是灰黄色的。

“坐到我旁边来，儿子，”尼盖西说着，简直是强把我按到了一把空椅子里。“我希望，你从贝雷萨斯这个库鲁茨的活动中心，带来了很好的、战斗的匈牙利精神。因为这里，这个岌岌可危的前哨基地，非常需要这种精神。”

“要讲战斗精神，”舅舅插嘴道，“那是谁也不能挑剔格查的了。他昨天晚上刚到索莱瓦，今天就血洗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措词——罗斯人。”

福洛普舅舅讲述了我们如何殴打米科拉，以及我怎样为我们辩护，说道：“你瞧，格查·巴林特，这个库鲁茨！”

尼盖西微微一笑。

“我不赞成，”他沉思地说，“用我们的拳头来解决原则问题。不过，如果要用拳头的话，三个匈牙利人殴打一个罗斯人，总比三个罗斯人打一个匈牙利人要好。”

“对有的人好，对有的人就坏了，”舅舅说。

这位象军人似的牧师，跟黝黑的脸上显着一种疲惫而又心不在焉神情的西维拉大夫之间的谈话，贝雷萨斯公立学校二年级的优等生是听不懂的。他只领悟到，他们是在谈即将来临的选举市长的事。牧师断言，少数的匈牙利人，面临着被俄国沙皇和大量的斯拉夫人吞并的危险。舅舅认为，威胁着喀尔巴阡山人的是大庄园。他说，现在大多数的孩子，还仅仅是通过传说，才知道什么叫肉、黄油和鸡哩。

“要是人们都变成了匈牙利人，那就每个锅子里都会有一只子鸡。”

“那是可能的。可是眼下匈牙利的伐木工人却跟罗斯人一样的贫困。他唯一能吃到的肉，是他去偷猎得来的肉。要是他偷猎运气好，他吃野味；要是他不走运，他就吃马肉了——在监牢里吃。”

那位牧师开始解释道：信奉摩西教义的匈牙利人，若是跟新教的匈牙利人一起投票的话，他们就能挡住罗斯人的进攻。舅舅却宁愿追究人民贫穷的起因，造成他们的苦难的剥削者。听去净是些陌生字眼，什么——匈牙利至上……大庄园……福洛普舅舅说话时轻声细语，沉思默想，牧师说话的声调却相当激烈。

当尼盖西起身要走时，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亨利希·海涅画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海涅的诗。

“没有，我没有读过。”

“那就不行了！每个真正的匈牙利人都应当知道海涅。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海涅可说是我们的诗人——一个匈牙利诗人。他是这样写的：

当我听到马扎尔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的德意志背心就感到紧了许多，
大海在我的胸膛里怒吼，
号角声在向战士致敬问候。”

舅舅送客人到门口。他回来后，就进了书斋，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然后，他很快地站起身来，走到那只书橱旁边；书橱里装满了许许多多匈牙利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

“学德语，格查，”他说，一边在书中摸索着，“你就能了解海涅这位匈牙利人的诗人了。不过，现在你出去玩玩吧。吃晚饭还有一个半小时哩。”

—

男孩们都上哪儿去玩了。院子里只留下了利格。

利格是一头驴子，一头很美丽的深灰色的驴子，皮毛闪闪发亮。它给取名为利格，是为了向当代名人、维也纳市长卡尔·利格表示敬意。当时，匈牙利许多狗和驴子都叫利格。因为整个奥匈帝国都知道，那个维也纳市长是个激烈的排匈人物和热心的排犹分子。

我们的利格象一条小狗一样跟着艾尔莎舅母团团转。它甚至跟了她上街，如果不赶它回家的话。利格就只能干干这样的活儿。索莱瓦的小孩子——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都很

敬爱利格，老是给它带纸来。利格，你知道，就爱贪婪地吞吃纸头。开始时，利格吃各种各样的纸头，都高高兴兴吃个心满意足；后来，当镇上所有的孩子都来喂它时，它就不大想吃了。因此，现在除了书本和报纸之外，它已什么也不吃。

我正站在那儿搔着利格的耳朵根，一个乞丐走进了院子。

"艾尔莎舅母，"我对着牲口棚门高声喊道，舅母正在那边挤牛奶，"给这个乞丐一枚铜板。"

艾尔莎舅母从牲口棚走出来，递了一个铜板给乞丐。待到乞丐走掉了，我舅母向我作了指示。

"那个乞丐不配给铜板，"她告诉我，"他是一个罗斯乞丐。我们只布施犹太乞丐——有时候也布施匈牙利乞丐。"

无须多加解释。在贝雷萨斯，如果一个基督教徒乞丐来到了犹太人家里，在院子里玩的孩子们就会向他高声喊叫："这里没有住匈牙利人。"

这是提醒那个乞丐要识趣点——他吐口唾沫就走了。

如果一个犹太乞丐荡进了基督教徒的家，孩子们就会向他喊叫道："这里没有住犹太人。"

那个乞丐也知道人家会怎样对待他。

在全贝雷萨斯，只有我们家是唯一的例外。

毕竟，一个为独立党搞竞选运动的人的儿子，怎么能说这儿没有住匈牙利人呢？一个百倍聪明的犹太教士的孙子，也不能说这儿没有住犹太人啊。

当我跟利格在玩时，艾尔莎舅母已给两头母牛曼西和奥尔加挤完了奶，开始在喂鸡了。艾尔莎舅母总是不停地干活。西维拉家虽然雇了一个仆人，我的舅母纯粹出于习惯，大多数活儿还是亲自干，艾尔莎舅母在成为西维拉太太之前，是布达佩斯一

家旅馆里的厨师。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秘密，但不管家里有多少个孩子，谁都打从婴孩时起就已知道这个秘密。

“你的福洛普舅舅的传记简直是一部小说，”晚上，父亲在吸烟的时候偶尔会这样说。“那不但可以写一部小说，写两部都行呐。”

“你就是溺爱孩子，”母亲会责备他。

“我不溺爱他们——一点儿也不！我只给他们讲讲福洛普一生的第一部小说。”

十七年前，父亲说，科克大夫，那个发现肺病菌的有名的德国医学教授，来到了布达佩斯。一大群院士、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到火车站去迎接他。科克耐心地听完了欢迎词，接着就问那位学士院院长，西维拉大夫是不是也一起来了。当然罗，西维拉大夫没有在火车站上那群杰出的大夫当中。学士院院长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在这个城市为向客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宴会上，科克教授问坐在身旁的教育大臣：他如何才能见到福洛普·西维拉大夫。不用说，西维拉是谁，大臣一无所知，但为了讨好这位著名的客人，他要求警察总长——当然，他也在座——去寻找福洛普·西维拉大夫。

警察总长打了个电话，命令当晚值班的警官，无论如何在早晨要交出福洛普·西维拉大夫。值班警官把命令传达给了刑事侦缉科科长，接下来，刑侦科长又把命令传给了他的一个部下。这样，早上四点钟时，福洛普舅舅——他当时是罗库斯医院的实习医生——给两个侦探从床上拖了起来。警察总长参加宴会后，第二天早上便大睡懒觉，于是福洛普在警察局的牢房里一直蹲到中午。最后当警察总长来到办公室时，刑侦科长向他报告，他们已顺利地查获他要找的那个西维拉——可想而知，那个

警察总长大发雷霆了。

“才不会有人为关一个犹太人而吵架呐，”母亲争论道。

“原来，”父亲说，继续讲述福洛普舅舅生平的第一部小说，“二十三岁的西维拉大夫花了两年工夫，为德国某一本很厚的高级科学杂志写了几篇很长的文章，照科克教授说，文章十分敏锐，轰动了社会。这几篇文章也把福洛普投入了监牢。不过，也正由于这几篇文章，他二十四岁时，就在布达佩斯大学里当上了讲师。”

这就是福洛普舅舅生平的第一部小说。关于第二部小说，父亲从来就没跟我们讲；但是，通过各种迂回的途径，我们对那个故事，却象对威廉皇帝吻手的故事一样熟悉。

科克教授到布达佩斯来时，福洛普舅舅已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叫做伊莎贝拉。伊莎贝拉的母亲不是福洛普舅舅的妻子；她是一家布达佩斯旅馆的厨师。这伊莎贝拉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福洛普舅舅一星期去看她们一次。

有一天，福洛普舅舅从大学里出来，偶然碰到了正在大街上哭的伊莎贝拉。福洛普舅舅把这个哭泣的孩子带进一家糖果店。伊莎贝拉什么也不肯吃，她坐在那里，眼泪簌簌地掉进她的冰淇淋中，怎么也不肯告诉他哭的原因。在福洛普舅舅一个劲地追问下，她这才说了：

“学校里，谁也不愿坐在我旁边，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父亲。”

一星期后，福洛普·西维拉大夫，布达佩斯皇家匈牙利大学的讲师，娶了伊莎贝拉的母亲艾尔莎·丽特。在这同时，他也告别了那所大学，担任了索莱瓦的区医官的职务。他早晨五点钟起床，常常深更半夜还要出诊。但他始终都有时间阅读医学文献。他会时不时写一篇文章论述伴随贫穷而来的疾病。

艾尔莎舅母就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金黄的头发，蓝蓝的眼睛，洁白的皮肤。只是她的手和脚却太大了一点。她从早到晚地干活，象照顾孩子一样地照顾福洛普舅舅。

伊莎贝拉长得跟我的母亲异常相象，她当时是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学生。

晚饭后，又来了一个舅父的客人。

此人是杜迪克斯。索莱瓦希腊天主教堂的牧师，一个高大、肥胖，并不年轻的人，他的黑胡子里已夹有大量的灰白胡子。他的眼睛一闪一闪，好象一个患热病的人。他说话高音高调，几乎是在喊叫。他说"你必须爱人民啊"这句话时，牙齿都咬紧了。什么事弄得他如此气愤，以致他既不听别人讲，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很可能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踡缩在沙发上。

"看一看统计表吧，大夫。即使那些经过当局粉饰过的统计表，也说明索莱瓦几乎有一半居民是罗斯人，匈牙利人只占四分之一。如果你们犹太人不支持匈牙利人的话——"

在进行这番冗长的对话时，他几次激怒得在桌上擂起拳头来。

"凭着爱国主义，匈牙利人就懂得压迫别的民族。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意味着剥夺非匈牙利公民的一切权利。而你们犹太人却为爱国主义服务，为这种自由服务！不？那好罗，在这次市长选举中，用事实来表明你不是那种认为罗斯人仅仅是牛马的爱国者吧。你尽有方法和办法证实这一点。"

福洛普舅舅没有理睬这种赤裸裸的、威吓性的挑战，这个罗斯牧师就比较平和地说道：

"犹太人——你不能否认，大夫——是亲匈牙利人的。他们

跟匈牙利人一起赴汤蹈火。这是一个事实！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就是匈牙利人！他们是不是会永远成为匈牙利人？”

“他们是不是会永远成为匈牙利人？”福洛普舅舅重复了一句，闭上了眼睛，好象想在心里反省一下似的。“他们是不是会永远成为匈牙利人？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为什么犹太人变成了匈牙利人？有的是由于这个原因，有的是由于另一个原因。一个，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祖父，”舅舅指指我，“变成为匈牙利人，是在战场上为匈牙利的自由而战时变成的。他的儿子——这个孩子的父亲——生下来就是个匈牙利人。他从来没听说过西门·加里利这个名字，他崇拜拉科治。他的孙子——这个男孩——首先是一个匈牙利人，其次才是一个人，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是匈牙利的，这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为一个匈牙利人，是挺美好的。长期无家可归的人有了一个家。

“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犹太人自称匈牙利人，那是因为，在匈牙利成为一个匈牙利人，是桩好买卖，而处处都是犹太人，可是一桩坏买卖。以这种理由去变成为一个匈牙利人，是很卑鄙的。不过孩子们，那些为了买卖的原因而成为匈牙利人的犹太孩子们，是天生的匈牙利人，他们都真诚地热爱拉科治和科苏特。只是我们考察一下，为什么匈牙利人接受犹太人呢？匈牙利人单独站立在欧洲，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一千年来，它为自己的生存和自由，抵御德国人。单身独个儿，一直是孤零零的！唔，要是有人跑来，说：‘我也要成为匈牙利人，我也是匈牙利人，’这人跟匈牙利人并肩工作、战斗，匈牙利人干吗不高兴呢？你说，神父，匈牙利人压迫住在匈牙利的别的民族，这是不真实的！压迫罗斯人、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劳动人民的，不是匈牙

利人——那是匈牙利的地主们。他们在有钱的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和罗斯人的帮助下，也压迫匈牙利的劳动人民。你把事情完全简单化了，神父，有点儿粉饰现实。这是匈牙利人；那是非匈牙利人。接下来又是犹太人。我们讲的是哪一类犹太人呢？是犹太银行家呢，还是犹太的伐木工呢？犹太银行家永远支持会保护他的金钱的人。劳苦的犹太人则支持为美好的未来而战斗的人。"

"问题是，大夫，"罗斯牧师插嘴说，"问题是犹太人投谁的票。"

"真的，神父，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真正的争论之点，跟市长选举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谁当索莱瓦的市长——是匈牙利人也罢，罗斯人或霍屯督人①也罢——他都要合着古拉克西的笛子跳舞，只有这样，他才当得成市长。这是可悲的事实，实在很可悲。但是，很不幸，这是真的。"

杜迪克斯离去后，福洛普舅舅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听到双方的谈话了吧，格查。唔？"

"我是匈牙利人，福洛普舅舅。"

"我知道，"舅舅严肃地说，"但你有没有想过，匈牙利人也有好多种？桑邦伯爵是国会议员，他是匈牙利人。他拥有七十万亩土地。而他的雇农也是匈牙利人。雇农有四五个孩子，他的孩子们都在挨饿。当一个人想到这一点——"

舅舅沉默了。

"我多蠢哪，"他过了一会儿说，"我忘了你还是一个小孩。该上床去睡了，格查，小伙子！"

---

① 西南非洲人。

我上床了，但久久不能入睡。这个实感在折磨着我：我虽然是贝雷萨斯学校二年级的优等生，对有些事情却啥也不懂。

第二天晚上，在我去睡觉之前，福洛普舅舅问我：

"今天你干了什么来着，格查？"

"我向米科拉道了歉。"

舅舅摸摸我的头发。

"你不可能成为你父亲所想的大臣，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市长选举前两天，从蒙卡契开来了一队宪兵，加强索莱瓦的治安力量。

选举前夕，警察局长拘留了四十六个罗斯偷猎者。

匈牙利的候选人以多得十九票而当选。他获得了镇上全体犹太人的选票。

选举后一天，警察局长释放了偷猎者。

蒙卡契的宪兵在索莱瓦学校里又驻扎了四天。

选举后十天，索莱瓦绅士俱乐部成立了。跟索莱瓦的所有的绅士们一样，尼盖西和杜迪克斯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一个绅士没有被邀请参加——福洛普·西维拉大夫。

四个森林妖精

一连几天，索莱瓦的孩子个个都忙着削剑雕盾。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用栎木给我削了一把很重的轻骑兵的剑，给米科拉也做了同样的一把。不久以后，交战的战士们就将握着这些剑，在战场上交锋。

两军的司令官为战斗订了明确的章程：

一、火器：橡树子和松果；攻击武器：剑。

二、防卫武器：盾。

三、射头可以；不准打头。

四、受伤后，必须退出火线。可以保留武器，但不得再投入战斗。

五、被俘后，必须缴械，不得违抗。

六、战斗于早上六时开始，至中饭时如尚未定胜负，明晨继续战斗。

七、战场：拉托卡河对岸的双峰山。

一枚掷向空中的硬币作出了决定：罗斯人守山，匈牙利军队进攻。

犹太教士弗兰克尔的儿子艾赛亚，是匈牙利军的首领。他建议由一小股匈牙利军队迂回绕过罗斯人，从背后攻击他们。他说这一伙人要躲开那座桥，游泳渡过拉托卡河。

匈牙利军的四个士兵自愿游过拉托卡河去。我被任命为这

个所谓水兵突击队的队长。

我们在岸边的灌木丛里藏好了衣服。我穿着游泳裤和凉鞋，在三个穿游泳衣的赤脚士兵的陪同下，向拉托卡走去。我们安全地到了对岸，在路上只丢失了一个盾和一满筐橡树子。

我们要爬上去的那个山坡，陡峭险峻。我这双脚，走惯了贝雷萨斯平平稳稳的小山，怎么也跟不上索莱瓦的那些爬山能手。不一会儿，我就掉在归我统帅的这伙人后面了。

山坡上，只蜿蜒着一条狭窄的荒凉小径，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榛子、黑刺李、山莓和荼蘼的灌木丛、蔓藤的弯弯曲曲的长卷须。我为了取捷径越过这段曲折的路程，便离开了这条小径。我以一个水兵突击队队长应有的勇敢，不顾荨麻的刺棘，从灌木丛中开了一条路。

我推测，我该早已来到那条经过一个古代公墓通到罗斯军队后面的小径上了。可是，公墓也好，小径也好，我都没有找到。我搞错了方向，跑到一个树林密得象一道无法穿越的墙壁一样的地方来了。它们仿佛都是活的人——打个比方，是同一国的人，或者兄弟们——这些树的性情都很暴躁，互相掐着脖子，你要扼杀我，我要扑灭你。它们的枝桠交错缠绕，好象搏斗者胳膊绞着胳膊，它们的根，为了争喝地球的液汁，互相盘结在一起。一棵苗条的冷杉，已被它的仇人连根拔起，它的枝条搭在毗邻的几棵树木的顶上，断了的树根，有二十来时悬在空间。

我又改变了方向，这一次是向上爬去了。从那个山顶上，我很有可能看得见战争在哪里进行。也许，我甚至还能在关键时刻赶到，挥着我的剑，打垮和歼灭眼看就将获胜的罗斯军。一看到我，那些遭受猛烈围攻的匈牙利人，就会鼓起新的希望和劲头，而我就要发出一声呐喊：

“匈牙利人前进！胜利是我们的！”

我发觉，我象做梦似的，把我的剑搞丢了。盾还挂在我的左肩上。我想循原路回去，但是已没希望找到我的剑，再说，即使找到的话，我也已赶不上这场战斗。我气得哭了，一路走，一路喊，拨开大树下的灌木丛，向山顶上走去。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坡。

从下面向上望，雪似乎是玫瑰色的，紫红色的，或者蓝灰色的。我走近一点，来到离白雪覆盖那儿一百五十米光景的地方，我看到，那雪原来是污灰色的。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雪，只是些融化的雪泥。

我在一棵倒下的冷杉上坐下来，可是感到很冷，我又站起来了。我原以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交战的军队。我看到的却是索莱瓦、工厂、新教教堂，从索莱瓦奔腾流去的拉托卡河——就是没看见军队的影子。在这里的山顶上，听不见战斗的声音。风刮着栎木的枝条，飒飒地穿过了松树的针叶。鸟儿叽叽喳喳鸣啭着，叫得最响的，是杜鹃喧闹的“咕咕——咕咕”声。

我饿了。我的裤袋里装有艾尔莎舅母给我的一包面包和黄油——可我的裤子放在拉托卡河岸上。我转身回去了，这倒不是为了面包和黄油，而是常识在告诉我，我应该这样办。我推想，要是我游过拉托卡河，我还赶得上匈牙利的主力军。

我下山了。下山比较容易，但是一点也不舒服。我已来到山谷里了，却不见拉托卡的影子。我走错方向了。这时，太阳已在山后面消失，我感到寒气刺骨。

突然，也不预先打个招呼，夜幕降临了。

我靠在一棵树上，向黑暗中凝视着，冷得直发抖。要是我这时在家里有多好啊——在贝雷萨斯，而不是在索莱瓦。这时候，

父亲会燃上他的烟斗，疲倦地躺在椅子上，说："要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

我哭了。

"假使现在来了一头熊，怎么办哪？"我想，"象去年春天，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用一根木棍打死的那样一头大熊——或者，象四天前乱抓乱咬樵夫的肚子的那样一头野猪。"

我站在那里，叫想象出来的恐惧弄得簌簌发抖，我真的听到有一头熊正在走近，它那吓人的爪子踩得灌木丛在咔咔发响哩。不！不是一头熊，而是两头，三头，一大群熊——而我却手无寸铁，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妈啊！"我失声喊叫了。

"该死！这里有陌生人，"一头熊用罗斯话骂了一句。

四个罗斯人围住了我。其中一个划亮一根火柴，递到了我的面前。

"是犹太大夫的外甥，"他说，从说话的声音，我听出是米科拉的父亲。

"见鬼，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我迷路了。"

"该死！"

只在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几个罗斯人拖着个什么东西：一只长着很大的角的鹿，一只死鹿！

偷猎者。

四个罗斯人站在一旁，低声地商量着。他们谈了好久，我冷得直发抖，便钻进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那件无袖的粗呢长斗篷下面去了。

"你能保守秘密吗？"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问道。

"能。"

"你答应不说出去？要是你瞎说一气的话，村里的人就会取笑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人竟还会迷路。"

"我不会乱说的。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我看到了你们，——或者看到了这只鹿。"

"这没有用，"一个罗斯人警告道。

"这就行了，"彼特鲁塞维茨坚决地说。"要是这孩子乱说，我就打死马鲁莎。"

彼特鲁塞维茨抱起了我。怀里暖烘烘的，就跟躲在他的发出汗臭味的粗呢斗篷里一样。

我睡着了，醒来时，我们已到了村边。

"你认得回去的路了吧？"

"嗯，我认得的。"

"你会保守秘密吗？"

"会，我答应了嘛。"

"别忘了；假若你瞎说，我就要打死马鲁莎。"

天快亮了，但我们家的窗上还亮着灯光。我敲敲窗门。

"大夫出诊去了，"艾尔莎舅母喊道。

"是我，艾尔莎舅母，格查。"

"天哪，格查找到了。"

艾尔莎舅母一边哭，一边给我浑身擦了酒精。仆人进来了，拿来了热茶和一个煎蛋饼。

"你上哪里去啦？"当我恢复了一点时，艾尔莎舅母问道。"打中午起，两个樵夫就去找你。他们为了你，找遍了树林子。"

"我迷路了。我好累。你知道吗，艾尔莎舅母，谁赢了？"

"去睡吧，"艾尔莎舅母命令道。

近中午时，我才醒了过来。

卡罗莱坐在我床边，他头上包扎了纱布；乔奇坐在他身旁，一条绷带吊着他的胳膊。

“我们打赢了？”我一开口就问。

卡罗莱和乔奇面面相觑。

“差不多，”卡罗莱最后说。

“受伤的多吗？”

“爸爸一个下午都在一家挨一家地跑。”

在再三盘问下，卡罗莱才讲述了这一仗的经过情况。

“起初，我们没有赢，”他说。“罗斯人躲在几棵大树后面，象雨点般地掷棒子，我们没办法挨近他们。我们派了一个人去谈判，叫他们投降，但他们取笑我们的人。于是，匈牙利军的首领波多尔下了‘冲锋’令。我们冲锋了——不管罗斯人的炮火有多厉害，他们都抵挡不住，我们来到了那棵大栎树后面他们的哨所——莱霍西基和苏斯拉克那儿。弗兰克尔击中了苏斯拉克的头，苏斯拉克在弗兰克尔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告诉你，爸爸一个下午都在洗伤口。但真正受伤的只有弗兰克尔一个人；打掉了几颗牙齿，打破了两个头，就是这样。”

“那我们到底打赢了？”

“我们赢了。在我们这边，除了艾赛亚·弗兰克尔之外，每一个男孩都好好的。罗斯人不敢到街上来了——他们怕警察局长把他们关起来。”

警察局长确实已在干涉索莱瓦孩子们的这场战争。

两个宪兵在挨家挨户地搜木头剑。

福洛普舅舅回家来吃中饭。他给我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发现我稍微有点发烧，就吩咐我躺在床上。中饭后，孩子们都到

外面炫耀他们扎着纱布的胳膊去了，福洛普舅舅拖了一把椅子到我的床边。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样迷路的，怎样回家的。”

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派给水兵突击队的战斗任务，我如何到了双峰山的那一边。当我正在讲时，艾尔莎舅母走了进来。

“你是怎样回家来的？”

“我听到了笨重的脚步声，虽然附近有一只熊，我还是大喊大叫起来了。那不是一只熊——只是四个人。”

瞧我，说溜嘴啦！

“是四个什么人？”

“四个森林妖精。”

“嘿……嘿……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四个森林妖精。他们的衣服象苔藓一样绿，他们的鞋子和帽子是红的，他们的白胡子一直拖到膝盖。三个妖精有银宝剑；另外一个——他戴了一顶王冠，不是一顶帽子——有一把金宝剑，是纯金的。”

“别说谎，格查，”艾尔莎舅母打断了我的话。

福洛普舅舅打了个手势，叫她别作声。

“我向来不说谎，”我提出了强烈抗议。

“这我们知道，格查，我们知道，”福洛普舅舅抚慰地说。“艾尔莎舅母也并不真的认为你是在说谎。唔，后来怎么样呢？那些妖精怎么啦？”

“最大的妖精，不戴帽的那个——他头上有一顶金王冠——向我走过来，问我在他的王国里干啥。我告诉他，我迷了路。

“‘你是谁？’妖精的国王说道。‘福洛普舅舅的外甥，’我告诉他。‘犹太大夫的外甥，’妖精的国王对他的臣民说。

“四个妖精用外国话——我猜想，讲的是法国话——一起轻轻地商谈了好久，于是那个国王又来对我说话了。‘闭上你的眼睛，’他命令道。我服从了。‘你啥也看不见了吧？’‘是啊，我啥也看不见了。’‘我说好了，你就慢慢地数到七。你数到七的时候，再睁开眼睛，你就到了村边啦。不过，要是你下次再来扰乱我的王国的话，我就要杀死马鲁莎奶妈。明白了吗？好，如果你已明白了，那就好了！’我很慢很慢地数到了七，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已在村子外面了。”

“这孩子在发高烧吧，”艾尔莎舅母发愁地说。

福洛普舅舅摇摇头。

“只是有一点，格査，”他说，“你刚才说，森林里是漆黑的。如果是漆黑的话，那你怎么知道妖精是穿绿衣裳红鞋子呢？”

“怎么？我怎么看得见？难道我忘了告诉你，每个妖精手里都提着一盏灯吗？一盏象矿灯一样的灯。三个妖精提的是银灯，妖精的国王提的是一盏纯金的灯。”

“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那个妖精的国王威胁你说，要是你再去扰乱他的王国的话，他就要杀掉马鲁莎奶妈。”

“他是这样说的。”

“一切都清楚了，”福洛普舅舅重复了一句，“一切。”

“你肯定这孩子没发高烧？”艾尔莎舅母焦急地问道。

“完全肯定。”

遵照福洛普舅舅的命令，我在床上躺了两天。到第三天，当我走到外面街上去时，许多孩子还都在夸耀扎纱布的头和吊绑带的胳膊。我只是患了伤风——这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因为不管你怎样老是擤鼻子，也没人知道，我跟他们受伤一样，是在为我的国家服役时着了凉。

政　　治

我几乎天天都看福洛普舅舅订阅的布达佩斯报纸。卡罗莱也看。他看的是“今日幽默”这一栏；我则仔细阅读议会报道。我跳过那些长篇大论——它们都枯燥得令人厌倦，我看了也不甚了了。可是，有几次，当独立党的国会议员指责政府是“维也纳的走狗”，或者高喊他们“为英镑而出卖祖国”的时候，——我就会兴高采烈地把这些文章一连读上三遍。当我看到维也纳的走狗们竟然无耻地管那些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国会议员叫做“丑角”时，我就愤慨不已。没有比政治更美妙的玩艺儿了。

秋天来到时，我得知父亲已经接受福洛普舅舅“作为亲戚和大夫”的劝告，我将在索莱瓦读一年书，也许甚至两年。我连假期也不能回家去过。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既悒郁又寂寞，匈牙利议会成了我的唯一的乐趣。

那是你的欢乐窝；那里才有乐趣哩，我想。

政府要求在全国扩军和为军队提供更多的经费。独立党以国家的名义作出了回答：“不出一个人，不缴一文钱。”议员们互相破口大骂，你说我是“流氓”，我称他为“叛徒”。独立党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不过也有不光彩的一面——说罗马尼亚话的议员都跟独立党并肩战斗。不过，那些罗马尼亚人获得了报答——政府党的一个特兰西瓦尼亚的议员斥责他们是被收买了的匈牙利的敌人。他们也提出了证据，说塞尔维亚族的代表们已出卖

了匈牙利祖国。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和激动人心的。

后来有一天，当我在报上看到了索莱瓦区的政府党议员沙波尔克斯·希德维戈的发言时，这些事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希德维戈大骂俄国代理人。他所说的俄国代理人就是罗斯人。

他列举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来证明俄国代理人扰乱喀尔巴阡山的治安，使用毫无人性的方法反对匈牙利人。希德维戈举出十七个具体例子来证明他的论点，——其中，第十七个例子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

>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希德维戈说道——但这是确凿的事实：那些俄国代理人在索莱瓦街上痛打毫不防备的匈牙利孩子。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现在我来念一下名字。

于是沙波尔克斯·希德维戈就念了二十来个住在索莱瓦的匈牙利孩子的名字——那些于双峰山打了一仗后，在索莱瓦大街上骄傲地夸耀包扎的头或吊着胳膊的孩子的名字。

> 我要请问内务大臣——最后沙波尔克斯·希德维戈说——为了喀尔巴阡山人民的和平，为了处于威胁下的喀尔巴阡山的匈牙利人，他已做了什么，打算做些什么？

几天来，我都在默默思忖着，想弄清楚事实真相。什么是真理——我目睹耳闻的、我了解的是真实的呢，还是希德维戈说的是真实的呢？

我觉得，我难以相信我目睹耳闻的和了解的不是真相。

另一方面，要说议会里发表的保护匈牙利人的演说，决不是

绝对正确的，那也令人难以想象啊。

之后好几天，我都没有跟罗斯人的孩子们玩，当米科拉来看我时，我也不让他进院子。可十天后，我自己去看米科拉了，这时我才听说警察已逮捕了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跟米科拉的父亲一起，警察还拘留了索莱瓦的十一个罗斯人。内务大臣向议会保证，这些罪犯逃不掉应得的惩罚。

凡是看过这则议会新闻报道的索莱瓦人都知道，议会"于恐怖事件影响下"，急忙投票通过了扩大兵额和增加军事预算。

很可能，在布达佩斯议会里，"于恐怖事件影响下"投票的代表们并不知道，这些罪犯都不加惩罚地释放了。罪犯们也没有交付审讯。彼特鲁塞维茨和另外几个索莱瓦村民在贝雷萨斯监牢里蹲了两个星期。这时，杜迪克斯神父已另外雇了一个马车夫，——当彼特鲁塞维茨回到索莱瓦来时，在教区牧师家里已没有他的工作了。马鲁莎在那以前，一直是为这位牧师煮饭洗衣的，但她也跟着彼特鲁塞维茨很快给解了雇。马鲁莎带了米科拉到她妹妹奥尔加——一个名叫米霍克的工厂工人的妻子那儿去住了。

杜迪克斯神父雇用了富弗卡大婶的女儿弗罗莎，顶替马鲁莎当厨娘，从此，富弗卡大婶成了这位教区牧师家的常客。

驼背的富弗卡大婶是一个医生——自称"神医"，因为她的医学知识并不是从"某一本书"上得来的，而是上帝送给她的礼物。经常有要神医医治的病人。人们病了，都一定要富弗卡大婶医治——倒不是由于她收的诊费比那位犹太大夫要少一半，因为在这种场合，钱是无所谓的。那位犹太大夫收的诊费，尽管要比富弗卡大婶多一倍，但患者如果没有钱，犹太大夫可以免费为他诊治。

可是另一方面，富弗卡大婶给病人治病却非先收诊费不可。所以，富弗卡大婶的知识是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她在索莱瓦广受爱戴，是因为这位神医有一种能医治百病的万应药，而那位犹太大夫的知识却只限于某些方面。当犹太大夫被请去诊治一个四岁还站立不住的骨瘦如柴、腹胀如鼓、皮肤呈柠檬色的孩子的时候，他会这样说："治这种病，从药房里你搞不到什么药。这孩子一定要吃牛奶、黄油、鸡蛋、水果，并且要睡在空气流通的地方。"犹太大夫象这样提个劝告，向来不要钱，人家也从来不认真采纳。而富弗卡大婶呢，却会从拉托卡河里取点水来，倒在燃烧的木炭上，然后递给病人去喝。她说，病人的肚子和背脊要擦狗油——但是这种油膏只有富弗卡大婶亲自涂在那个孱弱的身子上，才会奏效。倘若有人认为这位神医的治疗法是荒唐的——哼，那他准是叫犹太大夫收买了制造谣言。

富弗卡大婶会把马粪敷在露肉的伤口上。会给发疟疾的病人喝一杯白兰地，在这杯酒中，神医亲自掺了一小撮用蝙蝠的左翅做成的粉末；这蝙蝠是彼得和保尔前一天晚上捉来、在太阳光下晒干后放在一个木头研钵里捣碎的。

她会给一个发烧的病人在脑门和太阳穴上擦些孕妇的尿。供尿的孕妇可以得到两公斤燕麦片作为报酬。

富弗卡大婶在索莱瓦有很大的势力。

有一回，她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在那六个月中，市镇大厅烧毁了，警察局长的鞍子马跛了腿。

地主的管家们也罢，工厂也罢，都不要先前的马车夫彼特鲁塞维茨干活，这件事进一步证明了富弗卡的权力。彼特鲁塞维茨在被捕前几天，因为富弗卡在人行道上朝着艾尔莎舅母吐了口唾沫，他曾在富弗卡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位神医气坏了，因

此就叫这位牧师的马车夫失了业。

彼特鲁塞维茨一家搬到公墓附近的米霍克家去住了。当我去看望他们时，米科拉不让我进门。马鲁莎奶妈狠狠地骂了米科拉，牵着我的手领我进了屋。

马鲁莎唤做房间的那个茅棚，没有一扇窗户。屋子很小，我不知道米霍克、米霍克太太、他们的五个孩子，再加上彼特鲁塞维茨一家三口子怎么睡得下。我只耽搁了一会儿，因为屋里的臭味使我很恶心。

那天晚上，我们坐下来吃饭时，我一想到马鲁莎的屋子就哭起来了。

福洛普舅舅问我哭什么，我把马鲁莎的住房的事告诉了他。福洛普听了，一言不发，艾尔莎舅母却生气地责备我：

"你不该上那儿去。要是你爸爸知道你交了这样的朋友，他准会好好打你一顿。"

"爸爸不打我的，他从来不打。"

"瞧着吧！"

晚饭后，我走进了舅舅的房间。福洛普舅舅阖上了他正在看的那本书。"有什么事，格查？"

"福洛普舅舅，我想，最好叫马鲁莎奶妈到我们家里来。马鲁莎会煮菜烧饭。米科拉是个挺好的孩子，谁也不会认为他是个罗斯人。人人都知道，彼特鲁塞维茨是全索莱瓦最强壮的人。让他们到这儿来吧，福洛普舅舅。"

舅舅好久没有回答。他咬着嘴唇坐在那儿，左手的手指咚咚敲着铺了藏青毡的胡桃木桌子。

"呃，格查，"他最后压低嗓门，字斟句酌地说，"对于彼特鲁塞维茨，凡是我帮得上忙的事我都帮了，我可能过高估计了我做

的事。不过，我也可能并没有估计错，彼特鲁塞维茨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快就回到了索莱瓦，是由于我为他们作了证。格查，你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我做这件事所冒的风险。你可能会觉得这是胆小怕事——但是我可不敢再做什么了。想要做有益的事的人，必须保持机警。我怕如果现在我再去给彼特鲁塞维茨帮点什么忙，那么从此我就不可能再为别的人办什么事了。在喀尔巴阡山，毕竟有许许多多个彼特鲁塞维茨，而西维拉大夫可不多啊。"

舅舅沉默了。我们一声不响地并排坐了几分钟。

"你瞧，格查，"福洛普舅舅打破了沉默，"我老是忘记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唔，你也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吧。这十个克劳采——你拿去买巧克力吃吧。"

两天后，福洛普舅舅把彼特鲁塞维茨叫了来。他劝他上美洲去。

"路费我借给你。你在美洲赚了钱再还给我就是。你走后，马鲁莎和米科拉可以跟我一起住。反正我妻子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彼特鲁塞维茨谢谢他出了这个主意，稍作考虑后，他决定上美洲去了。但他没有走成。没过几天他就死了。两个猎场看守人怀疑他在偷猎。他们命令他把枪掷掉，但彼特鲁塞维茨不听。

"我不饿肚子，你们就会更穷了吗？"他高声对那两个猎场看守人说，"要不是我认为你们也是穷鬼——"

他没来得及再说下去。

一个猎场看守人的一颗枪弹打进了他的腹部，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那支枪从索莱瓦最强壮的人的手中落掉了。

杜迪克斯神父不愿为彼特鲁塞维茨举行葬礼，波莱纳的牧

师也拒绝主持葬礼。于是这个牧师的以前的马车夫，就在没有牧师光临的情况下埋葬了。这是索莱瓦举行的第一个没有牧师到场的葬礼。

“他们象埋一只狗一样埋葬穷人啊，”马鲁莎奶妈哭喊着。

只有米霍克一家、马鲁莎、米科拉和我把彼特鲁塞维茨送到墓地。那个又聋又哑的掘墓人苏萨克开始往棺材上铲土时，米霍克一家就走了。马鲁莎奶妈跪在新坟边哭了一阵。

米科拉没有掉眼泪，他低着头站在那里，既不说，也不动；人们说，在同一座小山上，在离开他父亲的坟二三十步远的地方，就是埋着阿提拉王朝时代死去的匈奴英雄们的地方。

二十年后，在我的奶兄弟、马鲁莎奶妈的儿子站立的这个小土墩上，也许甚至是同一块地方，我站在两面大红旗下，为一个在喀尔巴阡山人民的战斗中倒下的英雄——一个名叫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的人致了悼词。

上 课 的 日 子

九月一日，我开始在索莱瓦上学了。三年级共有八十九名学生。大约十七个学生，每天都从哈斯法尔瓦步行到索莱瓦来。哈斯法尔瓦的孩子们尽管早晨六点钟就动身，却总是迟到。

“我要改掉你们迟到的习惯，”教师阿拉迪先生宣告道，“迟到一分钟，你们就要吃一棍，增加一分钟，就多吃一棍。”

“弯下去，”阿拉迪对一个战战兢兢地等着挨棍子的孩子喊道，“弯到你的手指头碰到鞋头。”

“我又没有鞋子，老师。”

“你这样没有礼貌，除规定的十二棍之外，再加三棍。”

棍子在空中呼呼飞舞，阿拉迪先生高声地数着打的数目。

“迟到一分钟，迟到两分钟，迟到三分钟——”

老师的手指是很灵活的；可是责打哈斯法尔瓦的孩子，还是往往要花掉他半个小时。

索莱瓦的学校远比贝雷萨斯的学校令人兴奋。

“费多连科，举出匈牙利最重要的河流来，”老师说。

被叫到名字的费多连科就会站起来。他的父亲是今年夏天从森林里迁到索莱瓦来的。他沉默地站着。阿拉迪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费多连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彼特鲁塞维茨，”阿拉迪命令米科拉说，“告诉费多连科我问他的话。”

米科拉把这个问话翻译成了罗斯话。

“多瑙河，蒂萨河，德拉瓦河和萨瓦河，”费多连科正确地回答道。

“多瑙河发源在哪里？”阿拉迪问。

米科拉把问话译成罗斯语。费多连科用罗斯语回答，米科拉又把答话译成了匈牙利话。

“发源在黑森林。”

阿拉迪是从特兰西瓦尼亚到索莱瓦来的。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这样一把年纪，要学会一种语言是很困难的，对于一个大半辈子不知道如何依靠薪水防饥御寒的教师就更为困难。他一个罗斯字也不认识。这样，米科拉也就有了帮助他的罗斯同胞的机会。不管他们怎样回答教师提的问题，答案经过米科拉一翻译总是对的。

没过多久，罗斯的孩子们都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开始利用他们这个有利地位了。

“告诉我，沙拉达，莫哈克斯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米科拉把这问题译成罗斯话，沙拉达用罗斯话作了回答：

“我饿了。”

米科拉把沙拉达的回答译成了匈牙利话：“在一五二六年。”

“对，”教师说，学生们都笑了，教师莫名其妙。但是当沙拉达又回答了一个问题，班上发出一阵嘻嘻笑的时候，他可怀疑起来了。

“西维拉，你懂罗斯话吗？”

“懂，老师。”

“沙拉达说了什么？”

卡罗莱犹豫了。

“沙拉达说了什么？”

“他说土耳其人在莫哈克斯打胜了。”

“菲尔德曼！你懂得罗斯话吗？”

“懂。沙拉达说，太糟糕了，但是土耳其人在莫哈克斯打胜了。”

阿拉迪摇摇头，沉思了一下，接着就命令米科拉和沙拉达都站起来。沙拉达挨了很重的五棍，米科拉挨了十棍。

在这样照顾了哈斯法尔瓦的孩子以后的第二天早晨，阿拉迪先生在班上发表了一通演说。

“我现在是对匈牙利的孩子们说话，”他加重语气说。

他号召我们要有爱国心，要热爱美丽的匈牙利大地和我们可爱的匈牙利祖国。

他说，倘若罗斯的孩子们取笑匈牙利学校，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国家。

“要是罗斯人嘲笑这个被我们认为是最神圣的东西，所有的匈牙利孩子，都要把向我报告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要是这位教师光打罗斯孩子，那我们倒很可能会跟他一起对付罗斯人。可是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大家却都反对这位教师。

从那以后，阿拉迪就只向匈牙利人和说匈牙利话的罗斯人提问，从而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语言问题。如果一个罗斯孩子没有在家里温好功课，他只消说他不会说匈牙利话——这就行啦。

有的犹太孩子很艳羡罗斯人的这种特权，硬说自己也都不懂匈牙利话。菲尔德曼把犹太话译成匈牙利话，比米科拉熟练得多。所有的犹太学生，立刻象罗斯人一样，也处于有利地位了。于是他们所享受的文化的恩赐，就只有一样东西了——教师的棍子。但那往往是不堪忍受的。

这样一来，那些罗斯和犹太的孩子，由于再也不怕教师会叫到他们，也就开始感到无聊起来。他们只想搞点什么花样来解解闷——那些花样常常是违反校规的。

有一天，沙拉达在墨水池里装满了沙，就扯下几个苍蝇翅膀，贴到坐在他前面的伊科维支的头发上，然后躲到书桌底下，在他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伊科维支哇地叫了起来。

“你喊什么，伊科维支？”

“有人掐我，老师。”

伊科维支给踢了一脚。他点点头，表示已领会这个暗示。

“跳蚤咬我，老师，”他自鸣得意地说。

“跳蚤？跳蚤可不是有人啊，应该说有什么东西。这你到现在总应当知道啊。不管怎么样，要是你身上长了跳蚤，那就不能上学校来了。你回家去吧。”

伊科维支回家了，一连三天，他不用为功课操心。阿拉迪猜到了，咬伊科维支的是个什么人，而不是什么东西。结果，费多连科和菲尔德曼每人都挨了重重的五棍子。

临近圣诞节时，贝雷萨斯的督学尼梅什光临了索莱瓦小学。

“这个索莱瓦小学，”阿拉迪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他解释道，“是匈牙利民族文化优越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匈牙利、犹太和罗斯的孩子们，一起坐在这个教室里，受到同样的对待。如你所看到的，督学先生，匈牙利的孩子们都是好学生。至于犹太人——他们马马虎虎。而罗斯人，可就连基本知识也学不会了。”

下课后，当他们俩坐在教员休息室里时，尼梅什训诫了阿拉迪。

“在索莱瓦小学里不是三个民族，而只有两个民族。犹太人

是匈牙利人，他们是信奉摩西的。”

“那些犹太孩子，匈牙利文一字不识——也是匈牙利人？”

“凡是在这里，在边疆内的犹太孩子，就都是匈牙利人。”

我在贝雷萨斯是“班上的优等生”，但是在索莱瓦，我却降到第二名，落在左尔坦·菲尔德曼后面了。甚至今天，我也还为这一痛苦的降级而怀恨希伯来语①。都是希伯来语害得我降了格。

在贝雷萨斯，贝兰·拉帕波特博士是我们的希伯来语教师。拉帕波特喝了一点酒后，往往会用他那圆润的男中音唱起轻快的匈牙利小调，如果他喝醉了的话，就唱忧郁的匈牙利古歌。作为一个热情的匈牙利人，在国庆节时，他会在钮孔上戴一个红白绿三色的玫瑰花饰。他做梦也没想到会以教希伯来语来折磨那些在他管教下的信奉摩西的匈牙利人。

索莱瓦的犹太教士约纳斯·弗兰克尔，决心要用希伯来语教授他的神学课。我夸夸其谈地讲述了我们的祖先雅各怎样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雅各的儿子约瑟，又怎样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②——但弗兰克尔总是不满意。他要我把在贝雷萨斯所没有学过的都补起来——学会读希伯来语。在他的折磨下，我终于真的学会了那些长棱角的文字；从此，我也不再理睬他的唠叨了。

犹太教士约纳斯·弗兰克尔，这位索莱瓦、波莱纳和哈斯法

① 即犹太语，但不是犹太人的口头语言。在生活中，犹太人一般讲意第绪语。

② 这里指这两件事：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求弟弟雅各给他吃点熬的红豆汤，雅各趁机要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雅各的儿子们见父亲宠爱弟弟约瑟，就恨约瑟。后来根据犹大出的主意，他们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约瑟便被带到埃及去了。（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五章及三十七章）

尔瓦的犹太人的精神指导者，脚穿一双黑靴子，身着束腰的长袖黑绸袍、黑灯芯绒裤、白袜子，头戴深蓝的皮边天鹅绒帽。他一来到学校里，就脱掉天鹅绒帽，头上只罩一顶绸缎帽了。他是一个又大又胖的汉子。他那修饰得整整齐齐的长胡子和头发都是漆黑的，看上去一副凶相。

有一次，我梦见了古老的犹太上帝耶和华，他因为做父亲的人的罪孽，甚至惩罚了下面七代的孩子们，残酷的耶和华的那双眼睛，就活象这位犹太教士弗兰克尔的眼睛。

一天，下课后，我来到弗兰克尔身边。

"教士，我想请教你一个有关良心的问题。"

"滚开，"犹太教士粗暴地回答道。

我想问犹太教士的这个有关良心的问题，就是象我这样一个为独立党搞竞选活动的人的儿子，百倍聪明的犹太教士的孙子，竟喜爱罗斯人米科拉更甚于我的表兄卡罗莱，这到底是不是一桩罪孽？这位犹太教士既然连听也不愿听，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获得解答。我呢，也就对米科拉保持着诚挚的爱——他在他的父亲死后，已同马鲁莎一起搬到福洛普家里来了。

我捧着我的«圣经»，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在索莱瓦，«圣经»就是一面印着希伯来原文、一面印着匈牙利语译文的«旧约全书»。匈牙利语译文我一下子就通晓了，但希伯来文却从来引不起我的兴趣。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①

① «旧约·创世记»开头的几句。

如果你看的是匈牙利文，那是很容易懂的，这段话的意思你全都能明白。可是你看的如果是希伯来文的话……

所以我就跟尼纳去玩，不读希伯来文了。尼纳是一只公鸡，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而且有点儿反常。

我来到索莱瓦没几天，艾尔莎舅母就铺好了一打鸭蛋，叫一只大麻花鸡去孵。她告诉我，因为鸭子自己不会孵蛋，只好叫母鸡孵鸭蛋。卡罗莱是看惯母鸡孵陌生蛋的，他兴冲冲地向我保证说：

"等着瞧吧，格查，当鸭子下水去时，母鸡会嘎嘎嘎嘎叫哩。"

"它干吗要嘎嘎叫？"我问。

"呃，你在贝雷萨斯的学校里就一点也没学过？它嘎嘎嘎嘎叫，是因为鸭子会游泳，母鸡却不会游啊。"

"是为这个发牢骚吗？一个好的母亲，应该为孩子比她更能干而高兴啊。"我说。

没想到，在艾尔莎舅母拿来孵的鸭蛋当中，混进了一个鸡蛋；这个蛋看上去比鸡蛋要大一些，比鸭蛋又稍微小一些。你知道，小鸡出壳比小鸭早。当同窝的另外一些蛋还远远没有破壳见阳光的时候，那只麻花鸡孵的一个蛋却发生了那件早就预料到的事。母鸡朝这个新生儿看了一眼，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它照料的其他那些蛋上去了。它给搞糊涂了：是这个新产品提早出世了呢，还是别的孩子延期出生呢？多数定标准，它断定准是这个调皮家伙违反了常规。孵蛋的母鸡生气了，对这只黄毛小鸡恶狠狠地啄了一口。那孩子吓得从愤怒的母鸡身边逃开了。幸亏我正好在养鸡场里，要不它也就完了。我不明白那只母鸡干吗要这样大发脾气，我捡起这只小鸡，就拿我的草帽向那母鸡摔了过去。

我们把这只小鸡放在厨房里一个铺了棉花的面包筐里。我给它起了尼纳这个名字。不能把它单独放在院子里，因为不仅那只母鸡，而且一起养的小鸡也都一心想伤害它。我每天都要带尼纳到外面露天地里去一两个小时。在它小的时候，我用手捧着它，等到它渐渐长大了，我们出去时，它就蹲在我的肩膀上了。那时，那只孵蛋母鸡已经当上了一窝子小鸭的母亲。我碰到它时，尼纳蹲在我的肩上，它会威胁地朝我瞪眼睛——起码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坏家伙就是你的娘啊，”我对尼纳揭穿了秘密。

尼纳的反常特征，表现在它害怕自己的亲族、一起饲养的鸡鸭，而对人却无限地信任。当尼纳开始长出雄鸡的尾巴和鸡冠的时候，卡罗莱硬要给它改一个名字，但我不答应。我想，说实在的，尼纳经受得够多了。

我就这样跟尼纳玩着，不去攻读希伯来文《圣经》了。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利格在我身边。

利格生性很妒忌——它压根儿不欢喜我跟尼纳玩。

“嘿——呀，嘿——呀，”它喊叫着，想引起我的注意。当这一套没有得逞时，它就象一头公牛似的低着脑袋朝我逼了过来。利格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吓着了。

它舔舔我的脸，叫我放心，接着，又舔舔我夹在胳肢窝下的《圣经》。

这可给了我一个好主意。

我把尼纳从窗上丢进厨房里，就引着利格来到院子的那一头，谷仓的后面。我爱抚和摸弄了它好一会儿，直到我们成了可靠的朋友；于是，我把《圣经》递到它的鼻子面前。

“吃掉它，利格！”

利格疑惑地瞪着眼睛望望我。

它显然认为我是在逗它，如果它咬一口这诱人的书本的话，我就会打它的鼻子。

但我却站在那里，平静地盯着它的怀疑的目光，那两只在哀求似的一拍一拍的耳朵。"吃掉它，亲爱的利格。吃呀，吃掉它，请呀。"

利格终于答应了我的恳求。

那本《圣经》除剩下一块硬封面之外，已一无所剩。我把那块硬封面扔进了我们隔壁药剂师的院子。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福洛普舅舅问道："你们都温习过功课了吗，孩子们？"

"唔，温习了，"卡罗莱说。

"你呐，格查？"

"我都温习了——除了《圣经》。"

"你为什么不读《圣经》？"

"利格把我的《圣经》吃掉了。"

"利格吃掉了你的《圣经》？"福洛普舅舅惊问道。

"唔。我正在跟尼纳玩，它从我胳肢窝里把《圣经》抽走了。"

"看着我的眼睛，格查。"

我脸红了，垂下了头。我的眼睛含着眼泪。

"好，得啦，"福洛普舅舅说，"明天我给你另外买一本。新《圣经》可要保管好啊，你这个百倍聪明的犹太教士的孙子。"

第二天，福洛普舅舅给我买了一本新的《圣经》。

圣诞节时，在我的成绩单上的一排"优"字当中出现了一个"良"字。我的宗教课得了"良"。还有一条附有一个星号的简单评语："该生学习希伯来文毫无进步。"

要是我的宗教课得个优，我就会学习希伯来文了。既然弗兰克尔毁坏了我的成绩单，我就进行了报复：把已学到的一丁点儿希伯来文也忘掉了。

我不仅嫌恶学希伯来文；普通的犹太话我也学不会。当我要跟一个只会说意第绪语的孩子打交道时，米科拉就是我的翻译者。他意第绪语讲得挺流利。要是他问我，我怎么连这样容易学的语言也学不会，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匈牙利爱国者。”

“斯洛伐克人不是人，玉米粥不是食物”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两句明确的断言，或者不如说两句否定性的话：“斯洛伐克人不是人，玉米粥不是食物。”这话是连在一起说的，虽然两句话各有各的历史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解释。为什么玉米粥不是食物，我记不得了，但是为什么斯洛伐克人不是人，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阿拉迪老师跟我们说：

“在费伦茨·拉科治时代，当他的勇敢的士兵正在跟德意志皇帝的雇佣军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小斯洛伐克人骑着马从大路上走来。这个斯洛伐克人正高高兴兴地往前走，突然有三个骑兵追上了他。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士兵们问这个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人老老实实回答了这三句问话。

“‘是亲奥地利的呢，还是库鲁茨？’一个骑兵问道。

“‘库鲁茨，’斯洛伐克人想了一下，回答道。

“于是，士兵们就狠狠地打了这个斯洛伐克人一顿，因为他们是皇帝的雇佣军。

“斯洛伐克人摸摸疼痛的屁股，骑着马走了，直到又让三个士兵拦住了去路，那三个士兵正好是匈牙利的起义者。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斯洛伐克人老老实实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是亲奥地利的呢，还是库鲁茨？'

"'亲奥地利的，'斯洛伐克人毫不犹疑地说。

"于是士兵们痛打了他一顿，因为他们是拉科治的战士。

"斯洛伐克人摸摸疼痛的屁股，骑着马走了，直到第三次又让士兵们挡住了去路。

"他们又从头开始盘问。

"'是亲奥地利的呢，还是库鲁茨？'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斯洛伐克人回答道。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士兵们惊奇地重复道。'那不可能。一个人不是库鲁茨，就是亲奥地利的。'

"'一个人，当然罗，'斯洛伐克人说，'可我是一个斯洛伐克，而斯洛伐克可不是一个人。'"

阿拉迪老师讲这件有趣的、有启发性的轶事时，匈牙利的孩子们哄堂大笑。按照老师的命令，米科拉把这故事翻译成了罗斯语，菲尔德曼翻译成了意第绪语，这时全班的孩子都笑了——除了约罗斯拉夫·高夫利克，他是斯洛伐克人；他是从卡沙附近的哈特卡村搬到索莱瓦来的，刚刚开始学匈牙利语。高夫利克没有笑——反而举起了右手，每当我们要求老师允许发言时，就是这样举手的。

"什么事，高夫利克？"阿拉迪问道。

"老师，对不起，"高夫利克说，"在哈特卡，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只是他讲的是，开头，从大路走来的是个罗斯人，中间，是士兵们打了罗斯人，结尾，是罗斯人说，罗斯人不是人。"

教室里一片寂静。

"哈特卡的那个老师肯定是个斯洛伐克人，"阿拉迪想了一

下说。

“他不是斯洛伐克人，”高夫利克反驳道，“他是一个匈牙利的新教徒。他名叫佐尔坦·迪奥西。只是，你知道，”高夫利克吞吞吐吐地继续说，“哈特卡只是一个斯洛伐克村，那里——”

我怀疑，无论是皇帝的雇佣军也罢，拉科治的士兵也罢，他们打故事中讲的那个斯洛伐克人，是否能比阿拉迪打约罗斯拉夫·高夫利克打得更狠了。

我除了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斯洛伐克人的事情之外，我还知道，他们共有二百多万人，住在匈牙利，在罗斯区的西面。我还晓得，大批的斯洛伐克人已移居到美洲去了，因为他们在匈牙利既没有土地，又找不到工作。因此，在理论上我是熟悉斯洛伐克人的，但实际上我只认识一个斯洛伐克人，那就是高夫利克。后来，有一天，有七十九个斯洛伐克人，乘着两辆牛车，来到了索莱瓦。工厂老板要造一个新的甲醇厂，便搞来了这些斯洛伐克人。

厂方把这七十九个斯洛伐克人安置在几幢棚屋里。照我看来，这些斯洛伐克人都是人。他们吃、喝、谈天，都跟索莱瓦的村民们一个样。只是他们说另外一种语言，吃的甚至比村民们还要少。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就象罗斯人穿的，不同的是他们腰上都系有皮囊，脚上穿的是鹿皮鞋。他们从早到晚在工厂的基建地上干活；接下来他们就洗衣服、烫衣服和烧菜做饭。夜晚来临了，他们也不点灯，只是在黑暗中围坐着唱歌。他们唱的歌十分悲哀——又非常优美。

斯洛伐克人干的活不比别的建筑工人差。可是他们拿的工钱，每小时却比匈牙利人、罗斯人和犹太人要少两个克劳采。索

莱瓦村的村民们都嘲笑这些"流动小工"。

人们说，斯洛伐克人不管到哪里，都会碰到熟人、朋友和亲戚。有一首歌，讲一个斯洛伐克人给一些吃人者捕捉了去，结果，吃人者的头头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后来，这个斯洛伐克人到了天上，他又认出了在圣·彼得①那里看管珍珠门的叔叔。

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索莱瓦也罢，在邻近一带也罢，我们这些斯洛伐克人却既没有认出亲戚，也没有认出朋友。他们生活着，好象根本不是活人似的，跟所有的喀尔巴阡山人都毫无往来。但是，斯洛伐克的工头萨弗兰耶克，有一次偶然碰见了酒店老板费多尔·加加特柯，认出他是个老朋友，这一来，斯洛伐克人尽管离群索居，可终于把索莱瓦的体制弄得一清二楚啦。十二年前，萨弗兰耶克和加加特柯曾一起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巡回马戏团里扮演轻骑兵，这个马戏团是由一个名叫蒂梅斯古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率领的。蒂梅斯古上演的匈牙利轻骑兵最吸引人的一幕，是吃马鞍下面搞熟的生马肉。这是一个挺赚钱的行业，但不是每个人的肚子都受得了。譬如说，加加特柯就对付不了这种食料。因此，他去给一个浸礼会传道士当了秘书。

加加特柯一见这个以前的轻骑兵老友，真是惊喜欲狂。他吩咐他的妻子照应顾客，就坐下来按照美国的方式往酒里放上几片小苏打，跟萨弗兰耶克聊起"美好的往昔"来了。加加特柯把小苏打溶解在大茴香酒里，使它升华成了威士忌酒，那味道是很难吃的，但是这能使人回想起美国，即便口味不对头，调制的方法总是美国式的嘛。

---

①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为渔夫。

这两个以前的轻骑兵谈论了过去十年里英国的一些往事。

他们灌下相当数量的酒后，萨弗兰耶克把话题儿一转，讲到他一心想探听的事情上来了。

“告诉我，我的朋友，为什么在索莱瓦这里人们都管犹太人叫匈牙利人？”

“因为在索莱瓦，匈牙利人只有把犹太人合在一起，才是多数。”

“我懂了。在卡沙也是这样的。现在，还有一点，要请你告诉我，老朋友：匈牙利人把犹太人当作匈牙利人，这弄明白了。但是犹太人为什么自称是匈牙利人呢？”

“呃，这也要问吗？如果犹太人自称是犹太人，他的邻居就会称他为肮脏的犹太人。而要是他自称是匈牙利人，那他就可以称他的邻居是龌龊的罗斯人了。你到底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感兴趣？”

“我可以告诉你，”萨弗兰耶克考虑了一下说，“唉，天哪，我告诉你吧。你知道，我的朋友，”他放低声音继续说道，“按照目前的状况，我们斯洛伐克人，比罗斯的、匈牙利的和犹太的工人每个小时要少拿两个克劳采。我知道，在美国，是有的人总比别的人要赚得少些。那是黑人，是犹太人或者斯洛伐克人……我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别误解我，老朋友——要怎么样才能使斯洛伐克工人跟匈牙利人拿同样多的工钱，而让犹太人少拿一点。对工厂来说，谁是‘流动小工’反正都一样，但是对斯洛伐克人来说，可就不一样啦。”

当萨弗兰耶克正在考虑着如何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工人拿同等工资的时候，厂方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没有给斯洛伐克人每小时增加两个克劳采，而是削减了匈牙利、罗斯和

犹太工人的工资。

这一来，可把索莱瓦村的村民激怒啦。他们的怒火不是对着厂方，而是对准了降低工资抢饭碗的斯洛伐克人。

“杀掉那些恶棍，”他们主张道。

“杀掉他们不犯谋杀罪。反正斯洛伐克人不是人。”

就索莱瓦村民来说，对这种事情作出一个决议是很容易的。他们决定，不管语言或宗教信仰如何，都要去教训教训斯洛伐克人，叫他们规矩点儿。住在索莱瓦的每一个工人，都一心愿为这项教育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常识又警告他们，干起来可得自我克制。如果罗斯人也一起来教训斯洛伐克人，警察厅长就会插手进来，逮捕攻击者。如果只有匈牙利人殴打斯洛伐克人，他有可能会来干预，但这种干预不会怀有恶意。在那种情况下，警察厅长不会逮捕侵犯者，而会把受害者关起来。因此，他们决定由匈牙利人来殴打斯洛伐克人，只特许一两个犹太人参加这一行动，而且他们得是被公认为匈牙利人的犹太人。

星期六晚上，工人们都领到了工资，酒店里一片喧闹。消耗了大量的葡萄酒和白兰地。

这些逐店闹饮的人，大骂斯洛伐克人，由于一种地地道道的要骂人就也得骂德国佬的风气，因此他们也大骂德国佬。

往常在星期六晚上，酒店里总有两个值勤的警察，但这一次却没见警察的影子。道路畅通无阻。

酒能助威，这是常识。但是，如果喝酒的人不借酒力的帮助就已是个冒失鬼，那么酒就会使他失去理智。索莱瓦的匈牙利人恰好就是这样。半夜里，当他们去打斯洛伐克人时，他们已经无所顾忌。两个亡命之徒撞破门，另外两个砸碎两扇窗，就开始对斯洛伐克人袭击了。

"打狗杂种呀。"

匈牙利人高声怒吼，但只怒吼了不大一会儿。那些斯洛伐克人有的根本没睡，在等候他们的敌人，有的即使睡了也非常警觉，因为一听到响声，他们就都准备好了。他们没有大呼大叫浪费时间，而是立刻埋头工作——拿起石头、棍棒、斧柄和椅子干开了。

这一仗打的时间很短。

匈牙利人被他们结结实实揍了一顿。

西维拉大夫一直忙到天亮，包扎了二十二个伤员——十八个匈牙利人和四个斯洛伐克人。

早晨，木匠正在斯洛伐克人的棚屋里费劲地东寻西找，想好歹找出一张完整的桌子或椅子，这时警察来到了。

警察厅长把十二个斯洛伐克人关进了监牢。

厂方提出抗议了。

"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工人。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唯一的罪行，是他们受到攻击，进行了自卫！"

警察厅长搞清楚了，认识到厂方是对的。于是他释放了斯洛伐克人，逮捕了十四个罗斯人来代替他们。这一来，工人们提出抗议了。

"他们逮捕无辜的人。罗斯人跟这次打架毫无关系。如果斯洛伐克人是无辜的，那罗斯人就更是无辜的。不释放他们，我们就拒绝上工！"

星期二早上，索莱瓦的匈牙利工人、罗斯工人和犹太工人，都放下了工具。

到那天中午，波莱纳堆木场也停工了。下午，罢工扩展到了哈斯法尔瓦。

但是斯洛伐克工人却保持着工作的权利。

宪兵在建筑工地和斯洛伐克人住的棚屋四周布下了封锁线。

索莱瓦的工人们破口大骂，他们要让那些斯洛伐克下流坯瞧瞧谁是好样的。

为了抚慰这些斯洛伐克人，工厂里的一个叫做西德拉赛克先生的捷克工程师，在吃中饭休息时，用一种自以为是斯洛伐克话的外国腔调，对他们讲了话。

“你们不是那些卑鄙的、下贱的社会主义者，”西德拉赛克演说道，“你们都是匈牙利的忠诚的儿子，是我们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

斯洛伐克人对西德拉赛克说的话都不甚了解，但他们知道，索莱瓦罢工了。中饭后，六十九个斯洛伐克人中只有二十三个人回去上工。下午，他们也罢工了。

到星期三，警察厅长释放了十四个罗斯人。但是工人们继续罢工。他们要求恢复以前的工资等级，把罢工扩展到了离索莱瓦一小时路程的伏洛克镇的一个堆木场。

星期四，厂方对匈牙利人、罗斯人和犹太人都恢复了原先的工资等级。工人们还是继续罢工。现在，匈牙利工人、罗斯工人和犹太工人们是要求给斯洛伐克工人也同样增加工资。喊叫得最响的是那些头上扎着绷带的匈牙利人。也就是前几天拚命殴打斯洛伐克人的那些人。

星期四后半夜，厂方想出了一个挺高明的主意。他们公开宣告：这次罢工是排犹分子煽动起来的，目标是信奉摩西的厂长。

这一来，犹太工人就接过手来了。

星期五，担当起领导任务的已不是头上扎绷带的匈牙利人，而是身穿长袖大褂的犹太工人，他们向厂里的头头们发出了连珠炮一般的古希伯来先知们的可怕的咒骂。

“涂脂抹粉的巴比伦①婊子，世界的末日快来到啦！”他们朝着厂长的红屋顶瑞士别墅大吼大叫。

星期六，厂方屈服了，答应斯洛伐克工人的工资跟别的工人一样。

签订协议后，犹太文化协会主席费尔德曼对索莱瓦工人发表了演说。

“从今以后，凡是胆敢再说斯洛伐克人不是人的，就是流氓和德国走狗。”他用这话结束了他的演说。

“我们说玉米粥不是食物，还能说吗？”听众中一个老妇人问道。

“该下手了，”厂长在星期天早晨说。

“我们会下手的，”警察厅长华萨赫莱答道。

“领头搞这件卑鄙勾当的，是犹太文化协会那个费尔德曼。”

“我知道。”

① 古代亚洲西南部巴比伦帝国的首都，以奢华淫糜著称。

卡尔曼·阿兹泰洛斯

跛腿的印刷工人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费克斯凯叔叔的亲戚和一屋同住者，第一次给关进贝雷萨斯监牢，是因为犯了诽谤和造谣中伤罪。当市长同意给那个路灯点灯夫的寡妇和四个孩子每月五十克劳采的皇家抚恤金时，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当着证人们的面，称这个市镇的头子是一头蠢猪，是一个无耻的贼。阿兹泰洛斯要是在审判时放聪明一点的话，他本是不会因这种大逆不道而给关上两个多月的。这个跛腿的印刷工，当时以卖报为业，却硬是不愿卖个乖。他竭力向法庭证明，他讲的全是事实。

“你拿什么来证明呢?”斯泰普夫法官拚命高声吆喝，掩盖他的惊惶。

“我要证明的是，市镇官吏们唯一没有盗窃的公共财产，全是没有用的东西。”

“这不是诽谤——这是造谣中伤，”激怒的起诉人喊道。

于是，阿兹泰洛斯蹲了几个月监牢。

阿兹泰洛斯第二次给拘捕到斯泰普夫法官面前，是在他刚出狱后不久的一天。他劝砖厂工人们反对一天干十四个小时的活。砖厂老板贾沙依是个天主教徒；阿兹泰洛斯是个新教徒。这就足以证明，阿兹泰洛斯曾经骂过贾沙依是工人们的邪恶的吸血鬼，法官以反宗教煽动罪，判了这个跛腿的印刷工人十个月

徒刑。

后来，阿兹泰洛斯上阿克纳西拉蒂纳去，在盐矿工人中间组织什么工会，给判了一年徒刑。起诉人说阿兹泰洛斯买票只买到基拉莱哈扎，余下的一段路是无票白乘的。阿兹泰洛斯无法反驳这一指控；于是，他因为让铁路遭受了六十五个克劳采的损失，而在贝雷萨斯监牢里蹲了一年。

他还有些什么别的罪行，我就说不上了。不过，他肯定还犯了许多罪，要不，他就不会在五年当中，蹲上五十三个月的牢。

这个跛子印刷工第三次来到斯泰普夫法官面前的时候，贝雷克州的男男女女都已知道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这个名字了。《贝雷克》周报和《贝雷克报》给这个“亡命之徒”提供了相当大的篇幅。有时，甚至布达佩斯的报纸也提到阿兹泰洛斯，譬如说，谈谈与他去阿克纳西拉蒂纳有关的一些事。报纸都不讲他的好话，但是，阿兹泰洛斯却照样因他从事的事业而赢得了许多拥护者。

在贝雷萨斯，他的唯一的拥护者，是那些住在吉普赛区的人和砖厂的工人；对于后者，这里可能无需再专门提上一笔，因为砖厂的工人本来就都是住在吉普赛区的。在蒂萨河流域和维克河沿岸的人们中间，阿兹泰洛斯并没有多少追随者，那里居住的都是种植麦子和葡萄的人，那些拥有六头牛的农民的产业就算得上是大农庄了。

象我父亲这样同情独立党的匈牙利人，都因为阿兹泰洛斯说过这样一句话而严厉谴责他：“如果伟大的泰马斯·艾舍活到今天，他肯定是个战斗的社会主义者。”

上边，在北面的森林区——那里，燕麦和马铃薯是主要的庄稼，阿尔马西伯爵有一万四千英亩土地，桑邦伯爵的领地广达几

十万英亩——阿兹泰洛斯在乌克兰和犹太的穷人中间，拥有许许多多信徒。信徒？当然，没有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把阿兹泰洛斯的说教付诸实践。可是，打从阿兹泰洛斯来到贝雷萨斯居住起，人们的举动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

就拿一件事来说吧。桑邦伯爵的管家雷诺斯·博格约，命令女佣人安娜·华尔科芙茨基到森林里去，把那条挣脱了绳子的名叫马顿的公牛给找回来。你想想看吧，安娜·华尔科芙茨基由于这管家的儿子的缘故，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下这个命令是并不奇怪的。

新奇而又叫人吃惊的是安娜·华尔科芙茨基的回答："我不去！那是男人干的事。"

博格约一听这话，抬腿就朝这个顽抗的女佣人的肚子踢了一脚。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家常便饭嘛。新奇的是那些个仆人听到安娜·华尔科芙茨基的尖声喊叫，看到这个孕妇在地上打滚，就挥着拳头，向管家冲了上去。

博格约，象别的管家面临这种情况时一样，立刻掏出了手枪。他准会按照老习惯，向一群闹哄哄的仆人开枪的，要不是……这时出现了惊人的转折……要不是伐木工人内森·罗逊普拉特正好站在博格约背后的话。罗逊普拉特是个大力士，他挥起铲子就朝博格约头上来了一家伙，没人来得及喊声快①，一切都已经解决了。

按照惯例，罗逊普拉特被警察捆缚起来，拖进了贝雷萨斯监牢。不出所料，桑邦伯爵给了博格约的寡妇相当大的一笔抚恤金，因为如同《贝雷克报》所载，伯爵的这个管家"是一位死难烈

---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士，因为他是战斗的匈牙利人，具有坚定的民族意识”。由于种种难以言喻的原因，《贝雷克报》还说罗逊普拉特是一个“俄国代理人”。

桑邦的仆人们的举动可就更加令人吃惊了。他们为罗逊普拉特太太和她的三个孩子征集了燕麦和马铃薯——实际上，不时有一只野兔或者一条鹿腿送到罗逊普拉特的棚屋里来。裁缝华西里·贝西基德（他能在六角手风琴上奏出使人难以忘怀的曲调）用自己的衣料给这三个没有父亲的罗逊普拉特的孩子做了粗呢裤子和外套，工钱分文不取。

在阿兹泰洛斯来到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后来，又按照老一套，在秋天犹太大节日时，不准罗逊普拉特的那三个卷头发的孩子进犹太会堂。孩子们抗议说，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白费劲——会堂的看门人还是撵他们走。

“只有罗斯人才穿粗呢裤和外套，”看门人说。

卡尔曼·阿兹泰洛斯是索莱瓦有权有势者的经常的话题。他们认为，索莱瓦的生活不象以前那样敦厚平静，全是这个“亡命之徒”的缘故。人都变得倔头倔脑了——在他们看来，地主也罢，牧师也罢，上帝也罢，都不再是不可违背的了。而人却在迅速地大量增加中。前几年，在索莱瓦堆木场干活的才只三百人，现在有一千七百了。在波莱纳堆木场，以前是六十人，现在却有八百四十人了。现在，索莱瓦和波莱纳之间已通地方火车，因此，在索莱瓦游荡的伐木工人越来越多了。

十年来，索莱瓦一直存在着一个犹太工人的读书和文化的社团。后来，匈牙利和罗斯的工人们决定，他们也要读书识字。贝雷萨斯那个出名的排犹分子华萨赫莱，在娶了玛丽卡·斯扎波之后，已经当了警察厅长，他不准匈牙利和乌克兰工人成立社

团。于是匈牙利和乌克兰工人就加入了这个犹太社团。这一下，可把那个忠诚的新教徒尼盖西牧师和希腊天主教牧师杜迪克斯吓坏了。叫索莱瓦吃惊的是，这两个牧师，在多年的互相仇视之后，竟然和解了。杜迪克斯拜访了尼盖西，尼盖西也酬答了他。如果这是令人惊讶的，那么，后来发生的事，就可称之为奇迹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这两位牧师双双拜访了犹太教士弗兰克尔。弗兰克尔虽然没有回访，但从此以后，当他在大街上碰到这两个教会同行时，就回答他们的招呼，不再避不照面了。

他们三个和好后不久，警察厅长华萨赫莱就派人来请犹太读书和文化协会主席伊格纳克·费尔德曼到他那里去一趟。费尔德曼跛子心里很犹疑，在去警察厅长办公室之前，他跟他的朋友们决定，要是他以什么借口被捕了的话，这个犹太文化协会就由戴维·拉比诺维茨、费多尔·福马和贝拉·柯托斯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领导。你倒想想看，结果华萨赫莱款待他的并不是一顿鞭子，而是热情的握手，伊格纳克·费尔德曼是多么惊讶啊！

"请坐，费尔德曼先生，抽支烟。"

费尔德曼坐下身，从警察厅长递过来的金烟盒里取了一支烟。他把香烟衔在嘴上，忘记了点火。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费尔德曼先生，"华萨赫莱这样开了场，"想听听你的意见并得到你的帮助。"

费尔德曼一听这话，也许是大为吃惊，也许是吓了一跳，他把他的香烟都咬成两截了。

"你知道，我夜里睡不着觉时，想的是什么吗？"华萨赫莱问费尔德曼跛子。"我在想，费尔德曼先生，要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村子——它实际上正在变成一个城市——的生活，搞得又富

丽，又文明，就象——你到过外国吧，费尔德曼先生？没有，好，我希望看到索莱瓦变得象瑞士的市镇那样。安安定定，干干净净，文化普及——这就是瑞士市镇的特征。而我们不幸的索莱瓦——”

华萨赫莱深深叹了口气。

费尔德曼坐在椅子边上，忐忑不安。

“你知道吗，费尔德曼先生，”华萨赫莱继续念他的独白，“你知道索莱瓦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吧，是文化！是的，严重的缺点，根本的不足，是缺乏文化！我们的工人们，不久以前，还都是砍木头的——他们没有教养。可是——对我的直率，请不要误解，费尔德曼先生——这种缺乏文化，一部分，而且不是很小的一部分，得要怪你，费尔德曼先生。要怪文化协会的那些职员。文化协会是怎样教育工人们的，费尔德曼先生？老实说，根本没有教！文化社做了什么事，费尔德曼先生？老实说，是睡大觉！”

费尔德曼到警察厅长办公室去，原来以为，是为文化协会的活动而给召去挨骂的，结果却是由于文化协会睡大觉而给训了一顿，这可真叫他目瞪口呆了。费尔德曼跛子若是更有经验一点，在担任文化协会主席之前，不是在索莱瓦山上以牧鹅为业的话，他对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态变化，就不会这样高兴，而会拒绝接受华萨赫莱的帮助了。这位一开头就说要听听费尔德曼意见的警察厅长，向费尔德曼建议说，文化协会应该举行几次演讲会。

“在索莱瓦没有渊博的演说家？到蒙卡契或者贝雷萨斯去请嘛！你在那里找得到人的。”

华萨赫莱不仅提供意见，而且批准开一个会。他签了一张

许可证，说文化协会可以举行演讲会——讲普遍关心的问题。一位从贝雷萨斯请来的演讲者，在文化协会的第一次公开集会上演讲。

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就这样来到了索莱瓦。

文化协会租了学校的健身房举行第一次演讲会。文化协会的会员们把从工厂里借来的木板钉成的板凳，乒乒乓乓地搬到一起。板凳可以坐两百个人，座位中间和后面还可站两百多人。

健身房的门口和墙壁上都装饰了松树枝，因为是三月初，树叶子都还没有转绿。大门前面，费尔德曼用松树枝造了一个有点象凯旋门的玩艺儿，上面用很大的纸剪成的字母，按匈牙利文、乌克兰文和意第绪文排了"欢迎"两个字。

我们孩子们张着嘴巴，呆看着这种惊人的准备工作，一个个都喜孜孜的。因此，当艾尔莎舅母严禁我去听演讲时，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失望了。

"参加这种事，你想也甭想。"

我希望费克斯凯叔叔会陪阿兹泰洛斯一起到索莱瓦来，那样，我就可以在他的庇护下偷偷混进会场去了。结果并非如此。阿兹泰洛斯是单独一个人到索莱瓦来的。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求马鲁莎奶妈帮我避开艾尔莎舅母的禁令了。一上来，马鲁莎怎么也不干，但当我眼泪鼻涕地哭起来时，她的心软了，就系上了她的最好的方头巾。

演讲定于星期天下午五时开始。到下午三点半钟，健身房里已挤满了人。不光索莱瓦的工人来参加了，连波莱纳的、哈斯法尔瓦的，甚至象伏洛克和维里克凯那样远的地方的林业工人，也都赶来看阿兹泰洛斯，听他演讲。来到健身房的，不光是男女工人，五点差十分，华萨赫莱也来了。费尔德曼想为他在前排找

一个座位，但警察厅长笑吟吟地谢谢他，在倒数第二排的板凳边上坐了下来。华萨赫莱的谦逊固然令人感到惊奇，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前排的座位都叫妇女占去了，全村人都断言，这些个娘儿们，可是打个喷嚏也要得到牧师允许的啊。

伊格纳克·费尔德曼致了开幕词。阿兹泰洛斯跟他轻轻讲了几句，费尔德曼就问大家，听众中有没有人会领唱«马赛曲»。没有人会唱，于是裁缝贝西基德就提议唱个«泰科第战友»①，代替那首"名字也念不准"的歌。这首歌，可就人人都会唱了。健身房里响彻了这首二百年前的歌曲的叠句：

> 亡命者的血不值钱地流，
> 一天一个铜子就能塞满口；
> 他兜着花不了的余钱往前走，
> 还要在两个异教徒争夺一个国家时把鲜血流。

听众在贝西基德的手风琴伴奏下站着唱了歌。唱歌毕，有座位的人都重新坐下了。

"现在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要讲话了，"费尔德曼宣告道。"阿兹泰洛斯用匈牙利话讲，不过不要紧，我们会把他用匈牙利话讲的话，对不懂匈牙利话的人用罗斯话和犹太话再重复一遍。阿兹泰洛斯讲话时，大家不要吵。要抽烟可以抽，但不要吐痰。"

阿兹泰洛斯爬上了桌子，费尔德曼就坐在这张桌子后面。他穿一身破旧的褐色衣服，这衣服原是我父亲的，后来给了费克斯凯叔叔。

---

① 一支库鲁茨的歌。

阿兹泰洛斯一言不发，望着听众，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会堂里肃静得跟教堂里一样。

阿兹泰洛斯举起右臂，开始讲话了。

“工人弟兄们！”

他讲不下去了。

那些坐在前排的经常上教堂去的娘儿们，仿佛听到一声口令似的，都一下跳了起来，把脸朝向了听众，很敏捷地把她们的裙子掀到了腰部。

全场哄堂大笑了。阿兹泰洛斯看到这没有料到的情景，一时间站在那儿惊得呆住了。他差点从桌子上掉了下来。他也一起笑了，但只笑了一忽儿。接着，笑声被他的大声喊叫压倒了：

“妇女们！妇女们！你们把我当作什么啦？你们以为我是一匹没有阉过的雄马吗？”

“好啊，他骂得好，”有人高喊道。

“就要这样对付她们。”

“这是她们活该，这些牧师的婊子！”

大伙又笑了，比刚才笑得更响了。只是现在的笑，不是嘲笑阿兹泰洛斯，而是同情阿兹泰洛斯。人人心里有数，虽然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一点，但他们都知道。

有人高喊了一声：“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好哇！”

四面八方响起了欢呼声和喝彩声。

那些来嘲弄阿兹泰洛斯的娘儿们，一窝蜂向出口处拥了去。她们好多人是从窗子上爬出去的。坐在二排的人移到了前面，那些坐在他们后面的人就占了空位子。站在外面街上听演讲的人，又向会场里挤。比走掉的娘儿们多两倍的人进来了。阿兹泰洛斯一动不动地站在桌旁，在这样重新调整座位时，他的脸上

显出一副沉思的表情。等会场里终于安定下来，他开始讲话了。

“工人弟兄们！”

阿兹泰洛斯有一副优美而洪亮的嗓子。当他说话时，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阿兹泰洛斯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我知道，他讲得非常之好。他讲了许多关于泰马斯·艾舍的事。

听众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大多数人都张着嘴巴听他讲。不时有人叹口气，或者在听众中响起一阵吓人的吼声。阿兹泰洛斯有时讲得使听众很感动——马鲁莎奶妈不怕羞地哭了——有时他讲到的事情，又使他们捏紧了拳头。

阿兹泰洛斯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会场里的人，很可能有生以来都没听过这样长的演讲。可是并没有人离开。听了演讲者第一句话的人，都听完了最后一句。

阿兹泰洛斯讲完了，费尔德曼问大家要不要把这演讲翻译成罗斯话或犹太话。人们说，用不着；他们每个字都听懂了。

“那好吧，要是有人要提问题，或者还要说几句的话——请上来。”

没有人要发言。听众在贝西基德的手风琴伴奏下，又唱起了《泰科第战友》，演讲会在歌声中结束了。

从伏洛克和维里克凯来的人都得赶快奔回家去，因此，只有索莱瓦的工人，加上几个哈斯法尔瓦的人还一伙伙地在小学门前谈论着阿兹泰洛斯讲的话。

阿兹泰洛斯也急忙去赶开往贝雷萨斯的火车。费尔德曼送他到了车站。四个警察和两个密探在站台上等着他们。阿兹泰洛斯和费尔德曼都给押走了。

假日余波

第二天早晨，索莱瓦人人都知道警察把阿兹泰洛斯押走了。一天之间，这个故事已口口相传：在华萨赫莱的命令下，两个戴脚镣手铐的犯人，已在骑马的警察的护送下，徒步押往贝雷萨斯。

阿兹泰洛斯在索莱瓦发表演说是星期天。到星期一，警察厅长就以“它是亵渎和煽动反对国王与国家的温床”为理由，封闭了犹太工人协会。华萨赫莱查抄了那个有八十三本图书的协会图书室。

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说也奇怪，大家对于会出什么事倒并不怎么焦虑不安。人人绞尽脑汁地思索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华萨赫莱明明希望搞这次演讲会的嘛。他为什么要这个演讲会呢？多数人认为，华萨赫莱是按索莱瓦的三个牧师的意见行事的。这话虽然听来颇有道理，但许多人都表示怀疑。

“很可能是，”怀疑的人说，“那三个牧师是急着想叫阿兹泰洛斯上索莱瓦来，那样他们就可以对费尔德曼和阿兹泰洛斯同时下手，并且封闭文化协会了。倘若华萨赫莱照牧师们的意见办，那他就不得不在阿兹泰洛斯发表演说之前就逮捕他。他们将在阿兹泰洛斯一言未发的情况下，搜出阿兹泰洛斯诽谤上帝和国家的证据。而阿兹泰洛斯说的话——牧师们事先就已知道——是不大可能叫听众们信服牧师们说的是真话的。”

有的人则怀疑，阿兹泰洛斯被捕，跟杜迪克斯神父的儿子艾莱克在演讲会那一天来到索莱瓦有关。人人都知道，艾莱克·杜迪克斯在布达佩斯读书，是斯拉夫大学生的一个头头。不过，相信这种推测的人并不多。因为，虽则谁也不怀疑艾莱克·杜迪克斯是赞赏华萨赫莱的行动的，但匈牙利的爱国者华萨赫莱办事，很少可能会受这个反匈牙利的牧师的影响。

有些流言蜚语说，华萨赫莱诱骗费尔德曼安排这次演讲，是因为他想赢得一次打赌。散布这个谣言的人，硬说华萨赫莱跟醋坊老板马科维茨打了赌，出二十五瓶香槟酒，他（华萨赫莱）就能把阿兹泰洛斯戴上脚镣手铐押送到贝雷萨斯去。这话是有根据的：贝雷萨斯是给华萨赫莱邮来了一箱香槟酒。邮政局长承认，寄件人是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另一方面，华萨赫莱是一个出名的排犹主义者，这一事实却又对这种赌博理论提出了反证。因为不管怎么说，一个排犹的绅士，是不会真的去跟一个犹太马贩子打赌的啊！

我不能断定谁是谁非。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阿兹泰洛斯和费尔德曼都蹲在贝雷萨斯监狱里。索莱瓦和波莱纳的工人们对这事思考了一番后，他们干活的手脚开始慢起来了。那个大家纷纷议论的演讲会开过几天，木场经理发觉，工厂的产量降低了。他调查了一下，发觉工作的速度一天比一天放慢了。

并没有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象阿兹泰洛斯露面之前屡见不鲜的杀人放火事件。只是产量一天比一天降低——而且老是出现恼人的差错。工厂定了栎木，他们却从森林里送来了松木。工厂要用松木，却又运到了漂亮的白杨木。

厂方向华萨赫莱求救了。警察厅长给木场派来了六个宪兵。

六个宪兵高高兴兴地吃工厂，喝工厂，还要抽粗大的雪茄烟。除此之外，当时派来的一个宪兵班长，还为自己按批发价赊购了一套木器。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工作速度的不断下降。

波莱纳的木场经理也叫苦连天。伏洛克的木场经理还拜访了华萨赫莱。为了安抚这些动辄抱怨的经理，警察局抓了十一个工人，把他们徒步发送到贝雷萨斯去了。可是，这件事也并没有使产品增加。

工厂的经理们和工程师们，在总工程师西蒙尼的家里跟一个蒙卡契来的律师商量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西蒙尼、伏洛克工厂的经理和那个蒙卡契来的律师一起上贝雷萨斯去了。一到那里，他们就要求谒见古拉克西州长。

这位贝雷克州的州长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事实的结果是：在西蒙尼家这次商谈后的第九天，费尔德曼和他的十一个伙伴就回到索莱瓦了。他们对索莱瓦人说：阿兹泰洛斯因为在狱中吐血，已给送进了医院。

阿兹泰洛斯演讲后，我在西维拉家里挨了一顿骂。马鲁莎也一样。我连忙勇敢地为马鲁莎辩护。

“是我要马鲁莎到会场上去的，”我说，“不该骂她；她没有办法不爱我，总是依我的嘛。”

“我早就看出来了，格查，野兔子也比你懂事啊，”艾尔莎舅母说。“但马鲁莎可不是小孩子啦！”

福洛普舅舅细言细语的责备，比艾尔莎舅母的骂人腔更使我感到难过。

“你这样小，就什么事都想试一试，可不好啊，格查。我是作为一个朋友，也是作为一个大夫在跟你讲话，你这样早熟，可没

有什么好处。我们是希望你不要撞到一棵白杨树上，折断了脖子，也不要淹死了，只希望你长大成人。要不会怎么样呢？再过二十年，你就会变成一个精力衰竭的老头，什么都试过了，什么也不感兴趣；什么都搞过了，什么也没干成功。凡是爱你的人——我是爱你的——只能劝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要象个孩子，这样，一旦你必须成为一个男子汉时，你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

"阿兹泰洛斯终于得到了报应，我才高兴呐，"艾尔莎舅母说。

"你有什么高兴的？"福洛普舅舅问道。

"一个流氓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哪个正派人都高兴。"

"你为什么认为阿兹泰洛斯是流氓？"

"为什么？"艾尔莎舅母诧异了。"这，人人都知道嘛。"

"人人是谁？"福洛普打破沙锅问到底。

"人人是谁？"艾尔莎舅母重复了一句。"你提这样的问题，福洛普，叫人不得不想，你这不是在教格查，而是在向格查学呐。"

"人人，"福洛普舅舅深思地说，"人人……人人……"

福洛普舅舅笑起来的时候，有点儿象个吉普赛人。当他沉思默想时，象现在这样，他那修得光光的消瘦的面相，不知为什么又叫人想起一个留胡子的古代犹太人的脸。

"人人……你知道吗，艾尔莎，"福洛普舅舅慢吞吞地说，"你知道吗，两千年前，古代的犹太人有一条很惊人的法律。古代的犹太人叫犯有死罪嫌疑的人站在一个很大的法庭面前；一共有多少法官，我记不清楚了，总有一百多个吧。法庭的成员用无记名投票决定那个囚犯有没有犯罪。只要简单多数就可决定囚

犯该用石头砸死，或者予以释放。但是，如果所有的法官，人人都一致投票，认为这个囚犯有罪的话，那么，这个囚犯就可以象人人投票认为他无罪一样，予以释放了。这条法律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本性看得很透彻。他们知道，要是人人认为某人有罪，那他就不是犯了一般的罪。他犯的罪不是一般的罪！他要的是超乎现实的东西。所以，法官们不光是凭追求公正，而且还要按照习惯的情况来处理他的案子。至于讲到阿兹泰洛斯，”福洛普舅舅的声音渐渐变得刺耳了，“可并不是人人都认为他是有罪的。去问问那些没有面包给挨饿的孩子吃的母亲吧，她们是怎么看阿兹泰洛斯的。如果你愿意去问她们的话，艾尔莎，我可以给你几千个地址。”

阿兹泰洛斯访问索莱瓦后几个月，我回到阔别两年的贝雷萨斯去了。家里有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已把我们大半个果园卖给了马科维茨，现在马科维茨的园子，已成为矩形地围住了我们的园子。醋坊老板把我们这里买去的那块地上的许多树木都砍掉了，在从前种果树的地方，造了一个很大的马厩。这个马厩可关五十四马。马科维茨正忙着在给军队供应马匹。

果园破坏了，使我心里很难过。可是，很不幸，那还不是在家里等着我的最伤心的变化。

父亲已跟以前大不相同。他变成一个老人了。在索莱瓦时，他曾经来看过我三次，但我当时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到了家里，在平常的状况下，我立刻看出，他已不象从前了，已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喝酒、讲故事的人了。讲喝酒，他是比以前喝得更多了，但不是象以前那样喝。现在，他已不再讲究酒的颜色，也不再闭着眼睛用舌头品尝品尝，而是把酒一口就灌下去，仿佛很

高兴完成一桩厌烦的工作似的。至于讲故事，父亲实际上已早抛弃了讲述奇闻轶事的习惯。

以前，当父亲讲故事，或者笑起来时，他脸上往往会有一种孩子气的表情。连他的蓝灰色的眼睛也是一双孩子的眼睛，他那浓密的、下垂的黄胡须，也丝毫无损他一脸孩子气的模样。如果什么事叫他生气了，他会一声不吭地坐上几个小时，完全象个小孩似的绷着个脸，或者象个少年人，假装已经成人了，开玩笑地在嘴里插一根烟斗。只是，当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时，最好别去正面看他。在那种时候，他的眼睛会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直勾勾地呆望着——谁也说不上是凝视着过去呢，还是凝视着未来。

近来，父亲一直愁眉不展，他跟人家说话时，也不正眼儿看对方一眼。

阿兹泰洛斯在索莱瓦的演讲，对父亲的命运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阿兹泰洛斯跟费克斯凯一起住在吉普赛区。他们住的那个小房子是我父亲的。有一天，警察把阿兹泰洛斯从索莱瓦押往贝雷萨斯后，盖什市长把我父亲请去了，他作为一个朋友，叫父亲不要在他的屋里容忍象费克斯凯这样的可疑人物。过了几天，父亲跟费克斯凯一起来到了公证人那里。费克斯凯用一百七十五个福林买下了我父亲在吉普赛区的这幢房子，用现金一次付清了价款。

这样，父亲再也不在他的房子里容忍这个“可疑人物”了；费克斯凯住的那个小房子，现在已属于费克斯凯了。这种孩子气的欺骗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落在费克斯凯头上，一个落到了父亲头上。

费克斯凯给传到警察局去了，要他说明买这幢房子的一百

七十五个福林的来路。费克斯凯乱编瞎说了一顿，但完全没有用。他在拘留所里蹲了六个星期，沮丧地沉思默想着：变成了房屋的主人，原来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愉快的。

市镇当局甚至以提高捐税来对付我父亲。父亲的收益尽管一年比一年少，他每年缴的税却越来越多了。

直到十年之后，我才发现了阿兹泰洛斯在索莱瓦的演讲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阿兹泰洛斯被捕后几天，在波莱纳森林里，当着一个布达佩斯派来的代表团的面，成立了木业工会索莱瓦-波莱纳-哈斯法尔瓦分会。正是这个工会，领导了释放阿兹泰洛斯的斗争。

为了国家和自由

我的故乡贝雷克州，自认为有两件很光荣的事。这是两件跟这个州浸透鲜血的土地有密切关系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第一件，是匈牙利人对这块土地的征服。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马扎尔人在公元前八九六年通过维列克隘口进入匈牙利地面，在蒙卡契的路上停了下来，在那儿休息了四十天。维列克隘口和蒙卡契镇都在贝雷克州。马扎尔人走维列克小道的意义之所以被轻慢地缩小了，自然罗，是因为官方的书本上说，那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说；其实呢，这种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实际上并无其事，也是很光荣的。不管怎么说，匈牙利人的征服地，反正是小学生们的骄傲。贝雷克的学生们，一离开了学校，就不来对这件事费脑筋了；当然，这并非因为马扎尔人不是从维列克隘口来的，而是由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即便真是那样，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嘛。

同样，第二件事也不能说是贝雷克的光荣。

费伦茨·拉科治确实是贝雷克州人。

费伦茨·拉科治的母亲，英勇的伊洛娜·兹列妮，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抵挡哈布斯堡的德意志将军们发起的进攻，守住了拉科治祖先的要塞蒙卡契。拉科治确实曾经擎着他那面写着“为了国家和自由”这句铭文的旗帜，骑马驰过了维列克隘口。

正是在贝雷克的地面上，国王的亲戚费伦茨·拉科治和农

民泰马斯·艾舍握了手，正是在贝雷克的地面上，伟大的泰马斯·艾舍第一次用声闻数里的嗓门发出了号召：

“冲啊，乞丐们，饥饿的乞丐们，发臭的乞丐们，下贱的乞丐们；向他们冲啊，亲爱的弟兄们；狠狠地揍德国皇帝的走狗们。打他们！砍他们！摔他们！向他们冲啊，乞丐们，下贱的乞丐们——”

在领导匈牙利的贵族和老百姓，匈牙利的、罗斯的、斯拉夫的和罗马尼亚的农民跟皇帝的走狗们进行了一百次战斗之后七年，拉科治骑马经过维列克隘口，离开了匈牙利。而且，他几乎一贫如洗。伏尔泰①写文章讲到他，说他亡命土耳其时，“连坛坛罐罐也没有一个”。

贝雷克州人人都因拉科治而感到骄傲：匈牙利人，是因为这位著名的独立战士是匈牙利人；罗斯人，是因为他们是拉科治的第一批士兵；犹太人，是因为拉科治曾在一张黄的羊皮纸上，以一个红字母开头，然后用中国黑墨汁写过这样几句话：

我们没有权利把人们
按语言和宗教加以区分。
凡是热爱祖国和鄙视奴役的
都是我们的亲弟兄。

贝雷克人人都因拉科治而感到骄傲，甚至福洛普舅舅也是这样。可是，每当我为古代的马扎尔人的战斗荣誉而感到乐陶陶时，他却常常用一句话给我的热情泼上冷水：“要你自个儿做的事才值得骄傲。”如果我们谈天时谈到了拉科治，他也感到挺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文学家。

骄傲，他也是匈牙利人了。这一点，我是在我们有一次上维列克去参观那个有名的隘口时看出来的——那个隘口，一千年以来，都是征服军的进口，败退者的出口。

从前，这个隘口是骑兵穿越喀尔巴阡山的一条重要的小道，现在是大炮也可以通行了。在隘口的左右两边，更确切点说，在东面和西面，有两座陡峭的悬崖。高高的岩壁上，镶有几个很大的铜字，说明马扎尔人于一千年前由此进关。我去这个隘口时，还没有人为纪念拉科治而献上一块铜匾。连福洛普舅舅也为没有他的纪念物而感到很气愤，我们在维列克时，他一直不断地讲述拉科治的事。

福洛普舅舅知道许许多多关于这位公爵的事，他所谈的，都是我们在学校中从来没听到过的。譬如，他告诉我，哈布斯堡王朝因为桑邦的伯爵们跟费伦茨·拉科治斗争有功，就封了那么一大片匈牙利的土地给这些伯爵。在维列克，我还第一次听福洛普舅舅讲了费伦茨·拉科治的战无不胜的罗斯伐木工士兵的事。

当我回到贝雷萨斯时，我已成了有关拉科治的家庭专家了。我是家中唯一到过维列克隘口的人——此外，我还到过蒙卡契要塞，那也是跟福洛普舅舅去的。

我承认，看了拉科治祖先的要塞，是非常失望的。我想象中的那个有名的"鹰巢"是多么不同啊。在我的想象中，那个要塞准是屹立在一道不可攀登的峭壁之上，塔楼之间，白云缭绕。事实上呢，蒙卡契的这个历史性的要塞，却是造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土墩上，黄熠熠的棱堡，低得令人惊异。

福洛普舅舅在我的脸上看出了这种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看到的这个要塞，格查，"他说，"是并不怎么坚固。但是

守卫它的人却很坚强，因为他们是为自由而战的人。”

要塞的地窖里，有一口深得可怕的井。往井里扔一块石头，要数到三百六十八，石头才会坠入水里。我老是做梦梦见这口井，待到惊醒过来时，往往心口还在难受地怦怦跳。

我常常让孩子们围在我的身旁，反复地给他们讲述这口可怕的井的故事，讲那些用链子捆缚的叛变拉科治的人的鬼魂如何如何在这口井底里受着折磨。给关在这口井里的，我说，有桑邦伯爵的祖先，还有山陀尔·卡罗莱依伯爵等等许多匈牙利贵族，他们都依靠向维也纳的德国皇帝出卖匈牙利的自由，才由德意志帝国[①]授予了伯爵的称号和匈牙利的大庄园。

当我绘声绘色地讲到那些该死的鬼魂如何号啕、呜咽和呻吟时，我的两个妹妹会吓得浑身发抖。只有我从前的心上人特丽[②]·马科维茨——不知为什么，她用煤油洗过头发，一走近她就能嗅到一股很难闻的气味——不相信那些卖国贼的灵魂会在拉科治的井里受惩罚。

“是跟马戏团里那样的吧，”特丽争论道。“他们把一个人藏在井里，叫他知道有人走过来了，就呜呜地哭。我可以打赌，他一哭，就可以拿好多钱。”

我骄傲得象庞奇[③]一样，因为我到过这个要塞，我已跟拉科治建立了某种联系。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一天，我竟然还跟这位公爵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可这却是真的。这是在他们把拉科治运回来时的事。

费伦茨·拉科治、伊姆列·索科莱、伊洛纳·兹列克、米克

---

① 指第一帝国，即九六二至一八〇八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② 特丽为特丽兹的爱称。

③ 英国木偶剧«庞奇和米蒂»中一个驼背、钩鼻的滑稽角色。

洛斯·贝尔克西尼以及拉科治的其余的亡命伙伴的遗骸，全都给运回匈牙利来了。报纸一连报道了几个星期，说他们在运送……运送……运送……费伦茨·拉科治，有一天，父亲嘻笑颜开地回家来了。

“我们要上卡沙去了，格查，”他高声喊道，“到卡沙去参加公爵的葬礼。”

拉科治终于要回到他的故乡卡沙了。父亲已被选进贝雷克州派往卡沙去的五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父亲要我一起去。

“这样，好让你看看，儿子，匈牙利民族是怎样珍爱她的伟大人物的，这使你一辈子都可以说，‘我参加过拉科治的葬礼’。”

母亲立即忙碌开了，煮吃食，焙面包，供我们在长达七小时的旅途中食用。父亲携着我的手，领我来到沙拉蒙·米特尔曼服装店，给我买了一套藏青衣服。从米特尔曼服装店，我们又来到了克雷采西鞋店，给我买了一双黄靴子。买好靴子，我们又赶到了托勃百货店，父亲给自己和我都买了一顶新帽子。给我买的是一顶蒂罗尔①帽，上面插有一根很漂亮的红白绿②三色羽毛。

第二天早晨，我们提着一只装满了食物和一瓶五升装的葡萄酒的大皮包，上火车站去了。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站有这样壮观，即使农业大臣威风凛凛地莅临这个市镇时，也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穿着检阅服的警察，列队站在站台上。他们前面排列着杰诺斯·贝雷吉·基斯的吉普赛乐队。簇拥在警戒线外的，有一千多人，手里高高地举着旗子。这些旗子，虽然这一面写的是

---

① 蒂罗尔是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

② 红白绿是匈牙利国旗的颜色。

“艾姆列·乌拉依万岁”，而另一面却写了洛尼亚伯爵的名字，但都和和平平地并排挤在一起。

当马拉马罗斯开往卡沙的火车进入贝雷萨斯站时，人人都脱下帽子，唱起了国歌。穿着古老的匈牙利服装的绅士们，在火车的窗门上挥手；靠在三等车上的农民们，穿的都是二百年前拉科治伐木工士兵的衣服。

学法律的大学生弗伦克·托罗斯，校长山陀尔·托罗斯的儿子，身穿农民装，手擎长柄戟，爬上一只板条箱，开始朗诵了：

马扎尔人，不要相信德国佬，
即使他们许诺你上天堂。

鼓掌和欢呼！我们又唱起了国歌。接着，到点了，佐尔坦·基斯巴尔站长大声喊叫着：“请上车！请上车！”

火车开动了，杰诺斯·贝雷吉·基斯的乐队奏起了《拉科治进行曲》。

有的唱歌词，有的用手和脚打拍子。

车轮的咔嗒咔嗒声，狂热而激动人心的拉科治的战歌声，那种庄严的、战斗的状态，可真有力量甚至叫死人也一跃而起，去把德国皇帝那些可恨的外国雇佣兵抽筋剥皮，捣成齑粉哩。

在 卡 沙

我们到达卡沙时，我的情况是不怎么令人羡慕的。我瞌睡极了，因为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夜，我始终没有阖一分钟眼；火车从贝雷萨斯向卡沙开来，每到一站都要唱两次国歌，我不但诚心诚意地唱，而且拼命高声地唱，唱得嗓子都哑了。一路上又吃个不停，肚子也吃痛了。

之后，我们快到卡沙时，就看见了在山顶上燃烧的向拉科治致敬的大篝火；火车进站时，一支穿着拉科治时代的库普茨制服的仪仗队，已笔直地站在站台上——我感到自己不是在地上走路，而是在红白绿的三色云层里浮游。我感到幸福，感到一辈子从未有过的骄傲——而且，在这近四十年来，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感觉。

在卡沙，我们住在母亲的哥哥、从美国来的费迪南那里，他是一个舞蹈教师。家里的人管他叫"美国佬"，这有两层原因。一层原因是，这样免得把他跟母亲的堂兄、在特兰西瓦尼亚当兽医的那个独眼费迪南混淆起来；另一层原因是，费迪南舅舅不管看到、听到或感到什么，吃也罢，喝也罢，他总是说："在我们美国，就决不是这样。"

你知道，费迪南舅舅年轻时在北美洲住了四年。他常对陌生人说，"我在一家航运公司担任机要工作。"可家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在芝加哥铁路上当搬运工。他二十一岁时，砸开了外祖

母的保险箱后，就到美国去了。在娶了西蒂舅母，芝加哥的一个犹太菜馆老板的遗孀之后，他就回到了匈牙利。费迪南舅舅回来后几个星期，就办起了一本叫«世界文化»的杂志，在布达佩斯出版。«世界文化»出了两期——第二期就因为刊登色情的图画和文章而被没收了。这是费迪南舅舅第一次跟法院闹纠纷。

«世界文化» 垮台了，费迪南舅舅就开了一家旅行社。这使他第二次跟法院发生了纠纷。

他的第三个冒险事业是美国酒吧间，但是——讲起来可能太乏味了，我也没有办法——这个事业，也在刑事法庭上了结了。

费迪南服完第三次徒刑，就迁居到卡沙，当了舞蹈教师和礼节教员，在镇上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名人。

家族间，流传着许多跟费迪南有关的讽刺性轶事。我就讲讲其中的一件事吧。费迪南逃往美国已四年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的话，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时，在他出走四年后，快要回到匈牙利之前不久，外祖母却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信一开头说："亲爱的、敬爱的母亲，我患流行性感冒，已卧床三天，因此无法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你。"

费迪南舅舅是经常上贝雷萨斯我们家来的，因此我跟他挺熟悉。他是一个好人，虽然有点儿傲慢和浮夸。我喜欢他。比之他那个为纪念华盛顿而取名叫乔奇的儿子，我倒更欢喜他。我跟乔奇在索莱瓦同一个屋顶下一起过了七个月。艾尔莎舅母老是拿他给我当品德上的榜样。乔奇从来不爬白杨树啊，他很少撕破裤子啊，他从来不会上森林工人的棚屋里去啊……我对乔奇倒还没什么，但对西蒂舅母可简直受不了。她从来不吻任何人——她只拿自己的腮帮让别人吻。

长得又矮又壮，说起话来象吹雾角① ——这就是西蒂舅母。她抽黑雪茄烟，是把烟插在一支很长的木烟嘴里抽的。有人说，她要打她的丈夫——那倒是没有的事，这我知道，因为费迪南亲自对我讲过。

"我们是跟贝雷克代表团一起来的，"父亲容光焕发地作了通报。可是，眼看这话并没引起西蒂舅母的注意，他就加了一句，"代表团由欧文·桑邦-布汉姆伯爵率领——他是专门为这件事赶回家来的。"

我们一到达，立刻就坐下来吃晚饭了。我一口也没吃——我的肚子已经装不下了。父亲也没有吃，因为，他要是不把从贝雷萨斯到卡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或者如他所说的"经历过的"种种事情谈一谈，他准会闹病的。

"哼，"费迪南舅舅说，"要是你看见他们给我们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举办的葬礼那就好啦，老兄，那才棒呐。我们特迪的葬礼啊！②"

"西奥多·罗斯福还没有死哩，"我这个看报纸的说了一句。

"可等他死了，你看看他们会怎样葬他吧，"费迪南舅舅答道。

费迪南舅舅对我进行报复了：我在罗斯福总统这件事上赢了一分，他就说我的这身节日服装很难看。

"呃，老兄，一身藏青衣服，配上一顶绿帽子，一双黄靴子，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这倒还不是我们在这位美国舞蹈教师家里感到最生气的

---

① 浓雾信号。

②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特迪是西奥多的昵称。

事——因为吃晚饭时，西蒂舅母竟然端上了一瓶啤酒。

“请原谅，西蒂，”父亲说，脸色阴沉沉的，“我可不喝啤酒。从来不喝的。”

“可惜呀，”西蒂舅母答道。“我们葡萄酒是不上桌的。在美国，只有卡车司机和失业的泥水匠才喝葡萄酒。”

晚饭后，父亲上斯哈尔斯咖啡馆去了，贝雷克代表团都在那里集合。我早早就上了床，几乎倒头就睡着了。我梦见我乘着运拉科治上卡沙的火车。我记不得我做梦时我是死的还是活的，我好象一具尸体，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但我又能象一个健康的活人一样看和听。火车从一排巨大的篝火中驶过去，轨道两边，跪着无边无际的一片人——匈牙利人，罗斯人，犹太人。在跪着的人中，有许多是我们认识的——父亲的面孔，马鲁莎奶妈的面孔，福洛普舅舅的面孔，卡尔曼·阿兹泰洛斯的面孔。火车一摇一晃地把我送入梦乡，就象很早很早以前，马鲁莎奶妈常常摇着我睡去一样。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我一醒过来，反而格外感到不快乐了。

早晨的报纸上，都登了卡沙警察局长的布告。警察局长命令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出殡那天不准上街。

父亲安慰我说：

“出殡的队伍会顺着大街经过这儿。你在窗上什么都看得见——比在街上还看得清楚。”

费迪南舅舅也来安慰我。

“没关系，格查。他们怎样埋葬拉科治，你看报纸就行了嘛，以后你到贝雷萨斯，就可以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说你是跟在棺材后面走的。要是有人不相信你的话，叫他上卡沙来问我就是。再过上十年，你可以说，是你骑着马领导了这次游行。要是有人

不相信你的话，叫他来找我就是。”

我却在自己的想法中获得了安慰。

“我可以偷偷跑出去。要是警察拉住我，我就告诉他，我十七岁了，人长得比年纪小嘛。”

要不是我出了个蠢主意，想带乔奇一起走，免得这个可怜虫留在家里的话，我这个计划本来是很可能会成功的。

“你打算怎么样出去？”当我偷偷把我的计划告诉乔奇时，他问我。“门口有人站岗啊。”

“让他站在那里好了。出去还不容易吗！避雷针的钢丝索是在窗子旁边通过的。我们可以在早晨大家还在睡觉时就爬下去嘛。不骗你——从二层楼上溜下去方便得很。”

乔奇向西蒂舅母泄露了我的计划。舅母下了命令，出殡这天，只有女佣人在那个临大街的房间——避雷针的钢丝索在窗子边通过的那一间——里的时候，我才能进那房间去。由于女佣人一直很忙，结果只准我朝大街上看了三十分钟——要是不把还值得一看的身穿检阅制服的警察算在内的话，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出殡这一天，我大半天都心烦意乱地待在面向院子的一个后间里，这个房间的窗上只望得见一幢很大的黄房子——警察的营房。

这样，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只好细看着那幢房子了，正是在这幢房子里，十二年后，我作为一个非自愿的居住者，一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我不是从费迪南舅舅的窗门上烦恼地凝视这个警察营房，而是从营房的一扇铁格窗上羡慕地望着我亲戚住的这幢房子。后来，我从单身牢房里偷偷送出一封信来，要求我的表兄乔奇·西维拉律师作为我的辩护人，到警察局来一下。我叫他来看我，我要讲述事实真相，是那样的事实真

相……

我的表兄乔奇·西维拉博士，把我这封通过非法途径寄给他的信，交给了警察营房的长官。

回家——在家里

父亲、泰马斯·艾舍和我，在这全国有名的葬礼过后，就回家了。代表团还要在卡沙逗留几天，有的人在葬礼后举行的酒宴上喝醉了，想好好睡一觉，醒醒酒，有的人却还要喝酒。父亲和艾舍回家去，倒不是他们反对喝酒，说得更恰当点，是他俩都在卡沙伤透了心。不是受了卡沙人的侮辱，而是受了一个贝雷克的本地人的侮辱。父亲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可他始终不能完全忘却他在卡沙所受的打击。如果说，泰马斯·艾舍好对人家发脾气，那么，他一辈子就是遏制脾气。

父亲到车站酒店里买了四公斤半火腿，把他那个小颈大酒瓶重新灌满了葡萄酒。

"打五升葡萄酒，"他对酒店掌柜的说。"要是你给我纯酒的话，我可以付你六升的钱。"

酒店掌柜思忖了一下，跟他商量道："付六升半的钱吧——那样，我们就双方都满意啦。"

火车开动了，我们向火腿和艾舍叔叔买的两公斤绿洋葱发起了进攻。我们一言不发地吃了一个半小时。

我不知道干吗我们要比贝雷克代表团先回家。我们在费迪南舅舅家里时，父亲完全没有提起他遭受的侮辱。他不好意思讲。但是现在他吃饱了，缄默得够久了，加上用足足两升葡萄酒冲下了火腿，他就大发牢骚啦。

"唉，唉！"

艾舍点头表示同意。

父亲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摸啊摸的，摸出两支很粗的雪茄烟来。递了一支给艾舍，给自己燃上了另一支。艾舍用手掌搓碎雪茄烟，把一小半烟草塞进他的樱桃木柄的陶制烟斗，把剩下的烟草装进了他那有饰缘的烟叶袋，供以后再用。父亲坐在那儿，喷吐着一个个大烟圈。

"当他们需要犹太人，要犹太人的钱，要犹太人的智慧，要犹太人的选票时，"他评论道，"犹太人就是匈牙利人。犹太人说：'我要跟你有福同享，有苦同尝'，这时他们就对你说：'滚开，你这犹太人！'"

艾舍作为回答，不顾什么规矩不规矩，狠狠地往火车座厢的地板上唾了一口。

要搞清楚父亲在卡沙碰到了什么事，是很困难的。你不得不把他说的话，象装拼板玩具那样，一句一句拼凑起来，只有在把那些拼板恰当地拼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我揣摩了好久，思考着种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实际上，这事挺简单。

贝雷克州派了一个五十二人的代表团上卡沙；但是国家组织委员会只给了五十张参加这一官办的宗教仪式的入场券。贝雷克代表团的头头们——欧文·桑邦-布汉姆伯爵、古拉克西州长、华萨赫莱警察厅长——商量了半个钟头后，一致同意，父亲是不发给入场券的贝雷克的一个代表。至于还有一个人呢——他们又商量了半个钟头，还是决定不下来。泰马斯·艾舍毫不犹豫地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果这位地地道道的独立党的匈牙利人，约瑟夫·巴林

特——即使他的仇人也抓不到把柄来诽谤他——如果你们这些先生认为约瑟夫·巴林特都还不够格，那我也是不够格的。”他一听到那番侮辱我父亲的话就宣告道。

为了安抚这个反叛的塔巴村的村长，华萨赫莱特意提到了大泰马斯·艾舍。

“大泰马斯·艾舍会怎么说——”

“你说对啦！我正这样在想，”小泰马斯·艾舍打断了他的话，“他会说什么呐？要是他知道他的孙子在跟桑邦伯爵一起埋葬拉科治，他会在坟墓里翻身打滚哩。”

大泰马斯·艾舍的孙子，虽然只拥有十五英亩土地，却是贝雷克代表团的帽子上的羽饰。古拉克西州长为了抚慰他，就拿出了那两张下落不明的入场券，亲自把一张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要不是这个大艾舍的孙子的话，父亲是准备容忍这一侮辱的了。

“约斯卡①，”塔巴村的村长警告父亲说，“如果你去参加仪式，我就宰了你。我甚至会啐你唾沫。”

这样，我们三个就回家了。

父亲大发了一顿牢骚。艾舍保持着沉默，乘了四个小时车后，他开腔了。

“政治不是诚实的人搞的，”他说。

“我看乌拉依会拍桌子哩，”他沉思了一会儿，补充了一句。

“乌拉依不会跟州长争吵的，”父亲答道。

“为什么不会？”艾舍不同意这话，蓦地满脸通红。“我们独立党的代表干吗不能教训教训这个政府党的马屁精？”

“因为精明的缘故嘛，泰马斯。乌拉依是精明的，他不会去

① 约瑟夫的爱称。

惹古拉克西的。"

"精明？我才他妈的不要这样的精明哩……你说精明，约斯卡？这算哪门子精明？不管怎么说，古拉克西一向就支持政府候选人。"

"那是真的，泰马斯，一点不错。古拉克西一向支持政府候选人——但只用合法的方式支持。要是在选举前夕，几个我们的人给抓走了，这对乌拉依并没有多大妨碍。但要是乌拉依跟古拉克西闹翻了，那他就会给他颜色看啦。他会象乌戈克沙的州长那样，选举日在市里布下一道警戒线，不让独立党的投票人到投票处去。你要这样吗，泰马斯？"

艾舍没有回答。他只是象一头野牛似的喷着鼻子。

火车进了沙托拉贾海莱站，父亲又给他的酒瓶重新装满了酒，还买了几张布达佩斯报纸。

报纸热情洋溢地报道了这个国家给予匈牙利光荣的儿子费伦茨·拉科治的欢迎，人们如何埋葬了他。我热情地念了起来。

> 拉科治迄今没有在土耳其安歇，今后他也不会在卡沙安歇。他迄今活在、而且将永远活在匈牙利人民的心里。不是死了，而是活着进行战斗！

"喏，不是吗，泰马斯，"父亲在我念了这条新闻后，用和解的口气说。

我发现报上还有别的重要新闻。

威廉皇帝延期访匈

据柏林报纸讯，原定德皇赴匈访问，已经无限期延期。半官方宣称，此行延期是因皇帝身体略有不适。《十字架时报》则明白暗示，威

廉皇帝乃为拉科治葬礼过分张扬而对匈牙利政界深感不满。

“啊，这个该死的德国坏种，”当我把这条新闻念给父亲听时，他大声吼了起来。“拉科治使这条狗不痛快啦？他们杀害了他，现在我们埋葬他，他们又妒忌啦？去他妈的臭德国佬！”

报纸附有自己的评论：

> 几年来，德皇均计划访问布达佩斯，但此行却一再延期。布达佩斯可能已永无机会充当接待威廉皇帝的主人。

“爸爸，”我看了这段评论后，问道，“既然威廉皇帝从来就没有到过布达佩斯，那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吻维尔玛·班菲的手的呢？”

父亲一言不发；艾舍也不吭声。

当贝雷萨斯的森林映入眼帘时，那位塔巴村村长打破了沉默。

“我说，约斯卡，政治不是诚实的人搞的。现在我告诉你吧，我是到此为止了，这种政治不是我们搞的。”

“艾姆列·乌拉依是独立党的一个真正的支持者，”父亲回答道，他主要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凭议员选举来看待政治的。

“艾姆列·乌拉依也是那些绅士当中的一个，”艾舍反驳道。

“泰马斯，泰马斯，”父亲抓着艾舍的手回答道。“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别忘了，泰马斯，永远别忘了，一个真正的人可要忠于他发誓要高举的旗帜啊，即使他们拿旗竿击他的头也罢。”

我们一回到家里，父亲就从墙上除掉了德皇的大画像。他把它取下来，撕了个粉碎，把碎片扔进了厕所。

第二天，他买了一张拉科治的画像，挂在挂过威廉皇帝画像的墙上。

“爸爸，”我对他说，“把费伦茨·拉科治的画像挂在挂过德国皇帝的地方，不大妥当吧。”

父亲对这事琢磨了一番。

“我不是把费伦茨·拉科治的画像挂在威廉皇帝的地方；我是把它挂在加里波第的旁边，”他加重语气说。“它本来就该挂在这里的。”

葡萄收获期

没在贝雷萨斯住过的人，恐怕就不会知道收获葡萄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种可怜的人也许都不知道葡萄是什么玩艺儿哩。

当地的《贝雷克报》，年年都在社论中写上一句："葡萄收获期是富饶的节日。"那是真的！不过葡萄收获期远非就此而已。

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在讲到葡萄收获期时，常常说："活儿干完了，终于看到了一些钱。"那也是真的。葡萄收获期对许多人来说，是意味着金钱——只是他们并非辛辛苦苦干活的人罢了。

用费克斯凯叔叔的话来说，葡萄收获期是节日里面最好的节日，在葡萄收获时节，分不出贫和富，分不出聪明和愚昧。在葡萄收获时节，人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就某种意义来说，费克斯凯这话也是对的。虽说如此，葡萄收获期可远非就此而已。

葡萄收获期就是放假三天——小学生们都会这样说。那也是对的。在贝雷萨斯，葡萄收获期意味着给孩子们放三天假。不过，如果这是它的全部意义，那就……

在贝雷萨斯，葡萄收获期一连共有三天时间。学校在十月一号、二号和三号，都关上了门；市里和州里的机关也都不办公——即使是非正式的，实际上是不办公了。甚至于法庭，这几天也不开庭。镇上空空如也——所有的人都到外面山上去了。

葡萄园工人，主要是姑娘们和妇女们，用大剪刀剪下葡萄枝，把一串串葡萄扔进桶子里。

“唱呀，你们大家，”吝啬的主人老是吩咐大家唱歌。这是很必要的——一唱歌就不能吃了嘛！剪葡萄的姑娘们和妇女们，有一半人会服从命令，开始唱歌了。另外一半人就吃了起来。然后，他们就轮换着唱和吃。

姑娘们和妇女们剪下葡萄，往木桶子里堆。男人们把装得满满的桶子摇摇晃晃地搁上肩膀，运到那些大肚子的大木桶里去。要许多桶装得满满的葡萄，才能装上整整一大桶。

吝啬的主人，会在装满的大桶顶上撒些沙子和灰，省得人家去吃葡萄。葡萄园工人都暗暗发笑：有酒喝，谁还要吃葡萄？

葡萄给分类倒进了葡萄绞汁机——一台机器里倒绿的和黄绿色的葡萄，另一台倒粉红色的和紫色的。汁水从机器上慢慢流出来了。

新葡萄酒的芳香使人联想起蜂蜜的香味。很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引来了许多蜜蜂和大黄蜂。但是，新葡萄酒的芳香不仅使人联想起蜂蜜，它还使人想到熟透的梨子和凋谢的月季花。

葡萄绞汁机要是不能使用了，葡萄酒就得用脚踩出来了。两个赤脚的青年，把裤脚管卷在膝盖上，跳进装得满满的大桶子，就在葡萄上跳起舞来。他们一边跳，一边唱：

老弟，葡萄酒是好的，
是好葡萄酒吧，呃，老弟？
老弟，葡萄酒是好的，
是好葡萄酒吧，呃，老弟？
老弟，葡萄酒是好的！

当跳舞的人渐渐唱得嗓门都哑了时，就在大木桶的肚子上敲进一根管子，于是，色如蜂蜜的葡萄汁，或者说新葡萄酒，就从那个口子里流出来了。葡萄汁是禁止喝的，谁要是喝了，马上就会肚子痛。葡萄绞汁机绞出来的葡萄汁，吃了肚子也会痛，不过不是马上就痛，而是在葡萄收获期后的第二、三天才痛。那就没什么关系了。到第三天，反正人人都已喝得醉醺醺的，不可能再来喝葡萄汁了。那时，喝酒的人，都喝李子白兰地了，那是既解宿醉，又治新葡萄酒引起的肚痛的良药。

晚上，山坡上一个个葡萄园里都燃起了大堆的篝火。这时候，贝雷萨斯山上闪烁的星星，比天上的星星要多得多，也远比它们美丽。采葡萄的人——葡萄园主，收葡萄的，驾马车的，踩葡萄的——会围成一圈坐在篝火边。他们的右手握着长长的炙叉——做这玩艺儿最好是用樱桃木，但是榛子枝条也不赖——他们的左手拿着一大片面包。炙叉上叉着肉和洋葱——一片肉，一片洋葱，又一片肉，又一片洋葱，就这样。然后，炙叉要放在火焰烧不到烤肉、而只灼着通红的木炭的地方，在火上面转动着。接在烤肉下的面包片，接住了滴下来的油脂。要是面包变得油滋滋了，拿面包的人就会在降雪时赢得一个美丽的心上人。要是滴下来的油脂搞得火焰噼噼啪啪烧起来，拿面包的人的情人就会对他或她——看拿面包的人是谁而定——变心。

转黄的葡萄树叶的酸味，葡萄汁的香气，冒烟的葡萄树枝的辛辣味，烤洋葱和烧着肥肉的臭气，搞得空气很刺鼻。肉烤好后，空气中又增添了一股盐和辣椒的混合气味。

吉普赛乐队在一堆堆篝火边兜圈子。

“允许我祝贺你获得好收成吗？”乐队指挥杰诺斯·贝雷吉·基斯问道，他的胳膊下夹着一把小提琴。

“我们都是匈牙利人嘛，”葡萄园主答道；给了这个乐队指挥一满杯葡萄汁。

乐队指挥接过杯子，高高举在头上，闭上了眼睛，在喝之前，先在地上泼了一大口，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这是在祭古代的一位已被废黜的非基督教的上帝。乐队指挥喝下了葡萄汁，就会从他的外衣的暗袋里，取出一块漂亮的绸手帕来擦擦嘴巴。

“愿上帝保佑你明年获得更好的收成，”他挺认真地说。

于是，那个杯子一次次重新装满，手手相传地递给乐队的成员们，吉普赛管弦乐队的小伙子们的红嘴唇就轮流重复他们指挥的祝愿：

“愿上帝保佑你明年获得更好的收成。”

“奏吧，吉普赛，奏吧！”

于是，跳舞开始了。

至今不晓得葡萄收获期是美好的节日的人，由于没有一点儿概念，肯定不会知道葡萄是什么玩艺儿。在世界上，有的是这样的人。我本人就曾经跟这样的人谈过话，他们认为给予人以温暖和欢乐的，是面包、肉、蛋、蔬菜、牛奶和黄油，而财富则来自煤、铁、石油、木材和工厂的生产机器。这些人的童年如果是在贝雷萨斯度过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胡扯淡了；他们就会知道，财产是从葡萄和葡萄酒而来的。他们还会知道，任何一个可尊敬的人，都是靠葡萄酒断奶，喝葡萄酒长大的。一个靠新葡萄酒培育起来的人，在一生的兴衰浮沉中，甚至在他弥留之际，都在葡萄酒中寻得了安慰。真正的贝雷萨斯的居民，全都坚信这个真理。

有一次，天主教堂的敲钟人德米特尔·西贾托老头被一

匹名叫索勒姆的雄马踢了一脚，人们把半死的西贾托抬回了家。他的老婆要去请牧师，但西贾托老头坚决不同意。

“牧师没有用的，”他呻吟着说。

“啊，那你要什么呀，亲爱的丈夫？”西贾托太太哭着恳求道。

“两升麝香红葡萄酒——不多，也不少。这才更能拯救——”

说着这句不敬神的话，西贾托老头与生活诀别了。他始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喝了两升麝香葡萄酒，喝得瓶子里涓滴不剩。

“这老头死得才美呐，”贝雷萨斯的人说。“西贾托老头敲了这么长时期的钟，不是白敲的。上帝用这样的好方法把他引进了天堂。”

西贾托老头会死得如此美，那是因为他从婴孩时代起，就知道、珍重、热爱葡萄以及葡萄之魂——葡萄酒的缘故。

葡萄要象孩子一样加以爱护和培养。春天，为它们修整，为它们缚扎，给它们锄草，给它们喷杀虫剂。接着，当潘克拉斯、波尼法西和塞瓦梯斯①的诞辰来到时，在五月十一、十二、十三这三个寒冷的日子里——用牛车把肥料运到山坡上去，好让大粪的熏烟来防止葡萄受冻。

每年，在波尼法西日的隔天早晨，马科维茨天一亮就会把我们喊起床：“天罚临头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葡萄都冻伤啦。”

待到象焚香驱除魔鬼一样，熏烧的肥料祓除了妖精，葡萄还要防止贪婪的鸟和红狐狸。用稻草人吓鸟，用枪和陷阱对付狐狸。

---

① 这三人是传说中的圣徒。

那是在葡萄叶子变成翠绿的时候。当翠绿的叶子转成暗绿色，叶脉变成紫红色时——你就指日可待了。葡萄叶的有些尖尖上，后来出现了黄褐色的斑点——于是，成熟的葡萄从叶子中探着头，在笑吟吟地答谢你了。葡萄笑得多美呀！

美国的费迪南

九月中旬，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美国的费迪南舅舅带着两只大皮包到贝雷萨斯来了。但他囊无分文。他买烟也向父亲要钱。

那时，我是一个热心的邮票收藏者，他送了我一枚邮票。是一枚埃及邮票。不难看出来，我对这项礼物是不满足的，虽然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道了谢。

"你知道这是什么邮票吗？"费迪南舅舅问。

"埃及的。"

"埃及的！这连傻瓜也晓得嘛！不过是一枚怎么样的埃及邮票呢？什么样的？"

我耸耸肩膀。

"当摩西领着犹太人出埃及时，"费迪南舅舅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说，"上帝从天上送来了神食①，这样流浪在荒野中的犹太人才有东西吃。这你上神学课时就学过了。但是大多数宗教教师却忘了，上帝不仅从天上送来了神食；他还送来了邮票，这样，要是流浪者的家里或者业务上有急事的话，可以写写信……"

---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所谓神食，即吗哪，"样子象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是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来到以琳和西奈中间的汎的旷野时，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食物。

我没让舅舅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住在福洛普舅舅家里时，福洛普舅舅常常忘了他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费迪南舅舅，你可忘了，我已不是一个小孩子啦。”

费迪南舅舅拥抱和吻了我。

“可惜，你姓巴林特，格查。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维拉！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维拉，恶运把你扔进了这个不幸的、落后的小国家，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赏识真正的人材。如果你是生在我们的国家，生在美国的话，那就好啦！你知道，格查，等你离开学校后，就上美国去。我会给那边的几个朋友写信，他们会把你引进美国最上层的社交界，只要你到了那里——”

费迪南舅舅把他长期离开他的家的原因，只告诉我母亲一个人。母亲告诉了父亲，但讲定了父亲不得泄露秘密。可怜的父亲才遵守他的诺言呐！他在吃中饭和晚饭时，大讲特讲西蒂舅母的可爱，她的美国文化，西蒂和费迪南舅舅的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以致我和我的两个妹妹都了解了真情实况：西蒂舅母已把费迪南舅舅撵出了家门。

费迪南舅舅说，他将留在我们这里过葡萄收获期。可是，他却并不是在葡萄收获期里的最讨人欢喜的客人。

九月二十日，当我们大家正坐着吃早饭时，邮差送来了一封给父亲的挂号信。父亲拆开信封，对来信上下一看，只读了几行，就面无人色，发出一声喊叫。信从他手上落掉了……

母亲在父亲死灰色的脸上洒了水。

“马鲁莎！马鲁莎！把白兰地瓶拿来，快！”

费迪南舅舅比马鲁莎机灵——他拿来了白兰地瓶。他没有去找杯子，拿着瓶子就往父亲的嘴上凑。父亲闭着眼睛，使劲地

大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这一来，他显然感到好一点了。

不过他还在咻咻喘气。

“我决不！看我说的，”他愤怒地喊道。“我们落得这个样了？要是有这样的事，地上就没有公道，天上就没有上帝了。”

“约瑟啊！”母亲说，她竭力安慰他，把手按着他冒汗的太阳穴。

是我先想到了看看那封带来噩耗的信。我把它从桌子下面捡了起来。

这是一封很特别的信。在精致的信笺顶上，印着一行淡蓝的字：“匈牙利反酒协会”。底下有一行红字：“酒是毒！它杀人，麻醉人，使人穷困！”

下面是打字的正文。

亲爱的巴林特先生：

据悉，台端为贝雷萨斯及其附近一带反酒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如蒙惠寄一份有关当地运动情况及前景之报告，则不胜感谢。并望告知，台端是否认为条件已臻成熟，我等已可成立贝雷萨斯反酒分会。若有必要，敝会当派一干事专程前去贝雷萨斯参加成立大会。

致以反酒敬礼

总干事　戴索·亚尔多

巴洛克参事是我们的近邻，在办公时间也会顺便来看望我们。他看了这封信，喝了一大杯白兰地，燃上烟斗，发表意见了。

“不可能就此算了。一定要把这案子交给刑事法庭——今天，约斯卡，今天就交去，要是你看重你的名誉的话！”

父亲也尝了尝白兰地，说他不允许任何人，即使他的好朋友也罢，来怀疑他的名誉。他立刻就要去找州里最好的律师，不管花多少钱，即使卖掉房子也在所不惜；但是当涉及到名誉的时候……

“平平气，妹夫，”费迪南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高声喊道，“平平气。你不用去找律师。你需要的是我，美国的费迪南！这样的事情，你得象我们在美国那样处理。这是说，要象个男子汉！你知道什么叫私刑吗？不知道？私刑意味着在美国没有流氓立足之地。流氓没有权利败坏一个正派人的生活。我希望这方面贝雷萨斯不要落后于美国。”

父亲也罢，巴洛克也罢，对于美国的费迪南所作的这番关于私刑的解释——既混乱又奇特——都不甚了解；但他们完全同意费迪南说的，贝雷萨斯不能落后于美国。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把这信给我，妹夫。”

费迪南、父亲和巴洛克低声谈了好久。巴洛克叔叔不时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他的肚子直打颤，连整个房子也震动了，打断了轻声的谈话。

父亲优柔寡断，茫然瞪着眼睛。近来，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有时候他的脸有点儿浮肿，他的眼睛看上去是混浊的。

巴洛克和费迪南联合一致说服了父亲搞私刑法庭。幸好，这时马科维茨也进屋来了。

醋坊老板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也支持费迪南的论点。父亲屈服了，同意了。

“私刑！私刑！”巴洛克叔叔笑着喊叫道。

于是，九月三十日父亲就收到了一份布达佩斯发来的电报。

电文是："十月三日下午三时到。亚尔多。"

费迪南舅舅拟订了一个很详尽的接待亚尔多的计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但也始终仅仅是一个计划而已。这不能怪美国来的费迪南，而都怪父亲。

父亲在采收葡萄的第二天早晨，肚子痛了。如所周知，在贝雷萨斯，治这种病的良药是李子白兰地。喝了两瓶这种药，父亲的身子有点摇摇晃晃了。幸好，还有一种治摇晃的灵丹妙药——浓的黑咖啡。十杯黑咖啡治好了父亲摇晃的步伐，但引起了剧烈的恶心。一个上午，父亲都不断呕吐和咒骂。到中午时，他已疲乏不堪，再也不可能上车站去迎接亚尔多了。美国的费迪南就抓住了巴洛克参事。费了好大劲，他总算同意照办了；但费迪南舅舅不住地连说带劝，直说得这位参事答应上火车站去。事实上，他甚至还同意，这一次把他那个当手杖使用的五升装的细颈大酒瓶留在家里。

费迪南向巴洛克明白地说，为了贝雷萨斯全市的财政和士气打算，就必须"击败"亚尔多和反酒主义，这样一讲，终于逼得巴洛克让步了。

"在老家美国，这样的人会受绞刑。"

亚尔多来到了。他的全部行李是一只很小的提包和一个好大的公文包。

这个反酒将军年约三十五岁，是一个宽肩膀、脸修得光光的高个子，身穿一套式样平常的服装。他的胳膊长得出奇，一双柠檬黄的靴子尺寸好大。他的大鼻子上架了一副金边眼镜。

他一开口就问到了父亲。

"我妹夫病了，"费迪南告诉他。"他前几天喝了好多水，而贝雷萨斯的水可是一种靠不住的饮料。一个人身体单薄的话，

喝了就会醉倒。”

亚尔多惊讶地望望费迪南舅舅，又怀疑地瞧瞧巴洛克。这位参事在出门上火车站接客人之前，为了掩盖嘴里的酒气，曾特地嚼了一些咖啡豆，可是咖啡和葡萄酒一搏斗，后者却占了上风。巴洛克的呼吸、衣服、皮肤都冒着一股酒气。

“我们走去吧。我妹夫家离这里只十分钟的路程。”

这十分钟的步行，对亚尔多确实大有教益。街上人不多。他们简直不是在走——一个个都东摇西晃的。不过，他们并没有醉得忘了适当地给参事巴洛克打招呼。

“葡萄收获期好！”

“收成好！”

布达佩斯来的客人没有对市镇看一下——他闻到了。他的两个大鼻孔一抖一抖，象捕狐的大猎狗发现了猎物的足迹似的。

巴洛克一路上向他介绍当地情况。

“在这儿，在我们镇上，讲讲反对喝啤酒是最适宜的了。因为没有一个匈牙利人喝啤酒——那是下流的德国佬的发明物。匈牙利人可受不了。人们一想到那种尿水就会发疯，那玩艺儿比起匈牙利葡萄酒来，甚至不值得呕吐。谁要有办法叫政府封闭了啤酒厂，对喝啤酒的人科以罚金的话，我们就选他——全体一致地选举他当国会议员。不过，这事也难办；政府是为维也纳效劳，不是为匈牙利人——”

亚尔多没有回答，只是咬着他的下嘴唇。

父亲一边打着响嗝，一边热情地迎接客人。

按照费迪南的计划，已给亚尔多准备好了中饭。

“我们都吃过了，”巴洛克说。

不过他还是坐下来了，因为他好奇心十足，想看看这位布达

佩斯客人，是不是真的会吃我们为他摆出来的“喂狗”的食物——一大壶酸牛奶。一个勇敢的人的勇敢行为，是勇敢的敌手也都尊敬的。巴洛克怀着近乎尊敬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亚尔多，看他抓起了第二壶酸牛奶。

下午六点钟，亚尔多就和他们三个人一起乘着巴洛克的双轮轻便小马车上山，如费迪南舅舅所说的，“献身于这件天底下最神圣的事情去了”。

当他们乘着双轮马车一路驶去时，迎面走来了一队装着重甸甸的桶子的牛车。驾车人的帽子装饰着成串的葡萄叶，嘴里大呼大喝，驱赶着那些披了一身葡萄蔓的公牛。

山坡上已燃起最早的一批篝火。在明亮的火光中，附近那些已摘掉果实的葡萄枝，呈现出一种红艳艳的光泽，仿佛想到失去了它们一直小心守卫的果实而正脸红耳赤似的。吊在篝火上的几口大铜锅，正在煮烧收采葡萄的最后一顿晚餐——血红的胡椒洋山芋烧牛肉。

葡萄枝已光秃秃的了，采葡萄的人也都疲倦了。

可是，费迪南和巴洛克还是召拢了四百来个人，让他们到酒店前面的空地上来听这个“布达佩斯的怪鱼”的演讲。

亚尔多一言不发地看着这番准备工作，不过他并不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他很快地一连吃掉三大份洋山芋烧牛肉，用啤酒杯装的两杯牛奶，把这些用胡椒调制的食物灌了下去。他象采收葡萄的人那样，在他那顶一向不插花束的黑礼帽上插了一大束葡萄叶。

这时，父亲感到对不起亚尔多了，只想暗示他赶快及时退场。他打算向他说明情况，道歉，偿付旅费。但是费迪南不答应。他几乎不得不把父亲从“这个布达佩斯的倒霉家伙”身边拉

了开去。

等到听众集合以后，亚尔多用手帕擦擦他的金边眼镜，就站到一只六十加仑①的木桶顶上去了。

"种植葡萄的人们。"

他停住了，又小心地擦擦眼镜，然后用洪亮的声音重新开始了。

"有句老话说：'来到罗马，就象罗马人一样办事'——而我们可以说，来到了贝雷萨斯，就要象贝雷萨斯人一样过活！聪明人是学聪明的谚语的。因此，当他来到了贝雷萨斯时，他就用这样一句话向贝雷萨斯人问候：'葡萄收获期好。'"

引来了赞赏的掌声和喊声。

父亲和巴洛克不安地互相望了一眼。

"良好的祝愿不是一件坏事，"亚尔多继续说，"但就祝愿本身来说，它们最多只抵得上一只空桶子。德国人在这桶子里倒进啤酒；匈牙利人倒进挺好的贝雷萨斯葡萄酒。我是一个匈牙利人，因此我在这个良好祝愿的桶子里倒进这样一个忠告：贝雷萨斯的葡萄培植者！保护你们赖以过活的葡萄吧，要象珍爱你的眼珠一样珍爱它！你们，贝雷萨斯的葡萄种植者，正在听我讲话的人，可能心里在想，这个从布达佩斯来的家伙，说话倒挺直率，但是他的忠告可来得晚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象母亲对孩子一样地珍爱这上帝赐给的葡萄的嘛。你们是在这样想吧，贝雷萨斯的朋友们？"

"是呵，是呵，"四面八方应声答道。

"我知道，你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贝雷萨斯的葡萄种植者们，

① 英国加仑，一加仑合四·五四六公升。

可现在你们会知道，你们可错啦。即使最慈爱的母亲，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知道该如何保护和保证她心爱的孩子免除痛苦和疾病的。你们也同样不知道。母亲会去向医生征求意见。你们可以向我征求意见。你们是不是要听听意见呢？我很乐意给你们提个意见。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珍爱葡萄，贝雷萨斯人——珍爱它；还要保证它。保证它不遭寒冻、雹雪、洪水和葡萄虫灾——以一个安全的、有偿付能力的公司来保障它。譬如说，让那个吉纳拉利公司来保障吧，它已投入资本——”

原来，亚尔多从事反酒工作只是一项副业。这位反酒协会的总干事，主要职业是保险代理商。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很好的歌唱家，一个优美的舞蹈家，他跟那些葡萄收获者碰杯时，会象喝香槟酒那样把杯子潇洒地一挥，而仿佛喝的并不是羊奶。半夜里，在他跟我母亲跳过舞后，他已象剧团导演克雷茨特莱·斯曾佩特利一样大受欢迎。不过，斯曾佩特利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他打赌能一口气喝上十升酒，然后再一只脚站着唱国歌。亚尔多却是喝羊奶，可他吸引来的崇拜者至少也有象斯曾佩特利那样多。

亚尔多是很善于利用人们对他的好感的。他获得了丰收，给几十个葡萄园主保了霜冻、雹子、葡萄虫灾和火灾险。亚尔多坐在靠篝火边的桶子上，在费迪南舅舅对这位反酒主义者的帮助下，并在跟他用英语交谈中，开了保险单。

马科维茨也给他的葡萄园保了雹险，给房子和马厩保了火险。父亲把各种各样的险都保了。

亚尔多在贝雷萨斯待了三天。他在费迪南舅舅陪同下，访问了每一个签订了临时保险单的人，在每一家都喝了一杯奶，开了正式保险单，收了保险费。他回去时，有几百个人送他到火车

站。他在车窗上探出身来，向可敬而好客的贝雷萨斯人再一次保证，明年葡萄收获时一定来这个市镇。

亚尔多走后的下一天，费迪南舅舅也整理提包了。现在，他可以乱花钱啦。他给我买了一个挺漂亮的集邮本。

“你的舅子是个机灵人，”费迪南走后，马科维茨对父亲说。“他有一颗令人钦佩的脑袋。”

父亲茫然不解地望望他，马科维茨哈哈大笑了。

“唉，你现在还不明白吗，美国的费迪南是把我们，而不是把亚尔多当傻瓜似的耍弄了一番。显然，他跟这个反酒主义者是合伙干的。你的舅子在美国可学了点名堂呐。象他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杜诺夫斯基服征世界

有一天，贝雷克储蓄银行行长和犹太公会的主席、受全市的人爱戴的贝泰兰·卡采曼死掉了。这位长连鬓胡子、经常穿匈牙利服装、用农民的陶制烟斗抽土烟的银行行长，是以一种非常美妙的方式死去的。

贝雷萨斯的银钱大王跟巴洛克参事打五十福林的赌，赌他吃菜包子能比巴洛克吃得多。在我们这个市镇上，我们管这种赌博叫"南美洲决斗"。

这场卡采曼-巴洛克赛，由决斗者的副手订下了竞赛办法。根据决斗的条款，竞赛的地点在狮子旅馆的餐厅；每个竞赛者轮流吃三个菜包子，直吃到其中一个认输为止。吃了一个菜包子，可以吃一口面包和一杯葡萄酒。要是一个决斗者感到没劲了，可以拿一瓶苏打水给他洒一下脸。父亲是巴洛克的副手，马科维茨是卡采曼的副手。

这种南美洲决斗，在贝雷萨斯并不是新鲜玩艺儿。要不是这场决斗最后竟变成了一件非常有名、事实上成了历史性事件的话，当地的报纸是决不会提起卡采曼-巴洛克比赛的，充其量也只会用三四行文字报道一下谁赌赢了。

卡采曼的情况不妙。吃下第十八个菜包子后，他不得不解开了衣衫领扣。吃了第二十一个后，他脱掉了鞋子。吃了第二十四个后，他要马科维茨给他脸上喷苏打水了。醋坊老板马上

履行了副手的职责。卡采曼由于苏打水，显然又接上了气。他成功地吞下了第二十九个菜包子，但是当他吃了第三十个，伸手去拿酒杯时——他从椅子上滑下去了。马科维茨忠于他的职守，给躺在桌子底下的银行行长和犹太公会主席的脸上洒了一瓶苏打水。

由于这位银钱大王没有重新爬起来，醋坊老板只好把胜利让给了巴洛克参事，宣布他是五十福林的赢家。

父亲、巴洛克和马科维茨因为胜利而感到挺得意，又在狮子旅馆里兴高采烈地待了一两个小时，要不是那个参事跟餐厅掌柜吵了起来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在那儿坐到天亮的。巴洛克一点儿也没有压低嗓门，责备狮子旅馆的老板在酒里面掺了水。老板为了证明受了冤屈，摆出了一副要打巴洛克的样子。巴洛克立即狠狠地揍了那个恫吓的餐厅掌柜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这一来，这一伙人就站起来准备走了，要动身去皇家酒馆时，马科维茨弯下身去唤醒那位还安安静静缩在桌子底下的银钱大王了。

"行长先生，别躺在这不干不净的餐厅里了。跟我们一起上皇家酒馆去吧。他们才供应纯葡萄酒哩。"

银行行长听到"纯酒"也没动一下耳朵。当马科维茨开始摇他时，他也没有站起来。于是，父亲就去把隔着两张桌子、正坐在那儿跟警察局长巴拉茨一起喝酒的贾诺西大夫喊了过来。大夫跪在银行行长身边，听了听他的胸，又拿一面镜子放在他的嘴巴前面。

"可怜的卡采曼一小时前就在上帝的宝座前报到了，"贾诺西说，他站起身来，拍拍裤上的灰尘。

"这位敌人这下要找我报复也报不成啦，"巴洛克参事擦着

眼睛，叹了口气。

犹太教士用感情激动得颤抖的声音，在墓地上致悼词，告别了贝雷萨斯出类拔萃和热心热肠的儿子、随时准备为匈牙利祖国和摩西的宗旨而战斗的战士。

那些在犹太教士致辞时没有哭的人，当杰诺斯·贝雷吉·基斯奏起了死者心爱的那支歌曲的叠句时，可都流泪了：

我的喉咙我的喉，
从来不会醉酒，
这样的喉咙这样的喉，
我见过的从来就没有。

贝泰兰·卡采曼安葬这一天，贝雷克储蓄银行的出纳主任蒂哈梅尔·富泽自杀了。他用手枪朝嘴里放了一枪，当场毙了命。过了一天，贝雷萨斯的警察局长达尼尔·巴拉茨上了吊。当人家割断绳子把他放下来时，身体已经僵硬了。之后两三天，警察逮捕了贝雷克储蓄银行的会计主任西蒙·卡萨。

为了照顾卡采曼、巴拉茨、富泽和卡萨的家属的面子，当地的报纸都避不报道在银行的帐簿上见到了什么，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未见到什么。可是，一家布达佩斯的报纸，却擅自开玩笑地发了一篇有关贝雷萨斯的死亡、自杀和逮捕案的文章：

> 一年前，他们准备造一幢房子，开始挖掘那家百年老店杜列巴诺斯酒馆的地基。工人们在酒馆的地窖里发现了十一具骷髅，十分可能，那些获得这一意外发现的人，还远远不如那些打开贝雷克储蓄银行的大保险箱的人那样震惊。

贝雷克储蓄银行被勒令停业了。它重新开张时，已叫做"布

达佩斯匈牙利商业银行贝雷萨斯分行”。银行的头头没有被授予行长的头衔——他给唤作“营业主任”。亚巴德·柯莫尔，这位营业主任，从布达佩斯迁居到贝雷萨斯来了。

在贝雷萨斯，柯莫尔不象已故的贝泰兰·卡采曼那样得人心。这一点，凡是知道柯莫尔给我父亲来了一纸公文，催他立刻偿还贝雷萨斯储蓄银行贷款的人，个个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了我们的大半个葡萄园。醋坊老板马科维茨买去了。

卡采曼死后两个月，雇有五十五个工人的贝雷萨斯砖厂给火烧掉了。砖厂是保了险的，但是砖厂老板伊格纳克·贾沙依差不多已有两年没缴保险费。砖厂的废墟和贾沙依的葡萄园交付拍卖了。马科维茨买了葡萄园；砖厂售给了马诺·柯霍特——他是刚巧在拍卖前几天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贝雷萨斯的地面的。柯霍特是柯莫尔主任的小舅子。

贝雷萨斯人不久就看出来了，柯霍特疯狂得象一只三月里的野兔①。贾沙依因为砖厂停业了，背了一身的债，而这个柯霍特疯子却造起了一个比贾沙依的大四倍的砖厂。在柯霍特的工厂里，男男女女加上孩子们，共有二百多人，制砖烧瓦，一天干十三个小时。

过了几个月，事情就清楚了，柯霍特原来并不疯疯癫癫。在造工厂的时候，银行就以贱价买进了好多座果园，它们主要是从贝雷萨斯那些在卡采曼时代任性地借了钱、而现在又无力偿还的居民们那里买来的。银行在以前的果园的地上铺了一条街。这条街不象贝雷萨斯那些东弯西绕的老街，而是象箭一样从火

① 春季三月是野兔交尾期，野兔蹦跳不停。

车站笔直通往靠近州的大会堂、法院、银行和药店的市场。银行在这条自己出资铺的大街两边，造了不少漂亮的瓦顶房子。没几天工夫，市镇上的人和车辆就都已转到了安德烈斯大街上，于是，买银行造的房子的顾客，成群结伙地赶来了。可柯莫尔却不急于出售；他等待着顾客们互相抬高价钱。他并没有久等。

柯莫尔的家就在安德烈斯大街上。柯霍特也住在那里。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巴尔·西蒙博士，也在这条街上买了一幢房子。没多久，市镇上最好的商店都搬到安德烈斯大街上来了。就拿其中的一家，即托勃时装商店来说吧，它在贝雷克就是以作重复广告而闻名全州的：

有句老话：托勃的帽子呱呱叫
有句新话：托勃的领带呱呱叫

这个市镇由于这条新街而大为沾光。新街也给了银行以可观的利润。柯霍特也并没有因造房子而白费劲。当政府批准银行把地方铁路和几公里外的多尔哈锯木厂连结起来时，一家股份公司——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和警察厅长华萨赫莱是主要的股东——就开始建造亨涅炉子厂了。这时，以前一直骑自行车的柯霍特，买了两匹挺漂亮的灰色马和一辆马车，请注意，不是无盖的双轮马车，而是一辆装玻璃窗的大马车。这样的车子，贝雷萨斯还从未见过。

当柯莫尔建造他的新街的时候，在巴拉茨自杀后从卡沙调到贝雷萨斯来的警察局长西蒙，整顿了这个市镇的老街。他不是从清除垃圾着手，而是先清除乞丐。在贝雷萨斯，求乞是一种几乎象喝酒一样盛行的行当。干活干得老了的工人，破了产的农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如果他们的孩子又无法或者不愿赡

养他们，就只好求乞讨饭。残废的人，有病的人，以及失业的人，也都照此行事。那些专业的乞丐常跟业余的乞丐竞争。星期三上市镇来赶集的农民，卖掉了带来卖的东西，买进要买的东西后，就会把他们的货车交给孩子们看管 ，自己去乞讨一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省得把他们从市集上得来的钞票拿去付给平卡茨·克列勃斯(平卡茨·克列勃斯是酒店老板，他的酒店广告是："请来喝酒——酒是好酒！")。当然，来赶集的农民并非个个都求乞，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搞这营生。这些人是所谓"星期三乞丐"。在平常工作日，除了星期六，特拉茨克·纳汉曼那个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生们，也都会来讨几个铜子。

残酷无情的西蒙上尉禁止一切未经许可的乞讨。甚至在特拉茨克·纳汉曼向他派出一个商贩代表团后，他也仍不解除这个禁令。于是，平卡茨·克列勃斯这个"请来喝酒——酒是好酒"的酒店老板，就让那个在赶集日值勤的警察喝了个酩酊大醉，以恢复被西蒙剥夺了的他那些基本顾客的随意乞讨的权利。克列勃斯是个有名的为政府党搞竞选活动的人，而且还掌有实权。当他喝多了酒的时候，他会说："在整个贝雷克州，谁也不可能象我这样恶毒、这样粗鄙、这样不客气，或者这样危险地造谣中伤了。"克列勃斯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了一个有力人物。可是，平卡茨的舌头对西蒙警察局长却不起作用。于是，他就散布谣言了，说西蒙是一个排犹分子。这种流言蜚语确实挑起了对警察局长的反感；但是，有个星期六的早晨，西蒙却来到了犹太会堂，还热诚地做了祷告。原来，克列勃斯所说的这个排犹分子不是别人，而是卡沙一家咖啡馆老板斯哈尔克的儿子，他是学法律的。

两个值勤的警察，由于克列勃斯的殷勤照顾，喝醉了酒，当

场给西蒙撤了职。二十七个农民，因为未经警察许可而求乞，都给抓了起来，吃了一天牢饭。为了免得农民们在市监狱里烦恼，还抓了十九个学犹太法典①的去陪伴他们。这种残忍的行径，激起了全市的愤怒。独立党的勇敢战士、犹太法典教师特拉茨克·纳汉姆把西蒙叫做"维也纳的马屁精"。可是这个绰号也并没有能吓住警察局长。他知道，新市长艾米尔·杜诺夫斯基是他的强有力的靠山。杜诺夫斯基原是盖什市长手下的一名市政厅秘书，全市的人都熟悉他那副骨瘦如柴的身子，他的绰号叫做"小杜诺夫斯基"。当盖什的麻痹症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法儿隐瞒的时候，通过一次新奇的选举运动，"小杜诺夫斯基"就变为贝雷萨斯的市长了。他不是靠政府党，也不是靠独立党的竞赛当选的。他当上市长，是由于登在《贝雷克报》上一篇文章的影响，以及银行的支持。杜诺夫斯基在一篇题名为《新的时代，新的要求》的文章中，要求进行"广泛的改革"。这篇文章，使他赢得了抱进步观点的公民们、以及那些希望银行购买他们的果园作建筑基地的人的支持。杜诺夫斯基还用下面这样一句警告的话争取了贝雷萨斯其余的人："贝雷克州的罗斯人正在逐步加强他们的活动。"杜诺夫斯基认为罗斯人的进攻，"唯有一个现代化的、巨大的和富裕的贝雷萨斯，才能加以抵挡。因此，要让贝雷萨斯的每一条街都象安德烈斯大街。让我们买一辆洒水车。建造起沟通这个市镇和各个葡萄园的很好的街道。为了符合新的时代，要用电来照明这个市镇。为了让贝雷萨斯的葡萄酒征服维也纳、柏林、伦敦和纽约，我们来组织贝雷萨斯葡萄酒的销售吧！"

---

① 犹太法典，即《塔尔莫德》，犹太教口头相传的法律书。

杜诺夫斯基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后，这位新市长就命令西蒙整顿贝雷萨斯市容了。按照银行营业主任柯莫尔的意见，杜诺夫斯基在为贝雷克的葡萄酒夺取世界市场这件事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在他的倡议下，贝雷萨斯葡萄酒销售协会成立了。

伊斯特凡·泰尔当上了这个协会董事会的董事长。泰尔是个身高六呎五吋的大汉，古拉克西州长的舅子，贝雷萨斯最大的葡萄园主和政府党的出名的支持者。正因为泰尔的缘故，所以，在协会成立时，入会的全是一些属于政府党的葡萄园主。后来，事实证明，协会信守诺言，答应在收成前预先付款，甚至还愿意在葡萄快要成熟时就买下会员的葡萄酒，贝雷萨斯镇上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去找泰尔。可这位董事长现在却挑剔起来了。他拒绝了最出名的反对党的葡萄园主们的入会申请，同时也拒绝了债台高筑的种植葡萄者的申请。负债的葡萄园主的土地，因为银行拒绝给予信用贷款，不久就易了手。宣称同情独立党的种植葡萄者，不是“明白和承认”他们以前的政见错了，就是马上加入了因卖不掉葡萄酒而出卖葡萄园的人的行列。

“喂，约斯卡，”马科维茨对父亲说，“请选择吧，要么抛弃乌拉依，要么丢掉你的葡萄园。”

“我可这也不干，那也不干。”

“那你就会两头落空。从今以后，只有加入协会的葡萄园主的葡萄酒，才能卖得上好价钱。至于其余的人——”马科维茨轻蔑地做了个手势，“要说乌拉依嘛，你可以打赌，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叫他好瞧的。”

马科维茨这一点是说得对的。那些没有加入协会的葡萄园主，在葡萄酒上赚的钱比协会会员们要少得多。说到头来，他们是生产贝雷萨斯葡萄和出售贝雷萨斯葡萄酒嘛。而协会的会员

生产贝雷萨斯葡萄酒，卖的却是托凯葡萄酒。当时，为廉价的托凯葡萄酒进行竞争的酿酒人，分发了他们那张出名的价格表，所有的报纸读者都知道这张表，但只有贝雷萨斯的人才明了那是怎么一回事。酿酒人的价目表是这样写的：

普通托凯葡萄酒　每瓶一福林
上等托凯葡萄酒　每瓶二福林
优等托凯葡萄酒　每瓶三福林
最佳托凯葡萄酒　每瓶四福林
真正托凯葡萄酒　每瓶五福林

托凯的各种等级——普通、上等、优等和最好的——葡萄酒，全是贝雷萨斯生产的，只有真正的托凯葡萄酒，才用托凯镇上的葡萄酿造，而且还并非经常如此。

泰尔的协会把大部分贝雷萨斯产的酒卖给了托凯葡萄酒销售协会，因而贝雷萨斯的葡萄酒就给贴上"托凯葡萄酒"的标签，装运到了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和纽约。杜诺夫斯基已征服了世界。

协会成了贝雷萨斯山上的统治者后，父亲活象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了。只剩下一个人还可以不时跟他一起喝喝酒——那就是巴洛克参事。接着，阴郁的日子来到了，父亲开始一个人独饮了。

杜诺夫斯基市长叫巴洛克参事退休了。巴洛克被迫领取养老金退休后，感到十分痛苦，就一个劲地喝起酒来。不错，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反酒主义者；可是现在，他是白天黑夜地喝了，一顿要喝大量的酒。有一次，他喝了许多酒，喝得稀里糊涂的，跟父亲吵了架，顺口骂了他一声"卑鄙的犹太佬"。父亲对巴洛克挺

了解，没把这个侮辱放在心上。可是，巴洛克宿醉睡醒后，知道在喝醉时“刺痛了他最好的朋友的心”，却羞愧得哭了。他给父亲写了封信，赔礼道歉，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他的来信：

“我以人格担保，约斯卡，在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碰一滴葡萄酒或者白兰地了；从今以后，我只喝水和牛奶。如果我食言的话，你可以骂我是德国佬。”

父亲收到这封信，立刻去看巴洛克了，他求了他几个小时，请他放弃这个可怕的誓言。但是巴洛克坚定不移。

一连四天，巴洛克都靠牛奶和水活命，象一只丧家犬一样在街上游荡。到第五天上，他吐出了他的食物——他心爱的食品，科洛采伐的菜包子。第六天，他倒在床上了，他的耳朵里轰轰直响，已听不清对他讲的话。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膜，渐渐看不见了。胳膊肘和膝盖痛得这位退休的参事尖声呼叫。

巴洛克太太请来了医生，他是从卡沙搬到贝雷萨斯来的赖斯曼大夫。赖斯曼给病人开了一些药剂，叫巴洛克太太每天用酒精给高声痛喊的病人擦四次身。

可是，无论是赖斯曼开的药剂也好，擦酒精也好，都无济于事。巴洛克疼痛得咬破了嘴唇，指甲把胸口抓得鲜血淋淋。

巴洛克太太按照父亲的劝告，请来了贾诺西大夫。贾诺西大夫诊察了病人，开了一个处方，亲自拿到药房去了。过了半个钟头，他带着一个三升装的瓶子来到了病房里。这瓶子装满了黄颜色的药。这么大的瓶子和这药的颜色，引起了病人隐隐的怀疑。他仔细地看了贴在瓶上的标签，这才喝了第一次吃的剂量。标签上写的是：“拉约什·迈塞尔斯，黑熊药房，拉约什·科苏特广场，贝雷萨斯。”在商号的名字下，写着拉丁文的药名。再下面是匈牙利文写的用法说明：“每隔三十分钟服一啤酒杯。”

贾诺西给巴洛克服了这药的第一次剂量，这药闻闻象酒，甚至味道也象酒——但是，这时病人已既无嗅觉，也无味觉。他立刻把药吐掉了。那天，贾诺西试了三四次，让病人服用这种黄色的药，都没有成功。那天夜里，巴洛克神志昏迷了。到天刚亮，他死了。临死前，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把舌头咬成了两截。

"一个人不喝酒就会这样，"贝雷萨斯镇上的人说。"他十天不喝酒，就死啦。"

"巴洛克，可怜的朋友，并不是十天不喝酒而死的，"贾诺西坚持说，"而是因为他五十五年来喝得太多了。"

新的时代——新的人

杜诺夫斯基市长立誓要迅速改革贝雷萨斯的生活。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他的最显著的改革之一，是提高市镇的捐税。在杜诺夫斯基任市长的第二年，这个市镇从居民们身上收的税款，差不多比以前盖什任市长的时期增加了三倍。

不久前，还自以为挺了不起的制桶工人，现在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贝雷萨斯办起了一个制桶工厂，木桶急剧跌价了。这一新事物不仅仅叫制桶工人倒了霉，大批的廉价木桶还给古老而美妙的葡萄收获期也送了终。以前，木桶不足，现成的木桶的价钱，几乎跟葡萄汁一样贵，人们不得不喝掉一些葡萄汁。现在，他们木桶有了，又用不着去找葡萄酒的顾客。贝雷萨斯葡萄酒涨价了！因此，在葡萄收获期的第三天，在贝雷萨斯街上，就已经看得见有清醒的人在走路了。

从前，只是在五月那三天寒冷的日子里，当用肥料来生篝火时，山上才看得见肥料。现在，他们过了葡萄收获期，在降雪之前，就在地里下肥料，甚至随着春雪融化，赶在修整葡萄枝之前，就铺开了肥料。贝雷萨斯山感恩不尽，滚滚流出了它们那琥珀色的托凯葡萄酒。

伊斯特凡·泰尔买了一辆机动车，这是贝雷克州的第一辆汽车。它看上去象一辆锯掉了车辕的马车。跑起来时，发疯地喷鼻子，卟卟卟，冒出一团团难闻的煤油烟。

不过，话说回来，嘟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不习惯的汽油气味，并不是贝雷萨斯听到和闻到的唯一的新声音和新气味。警察局已进行了大改革，现在，警察已都不是那种酷爱喝酒和喝得醉醺醺的贼骨头，他们会拿钱来买一升葡萄酒了，于是一连串奇怪的罪行也就发生了。几星期来，每逢赶集就有一两个农民给扒走银挂表，人们已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儿。有个斜眼的马贩子西波克，他的裤袋子连同皮夹子一起给割掉了，那也算不得是新时代的象征。但是，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教师本达的上了年纪的妻子被人用刀子捅了十二刀，搞得不成样子，这时，大家才开始感觉到古老而欢乐的贝雷萨斯是一去不复返了。

谋杀本达太太的凶手被找到了。他叫杰诺·柯克扎，是一个拍卖了产业的葡萄园主的儿子。柯克扎被学校开除了，在克沙托律师的事务所里当书记。警察局长西蒙掴了他两个耳光，他就供认是他杀害了本达太太。他硬说他干这事并不是为了谋财，他要求把这一点记入警局记录。

谋杀案引起的喧闹还没平息下去，城里又叫一件新的轰动性事件吵翻了天。最近，一天夜里，有人抢劫了安德烈斯街上的卡罗莱·尼梅什那家钟表珠宝店。盗窃犯留下了许多很便于破案的痕迹。第二天，三个人——一个叫特尔凯斯的前葡萄园主和他的两个儿子——都站在西蒙面前了。

一连几个星期，全市的人都激动地等待着对谋杀犯和窃贼的审讯。许多娘儿们都定做了去看审讯时穿的上衣。这时，诉讼程序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这个市镇的维克河岸上，又发生了几件新的事情，这一来，谋杀和抢劫的事就从人们的心头被抹掉了。

柯霍特工厂里爆发了罢工。

《贝雷克报》经常提醒读者，砖厂老板马诺·柯霍特，又有文化，又挺人道，是一个有现代思想的人。柯霍特生得又长又瘦，微微有点驼背，头发带点儿亚麻色，他的外表与其说象个工业家，倒不如说更象个科学家。他穿的是质料很好的布衣服，不欢喜花哨的颜色，而且宁肯穿过时的式样。他乘坐一辆装玻璃的四轮大马车，戴的却是一副镍边眼镜。平常胳膊下总是挟着一本厚厚的书。是的，柯霍特博览群书，读过许多科学著作。有一次，当伊斯特凡·泰尔看见有一本书的题目叫做"当代社会主义"，他真的一下子昏倒了。"你……你看这样的东西？"泰尔差一点中风了，结结巴巴地说。他看过《贝雷克报》，知道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只要我在看这样的书，"柯霍特笑眯眯地答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尽管这样回答了，泰尔觉得还是得去向警察局长报告一下，他看到柯霍特有这样一本书。

"我也在钻研这样的作品哩，"西蒙对他说。

"那可没好结果啊，"泰尔惊叫起来。

"当然罗，"西蒙同意他的话，"问题是——对谁没有好结果？"

柯霍特的人道主义，厂里的每个工人都一清二楚。在贾沙侬当老板的时候，工人们一天要干十四个小时的活。自柯霍特接手后，他们开始干十三个小时了，从早上五点干到中午，歇一个钟头后，从一点干到七点。工资也增加了，虽说增加得不多，但无论如何也够了，已很少有工人在干活时饿得昏过去了。甚至还有这样的事——不错，一年半里只有一次——柯霍特还给一个分娩后的女工足足放了三天假。两张当地的报纸都大肆宣

扬了这件事。

有一次,《贝雷克报》刊登了一篇严肃认真而又客观的文章,论述了柯霍特为工人们制定的社会福利措施。譬如说,柯霍特破坏了贾沙依所建立的传统,在他的工厂里为男女工人建造了分开的厕所。

正因为如此,在镇上,几乎所有的报纸读者,都把砖厂工人罢工看作是对个人的侮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开头,人们对罢工这个字眼都搞不大清楚。大家口口相传,说砖厂罢工了,可是,贝雷萨斯镇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知道罢工是怎么回事——是吃的东西呢,还是喝的东西;或者,是该请大夫去对付呢,还是要请救火员去对付。幸亏,《贝雷克报》马上向他们解释了这件事儿。

"罢工,"它说,"是那些懒得不愿干活、整天价只知吃吃喝喝和睡大觉的工人必然会犯的一种罪恶。"

这样,事情就很明白了。对许多人来说,仍然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柯霍特砖厂里雇用的工人在罢工期间都不干活了。

罢工的第二天,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贾诺斯·福蒂这个名字。

马科维茨告诉我母亲说:"这个贾诺斯·福蒂是一个甚至比阿兹泰洛斯还要危险的流氓。"

贾诺斯·福蒂……这个名字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可是我决没有想到,以后竟会有这样的一天:贾诺斯·福蒂躺在纳梅尼村的蒂萨河岸上,是我阖上了他的眼睛,并最后一次吻了他满是泥垢和血污的脑门。

贾诺斯·福蒂……贾诺斯·福蒂……这个名字在贝雷萨斯口口相传。

福蒂是柯霍特工厂里的一个机械工。是他组织和领导了这次罢工。我第一次看到他时，是他大踏步走在罢工工人的前面，向安德烈斯大街走去。他长得矮矮敦敦，年纪三十光景。他的头发、剪短的胡子和眼睛，都是棕色的。我只记得，他穿了一件没打领带的蓝衬衫。

他迈着小步子走去。他后面的队伍很快地奔向了市政厅。跟福蒂游行的工人大约有一百五十个——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还夹着几个小孩子。一个妇女擎着一面用一块红头巾临时缝制成的旗子。这是一面破旧的旗子，跟着这面旗游行的是一些憔悴、瘦削、精疲力竭、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游行中的一个汉子用嘶哑的嗓门高喊着：

"没有国家的流氓们来啦。"

另一个汉子，也许是记起了泰马斯·艾舍的穷人军了吧，他高声喊道："冲呀，乞丐们；饥饿的乞丐们！"

人们都从家里和商店里涌出来观看这个场面。

"现在，可是，你们……你们……"肉店的胖老板娘尖声喊着，"你们乞丐过狂欢节啦。"

看的人都笑了。

我后来常在报上看到，说第一次工人示威游行把市民们吓坏了，引起了他们的憎恶。这可不是贝雷萨斯的实际情况。他们都感到很惊异。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要什么？他们扛的是什么旗呀；他们干吗自称是流氓呀？

在那些张开嘴巴站在那儿呆看的人们当中，要是有人了解那面破旧的旗帜象征什么，有许多人是的确会又怕又恨的。可是，如果观看游行的人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多得多的人，向福蒂挥帽致敬了。许多一无所有的、而且今后也

不会有什么财富的葡萄园工人，都在看这些砖厂工人。但是谁也没有由于看到那面红旗而心脏就跳动得更快一些。街上有许多农民，许多为挣脱银行的锁链而发愁焦急得夜不成寐的小葡萄园主。要是这些人了解这面红旗的意义的话……

即使那些跟在意志坚强的福蒂后面疲倦地走着的人，至多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他们是正在为打出一个新世界而进军。

都是由于两家当地的报社发行了最近几天的报纸，镇上才突然恐慌起来。贝雷萨斯镇上的人产生了一片憎恨。报纸以前所未有的愤怒，狠命地咒骂“叛逆的、亵渎神明的、贪婪的、谋财害命的社会主义匪帮”。政府党的喉舌《贝雷克报》号召全州正派的居民联合起来，不分党派、语言和宗教信仰，一起跟这批“人的败类”斗争。独立党的《贝雷克报》要求州长加强贝雷萨斯的治安力量，宣称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他就要“对我们财产受到的损失，对我们上帝受到的公然的侮辱，对我们国旗受到的诽谤，以及对我们妇女和无辜的孩子们的死亡”负责。

在天主教、希腊天主教、新教以及犹太会堂的讲坛上，牧师和教士们向“没良心的贱民”宣战了。新教的牧师卡洛斯宣称福蒂是基督的敌人。

贝雷萨斯一片鼓噪。许多人都在认真地考虑着是不是要烧掉吉普赛区。把这吉普赛区连同那些可恶的居住者一起毁灭了吧！

贝雷萨斯许多居民都新买了凶猛的狗，有的人甚至把他们一直珍藏在旧袜子里的钱也埋到地里去了。

这里要补充一句：示威游行和罢工顺利地结束了。宪兵和警察在市政厅前面等待着示威者。杜诺夫斯基市长派了一个警

官去告诉示威者，说他愿意接见一个由他们选出来的三人代表团。

福蒂，在另外两个人陪同下，走进了市政厅，这三人马上在市长接待室被捕了。在当时，宪兵和警察驱散没人带头的游行示威是一件挺便当的事。第二天，工人们回到柯霍特砖厂去上工了。

一天干十三小时，继续照办。至于工资嘛，柯霍特答应再作考虑。

过了几天，两个被捕的人被释放了。要审判的只有福蒂一个人。一时间，镇上议论纷纷，说这次砖厂罢工，也应对阿兹泰洛斯进行清算；可是，后来才弄清楚，阿兹泰洛斯已关在牢里五个月了，他是不可能参与组织这次罢工的。

审判福蒂时，贝雷萨斯的娘儿们可都来炫耀她们专为审判谋杀犯和盗窃犯而做的衣服啦。由于得到入庭证的人，全是由庭长仔细挑选出来的，因此，法庭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个时装展览。

可是，审判的仪式却令人失望。原来福蒂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他二十八岁，匈牙利人，新教教徒，无前科，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个贝雷加多的挖土工人的儿子，自己也用鹤嘴锄和铲子干活干到了二十一岁。他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炮兵团里当过兵。复员后，他在布达佩斯一家机械厂里工作了几年，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妻子。

福蒂在审讯时举止很安详。他并不否认是他组织和领导了砖厂罢工。对庭上的观众来说，他讲的话实在令人感到厌烦——观众们抱怨说，他用了许多使人听不懂的、完全莫名其妙

的措词，什么资本家啊，剥削啊，封建残余啊，阶级斗争啊，阶级状况啊，阶级法庭啊。

福蒂太太的对话可就比福蒂的供词有趣了。

福蒂太太跟她丈夫差不多年纪；虽然稍微瘦了点，却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她口齿挺伶俐：

"我的丈夫受审判，是因为柯霍特叫工人干活干得要死，而又要他们饿肚子，"她在法庭上说。

"贾诺斯·福蒂受审，"满脸冒汗的基采布赫莱法官威严地说，"是因为他煽动反对上帝和国家。"

"还是那句老话嘛，"福蒂太太说。"担心口袋的人总是信赖上帝的。"

基采布赫莱斥责了福蒂太太，提高嗓门问她道：

"你因此就否认贾诺斯·福蒂是匈牙利王朝的敌人？"

"阁下，你最好问我谁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敌人！即使你不问，我也来告诉你吧。桑邦、柯霍特、柯莫尔、古拉克西，还有你，你本人，阁下！以及所有象你这种人！"

基采布赫莱因到庭作证的福蒂太太侮辱法官而判了她十四天监禁。贾诺斯·福蒂判刑八个月。

那时候，匈牙利的法律和法院，尚未为镇压当代工人运动而配备好残酷的暴力。

市长为庆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生日而举行盛大宴会后，州委会的独立党员卡尔曼·万多尔，在那个座位上多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中，他开始阅读一份布达佩斯报纸的经济栏。他决定要"收拾他们"了。

于是卡尔曼·万多尔给他们抛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在州委会的全体会议上，他揭发柯莫尔主任欺骗了库鲁茨州，正用普鲁士银行的钱在建筑贝雷萨斯-多尔哈铁路。

“这条铁路，州里的匈牙利人都以为是他们的，实际上是属于普鲁士银行老板的。”

这一揭发，使得与会者顿时为之哗然。连政府里的成员也愤怒不已。

“荒谬绝伦！臭不可闻！”全场一片叫嚷。

杜诺夫斯基市长却不同意这些激怒的匈牙利人的意见。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说，普鲁士盟友帮助我们建造铁路，创造文化，是不对的呢？”他问道。“怀疑有危险的人，也得看到朋友的手里握着一条鞭子才行啊。先生们，别诬蔑我们的朋友了；倒不如来谈谈那个伏洛克村怎么竟选了一个罗斯人来当村长的事吧！”

他的话掀起了一场新的轩然大波。现在，罗斯族的州委会成员砰砰敲板凳了。索莱瓦的罗斯人牧师杜迪克斯要求发言。

“四百年来，是德国人蹂躏匈牙利，摧残匈牙利。而现在，杜诺夫斯基市长却在伏洛克的罗斯人选出了一个罗斯人村长这件事上，看到了危险！”

“俄国代理人！”醋坊老板马科维茨向杜迪克斯喊道。

“住嘴，你这个犹太佬！”罗斯人牧师回报了一句。

听到这样破口大骂，委员们一个个都从各自的座位上跳了起来。一片吆喝怒号，人们威胁地挥着拳头。

执行主席古拉克西摇铃也没有用；这时，他似乎记起了某个传统的例子，发出一声大吼，压倒了这片喧嚷喊叫。

“先生们！你们要打破脑袋，互相去打吧，但先听我讲

几句。”

听到这个奇怪的挑战，州会堂里顿时静下来了。

为了使讲话显得特别庄重，古拉克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想，尊敬的委员们，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了解最近几个月间在我们光荣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清楚他的责任所在。俄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不是对匈牙利人的威胁。在审判福蒂以后，那些还不认识到敌人在哪里、谁是敌人的人，我担心，那就只有他头上的房顶烧塌时才会醒过来了。现在已没有互相争吵的余地。凡是把上帝、国王和国家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必须撇开从前的、过时的敌意，站到行列里来，准备保卫家庭的窝棚、我们祖先的土地。”

古拉克西的讲话，迎来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那天，每一项决议都获得了州委会全体一致的通过。

在福蒂被判刑后几个星期，贝雷萨斯又出了一件轰动全市的事件。市镇的街道上出现了第一辆洒水车。

福洛普·西维拉
传记小说第三部

我回到贝雷萨斯后两年，索莱瓦一带突然流行了一种骇人听闻的传染病：伤寒！尽管蒙卡契和贝雷萨斯都派了大夫和护士去跟这种传染病战斗，但索莱瓦区还是接连不断地死人。

州里所有的教堂，不分语言和宗教信仰，都为病人的康复进行祈祷，为死者的灵魂作了法事。贝雷萨斯的希腊天主教堂还由信徒扛着圣母马利亚像举行了游行。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救传染病的受害者，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病人的命运当然毫无影响。这场传染病，是在一次少有的严寒的侵袭下才结束的。那时，死亡的人数已达二千名。

埋掉了最后一个死于传染病的人，放火烧掉了隔离医院，蒙卡契和贝雷萨斯来的大夫都回家去了。这时，福洛普舅舅却病倒了。他患的不是传染病。艾尔莎舅母请来的蒙卡契的大夫，给病人诊视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告诉西维拉太太说：

“我的同行西维拉是由于劳累过度和太激动，所以精疲力尽了。他必须休息，他要的是这个。过几个星期，他又会精神勃勃的。”

蒙卡契来的大夫诊断错了。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福洛普大夫的情况却并无好转。这位索莱瓦的“犹太大夫”，在传染病流行的两个半月中，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在那段时期，从来

没有一次吃中饭或者晚饭会不给打断，他一个人顶十个人干，两个月内体重差不多减轻了四十磅。他天天沉默不语，一动不动，茫然瞪着眼睛，坐在书桌旁。艾尔莎舅母早晨给她丈夫穿衣服，晚上给他脱衣服，白天喂他吃，好象他是一个小孩。

当西维拉太太看出，蒙卡契的大夫的乐观的断言毫不灵验时，她请来了一位贝雷萨斯的大夫。贾诺西大夫整天待在西维拉家里。当他动身回贝雷萨斯去时，他劝告艾尔莎舅母说：

"是忧郁症。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夫人，我就送我的同行西维拉到布达佩斯一家疗养院去。"

艾尔莎舅母听从了他的劝告。因为她没有钱，便向父亲求助。她把卡罗莱放在我们家里，就跟她患病的丈夫一起上了布达佩斯。按照父亲断然的嘱咐，福洛普舅舅给安置在布达佩斯一家收费昂贵的神经病疗养院里。

住疗养院花了好多钱，但对福洛普舅舅却并不见效。艾尔莎舅母不要护士来护理他的丈夫，自己也在疗养院里住了下来。她给福洛普舅舅穿衣，脱衣，喂饭，在他睡的时候，守着坐在他的床边。大夫们都认为，西维拉太太护理她的丈夫，自己也马上就会病倒的。他们可错了！艾尔莎舅母并没有被夜间护理和为丈夫担忧这副重担子压垮。她只是稍微瘦了点，但不知怎的，反而变得更年轻了。谁也想不到，她已是近四十四岁的人。

在疗养院里，福洛普舅舅天天木然不动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茫然凝视着空间，跟在索莱瓦家里一样。他顺从地吞药水，服药粉，但说什么也不能劝诱他去参加坐谈室的游戏和院里举办的音乐会。他会回答一声"是"或者"不"，但有时连这也不表示。大夫们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他那双痛苦的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有一种隐隐透露着神志健全的难解的忧伤。

疗养院的神经病医师在同福洛普·西维拉见面之前，就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事情。他不熟悉西维拉的工作；但他记得科克教授问了一下，就把这个年轻大夫关进了拘留所的那件有趣的事。这位神经病医师是个细心的人，当他看出疗养院的治疗法毫不见效时，就劝艾尔莎舅母把她丈夫带回到索莱瓦去。

“在西维拉习惯的环境中，在绿色的喀尔巴阡山里，他可能会复原的。拿神经病人来说，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病人治好啊。”

一天早晨，当艾尔莎舅母帮患病的丈夫穿衣服时，她对他说：

“我们就要回家去了，福洛普。”

一上来，病人只是摇摇头，接着，他开口说话了：

“我们不回家，艾尔莎。我在布达佩斯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办。”

“你在这里要办什么事呀，福洛普？”艾尔莎舅母问道，她不知道笑好还是哭好。

“我已作了一些很重要、十分重要的观察。我不能把这些观察藏在自己肚子里。我要为一家布达佩斯的报纸写几篇文章——我想，为工人日报写吧。”

当艾尔莎舅母告诉疗养院的神经病医师说她丈夫要工作时，那位医师劝她把她丈夫搬到一个安静的公寓里去住。

“拿一个神经病患者来说，谁也不知道——”

在布达山上一个僻静的公寓的花园里，福洛普舅舅开始工作了。他坐在枝叶葱茏的树底下，一连两个星期，每天从从容容地写作七八个小时，工作治愈了医学无能为力的病。过了两个星期，西维拉大夫的病痊愈了，唯一留下的痕迹，是衣服看上去

好象挂在他的躯体上似的，乌黑的鬓发中有了一根根银丝，眼睛下面出现了两道黑圈。

艾尔莎舅母把他丈夫开头写的两篇文章拿给疗养院神经病医师看了；那位仁慈的大夫摇摇头。

“我担心，”他说，“以后我的同行西维拉大夫不可能再当大夫了。”

按照丈夫的嘱托，艾尔莎舅母把文章交给了工人日报的编辑部，福洛普·西维拉的文章一篇篇发表了。

西维拉大夫认为，他写的是医学方面的文章。探讨的问题和使用的术语，的确都属于医药的范围。然而福洛普舅舅的一系列文章，都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在这种用特殊的形式写成的论文中，隐藏着这样一些思想：

“引起每年杀害九十万生命的最广泛、最危险的疾病的，并不是用显微镜才看得见的细菌，而是无边无际的大领地。

“结核病、伤寒和梅毒是同一类可怕的疾病的亚种。这种疾病，很难给它取一个普通的名字。在德国，它也许可以称之为克虏伯病①，在北美，可以称之为洛克菲勒或范德比尔特②瘟病，在林木繁茂的喀尔巴阡山，可以称之为桑邦溃疡。”

一言以蔽之，福洛普舅舅的文章的精髓实质是：私有财产是为害极大的地方性流行病的起因。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福洛普舅舅用来证明其主张的一些事实，即使对那些正在跟克虏伯病和桑邦溃疡斗争的人来说，也都是新的，令人吃惊的。

这几篇文章，比起从前引起科克教授注意的那些文章来，对

---

①、克虏伯，是十九世纪经营钢铁、铁路、枪炮的德国大资本家。

② 洛克菲勒和范德比尔特都是美国金融界巨头。

福洛普·西维拉的一生,发生了远为重大的影响。

西维拉一家乘从布达佩斯去索莱瓦的火车到达贝雷萨斯时,我们全家都到车站上迎接他们。

福洛普舅舅心情很愉快。他拍着我父亲的背脊,咯咯大笑:

"弟弟,要是几个星期后,你听说他们偶尔烧毁了我住的房子,把我埋在里面,或者一枪把我打死了,请不要吃惊。"

火车在贝雷萨斯站停了五分钟,这段时间里,尽是福洛普舅舅一个人在说话。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健谈和开心。

他认为他们可能会烧掉他的房子,或者一枪致他于死命,他可错啦。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警察厅长、伯爵的管家和牧师们全都知道,西维拉大夫写了文章,在布达佩斯发表了。可他们并没有象他料想的那样进行报复。索莱瓦的这位犹太大夫没有出任何事——只是,对镇上的人来说,他已不再是一个大夫了。付诊金的病人,再也不来请西维拉大夫治病了。那个伏洛克的大夫会骑着伯爵的马,每星期上索莱瓦来一趟,逗留几个小时。那些在他没来时病倒了的人,就等待着。如果等不及的话,他们或者去向富弗卡大婶求救,或者就得不到任何帮助,进入另一个世界去了。警察厅长、管家、三个牧师和工厂经理的抵制是很认真的,即便是不付诊金的病人,也只敢在深更半夜前来请西维拉看病。

这一来,索莱瓦的药剂师米哈莱·库洛夫斯基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库洛夫斯基老是发牢骚,提出越来越强烈的抗议,索莱瓦才终于又请来了一个大夫。巴尔·尼盖西大夫,新教教会牧师的堂兄弟,在索莱瓦定居下来了。

叫福洛普舅舅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大夫竟不回避受排挤的西维拉一家。相反！他差不多天天都来拜访西维拉大夫，几乎每个疑难病症都来向他的高明的同行请教。西维拉大夫也不吝教言；他向他的后继者欣然传授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

巴尔·尼盖西虽然刚刚开始行医，倒是一个挺聪颖而诚实的青年人。待他明白到，自己原来是在索莱瓦充当这样一个别扭角色时，他想马上离开索莱瓦。福洛普舅舅把他留住了。

"至少，索莱瓦也需要有个诚实的、受过教育的人呀，"他对他说。"它少不了你，尼盖西大夫。至于我嘛，反正已经给打发掉了。你比我会好受一点，尼盖西。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又是新教徒。不过，尽管如此，你干起来也挺不容易就是了。"

西维拉太太跟患病的丈夫一起上布达佩斯去时，就早已把几匹马卖掉了。为了让女儿在布达佩斯上学，福洛普舅舅前几年就已拿房子抵押了一大笔钱，现在，贷给了西维拉太太一大笔款子的蒙卡契银行，愿意买下他在索莱瓦的房子。

当西维拉大夫得到通知，知道布达佩斯的一家公立医院愿聘他为住院外科医师时，有待他处理的已只剩下两头母牛和一些家具。福洛普舅舅把利格赠给了尼盖西大夫。

"我又象二十二岁的人啦，"福洛普舅舅接到住院外科医师的聘书时说。

福洛普舅舅的传记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下次我还要叙述福洛普舅舅生平的第四篇小说，它的题目是："一个军医跟掠夺性战争的斗争"。

在明媚的蒂萨河畔

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蒂萨河是河里面的一条最地道的匈牙利河①。我们天天从故事和歌曲中听到，世界上最好的水，是蒂萨河的水，这条河里，繁殖着世界上最好的鱼。在这世界上，哪里都没有这样勇敢的士兵，这样美丽的姑娘，也没有蒂萨河畔所唱的那样悲哀的歌。

从贝雷萨斯到蒂萨河，要花四个小时。我小时候，贝雷克的人们，有的把路程估为一小时，也有的估为两小时，其说不一。他们说的是乘农家马车要赶两小时。自然罗，那不是估量距离的最精确的方法，因为农家马车赶一个小时能走多少路，要看路面情况、马的体力，最后(但这也并非无关紧要)还要看一路上有多少家酒店。我们说四个小时的路程，大致是二十公里光景。

换句话说，蒂萨河离得不远。不过，我必须不好意思地承认，我在十岁之前，却既没见过蒂萨河，也没饮过蒂萨河的水，更没有吃过蒂萨河岸上用蒂萨河的水煮的辣椒鱼。

可是命中注定，有一天，我不但要去看蒂萨河，而且还要游泳横渡这条河。父亲要上纳梅尼去了，他决定带我一起去。纳梅尼就在蒂萨河畔。

父亲要到纳梅尼去办一桩公事，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整个蒂萨河流域都是当时匈牙利的领土，故有此说。现在，蒂萨河北部流域已划入苏联版图。

说也奇怪，纳梅尼镇的人决定种植烟草了。人人都知道，在匈牙利王国的领土上，生产、制作和销售烟草，是国家专利经营的。因此，种植烟草的许可证，差不多全是发给选举时投政府党候选人票的农民的。选了独立党议员的地区，是不适宜种烟草的。

纳梅尼镇的人选举了乌拉依。他们在他们的绸旗上绣着引以自豪的口号："纳梅尼不放弃四八年。"①纳梅尼的村民的确没有放弃四八年，可是，他们的脑袋瓜却想到要种植烟草了。蒂萨河畔的村民们一旦想到要干什么事，那是用铁锤去敲也不能从他们的脑袋瓜敲掉这个念头的。纳梅尼的村民们给乌拉依寄了一封有一百二十个人签名的信，要求他们的代表，为他们设法获得政府对种植烟草的准许。

乌拉依无法依从他们的要求。他不能去向他称之为维也纳的马屁精的人提出请求，要不，谁知道塔巴的选民会怎么说呢？可是，他又不能拒绝这个请求，因为，要是他拒绝了的话，纳梅尼很可能会继续忠于四八年，但准会抛弃乌拉依的。

为此，纳梅尼的村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要求不符合拥护"独立"观点的匈牙利人的尊严。再说，种植烟草，也许并不象他们所想的那样，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独立党的州组织派父亲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我就是这样才到蒂萨河去的。

自西维拉一家迁往布达佩斯去后，我的奶兄弟米科拉和奶妈马鲁莎就住在我们家里了。我要米科拉跟我们一起上蒂萨河去。

父亲听到我提出这个请求，吓了一跳。"你是怎么啦，格查？叫一个罗斯孩子一起上纳梅尼去？若是烟草这件事得罪了他

---

① 意为不放弃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理想、要求、权利。

们，那他们马上就会指责我是俄国代理人啦。”

父亲的马和马车开春之前就在市场上卖掉了，因此我们是乘了马科维茨叔叔的马车去的。这是不大光明磊落的，因为马科维茨是一个政府党党员，而我们却是去为独立党办事。坐在马车里，我把我的忧虑告诉了父亲，但他只是摆摆手。

“人要生存下去，就不能面面都顾到。这是生活。”他说。

父亲在纳梅尼村的村长米克洛斯·华拉第家里，跟这位当地最有影响的农民谈了两个小时。我就跟村长的女儿伊洛娜·华拉第一起，在一棵大桑树底下的空马车里坐了两个小时。我们没有玩——我们是谈天。我谈得很少，但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伊洛娜，那两片红玉般的嘴唇却说个滔滔不绝。伊洛娜穿一条红裙子，着一件绣花的白罩衫和用金线缝制的红背心。她的袜子和鞋子也是红的。她的衣服、她的扎成矢车菊模样的亚麻色头发和她的呼吸，都有一股麦秆的清香味。她讲着，我听着，但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却一个劲地直盯着我，仿佛我正在说什么金玉良言似的。她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没成熟的杏子，送给了我。杏子又硬又没味，白色的果核倒是一咬就开的。

伊洛娜跟我讲了蒂萨河的事，说住在水里的美人鱼，怎样常常用她们优美的歌声和金色的头发来迷惑撑木筏的人。接着，她讲到一个叫做波克斯柯的老头，说这个住在蒂萨河底的鱼眼魔鬼，黄昏时会在月光下游到水面上来，用他那有蹼的手缠住渔夫的网，在他们的船上钻洞洞。波克斯柯会把木筏扔到沙滩上，还会把贪婪、残酷的狗鱼引到小鲤鱼晒太阳的地方去。

蒂萨河美人鱼的故事，我已听过多次，但关于波克斯柯老头的故事，却还是第一次听到。仅仅是一个神话故事吗？有时候，神话故事讲的可是象水晶一样明澈的真理啊。譬如说吧，我现

在就亲眼证实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都是生在蒂萨河畔的。

当父亲走出华拉第村长的家来到院子里时，看看他脸色就知道了：纳梅尼的村民如果不能获得种植烟草的许可的话，他们是不管怎样也要改变政治信念的了。父亲走路时，简直腰都挺不直了。

为了避免落个谈判破裂的印象，父亲接受华拉第村长的邀请，将在纳梅尼留到夜晚再走。伊洛娜和我就到蒂萨河边去了。

正象故事和歌曲中所讲的，蒂萨河是“金色的”；它的水，是亚麻色的，它的沙滩，是金黄色的。河对岸，欢乐的南风轻拂着一片金色的麦秆。

不过，躺在金色的沙滩上的，或者在亚麻色的水中玩水的纳梅尼的孩子们，却不是金黄色的。他们裸露的身体是褐色的，他们蓬松的头发，是黑黑的。只有伊洛娜一个人，她的头发才染上了蒂萨河的色彩。

我虽然是一个城里来的孩子，是从遥远的、神秘的贝雷萨斯来到纳梅尼的，但我没花多少时间就跟这些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孩子交上了朋友。赤膊佬是不讲究礼节的。一眨眼工夫，我们就已随便讲话，互相直呼名字了。更确切点说，我们已经管那些不赞成我的提议、不愿游过蒂萨河去的孩子叫做“笨蛋”。

“这危险？你讲话象头蠢驴。蒂萨河到底有多宽嘛？就不过你掷一块石头两倍那么远吧？那算什么？水流很急？漩涡太多？胡扯！匈牙利的男孩才不把这样的小玩艺儿放在眼里呐。”

我们大约一共十五个人，开始横渡蒂萨河了。我一跃进水里，就拿定了主意，我一定要在正对面有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的地方上岸。我朝着那棵白杨树游去了。

微风吹得清凉的水面波纹叠叠。确实，蒂萨河是一条湍急

的河，但我不怕。

我稳健而有节奏地划着水，破浪前进。这时我才注意到，水与其说是黄的，倒不如说是绿的。游到中流时，我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同伴们都游回去了。我还发觉，水流已把我冲离了我的航道，使我离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很远了。我心里蓦地起了一个念头：还是游回去为妙吧。不！不！要是我放弃我这样起劲地撺掇起来的冒险，我怎么去见伊洛娜的面呢？没有别的办法——前进！我一头钻在水里游去，划四下才抬头透一口气。当我终于爬上对岸时，我已精疲力尽了。湍急的水流把我足足往下冲了一公里，我是在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下游的地方上的岸。

我仰面躺在地上，久久地凝望着灰白的天空，一些羊毛般的云朵，正高高地在我头上飘浮。我摘下一枝矢车菊，嚼着它的茎杆。一个瓢虫停在我的手上，我念念有词地吟唱起那句熟悉的问话来了："瓢虫，瓢虫，你要带我到哪儿去？是上天呢还是入地，或者去墓地？"

这个斑斑点点的小预言家并没有马上回答。我正在想，它是打瞌睡了吧，突然，翅膀一振，它不客气地飞走了。

当我的肚子告诉我应该游回纳梅尼那边去了的时候，我并没有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往水里一跳，而是沿着河岸，向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走了去，从那里，我看见对岸空空荡荡的。游泳的人都已回家吃饭去了；只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还站在岸边。我的心怦怦直跳起来："伊洛娜！"

我朝上游走去了，心想，要是我在离白杨树一公里光景的地方下水，水流就会把我冲到我的出发点，伊洛娜站着的地方。

可能是我尽管休息了好久，依然感到很累，也可能是水流太

急了，我游得很慢。当我游到中流时，我突然心慌起来了。要是我的脚抽筋的话，那怎么办哪，我这样一想，吓得牙齿都咯咯抖了。为了定下心来，我翻身仰游。用这种姿势游，只要稍微动动手，动动脚，或者动动头，都一样可以使身子浮在水面上。这条河，黄色的蒂萨河，在轻轻地、轻轻地摇荡着我。

不远处，漂来了一张木筏。我在教科书上读到过，马拉马罗斯的罗斯人，常把木头扎成木筏，由蒂萨河运到缺乏木材的匈牙利大平原去。可我在学校里却没有学到过，撑筏的人是用一阵西瓜皮和玉米棒子芯来迎接游到木筏旁去的人的。我连忙逃开了。

我在水里呆得太久了，直到纳梅尼村下面老远的地方才上了岸。这样，我走回去不得不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因为我的一双脚在火热的沙上走不惯，常常要停下来在水里浸一下。

走近纳梅尼村时，我看到岸上闹哄哄的，来了好多人。也许有上百个吧，他们正在河滩上团团转。河里来了好多划艇。待走近时，我看到艇上的人正拿着一根根长竹竿往水里戳。他们在捞什么鬼东西啊？有一只小艇上，我看到父亲正坐在华拉第村长旁边。我用手做个喇叭，高声喊道：

“你们在水里戳什么呀，爸爸？”

父亲一下子跳了起来。要不是华拉第抓住他，他准掉进水里去了。“格查，儿子，你活着呀？”小艇笔直向岸边驶了过来。它一靠岸，人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有称赞的，有咒骂的。大多数的人都骂。人人都以为我已经淹死了，他们是在打捞我的尸体啊。

父亲跳下小艇，来到岸上，就掴了我几个耳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耳光。接着，他垮了，哭起来了，一边

哭，一边吻我眼睛，吻我的头发，吻我的手。

纳梅尼的那些不敢或者不会横渡蒂萨河的孩子，见我因为勇敢而挨了耳光，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伊洛娜没有笑；她睁着眼睛呆望着我。

天黑了，那天晚上，我们俩又在老桑树下坐了下来。伊洛娜没有说话，我沉默着。伊洛娜先开口。

"你不害怕吗，一个人在蒂萨河的河中间？"

"我不是一个人，"我颤声地说，"我想着你。"

伊洛娜一言不发。我没有出声；恍恍惚惚地抓住了伊洛娜的左手。我吻了伊洛娜头上那个正在枯萎的矢车菊花冠；伊洛娜吻了我的眼睛。

"你还会回来吗？"

"我会回来的。"

"答应了？"

"保证来。"

当时若是有个金头发的蒂萨河美人鱼悄悄地给我们预言将来的事情，那我们准会想，这个说话的准是恶毒的老波克斯柯，因为只有魔鬼波克斯柯才会臆想到，当我十年后回到纳梅尼来时，伊洛娜·华拉第竟会放狗来咬我。那时，我身穿一件七零八落、满是灰尘的制服，脚着一双破旧的靴子，头上扎着血污的绷带。贾诺斯·福蒂身中四弹，正在流血，当我背着他往蒂萨河走去时，我的武器在哪儿掉了。

"给我喝杯水吧，"我请求伊洛娜·华拉第。

"水有的是，喝嘛，"华拉第村长的女儿回答说，指指浑浊的蒂萨河水，那河里面，正漂浮着几具匈牙利红军士兵鼓胀的尸体。

在很久以后的那个时候，罗马尼亚的大炮，正从塔巴那边向着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司令官和几十个罗斯红卫军据守着的纳梅尼轰击。

中饭我们吃了辣椒炖鱼，是用蒂萨河的水煮的，晚饭也吃的是辣椒炖鱼。

“只有两个地方的人，懂得怎样做辣椒炖鱼，”华拉第村长说，“斯齐格德人和纳梅尼人。”

吃辣椒炖鱼，得用葡萄酒灌下去，因为鱼还要在肚子里的葡萄酒中游泳。

“让它们游吧，”华拉第村长老是这样说，一杯接一杯地斟酒。

一个驼背的蒂萨河老渔翁，开始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讲起古老的传说来了。老渔翁的故事中最年轻的英雄，是二百多年前的泰马斯·艾舍。最老的勇士叫做库特苏，在十一世纪彼得王统治的时候，他单枪匹马地把一百个穿戴盔甲的德国人和一百个穿黑袍的意大利牧师沉入了蒂萨河。我们听讲匈牙利的祖先的惊人的功绩，一直听到深更半夜，然后就在华拉第村长家里睡了。由于第二天早晨睡过了头，我们只好留下来吃中饭。吃过中饭，我们终于动身回家了。

我们走了一半路，父亲都没吭一声。当他终于说话时，与其说他是在对我说，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回想起几年前，纳梅尼的村民们还把一个麦子代理商刺了一刀，因为那人竟胆敢说，一个政府党党员，就是一个正派的匈牙利人，而现在……要是乌拉依不能为他们获得烟草许可证的话，所有的纳梅尼人，在下次选举时就都要投政府的票了。”

"独立党可不需要那些为了贪钱而出卖信念的人的选票，"我说。

"贝雷萨斯已经给魔鬼抓走了，"父亲回答道。"现在纳梅尼要是给拉走的话，瓦里和巴比也会动摇，那就——"父亲深深叹了口气，不说下去了。

"换了我是乌拉依，我就不接受那些纳梅尼人的选票。"

"你还是个小孩，格查。你不懂得世界上的事。"

"那倒是的，"我同意道，"我不明白，比起那些拿钱把选票卖给政府党的人来，纳梅尼人有什么好。"

"他们要好一点，"父亲不大有把握地答道。

"为什么匈牙利人比那些明明知道选了罗斯候选人就得坐牢的罗斯人要好一些？"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是更好一些，"我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是更坏一些。"

"好一些，格查，儿子；要好得多。"

"他们为什么要好一些？"

"他们就是好一些嘛，"父亲重复说，"好一些。相信我，格查。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你知道，我是不拿人格开玩笑的——我拿人格担保，匈牙利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当我们回到家里时，马鲁莎奶妈在家门口等着我们。

"不好啦，先生。"

"出了什么事，马鲁莎？"

"来了法警——正在查封东西哩。"

父亲的面孔倏地煞白了。这是巴卡克斯法警第一次上我们家来，不过也不是最后一次。

等这位法警和估价员赫德华里在母亲的钢琴（它早就被定为暂缓处理）、父亲的猪皮扶手椅和那只不是装书，而是摆满了

雕花酒杯的书橱上，完成了贴封条的法定手续后，父亲请两位绅士喝一杯葡萄酒。在以前那棵科苏特树的地方，现在已盖了一个长满五叶地锦的亭子。待几瓶葡萄酒落了肚，大家才知道赫德华里原来还有一副挺优美的嗓子。歌声把我也吸引到亭子里去了。

蒂萨河金色的水呵
请告诉我邻居的女儿
在整个蒂萨河流域
再没有比我更好的情哥

父亲拿拳头在桌上敲着拍子，震得酒杯摇摇晃晃，叮叮当当。

马科维茨来了，又取来了两瓶葡萄酒，父亲叫马鲁莎到哪里去弄两只小鸡来煮辣椒酱油鸡。那天晚上，要不是叫赫德华里打乱了计划的话，本来会过得挺开心的。

这个打匈牙利西部上贝雷萨斯来的估价员，在父亲又打开一瓶葡萄酒时，可显出恶劣的原形来啦。

“我必须说，贝雷萨斯的葡萄酒是很好的酒，可是，世界上不管什么葡萄酒，都抵不上真正的皮尔逊啤酒。”

马科维茨虽说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马上站起身，不辞而别了。父亲向两位客人道声歉，说他身体不大舒服，头一夜没有睡好，又叫长途旅行搞得很累，就去睡了。

巴卡克斯法警和赫德华里估价员没有吃到我们家的辣椒酱油鸡。

泰马斯·艾舍

塔巴村村长泰马斯·艾舍，是一个满腔怒火的人。贝雷克州州长古拉克西是个报复心重的人。

艾舍憎恨贝雷克州的名门望族，经常在市政厅和酒店里发表他对他们的看法。

古拉克西对这位塔巴村村长只提到过一次，说："我要扭断这个傲慢的农民的他妈的脖子。"

泰马斯·艾舍除了他的历史性的姓氏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贵重的东西足以夸耀。古拉克西州长却从他父亲手上继承了六千英亩肥沃的土地。这六千英亩地，是古拉克西家的一个成员搞来的，此人在一八四九年时，作为帝国的一个特派员，兜捕过科苏特败军逃散的士兵。古拉克西手上有州长的权力，又是六千英亩土地的主人，因此，是贝雷克州匈牙利上层社会的一个完美的典型。

当艾舍知道艾姆列·乌拉依为纳梅尼村的村民们弄到了种植烟草的许可证时，他在塔巴的酒店里公开宣告说：

"我决不再扛有艾姆列·乌拉依名字的旗子了。"

"那你现在扛的是什么旗子呢，泰马斯？"那个富裕的农民艾列克·巴特科斯问道。

"匈牙利的旗子，"艾舍答道。

"那是不用说的，"巴特科斯辩论地说。"问题是旗子上标的

是什么字？”

艾舍踌躇了，在思考了好一会儿，又灌下了两杯葡萄酒后，才重新答上了话。

“我的旗子上写的是‘冲啊，乞丐们，饥饿的乞丐们，长虱子的乞丐们——’”

“你愿当乞丐的村长？”巴特科斯既恐惧又怀着恶意地探问道。

艾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宪兵少尉把艾舍的这番奇谈怪论报告了州长。古拉克西看了报告，哈哈大笑。

“到时候了，”他说。

正是好机会。塔巴村不久就要选举村长。州里那些头面人物从来就不欢喜这个库鲁茨的艾舍，现在这个塔巴村村长又跟艾姆列·乌拉依的党挑了战。这个傻瓜心里在想些什么呀？

“乞丐要讨铜子，每个虔敬的人都会给乞丐一个铜子或一块面包，”塔巴的新教教会的牧师说。“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把村长的权杖交给一个乞丐。”

“艾舍不是乞丐，”塔巴村的村民们都卫护他们的村长，提出了抗议。

“不是上帝的意志，”牧师说，“而是他自愿站到乞丐的行列里去啊。”

“冲呀，乞丐们，饥饿的乞丐们，”——大泰马斯·艾舍鼓励他的赤脚军队时高喊着这句话，人们听了觉得自有一种诱人的声调；但是这话出自塔巴村村长泰马斯·艾舍之口，可就毫不讨人欢喜了。塔巴的农民可不是赤脚的乞丐！

二十四年来，艾舍在选举中第一次有了一个名叫艾列克·

巴特科斯的对手。选举活动开始了。

选举前七八个星期，事情就已经很清楚，是乞丐也罢，不是乞丐也罢，塔巴村大多数村民都支持艾舍，都会投他的票。

艾舍的支持者担心州长会靠宪兵的刺刀来帮助艾列克·巴特科斯当选。古拉克西可没有这种打算。

选举前六个星期，艾舍收到了贝雷萨斯银行的一封由营业主任柯莫尔签名的信，叫他三天之内还清以他的土地和房子抵押的借款；否则就……

艾舍套上他的马和马车，驱车上贝雷萨斯去借钱还债了。他东奔西走，毫无结果。他也找了我父亲。

"不要紧，泰马斯，"听艾舍诉说了他的苦恼后，我父亲对他说。"没关系。你要的这一点儿钱，我今天还拿得出。"

父亲是相信自己说的话的，而他结果没能弄到"这一点儿钱"，可不能怪他。银行拒绝借钱给他，因为我们的葡萄园和房子的抵押贷款已经太多。他向私人借钱，也同样不顺利。有钱的人，不肯借给我父亲。愿意借的人，他们自己跟那家邪恶的银行的纠纷就已经够多的了。

当父亲向马科维茨去求援时，马科维茨不是借给他钱，而是给他提了个忠告。

"照顾照顾你自个儿的事吧，约斯卡。趁早照顾照顾，免得为时过晚。"

父亲借钱碰壁，决定了艾舍的命运。你说匈牙利法院办事缓慢吧，看看载着泰马斯·艾舍的审判记录的公报，你就知道了，匈牙利法院可并非什么时候都是办事缓慢的。这位塔巴村长接到贝雷萨斯银行的来信后二十二天，法警就来到了艾舍家里。法院定在选举日交付拍卖。

泰马斯·艾舍在选举之前就退出了选举，于是艾列克·巴特科斯以全票当选了村长。

艾舍拍卖掉房子后几天来看我们了，带来两个蛋和两个苹果作为礼物。中饭后，他和父亲一起坐着喝酒。他们不是喝我们酿的葡萄酒——银行开始逼债前两个月，父亲已把我们的酒连同酒桶一起卖掉了。我们的地窖已打扫干净，因此马鲁莎奶妈到酒店里打了点酒来。喝酒店里的葡萄酒，比喝家酿的葡萄酒要慢一点才能打开话匣子，不过最后还是见效了。

“嗐，约斯卡，”沉默的艾舍开口了，“我已变成一个没田没地的约翰了。”

“你现在怎么办呢，泰马斯？”父亲怯生生地问道。

“我给人家当雇农去，”这位以前的塔巴村长答道。

“我劝你，泰马斯，”父亲思索着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匈牙利有的是古拉克西州长够不到和桑邦伯爵管不着的地方。”

“天下乌鸦一般黑，”艾舍镇静地说。接着，他在桌上砰的一拳，突然发出一声喊叫，“我不走！我就留在这里！”

他那方墩墩的身躯，他那深陷的褐色眼睛，以及他搁在桌上的骨骼分明的手，在在都显示着他的坚强的意志。

“我不离开这里一步，”他高喊道。“奥地利皇帝把匈牙利的土地赐给了名门望族；银行从我们的头下面抽走了最后一个枕头——但是匈牙利的土地可不是属于那些狗的，它是我们的！要清楚，约斯卡，好好地弄个清楚——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从我们这里把匈牙利的土地抢走，上帝本人来抢也不行。它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你准备怎么办呢，泰马斯？”当艾舍静下来时，父亲用轻得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我已跟你说了嘛，我去给人家当雇农。"

"要是你找不到工作呢？"

"我就去讨饭。"

父亲眼睛转向着一边，沉思默想地坐着。艾舍又说下去了。

"我就去讨饭。要是他们不布施长虱子的乞丐一个铜子，那我就去偷。偷窃，"艾舍高喊道，"偷窃，他妈的！要是他们把我拖到法庭上去，我就啐法官的脸，但我将留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静默了好一会儿，最后父亲问道："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吗？"

"可以，你能帮忙的。帮我，帮你自己，帮每一个真正的人！你只要不仅心里是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而且还用匈牙利人的拳头，你就能帮忙。要是有人找你吵架，你不要垂头丧气，不要闷不作声，而要大喊大叫，使劲揍他。好好打……打他们，打那些癞皮狗！不住地打，直打得他们堕落的灵魂出窍！"

这位以前的塔巴村的村长大泰马斯·艾舍的后裔，靠在桌子上，脸埋在手中，结实的身体在吓人地摇晃，他哭了。

一星期后，我们听说，泰马斯·艾舍已雇给彼得·塞泰当了长工。彼得·塞泰是他的大女婿，巴比村的一个殷实的农民。贾诺西·福蒂出狱后，到巴比去看望了艾舍。

马卡尔·楚德拉

我学会打牌了。父亲心爱的娱乐——“余牌成亲”，得有三个人打才行。一个人“出示颜色”，两个人对抗。巴洛克叔叔还活着时，三个人——父亲、市参事和醋坊老板——老是一起玩的。打从巴洛克叔叔死后，第三个人就不固定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来代替这位死者，可又谁也不能完全代替他。有的人，打牌打得并不亚于那个以前的市参事；可他们都不是虔诚的酒鬼，而不喝酒，打牌可就不是真正的娱乐了。有的人，对这种马戏场的余兴也很有点瘾头，可他们都是业余打打的。父亲对打牌打得蹩脚的人会轻轻责备一下，加以指导；马科维茨却直通通地骂他们是笨蛋。结果，巴洛克死后几个月，父亲和马科维茨都没有打牌的搭当了。

马科维茨灵机一动，想出了办法。

“教格查来打嘛。”

“你用不着教我，”我应声说道，“我经常看你们打，听你们吵架，你们哪个都打不过我。”

“呵，呵——”马科维茨不相信。

“可格查不会喝酒啊，”父亲反对叫我跟他们一起打牌；然而马科维茨一下子就把他驳倒了。

“我们可以给这孩子的葡萄酒兑矿泉水嘛。要是他那也不能喝，光喝矿泉水也行。对孩子就让着点嘛。”

头一天晚上——我们还没有赌钱——事实证明，我是值得醋坊老板信任的。第二天晚上，我们赌钱了，我赢了三十二个克劳采。我花三十个克劳采，在贾卡勃·法卡斯太太开的书店里买了一本书。这本小小的黄封面的书，名叫«马卡尔·楚德拉及其他»，是一个叫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俄国作家写的。我看过这本书后，才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所以知道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个俄国人，因为我在扉页上看到，"德佐·安布罗佐维茨译自俄文原著"。

«马卡尔·楚德拉»[1] 偶尔落入我手中的时候，我已是一个博学的读者了。我已狼吞虎咽地看过儒勒·凡尔纳[2] 的二十或二十五本书；看过由索莱瓦和贝雷萨斯公共图书馆供给的一些最有名的匈牙利古典作品，热切地阅读了几部华尔特·司各特[3] 的长篇小说。

看了凡尔纳的书，我决心去发现北极。对匈牙利古典小说着了迷，我决定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征服者，把土耳其人撵出欧洲，消灭德国人和俄国人。当然，我还不知道该采用什么办法，不过，一个人知道了他要干什么的话，他是自会学会怎样去干的。

我差点忘记讲到库柏[4] 了。读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我的责任明确了：我得建立一个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的印第安帝国。我甚至已真的朝着这方向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哑巴古

---

① «马卡尔·楚德拉» 是高尔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描写主人公情愿死也要忠于自由。

②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著有«海底两万里»等。

③ 司各特(1771—1831)，英国小说家，著有«艾凡赫»等。

④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是他的代表作。

古的指导下，在马科维茨老头的花园里学会了骑不加马鞍的马。

待我一看过高尔基的书后，我的这些孩子梦就全都不在话下了。北极的寒光偶尔还诱惑着我，而更经常的还是幻想按照华尔特·司各特的体裁，写一本关于费伦茨·拉科治的长篇小说。

现在，北极和关于拉科治的小说，象我打算建立的印第安帝国一样，又全部烟消云散了。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怎样在高尔基的影响下转变的，我会不知如何回答。我只知道，我是里里外外、彻头彻尾地转变了。我开始——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探索地——重新评价一切人和一切事。比如，在我看来，马科维茨已不再是一个很会喝酒和善于打牌的邻居；砖厂工人福蒂远非只是从布达佩斯来到贝雷萨斯而感到很厌烦的工人。

我把《马卡尔·楚德拉》给米科拉看了。当米科拉把书还给我时，我问他："你欢喜这本书吗？"

"欢喜，"米科拉答道。

米科拉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孩子打从离开索莱瓦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觉得在贝雷萨斯是个局外人；学校使他厌烦，他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免得人家说：一个索莱瓦来的罗斯孩子，不能符合贝雷萨斯的匈牙利学校的标准。下午，他会默默地坐在园子里的一棵树底下，或者爬到树桠子上去。"别吵他，"当我要去打扰米科拉时，父亲会这样说，"他一心想到山里去哩。"父亲和米科拉很友好；他很欢喜听父亲讲故事，但他总是避开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

米科拉把高尔基的书还了我，但第二天又借去看了一遍。

"怎么样？"第二次把书还我时，我问道。米科拉没有回

答——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亮光。突然间，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妒忌。我吃惊地想到，或者不如说感觉到：米科拉跟高尔基，比我更有共同之处。也许，这是因为米科拉是罗斯人，要是他和高尔基碰到一起的话，他可以跟他讲话。不过，这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米科拉，"我以带敌意的口气说。米科拉惊讶地瞧瞧我。正是这时候，我下决心要成为匈牙利的高尔基。我是认真地作出这个决定的，我勇敢地面对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不希望在贝雷萨斯一带也经历象高尔基的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事情；但是，如果山不去找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去找山嘛。我要寻找出象高尔基所写的那些男男女女来，要盘诘他们，刺探他们的想法和经历。在贝雷萨斯住着这样的人吗？有的，——比如说，古古就是。

古古是醋坊老板马科维茨雇用的小马夫。他是马拉马罗斯的一个乌克兰孩子。嗯，我要跟古古一起到维克河岸上去，我们将坐在那里，把脚在水里荡呀荡的，古古会给我讲述他的生活故事。那将多美妙啊！我这个计划难办的是——古古是个哑巴。他只会"咕咕一咕一咕咕"地喊！他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不管你对古古怎么说，他只会笑笑，回答你"咕咕，咕咕"。人们要知道古古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只能看叫他做的事他是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古古懂匈牙利话和罗斯话，但他对哪种语言都既不能看，也不会写。因此，我休想从他那里听到这样一些故事：只要把它们记下来，我就能成为匈牙利的高尔基。不过，我还是相信，古古是真正的材料。

古古对马拉马罗斯伐木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跟那儿的伐木工人一比，索莱瓦的伐木工人可算得是富有的人了。古古还

熟悉盐矿工人的生活，因为他成为哑巴之前，就住在苏加塔克。他下过苏加塔克的盐矿——去偷盐水——那个矿后来给淹没了。当时，许多人经常为了只值两三个克劳采的盐，去作这种冒险的旅行。但是古古碰到的事，别的人却都没有碰到过。他刚刚提着一桶盐水来到地面上，那块底下已被流水冲塌了的土地一个摇晃，立刻连人带牲口、房子和树木一起陷进一个二百米的深坑里去了。古古站着的地方，离地崩的边缘只隔几步远，他吓得浑身瘫痪，动也不会动了。几秒钟工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被唤作“好运气的末端”的苏加塔克尽头那块土地变成了一个无底的盐水湖。

打那时起，古古就成了哑巴，老是不停地笑。虽说并没有什么事值得他笑。住在这个遭灾的村子上的人，都恶狠狠地望望他，好象他不仅仅是亲眼看到了这次地崩，而且还是他引起这次地崩似的。人们伤心地想：古古是在笑他们的苦恼哩，他们把这嘲笑者拳打脚踢了一顿。孩子们朝他掷石头；警察也不知为什么生他的气，把他关了几个月。在班房里，古古照样不住地笑，老是重复地喊“咕咕—咕咕—咕咕”。宪兵打掉了他几颗牙齿。当古古给释放了时，他就不辞而别地离开苏加塔克，逃到蒂萨河上。他躲藏在一张木筏上，来到纳梅尼，在那里被撑木筏的打了一顿，给赶上了岸。古古从纳梅尼步行到贝雷萨斯，马科维茨雇用了他。由于古古不会说话，他得到的食物，只有别的小马夫的一半，得到的工资也只有十分之一。小马夫们也都不喜欢古古。他们净拿他开各种各样粗鲁的玩笑。只有那些马却挺爱古古，古古也爱那些马。当他给马喂料、喂水和洗刷身子时，他会“咕咕—咕咕”地直叫，而那些牲口，也总是知道它们的朋友古古要它们干什么。

我心里想：要是古古能够用这种费人思索的、简单而又古怪的语言，把这一切都讲给我听，象高尔基笔下的人物所说的那样，那该有多好哇……

可是古古不会说话；因此，我就去向费克斯凯叔叔求助了。在我决定去向费克斯凯叔叔讨教和请求帮助时，他正睡在我们的园子里，在一棵胡桃树底下打鼾。我坐在他的身旁，等着他醒过来。我不得不等了好久，不过他终于醒来了。

费克斯凯叔叔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直截了当地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

"费克斯凯叔叔，给我讲些我可以写作的事情吧。"

费克斯凯已香甜地睡了一个午觉，还睡眼惺忪，他茫然不解地瞧瞧我。

"你要听神话故事，去找马鲁莎奶妈嘛。她会给你讲所有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我不要听神话故事，费克斯凯叔叔。我要听真的故事。不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要听干活而又饿肚子的人的故事；想做工又找不到工作；有些事使他们很痛苦，而又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人可多呐，格查。他们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怎么这样说呢，费克斯凯叔叔？你只要看一看高尔基写的——"

"我什么书也不看，儿子。我不看书也知道，生活糟透了。不过，要是你能给我一筒烟丝和一杯葡萄酒的话，我就说你是个乖孩子。"

我给费克斯凯叔叔取来了一节腊肠、半瓶葡萄酒和一支雪茄。

“自然罗，你忘了面包啦。”

我又回家去拿面包了。我跑得很快，但待我拿着一片面包来到胡桃树旁时，那节香肠已消灭了，瓶子里的葡萄酒也只剩两吋高了。费克斯凯把面包塞进口袋里，舔了舔父亲的雪茄烟头，小心地把它点燃了。

“好，格查，你需要什么故事？”他喷着一个个大烟圈，问道。我背靠着胡桃树干坐下，详详细细地向他讲述我看了什么书，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我怎样下了决心，我指望他帮什么忙。

费克斯凯听着我这番冗长的解释，不住赞赏地点头。

“唔一唔，”当我再没有什么要说时，他发表意见了，“如果就只这么点麻烦事儿的话，我可以帮忙。”

“我来跟你讲，”费克斯凯叔叔继续说下去，一口喝光了瓶里的酒，“格查，我来跟你讲讲我和我的伙伴米库利克跟英国国王开玩笑的事吧。”

“跟英国国王？”我诧异了。

“就是跟他玩笑，”费克斯凯肯定地说。“此人名叫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个邪恶的吸血鬼，他是——不过，我们还是按次序说下去吧。米库利克和我，我们俩突然想到上英国的一个堆木场里去找个工作，我们俩就步行出发了。你准知道，到英国去要经过土耳其，于是——”

“到英国去怎么会经过土耳其呢？”

“那时是那样的嘛，格查，我的孩子；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这不是从哪本愚蠢的书上看得来的；我是凭我的亲身经历知道的，所以，如同我说的，我们，米库利克和我，就步行动身去土耳其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米库利克可他妈的真棒，他能赤手空拳连根拔起一棵枯死的树，用肩膀推倒古老的栎

树。有一次，他甚至在一家德国剧院里拿这作过表演。”

“剧院里根本没有活的树，”我插嘴道。

“不是在匈牙利剧院，是在德国剧院里。你干吗老是想显得比我还懂？我这个有经验的人，正在教导你啊！好，别再打岔了，土耳其人可爱上米库利克啦，因为土耳其人非常尊敬身强力壮的人。土耳其人请求米库利克留下来；他们讲好话，给他吃好东西，给他喝烈酒，给他金布做的衣服——”

“土耳其人跟米库利克讲话时，是用什么语言讲的？”我问道，打断了费克斯凯叔叔教导性的演讲。

“什么语言？唔，你知道，格查，土耳其的老百姓，都欢喜哇啦哇啦讲土耳其话，不过土耳其的上等人却都欢喜讲匈牙利话。”

我站了起来。

“你上哪儿去，格查？”

“我再去拿点酒来。”

“对，这才是聪明的孩子！教教你也叫人开心。”

我走进父亲的房间，随手从里面锁上了门。为什么，我说不上，只是我感到十分羞惭，羞惭得不敢离开那间黑暗的房间，一直到全家人开始喊我吃晚饭时，我才走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费克斯凯又上我们家来了。我想避开他，但他拖住了我的胳膊。

“我来看看你，格查。你知道，”他见我什么也不说，就接着说道，“昨天的讲话是我的葡萄酒讲的。一个经历过痛苦的人，不喝酒是不会讲话的；而他要是喝了酒，就又不讲真话了。你知道，格查，我干吗来找你吗？阿兹泰洛斯躺在床上，病了；他在吐血。如果你想听些通情达理的话，就跟我走吧。你只要好好求

求他，阿兹泰洛斯准会告诉你一些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事情的。”

阿兹泰洛斯和费克斯凯住的屋子，比我上次看到的稍微整齐了些。他们在做得很粗糙的工作台一样的长凳上，铺了草垫，上面还罩着乌克兰毯子。屋中央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摊着一些报纸和几本书。还有两把椅子。

阿兹泰洛斯和衣斜倚在床上。当我告诉他，我在索莱瓦听过他演讲时，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下。我们谈起了索莱瓦的一些事，接着谈话转到了贝雷萨斯。阿兹泰洛斯老是咳嗽，打断我们的谈话。在一阵咳嗽过后，拿手帕一擦嘴巴，手帕就渗上了血迹。

我竭力把谈话往我关心的事情上引，但没有成功。费克斯凯叔叔看到我求助的眼色，给我帮了忙。

“你知道吧，卡尔曼，格查看了一本书，一个俄国人写的，现在，他也想跟那个俄国人一样。他想请你帮个忙。”

阿兹泰洛斯惊奇地望望我。我以为，倘若把我的心事告诉他，他准会发笑的，但他并没有嘲笑我。

“古代的罗马人认为：胸怀大志，是件好事。你，小巴林特，可真不赖啊。努力前进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同志，”他在同志两字上加重了语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

阿兹泰洛斯开始谈起马克西姆·高尔基来了。在我听来，他讲的故事，几乎跟高尔基的作品一样的美。

“一个饥饿而疲乏的、”——他说——“穷苦的、赤脚的、破破烂烂的、到处流浪的短工，行走在茫茫无边的俄罗斯草原上。他不管上哪儿，不管望哪儿，看见的尽是一群群忍饥挨饿、精疲力竭的不幸的人，在贫困、愚昧、奴役和无望中苟延残喘。这个脚

上流血的挨饿的流浪者，既不梦想丰盛的筵席，也不渴求鸭绒被褥的床铺，而只准备为这同一命运的大群受折磨的、呼号着的人而斗争。他号召拿起武器，不是去进行一场一个民族消灭另一个民族、使战败者成为奴隶的战争；而是号召穷苦人、挨饿的人、破衣烂衫的人、受压迫的人起来，为赢得自己生的权利而斗争。”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又咳嗽了，咳得很厉害。费克斯凯叔叔递给他一杯水。阿兹泰洛斯喝了，用那块沾血的手帕擦擦嘴巴，揩干了脑门上的汗珠，又继续讲下去了。

我听着；我可以听阿兹泰洛斯讲上一千年，他说的事情，给了我难言的痛苦，也给了我无法形容的欢乐。突然间，我不由地哭起来了。

“你干吗哭啊，格查？”费克斯凯问道。“不过是讲故事嘛——呃，你知道，一切到头来都会好好的。”

“一切到头来都会好好的，”阿兹泰洛斯加了一句。

我哭了好一会儿，哭了就舒服些。待我不再流泪了，阿兹泰洛斯朝我脸上望了望。

“你要做这样一个流浪者吗，小巴林特？”

“我要做这样的流浪者，”我坚决回答道。

“为这句话，把手伸过来。”

我们握了手。阿兹泰洛斯的右手火烫烫的。

“你不知道，你是答应了什么，”阿兹泰洛斯说，“不过，也许——让我们希望——最后你会说到做到。”

我们三个人默默坐了一会儿。阿兹泰洛斯那双洞察未来的眼睛，已看出了那还仅仅是一个梦想的东西；今天，它已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了事实……

费克斯凯想到的无疑是吃的和喝的。我呢？我记不得当时

是怎么想的了。但我知道,我决没想到,二十五年以后,我会在莫斯科公园里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一起散步,谈起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费克斯凯叔叔和我曾经怎样如醉如幻地想念他。公园里黑朦朦的;高尔基的烟嘴上的香烟火,象一个大萤火虫似的在发着闪光。

犯 罪 小 说

马科维茨不象以前那样上我们家来了。他是个大忙人；他正在跟柯霍特合伙修建一条公路；他们在修建那条让重型大炮经过维列克隘口通往兰堡的公路。

这位筑路的醋坊老板，对我们的经济情况挺清楚。当他来看望父亲时，会带一瓶五升装的葡萄酒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管那个酒瓶叫“小灯”。只要一摆上葡萄酒，他们就要打牌；等到“小灯”干涸了，马科维茨也就回家了。

我已成了固定的搭当。我不喝酒，他们也无所谓；不过，打牌时，他们老是互相骂对方“笨蛋”——有时候也骂我，而我却不这样称呼我的牌友，这使得他们大为扫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是什么都会忍受的，甚至对管他的牌友叫笨蛋这样的事，也听之任之了。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好久没来的马科维茨，又提着他的“小灯”来了，打牌打得很慢。醋坊老板肚子痛，我们不得不一再放下牌，等待马科维茨恢复过来。

当我们的客人到外面去解手时，父亲就一个人喝着酒。我站在窗边，眯着眼睛朝外面望，看看我们的牌友来了没有。这是初秋的一个黑压压、阴沉沉的夜晚。果实累累的树枝，摇曳着黑影，在窗子的石缝里，有只蟋蟀在唧唧叫。

“小灯”空了时，已经十点半了。母亲补袜子补得直打瞌睡，

我也渐渐昏昏欲睡了。我等着马科维茨站起身来，以他那句传统的笑话向我们告辞："希望你以后会更规矩点。"

可是，马科维茨却一个劲地打牌，忘记回家了。

准是过十一点了吧，马鲁莎奶妈突然闯了进来。

"起火了，起火了，"她用罗斯话高声喊着。

我们的房子并没有起火；起火的是马科维茨筑在从我们家买去的果园里的那幢马房。

几分钟工夫，那幢长长的木房子就给火卷没了。火焰蔓延到了马房隔壁的马科维茨的办事处。果园里的树木熠熠发光，天空一片通红。三个教堂塔楼上的钟，疯狂地敲了起来，发出火警。

我们最早来到火灾现场，大家都吓糊涂了。只有马科维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他的吩咐下，两个马车夫用斧头敲掉了我们家的木瓦房顶，另外两个伐木工人忙着拆马科维茨的房顶。马科维茨命令三个人快用斧子砍掉马房门，或者把墙头砸倒。这个命令没有执行，因为马房的墙也着火了。

有人象野兽似的在临死的恐怖中尖声哀号。陷在着火的马房里的马的嘶鸣、呼叫和呜咽声，活象人的哭泣声，仿佛一千个注定要被折磨死而在拼命挣扎的人给关进了燃烧的地狱。

令人作呕的烤炙马肉的恶臭，淹没了果园里烧焦的果实气味。

那些着火的马还活着，正在用蹄子和头踢撞着马房的墙。突然，有一处的墙塌了，三匹马恐怖地哀鸣着，冲进了站在园子里的人群中。烧瞎了眼睛、浑身冒火的马踩倒了一个女人。有匹马一头冲到一棵树上，倒下去了。第二匹用后脚站起来，疯狂地打着圈子，飞奔了几秒钟，终于撞倒在地上。第三匹在果园里

横冲直撞，直到有人一斧头砍倒了它。

当消防队来到时，这里已没有他们可做的事。为了免得完全白跑一趟，他们用桶子在我们的井里汲了水，灌满了洒水车的水箱，在冒烟的马房的废墟上浇注了一阵。

我们上床睡觉，已经半夜过了。早晨，我醒来时，几个捕狗的人①在古古和另一个小马夫的帮助下，已经搬掉了烧焦的马。但是，被践踏得一塌胡涂的园子里，却仍然弥漫着一股子焦肉的气味。

有几棵树已经毁掉；许多树虽然还站在那儿，但已不是活的树，只剩下烧成木炭的树干。"这是那棵老胡桃树；这棵是长绯红的酸樱桃的；这儿是长蜜甜的梨子的地方——"

"你的损失很大吧？"父亲同情地问马科维茨。

"这一下，我的业务可瘫痪啦。怎么说，也是严重的损失。马房和马是保了险的。"

"你缴了保险费吗？"父亲问道，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在律师要求下才缴款的。

失火后的第四天，那个反酒主义者、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戴索·亚尔多来到了贝雷萨斯。他在我们的镇上待了三天半，只喝矿泉水和生牛奶，遍访了老相识。他也来看了我们，跟父亲作了一次长谈。三天半后，他驱车上塔巴去了，接着又去了纳梅尼。他视察了四个村子，之后又回到贝雷萨斯，只逗留了几个小时，就回布达佩斯去了。

保险公司拒绝了马科维茨提出的赔偿申请。用总公司法律顾问的话来说，"申请人之行为，具有为获取保险金而纵火之重

---

① 指当地的巡捕，其职务是捕捉、扣押流浪汉和无执照的动物。

大嫌疑”。

在总公司法律顾问向贝雷萨斯检察院提出的备忘录中，列述了这样几条可疑的根据：

(一)火灾之夜，马科维茨之马房由一名为古古之小马夫看管。该晚八时，马科维茨曾亲予此一古古者半升葡萄酒；古古喝酒后，即锁上马房门，置钥匙于口袋，至园子一隅躺下睡觉。彼睡眠甚酣，致火焰和救火之喧闹亦未能将其唤醒。一贝雷萨斯之小马夫于喝饮半升葡萄酒后，竟至酣睡不醒，则此葡萄酒中显然已置有安眠药物。

(二)失火前数小时，马科维茨适在葡萄园主约瑟夫·巴林特寓所玩牌，该寓所距马房六十至七十米。马科维茨曾数度中断牌戏，声称肚痛而外出至园中。起火之际，马科维茨亲在火灾现场——而并未肚痛。吾人素闻，遇惊吓之事，常能使人肚痛发作，而惊吓竟使人肚痛顿失，实前所未闻。

(三)马科维茨之马，每匹保险为四百福林。火灾前数日，马科维茨关入被焚马房之马，系购自塔巴、纳梅尼、瓦里和贝雷加多诸村，每匹付价五十至六十福林。在瓦里村，并曾以十二福林购进一跛足马。保险总金额与所损马匹之差额，不下一万六千五百福林。

关于对检察院提出了备忘录的事，马科维茨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总公司不肯付款。他十分气愤，决定立刻就去布达佩斯。

“我要宰了那个反酒主义者流氓。那天真该死呀，我竟跟一个反酒主义者打了交道！”

马科维茨既没有去布达佩斯，也没有杀死那个反酒主义者。贝雷萨斯的警察当局根据检察院的命令，逮捕了火灾的受害者醋坊老板。警察局长西蒙亲自执行这一逮捕。

“我以法律的命令逮捕你！”

听到这句可怕的话，感觉到西蒙戴手套的手按在自己肩上

的分量，马科维茨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个匈牙利人，朝天用希伯来话喊了起来："希马·叶斯洛艾尔。"①

马科维茨在贝雷萨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人；然而镇上许多人还是为他的被捕感到愤慨。有钱的人不相信马科维茨犯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小葡萄园主也都认为马科维茨是无辜的。《贝雷克报》也卷进去了，它登了一篇措词谨慎的指责总公司的文章，暗示把马科维茨投入狱中，是为了避免赔款；不过，主要的还是，贝雷萨斯的葡萄园主，在艰难的时刻里，几乎莫不都在心里想：要是他向总公司保了险的房子烧毁的话，那才好呐。可现在，他们惊愕地领悟到了，那个总公司是注定不会在他们被迫拍卖时假以援手的。

总公司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控告报纸犯了诽谤罪。《贝雷克报》没有应战；它收回了自己的指责，并且道了歉。对读者来说，这等于是说，这家有名的《贝雷克报》已经承认马科维茨是有罪的。

这期间，马科维茨太太却挺身而出，参加战斗了。她聘请古拉克西州长的舅子艾列克·克萨托担任她丈夫的律师。在克萨托的劝告下，她又雇用了第二个律师——亚柯斯·柯罗西。柯罗西是国会议员，全国闻名的布达佩斯律师，而且还是一位好斗的独立党党员。全市的人都知道，柯罗西来贝雷萨斯之前，收受了马科维茨太太电汇去的作为预约辩护费的五千福林。柯罗西只在贝雷萨斯逗留了两天，跟马科维茨太太和克萨托律师谈了几次话。

他也到拘留所里去看了马科维茨。然后，他拜访了古拉克

① 希马·叶斯洛艾尔，是犹太人在祈祷时和忏悔时开头说的话，意为："听啊，以色列呵，我们的主，唯一的主。"

西州长，杜诺夫斯基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和警察局长西蒙。在临去布达佩斯时，他会见了独立党的《贝雷克报》记者。关于马科维茨的案子的事，柯罗西对《贝雷克报》不置一词，他只是说，他是怀着一种多么崇高的感情，踏上贝雷克的土地，来到这个使所有真正的匈牙利人因缅怀高贵的拉科治而奉为神圣的地方的。

柯罗西走了。几天后，一个密探——马科维茨太太出钱雇来的——从布达佩斯来到了贝雷萨斯。当时，密探或者"秘密警察"，是青年人的理想人物。科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①风靡了半个世界；另外半个世界，也都已被科南·道尔的模仿者所占领，这些模仿者的惊人之作，都是些十个克劳采一本的小册子。侦探小说的作者越是没有才能，越是没有教养，他笔下的英雄的功绩就越是令人惊叹不止。一系列的尼克·卡特斯、奇克·卡特斯、诺波迪斯等等创建奇迹的人物，使歇洛克·福尔摩斯也迅速为之失色了。这些勇敢的英雄，彼此没有区别；一个个的脸都修得光光的，鹰钩鼻，山猫眼，是又高又瘦的超人，肌肉如钢，意志如铁。自然罗，镇上期待着的那个穿着普通的布达佩斯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超人罗，他来到之前，马科维茨家的孩子们就早已宣传开了。

布达佩斯来的密探——一个头发金黄、矮矮胖胖、两颊红红、不加虚饰的绅士——给安置在狮子旅馆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狮子餐馆里喝啤酒。许多人都失望了，有的甚至对这侦探平凡的外表和举动感到很愤慨。尽管如此，他对一些不存奢望的青年来说，却还是一种快乐的泉源。每当这个侦探上

---

① 指英国作家科南·道尔(1859—1930)写的《福尔摩斯侦探案》。

街时，二三十个孩子就会聚拢来，跟在这位布达佩斯来的绅士后面，在镇上奔跑，用手指指着他，兴高采烈地喊着：

“侦探来啦，布达佩斯的侦探来啦。”

有趣的是，这个布达佩斯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有时会向他的崇拜者威胁地扬扬拳头。

无论如何，有一次他可让他们如愿以偿啦。一天早晨，他上贾卡勃·格尔勃玩具商店去了，在那里买了一个绿色的捕蝴蝶的网。他手里拿着这个捕蝶网，从格尔勃商店一路回到他的旅馆里去。

“他来啦，他来啦，”孩子们喊着，但喊的声音没有平常那样响，仿佛那个绿色的捕蝶网已施展了奇术，在他们的声带上安了个弱音器。

这位侦探进入旅馆去已好久了，孩子们还围站在那里拼命猜测：这个捕蝶网在决定马科维茨是无辜的这件事上会发挥什么惊人作用。后来，旅馆老板拉约什的八岁的儿子拿着这个捕蝶网到外面来了，这才结束了这场猜测。原来，那个网是侦探买来送给拉约什的，这样，当他睡午觉时，拉约什就会到澡堂花园去捉蝴蝶，不会在旅馆走廊上大喊大叫了。

“蝴蝶——在十月里！这家伙算个什么侦探啊！”

孩子们把拉约什痛打了一顿，把捕蝶网踩烂了。

这个喝啤酒的侦探，在贝雷萨斯已使他那神圣职业的荣誉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时，正当人人不再指望他还会有什么重大作为时，他却干出了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他发现马科维茨的马房所以成为火焰的牺牲品，原来都是卡尔曼·阿兹泰洛斯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律师艾列克·克萨托在递交给检察院的诉讼事实摘要中，

提出了怀疑阿兹泰洛斯的下列几条根据：

(一)众所周知，阿兹泰洛斯系醋坊老板马科维茨之私敌。据称，彼之成为其敌人，昔因四年前华萨赫莱警察厅长于索莱瓦逮捕卡尔曼·阿兹泰洛斯，乃系与醋坊老板马科维茨赌钱之结果。

克萨托列举了十个能证明确有这种流言的证人。

(二)火灾发生前之下午，阿兹泰洛斯曾来至马科维茨马房之院子，与马科维茨之马车夫及小马夫晤谈三十余分钟。众所周知，阿兹泰洛斯经济情况甚为恶劣，然此时阿兹泰洛斯却予一名唤古古之小马夫以一袋烟草——显然不无原因。

这一下，《贝雷克报》可奇迹般地重新发现发言权啦，它写了一篇关于阿兹泰洛斯的大标题叫做《真正的罪犯》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第二天警察就逮捕了阿兹泰洛斯。

那个侦探又在市镇上待了两天，在狮子餐馆里喝啤酒。待到警察同样逮捕了古古之后，他这才回布达佩斯去了。

审　判

马科维茨、阿兹泰洛斯和古古的案子，将当着一个陪审团①的面进行审判。马科维茨的两个律师摆出了一个出色的阵线。克萨托，是政府党党员，谦逊地居于幕后；柯罗西，是独立党党员，因此，有较多的机会谈论自己和让自己被人们谈论。他告诉《贝雷克报》记者，贝雷萨斯的安德烈斯大街，就是放在布达佩斯也毫无逊色。他对狮子旅馆的广大听众赌咒发誓，说贝雷萨斯葡萄酒，是他有生以来尝过的最好的酒。柯罗西在《贝雷克报》的一个记者陪同下，于开庭前两天去了蒙卡契，在拉科治士兵的墓上献了花圈。

为阿兹泰洛斯辩护的肯尼兹博士，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律师。对马科维茨来说，他可能比柯罗西还要有用。肯尼兹到了吉普赛区，参观了几个住所，甚至给他们当中几个人照了相。他访问了贾诺斯·福蒂，差不多逗留了两个小时，跟许多砖厂工人谈了话。克萨托撺掇一位《贝雷克报》的记者向肯尼兹提问：他在贝雷斯看到了什么。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令人厌恶而又令人吃惊的事，"肯尼兹说。"砖厂工人和箍桶工人生活在奴役中。吉普赛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结核病的温床。"

---

① 陪审团，通常是十二人，由民间选出审理、评定诉讼事实，供审判长裁决。

肯尼兹的讲话在《贝雷克报》上登出来了，克萨托高兴得直搓双手。

“接受我的祝贺吧，夫人，”他对马科维茨太太说，“现在结局是毫无疑问了。”

在法庭上，事实证明，肯尼兹也是一个不中用的家伙。陪审员是由抽签决定的，起诉人和被告代理人都有权利，可对其中六七个人表示异议。肯尼兹很快就行使完了他的提出异议之权，这样，当抽签抽出砖厂老板柯霍特的名字时，他没有权利反对了。就这样，柯霍特坐在判决马科维茨-阿兹泰洛斯-古古案件的陪审团里了。凭着他的名气和狡猾，柯霍特成了陪审团中最有影响的一员。

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来的主要是些娘儿们，因此，这出戏的主角们的头顶上，飘荡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香水气。

审判长基茨布哈利尔身穿黑色大礼服；代理人柯罗西和克萨托也穿了一身黑衣。马科维茨穿的是簇新的、鸽灰色的、镶边的匈牙利服装，跟阿兹泰洛斯褴褛的灰衣服一比，显得格外惹人注目。古古穿的是粗绒衣服。

基茨布哈利尔首先审问对马科维茨提出的指控。第一个给唤到证人席上去的证人是约瑟夫·巴林特。父亲详详细细讲述了我们如何打牌；在打牌时，马科维茨说他肚子痛，到外面去了几次。

“马科维茨在外面待了多久？”基茨布哈利尔问。

“那我说不上，”父亲回答道。“人在打牌的时候，一个打牌对手走开了，就是几分钟工夫也好象过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听众发出了一阵笑声，基茨布哈利尔叫大家注意法庭秩序。

“马科维茨出去的时间，足够他去放火烧马房吗？”起诉人

问。

“我不知道，”父亲回答道，“因为我一点儿不知道，放火烧马房要花多少时间？”

“见证人以前是否注意到，马科维茨有肠胃病？”柯罗西问。

“是的。马科维茨要是吃了菜包子或者炸熏鱼，老是会闹肚子痛。”

下一个见证人是马科维茨的厨子，她证明那天晚上马科维茨晚餐吃的是菜包子，他还和他的妻子吵了架。马科维茨太太不允许他吃难消化的食物。

“他们吵架你怎么知道的？”起诉人问，“你在哪个房间里？”

“不，我在厨房里。可马科维茨先生和太太吵架，就是在园子的尽头也听得到啊。”

马科维茨的家庭医生赖斯曼大夫，证明被告一直不断在治疗低酸性胃病。

马科维茨的律师们让二十七个见证人列队来到了法庭上，这些人全部发誓说，在火灾发生前一星期，他们一共卖了五十二匹马给马科维茨，每匹的价钱是三百八十到四百五十福林。

“你把在火灾前一个星期刚买来的这些便宜马卖给了谁？”检察官问马科维茨。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的生意规模很大，我不可能记得每一个细节。可敬的皇家法院也知道，所有的卖契，连同我的一些帐本，全在我的办事处给烧掉了。我的损失可大啦。”马科维茨说完，叹了口气。

马科维茨的两个马车夫证明，阿兹泰洛斯在发生火灾那天下午，是来跟他们谈过话，竭力劝他们订阅一份“我记不起叫什么名字的”报纸。

"阿兹泰洛斯怎么说的？你们为什么要给那张报纸预先缴款，你们记不起那张报纸的名字了吗？"柯罗西问。

"阿兹泰洛斯跟我们说，"马车夫苏莫吉答道，"只有这张报纸讲真话；别的报都瞎说一气，是讨好马科维茨和柯霍特的。"

法庭上骚动起来了。

"这位见证人有没有看见阿兹泰洛斯把烟草给伊凡·奥勃洛克，也叫做古古的？"

"看见了。"

"阿兹泰洛斯跟古古悄悄地谈了话吗？"

"跟古古是没法谈话的——他只会咕咕—咕咕—咕咕地回答你。"

观众们欢叫开了。

"要是有人再吵吵闹闹，破坏审判的尊严，我警告你们，那我就要把大家都赶出审判室，"审判长基茨布哈利尔严厉警告道。

"跟古古是没法谈话的，"柯罗西继续盘诘马车夫苏莫吉，"可你是能跟古古讲话的呀。见证人看见阿兹泰洛斯谈话了吗？"

"看见了。"

"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话？"

"我没听到。"

"这个事实必须确定下来，"柯罗西对着基茨布哈利尔说。

"很不幸，对伊凡·奥勃洛克，就是被大家叫做古古的那个人，无法进行审问。"

"他可能是，"陪审员柯霍特插嘴了，"古古不会说话，但他会打手势表示意思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

“你能不能唤被告到证人席上来？”

基茨布哈利尔命令带古古来到刑事被告席前。

“你的证人来了，”基茨布哈利尔对柯霍特说。

“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在起火的那一天跟你说了些什么？”柯霍特拖长音调问古古道。

“咕—咕—咕—咕—咕，”古古哈哈直笑。

审判室里响起了一片笑声。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如果再扰乱审判秩序，我就要把大家全都赶出审判室。”

“被告，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们，阿兹泰洛斯对你说了什么的话，那就做手势告诉我们，”柯霍特以一种急切的口气说，一面递给古古一盒火柴。

一时间，这个点着四盏挂灯的审判室鸦雀无声了。柯霍特的诡计，使法官、起诉人和被告的律师都吃了一惊。

古古手里拧转着那盒火柴，高声痴笑了起来。

“我要求阁下，”柯霍特向基茨布哈利尔求助了，“指令被告奥勃洛克再次作证。”

“古古，”基茨布哈利尔说，把盘诘接了过去，“我指令你，用手势告诉法庭，阿兹泰洛斯想劝你去干什么事。”

古古嘻嘻笑着。

“我命令你，为了正义和你自己的利益，用手势告诉法庭，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叫你去干什么事。”

这一回，古古不笑了；他满脸困惑，茫然凝视着基茨布哈利尔。

“唔？”法官催促着古古，“尽你的责任吧。用手势告诉我们，阿兹泰洛斯要你干什么。”

古古慢慢地把火柴盒放进口袋里。他伸出一只手，一个劲地望着手掌心，好象要在那上面找出他该如何办的答案似的。他盯着自己的手掌，接着在手掌上啐了一口唾沫。猝然间，他跑到马科维茨坐着的地方，对着这位醋坊老板的下巴用力揍了一拳。他打得很重，马科维茨从板凳上倒在地上了。

基茨布哈利尔把又笑又叫的观众赶出了审判室。待到室内腾空了，法官判决古古犯了藐视法庭罪，罚他单独监禁四十八小时。接着他说时间已晚，宣布休庭，到次日早晨再继续审判。

第二天上午，起诉人对陪审团作了演讲。他一点儿也没有放过马科维茨，反来复去地列举了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实，但他的主要火力始终对准了阿兹泰洛斯。

“我们知道，卡尔曼·阿兹泰洛斯立志要烧毁这个世界，把人类过去和现在一切美好的、高贵的、纯洁的和神圣的东西，破坏殆尽。我们怎么能天真地相信，这个职业纵火者会单单不去火烧马科维茨的马房呢！”

吃中饭休息后，柯罗西第一个发言。柯罗西是一个高大魁伟、脸膛红红的人，因蓄着一把匈牙利式浓密的黑胡子而洋洋自得。他用一种深沉的、怪动人的男低音说话。

柯罗西叙述了马科维茨的生平，讲这个贫穷的犹太乡下孩子如何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匈牙利人。

“马科维茨是通过工作，凭他自己辛勤劳动变得富裕的；是匈牙利的土地，匈牙利的葡萄酒，匈牙利的歌，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

他大讲特讲马科维茨的事业。

“人们都管马科维茨叫醋坊老板，他出于谦逊，接受了这个称号。可是，实际上呢，马科维茨一生的职业和使命，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接受匈牙利的葡萄酒和马而进行斗争。马科维茨酿造葡萄酒，匈牙利的葡萄酒，这酒现在已经誉满全球。马科维茨经售马匹——匈牙利马。匈牙利的马已用金字载入世界历史，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骑着匈牙利马驰出亚细亚，穿过维列克隘口，来到我们美丽的匈牙利的。我们的祖先曾骑着匈牙利马，为寻求冒险而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北部来回奔驰，他们的足迹所至，到处引起了恐怖和钦佩。拉科治的勇敢的贝雷克士兵们，曾骑着匈牙利马，追击皇帝的外国雇佣兵。”

柯罗西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诉说火灾的事。

“陪审团若认为分不清罪犯和他的受害者，”他说，“那我是会生气的。”

已被基茨布哈利尔允许重新入场的公众，都对柯罗西的讲话拍手叫好。

肯尼兹博士作为一位辩护人，跟马科维茨的辩护律师相比，水平可就差远了。

“在匈牙利，富人犯罪，要穷人承担责任，”他说，“这并不是第一个例子。”

这话在公众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当他继续说下去时，这种不满已变成了明显的憎恨。他声称古古是“资本主义制度悲喜剧的牺牲品”。

“显然，”他说，“可尊敬的起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知识，是从报纸的漫画栏上得来的。因此，他把社会主义者叫做纵火者，我们可以原谅。”

基茨布哈利尔要肯尼兹把这话讲清楚些。

“如果阿兹泰洛斯要把所有曾经不公平、不正当地对待过他的人的房子都烧掉，那么半个国家都会冒烟了。”

这时，听众甚至已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但肯尼兹不去管他们。

“这一天会来到的，”他提高嗓门说，“那时，贝雷克州的居民们，会把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引为骄傲，就象他们今天正当地把泰马斯·艾舍引为骄傲一样。”

基茨布哈利尔虽然保持着呆滞的镇静，但公众还是对肯尼兹发出了侮辱性的诘难。

马科维茨没有提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阿兹泰洛斯显然是病了，在审讯时一直呻吟得很厉害，他只简短地讲了几句：

“我打童年时代起，就熟悉贝雷克州的上流社会。我从来也不对他们抱任何希望；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实在太早了！”

陪审团退席时，外面已经天黑了。陪审团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作出了决定。

快近半夜时，工厂老板柯霍特传达了陪审团的决定。

我以人格和忠诚宣布：贝雷萨斯陪审团，根据审讯中提供的证据，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唯正义是从，对戴维·马科维茨、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及伊凡·奥勃洛克即古古之刑事案件，作出如下判决：

(一)对于戴维·马科维茨是否犯有被控罪行之问题，已由陪审团六人以上表决否定。

(二)对于卡尔曼·阿兹泰洛斯是否犯有纵火罪之问题，已由陪审团六人以上表决肯定。

(三)对于伊凡·奥勃洛克，即古古，是否犯有被控罪行之问题，已由陪审团六人以上表决否定。

肯尼兹急得跳起来了。

“尊敬的皇家法庭！”他大声喊道，“陪审团的决定有个大矛盾。如果古古没有罪，如果他没有纵火烧马房，那么，阿兹泰洛斯也不可能有罪啊。”

十五分钟后，基茨布哈利尔审判长念了判决书。他宣判马科维茨和古古均未犯有受控之罪。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则因犯有纵火罪而被判处徒刑七年和褫夺公权十年。公众对这判决都鼓掌喝彩。

马科维茨获释后两天，杜诺夫斯基市长设宴招请了醋坊老板。席间，西蒙警察局长提议为马科维茨干一杯。

马科维茨开除了古古，古古搬到费克斯凯叔叔那儿去住了。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被押上火车，送往伊尔拉瓦监狱去时，他已患了出血症。宪兵们交给伊尔拉瓦监狱长的是一具他们的囚犯的尸体。

当阿兹泰洛斯的死讯传到贝雷萨斯时，砖厂工人们举行了三分钟停工。索莱瓦工厂的工人们为悼念阿兹泰洛斯而停了五分钟机器。

斯拉蒂纳盐矿里，在几百英尺深的地底下干苦活的矿工们，都放下他们的鹤嘴锄，听了贾诺斯·福蒂所作的关于卡尔曼·阿兹泰洛斯生平的悼念演讲。

胡扯淡

马科维茨获释那一天，母亲上布达佩斯参加西班牙外婆的葬礼去了。母亲是我外婆的继承人。遗产是三十六件西班牙衣裳。当时若有一笔有用一点的遗产，已经沦为赤贫的父亲就可以拿来派大用场了。

名义上，父亲仍然是一个葡萄园和一幢房子的主人；实际上，他已既不拥有葡萄园，也不拥有房子，甚至我们睡觉的枕头，也已不是我们的了。银行没有把我们撵到大街上去，这我们得感谢柯莫尔和他的政治计谋。其原因是，这位银行营业主任打算于下次国会选举时，站在政府党的讲台上反对乌拉依。所以，他不想叫父亲拍卖家当，因为镇上许多人，尤其是蒂萨哈特的村民们，仍然很喜爱父亲，虽然他已经孤独无依，潦倒不堪。那时候，无痛拔牙的方法已经到处流传，而柯莫尔对父亲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马科维茨来了，他身穿一件藏青色的新衣和一条不扣钮扣的裤子，脸上是一副前所未见的严肃表情。这位醋坊老板已不是我们的邻居——他出狱后就搬到安德烈斯大街去住了。只有他的办事处，连同一个新造的、比原来那个更大的马房，以及那个醋作坊，还留在波克斯坎街上。

这是马科维茨四个月来第一次来访。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一谈，巴林特。我要跟你单独

谈谈。”

父亲把客人引进了吸烟室。

“请坐，抽支烟。”

马科维茨站着，也没有点烟。

“前几天，”他以一种办公事的口气说，“我的朋友柯莫尔主任拿一件伤脑筋的事来征求我的意见。这是跟你有关的事，巴林特；关于你欠债的事！柯莫尔告诉我，你欠银行的钱，已超过了，或至少已相当于你的葡萄园和你的房子的价值。而你甚至连利息也不付。”

“我哪里去搞钱呀？”父亲问道。

马科维茨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继续说下去。

“柯莫尔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正直的人。因此，他不想叫你进行拍卖。柯莫尔是一个很厚道的、通情达理的人。”

父亲开始稍微透了口气。

“如同我说的，柯莫尔是一个很难得的厚道人，”马科维茨继续说。“可是，很可惜，他也不能只顾人情啊。他还得对银行负责。因此，他来征求我的意见，如何他才能两头都照顾到。我不仅向他陈述了我的意见，而且愿意帮个忙。因为我不仅是柯莫尔的朋友——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朋友啊，巴林特。”

“谢谢你，戴维，非常感谢。我一直知道——”

父亲没有说他一直知道什么，因为马科维茨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想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吧？”

“不想，不想，”父亲急忙说。

“要避免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看你是不是出售你的葡萄园和你的房子了。我愿意把两者都买下来。你对付银行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付给你的钱，够你偿还全部欠债。不幸的是，你拿

葡萄园，尤其是拿房子做抵押借的款子数目很大，因此，另外我就无能为力了。不过这件事我是愿意办的。”

“那我靠什么过活呢？还有我的一家人呢？”在震惊得静默了几分钟后，父亲问道。

“这我也想到了。葡萄酒销售协会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仓库管理员。你知道我们的仓库吧？”

父亲点点头。马科维茨谈起了那个酒仓——贝雷萨斯葡萄酒是在那里装瓶后给贴上“托凯葡萄酒”的标签的。

“嗯，在我的推荐下，你可以获得管理员的职位。你会获得的。不错，工资有限——但是很稳当。”

要不是母亲说“不”，父亲十之八九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我们的财政崩溃，唤醒了母亲长期沉睡的精力。她上银行去查明了我们共欠多少钱，未付的利息又总共有多少。是她去找了律师，是她去请了一位专家来估价我们的葡萄园和房子。只在她确信我们是无法防止财政灾难时，她这才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把我们的一切所有物全部卖给马科维茨。醋坊老板把买款直接交给了银行。签具了卖契后，父亲说：

“上帝给的，上帝取走了。”①

“你父亲买的，你喝酒喝光了，”母亲一句反驳，把我父亲——这个百倍聪明的犹太教士的孙子——虔诚的听天由命的心情，全给糟蹋掉了。

母亲决定，我们将搬到布达佩斯去住。她给福洛普舅舅写了信，请他为我们租一套房子。

父亲按照母亲的明确愿望，给乌拉依写了信，请求这位他支

---

① 这是犹太人失意时常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口头语。

持了十八年的贝雷萨斯的议员，帮他在布达佩斯找个工作。父亲想写："一个我所胜任的工作"，但母亲坚决反对。

"如果你要求找个你所胜任的工作，乌拉依会让你到那儿去当个酒味品尝员的。"

"那才是我合意的工作呐，"父亲回答道。

我瞒着父母亲，也给布达佩斯写了封信。我在那里有一个熟人——贾诺西大夫的女儿杰拉尔丁。八年前，她用她那双细长的腿在华加家的花园里蹦呀跳的，现在，她那双腿已经印上了全世界赞美的图画明信片啦。杰拉尔丁已变成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演员之一。八年前，她曾经问我，我的眼睛里是不是涂了鞋油；现在，有一种鞋油已由她的姓氏命名，叫做"贾诺西鞋油"。

我们接到的第一封信，是一个我们并未给他去信的人寄来的——美国的费迪南。费迪南舅舅劝我们上美国去，并且说他会给我们写几封介绍信。接着，艾尔莎舅母来了信，说他们已为我们租下一套房子。没多久，我收到杰拉尔丁的来信。她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她身穿一套匈牙利农家服装的肖像的明信片：

你若来布达佩斯，小巴林特，来看我吧，我会给你一张戏院的免费入场卷。

杰

乌拉依的回信过了好久才到，但终于来到了。

亲爱的巴林特先生：

知悉君因财政问题被迫离开可爱之贝雷萨斯，深感遗憾。抵布达佩斯后，如求业无门，可便中前来我处或电话告知。鄙人之忠告或对君有所裨益。

艾姆列·乌拉依谨启

“简直是胡扯淡！”母亲说着，把乌拉依的来信撕了个粉碎。“你不用怕，”她对父亲说，“要是七十万人能设法在布达佩斯活下去，我们也不会饿死。我们会拉扯大我们的孩子的。”

我们在贝雷萨斯要办的事，就只剩下安排马鲁莎奶妈和米科拉了。马科维茨雇了马鲁莎去给小马夫和醋坊工人们做饭。米科拉退了学，在马房里干活了。

“他会成为一个马车夫的，象他父亲一样，”马鲁莎说。

“要是我们的景况好转了，我们就来叫米科拉到布达佩斯去上学。”父亲答应说。

我们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的。我们的好多家具，早已卖掉用来维持生活了。我们正准备动身时，我在街上碰到了特丽兹·马科维茨。她看上去好象一只极乐鸟，一个小洋娃娃。她的法国女教师，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妇人，陪着她从街上走了过来。

“你觉得住在安德烈斯大街，比你是我们的邻居时更舒服吗？”

很明显，特丽兹对我的问话生气了。

“巴林特先生①，”她思考了一下，说道，“请不要见怪，我提醒你一下：有教养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互相称呼‘先生’和‘小姐’②，也可能称呼‘夫人’③。我的名字叫马科维茨小姐。”

那位法国女教师优雅地点点头，很赞赏马科维茨小姐这一席匈牙利语和蹩脚法语相混合的教训性的话。我用匈牙利语和罗斯语的混合语言作了回答。夫人对我说的话也赞赏地点点头，其实，如果她懂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她准会昏过去的。

---

①②③　原文是法语。

当时我心里想，以后再也不会有幸遇见这位醋坊老板的女儿了，但是我错了。

马科维茨小姐可不是个记仇的人。大概十年之后，她主动来看望我了——在革命法庭的本部。她打扮得就象一个在布达佩斯舞台上演农妇的女演员。

她用匈牙利语和罗斯语的混合语告诉我，她来看望我，是因为她向来很高兴会晤童年时代的好友。她顺便要求我为她父亲帮个忙。那时，马科维茨已不酿醋、造葡萄酒，也不做马生意了；他蹲在革命法庭的监狱里。这里，我顺便说一下，革命法庭的本部就设在卡尔曼·阿兹泰洛斯大街上。

“你记得吧，”特丽兹说，“父亲是一向富有社会感的。他只要办得到，随时都会帮穷人的忙。而现在，真想不到，他竟被控敲诈勒索、投机倒把、食物掺假、私套外汇、传播谣言，还有——简直说不出口——他们说他……跟小女孩子……确实，排犹主义者把我可怜的敬爱的父亲、你的善良的马科维茨大叔可坑苦啦。”

我字斟句酌，很得体地回答了马科维茨小姐。这位农家打扮的特丽兹一听，还是昏过去了。她所以会晕倒，大概因为有些字眼，比如说绞首台吧，不管你说得多么婉转，总还是具有一种强烈的气味的缘故。

我们动身前两天，泰马斯·艾舍来看望我们。他带来了一升葡萄酒。他跟父亲喝了葡萄酒，然后就走了——告别的话也没说一句。

费克斯凯叔叔、马鲁莎奶妈和米科拉送我们到火车站。费克斯凯送了母亲一束野花，没等火车到站，他就不辞而别了。

在我上车前，米科拉象一个大人似的，跟我紧紧地握握手。

“再见，格查！”

马鲁莎奶妈没命地哭叫，一头倒在地上，紧紧扳住了火车的轮子。两个铁路员工用尽力气才把她拖开了。

火车开动时，天晓得从哪里来了个古古。他一气儿跟着火车跑，向坐在窗旁的巴林特一家喊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这个由牧人萨斯用他发现的一箱金子建造起来的市镇。

这是我第一次坐三等车，跟四十个人一起挤在一节又小又脏的客车里。以前，我也曾经到穷人中间去过，那是因为我愿意去。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我的位置。这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

当时，我大约十四岁——已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了。我知道，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结束，我面对着的是……

当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去追求的是种什么样的生活。要是我猜得到，我将经历的事件，比我心爱的小说中最勇敢的英雄们的生活还要令人激动，还要重大；要是我想象到，我将经受的风暴，要比我敬佩不已的历史上的英雄们所经历的强大一百倍——要是我仅仅是感觉到等待着我的某些生活与斗争，那我就会喜不自禁了。可实际上呢，我却在焦虑地思考着那捉摸不定的未来。

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不快的事。由于我们忘了带些食物，父亲在沙托拉尔焦赫莱站上，下车去买了点吃的东西。他带回了几个煮蛋和一袋苹果。

“我已向新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他宣告道。

“你干了什么事，约斯卡？”母亲想知道。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了一杯啤酒。生活不容易啊！”

母亲未加评论。

父亲在去布达佩斯的一路上也都缄默不语。生活已使他受了创伤。

我们上午十点钟动身，晚上八点钟到达。艾尔莎舅母和卡罗莱在车站接我们。

那个其大无比的、玻璃围绕的火车站，在一百盏弧光灯映照下，一片辉耀。有的列车，隆隆地开进站来；有的列车，汽笛长鸣地驶出站去。机车的隆隆声，拥挤的人群的喧嚷声，哭的，笑的，在火车站里，音响扩大了好几倍。

“搬运工！搬运工！”父亲高喊着。

“我们自己拿得了嘛，”艾尔莎舅母说着，提起了两个大旅行袋，“你别浪费钱了。”

我们离开火车站，步行到巴罗斯广场。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孩子们，”父亲说，朝那个闪亮的火车站点点头，“这个美丽的车站就是这个铁人建造的。”他指指故世的加波尔·巴罗斯大臣的雕像。

“造这个车站时，”我们等电车时，父亲说道，“人人都笑加波尔·巴罗斯。布达佩斯人吃吃发笑，‘这么一个小城市，何必要这样大的火车站？’而现在，孩子们，布达佩斯人可都在说，‘象这样一个大城市，造这样一个小的火车站，多笨哪。’孩子们，要是你们观察生活——”

“看住行李，妹夫，”艾尔莎舅母警告道。

我站在那里，口袋里装着我在贝雷萨斯中学成绩优异的毕

业文凭，一只胳膊挟着费伦茨·拉科治的画像，另一只胳膊挟着穿红衬衫的加里波第的画像；我昂头凝望着被一百万盏灯火映照着的、一片通红的无星的天空，觉得我们宛如站立在烈焰腾腾的、上百个村庄的中间。

第　二　部

林　中　人

开 头 几 天

小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吃什么以及我可以吃多少。后来，大一点了，读了几本非同一般的、令人激动的书，懂得了一些世事，我发觉吃东西毕竟并不十分重要——事实上，跟那些重大而深远的生存问题相比，吃是微不足道的，几乎是可笑的。后来，到了十四岁，当我来到布达佩斯时，我却又回复到我童年时代的观点了。

我们不得不离开故乡，是因为父亲破了产，而我们搬到布达佩斯来，只是因为母亲坚持认为，在这里人人都能谋生过活。事实证明，一般地说，母亲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在布达佩斯的确住下来了——这就是说，还过得下去。

母亲的哥哥福洛普·西维拉大夫为我们租的那套房子，实际上是不够住的。房子太小了，我们觉得很不舒服，而对我们的财力来说，又太贵了。这套房子包括两个小间和一个厨房。一上来，我们孩子们对那套便利设备，电啊，自来水啊，都感到很高兴。当父母亲出门去找工作时，我的小妹妹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开着电灯，我的大妹妹会无缘无故地拧开水笼头。

父母亲睡一间，两个妹妹睡一间；我睡在厨房里。起初，说来好笑，我觉得这很丢脸；后来，只是感到不舒服。厨房的气味搞得人心烦意乱，不过更糟的，还是清晨家庭妇女们在院子里打地毯的那片喧闹声。

天一亮，院子里就吵开了，因此，我也一清早就起了床。这是夏季，学校放假了，我有的是整天游荡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这个城市进行欣赏。可是这样，我也很快就明白到了，不受约束的享乐，多么快就会使人感到腻烦啊。起初，那许多疾驰的汽车，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欢乐的泉源。华丽的橱窗陈列，使我看得欣喜若狂。想到在这布达佩斯，我们有那么多人，我感到说不出的骄傲。很可能，如果我有点儿钱，能使我不光是用眼睛欣赏布达佩斯，那么，这种令人愉快的感觉，可能还会更加持久一点。事实上，我的欢乐很快就变成了憎恶，即使是一块最美好的巧克力蛋糕吧，你若是只能看，不能尝，也会变得讨厌的啊。

小时候，乡愁这个词，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现在，我才熟悉了这个字的含义。这是一种丝毫也不令人愉快的感觉。看到布达佩斯住着这么多人，我更加体会到了我的寂寞。

我们那套房间，虽然靠近市公园，我却总是往相反的方向跑。市公园里的树木，使人产生一种对喀尔巴阡山森林的怀念，就象一张恶意扮装的鬼脸，使人想起一张遥远的亲爱的面孔。我倒是更喜欢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不喜欢公园里那些矮小的树木。这些楼房都不是仿制品；屹立在那里的每一幢房子，都又坚固，又宽敞，又沉着，象一棵棵百年老栎树。房子多得数不清的布达佩斯，活象是一座森林。一个人要是闭上眼睛，带一点儿幻想，他就能在电车、汽车和马车的喧闹声中，听到夜晚的森林的声音——那时，北风的手指扯着古树的顶梢，把幼树折成了两段。我承认，意识到这种相似，是需要一点儿想象力的，但是从那以后，我却看见了甚至需要更大的幻想的东西。在乡愁和年轻人的奇想的萦绕下，甚至在熔化的沥青的臭味中，我也闻到了在森林中燃烧的木炭的气息。

我闭着眼睛，靠着一根煤油灯柱，站在那里。当我听到有人在唤我时，我想，我是在做梦吧；不过我还是睁开了眼睛。

“是你啊？格查·巴林特？”

一时间，我认不出这个跟我说话的金黄头发的高个子是谁了。他那绣花的乌克兰衬衫，垂到肩上的长发，以及修得象耶稣那样的胡子，都象是喀尔巴阡山人，可是，他那时髦的鸽灰色裤子和运动鞋，却又清楚表明他是这个城市的人。

“你不认识我了？”

待起初的惊奇消失后，我知道走到我身边来的这人是艾列克·杜迪克斯，索莱瓦的天主教牧师的儿子。我从来没跟这牧师的儿子说过话，因为在索莱瓦，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排犹分子，也不欢喜匈牙利人。他在布达佩斯学法律，只在暑期里才回家到索莱瓦来。他在布达佩斯大学的斯洛伐克和罗斯学生中间扮演着一个很有影响的角色。他因为给报纸写了篇论文，曾被判处过八天监禁。

住在索莱瓦的犹太孩子，——大部分匈牙利孩子也一样——都对艾列克·杜迪克斯敬而远之。正因为如此，我九岁的时候，有一天，为了表示我并不怕他，我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哈哈大笑，避开了我，结果一脚踩进了一个水坑。之后，他一看见我，就摘下他的帽子，向我打招呼了，虽说他比我足足大十岁。这次却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

“你们干吗搬到布达佩斯来住了？”我简短说明情况后，他问。

“我们破产了，”我答道。

“那算什么，”杜迪克斯说。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安慰我呢，还是嘲笑我。“去跟你的父亲说，”他继续笑着说道，“在布达佩

斯也可以酿酒嘛。你急急忙忙要上哪儿去呀，巴林特？口信还没有说完呐。跟他说，在布达佩斯，掺假的酒，比在索莱瓦还要赚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好，祝你幸运！”

我凝望着杜迪克斯渐渐消失的背影，站了一会儿。他在过路人当中很显眼，倒不仅仅是因为他那独特的衣服和头发的式样，而是因为他比其余的人足足要高出一个头。他的身影早已看不见了，可我仍能看见他金发的脑袋。

吃中饭时，我详细讲述了这次奇怪的邂逅。父亲心情很不好，当我向他转述杜迪克斯的口信时，他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他显然正想说点什么，也许正在准备一个很长的故事，可他还没开口，有人在敲门了。

“进来！”

门开了一道缝，因此我们看不见站在门口的是谁。一只手，抓着一个三升装的酒瓶，悄悄从那道缝里伸了进来。瓶里装的是红葡萄酒。父亲拉开了门。

“各位好哇！”美国的费迪南舅舅喊道，把那瓶酒竖立在桌上。费迪南兴高采烈。

“我希望，你住的这个小窝窝是你自己的吧，老弟？”他喝了第一杯酒后，问父亲道。

父亲嘎嘎地笑了。

“你一定得把它买下来！听我的劝告，老弟，买下来！”

“要是你能随着劝告，同时给我一点钱的话——”

“钱？为什么？用钱买，是个傻子也会买一幢房子啊。买下来，不用钱，——那才是艺术哪！”

“我可从来不想让人家把我看作是艺术家，”父亲说。

“我却是这样的人，”费迪南敲着桌子叫道。“是的，我是这

样的人！一个艺术家，在作了许多摸索并经历了许多失败后，终于找到了一件配得上他的工具啦：刷子，笔……倒满，老弟！”

“你来以前，已经喝过酒了，费迪南，”母亲插嘴了。“你已喝得受不住啦。”

“你老是错看我。你一向对我不公道，伊莎贝拉。我没有喝过酒。或者，说得更正确点，我没有喝得受不住——我喝的只跟我不得不交结的那一伙朋友一样多。要是我喝醉了的话，我发誓，那也不是喝酒喝醉的。我是叫幸福和快活陶醉了。我又高兴又骄傲，因为——告诉你吧——我已发现了哥伦布的那个鸡蛋①。信不信由你，那个鸡蛋是木头做的！是的，木头！”

父亲和我一起把费迪南搬到沙发上去睡。他一直到后半夜才睡去，睡梦中还咕咕哝哝地讲着梦话：“买这房子，妹夫！买下来，买下来。”

待他醒来了，洗过了脸，他的神情竟惊人地严肃。

“我知道，”他说，“我们家的运道逐渐衰落了。我是最后的希望，这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相信我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他告别时，一一吻了我们大家。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明天再来看你们，”他答应说。

差不多有两年，我们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儿。

---

① 哥伦布一四九二年发现了新大陆后，西班牙一些心怀妒忌的贵族说：“那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事，新大陆本来就在那里，只要越过大洋，就可发现的。”一次宴会时，哥伦布拿起一个鸡蛋，问他们能不能使鸡蛋直立起来？他们试了几次，鸡蛋都立不住。哥伦布把鸡蛋的一端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立住了。他说：“这也是挺简单的事嘛，有人做了样子，人人都会做了。”

第　一　年

父亲找工作找了好久，找了十一个月，也没找到。在这整个期间，他只有一次搞到了一个工作：在大马路的一家电影院里当了三天引座员。要不是他偶然碰到了蒂萨哈特区的国会议员艾姆列·乌拉依的话，他也许还会在那里干下去的。这位国会议员带了一位漂漂亮亮、神采奕奕的年轻太太；乌拉依认出引座员原来就是我父亲，以前在贝雷萨斯搞过竞选活动的人，就同他打了招呼。他跟我父亲说了话，临走时，握了手，在我父亲的手掌里塞了一张十福林的钞票。

过了几分钟，父亲才领悟到乌拉依给了他十福林。待他终于明白过来时，就大衣也不穿，帽子也不戴，一头冲进了白雪覆盖的大街，去把钱还给乌拉依。他在街上来来去去走了好一阵，却始终没有找到乌拉依。

父亲没有回电影院去；他回家了。一路走回家来，他的颤抖的手紧紧捏着那张十福林的钞票。他穿过几条街道，来到终点时，已气喘吁吁，浑身湿透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踱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说明他为什么在工作时间离开了电影院。

第二天清早，他叫我去告诉他们，他不回去工作了。我还得去拿他的帽子和大衣。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我到安德烈斯街上乌拉依的别墅前拉响了门铃，把装着一张弄皱了的十福林钞票的一个封好的信封交给了看门人。然后我就回家了。在我保

证已把钱退回去之前，父亲一直不吃不喝。这时，他才慢慢地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吃了前一天剩下的晚餐，喝了我从酒店里买来的半升葡萄酒。

两天后，父亲病了。他患了肺炎。他卧床不起二十九天，人老了十年。

父亲失业，我们全靠母亲的收入过活。母亲搞的是缝纫。她不仅仅搞缝纫；她还会搞设计，她设计的衣服，是我去世的外婆的西班牙服装和喀尔巴阡山的罗斯妇女星期天和节日里穿的那种衣服的混合物。雇母亲干活的那家拉约什·科苏特大街上的成衣店，夸起人来是很慷慨的，付报酬却很吝啬。

“巴林特太太，”店老板施瓦茨对我母亲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哪。”

赞赏激起了母亲的雄心壮志：不是她的艺术家的雄心壮志，而是她想攒点儿钱的欲望。除施瓦茨先生不断赞赏之外，她的朋友们的意见也鼓励着她，他们老是对她说：“巴林特太太，如果你有一点儿钱的话，你就会挣好多钱呐。”

母亲一点儿钱也没有，因此，她也就不可能挣好多钱。她得弄点钱来自己开业做生意。待明白到我们不能为这件事在布达佩斯搞到钱的时候，父亲就给美国的费迪南写了封信，向他求助。费迪南来了回信；他没有寄钱来，却讲了一些鼓励的话：

> 亲爱的妹妹，你别为了替他人缝纫而折磨自己了。过一两个月，也许只要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买下你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把它交给你们。那时，你就不用为他人缝纫了；最好的裁缝将要为你做衣服。当然，我说的不是布达佩斯最好的裁缝，而是指巴黎最好的裁剪师。

“费迪南发疯了，”母亲说。

“如果不肯借钱给我们的人就是发疯了，那全世界岂不是都发疯了吗，”父亲说。

这样，母亲就一直为施瓦茨先生干着活，得到大量的夸奖和低微的收入。我们节衣缩食，才能勉强应付，让我继续上学。但是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布达佩斯的那套房子。父亲越是贫穷就越骄傲：他到处跟人家说，我们要搬家，是因为这套房子对我母亲的工作不合适；这里光线不足，他解释说。

我们从布达佩斯搬到了维佩斯，住在奥斯街的一幢平房里。布达佩斯的维佩斯，就象贝雷萨斯的吉普赛区：住在那里的都是些工作艰辛而生活朝不保夕的人。但是，拿维佩斯比作吉普赛区，就好象拿一百万人的首都跟一万人口的种植葡萄的贝雷萨斯相比一样。华西路上奔驰的电车，把维佩斯和布达佩斯连接在一起，这条十一公里长的大街，两侧都是工厂。维佩斯是个工业市镇；镇上住的几乎全是工人，他们不是居住在肮脏的分租房子里，就是居住在分租房子中间被废弃的棚屋里。早晨，当工人们向施列克·尼古尔逊机械厂、沃尔夫纳尔皮件厂、奇诺因化工厂或者电厂走去时，街上挤满了一股急匆匆的人流。白天，烟雾沉沉的维佩斯街上阒寂无人。傍晚，成千上万又累又脏的男男女女，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他们阴郁的平房走去。当多瑙河吹来的风，把工厂烟囱上沉重的黑烟压下来的日子里，狭窄的街道就笼罩在一片幽暗中，只有那些阴森森的公寓房子，还吓人地露在外面。它们不是绿叶满株的栎树，而是赤裸裸的警报信号。

我们搬到维佩斯后，父亲在布达佩斯找到了一个工作。这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开始打算搬回布达佩斯去住，那样一来，父亲就不必每天乘两个钟头的电车了。可是，我

们毕竟没有搬回布达佩斯。在父亲带回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把那包在一张粗糙的纸里、还装饰着一支红红的荷兰石竹的钱交给母亲时，母亲已不得不停止工作了。

几个月来，母亲一直抱怨她的眼睛痛。她正在用眼药水治疗。两个星期以来，她在灯光下已不能工作。就是大白天，她也不得不时常放下她的活儿。在这种时候，她会老是狠狠咒骂她的眼睛，硬说她用不着眼睛时，眼睛显然好好的；现在少不了眼睛时，眼睛却来调皮捣蛋啦。后来，母亲发觉，就是大白天，她也不能干活了。她干活时即使眼睛痛，她也是不管的；可是当她的视力开始衰退时，她不得不加以注意了。

福洛普舅舅陪她到布达佩斯的一个眼科专家那里去。大夫彻底诊察了她的眼睛，把他的诊断用拉丁语告诉了舅舅。福洛普舅舅送我母亲回到了维佩斯家里，才把眼科专家的话告诉她。

"很可惜，但你千万不能再搞缝纫了，伊莎贝拉。至少暂时不能再搞了。"

"那不行。我们靠什么过活啊？"

"如果你不丢开缝纫的话，你会变瞎的。别哭，我求求你，别哭了，哭对你的眼睛没有好处。"

从那以后，母亲不是用缝纫，而是用哭泣来损毁自己的眼睛了。父亲到那家成衣店去，告诉他们我母亲已无法工作。一上来，施瓦茨先生怀疑母亲是否接受了一家跟他竞争的商店的活儿，很是生气。待知道我母亲已丧失工作能力时，他平静下来了。

"真可惜，太可惜了，"他说。"我们正打算给她加工资哩。"

就这样，当父亲找到了工作、我们能够从维佩斯搬走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过一种甚至更加节俭的生活了。

我忙着寻找愿意请我去当家庭教师的学生。

拉科治在布达佩斯

父亲终于找到工作了，如同他所说的“我所胜任的工作”。他在布达佩斯一家大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个侍应生的职位。在这个咖啡馆里进出的，一般都是些作家、记者、演员、画家和雕刻家，以及一批急于想被人们看作是作家、记者、画家和雕刻家的人物。

你们若不是布达佩斯本地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侍应生吧，那就听我道来。

在我现在描述的那个时代，当一个顾客走进布达佩斯的一家大咖啡馆时，一位衣冠楚楚、态度端庄的绅士，就会向他深深一鞠躬，说：“见到你很高兴。”一上来，顾客心里会想，是碰到一个熟人了吧。待到顾客搞清楚，那个衣冠楚楚、态度端庄的绅士，并不认识他的同伙中的任何一个人时，那绅士已在鞠躬欢迎第十伙来宾入座了。要是顾客是一个外省来的土包子，他心里会想，这位端庄的绅士莫不是认错人了吧。要是他是一个城里人，那他立刻就会知道，他是在跟谁打交道，他会对这招呼不加理睬，或者开玩笑地说上一句：“晚上好哇，迎宾伯爵。”

迎接到达的顾客，对离去的顾客道声再见，这就是这位衣冠楚楚、态度端庄的绅士，这位咖啡馆的“迎送宾客者”的责任、专业和行当。如果这位“迎送宾客者”是个热心人，他会殷勤地向顾客问上一两句。譬如说，他会问火腿是不是太肥了，或者，香

槟酒是不是冰得够冷了。父亲作为一个侍应生，表现得特别的热情和起劲。他不仅向顾客们提出一连串询问，而且还不管他们是否感兴趣，提供解释和消息。有几个常客[1]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位新来的侍应生是个很有创见的人，他们会连哄带骗地要我父亲谈一谈。在坐在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里的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顾客听来，父亲讲的故事都带有一种异国情调的吸引力，如同布达佩斯的酒坊老板听到葡萄可以做葡萄酒的消息一样。要是顾客们情绪好，并且有钱，他们会拖住父亲一起喝一杯，鼓励他讲讲他的故事。父亲就象以前在贝雷萨斯那样喝酒谈天了。所不同的是，以前他是拿葡萄酒请客，来吸引听他讲故事的人；现在，他是用讲故事来为自己挣点儿酒喝。

他的听众当中有一个名流雅士之类的人物，此人把我父亲写进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使我父亲永垂不朽了。他象大开恩典似地以一种高级的挖苦口吻描写这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一个热情的匈牙利人，一个在这电气时代仍效忠于生活在两百年前的费伦茨·拉科治的热情战士。在布达佩斯一家咖啡馆里有一名"侍应生"，他竟然把一年中的季节分为"葡萄铲草的时节，绑扎葡萄藤的时节，葡萄收获的时节，当葡萄酒发酵的时候……"这一点使作者感到乐不可支。

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父亲作为一个侍应生的积极性就降低了。他不肯再讲任何故事；他生气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嘲弄了他，而是因为他们竟胆敢说拉科治是个过了时的英雄。通过那篇小说发现了父亲的老主顾们，天天邀请这位老人去喝点葡萄酒，希望他再讲点象他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那种稀奇古怪

---

[1] 原文是法语。

的珍闻。就这样，在这电气时代，却给父亲提供了为拉科治而受苦的机会；因为对他来说，拒绝葡萄酒自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父亲却宁愿拒绝葡萄酒，也不愿拿拉科治来赚钱，这也是很自然的。他既不喝酒，也不讲故事，只是避免冒犯顾客——因为那样的话，就会丢掉他的饭碗。他说谎了。

“我已经发过誓，从此再也不沾一滴酒了，”这话他反来复去地讲，直讲得他自己都相信了。

他在家里也不再喝酒，即使他有钱买酒也罢——那是非常难得的。毕竟，一个侍应生的月薪，总共只有五十福林，或者如他们在布达佩斯计算的，一百克朗①。我的贡献是一个月二十四克朗，那是我给两个同学私下教课赚的钱。费伦茨·拉科治使我找到了学生——是的，是费伦茨·拉科治。

我在学校里的头几个月是很不幸的。同学们都把我当作嘲弄的对象，但他们又并未放肆到让我知道他们的看法。我是一个离奇古怪的人物，穿的是乡下衣服，讲的是贝雷克方言。我穿的乡下衣服很快就破烂了，可方言却仍旧保留着。即使今天，我一激动，我也还会把O的长音发成 ao 音。我不能领会布达佩斯的土语，而这就使我显得更加滑稽可笑。要是同学们说“小姐儿”，我决不会想到那是指姑娘，而总认为是指长羽毛的小鸡。在我听来，“胸粉”的意思是一种药，而不是兜胸一拳。而当他们谈到兜胸一拳时，我又不知道那是借钱的意思。因此，我在布达佩斯的孩子中间是个局外人。而充当一个局外人，那是十分悲哀的。

不过一个人历经坎坷也有坎坷的好处，这种痛苦也有其好

① 克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国银币名，等于一百赫勒(小铜币)。

的一面。为了让那些取笑我的人看看我是怎样的一块料，我刻苦用起功来了。几个月工夫，我在班上已成了拔尖的学生。当校长或者督学到班上来时，我老是给唤起来回答提问。

区督学来校视察，教师们甚至比学生还要怕。布达佩斯的中学督学是安琪儿伯特·马齐神父，一个天主教牧师和臭名远扬的吃人者。我搬到布达佩斯来以前几年，这个可怕的家伙来视察了一趟，两个教师给调到了外省，一个给退了职。当大家知道，这个吃人者——他因为穿一身牧师的黑罩袍和他的教名而被孩子们取了个黑天使①的绰号，——第二天就要来视察时，那种惊惶不安的状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正在上历史课，黑天使走进教室来了，实际上，当这位被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的客人跨进门来时，再过二十一分钟就要摇下课铃了。不难推测，将会有三个孩子，或者最多四个孩子，要给唤到这位审问官的面前去。督学简略地问了声好，孩子们就僵直地站立在那儿，悄悄地祈祷起来，许下了各种各样的誓愿。我也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了匈牙利的上帝，只求他使我免除这场危险。可是，匈牙利的上帝把我的恳求当作了耳边风，——或者不如说，他并没有照我的希望那样办。

历史教师第一个就唤到了我。

黑天使从头到脚看了我一下。这个矮矮胖胖、面庞光光的天使，有一头已经灰白的黑发和一双深陷的、敏锐的绿眼睛。他那绿色的眼光盯着哪儿，那儿几乎就会发痛。我直望着这位天使的脸，竭力摆出一副勇敢的姿态。我的脸在发烧，我的膝踝在不由自主地颤抖。

---

① 这个牧师的教名叫安琪儿伯特，前面安琪儿三个字，在德语中意为“天使”。

“关于费伦茨·拉科治的事，你知道什么吗？”安琪儿伯特·马齐温和地问道。

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的教师马蒂索夫斯基哆哆嗦嗦地盯着我。那个学期的课程里，并没有包括拉科治的独立战争啊，马蒂索夫斯基断定，我的回答准不会使督学满意。他正张开嘴巴想纠正黑天使，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在这紧要时刻，他蓦地想到，要是我不能好好回答，他可能就会碰到麻烦；但他如果胆敢提醒督学说他搞错了，那他肯定会陷入困境。因此，他保持着沉默，——只是他忘了阖上嘴巴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近似低声细语地说了起来。我一开头先讲拉科治的母亲英勇的伊洛娜·兹列妮，然后讲到他的被流放的继父索科莱公爵。我讲了教科书上所找不到的一些细节，描述了拉科治度过他的童年的蒙卡契城堡，也没有省略掉城堡里的那口可怕的井，大家都相信，那些上了镣铐的叛徒的鬼魂，到今天都还在那口井里痛苦呻吟。当我讲到国王的心腹把婴儿拉科治带到了维也纳的时候，马蒂索夫斯基终于把嘴闭上了。

我一直讲下去，远远超过了平常一个学生答问的时间，但是既然黑天使没有插嘴说“行了”，我就还得继续讲下去。我把拉科治住在维也纳的几年，他的结婚、被禁和逃亡一笔带过，而着重讲了起义的准备和拉科治的第一个将军赤脚的泰马斯·艾舍。现在，我已不是在背诵，而是在激昂慷慨地演讲了。我直伸着两条胳膊，活象国会议员艾姆列·乌拉依在发表演说。

“森林密布的喀尔巴阡山山顶上的牧人们的篝火，为早已等待着的解放者照亮了道路。”

连这也没有使黑天使感到满足。

我领着拉科治的军队，从一个胜利的战役走向另一个胜利

的战役。当我讲到哈布斯堡王朝下台时，终于摇下课铃了。

“你从哪里学来的，学得这么好，这么详尽，儿子？”黑天使问道。

“督学先生，这是每一个匈牙利人都必须知道的，”我真心诚意地答道。

“对，非常对，”督学同意了我的话，跟笑容满面的马蒂索夫斯基热烈地握了手。

“你讲牧人的篝火照亮了道路，讲得好极了，我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意，我的孩子，”安琪儿伯特·马齐走出去时，一再对我说。

要是这位黑天使猜想到，不久以后，我就将围坐在喀尔巴阡山的篝火旁边，而且十一年之后，我会把松树枝堆到喀尔巴阡山的一个篝火上，为布琼尼①的红军骑兵照亮道路，他会说些什么啊！

费伦茨·拉科治使我父亲成了笑柄，后来又使他成为反酒主义者。在学校里，拉科治却使我成了英雄。全靠拉科治，我搭救了三个即将被唤起来背诵课文的孩子，使马蒂索夫斯基避免了也许更为倒霉的命运。现在，我把长音 O 说成 ao 时，同学们再也不笑我了。班上的人都说，拉科治就是说的这种方言嘛，因为他的童年是在贝雷克州度过的。有些在布达佩斯出生的孩子，一想到他们已开始把 O 发成 ao了，就会激动得发抖；譬如说，拉茨洛·肖斯贝格男爵，这个有名的银行家的红头发、雀斑脸的儿子吧，他是坐汽车来上学的，现在说话也用这种方言的腔调了。

---

① 布琼尼，苏联早期红军领导人之一。

在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布达佩斯的中学生后，我注意到布达佩斯居民之间的差别，并不亚于贝雷克的匈牙利人和罗斯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只是更加多样化和更为复杂罢了。我起初以为，这是因为有的是穷人，有的是富人的缘故。可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老是没钱买一块三明治当早点的山陀尔·杰凯法勒西，却看不起肖斯贝格这个有百万财富的男爵呢，为什么出门坐小汽车的肖斯贝格，要向乘电车来上学的杰凯法勒西拍马屁呢？杰凯法勒西的父亲是一个骠骑兵上校，他的祖先被查理士三世擢升为贵族的时候——引用杰凯法勒西的话来说——肖斯贝格家那些所谓贵族的祖宗们还都在做下贱的小贩哩。我还有一个同学，名叫哈莫列，比肖斯贝格和杰凯法勒西都还要傲慢。他夸耀他的父亲是个民主主义者，因之，还是布达佩斯市的副市长。他的自高自大，比起肖斯贝格的或者杰凯法勒西的自高自大来，更加咄咄逼人，但也更加不起作用。杰凯法勒西也好，肖斯贝格也好，都不把哈莫列的倨傲相放在眼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可并不象一眼看上去那样简单。

我跟班上的这三个有名人物中的两个闹了纠纷。黑天使来校视察后，我立刻就跟哈莫列吵开了。

“喂，巴林特，”在十分钟休息后，哈莫列对我说，“你老老实实说吧！你是故意拿那些荒唐的故事来骗那个老家伙的吧，是不是？”

“什么荒唐的故事？”我吃了一惊，问道。

“得了，得了！别装蒜！我是讲那口会呜呜呜呜哭的井，那赤脚将军，还有牧人们夜里的篝火。”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狠狠打哈莫列一

拳；说来叫人难以相信，我确实没有打他。但我打了肖斯贝格男爵一个耳光。那不是在黑天使前来视察之后立即发生的，而是过了五个月，在刚要大考之前。

伊斯特凡街中学，每年都给三个高年级班安排一次数学比赛。这三个班级的学生中最好的数学家，会得到由一位贵妇人建立的某项基金中出的五克朗。最好的数学家，就是能正确而又迅速地解答两道比赛题的学生。不用说，我是指望得到那五克朗的。

比赛前两天，肖斯贝格在操场上走过来跟我搭话了。

"我要跟你谈一谈，巴林特。"

"说吧。"

"到那边去——我不愿别人听到。呃，我要求你不要参加数学比赛。或者，如果你参加的话，就不要获奖。"

"你发疯了？"

"不，我没有发疯，"肖斯贝格说。"你也知道，班上精通数学的就只你我两个人。你也许比我稍微要好一点，不过，我照样不会输的。要是你不参加比赛，要是你那天头痛了，或者牙齿痛了，或者肚子痛了，那我就准会获奖。当然罗，我并不看重那区区五克朗，但是我家的老头子却劲头特别大。他答应我，如果我比赛获胜的话，就给我买一匹可以骑的马。而我实在很想这匹可以骑的马。因此，我要求你把比赛让给我。我不会白要的，当然。我不是给你五克朗，而将给你三十克朗。换句话说，你将做一笔好买卖。我现在就付你十克朗，还有二十克朗在比赛后第二天再给。你会得到二十克朗的——我用人格担保。我希望你不会怀疑我的话吧？嗯，你觉得怎么样？"

代替回答，——或者不如说，作为回答，我掴了拉茨洛·肖斯

贝格男爵一个耳光。

当我在家里讲起这件事情时，父亲吻了我。

“你回答得对，非常对，格查。我不怕了；你一辈子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惯于以沉默来回答侮辱的父亲说道。

母亲摸摸我的头。

“我怕，格查，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她和蔼地说。没想到，这话出自一向敢说敢为的母亲之口。

至于那次数学比赛，我是参加了，但获奖的是肖斯贝格，因为他象着了魔似的，飞快做完了题目。孩子们都窃窃私议，说比赛前一天，他给了学校门房几个克朗，门房事先给他看了数学教师为比赛出的题目。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非如此，但有一点是确实的——我没有获得那五克朗。

这事是在学期终了时发生的。从黑天使来视察到数学比赛，中间已经过了五个月。这五个月，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日子。有三个同学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一个名叫基斯，大鼻子贝拉·基斯，他总是高高兴兴，兴致勃勃，但有一个缺点：他想成为一个演员，老是不停地背诵《汉姆莱特》①，或者《西哈诺》②，或者《邦克总督》③。我的第二个朋友名叫比斯泰·巴洛克。巴洛克的父亲在书店里工作，带回家来的书，足够办一个图书馆。很可能，正因为如此，比斯泰一心想成为哲学家。有时，我们会违犯学校的禁令，一起上酒馆去，比斯泰会象苏格拉底服毒④时那

---

①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本。

② 法国戏剧家艾德蒙·罗斯丹一八九八年所写的一个剧本，主角即西哈诺。

③ 匈牙利剧作家约瑟夫·卡托纳一八一四年所写的一个古典戏剧。

④ 苏格拉底(公元前463—399)，古希腊大哲学家，后以不信神罪而被判处死刑。

样，用同样的手势，同样的藐视又宽恕一切的表情，一口喝干手中的啤酒。我的第三个朋友是卡尔克西·波洛尼，他想当一名士兵。为了养精蓄锐，以备到时候给召去保卫国王和国家，卡尔克西吞噬了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食物，这套本领对他来说是特别容易的，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肉店。他老是带火腿和熏红肠到学校来，带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一起吃。

基斯是一个为我们下午的冒险拟订计划的人。巴洛克会挑剔这些计划，而波洛尼会出钱使计划付之实现。我的任务则是快快活活干起来。的确，成为这一帮子人中的一员，我是很快活的。

我们会搭渡船渡过多瑙河到奥布达去。一张来回票要花六克劳采。因此，只在波洛尼的口袋里有二十四克劳采时，才能去参观这个从前特拉詹皇帝①的城市。我们会爬上那座小山，九百年之前，异教的反叛者从那山上把圣·盖勒特主教掷进了多瑙河。那趟远足花了我们四个人八克劳采。后来，过桥费又收了我们每人两克劳采。要是波洛尼破产了，那我们就逛市公园；要是他有钱了，我们就去公园剧场。

一张站票要二十克劳采。我们四个人要进去，就得买两张戏票，或者说花四十克劳采。这件事我们是这样解决的：波洛尼买两张戏票，跟巴洛克一起进场去。基斯和我等在外面。几分钟后，波洛尼出来抽烟，带来了他的戏票和巴洛克的戏票。我就用波洛尼的票子进场去了。

当我在里边时，巴洛克就出去，用波洛尼的票子带进了贝拉·基斯。

---

① 特拉詹(53—117)，罗马皇帝，曾征服亚美尼亚、帕提亚和底格里斯河等地。

这套把戏只被识破过一次。那是因为穿着一身拿破仑装的剧场老板西克莱，正站在门口吸烟；他掴了波洛尼两个耳光。

总之，这些欢乐以及我没有谈到的别的一些欢乐，全都是靠费伦茨·拉科治才获得的。

变革的时代

我们搬到维佩斯后，我和朋友们一起远足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后来，通过教师马蒂索夫斯基帮忙，我收了两个学生，从此跟公园剧场永别了。

为了早晨八点钟赶到学校，我六点钟就得去搭电车。学校一点钟放学。那时我也不回家，因为三点钟在布达佩斯还有事。这样，我就到处游荡，消磨两个钟头，所谓自己掏腰包吃午饭了。下午三点到四点，我教这个学生，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教另一个学生。在这之间，以及在乘电车回家的时候，我温习自己的功课。福洛普舅舅曾几次建议我到他家里去吃中饭，不要这样胡走乱逛地消磨这两个钟头，但我没有接受他诚挚的邀请。福洛普舅舅住在布达[1]；走到那里，来回要两个小时；如果我乘电车，就要花掉我一半的收入。因此，我还是照老样子：逛两个小时，掏钱买中饭吃。

不过，有一次，我还是到福洛普舅舅那里去了；那不是在中午，而是在晚上，我授完课以后。我要跟福洛普舅舅谈谈贝雷克和下喀尔巴阡山的事。

他一个人离开外省来到布达佩斯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只是在这个城市里暂住而已；他仍生活在乡下。我是在布达佩斯

---

[1] 布达佩斯是由布达和佩斯两个地区组成的城市。

上学，可我一看报，首先就看贝雷克的新闻，看那从喀尔巴阡山林区来的消息。当然，在布达佩斯的报纸上，是很少看得到我故乡的消息的。有一两桩挪用公款或者酒店吵架行凶致命的案子——如此而已。有一次，当我在报上看到雇农泰马斯·艾舍因为犯煽动罪被判刑两个月时，我浑身都发抖了。

后来，当我感到自己已是一个在布达佩斯扎根落户的居民，不再在报上寻找贝雷克的消息时，布达佩斯的报纸却开始刊登许多关于贝雷克和喀尔巴阡山另外几个州——昂克、乌戈克沙、马拉马罗斯的消息。为了保护在喀尔巴阡山居住的罗斯人，反对他们的犹太敲诈者和剥削者，报纸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宣传战。

我不明白的是：在匈牙利，说匈牙利话的犹太人，可不是仅仅被看作匈牙利人，——他们事实上就是匈牙利人呀。

在下喀尔巴阡山，即使不会说匈牙利话的犹太人，也都被看作是匈牙利人的。因为要拿他们来抗衡罗斯人。

在这以前，罗斯人一向被当作恶狗看待——他们的嘴巴上了口络，身子挨鞭打。现在，忽然之间，他们受到了保护——对抗起犹太人来啦。

我去看福洛普舅舅，想请他解释一下喀尔巴阡山出现的事情。他没在家。西维拉一家住在一幢新房子的四层楼上，一套两间。一间是大夫的诊所，一间兼吃饭、睡觉、起居用，还要做卡罗莱表哥的书斋。跟往常一样，屋里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艾尔莎舅母不管住在哪里，总是这样。我看不出一点贫困的迹象；我只是有点感觉而已。当艾尔莎舅母做饭时，卡罗莱给我看了他画的画。他一心想当画家。有一张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一个罗斯的伐木工，一个犹太工人，和一个匈牙利农民肩并肩站着。三人胳膊弯在一起，六条胳膊连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这个有力的拳头一拳向一个钱袋打了下去。

“是索莱瓦的回忆吧？”我问道。

“回忆？”卡罗莱思忖着我的问话。

我的表哥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他继承了他母亲的身形、力量和镇静。只是他那双充满梦想的乌黑的大眼睛，却使人想起福洛普舅舅。

“回忆？”他说，“不！倒不如说，幻想，是未来——”

“你倒不如经常出去走一走的好，”艾尔莎舅母说着，走进屋来，“你瞧，格查，这孩子多苍白啊！他整天价不是捧着一本书，就是伏在画板上。虽然你看上去也不太好，格查。”

“我可走得够多啦，艾尔莎舅母。”

“我知道，”舅母叹了口气。

福洛普舅舅很晚才回家来。他憔悴了，头发已差不多完全灰白，不过他的眼睛、举动和声音，却仍显得年富力强。

“带来了什么好消息，格查？”

我把喀尔巴阡山的事情和我的看法告诉了他。

“我也注意到了，”福洛普舅舅说，“只是我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意义——实质上已充分说明，这里面有鬼。一个肤浅的观察家会认为，这是布达佩斯的报纸，纯粹出于正义感，力图摧毁匈牙利统治者们人为地建立和刻意保持的多数。当然罗，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绅士们在改变策略了——为了对抗已起了变化的局势。如果我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我想，那准是现在已出现了一种比罗斯人的威胁更大的危险。新的威胁是什么呢？那也不难猜测。”

说着，福洛普舅舅指指卡罗莱那张画，那握着一个大拳头的三个下喀尔巴阡山人。

“很可能，我没有猜错，”他说。“你是怎么看的，格查？再进一步观察观察，不就清楚了吗？”

平时，我每天都在七点钟左右回到家里。吃饭，做作业，然后就睡觉。我在平时是看不见父亲的。我回家时，他还在咖啡馆里；我清早出门时，他还在睡觉。他星期天也工作；星期天下午，他要进城去，我们只有星期天上午是在一起过的。我们多半是沿着多瑙河散散步；有时，我们会过河到蚊子岛上去。

我在布达佩斯闲逛的日子里，是经常看到多瑙河的。它那宽广、稳健与宁静，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当急风暴雨刮打着这条河的宽阔河面时，它简直是令人畏惧的。不过，尽管是在很久以后，我却真正感觉到了这条闪耀的水带的美，它广袤数百码，不断流逝，而又以它那特有的蓝、绿、灰、黄和紫色的细微差别，显得如此喜悦安详。河的我们这一边，散布着一长列工厂的烟囱，对面，河的那一边，一些别墅建造在小丘和树木密布的小山上。两个大斑点破坏了河流的波涛：我们常去的那个没人照管的灰蒙蒙的蚊子岛，和玛格丽特岛——一块象绿宝石般的草地，那是专为付得起入场费的布达佩斯有钱人而小心栽培的。

“瞧，多美啊，”我站在多瑙河岸，指着沐浴在阳光下的布达山喊道。

“没有贝雷萨斯的摩西山美。”父亲温和地说。

“它更美，美多啦。”

“你可错了，格查，我的儿子。是的，你已在为谋生而工作，可你年纪太小了，还不懂事。”

最近几个星期，父亲老是干咳，现在又咳起来了。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旁。

我们对面的奥布达，是罗马皇帝特拉詹于一千八百年前选来建筑他的城市的地方。现在那儿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剩下的几个黑黝黝的废墟。再过去一点，可能在那些小山中间，匈奴王布达在一千五百年前曾经搭过他的篷帐。这个一度威震世界的匈奴帝国，现在已只留下寥寥几个传说。左边，耸立着一座王家城堡，很久以前，马赛厄斯王①曾在这里即位，并胜利地对抗过德国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他的地方被土耳其人侵占后，那位世界征服者、索利曼苏丹②的旗子曾在这城堡上飘扬了一百五十年。再过去，就是那个以前被称作奥地利人的骄傲的堡垒，它的废墟散布在云遮雾掩的盖勒特山上。

父亲在痛苦地咳嗽。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一切都过去了，或者一切都变了？他准会回答说："我知道，格查。可对一个以前自己拥有二十四英亩葡萄园，而现在靠向陌生人鞠躬打揖餬口的人来说，这可不起安慰作用啊。"

我什么也没有说。

---

① 马赛厄斯(1443—1490)，于一四五八年被推选为国王，但直到他和土耳其、波希米亚人长期斗争后，于一四六四年才加冕登基。

② 苏丹是旧时土耳其君主的称号。索利曼(1496—1566)一生到处侵略，于一五二六年在莫哈克斯杀死了匈牙利国王路易斯。

世 界 语

星期天下午，起初我感到很孤独，但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个伙伴，我们邻居的女儿厄莎·卡尔曼。厄莎是个女裁缝，比我大几个月。她是一个小胖子，笑起来的时候，一排健康的牙齿在张开的嘴唇间闪闪发亮。即使今天，在我的想象中，我也还能看见她那双圆圆的、惊奇的、淡褐的眼睛，她那乱蓬蓬的、麦秆色的头发，还能隐隐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闻到她那杏仁皂的醉人气味。这是我的女朋友，厄莎·卡尔曼。但我又记着另一个厄莎·卡尔曼。这个女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当多瑙河舰队炮击红色维佩斯①的时候，她在火线上给我们提来了两大壶冷饮料。她抓起一个伤员的步枪，就跪在地上跟她旁边的父亲并肩射击起来。三十分钟后，厄莎躺在光秃秃的地上，她眼睛闭上了，面孔变得绿阴阴的，脑门上有三个紧挨着的小洞，是三颗机枪子弹打的。一面弹痕累累的红旗覆盖着她的身体。

我们住在临奥斯街一幢平房里。院子里还隐藏着另外一幢小房子：那是木工恩德列·卡尔曼的房子。他长得又矮又瘦，穿得破破烂烂，经常不刮胡子，是一个一贯发牢骚的人。当我提起帽子，彬彬有礼地招呼他时，他会阴郁地点个头。他的妻子是个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匈牙利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年八月，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国内恢复了君主立宪政体。这里讲的这次反革命袭击，在当时很快就被革命政府委员会扑灭了。

长得很结实的金发女人，整天蓬头散发，穿着一条邋里邋遢的裙子和一件污斑狼藉的紧身胸衣，到处乱跑。她老是来向母亲念苦经。那是她的一出拿手好戏。她来过两次，我们就知道了她的整个一生的故事。她什么事、什么人都要骂，骂起来还趾高气扬，老练得很；但她最大的欢乐却是诽谤她的丈夫。

"卡尔曼是个好工人，为人正派，这没有说的。但要是他不关心家庭，却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消磨在那个该死的工会里，他的工钱有什么用？他下起象棋来，好象有钱赚似的。好，他下象棋我倒还受得了。可他还喝酒啊。他哪一天都要喝三杯啤酒，星期天要喝六杯。他抽烟又抽得那么多，就是洛特柴尔德①的钱也不够他买香烟啊。"

从大门口进来的一条长满杂草的小径，穿过院子，通到我们住房的门口，再往后面一点，就到了卡尔曼的家。上午，院子里，我们住房右边那幢公寓房子，投下了暗影；下午，又给左边那幢房子遮得阴沉沉的。我们的住房没有自来水。院子中央有一口装抽水机的井，井水有股铁腥味。井边有一棵孤零零的七叶树，长得又矮又阴森，看了叫人怜悯。它的叶子苍白而黯淡。我想，那是蒙了灰尘的缘故吧；可有一次，我采下一片叶子，用手帕擦了擦，那黯淡的色调却擦也擦不掉。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正坐在那棵孤零零的七叶树下看书，厄莎·卡尔曼跟我来说话了。

"你不想学世界语么？"她问道。

"什么世界语？"

"你连这也不知道？"厄莎笑道，"那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

① 洛特柴尔德（1777—1836），伦敦的一个有名的犹太大资本家。

言。有朝一日，当这世界变成一个国家时，人人都得讲世界语。”

“你会讲世界语吗？”我问。

“还不会，但我正想学。工人之家开办了一个世界语班。六个月就可以学会世界语。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就学的话，还来得及学会它。”

“来得及？换句话说，你认为全世界六个月内就要变成一个国家了？”

厄莎思忖起来了。当一张老是笑吟吟的年轻面孔在一阵思索中变得很严肃时，真是妩媚迷人。

“我不知道。我去问问父亲看。他是维佩斯木工工会的主席，可能你也知道。这样的事，他是知道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再把父亲说的告诉你吧。那你是想学世界语罗？”

“不。我不想学一种全世界的语言，再说，我也没有工夫学。”

“懒惰只会自己害自己，”厄莎回答道。

下一个星期日，她又来跟我说话了。

“你不想到蚊子岛去玩玩？”

我们走了。

“问过你父亲了吗，厄莎小姐，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国家？”

“我不是‘小姐’，”厄莎说。“嗯，我跟父亲说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给了我三十个克劳采，叫我上电影院去。”

蚊子岛是一块广阔的土地，那里长着断枝折桠的树木，有许多野灌木丛和踩得扁扁的野草，到处是垃圾，上面覆盖着从工厂烟囱里吹来的一层黑色的烟煤。一大群年轻工人、女裁缝和纺织厂的女工，正在等着厄莎。我的女友把我介绍给人家时，总不

忘记告诉他们，或者不如说总是着重说明，我是一个在校的中学生。如果她不这样说，我在那一伙人中就只不过是一个生人。事实上，我也是个局外人。他们也并不对我隐瞒这一点。他们跟我讲话时，都带有一种过分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殷勤。有时候，这种彬彬有礼会猝然间变得恰恰相反。我们玩捉人游戏了。一个名叫列普泰克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装配工——扮“它”；他抓住我时，在我背上重重拍了一掌，直拍得我几乎倒了下去。在玩捉人游戏时，我没有机会溜掉，但当我们开始玩捉迷藏时，我想，这下我可以悄悄溜走啦。可我完全错了。当我走到桥墩边时，一个姑娘的两只手从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厄莎不是象一般那样问我：“你猜我是谁？”而是问我：“你猜我心里对你有什么看法？”我只好回去了。

当我们玩捉迷藏玩倦了时，大伙儿一起去喝啤酒了。我囊无分文。可是，厄莎挽着我的胳膊，我要偷偷跑掉，想也甭想。怎么办呢？我挑衅而又毫不害羞地公开宣告，声音响得不仅厄莎、而且前前后后的人都听到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就象拉科治在学校里那样，这一声明，使我立刻在厄莎的朋友中赢得了公民权。使我吃惊的是，我变成注意的中心啦——事实上，变成了宠儿。那一伙人中，十个人异口同声地邀请我。最后，是列普泰克结束了当时已渐渐变得令人痛苦的这番亲切。他挽起我的胳膊，对其余的人怒喝道：“滚开，你们大家！”

渔人酒家的庭院里，摆了二十来张铺了红桌布的桌子。为了使我们这一伙人能坐在一起，只好把四张桌子并排拼了起来。列普泰克向女招待点了吃的东西。

我们又吃又喝。列普泰克点了羊奶干酪、洋葱、咸面包卷和

啤酒。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正在变黄的叶子，老是落下来掉在我们的酒菜中。我不得不喝干了自己的一份啤酒，又代喝了厄莎的一半啤酒。面前的一切都喝光吃光了，小伙子们都抢着会钞。列普泰克给女招待付了钱，我们起身走了。

"上工人之家去。"

工人之家的庭院，跟渔人酒家的庭院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更大一点。这儿，桌子上也铺的是红桌布，放着啤酒壶。顾客大多是男人，但在喝啤酒的人中间，也有几个女的。有两三个女人膝上还坐着孩子。男人围着两三张桌子在打扑克；出牌人每次出牌时，都会在桌上砰地敲上一拳。打扑克的人不时争吵，叫嚷，不过一会儿又平静下来，讲和了，重新玩起来。两张桌子上在打多米诺①，一张桌上在下象棋。有架吱吱嘎嘎的留声机，在放一支流行的喜剧歌曲。

"你以前到过工人之家吗？"列普泰克问我。

"我是第一次来。"

"跟我来，我们去看看。"

我们走进了那个很大的大厅。那个又长又狭的幽暗的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进去时，脚步响起了回声。列普泰克开了电灯。墙壁又脏又潮；屋子的一头有一个舞台，上面摆着一张铺红毡子的长桌，旁边放着三张高背椅。舞台的左角上，摆有一个象教堂讲道坛一样的演讲台。

我们爬到舞台上。那墙上挂着两幅有红框架的画像。一张是卡尔·马克思像，一张是费迪南·拉萨尔②像。

"这个房子，我们一星期里只在星期三用一次，"列普泰克解

① 用二十八块骨排玩的牌戏。

② 费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家。

释道。“那是党开周会的时候。工会开年会，也在这儿开。冬天，我们在这大厅里安排文化节目、音乐会和诸如此类的玩艺儿。所有其他的活动，都安排在倍倍尔①室里。”

列普泰克关上了电灯。

“我们去看看图书馆吧，”他提议道。

图书馆的门锁着。

“西波斯准是到外面打扑克去了，”列普泰克说。“我们就上倍倍尔室去。”

倍倍尔室比那个大厅小得多了。它只有三十来把椅子和三条长凳。

墙壁挺干净——看上去是新近粉刷过的。一个角落里竖着一捆红旗。

“工会的旗子。”

这里，也有一张铺红毡子的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两张画像。一张是利奥·弗兰克尔，原籍匈牙利的巴黎公社的人民委员。另一张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今天晚上这里有演讲，”列普泰克告诉我。

“讲什么？”

“讲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我不知道演讲人是谁。每个星期天，康迪街总部②都派一个演讲的人来；遗憾的是，来讲的并不都是能讲那个题目的人，而是谁有空就由谁来讲。结果，不是讲的人对那个题目一窍不通，讲得很糟，就是他讲到别的事情去了。上星期天，譬如说，预定要讲的题目，是奥匈帝国的外交政

---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之一，著名革命家。

② 指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部。

策，结果，我们却听到他讲了裴多菲的诗歌。很可能，今天我们也不会听到讲达尔文，而会听到讲帝国的对外政策哩。”

七点只差几分钟了，在倍倍尔室内就座的还只有我们八个人。正七点，演讲人来了。他后面跟着进来了三十来个人，其中包括恩德列·卡尔曼，他刚才一直在外面下象棋。他担任会议主席。

“他们给派来了一个很好的演讲人，”列普泰克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福洛普·西维拉大夫。他是一个天生的学者。”

“我认得，”我回答道。“他是我舅舅。”

“真的？那你——”

列普泰克这句话没有说完。

“请原谅我，同志们，”福洛普舅舅开始讲话了，“我今天不能讲达尔文。请相信我，我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也很愿意下一次再来讲他。但今天——”

演讲者停住了，他一动不动，笔直地站着。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在整理他的思路，但我知道，他这是在努力抑制某种内心的强烈激动。

“同志们，”西维拉大夫又开始讲了，“帝国已并吞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宣布对那块地方拥有永久所有权。你们也知道，这个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巴尔干国家，是几十年前根据柏林会议的授权，由奥匈帝国占领的。当时，占领的目的，是为了在争夺巴尔干的列强中间，也就是在一边是俄国，一边是哈布斯堡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靠不住的，现在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略政策，已经结束了。那些一星期前，在宣布并吞时还不明白这一步骤的意义的人，现在，如果他

们不是瞎子的话，总该看清楚这个后果了吧。因为现在匈牙利南部和克罗地亚已开始进行局部动员了。塞尔维亚和俄国也在动员。战争已迫在欧洲的面前！战争也许不会在明天爆发，甚至也不会在今年爆发。但是，战争的问题，无疑是今天最急迫的问题。这场战争对谁有利？无论如何，对劳动人民是不会有利的。”

福洛普·西维拉的讲话，激烈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听众即使不为他生动的语言和旺盛的干劲所感动，也会被他那严密的逻辑所折服。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当演讲人讲完了时，一个名叫莫尔多凡的机器装配工第一个要求发言。他激烈反对西维拉。倍倍尔室内挤满了人，当莫尔多凡谴责西维拉大夫不讲达尔文主义时，大部分群众都大叫大嚷地表示赞成。莫尔多凡说，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对匈牙利的产业工人有利，因为匈牙利，由于征服了一个不发达的地区，工业就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这时，有的人甚至还喊叫着助威。他坚持认为，这个行动，不仅对资本家，而且对工人也同样有好处。莫尔多凡说，并不存在战争的危险。“在欧洲，谁也没有当真想到战争。要是资产阶级——而这是不可能的——想试一试发动战争的话，工人们就会宣布总罢工，在战争发动之前就结束战争。”莫尔多凡说。

列普泰克继莫尔多凡之后发言，他说得更有激情，但没有那么机敏。他感谢西维拉讲了一个关系到全体社会主义者的利益的题目——战争的危险，并攻击了主张牺牲波斯尼亚农民来提高匈牙利工人生活水平的莫尔多凡。当他开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矛头对准工人阶级时，在一阵附和反驳的呼喊声中，他

发慌了，就坐了下来。

列普泰克之后，又有十来个人发了言。发言时，他们大多都感情很强烈，有赞成西维拉的，有反对西维拉的。有几个发言者企图把这两种彼此截然不同的观点加以调和。

西维拉大夫作了总结，讲得又平静又客观，但措辞相当抽象。当他说到，为图眼前利益而支持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工人，使人联想起为了一份红豆汤而出卖他的长子名分的以扫时①，观众中爆发了赞同的欢呼声和抗议的喊叫声。

倍倍尔室内的空气很窒闷，有股浓烈的酒气和铁锈味，或者，也许是由于那场不习惯的争论，弄得我头都痛了。福洛普舅舅的声音，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透过来似的。

我跟舅舅一起离开了演讲室。

"看到你在这里，我很高兴，格查。"

"我是偶然到这里来的，福洛普舅舅。"

"你错了，格查。也许，事实上，你今天正好是偶然到这里来。但是，你早晚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去喝点啤酒吧？"我问。

"啤酒不是主要的敌人，格查，"他严肃地说。"已经进入工人之家的不光是啤酒。还有一种比酒精更加危险的毒物，格查——象莫尔多凡喝的那种东西。"

"你想到了什么，福洛普舅舅？"

我这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这两三天内，到我那里去一下，格查，"稍微踌躇了一下，舅

① 以扫累昏了，求他的弟弟雅各给他吃点正在熬的红豆汤。雅各要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就用一份红豆汤换掉了他的长子的名分。（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舅说。“我要给你几本书，你一定要看一看。”

我陪福洛普舅舅来到车站。

“格查，你要尽可能多跟工人们在一起。”

“喝啤酒吗？”我含糊地重复了一句。

“有朝一日，总有人会为喝啤酒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的。”福洛普舅舅答道。

两天后，维佩斯工人之家的理事会作出了决定：星期天演讲会的次序表必须严格遵守。演讲人若背离排定的题目，就是破坏党的纪律。

列普泰克和另外二十二个人向理事会提出一份申请书，建议应该安排几次关于战争危险的讨论。工人之家的理事把这份申请书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因此，这个建议没有提交讨论。

所有的星期天下午，我都待在工人之家。没多久，我已变成这一伙人中的一员，但我又并不真正属于他们这一伙。人人都客客气气，但要是突然发生了争论，不管是政治上的事或者私人的事，我都没有发言权。那时，小伙子或姑娘们相互都毫不客气，但如果我也想加入那场争论，他们就变得非常斯文了。这说明，在我和别的人之间，隔有一道很厚的墙。

我想用凡是星期天演讲后发生争论就一概参加的办法，来摧毁这道墙。为了这样办，我开始贪婪地看起书来了。我向福洛普舅舅借的书越来越多，把半个夜晚都花在看书上。

“你会搞坏眼睛的，格查，”父亲告诫我。

“我们付不起电费啊，”母亲说。

随他们去说，我还是坚持看书。自然，我看书，连一半都看

不懂，但这只是激励我更用功地看下去。要看，要看，要知道……起初，读书和知识很吸引人，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是入门的钥匙。待到我明白了，凭着夸耀我新获得的学识，丝毫也不能缩短我跟工人之家的那些常客之间的距离时，我可初次体验到知识的味道，而更加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了。

看到在工人之家，一个有能耐的棋手，比一个老练的辩论者更受尊敬，我就学下棋了。没多久，我下棋就已下得挺有一手。可是，这也没有改善我在工人之家的境遇。那些你觉得跟他下棋很叨光的人——比如说，恩德列·卡尔曼——都不跟我下。如果我邀请他们坐下来下一盘，他们不是不想下，就是没工夫下。可是，当他们要下棋时，却又从来不挑我作对手。

话虽这么说，有一次，我却被恩德列·卡尔曼杀败过两盘——正好在我一点也不想下棋的时候。

一天，我偶然在报上看到了一条治安消息，其中提到了我熟悉的两个名字。一个是我的故乡下喀尔巴阡山；另一个是我的邻居恩德列·卡尔曼。报上说，装修木工恩德列·卡尔曼在昂克、贝雷克和马拉马罗斯几个州的堆木场里到处转，煽动工人起来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宪兵已在佩梅蒂将其逮捕。经调查证实，恩德列·卡尔曼是全国木材和林业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已被押回原籍维佩斯。已经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恩德列·卡尔曼出门待了几个星期，我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当我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到过哪里时，他早已回到维佩斯了。那天晚上，晚饭后我去看望他。我看到他在家里，只穿一件衬衫，正在看报。当我跟他说，我是来告诉他我知道的有关下喀尔巴阡山的情况，请他讲讲他在我的故乡的见闻时，他睡眼惺忪地看了看我。当我结结巴巴地站在那儿时，卡尔曼探手伸进桌子抽

屉里，取出一个棋盘，摆上了棋子。

“坐吧，”当我报告完毕时，他吩咐道。“第一盘你下白的。”

我很快一连输了两盘。

“对不起，现在我要走了，”下完第二盘后，卡尔曼说。“但我下次会给你一个扳本的机会。”

每个星期天傍晚，厄莎和我都会去溜跶一下——多半是去蚊子岛。

夜幕降临了，岛上又昏暗又冷落。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一对对的人，象我们那样臂挽着臂，静静地走着。可是当那一对对终于相互观察时，他们就或者转过脸去，或者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我早就想问你了，厄莎，你在学世界语吗？”

“你真的以为我会在这种蠢事上浪费时间吗？”我的女朋友回答道。

转 折 点

我在班上虽已不再是最优秀的学生，但还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的负担太重了，不可能抢占第一把交椅。在学校里，我没跟任何人讲，我已习惯于跟工人交朋友，但是，我的同学们好象在我的身上嗅出了另一个世界的味儿，我又变成一个外人了。比斯泰·巴洛克已迁居到乡下去。我跟贝拉·基斯已经疏远了，因为我受不了他那不停嘴的朗诵。我剩下的唯一朋友，是那个金头发、白皮肤、红腮帮、胖鼓鼓的、一心想当军阀的卡尔克西·波洛尼。他不知怎么一来，发现我每天都一个人逛两个小时，就紧紧缠住我啦。他住在学校附近，下课后飞奔回家，狼吞虎咽地吃过中饭，就从一点半起，陪我到三点钟。他跟我说，我是唯一能使他吐露心头秘密的人。我发过誓，决不会泄露出去，由于波洛尼迄今还未给我解除这个誓约，因此我只能说：波洛尼的计划如果实现的话，那么，俄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就都将成为匈牙利的殖民地了。我的朋友波洛尼是一个挺好的——也是非常愚蠢的小伙子。正因为他愚蠢，所以他尊敬我，爱我。很可能，机器装配工约瑟①·列普泰克也是这样看待我的；顺便讲一下，对列普泰克来说，正因为我敬爱他，才搞得他大伤脑筋。我尊敬他，因为他跟我是那么迥然不同：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

① 约瑟夫的昵称。

强壮、镇静、坚定、沉默寡言。我爱他，因为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战士。我们现在，经过这许多大风暴以后，列普泰克领导的那场斗争，看来好象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可在当时，我却想不出还有比那更重大的斗争了。

列普泰克是工人歌唱队的秘书。歌唱队队长、带假脚的皮件工人萨波，是个"纯艺术"的热心倡导者，所以，他为歌唱队所选的节目都是被他视为杰作的一些歌曲和歌剧的咏叹调。他在节目表上只容许排入一首革命性的歌——那首以"为什么如此阴郁……"开头的哀悼歌。

约瑟夫·列普泰克认为工人歌唱队应该唱革命歌曲，公然对这种"歌唱队的调和政策"进行宣战。萨波一发脾气，会很快地解下他的木头腿，拿它挥舞起来。他会在桌上砰砰敲着木头腿，敲得啤酒壶东摇西晃，压得反对他的人沉默下来。当列普泰克竟然胆敢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上批评萨波时，这位队长又把木头腿解下来了。

"你小心，臭小子。"

列普泰克看到那只木头腿，却并不惊慌。萨波砰砰敲桌子时，他不动声色，待到萨波渐渐敲累了，列普泰克却用比刚才更厉害的口气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一上来，对萨波和列普泰克的争吵感兴趣的，只是一些向来爱拿人逗笑取乐的人。这种人不少。特别好笑的是，萨波的最坚决的拥护者之一，竟是电厂的一个工头、工人之家的出纳员和约瑟夫·列普泰克的父亲。"大胡子"老列普泰克很生他儿子的气，因为他儿子把胡子剃掉了。由于他不能拿剃掉胡子作为工人运动的一个争论点，现在就拿歌唱队的事来反对自己的儿子了。

“象他这样的愣小子，只会给工人添麻烦，”大胡子列普泰克到处这样说。

工人反酒协会主席科伦班可对大胡子列普泰克发泄怨恨了，后者是维佩斯的喝啤酒大王。

“当然罗，那样的歌，跟喝啤酒一个样！呃，这我们看得到的，”科伦班说。

工人之家和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处理歌咏社团的问题，忙了足足两个月。

皮件工人支持萨波，五金工人支持约瑟夫·列普泰克。木工、印刷工人和缝纫工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党的领导者们作出了同样的决议。工人之家理事会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一致建议歌咏社团保持原先的节目单，另外增加两三首革命歌曲。萨波同意这个建议；列普泰克不同意。这样一来，党的执行委员会就转而反对列普泰克，把他从歌咏社团里开除了。但约瑟夫·列普泰克不屈服。

他在工人之家，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要辩论一番。也不管是在争论什么，他总是谈歌咏社团的事。这样做，并非都获得了好的效果。比如说，星期天晚上，工程师艾米尔·霍尔华特在倍倍尔室作了关于《未来的飞机》的演讲。列普泰克在发言中，又跟往常一样，提出了歌咏社团的问题，听众哄堂大笑。

列普泰克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他仍坚持战斗，但改变策略了。以前，他在一切会议上都谈歌咏社团的事，现在，他提也不提了。他开始在各个不同的问题上，批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之家理事会。例如，他指责党执行委员会忽视了在卡罗莱州卡波茨泰斯梅扎地区的农民工作。大家都不再笑列普泰克了；他们诽谤他是“歌唱队的牛皮歌手”。列普泰克可不怕。

没多久，这个“吹牛皮的煽动者”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好斗的集团，对于这一件事，我多少尽了自己的责任。我尽可能地跟列普泰克那一伙人站在一起。厄莎总是跟着我的，她很快就成了列普泰克的忠实信徒。她为列普泰克游说，把几个女裁缝和年轻的纺织女工拉到了我们这边。厄莎的干劲，使她父亲恩德列·卡尔曼大为惊奇。他开始注意列普泰克了。当列普泰克说话时，恩德列·卡尔曼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这个老头是睡着了哩。可他的朋友却知道，他是在聚精会神地思考和估量那个问题。他没有出来支持列普泰克；但是，当一小撮皮件工人硬说“那个顽固的列普泰克”跟工人之家的活动捣乱，反复提到那些“嚼烟草的农民”分散对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的注意，建议把他开除出去时——卡尔曼说话了，他坚决而严厉地反对开除他。卡尔曼不仅有木工支持他，而且好多铁器工人也都支持他。

列普泰克没有给开除出工人之家。待他感到他在工人之家的地位已足够巩固时，他跑到卡波茨泰斯梅扎地区去了。他第一次去那里，被雇农们打了一顿。他第二次去，宪兵把他打得昏了过去。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接着，他第三次又回到了卡波茨泰斯梅扎。这一次他没有遇到麻烦——雇农们把他藏起来了，躲过了宪兵。从那以后，他和卡罗莱庄园的雇农保住了牢固的联系。

约瑟夫·列普泰克劝我——可能是另有用意——去参加工人们的“自然界之友”安排的夏季旅行。“自然界之友”的四五十个会员，打算七月里徒步绕巴拉顿湖走一圈。经过我的申请，他们把我吸收进了这个团体。我后来没有徒步绕巴拉顿湖走一圈，这不是我的错。

父亲近来老是感到疲倦，他一有空，就躺在床上。春天还渺无影踪，我们已在盼望夏天和阳光照耀的天气快点到来，好让他恢复健康。（如果是秋天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希望晴朗的冬天能使他恢复健康。）

五月二十九日，他没有象平常那样在清早一点半钟回家，而是早在头天晚上八点钟就回来了。他脸色苍白，浑身打颤。母亲和我连忙把他扶到床上。母亲给他煮了甘菊茶，但他不想喝。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请了医生。父亲告诉医生——这对我们是新闻——他吐血已有几个星期，昨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昏过去了。福洛普舅舅——是我去告诉他父亲病了——下午就到我们家来了。

三个星期后，病人起床了。他根本不能再回咖啡馆去了——福洛普舅舅坦率地告诉我们，那等于去送死。父亲整天坐在外面院子里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只是凝望着空间。当母亲给他摆正背后的枕头，或者调整一下搁脚凳时，他会蔫蔫无力地点头谢谢。不论母亲问他什么，他都用点点头或摇摇头回答。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认识了当铺。我想，那只是偶然相识吧。当我把父亲的银表拿到当铺里去时，我是多不幸呵。我从来没有一天，会因为有东西可以拿到当铺里去而感到幸福的。

福洛普舅舅几乎天天都来看我们。他有时来得很早，天一亮就来了；有时很晚，到半夜里才来。他对父亲诊察一下，讲一两句安慰的话。然后，他天天都跟母亲一起，在院子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谈论。

“那个该死的无赖费迪南，”有一天，当我送福洛普舅舅上电车站去时，他发火了。“他是唯一能帮助你们的人。我写了信给

他；我写'亲爱的弟弟'时，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我还是写了。而那个混蛋却信也不回一封。"

"费迪南怎么能帮助我们呢？"

"很简单。费迪南已经变成富翁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那是靠诈骗发的财。他已不教跳舞——他是一个大老板了。当他上布达佩斯来时，他驾着一辆汽车到处转。我本应该知道，他早就把穷亲戚忘记掉了。"

但费迪南毕竟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亲戚。他没有给福洛普舅舅写回信，却在一个星期天下午驾着一辆黄色的游览车来到了我们家里。

舅舅一进门，我们这个阴暗惨淡的屋子里就扩散开一股香气。

费迪南一本正经地吻了我们每个人，然后给大家分了他带来的礼物。这些礼物对我们的景况来说，是毫不相称的。母亲收到了一个大花束，父亲得到一瓶真正的法国香槟。他给我们这些孩子——费迪南还把我看作是个孩子——带来了巧克力。我两个妹妹都很欢喜巧克力。我却宁愿有一大块腊肉。

"呃，老弟，"费迪南对父亲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蠢，害起病来啦。"

父亲点点头。

"不要紧，"费迪南象猫头鹰叫似地说道，"幸亏，我还活着。把东西收拾好，你们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走。"

"去哪儿呀？"母亲疑惑地问道。

费迪南用手拍拍自己的脑门。

"对啦，我真是个傻瓜，这事我还没提起过哩。一个人的头脑里给填满了重大的、重要的——我可以说是全国性的——

事情……简短地说吧，你们是去佩梅蒂……佩梅蒂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附近，离开贝雷萨斯七八个小时的路程。那可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妹夫。正是你所需要的。新鲜的空气，松树的芳香，鸟儿的歌唱——"

"人可不能靠鸟儿的歌唱过活啊，"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靠那个，伊莎贝拉。但是人可以靠一个月七十五福林过活啊——在乡村里，一切都挺便宜。那是佩梅蒂锯木厂付给它的仓库管理员的工资数。那个仓库管理员，在我的介绍下，将是约瑟夫·巴林特先生，从七月一号开始。嗯？哈！我几乎忘啦。这里是路费。

"走之前先打一个电报，老弟。把地址记下：纳塞恩·辛内尔，佩梅蒂，马拉马罗斯州。不，打电报给辛内尔太太吧。对，那样更好些——"

费迪南向我们讲了他家里人的一些情况。西蒂舅母和乔奇在奥斯坦德避暑。他没有办法到那儿去——他太忙了。

"不过，在八月份，或者，至迟九月份，我一定到佩梅蒂去看望你们，去打打熊，"他补充了一句。

舅舅走后，我仔细地检查了他给我们的那两张一百克朗的钞票。它们是真的钞票！

那天晚上，福洛普舅舅在倍倍尔室内发表了《少数民族问题与奥匈帝国的未来》的演讲。演讲结束时，他招招手叫我过去。

"那个无赖到你们家去了吗？"他问道。

"去了，"我说。

"他给了你们路费了吗？"

"是，给了。"

"他昨天晚上来看我，"福洛普舅舅说，"我把他撵走了。我

跟他说，如果他要跟我说话，他最好先跟你们去谈谈。他赌咒发誓，说他已为你们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是把他撵走了，虽然，我也许不应该那样。今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跟你父母亲谈过了。看来，这一回他倒没有说谎。"

十天后，我们动身上佩梅蒂去了。福洛普舅舅要我留在他那里上完中学，但我要跟父母亲在一起。我打算自学，以后，再上布达佩斯去参加考试。福洛普舅舅送了几本很好的书给我，作为临别的礼物。

厄莎也送我一本书作为纪念。那是一部裴多菲全集。她在最后一页上贴了她的相片——不难看出，这相片是她临时在一家照相馆里照的。

我去向厄莎的父亲辞行。当我去拜访时，我看到他正坐在一张脚凳上，两脚浸在一盆水里，在看报纸。他睡意朦胧地望望我。

"祝你一切如意，"他说。

我来到外面院子里时，他从窗上探出身来，又把我唤了回去。

"要是你在佩梅蒂碰到亚伯拉罕·霍泽列茨，请代我向他问好，"他说，"亚伯拉罕·霍泽列茨，"他重复了一句。

使我吃惊的是，约瑟夫·列普泰克把我送到了车站。

"再见了，格查，"他说。

八年之后，我们又遇见了——在一个军事监狱里。

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了火车。早晨六点，我们经过了贝雷萨斯站。上午十点半，我们到达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余下的旅程就坐马车。我们在中饭时分到达佩梅蒂。

佩梅蒂的施主

今天，倘若有人听到佩梅蒂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佩梅蒂之战和在那里发生的群众执行死刑的事。我们搬到佩梅蒂去时，这一切还是未来之神所严加守卫的一个秘密。那时，人们一看到佩梅蒂，心里只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竟会在这样一个倒霉的洞穴里建立这个村庄？"

佩梅蒂既不在森林的附近，也不在森林的边缘，它建立在森林的正当中。这个村庄，是一些马马虎虎造起来的木头小房子的一个堆集场。这些用粗大的树干和枝条匆忙拼凑而成的木头小房子，彼此相隔五十到七十码，有时远至一百码。在木头小房子之间，就是森林。因此，这个村庄占的地面有一个中等城市那么大，东一幢西一幢的房子，都盖在两棵或四棵树木之间，那些树木也就成了建筑物的角落。我在佩梅蒂，还看到过一些围着一棵树造起来的房子，凡是这种式样的房子，那棵树就从屋顶上穿了出来。那些房子的北面都是绿苔。屋顶上的野花中，长着茁壮的灌木。灌木丛中，藏有一个可使房屋居住者避邪的山羊脑壳。喀尔巴阡山的那些古老的住户——栎树呀，土耳其栎树啊，松树啊，犹如瞧不起长在它们脚下的那些丰饶的榛子、刺李、覆盆子和野玫瑰丛一样，轻蔑地俯视着佩梅蒂的这些木头小房子。不过，森林却容忍住在木头小房子里的人，事实上，在有些地方，还保护他们。但是森林又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要是

佩梅蒂村的一个村民，他见过世面，脑瓜里想到了要在屋前屋后搞个菜园子，那森林就会反对。一到时鲜的卷心菜可以收割时，矮树丛就会遮盖住菜园，一些细枝小树就会在园主人用来种黄瓜的地方，张开它们纤弱的身架。

那家雇父亲当仓库管理员的锯木厂，坐落在狭轨铁路和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到加利查去的铺石宽马路的交叉口。工厂的房子是用栎木建筑的。它那淡红色的冲天烟囱，活象伸向那些树顶庞大的栎树的一棵瘦棱棱的白杨。村庄延伸到公路旁。在那一边，森林里栖息着野兔、鹿、狐狸、狼和野猪。马拉马罗斯森林引以自豪的土生土长的野兽是棕色的熊①。

当锯木厂开始吞没森林，管林人在连根拔除了百年老栎树的地方种上了一排排整齐的树苗的时候，这些野兽就隐退到更远的北面去了，那里，松树已排挤掉了大部分栎树，矮小的山枫已取代了榛子和覆盆子矮树丛。只有那些被悬赏缉拿、被宪兵追捕的人，才胆敢跑到那里去。这些人，人们说他们是“受松叶掩护的”。由于松树只有针，没有叶，他们的处境是不可能很舒服的。他们说，这些受松叶掩护的人，“是跟狼分面包而食的”。实际上，说得更恰当点，是狼分食这些不幸的人的骨和肉。

马车把我们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带到佩梅蒂，在辛内尔的家门口停了下来。

除了工厂经理柯勃尔那幢给唤做城堡的马口铁屋顶的房子，辛内尔的房子是村上最好的房子了；也有一个马口铁屋顶，只是不及柯勃尔家那样闪闪发亮。

① 棕色的熊，即罴。黑色的熊，为熊。

一个又结实又灵敏的高个子女人在门口迎接我们。她长了一头黑鬈发，有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洪亮嗓门。她吻了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跟我父亲和我握了手。在请我们进屋后，她才报了她的姓名。

"我是辛内尔太太，不用说的罗。辛内尔！辛内尔！客人来啦！"

我们进去的这间屋子，又宽敞又明亮。辛内尔从隔壁一间屋里走出来接待我们了。

这个虚弱而瘦小的人，左腿往后一拉，向我们鞠了一躬，他的手却一直抚摸着他那把散乱的、长到腰部的胡须。他的黑绸长袖大袍和胡子上都沾着绿色的鼻烟斑渍。两只弯曲的、骨瘦如柴的腿上，穿着一双齐膝踝的、满是大皱褶的白袜子。他跟我父亲握了手，对我们其余的人，只点了点头。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疑惑而又近乎嫌恶地朝我脸上瞥了一眼，搞得我心里忐忑不安。但是，尽管我很担心，这场考试的结果倒还不错。辛内尔带着一种高贵的赞许的神情，慢吞吞地向我点点头，叫我向他走近一点。当我笔直站在他的面前时，他踮起脚来，把那双洁白的小手放到我的头上。屋内顿时鸦雀无声。我俯下头，省得辛内尔老是踮着脚站在那儿。当他用希伯来语——我只听懂了三个古人的名字：亚伯拉罕、以扫和雅各①——念祝祷时，我心里想：这个小个子可能是用他太太的一条胳膊雕塑出来的吧。

辛内尔祝祷毕，就伸出了他戴着戒指的右手，我一把抓住，热诚地握了握。辛内尔吃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他把手一下朝我的嘴边推了过来。

---

① 这三人都是《圣经》中讲的犹太人的祖先。

“这老家伙别是想叫我吻他的手吧?”我心里蓦地一闪。

他正是这样想的。他的手在我鼻子底下颤抖了好一会儿。

“我见过好多人,”辛内尔太太说,“他们为了得到辛内尔的祝祷,不惜丢掉一半财产来吻一吻恰蒂德[①]的手。不过,这位年轻人如果认为他不配这种恩宠……嗯,吉凶祸福,都是人自己招来的。纳塞恩,就别把你的善行强加于他了。丽莎!丽莎!”她高声喊道,“你把汤端上来。”

我们洗了手,在桌旁坐了下来。辛内尔又念了祝祷。当他祷告时,他的眼睛对我瞥了一下,搞得我的脊梁上起了一阵寒颤。

我们已很久没吃过这么多的好东西了。桌上有葡萄酒,父亲是很久以来第一次喝。丰盛的菜肴,加上美酒,使他讲话也随便起来,等端上咖啡后,他就开始讲故事了。为了节省时间,我这里就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父亲讲的故事吧。

故事讲的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据说名叫乔斯·西维拉的人的事。这个可尊敬的乔斯,不但不研读《圣经》,而且拒不承认他那犹太教士的大家族的传统,把毕生精力放在获取世俗的财富上去了。他不走正路,一心只想早点发财。可他搞这一行却不是个老手,他给关进班房去了。为了逃避长期监禁,他和另外几个囚犯一起签约充当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的那首船上的水手,哥伦布当时正要出发去找一条到印度去的最短的航线。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给第一个看到陆地的水手提出了五千福林——或者西班牙币五千比索的赏格。这个五千比索的诺

① 恰蒂德,是犹太圣人。

言，可搞得乔斯·西维拉坐立不安啦。他不但上班的时间，而且全部休息时间也都待在桅楼守望处了。不知上帝是为了奖赏他的持久力呢，还是惩罚他的贪心，竟让他第一个看到了那个新世界，因为在哥伦布的船上，是乔斯·西维拉第一个喊了起来："陆地！陆地！"

回到西班牙，乔斯·西维拉去认领那五千比索的奖赏了，但他并没有得到。在哥伦布出去寻找远方的陆地的时候，西班牙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犹太人已给天主教的费迪南和伊莎白拉①撵出了西班牙。发现新大陆意味着荣誉和光荣，因此，不能承认看见大陆的第一个水手是犹太人。因此，哥伦布就把五千比索授予了另外一个水手，而没有授予乔斯。这样一来，乔斯大吵大闹了，坚持说他是第一个看见新世界的人，要求得到那笔钱。哥伦布没有给乔斯·西维拉五千比索，倒赏了他五十皮鞭。

"那个年轻人活该挨五十鞭，"辛内尔说。"要我就会打他一百鞭，因为他不去读《圣经》，却去追求金子——还轻蔑地拒绝祝祷哩。"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麻烦的是，整个故事只是一个神话罢了，"我说，"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那是真的事情。"

"是这样吗？"辛内尔哇啦哇啦地喊了起来，"没有证据？美洲呢？也许，美洲根本就没有发现吧？也许，在这位年轻人看来，美洲这个证据还不够大，不够可靠，不够可信？"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辛内尔太太的女仆丽莎，一个强壮的乡下姑娘，走进屋子来了。

"那个克沙拉德拉又来啦！"她对辛内尔太太说。

① 费迪南(1452—1516)，西班牙国王；伊莎白拉是他十六岁时娶的王后。哥伦布出海远航曾得到她的支持。

一瞬间，辛内尔太太那张肉鼓鼓的方盘脸气得通红了。

“告诉那个下流坯……”她叫喊道。“不！我亲自去跟他说。”

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奔出屋子，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从那扇门上，我们听得见她那怒冲冲的声音，接着是另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打雷般的声音，淹没了她那刺耳的尖声喊叫。她的尖声喊叫的“忘恩负义的乡巴佬”，得到的回答是一声吼叫：“卑鄙的高利贷者。”

辛内尔默默地做祷告。父亲深深叹了口气。几分钟后，辛内尔太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辛内尔，辛内尔，”她申诉地说，“难道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得到这样的报答？”

辛内尔一声不吭；他兀自做他的祷告。

“跟我来，巴林特太太，”辛内尔太太对我母亲说，“我带你去看看你们的房子。”

我们要住的房子就在辛内尔的住宅旁边。是一幢新房子。松木壁板散发着松树的芳香。窗下面长着一些野玫瑰。两个房间空空如也，没有家具。

“在你的家具搬来之前，我可以借点椅子和草垫给你们，”辛内尔太太对我们说。

趁父亲和母亲正在丈量房间，讨论如何安放正在从维佩斯运来的家具时，我跟辛内尔太太谈了起来。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很有礼貌地问道，“有个名叫亚伯拉罕·霍泽列茨的人，我该上哪儿去找，怎样才找得到？”

“犹太人的上帝呵，”辛内尔太太一把抓着胸口惊喊了起来，“你要找那个强盗，那个杀人犯？巴林特太太！巴林特太太！你

来讲讲看！你的儿子，费迪南·西维拉的外甥——”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啦？你干了什么，格查？”

“你想想看，你倒想想看！他在打听霍泽列茨哩！”

“霍泽列茨是谁呀？”父亲问我。

“我也正在问呐，”我很单纯地说。

“人不该有好心肠。这是我经常说的——人不该有好心肠。我在芝加哥把费迪南从穷困中救出来，给他衣服穿，让他成为一个人，他娶了那个可怕的、长胡子的西蒂。我给了这些人吃的喝的，他们倒来问候霍泽列茨啦。”

“霍泽列茨是谁呀？”父亲浑身打颤，问道。

“我不知道，我正在问呐。”

“一个强盗，杀人犯，叛徒，”辛内尔太太没命地喊叫。

父亲又开始了一阵咳嗽。

“不要激动，约斯卡。不要激动。”母亲哀求道。

我们扶父亲躺在一个空房间的地板上。我叠起我的外衣，塞在父亲的头底下。母亲用手帕擦掉了病人脑门上的汗珠。我两个妹妹放声大哭起来。

辛内尔太太丢下我们走了。

我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访查到了亚伯拉罕·霍泽列茨住的那个木头小房子。我看到霍泽列茨在家里。他正在那间又当厨房又当卧室的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羊毛剪，在给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修剪卷曲的黑头发。当我询问过路的人亚伯拉罕·霍泽列茨住在哪儿时，凡跟我搭话的，人人都管他叫“长脚杆”霍泽列茨，或者干脆叫“长脚杆”。这个称呼挺适合霍泽列茨。他高得出奇，瘦得令人难以想象，有点儿驼背。他的下身，是一

个罗斯人；上身，又是一个犹太人。我的意思是说，他脚上穿的是罗斯人的鹿皮靴；他的细长的身躯上，穿了一条绒裤，裤脚只到膝踝为止，把一对赤裸裸的又瘦又多毛的小腿全露在外面。他的上身没穿衬衫，一件敞开的罩衣在他干瘪的胸部扣不上钮扣。他的这一部分是个罗斯人。头上戴了一顶破破烂烂的、淡绿色的绒皮帽，一圈黑胡须围着他狭狭的脸庞。这又使他很象一个犹太人。

他盯了我一眼，那双又美又聪慧的大眼睛显出一副好奇的神情。

“我给你带来了问候，”我开腔道。

“谢谢你，”霍泽列茨一边剪头发一边答道。

“你不问问我，是谁问候你吗？”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不问，你也会说。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那你上这里来干吗？拉了一把吧？”他问那个卷头发的小男孩。

“你干吗要拉呀？”他回答道。

“告诉你爸，下次别叫你到这里来理发了。叫他让你到没学过剪羊毛的人那里去理吧。”

“要是我爸有理发钱，就不会叫我到你这里来了，”孩子回嘴道。

“恩德列·卡尔曼问候你，”我说。“你认识他吧？还记得他吗？”

“如果他叫人带来问候，他准认识我罗。如果他记得我，那他就认识我的。如果他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他呢？嗯，我有幸遇见的是谁啊，先生？你可以走了，”他对那小男孩说。

小男孩也没道声谢，拔脚就跑出了木头小房子。

我跟霍泽列茨说了我的名字，并告诉他，我父亲是锯木厂新来的仓库管理员。

“你这样忙，要上哪儿去呀？”在我作了解释后，霍泽列茨问道。

“我不忙啊——一点也不忙。我来问问你，在佩梅蒂有些什么工人组织。我怎样才能参加进去，该上哪里去参加？”

“这你干吗来问我？”

“哎，那我去问谁呐？”

“我能给你的唯一回答是：这你干吗来问我？”

“对啦！对啦！让我们认真地谈谈吧。”

“至于我，我是认真的，”霍泽列茨说。“我可才认真呐，告诉你吧，我们佩梅蒂的工人都非常污秽，不值得，甚至不适合一位年轻的绅士来跟我们谈天。”

森林中的冒险

大清早，我提着一只篮子到森林里去，想满满地采一篮山莓。

我一离开最后一个木头小房子，就发现已来到了真正的密林里。大栎树浓密的树顶的阴影，笼罩了一切，只偶尔勉强地让一缕光线闪闪烁烁地落在树底下红的、蓝的、黄的和白的花堆上。松树散发着清香。哪儿都见不到一条小径。藤蔓的卷须，从这棵树绕到那棵树，七纠八缠地搂抱着野花和矮小的羊齿植物。我不得不老是绕圈子，避开那些密集的榛子、山茱萸和野玫瑰的矮树丛。方向我是晓得的。我来到佩梅蒂虽然才三天，可这已是我第三次来采山莓了。

密密麻麻的山莓矮树丛，离林中的一块开垦地只有一石之遥。不计其数的红点点——成熟的山莓——在淡绿色的山莓叶中，显得十分耀眼。

我饱吃了一顿，就把篮子抛在地上，伸手摊脚地躺了下来。这里，阳光从枝叶中穿透下来，风抚爱着你的脸庞，鸟儿在啁啾啭鸣，在这一片森林的色彩和气味中，生活是愉快的。大黄蜂和蜜蜂在我头上嗡嗡打转。凉爽的空气、阳光和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弄得我打起瞌睡来了。在睡梦中，我跟约瑟夫·列普泰克谈了话——确切点说，是他跟我谈了话。

“把这记下来，格查，千万别忘了，”列普泰克说。我要记下

来的那件决不能忘掉的事，待我一醒过来，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有人正在向我走过来。沉重的脚步踩着地面。我很不情愿地爬起身来，看看是谁在扰乱这寂静。没一会儿，我就看清楚了。我推开一根树枝桠，就见一只很大的棕熊已面对面站在我的面前。

我想喊叫，但我的声音在喉头哽咽了。我想逃跑，但我的两条颤抖的腿却动弹不了。

那头熊，用后脚站立着，在我的缭乱的眼睛里，渐渐变成一个庞然大物，朦朦胧胧的，竟比一个烟囱还要高。接着，它又似乎缩得很小很小了，小得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手掌上。倏然间，我恍惚看到，我前面有三只熊，三个毛烘烘的大身躯在有节奏地摇摆着。

那熊漠然地瞪眼望着我。接着，仿佛我引起了它的好奇心，要不，好象它是近视眼，它向我靠近一步，想好好看一看我。我的腮帮上已感觉到它那令人作呕的呼吸。

我们面面相觑互相瞪了多久，我说不上。我已不能思考，也没有了感觉；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停住了。是已过了一千年呢，还是只过了千分之一秒，我说不上。

那熊慢慢地、呆头呆脑地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了。

我又开始活过来——感到害怕了。我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子。我一上来想到的就是跑，可是，我竭尽全力，也只能拖着一双摇摇晃晃的腿慢慢地走。我回过头去，只看见那只熊的宽阔的、深褐色的皮毛。又走了几步——我跋脚跑了。

树枝扯裂了我的手和脸，留下了条条血痕；荆棘挂碎了我的衣服。我摔了好几跤，跌得眼青鼻肿。我一跃而起，又拼命跑

了。我上气不接下气来到村里，心跳得象个杵锤似的。

这时，我发觉自己能够出声了。

“熊！熊！熊！”我尖声喊叫着。

我的喊声惊动了全村。到处都出现了提着斧头的汉子，他们好象在等待着信号似的。立刻，二十来个人一起来问了：“哪里？在哪个方向？”

我挥着手臂指了指，好不容易结结巴巴地说：“山莓，山莓。”

一个犹太老人携着我的胳膊，领我回家。待我们到了家里，我再也支撑不住，哭了。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伐木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那只熊，只看到了熊的足迹和我的篮子。

一个下午，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跑来问我：“是一只公熊还是母熊？”

“我不知道。”

“可惜，很可惜。公熊会走得很远，母熊却总是待在它的洞穴附近。”

刚吃过午饭，一个罗斯男孩来看我了。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个头却比我高，也比我结实。他虽然又高又强壮，他的脸却很温柔，几乎象一个姑娘的脸。

“熊是你看见的吗？”他问。

“是的。”

“我父亲想看看你。”

“你父亲是谁？”

他站直了身子，那张讨人欢喜的脸上现出一副自负的神色。

“我父亲是铁匠米哈尔科；专门杀熊的米哈尔科。”

历史的一课

据一九一〇年的人口调查，佩梅蒂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人，内罗斯人一千一百四十三人，匈牙利人一千零三十一人。匈牙利人中，七百一十四人信奉摩西；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佩梅蒂村民的职业共分为三类。百分之七十二的人受雇于森林和堆木场；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是季节工；百分之一的人从事其他职业。季节工是在蒂萨河上用木筏放木头，在匈牙利大平原上帮助收割庄稼，或者搞点盐矿附近的活儿。我不知道，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告诉我，那些人是来来往往上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做伪证的。

这话是不确切的，因为要说真有一部分佩梅蒂村民是以做伪证当作职业的话，这种职业的收入可不足以使他们糊口活命。再说，做证人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搞得不能在森林里工作啊。

这个村子，是十八世纪后期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逃到匈牙利来的犹太人建立的。他们离开西里西亚，是因为当地法律规定，每一家犹太人，只有一个男人有权利成家娶亲。西里西亚的普鲁士的统治者们，不愿犹太人在他们的国家繁殖；但是又不愿他们移居外国。这样，犹太人就偷偷地离开了那个国家，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丢弃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他们走的路线要经过加利查，来到那里，他们或者不得不避开一切村落，或者向那

些憎恶犹太人、但是爱钱的波兰地主贵族交纳买路钱。犹太移民队的领队人，有时选取这一方式，有时选取另一方式。他们若是混过了那些个村庄，他们驮东西的牲口就会陷在深不可测的沼泽泥淖里，或者困死在森林中。他们若是穿过村庄走，那他们就会囊空如洗。

待到犹太人越过喀尔巴阡山时，他们可以自夸的是，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不过，他们却在匈牙利受到了最大的打击。

他们把匈牙利选为新的家园，那是因为，当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约瑟夫二世认为犹太人也是人。当寻觅家园的犹太人来到第一个匈牙利村庄时，他们知道约瑟夫二世已经逝世了。

约瑟夫二世曾经宣告：匈牙利贵族也不过是人，在这世界上，有的是比他们的产权更重要的问题。十年来，匈牙利的公爵、伯爵和男爵们对约瑟夫二世一直进行着无情的斗争。约瑟夫二世在跟这些豪门缙绅斗争中，需要同盟者，而受压迫的犹太人，正是可以接受的战斗中的同盟者。约瑟夫死后，匈牙利的贵族因为受过约瑟夫的屈辱，就来对跟那位未举行过加冕礼的国王一起反对他们的人，也就是说，城市的手艺人、农奴和犹太人进行报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从西里西亚来的犹太人倘若再往前走，可就不明智了。

可又不能再回去，别无他法，他们只好钻进了喀尔巴阡山的原始森林。他们用树桩和枝桠做起草率的木头小房子，变成了没有武器的猎人和没有犁耙的耕者。

转眼之间，匈牙利人也住到这个犹太人的村庄上来了。这些匈牙利人，不是成群结伙到佩梅蒂来的，而是零零落落、一个一个来的。我认识的他们的孙子一辈的人，都无法告诉我，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上佩梅蒂来以及为什么而来。他们既不是逃跑

的农奴，又不是有刽子手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的杀人放火犯。不过，大多数匈牙利人都是从盐矿里逃出来的。

马拉马罗斯的几个盐矿——阿克纳采克、苏加塔克和斯拉蒂纳——已经开采了几百年。由于十五世纪时乌拉西洛王颁布了一道法令，盐矿从来不会缺乏工人。根据那位国王的命令，那些顽强反叛的农奴，跟异教徒一样，都被判决终身在矿上干苦活。那位国王还注意到了，这种"无期徒刑"不得非法加以延长。盐矿工人根据国王的意旨，一天在地下干十七小时的活。任何矿工，住的地方离盐坑不得超过三百码，他们倘要出去，不得离开住所五百码。

这位国王给矿工们定下了许多禁令和义务。凡是破坏禁令，或者玩忽职守，就会受到惩罚。

初犯割去左耳；

重犯割去右耳；

第三次犯法割去鼻子；

第四次犯法左耳里灌铅水；

第五次犯法右耳里灌铅水。

第六次犯罪——或者企图逃跑，即使该矿工并无前科——就要受刑车的车裂之刑，或者全身肢解为四爿，那就全看经营盐矿的伯爵的高兴了。

打从乌拉西洛王时期以来，矿工的生活条件是改进了。历史学家说，已有大大的改进。但矿工们说，改进得并不多。从马丽亚·特里萨统治的时候起，就已不再拿铅水灌矿工的耳朵，而车刑也被人道得多的绞刑所代替。甚至对一个第一次企图逃跑的人，也不再用刑；而是代之以五十四磅重的铁链，想逃跑的矿工被抓住后，就把这铁链焊在他的脚踝上。他干活也罢，睡觉也

罢，都戴着这副铁链。那时候，工作时间也已减少到一天十五个小时。

有的矿工，脚踝上戴着五十四磅重的铁链逃到了佩梅蒂。到了那里，铁链摘除以后，一般都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当作水牛链子出售。

一八四六年，有许多罗斯人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北坡来到南边，从加里查跑到匈牙利来。一八四六年，加里查爆发了被称为"伟大的严峻考验"的农民起义。波兰地主和德国军官把农民起义淹没在血泊中后，便把那些未能逃脱的人全部处了死刑。我认识一个"伟大的严峻考验"时在加里查、现在住在佩梅蒂的罗斯人。依凡·米哈尔科，杀熊者的父亲，他就是四岁的时候穿过喀尔巴阡山南坡逃来的。

村里的人烧炭，狩猎，捡榛子、野草莓和山莓，借以活命。他们会用陷阱捕野兔，拿斧头袭击狼、野猪和熊。

冬天的时候，狼会大白天在村边悄悄地踱来踱去，傍晚，会到村镇上去为非作歹。倘若它们在夜里袭击一幢木头小房子，你要驱赶它们，就要拿燃烧的麦秆来对准它们扔去。那会把它们吓跑的。但是，如果狼肚子饿了，这个办法就只能制止它们一会儿工夫。要是麦秆或火柴烧光了，木头小房子的板壁是经不住饿得发疯的野兽的猛击的，那就只有全靠斧子了。斧子有时顶用，有时也不顶用。倘若顶用，那个幸运的猎人就可以拿狼皮换的钱去买些蜡烛、火柴和烟草。要是失败了，那么佩梅蒂村里的人第二天早晨就会说：

"死掉的是一个挺正派的人。愿他安息。"

"那三个天真的孩子太倒霉了。"

"那个女人也太倒霉了。她是一个好人。"

狼给人以很大的威胁，给人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当时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他们买一张被斧子乱砍乱斩过的狼皮，只出一福林。野猪就不同了！一只野猪剁成了十块，肉还是野猪的肉；而猪鬃总是能卖好价钱的。自然罗，拿一把斧子去猎熊，可不是一场毫无危险的游戏。可是，一个从小就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打猎的人，甚至还巴不得会碰到危险哩。

那种危险，对于猎熊的人来说，并不太可怕。一张熊皮，可以换来多至十二、甚至十五福林；不过熊是不肯廉价出售它的皮的。比方说吧，三个伐木工人袭击一个嗥叫的动物。那熊先生稍微动一下，就打碎了一个人的脑壳，折断了另一个人的胳膊。第三个人就会把熊皮拿回家去，卖十二福林。按照不成文法，熊肉将一分为三，一份给打碎了脑壳的人的寡妇，一份给断了胳膊的人，第三份就归那个幸运的猎人。死去的猎人的丧葬费和治胳膊的医药费，都由卖掉熊皮所得的钱支付。

总而言之，猎熊更担风险，而且比之打狼也多赚不了多少钱。

直至今天，在佩梅蒂也还找得到那些个拿斧头杀熊的汉子，他们干这一行倒不仅仅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自卫，而是还要以此证明佩梅蒂村的人不是脓包。他们有的人甚至于不用斧头，仅仅手持一把长刀，就去猛烈攻击一头熊。这就是格里戈里·米哈尔科特别喜欢采用的一种习惯。

一九〇四年的夏天，威廉皇帝在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奥匈帝国的皇太子的邀请下，到马拉马罗斯来猎熊了。马拉马罗斯州的州长把杀熊者米哈尔科介绍给了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陛下想看看格里戈里如何用刀子进攻一头熊。格里戈里答应给皇帝表演他的技艺，但那些熊老是避开皇帝及随从他的这位杀

熊者，那可不能怪他。

州长把十四个村子的人都召来了，叫他们到森林里去搜寻熊。几千人拼命地轰赶，至少也得把一头熊赶到陛下的枪口瞄得到的地方去啊。那些搜寻者高声呐喊，捶盘子，击锅子，发出了一片可怕的喧嚷；他们闹得个天翻地覆，却一位熊先生也没有请到。

皇帝生气了，而这位威廉可是不会把意见闷在肚子里的。马拉马罗斯州州长前来告辞，可能希望得到一枚普鲁士高级勋章，这时贵宾却大声喝道："是这样，这就是你们匈牙利出名的殷勤好客？谢谢你啦！我不会忘记的！"

弗朗西斯·费迪南只对州长说了一句："真丢脸。这就是你所谓的政绩？"

"你们等着吧，你们这些下贱的罗斯-犹太熊！"州长大发雷霆，"我早晚会教训教训你们的。"

既然他不能去对熊进行报复，就只好拿打猎时赶熊出洞的人来出气了。他逮捕了三十个帮助猎熊的人，并惩罚其余的人，一律不付给他们应得的三天工钱。但是他却给米哈尔科发了三天工钱一个半福林，可是连他自个儿也说不上这是为什么。这是州长作为政府官员的最后一场表演。

第二天，布达佩斯的内政大臣打来一份电报，州长因"非爱国行为"而给免职了。

陛下走后，格里戈里拿着两把双口长刀，单身一人进入了森林深处，一星期工夫，四只熊就与世长辞。其中有一只是母熊，还是熊类中最危险的一种熊。

这故事我是在佩梅蒂的娱乐场所里听来的，故事不是一口气讲的，甚至也不是连贯地叙述的；事实上，有的细节还互相矛

盾。

米哈尔科的铁匠铺充当了佩梅蒂的娱乐场所。这个铁匠铺，是在四棵活树上支着一个木瓦屋顶的敞棚。铺子里的设备，包括一个有手风箱的炉子，一个大铁砧和两个小铁砧，几把铁锤、双把锤和钳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六七个供客人坐的树桩子。时常有客人到米哈尔科这里来，不是打听消息，就是带来消息。

当我们迁居到佩梅蒂时，这个村子里已有一个派出所，一个宪兵营房和一所小学了。这村子已不再是一个避难所。在我那个时候，人们已都从佩梅蒂逃往劳动能得到报酬的地方——美国去了。

佩梅蒂是通过一个名叫乌尔里克·格伦米尔的德国人被外界发现的。这个格伦米尔——到处都管他叫“有钱的德国佬”——可能算不了什么，一辈子也只是个中等的投机商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有钱的德国佬

如果一块墓碑，足以证明以前曾经有过某一个人的话，那么，我自己的眼睛就使我确信，乌尔里克·格伦米尔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而且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看到过佩梅蒂墓地里他坟上那块黑色大理石的大墓碑，碑文上写着：

为文明而斗争的英雄和烈士
乌尔里克·格伦米尔先生在此安息
1827—1875
我们将复活

有朝一日，倘若乌尔里克·格伦米尔先生真的复活了，那我可得认认真真地劝告他，在佩梅蒂还是别干这种事情为妙。他们甚至不会让他从复活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会再次把他打死的。佩梅蒂村的人是干这种事的行家，这点，乌尔里克·格伦米尔应该比别人更清楚。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以及在那以后，我经常听许多人讲到乌尔里克·格伦米尔；因之，我对他比对我的许多好朋友还熟悉。我知道，乌尔里克·格伦米尔是一个德国绅士，长得又高又胖，稍微有点驼背，红脸膛，黄胡子。他那两只淡蓝色的眼睛，有点儿斜视。他老是笑，笑得太响了，有点刺耳。格伦米尔爱吃佳肴美酒——两样都吃得很多——而且一天到晚抽雪茄，象孩

子嚼甘草似地咬着雪茄烟头。格伦米尔也不是一个不理睬姑娘的男人；他很喜欢那些几乎还是小妞儿的年轻姑娘。

一个春天的早晨，他突然来到了佩梅蒂，跟他同来的有一个叫西德拉赛克的布拉格工程师，一个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律师，一个森林官和两个宪兵。这伙人是骑骡子沿着一条森林小道到达佩梅蒂的。

这些人来后就从骡子上下来，从骡背上搬下袋子，铺在草地上，便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待他们吃饱喝足，一个宪兵就吹起了军号，叫村民集合。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律师说话了，他告诉大家，光临佩梅蒂的这位维也纳绅士，已向政府买下了这个村子所在地的森林，同时，也买下了从村子边界到白雪覆盖的大山之间的森林。这位维也纳绅士要开发森林，供工业上使用。

"他是要养猪吧？"有人问道。

"他将把木料加工，把木头做成家具、木板、屋顶板。"律师回答道。

"好呀！那才好哪！"村民们赞同地喊道。

律师把要说的都说了之后，格伦米尔站起来讲话了。他讲的话由律师翻译成匈牙利话，由工程师西德拉赛克翻译成罗斯话。格伦米尔在简短的演说中，至少二十次用了"文明"这个词儿。佩梅蒂村的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大家都很感兴趣。当格伦米尔用"文明万岁"这句话结束他的演讲时，村民们向讲话的人起劲地欢呼。

格伦米尔和他那一伙人又大吃大喝起来。佩梅蒂村的村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对格伦米尔吃东西的样子，甚至比对他的演说还要欢喜。他哪里是在嚼肉，简直是囫囵往下吞呀。

有个佩梅蒂的犹太人，红头戴维·赫希费尔德，慢慢走到格

伦米尔身边，俯下身子，凑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在你的计算中，有一点可搞错啦，老爷，"他告诉他，"佩梅蒂这里没有马路，没有到市镇上去的马路，也没有到蒂萨河去的马路，这里砍下的木头，会留在这里烂掉的。"

"嚯，嚯①，"格伦米尔回答道，一边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簇新的五克劳采的硬币，扔到赫希费尔德的脚边。

一见有这样的好结果，第二个犹太人，萨木·纽费尔德，也慢慢向格伦米尔走过去了。

"阁下不应该买这里的森林，"他亲昵地打着耳喳说，"应该买靠近蒂萨河的。不错，那边的土地要贵一些；但那边砍下来的木头可以顺流运到下面平原上去。"

格伦米尔吞下了他嘴里的那一大块肉。

"嚯，嚯，"他用酒把肉灌下去后，说道。他也给了纽费尔德一个新的五克劳采硬币。

接着，一个叫梅盖列的村民，用匈牙利话向格伦米尔提出了忠告。

"什么是真的，这是真的呐。一个精明的人，不会到这里来砍木料。不过在这森林里也有好事可干，那就是打猎。熊啊，野猪啊，狼啊，狐狸啊，鹿啊——这些东西森林里全都有。毛皮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卖得好价钱。"

"嚯，嚯，"格伦米尔一边回答，一边递给他五克劳采。

现在，老老少少都围着格伦米尔团团转了，这位"有钱的德国佬"朝佩梅蒂村的村民中撒了两把五克劳采硬币。

"他是一个造币厂，那家伙，"村民们心里猜测着，又向格伦

---

① 格伦米尔不会讲匈牙利话，把"好"字讲成"嚯"了。

米尔欢呼了。

待到吃喝完毕，两个宪兵就给骡子上了鞍子，这一伙人都爬上鞍子去了。

“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们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律师说，他高高坐在骡鞍子上，又发表讲话了，“我几乎忘记说了，打猎，烧炭，捡蘑菇、野草莓和榛子，以及采集野蜂蜜，今后一律禁止。你们造了房子的土地，得付地租。地租的金额将由一个委员会来规定。”

村民们对那个可尊敬的律师发出了欢呼。他们并不当真看待这项禁令，因为有谁能来跟他们核算呢？至于委员会嘛，世界上哪个委员会也别想从佩梅蒂村的村民身上挤出钱来。

格伦米尔来访后几天，村上又来了另外几个客人：一个老是笑嘻嘻的工程师（无疑是由于他那鼻子的样子，村民们给他起了个诨名叫“马铃薯”）；四个看去象城市工人的汉子；还有四个宪兵。这些陌生人，或者，按佩梅蒂村民对所有的陌生人的称呼，这些外国佬，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村子中央搭起了两个作为住处的篷帐。工程师马铃薯和工人们忙着丈量土地，在树桩上作记号，宪兵们则守卫着篷帐。两三天内，村民们都跑来观看外国佬工作；之后，只有孩子们注意他们了。过了一星期，工程师马铃薯吹起军号，召集村民开会了。待村民们集合拢来后，他对为什么要筑一条路作了解释。村民们耐心而温驯，听工程师讲完了话；事实上，有几个人甚至还叫好哩。但是当工程师马铃薯问，谁愿意到筑路队里工作时，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

工程师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一边咒骂，一边取出铅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一个宪兵带着那信，上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去了，并且带回了回信。两天后，一支四个工人和六个宪兵组成的

队伍，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来到了佩梅蒂。工人还带来了几匹驮着很重的大包裹的骡子。当一部分工人忙着搭篷帐时，另外几个工人卸下了驮子，让村民们看了个一清二楚。老天！那些个包裹里什么没有装呀！且不说村民们连听也没听说过的吃的喝的，光是那五花八门的手帕、丝带、蓝的红的念珠、崭新的烟斗、小刀……也许连普鲁士王也不会拥有摊在佩梅蒂村村民面前那样多的财产呐。

外国佬把这些宝贝疙瘩都藏进了篷帐。工程师马铃薯向村民们解释说，篷帐里的东西都是出售的。其中有个陌生人，一个叫贝普波的意大利人，象吉普赛人一样长着一副亮闪闪的牙齿，砰砰敲着胸脯，高声喊叫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卖的！你给我贝普波钱，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烟草、烟斗、小刀、剪刀、围脖儿、丝带、糖，甚至辣椒。"

佩梅蒂的村民们取出了格伦米尔给他们的那些五克劳采硬币，可是贝普波显然瞧不起那个德国人的钱。他收下钱，只给了一点儿盐、烟草或者火柴，如果有人拿五克劳采要得一个烟斗、一把小刀或一条围脖儿，贝普波就笑了，摇摇头。

"那不行！那不行！"

工程师马铃薯看出村民们并不缺乏买东西的兴致，只是没有钱罢了，他就对他们说：

"来给我干活吧，伙计们，来筑马路吧。你干了活，就会得到钱，有了钱，你要买啥就可以买啥。"

村民们议论起来了，他们低声商谈了一会儿，接着就散开了。没有人来要求工作。

后半夜，不知是什么人把贝普波的篷帐搬光了。宪兵们漫不经心地去寻找被窃的货物。他们为了装装样子，任意找了一

两个人，把他们打得个半死，调查工作也就结束了。

工程师又给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写了一封信。这一回，回答他的是，来了十二名宪兵和三位陌生的绅士——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没有象工程师那样吹军号把人们召集拢来，而是在六名宪兵陪同下，挨家挨户走了一趟。

宪兵用枪托砰砰捣门。

“这屋里有人吗？”

屋里的主人出来了。

“你在这个木头小房子里住了多久了？”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父亲也是在这里生的。”

“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只有上帝知道。”

“好，我们就算他是六十年前出生的吧。这样，你使用这幢房子已经六十年。你，不用说，从来没缴过地租吧？对啦！你以后要缴了。一年二十福林。一年二十福林，补齐六十年；加起来正好一千二百福林。我们不算利息——那算我们送给你了吧。我们也不要你立即缴付这一千二百福林。你可以延期三天。不过，三天以后，你必须缴付。”

屋主人笑了。

“一千二百福林？就是我家的老头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而他可是个精明人。”

这时，那个委员会已到下一幢木头小房子去了。村民们并没有认真看待委员会的事，可那些外国佬却不是开玩笑的。待三天的期限到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又来了几个绅士。不久就弄清楚了，这几个绅士并不是委员会的，他们是法院里的人。现在，那个委员会由宪兵们和司法官陪同，在村子里兜圈子了。

第一幢木头小房子里住的是红头戴维·赫希费尔德。

“你欠了多少地租？”一个委员问赫希费尔德。

戴维搔搔头，接着搔搔屁股，肩膀一耸。

“你欠一千二百五十福林，”那个委员看着帐本宣告道。“我们是来向你收那一千二百五十福林的，”他对戴维说。“自然，你缴了钱，会给你一张收据。”

“你们这些先生是发疯了吗？”戴维突然喊道，“还是你们想拿穷人开玩笑？”

一个宪兵把手按在戴维的肩上。

“安静点，”他说。

“你缴不缴钱？”一个司法官问。

“缴钱？我到哪儿去搞钱呀？”

“换句话说，你拒绝交付？好，既然你居住的房子是建筑在格伦米尔先生的土地上，房子的木头是从格伦米尔先生的森林里偷来的，你就马上搬走吧。你在佩梅蒂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那就收捡起你的全部家当，今天就离开这村子。”

“老天，我能上哪儿去啊？”戴维大声喊了起来。

“随你上哪儿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谁愿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

一个法院里的绅士对两个宪兵丢了个眼风，那两个宪兵走进了木头小房子，二话没说，动手就把戴维那些可怜的家什往屋外扔。

戴维两眼充血，挥起拳头，就一头向那个法院里的绅士冲了上去，可是，一个宪兵用枪托朝他当胸一记，打得他的身子打了个转。

戴维的叫喊，他妻子的哭号，孩子的尖声呼叫，使村里的人

都跑来了。有的提着斧头，有的提着木棍。但是宪兵们也重新集合了。

村民们吼叫着，威胁着。宪兵们整好了队，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上子弹！”宪兵班长下了命令，铁器的卡嗒声，从呼号声、尖叫声和哭泣声中传了过来。

“瞄准，”班长命令道。十二支步枪筒对准了村民。

宪兵们排成一条线，一动不动地站着。佩梅蒂的村民们好象野猫准备扑向它们的捕获物，都弯着腰，脑袋缩在肩胛骨中间。到处有人在捶着胸部。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人啊，人啊！你们发疯了吗？”

乌尔里克·格伦米尔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佩梅蒂。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

成百个声音，一个个想喊得比别人响，开始向那位有钱的德国佬诉说发生了什么事。

“真没想到！上帝保佑啊！”他不住地重复说。

“稍息，”班长下了命令。宪兵们放好武器，笔直地站着，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待到喧嚷声静下来后，格伦米尔给了赫希费尔德和他的九个孩子每人一枚五克劳采硬币。然后，他建议村民们，叫十个年长的人坐下来跟他谈判。

老人们在篷帐里跟格伦米尔和那个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律师商谈了两个小时。在谈判时，他们喝了德国佬的白兰地，吸了他的烟草。格伦米尔对任何人都毫不吝惜。

两小时后，达成了协议。村民们被准许仍然居留在他们原先的住屋里。格伦米尔勾销了所欠的地租。村民们将在工程师

马铃薯的监督下，干一个月活，抵付当年的地租。

协议还规定了打猎的权利。打猎只准打那些危险的野兽，即狼、熊和野猪。熊和狼的肉归猎人获得，皮归格伦米尔。格伦米尔得野猪肉，猎人得野猪鬃。

森林的外貌和生活，马上按照那个有钱的德国佬的意志改变了，其速度之快，若不是亲眼目睹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三天工夫，村子中央就建起了四座宽敞的营房。两座归宪兵住，一座归工程师马铃薯和城里来的工人住。第四座供贝普波做生意，存放骡驮子接连不断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很快地运来的货物。

营房一落成，筑路就开始了。佩梅蒂的老老少少都忙着砍木头，锯木料。城里来的工人用炸药炸掉树根；挖根填坑的事留给佩梅蒂的村民干。工作从凌晨开始，一直干到深夜，大家既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采蘑菇和山莓、找鸟蛋和打猎了。虽然如此，干苦活的人却随时有吃又有喝。贝普波什么都供应他们——赊帐。

一个月后，佩梅蒂的村民们又是自由人了。要不是贝普波的话，本来生活就将恢复原状了。可一个月来，贝普波向佩梅蒂所有的人都大方地赊销货物，在一个本子上记了帐，现在开始来讨帐啦。

“还帐？我上哪儿去搞钱啊？”

贝普波可并不因为佩梅蒂的村民们没有现钱而就此罢休。他拿宪兵、律师和法院来威胁他们了。现在，村民们已都领教过，法院不是开玩笑的，为了免得跟法院闹纠纷，他们才乐意还债呐——可他们上哪儿去搞钱呢？

工程师马铃薯来援救他们了，就象格伦米尔一个月前一样。

工程师愿意替村民们偿还他们欠贝普波的帐，只要他们以后用劳动来抵偿他为他们垫付的钱就行。这位工程师可不乱卖东西给他们。你干一个月活，他付给男人八福林，付给女人四福林，付给小孩两福林。

为了免得跟法院闹纠纷，佩梅蒂的村民们又继续筑路了。现在他们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干活是有钱的了。他们不用操心吃的。打从工程师给他们偿付欠款后，贝普波又答应让他们赊帐了。到了月底，他们已还清了大部分的欠款。佩梅蒂每一户人家，在帐本上已只留下两三福林了。这笔钱跟村民们第二个月里新欠的钱加在一起。为了还清这笔债，他们第三个月又工作了。

当工程师把应该支付的月薪直接付给那个意大利人时，结果佩梅蒂的村民们每个月吃的比他们赚的还多了。工程师把全部工资都交给了贝普波，可是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偿付全部欠款。每个人都挂着一小笔债，不是三福林就是四福林。佩梅蒂村的村民们从天亮干到天黑，一个月又一个月，那条通往蒂萨河去的马路延长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村民们欠的债也越积越多了。在深更半夜里，贝普波被狠狠揍了一顿，但是情况却并没有改变。一天夜里，有人企图来抢仓库，可是宪兵们并没有打瞌睡。

村民们向工程师诉苦了。

工程师马铃薯注意地倾听了他们的苦衷，把这事仔细考虑了一番，劝告他们说：

“你们要少吃一点嘛，朋友们。你们干吗老是要吃腊肉？吃面包和玉米粉吧；那样，你们就无忧无虑了。你们以前并不吃腊

肉呀。”

“我们以前干活也没这样累啊。”

“我干活干得比你们少吗？”

这一问可把人问住了，因为工程师的确是起早贪黑地做事的。不过这并没有减少村民们一个子儿的债务。

马路快要造好时，工厂的工程也开始了。工厂是用栎木筑成的。工厂一完工，几辆六头牛拉的货车，就给佩梅蒂运来了机器——又大又重的钢铁铸造的机器，是佩梅蒂的村民们做梦也没见到过的。而从此以后，他们也就不得不开这些机器来抵债了。

机器安装好，锯木厂建造好，准备开工了。为工厂落成安排了巨大的庆祝典礼。所有的木头小房子都挂起了旗子和条幅。格伦米尔邀请全村人都去出席。在林中空地上，烤了两只水牛，摆了三桶葡萄酒，每桶都装六公石，外加一小桶桶上装有龙头的白兰地。人人都开怀畅饮，饱餐了一顿。

近傍晚时，格伦米尔乘马车来到了佩梅蒂。这个有钱的德国佬情绪很好。平常，他一个人吃喝，抵得三个人的量；现在，可以吃十个人的量。

他当着众人的面，搂抱了姑娘们，从仆人提着的一只篮子里，抓起一把把五克劳采的硬币东撒西扔。

晚上，当村民们聚集在篝火边跳舞时，格伦米尔已喝得酩酊大醉。他吹嘘地向大家夸耀，他多聪明啊，一英亩森林地价值一千福林，可他向政府买来时，却只花了两个福林。他不仅吻姑娘们，甚至还吻一些长胡子的男人。午夜时分，他登上一个大酒桶，对大家发表讲话了。他的演说是这样开的头：“喂，你们这些狗！是我教会了你们干活，不是我吗？不过等着！最好的还

在后头呐。”

他讲不下去了——突然一阵呕吐。两个男人抓住了他，才没让他从桶子上掉下来。人群中其余的人都欢呼起来。

等跳舞完毕，四个男人把这个德国佬抬进了经理室，让他睡一觉醒醒酒。他们把他往床上一扔，也没有脱掉他的衣服。

第二天中午，格伦米尔没有起床。工程师马铃薯敲敲德国佬的房门，没有回答，他就推开门，走了进去。格伦米尔已经死在床上，他的脑壳给砸碎了。

经法医检定，格伦米尔的头是给一个钝家伙，很可能是一个啤酒瓶砸碎的。全州的警察给动员了起来搜捕凶手。找不到罪犯的踪迹，警察就只好用鞭子把二三十个佩梅蒂村民抽了一顿；可那也没有用。凶手始终没有找到。

这个有钱的德国佬给埋在佩梅蒂的墓地上。那位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来的罗马天主教牧师主持了葬礼，用两句仿匈牙利古诗的话，把死者的灵魂交给了上帝：

上帝，不要把他看作是德国人，
他也是你的创造物！

德国佬给埋掉了；但那个工厂却仍然留在地上——并且从此全权支配着佩梅蒂。

森林中的工作

锯木厂生产木材——梁、板、盖屋板。把半成品的家具木材卖给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和昂格瓦的家具厂。栎木厂房里装配的是蒸汽传动机。开机器的只有二百来个工人，其余的人都在森林里干活。砍伐森林，用的是能够想得出来的一切最原始的方法，全凭手锯斧砍。倒下的树木给砍掉枝桠后，粗大的树干就从山上滚到下面的山谷里。然后再从那里由人拖到工厂去。拖走一棵大栎树要十个或十二个男人，拖一根松树则四个或六个人就足够了。拖木头的人，象载重马车上的马一样，给拴在那棵树木上。监工啪啪挥着鞭子，发出起步的信号，拴在树木上的工人就曳起来了，“用力拉呀！用力拉呵！”

工厂里雇用的工人，一天十四个小时拿六十五克劳采。伐木工人拿五十克劳采。是出于偶然吧，匈牙利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分配在工厂里。只有十五个或二十个犹太人——没有一个罗斯人——受雇在工厂工作。在一起砍树伐木的，有匈牙利人、犹太人和罗斯人。只有雇来拖运木头的却全是罗斯人。这种安排的偶然性，竟是铁一样的一成不变。

要说这种安排的偶然性含有什么目的，那么这目的可并没有达到。佩梅蒂的村民们，不管语言有何区别，都一概被认为是佩梅蒂本地人。凡不是佩梅蒂本地人的，就始终是个外人。

“匈牙利人在面包上撒辣椒粉，犹太人在面包上擦大蒜，罗

斯人吃干面包。但是佩梅蒂每个挨饿的人，却都用同一种语言咕噜咕噜叫。”

这句精辟的格言出自长脚杆霍泽列茨之口。

依沙克·桑费尔德常常说：“匈牙利人喝葡萄酒，罗斯人宁愿喝白兰地。要是既没有葡萄酒，也没有白兰地，那时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佩梅蒂的村民们以他们自己的特殊方式，对工厂采取的新制度提出了抗议。在格伦米尔死后几个月，他们打死了工程师马铃薯。另外派了一个工程师来接替马铃薯；但是村民们的处境并没有变化。接着，佩梅蒂的村民们打碎了工厂会计的脑袋。新来的会计在他们工资袋里装的工钱并不比老会计装得多。他们就放火烧掉了经理的房子，可是即使那样，结果也既没有提高工资，又没有改善待遇，他们就听天由命了。他们开始梦想着美好的生活，可又没有干什么事使那美好的生活快点来临。

一夜又一夜，牧人的篝火在林中空地上燃烧，象灯光吸引夜间的飞蛾一样，吸引着佩梅蒂的村民们。

灯火烧焦飞蛾的翅膀；牧人的篝火却给精疲力竭的村民添上了想象的翅膀。当老人们讲述故事时，他们的听众也跟着他一起飞回到古老的岁月里去了。

在火堆旁边，讲话的总是那些老年人。

老年人轮流讲述他们童年时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事，而这些事，可都是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当年他们的祖父听说的事，他们现在全都相信——讲的事情当然不会永远不走样。

“当他来的时候——”

“当他回来的时候——”

谁也不怀疑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从东方来的嘛，太阳升起

的地方！他来的时间也是固定的：最需要的时候，危急的时候。

来的是谁呢？一夜又一夜，围着这个题目，反来复去一遍又一遍地争论。

犹太人是在等待摩西。他们的摩西，是一个胡须长长的犹太老人，背上驮着一个深不可测的袋子，你心里想要什么，这袋子里就有什么。你可以走去向他说："摩西，我要一包烟草，几盒火柴，一品脱白兰地，三盎司①西格特的辣椒粉。"摩西会同意地点点头，从他的袋子里掏烟草、火柴、白兰地和辣椒粉给你。那才是生活哪！

"好，好，"匈牙利人附和道。"要是摩西有一次走错了路，真的来到了这里，那我们也不反对。不过，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他。要是一个人背上驮着一个袋子，那他是出门做买卖的，就不会拿东西送人啊。而如果他有这么多东西要分给人家，就不会傻得去沿街叫卖了。"

匈牙利人都期待着一个叫做克沙巴的人的到来。这个克沙巴，可不是什么沿街叫卖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王子，匈奴王阿提拉的小儿子。

他们给阿提拉王喝了一种滴了几滴茄科毒草汁的葡萄酒，待他睡着的时候，他的妻子、一个邪恶的德国人，背信弃义地谋杀了她的丈夫。高贵的国王死后，那个德国女人又对国王的儿子们和骑士们施行了妖术，使他们互相争吵，用箭、戟、剑、军斧和棍子打了起来，直打得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当骑士们都流血死去时，那个德国女人就想把那些匈奴孩子带到德国去做奴隶了。要不是克沙巴王子是死了的国王的儿子的话，这件事她

---

① 品脱，液量名，合中国〇.五六升。一品脱有二十盎司，一盎司合十六分之一磅。

也同样早就办成了。克沙巴命令匈奴的孩子们把已倒下的骑士的马赶在一起，那些马比风跑得还快。

“上马，”克沙巴一声令下，他们在雾中消失了。谁也没有再看见过他们。

克沙巴王子领着这支孩子军，直接上天去了。（嘘！别让德国人听见！）在没有云彩的夜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克沙巴走的那条路。那些不了解这一事实真相的人，竟管那条匈奴马飞奔上天的路叫做银河！

从那以后，克沙巴的孩子兵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等着在紧要关头再回到匈牙利来。等他回来时，每个匈牙利人就都会有一匹比风还快的马，一把比太阳还明亮的剑；全体匈牙利人都会喝克沙巴的骑士们用皮酒囊装来的陈葡萄酒。

“也许，是会这样的吧，”罗斯人说。

“那可不一定，”犹太人嗯嗯呃呃地说。

罗斯人也罢，犹太人也罢，都不把每个匈牙利人有一匹马和一把剑看作是最大的幸福。至于陈葡萄酒，那可最不合犹太人的心意了。即使新葡萄酒吧，几杯一落肚，也会使得匈牙利人拔出刀剑来。要是他灌满了陈葡萄酒，那晓得会出什么乱子啊？

罗斯人期待着一个名叫乌拉基米尔的人来帮助他们，这人的职业跟克沙巴一样，也是个王子。他住在大山和大海那一边的遥远的基辅。有一条比蒂萨河更宽、更快、更深的河，流经基辅城。在那道河的岸上，住着一个邪恶的巨人，他身子比塔高，力气比熊还大，生性比狼还残忍。这个邪恶的巨人，靠吃处女的血肉过日子；他眼睛一扫，就会使牛奶变红，使马变成跛足，叫孩子着魔。要不是乌拉基米尔王子的话，他准会祸害所有的人，乌拉基米尔跟这个邪恶的巨人搏斗了三天三夜。这个巨人的牙

齿，一共七七四十九次紧紧咬住了王子的喉咙——可是乌拉基米尔用他硬如钢铁的拳头，把那嗜血的牙齿一颗接一颗地打碎了，接着，他把那个邪恶的巨人从陡峭的河岸上扔进了河里。全城的人都看到了那个被打败的巨人的吓人的身躯在河里漂浮。要是乌拉基米尔知道下喀尔巴阡山的罗斯人的贫穷生活……

这个老故事一夜又一夜，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讲了又讲，就象晚上，火堆烧起来了，一直烧到后半夜，又熄灭了。但是摩西并没有来，住在下喀尔巴阡山的人，也没有等到克沙巴王子或乌拉基米尔王子。

可是有一天，没想到却来了一个人，这人的打扮，活象被焦急地等待着的那三个救星之一的摩西。但相象的只是外表。桑费尔德老头，他不能再砍木头了，就成了一个收破烂的。他走东村，跑西庄，背上驮着一个袋子，嘴里吹着笛子，唱着歌，手里挥着一把赶狗的雨伞。一天，桑费尔德老头来到了佩梅蒂，带来了一桩新闻，说蒙卡契、索莱瓦、彼列克西尼和伏洛克的工资都比马拉马罗斯的高。这老头还知道，外界的工人工资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比佩梅蒂村民的柯勃尔经理心肠好，而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索莱瓦和伏洛克的那些人——要求提高工资，那个经理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只好照付给他们。

“瞎说一气，”佩梅蒂人嘲笑道。

但是他们骂也好，笑也好，桑费尔德老头还是反来复去地这样讲。

“去要求嘛！去要求嘛！”他说。

“好，去找柯勃尔呀，要求他给我们加工资呀。我们会拿的。”

“要是我一个人去，他会把我踢出来的，”桑费尔德说，“但要

是二十个人一起去，他就不能把二十个人都踢出来了；他没有那么多脚。”

由于桑费尔德很坚决，村民们都顺从了。他们派了一个二十人的代表团去找经理柯勃尔了。柯勃尔是维也纳人，来到佩梅蒂还只有两年。他迄今还是一个城里人，天天刮胡子，即使上森林里去，也都要戴个硬领。他不喝酒，也不打牌。晚上，他会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在他妻子的钢琴伴奏下拉小提琴。他们奏莫扎特、巴赫的乐曲，有时也奏李斯特①的。他跟工人说话，口气谦和，显得很有耐心，也通情达理。

但是当佐尔坦·梅盖列告诉柯勃尔他们是为什么事而来时，这位经理的镇静可就垮啦。他气得说不出话，只是指指房门。由于这个逐客的手势对代表团并不起作用，这位很有礼貌的经理终于喊出声来了：

“快滚！滚出去！出去，你们这批强盗！强盗！”

“喏，你瞧，他没有用脚就把我们踢出来啦，”霍泽列茨责备等在院子里的桑费尔德说。

“你们没有搞好嘛。”

“呃，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呐？”梅盖列向桑费尔德叫喊道。

“不知道，”桑费尔德承认道。“我们应当去问问索莱瓦或者贝雷萨斯的工人。要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花钱把他们是怎么干的那个秘密买下来。”

要是那个经理只限于把代表团撵出去就算了，情况很可能也就暂时又会跟以前一样了。可是，当梅盖列和霍泽列茨被解除了工厂里的工作被派到森林里去干活时，他们可决定不能就

---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此罢休了。一连开了三夜的秘密会后，霍泽列茨动身上贝雷萨斯去了——他的路费是大家凑起来的。几天后，他回到了佩梅蒂，同来的还有一个汉子，名叫贾诺斯·福蒂。这人在早晨到达佩梅蒂；他在米哈尔科家里过了一天，那天夜里，一直到天亮，他都围坐在一个牧人的篝火边。第二天早晨，米哈尔科护送他去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他在那里搭火车上了贝雷萨斯。柯勃尔也罢，警察也罢，都没发觉福蒂的来去。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当然被柯勃尔注意到了，他千方百计叫宪兵们睁开眼睛。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福蒂来了一趟，佩梅蒂的机器开始慢下来了。它们堵住了，皮带滑脱了……经理给所有的机器都擦了润滑油，但润滑油可修不好机器。事实上，轮子越擦润滑油，反而转得越慢。

工厂锯的木头比以前少得多了；几天后，几部机器索兴停工了；森林里没有运来足够的木头。柯勃尔到森林里去了，他在那里先查看了运输工人。那些拴在木头上的人，都在使劲地拖拉着，使劲得连肠子都会崩裂。柯勃尔从运输工人的脸上，看出他们是使尽全力在干。倘若在别的场合，柯勃尔也许会觉得，监工卖力卖得过头了，可是眼下，他们不断地挥着鞭子，他看了却很满意。

"这里一切都有条有理，"柯勃尔心里想，就向伐木工干活的地方走了去。陪他去的有一个名叫特梅西的匈牙利工程师。

他看那些工人干活，足足看了一个小时也没看到一点过失或疏忽的迹象。工人们都安心地忙碌着；一伙人用一把双条锯在锯一棵树；另一伙人把一根绳子缚到正在锯的树上，让它固定位置；第三伙人在拉那根绳子，让受了致命伤的树干倒下来。经理没有看到一个东游西逛的人。他已决定要走了，这时工程师

特梅西却高声喊了起来："真想不到！"

经理快步跟着特梅西跑去。

"你们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啊？"特梅西朝一群伐木工吼叫道。

"我们在干活啊，"霍泽列茨代同伴们回答。

"你瞧，柯勃尔先生，"特梅西说，"这棵栎树还没有锯，这些流氓却想把它拉倒。天知道他们把这根绳子缚上去，已浪费了多少时间，现在，这伙下流坯却在拉绳，虽然他妈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棵树就是一千个人来拉，也拉不动呀。"

"决没有的事，"霍泽列茨惊讶地说，"我们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污辱。不过话说回来，老爷，马有四只脚，有时也失蹄。尤其是，如果肚子饿了的话。"

经理好不容易克制住了，才没有给这个厚颜无耻的犹太人一个耳光。可是一个人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度的。正因为大喊大叫不是他的习惯，他一旦喊叫起来，声音就提到了最高的程度。

"你们是一帮恶棍，一个比一个坏！"他高声喊叫道，"流氓！应该受绞刑！"

"请吧，先生，"霍泽列茨对特梅西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把经理说的话翻译成匈牙利话，或者罗斯话，或者意第绪话，你也知道，我们都是穷人，没有知识，我们不懂德国话。"

"我们走吧，先生。我们不跟这些人说——让宪兵来说。"

可柯勃尔却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我要绞死你们，把你们全都绞死，看我的，你们这些下流坯——"

经理的话只说到这里为止——树桠上掉下一个笨重的铁

锤，击中了他的左肩。只要再移一寸，它就会劈开柯勃尔的脑壳。现在只打断了他的肩胛骨。

工人们都是很人道的。他们掷下工具，急忙用栎树枝条扎了一个粗糙的担架，把他抬回佩梅蒂去了。三百来个伐木工，为了表示同情，把伤员护送到了他的家里。工厂里的工人们，听到出了这件事，都非常激动，他们一连专门谈论了三小时，听任机器自个儿转动着。

第二天，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警察局长米哈莱·凯梅尼斯到佩梅蒂来调查了。正是这个凯梅尼斯，在几年之后，他的大名因为跟那场罗斯人大审判有关而登上了全世界的报纸。凯梅尼斯逮捕了霍泽列茨和十五个伐木工人——五个犹太人和十个罗斯人，是他任意挑选的。

霍泽列茨举出工程师特梅西来作证人，说那把铁锤不可能是他从树上掷下来的，因为那不幸事件发生时，他一直站在树下面经理的身边。特梅西支持这一供述。除了特梅西之外，还有二百一十七个人——全体伐木工——作为证人写了呈报。

凯梅尼斯审查了那十个有匈牙利名字、说匈牙利话的见证人。他把他们十个人全逮捕了，然后，他就骑马回到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这十个见证人都证实霍泽列茨在出事时并没有在森林里。十个人都愿随时起誓证明，霍泽列茨是佩梅蒂最虔诚的人；他天天为国王作祷告，而且总是告诫工人们，他们应当为自己能餬口活命而感谢工厂的经理。

调查只确定了一个事实：那把铁锤原先在工厂的工场里，两个月前就不翼而飞了。是谁拿去的呢？警察可侦查不出来了，就象他们查不出是谁把这把铁锤落到柯勃尔的肩上一样。

凯梅尼斯命令佩梅蒂的宪兵班长派一个“监视人”到工人中

间去。班长就让亚当为他效劳。亚当在工厂里工作，厂里的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奥古斯特·坦泰津斯基。他是从加利査的斯特鲁伊到佩梅蒂来的。他给起了“亚当”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虔诚的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相信在天堂里的亚当[1]既是波兰人又是天主教徒。他一有机会，就当众发表这一见解，也不管有多少人嘲笑他。

遵照宪兵班长的指示，一天夜晚，亚当来到了森林里人们围着篝火讨论世界形势的地方。这个波兰人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夜间故事会。他并不很乐意去，人家也并不对他表示真诚的欢迎。不过，大家还是给他让出了一个位置。

亚当聚精会神倾听了一夜。由于他掌握的意第绪语、罗斯语和匈牙利语都很有限，因此，对篝火边谈论的那些话，并不怎么听得懂。他向宪兵班长报告说，有个名叫乌拉基米尔·克沙巴的人，正扮作一个犹太小贩，在喀尔巴阡山到处跑，一心想把经理柯勃尔扔进河里去。亚当的报告不太令人相信，但是宪兵班长按章办事，还是上报了凯梅尼斯。凯梅尼斯下令对这个州里的所有犹太小贩进行甄别。没有一个人叫克沙巴或乌拉基米尔。这样，亚当发现的这条线索，就通到死胡同里去了。

四个星期后，凯梅尼斯宣告终止审查。他释放了被捕的人。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警察，为了使霍泽列茨免得忘了他们，在放掉他之前，用铁锤敲掉了他的三个牙齿。

柯勃尔经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他终于恢复了，可他的躯体却从此歪斜了。他受伤期间，工厂里的工作简直乱了套。一些机器要拆开来修理；接着，森林里的木料又不运来；等木头堆

---

① 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见«旧约·创世记»第二章。

积在工厂的院子里时，机器又坏掉了。

工厂没能履行跟建筑公司和家具制造厂签订的合同，不得不付出一大笔赔偿费。

柯勃尔恢复健康后，要求工人们派代表去跟他谈判。霍泽列茨和哭丧脸梅盖列代表工人跟他谈判了两天。经理把一天的工作时间减到了十二小时，工厂里的和森林里的工人，日工资都增加了二十五克劳采。

凯梅尼斯根据他在佩梅蒂的亲身体验，向内务大臣打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说不忠的犹太人在煽动和领导社会主义运动。他写道，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计，必须结束"亲犹太"政策，而采取"适度的"而又"严厉的""排犹主义"政策。

当凯梅尼斯正在系统地写作他的回忆录时，一个客人来到了佩梅蒂。他叫贾卡勃·罗逊勃拉特，是岬佐拉勃克堆木场的工人们派到佩梅蒂来了解如何要求提高工资的。梅盖列同罗逊勃拉特一起走了，过了五天才回来。

梅盖列去访问后几天，凯梅尼斯就上岬佐拉勃克去整顿秩序了。

几百年来一直听人们反复叙述同样的故事的佩梅蒂村民，忠实地、几乎是依样画葫芦地模仿了索莱瓦工人的斗争方法，如今，岬佐拉勃克的工人们也照样仿效起佩梅蒂的村民来了。多年来，森林里的人都坚持这些老方法，老办法，一点儿也不离开这条经过考验的道路。几年后，当斗争围绕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展开时，总有一个老伐木工会摇摇头，咕咕哝哝地说："背离桑费尔德带给我们的方法，可是天大的错误啊。"

桑费尔德老头跟那个有钱的德国佬一样，也成了传说中的人物。

柯勃尔经理把森林的工作包给了一个女人纳塞恩·辛内尔太太。她出生于加利查；她从那里移居到美国。后来，她离开美国，回到了加利查，又从那里迁到了佩梅蒂。辛内尔太太虽然居住在佩梅蒂，却跟匈牙利各地都做生意。她常常上贝雷萨斯、卡沙，甚至上布达佩斯去。她的合伙人之一，是一个名叫费迪南·西维拉的家伙，此人经常访问佩梅蒂。辛内尔太太是一个精明而好斗的女人，她跟她丈夫——象圣徒般的纳塞恩·辛内尔，一个安静而和平的人——正好是个对照。辛内尔难得在公共场合露面；从来不上哪里去，也不接受任何邀请，但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却象野火一样传播着。人们都叫他聪明人，圣徒般的人，后来，又称他为好心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有求于他的犹太人，辛内尔都会给予深谋远虑的劝告，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还会给以实际帮助。

辛内尔的劝告多半是宗教性的。用祈祷来对待苦难，要服从犹太律法的格言。佩梅蒂的犹太人多灾多难，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成文法；他们在星期六干活①，跟不洁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一起吃吃喝喝。他们还吃野味来着！

不过，辛内尔不仅仅对他的求助者传道说教。他还可以为那些有严重困难的人从辛内尔太太那里获得一笔借款。辛内尔太太在丈夫的要求下，总是肯借四五福林的。

这位聪明的、象圣徒般的辛内尔的传道说教，不是没有效果的。有些犹太工人，在星期六就不去上工了。由于镇长禁止在星期天工作，这些犹太人也就一星期做两次礼拜了。此外，有几

---

① 犹太教规定星期六是安息日，这天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不该干活。

个犹太女人，遵照辛内尔的劝告，已不愿向偷猎者购买野味，甚至送给她们，她们也拒绝接受。这些犹太人不再吃肉了，因为去买另外的肉，他们花费不起。而戒绝了肉食的人，自然而然就绕弯儿避开了罗斯人和匈牙利人不洁的木头小房子。

开头，罗斯人和匈牙利人只是嘲笑这些"愚蠢的犹太人"，可后来，他们渐渐愤怒了。

早先，他们管他们叫"愚蠢的犹太人"；现在，他们可骂这些人为"污秽的犹太人"了。他们这种愤怒，慢慢地但又必然地渐渐传播给了那些不仅吃野味、而且本身就是积极的偷猎者的犹太人。

跟辛内尔家差不多同时来到佩梅蒂的，还有几个罗斯人的大学生。这些学生都蓄长头发，穿绣花乌克兰衬衫，还象牧师一样传道说教。他们的主要靶子是犹太人，他们旁征博引，说罗斯人的苦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不过，他们对匈牙利的上流社会也有些闲话。

这些大学生不管来到哪里，那里罗斯的、匈牙利的和犹太的工人之间就会流血打架。

在佩梅蒂，米哈尔科和梅盖列阻止殴打犹太人，顺利地阻止了短短一段时期。但是，当匈牙利的内务大臣指派一个专员前来取缔下喀尔巴阡山的犹太高利贷者时，事实证明，即便杀熊者也无能为力了。

在娱乐场里

我在森林中冒险后，当依凡·米哈尔科① 来找我，说他父亲想见见我的时候，我对佩梅蒂还不熟悉，也从来没听到过杀熊者这个名字。要是依凡对我说，是铁匠米哈尔科想见见我，那我是肯定不会这么快就答应的。可是一听是杀熊者米哈尔科带来的口信，我不顾我的骨头痛，立刻站了起来，我的病给"杀熊者"这个词治好了。

"格查，格查！你忘了你浑身发痛啦？"

"现在一点也不痛了，妈。"

十五分钟后，我已站在杀熊者的面前。

"熊把你吓坏了吧？"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男人提出的问话。这人就是格里戈里·米哈尔科！他的脸修得光光的，褐黄色的头发垂到肩上。他的面貌严峻，轮廓分明，好象是用一块木头或石头雕刻出来似的。那双象矢车菊那么蓝的含笑的大眼睛，使他那副狰狞的面貌显得柔和了一点。

这个杀熊者手里抓着一把大铁锤，赤膊站着。他把拿着大铁锤的手一挥，示意我坐下，马上就不来管我了。他的大儿子艾莱克从炉火中抽出一根铁条。他用双手抓着用一块湿布裹住的

① 杀熊者格里戈里·米哈尔科的父亲叫依凡·米哈尔科，他的小儿子也叫依凡·米哈尔科。

铁条的一头，把另一头放在铁砧上。在杀熊者的锤击下，火红的铁条迸出了千百粒火星。杀熊者那一身在皮肤下颤动的肌肉，可真叫一只熊见了也会羡妒啊。

有个犹太老头，弯身蹲在一个较低的树桩上，我在他旁边的一个树桩上坐了下来。这犹太老人左手托着面孔，在难受地呻吟着。他长着一把使徒般的胡子，穿了一身象乞丐着的衣服。

“我还要等好久吗，格里戈里？”犹太老头恳求地问。

“端盆水来，依凡！”格里戈里向他的小儿子喊道。

这个杀熊的铁匠用肥皂洗了手，拿他的围腰布把手擦干。

“你踢脚的话，我就要你的命，”他威胁那个犹太老头说，“依凡，捧住桶子，要是依沙克昏过去了，就拿水倒在他头上。把嘴张开，依沙克。”

犹太老头留心观察着米哈尔科的一举一动，吓得浑身发抖，可他又说话了：

“等一下，格里戈里！让我稍微壮壮胆吧。”

“张开嘴来，要不我宰了你。”

老头顺从了。“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格里戈里——”他好不容易地说。

米哈尔科用左臂箍着犹太老头颤抖的瘦身躯，右手早已插进了他的嘴巴。老头还没来得及喊一声，杀熊者的手指已抓住牙齿，赤手空拳地把它拔下来了。

“你吓得象只有病的兔子，依沙克，”他骂那个老头道。“而你的牙齿却象一匹老马的牙齿。痛吗？”

“不痛，”依沙克疑惑不定地说。“愿上帝报答你的好心。”

米哈尔科点点头，对这个报酬表示满意。

“我希望，没有错把你的一颗好牙齿拔掉吧？”

"哪会呢,"依沙克答道。"这是最后一颗牙齿,左边就只有这么一颗了。"

"好,那一切都行了。蕾蓓卡什么时候回家来？他好久没上这里来了。"

"上帝才知道他游荡到哪里去了,"依沙克叹了口气。

"你今天老是上帝呀上帝的,依沙克。准是你这狡猾的脑袋瓜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把你的猪都忘掉啦。快点儿,要不你为它们哭鼻子也没有用了。"

"玛格丽特在照看着呐。"

"他活象个魔鬼。玛格丽特见到姑娘就追。这个脓包是佩梅蒂的猪倌,"米哈尔科转身对我说。

"一个犹太人——猪倌？"我惊奇地问道。

"为什么不？"依沙克问道,"四只脚的猪不会排斥犹太人。"

"哈,哈,哈,"杀熊者高声大笑了,"这回叫你说对了,依沙克。不过,你还是快点回去的好。"

"给我一撮烟草路上抽,格里戈里。我的嘴巴叫你的手搞得怪痛的。"

这个留着使徒般的胡子的老头,在他的陶制烟斗里装满了米哈尔科的烟草,拿米哈尔科的火柴点着了,然后一边呻吟着,一边爬着站了起来。

"格里戈里,你这么拔一下牙齿,花了我整整一个钟头。嗯,今儿晚上来吗？"

"来。要是蕾蓓卡回家来了,就把他带来。"

"那么,熊把你吓住啦？"当依沙克老头走了时,格里戈里问道。

"做梦也没有这样吓过,"我回答道。

“好！把你吓住啦？”

“都吓昏了。”

“好样的，”米哈尔科大声说，“不是说你被吓住了，而是说你承认这一点。那是当然的嘛。你一直在上学吗？”

“是的。”

“你看书吗？”

“嗯，看。”

“如果你看书，那你就该知道俄国有多大罗。知道的话，就告诉我吧。”

我告诉了他。

“这你知道，明白了。很好！嗯，这个你知道吗？俄国比匈牙利大多少？”

“大七十一倍，”我很快就算出来了。

“我知道你是看书的了，”米哈尔科说。“现在，你知道卡尔·马克思是谁吗？”

我对他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踌躇了一会儿，我才回答了他。

“我知道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对！现在，告诉我，你知道贾诺斯·福蒂是什么人吗？”

问了马克思，问贾诺斯·福蒂！我以为这个杀熊者是在开玩笑，可米哈尔科却如此认真地瞪着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那张严肃的脸简直是一本正经地望着我，因此，我也非常认真地回答了他。

“我是偶然知道的。他是贝雷萨斯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住在贝雷萨斯时，他组织了那次砖瓦厂的罢工。那时我见过贾诺斯·福蒂。”

"我看得出,你挺懂事,"米哈尔科说,"不过,那只把你吓坏了的熊,如果是只母熊,而不是公熊,那你今天照样不会坐在我这屋子里了。你丢了命,那就可惜啦。我希望你常到这里来。下次我带你一起去打熊。"

铁匠铺就在大路旁。路上传来了一阵笛声,接着,听到一个疲倦的、懒洋洋的声音在唱着:

给我破衣裳……破衣裳
各种各样的破衣烂衫,
为换破衣裳,我将给缎带,
还要给小伙子大喇叭。

"喃,喃,"米哈尔科一声高喊,"蕾蓓卡来啦。"

大路上出现了一个矮矮墩墩、宽肩膀、红胡子的犹太人。歌是他唱的。这个唱歌的犹太人背上驮着一只很大的绿毡袋,左臂上吊着一把花格子伞。

"上这儿来!上这儿来,蕾蓓卡。"

几分钟后,米哈尔科巳紧紧握住了那个驮毡袋的犹太人的右手。

"有什么新闻吗,蕾蓓卡?"

"倒不如没有更好些。"

"依凡,"米哈尔科吩咐他的小儿子说,"带你朋友回家去。"

作为告别,杀熊者伸出了他那只象多瑙河上小划子的桨一样大的右手。

"请告诉我,那个红胡子干吗取一个女人的名字?"我在回家去的路上问依凡。

依凡警惕地四面一望,虽然近旁一个人也没有,他还是压低

声音说道：

“桑费尔德老头，那个猪倌，给他的两个儿子都取了女人的名字，这样免得他们被征去当兵。”

“他们真的就不征他们了吗？”

“他们当然给征去了。事实上，他们不但征了两个男孩子——蕾蓓卡和玛格丽特，而且连三个女孩子，德波拉、罗莎莱和莎拉也被征去了。是三人委员会确定她们真的是姑娘之后，才放这几个姑娘回家来的。但这件事不能说，要不，依沙克会受处罚的。他已经蹲得够了——蹲了八个月牢。”

“那老头为什么要蹲牢？”

“为高利贷呗。”

“为高利贷？这样说你父亲的朋友是个放高利贷的？”

依凡望望我，好象怀疑我的神志是否健全似的。他没有骂我，只是温柔地责备了我几句。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依沙克是一个放高利贷的？难道你真的认为，在匈牙利，他们会为高利贷而把放高利贷的人关进牢房吗？”

“自然罗，我是这样想的。”

依凡的脸上显出了一副因我的天真而感到丢脸的神色。

“你知道，”他稍微歇了一下说，“桑费尔德是第一个想到组织起来并要求增加工资的人。”

“呃，那又不是高利贷，对吗？”

“你准是从外国来的，”依凡·米哈尔科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在牧人的篝火旁

第二天下午，杀熊者又差人来叫我了。我发现霍泽列茨跟米哈尔科一起在铁匠铺里。

"你能保守秘密吗?"米哈尔科问。

"能。"

"你会不会写，我就不用问了。今儿晚上，当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依凡会来叫你。带纸和铅笔来。"

"你是个傻瓜，格里戈里，"霍泽列茨反对道。"我们干吗要打扰这位年轻绅士晚上的休息呢?"

"别装模作样啦，亚伯拉罕。是你首先对我讲到这个孩子的。'试探他一下，'你说。好啊，我试探过他啦。你还要怎么样?难道还要我再试探一下，看看他身上长不长骨头吗?"

"我是希望你不要闹出笑话来，格里戈里。"

"你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伙，亚伯拉罕，而且是个很少有的。不管我们干什么，你总是说，'别做傻事啦，别做傻事啦，'之后，我们把你认为是傻事的事搞成功了，你又照样有话说。那时你就来说，'这事我们早就该办了嘛。'你不怕我们厌烦吗?"

"格里戈里，我只是担心，你的脑袋瓜没有你的拳头棒！你是用你的拳头思考的。要是你开始用你的脑袋瓜思考思考，迟早你就会醒悟过来，懂得如果象你这样的一个认为干什么事都干得成的人是需要的，那么，象我这样的一个知道我们搞什么也

不会成功——不会完全成功的人，也是需要的。"

"可惜你没有成为一个犹太教士，亚伯拉罕。"

"是可惜，"霍泽列茨同意道，"要是我是一个犹太教士，我就会改造你，叫你当教堂的管门人，那样，你就可以把不缴礼拜会费的人都扔出门去了。"

"我来让你看看我怎么扔吧。"

米哈尔科象抓一个小孩一样，一把抓起霍泽列茨，假装要把他抛出去似的，前前后后地荡了几荡，然后把他放到树桩上。

"这下子你知道胡说八道要吃苦头了吧。"

夜幕降临后，依凡和我一起上树林里去了。森林里一片漆黑。依凡牵着我的手走，即使这样，我也还老是撞到树上。

"你怎么知道往哪里走的？"我问。

"我摸得到嘛，"依凡回答道。

一只猫头鹰在头上噢噢叫。随着树林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我远远地看见了我们的目的地：林中空地上燃着一个牧人的火堆。十三四个男人围坐在火堆旁——匈牙利人，罗斯人，犹太人。他们都抽着烟斗。其中有一个是杀熊者。

"坐下，"米哈尔科对我说，在他身旁腾出一个位置，叫我坐在他的羊皮外衣上。

再也没说什么。我突然感到一阵异常的激动。在喀尔巴阡山里的一个牧人的火堆……

这些火，两百年来，一直夜夜燃烧着。两百年前，它们为解放者拉科治的军队照亮了道路。现在，围着这篝火坐着的，是一些为自己寻觅解放之路的人。

牧人的篝火向天空冒着火焰。燃烧的松树枝，散发着浓烈的松脂味。在火光下，黑魆魆的背景，茫茫无边的人迹罕至的喀

尔巴阡山森林，似乎比以前更黑了。在午夜的蓝天上，群星闪烁，好象在远方燃烧的成百万个牧人的火堆。

猪倌依沙克·桑费尔德踢掉他的鹿皮靴，解下他的裹脚布，伸着一双光脚烤起火来了。

“俄国在那一边，那上面是匈牙利大平原，”米哈尔科一边解释，一边拿他的烟斗先指指东北方，然后指指西南方。

“你到底觉悟过来啦，”霍泽列茨喊了起来。

他这话是对这会儿刚从森林里走出来的蕾蓓卡·桑费尔德说的。

蕾蓓卡没有理他；他在他父亲旁边的地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取出烟斗和烟袋，装满了烟丝。他拿一根棒从火堆里拨出一块通红的木炭，用手指夹起来，点着了他的烟斗。

当蕾蓓卡喷出第一口烟的时候，米哈尔科开始讲话了。

“听说，那个派来侦查高利贷者的专员，过几天就要到佩梅蒂来了。”

“那糟啦！那糟啦！”霍泽列茨哼着说。

“在休斯特，”米哈尔科继续说，“那个专员把木工工会的头头伯泰兰·希德维奇关起来了。专员逮捕了希德维奇，可是预审推事过几天就把他放了。希德维奇是个匈牙利人，还是一个加尔文教徒①。一个加尔文教徒的匈牙利人，即使是工会的领袖，也不可能是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嘛。这说明，那个专员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用不着马上喊‘糟啦，糟啦’。我们要镇静地等一等，看看那个专员拿我们怎么样。我是说镇静，不是啥也不干。我想，最好是向那个专员交一份请愿书，把真正的放

① 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09—1564)所创立的教派的信徒。

高利贷者的名字都开上去。”

“你希望那请愿书起什么作用呢，格里戈里？”桑费尔德老头问。

“有时候，铁会变成金，”不待米哈尔科回答，哭丧脸佐尔坦·梅盖列已插了嘴。（顺便说一下，梅盖列是这里唯一戴帽子的。）

“这我可听得多了，但我从来没见到过，”霍泽列茨反驳道。

“那个专员很清楚，在佩梅蒂这里，谁是放高利贷的。他经常在她那里吃中饭。”

“就这样，”米哈尔科执拗地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起草请愿书吧。”

一片静默。

“由你来写，”米哈尔科对我说。“讲到写字，我们这些人，讲匈牙利话的，只认识希伯来字母，认识匈牙利字母的，又讲罗斯话。梅盖列什么字母也不认识。所以，你来写。把我讲的话写下来。你带了纸和铅笔吗？好！开始！”

我把带来的那个很厚的笔记本搁在膝盖上，用嘴舔湿了我的铅笔头。

“专员，”米哈尔科开始大声地口授起来。

“写‘专员先生’，”梅盖列打断了他的话。

“你写‘先生’，那就也要写‘尊敬的’，”霍泽列茨插嘴说。

“行，”米哈尔科同意道，“就这样吧，‘尊敬的专员先生。你正在搜索放高利贷者，在下喀尔巴阡山，这可有的是。在佩梅蒂也有几个——立即摧毁他们吧’。”

“那没有必要，”霍泽列茨反对道，“摧毁他们，把他们全都摧毁！越快越好；我希望会摧毁，一心希望这样。但是你不用写在这上面啊。”

“那这句就不写了，”米哈尔科让步了。“为了使尊敬的专员不致浪费时间——”

“宝贵的时间，”米哈尔科口授道，“我们告诉你——”

“我们告诉阁下——”

“我们告诉阁下哪里有阁下正在搜索的熊窟——”

“有阁下想要搜索——”

“就这样吧，‘想要搜索’。‘我们村里的放高利贷者’——写下来，巴林特——‘我们村里的吸血鬼，是纳塞恩·辛内尔太太，就是你上次来到我村时，阁下与她共进晚餐的那个污秽的妓女。’”

“上次光临我村。”

“住嘴！”米哈尔科对霍泽列茨喝道，“纳塞恩·辛内尔太太，”米哈尔科口授道，愤怒得喊叫起来了，“这个妈的婊子，是高利贷者里最下作的高利贷者。这一点，除了你，专员先生，人人都知道。佩梅蒂的一个穷人，如果去向那个卑鄙的辛内尔诉诉苦，说他正在饿肚子，没办法养活孩子的话，辛内尔会叫他去找他的老婆，而那个下贱的女人就会借给这可怜人三四个福林；她出借一个福林，每星期要收三个克劳采利息。算一算吧，专员先生，这利息总共有多少。”

“我们应该自己把它算出来，”梅盖列说。

“百分之一百五十六，”我告诉他们。

“没算错吧？”米哈尔科问。

“没错，”蕾蓓卡代我回答道。

“喏，你瞧，”米哈尔科朝着霍泽列茨说，“可你还反对这个孩子来呢。”

“我只是反对你，格里戈里。”

“别吵嘴了。你们干什么都行，可千万别吵嘴，”老桑费尔德嘀咕道。

“好，继续写下去，巴林特。这样写：‘这个污秽的贱人，对痛苦的佩梅蒂村民们榨取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的利息。她请阁下喝的可是他们的血啊。’”

“那没有必要，”梅盖列反对了。

“就这样，”米哈尔科高声喊叫了，“这是必要的。”

这番口授笔录，扣除斗嘴拌舌的时间，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后，我用擦不掉的墨水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的正反两面，抄好了米哈尔科口授的这封信。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签名？”我高声念了这份定稿的请愿书后，霍泽列茨问道。

“就不签名寄出去吧，”是蕾蓓卡的意见。

“瞎说！我们写的事情，那专员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写这份请愿书给他，只是为了让他知道，我们也并没有瞎了眼睛；这样，他以后就不好说，他没有逮捕辛内尔太太，是因为他不知道她是放高利贷的。签名的人是反对这个专员的见证人，”霍泽列茨解释道。

“我们要有一百个签名，”米哈尔科说。

“一百个人，对警察局的拘留所太挤了吧，”桑费尔德迟疑地说。“我们会坐也没有地方坐呀。我们怎么睡觉呢？”

“一百个签名，”米哈尔科重复了一句，“匈牙利人不用怕签名；匈牙利人不可能是犹太放高利贷者。罗斯人不用怕——他们是蹲牢房蹲惯了的。犹太人就不要签了。”

“停一停，格里戈里，”霍泽列茨怒喝道，“你看到的犹太人，都是些象先知杜迪克斯所描绘的那样的人：象卑鄙的、胆怯的狗

一样。你应该感到羞耻，格里戈里！我第一个在请愿书上签，依沙克第二个。你要签吗，依沙克？”

“要也罢，不要也罢，我都签。”老桑费尔德说。

围坐在火堆边的人，除了米哈尔科的儿子和我自己，都在笔记本纸上成一排签了名。梅盖列和依沙克·桑费尔德只划了三个十字，我在十字旁边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这份请愿书由米哈尔科保管。

蕾蓓卡在火堆上掷了新鲜松树枝，扬起了一阵火星。几秒钟内，火焰噼噼啪啪、嘶嘶嘘嘘地对抗着这根湿木头，接着，就冒起了火苗。

“我有杯葡萄酒就好了，”梅盖列叹息着说。

“或者好好喝顿白兰地也行，”米哈尔科沉思地说。

“我想要的东西可多着呐，”霍泽列茨加了一句。

亚柯斯·斯齐梅列专员乘着一辆由两匹俊美的灰色马拉的无盖双轮马车来到了佩梅蒂。斯齐梅列是一个老派的匈牙利绅士，蓄胡须和连鬓胡子，脚登马靴。他是一个很恳切的人，跟人人都很友好，对街上碰到的穿得最破烂的犹太伐木工人或者罗斯伐木工人，也会热诚地答礼问好。他分克劳采给孩子们，问他们学习的情况。他也偶然拜访一些老年人，耐心地倾听他们诉苦和发牢骚，在他们叹气时也陪着叹气。

这个专员住在柯勃尔经理那里。他在辛内尔太太家吃饭，跟警察局长一起消磨夜晚，喝酒打牌。

斯齐梅列专员在柯勃尔家接见了来递佩梅蒂工人请愿书的米哈尔科。他跟杀熊者握了手，答应他一定好好研究这份佩梅蒂工人的请愿书。第二天，他来拜访米哈尔科了。

他是走路来的，后面跟着一个穿骠骑兵制服的仆人；这个仆人手里拿着专员的海泡石烟斗，腋下夹着一个装烟草的胡桃木匣。

这位老爷在铁匠铺里一个树桩上高高兴兴坐下，那个骠骑兵就给大海泡石烟斗装上了烟。专员把烟斗仔细检查了一番，知道装得很好，这时，骠骑兵已用报纸卷起一个纸捻儿，燃上了火，把它递给了他高贵的老爷，老爷就点着了烟斗。斯齐梅列待烟斗上升起了一股浓烟，这才开口讲话。

米哈尔科还以为专员来访，是专门来谈那份请愿书的事的，他可搞错了。斯齐梅列眼前对高利贷者并不感兴趣；他是想了解一下有关熊的事情。他细致地盘问了米哈尔科，如何发现熊迹，如何追上它，他（米哈尔科）怎么可能偷偷走到与那只该死的野兽相隔一把刀的距离，而又不让熊够得到猎人。米哈尔科耐心地回答了这位老爷提出的问题，但他仍不满足。他要求杀熊者拿那位骠骑兵来实地表演一番，看他是怎样挣脱熊的拥抱的。为了讨专员的欢喜，这个杀熊的铁匠就作了杀熊表演。骠骑兵当熊，米哈尔科当猎人。但是搞断了两把当作刀用的羽毛帚——一把断在骠骑兵的喉咙上，另一把在他肚子上戳断了——米哈尔科终于对这玩艺儿感到厌倦了。

"长官觉得那份请愿书怎么样？"

"哈，哈，先生！哪有这么快！你要我对这样重要的事情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吗？或者，在我还没有机会形成一个概念之前，仅仅为了讲几句话，就胡言乱语一通？要杀一只猫，不止一个办法，我的朋友！就跟杀熊有它自己的程序一样，对高利贷者起诉，也得按照规章来进行啊。杀熊你是一个行家；但对高利贷者起诉可是我的擅长了。就象我不怀疑你一定会搞到你跟踪追

击的熊一样，你也可以放心，落到我手上的高利贷者，我是不会请他吃鹅肝酱馅饼的。”

专员讲话声音很响，但没有怒意。当他起身要走时，他伸出手来，跟杀熊者握了手。

斯齐梅列专员在佩梅蒂待了三天，就乘无盖双轮马车上蛔佐拉勃克去了。他走后第二天，宪兵逮捕了十一个佩梅蒂工人——九个犹太人和两个罗斯人。桑费尔德老头和霍泽列茨也一道被捕。十天后，两个罗斯人给释放了。六星期后，七个犹太人也获得了自由。可是，桑费尔德却蹲了四个月牢；霍泽列茨蹲了差不多六个月。

米哈尔科给失去赡养者的家庭供应野味。纳塞恩·辛内尔给那些痛哭失去丈夫的女人提供安慰和劝告。

“我说过多少遍啦，叫那些人放聪明点，”辛内尔说，“老老实实的犹太人，没有权利去跟那些舞刀弄剑的匈牙利人和狂喝滥饮的罗斯人一起胡闹。要是他不知道可怕的铁匠米哈尔科是臭名远扬的先知杜迪克斯的走狗，那他又长着一个哪门子的犹太脑瓜啊？一个正正派派的犹太人，会需要那样的人吗？他跟流氓似的、杀气腾腾的叛徒梅盖列搞在一起，写了一封污辱国王和上帝的信给专员大人。我为你和你的孩子们感到非常、非常难过，可是，至于你的丈夫……他可自找麻烦啦！”

米哈尔科和梅盖列周围已空空荡荡。犹太人开始在街上回避他们，除了蕾蓓卡之外，一个犹太人也不到铁匠铺来了。

但这还只是一半的苦恼。真正的危险，是匈牙利人不再听佐尔坦·梅盖列的话了。随着斯齐梅列前来访问之后，柯勃尔经理给十五个匈牙利人每天增加了十二克劳采的工资。梅盖列

把这些匈牙利人召集拢来，想说服他们，只能在受雇干同样活儿的犹太人和罗斯人也加工资时，才接受增加的工资。

眼看没有一个增加了工资的人有意赞同他的劝告，梅盖列就提议应把那十二个克劳采捐献出来，去支援被捕者的家庭。当梅盖列正在慷慨激昂地大讲团结一致时，有人从背后往他头上敲了一棍，他给打倒在地了。他后来在外面走动，三个星期头上都扎着绷带。

接着，罗斯人中间传开了谣言，说他们没加到工资，是因为他们结交犹太人的缘故，这时，米哈尔科和梅盖列可完全孤立了。

按照我的劝告，杀熊者给布达佩斯的木工工会写了一封信。更确切点说，信是我写的，由米哈尔科和梅盖列签上了名。十天后，回信来了。

工会说，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佩梅蒂的组织，因为佩梅蒂从来就没向工会缴过一个克劳采的会费。

我给福洛普·西维拉写了封信，讲了佩梅蒂的"奇怪而悲惨"的情况。福洛普舅舅来了一封详详细细的回信。

> 你的报告，格查，儿子，说的不是佩梅蒂的情况——它讲的是匈牙利被压迫民族和占人民大多数的农民和森林工人的状况。

这封长信讲了反动派如何把工人社会主义运动跟伯爵们领地上被剥削的农民和木工们的造反隔离开来，而统治者们这样做，又获得多大的好处。——当我念这封信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围坐在牧人的火堆旁：米哈尔科、梅盖列和我。我念完这封信后，就和我的两个同伴默默地坐在那里。

梅盖列深陷的黑眼睛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我有一种感

觉；他可能会欣然前去杀人。米哈尔科低头坐着。

坐在这两个倔强的人中间，我想到了我的舅舅福洛普·西维拉，他在上流社会中是一个局外人，可是看来他跟广大工人群众却也不能打成一片。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无能为力。有的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终归是个外人。多可怕呀！

我颤抖了。几乎象寻求帮助似的，我一把抓住了杀熊者的胳膊。米哈尔科惊奇地望望我。

“别怕，格查，”他平静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进行最后的打击。”

我们大家谁也不再说话了。我们脚边的火堆慢慢地变成了发红的火炭儿，接着，火炭儿也给灰遮没了，但在灰中间，有一个明亮的红火把，却在这里那里发着闪光。

初雪降落时，霍泽列茨回家来了。

“我们从头再来，”他跟米哈尔科一见面就说，“我听说工厂经理在九月一日已减了工资。那我们就从头搞起。如果他们搞垮我们一百次，我们就再搞一百零一次。不是这样吗，格里戈里？”

先　知

佩梅蒂的木头小房子，几乎都给厚实的白雪掩没了。

那些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伐木工人，都提着防狼的斧子，成群结伙地走动。

天黑了，柯勃尔经理屋前的广场上燃起了一个火堆。四个武装人员和一群猎狗，昏昏欲睡地围坐在火堆边，守卫村庄，防范野兽袭击。拖着长音的狼嗥声，老是从这一头或那一头传来，破坏夜的寂静。猎狗会一边应声狺狺吠叫，一边偷偷地向火堆边挪过来。狼群如果太饿了，就会走近火堆，在黑暗中闪烁着的圆滚滚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围在火堆边的人们。这时，那些人就会发出一阵零星的射击，结果应声传来了野兽受伤后激怒的嗥叫声。沉寂了几分钟，那些狼就会绕到火堆旁的人们的另一边，重新发出拖长音的嗥叫，威胁地闪动着令人可畏的绿眼睛。

狼来到窗子下面嗥叫，母亲吓得簌簌发抖，两个妹妹蹉缩在最暗的屋角里，这时，父亲就开始讲故事了。他的故事里讲的狼，可一点儿不象那些野兽——它们的嗥叫声穿过双层窗门结实的栎木百叶窗，在屋里发出回声，仿佛狼就在这儿咬啮它们可怕的尖牙利齿。父亲所讲的狼，都是吃素的，不是因为怕小孩而逃跑，就是见到小狗就吓得躲开。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狼嗥声不时被一阵射击声所打断。

那时候，父亲已经恢复了健康。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

的病究竟是叫山间的空气、比较安闲的生活治好的呢，还是叫格里戈里·米哈尔科治好的。这个杀熊者听我说父亲病了，马上就自个儿来充当医生。他对父亲诊察后，向他保证说，这样的小毛病，他已治好过多次。他的自信是如此令人信服，父亲只得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指点办事。每天早晨，他都在烤面包上擦上大蒜，在上面厚厚地涂上一层格里戈里给的熊脂，然后吃下去，还要喝上一杯杜松子酒。父亲遵照格里戈里的嘱咐，不再抽烟斗了，他整天在嘴里咀嚼一根新采的松树嫩枝，代替了衔烟斗柄。晚上，就寝之前，他吃一片辣味很浓的熊肉火腿，和一个羊奶煮的大蒜头，这火腿和大蒜又是用一小杯杜松子酒灌下去的。

每隔一天，米哈尔科都要在早晨用熊油给父亲擦一次干瘪的胸脯；晚上，又拿用松球煎熬过两小时的雨水，把这熊油洗掉。格里戈里给父亲这样医治了几次后，对我提出了一个叫人吃惊的问题。

“你说，格查，是你父亲是傻瓜呢，还是他认为我是傻瓜？”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格里戈里叔叔？”

“他拚命劝我在佩梅蒂帮助建立独立党哩。”

“哦，那是愚蠢的，”我勉强地承认道，“不过，你知道，格里戈里叔叔，我父亲是在跟我们不同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什么不同的环境？难道贝雷萨斯或者布达佩斯的锯木厂工人不饿肚子吗？”

“布达佩斯或贝雷萨斯，都没有锯木厂，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疑惑地直望着我。他出生在佩梅蒂，在这个村子里过了三十八年。他在军队里当过两个月预备兵，那也离他的本村不远，是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市的森林区。他从来没见过别的城市，在他的想象中，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森林，只是有的

地方点缀着一块长庄稼和葡萄的开垦地罢了。对他来说，大城市不过是一个放大的佩梅蒂而已。

“你说布达佩斯没有锯木厂？”他疑惑地问，“嘿，那布达佩斯的人做什么呐？他们干什么活？他们怎么生活的？”

我略加解释，他就明白过来了，我说的是实话。铁轨和火车头，工厂设备，火柴，枪和工具，都并不是在锯木厂造的啊。

格里戈里·米哈尔科一旦领悟了，可就什么都想知道和弄个清楚了。他挖根刨底地要我把所见所闻和读到过的事，全都讲给他听。他如饥似渴地听我讲了几天。之后，他的怀疑却又占了上风。

“那不可能，格查；那根本不可能。你说，在布达佩斯的工厂里干活的，有七八千工人，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工厂。你还说，那些工人都读过马克思写的文章。哎，那就不可能嘛，格查。霍泽列茨也罢，梅盖列也罢，我也罢，都没有读过马克思写的文章，我们只是从贾诺斯·福蒂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我们就已经通过斗争提高了工资。好，如果在布达佩斯，有成千成万的工人，他们又都比我们这里的工人聪明，那为什么州长到今天都还在摆布他们呢？为什么布达佩斯那些象柯勃尔或者辛内尔太太这样的人，还在对他们发号施令呢？现在，格查，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竭力避开这个问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加以解答，但是米哈尔科却不愿意听我讲了。

“我问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格查，你要是能回答，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你要是答不出来，那就干脆别开口。”

我就只好不开口了。可是，过了几天，格里戈里却又问起我布达佩斯的事儿来了，于是，我又开始对他讲了。

米哈尔科老人，格里戈里的父亲，不爱听我讲布达佩斯的

事。我上面说过，他出生于加利查，是四岁的时候从那里逃到佩梅蒂来的，他的祖父从加利查一路把他抱来，跟他讲过许多关于俄国的故事，说俄国的教堂有金塔，俄国的车子是三匹马拉的。依凡的祖父，在拿破仑时代，曾亲眼见过莫斯科，他常常一边儿在膝踝上抖着孙子，一边给他讲述那个有金塔的城市的事儿。待到依凡长大了，他把那些故事也忘掉了。可是最近，他却又讲起那个有金塔的城市，那个人人都讲罗斯话的地方来了。现在，格里戈里对布达佩斯发生了兴趣，依凡·米哈尔科不知怎地总感到他有点儿背信弃义。老人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格里戈里背叛了，而是一提起布达佩斯这个话题，他就会拌嘴，怄气，格里戈里也很难劝解他。

依凡·米哈尔科的头发直垂到肩上；浓密的大胡子和下垂的胡髭都已雪白，但身架子却依然象喀尔巴阡山的松树一样挺拔。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鳏夫。现在，他为一家人洗衣煮饭，这十年间——在格里戈里的妻子死后，屋里没有女人了，他一直为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缝制衣服。这老人因为动手打人，曾蹲过三次班房。他第三次犯法后回到家里时，工厂不肯再雇用他了，他想跟他年轻时那样，以采野果和打猎为生。结果却是一场空，时代已经变了。他就去向他童年时的游伴依沙克·桑费尔德请教。依沙克叫他象他自个儿那样，也到村民中去收破烂，村民们会近乎白送一般地出售那些破烂货，而他拿了那些东西却可以到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去卖好价钱。米哈尔科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于是，桑费尔德就劝他开个铁匠铺。米哈尔科老人以前曾为骠骑兵做过事，因此，懂得怎样镶马蹄铁；于是，这个计划很合他的意。但是开铁匠铺得有钱啊，米哈尔科可没有钱。桑费尔德又帮了他的忙。他为依凡·米哈尔科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借了

四十个福林，以后用狼皮和狐皮偿还。这一来，米哈尔科就开起铁匠铺来了。他把他的时间，不是花在镶马蹄铁上，就是花在猎狼和猎狐狸上。两年之后，他偿还了四十福林，从此自己当了老板。之后，他放弃了打猎，一空下来，就唆使森林工人反对工厂经理。

一上来，他倒挺亲切热情；但是当格里戈里通过我而发现了布达佩斯时，我就不受欢迎了。很可能，是我讲的关于布达佩斯的事情，激起了他对那批先知的同一感情。

那些先知，是一九〇五年开始到下喀尔巴阡山来巡回访问的。最早的一批先知，是象卡尔曼·阿兹泰洛斯、贾诺斯·福蒂这样的人……以及从城市里、从布达佩斯和卡沙到下喀尔巴阡山来的铁路工人、机械工人、印刷工人和细木工人。接着，在那批曾在城市里待过一阵子的下喀尔巴阡山的人中，出现了一些仿效他们的新先知。这种新的宗教，不同于别的宗教，它是一心想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不是死后去进天国；这种宗教，象野火一样在喀尔巴阡山各个村子的人们中燃开了。这种新宗教的拥护者，都不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宗教；事实上，他们还都抗议这种称号。当他们知道，森林村子里都把他们看作是先知时，他们是越来越激烈地大声抗议了。可是，他们抗议归抗议，这个称号却粘住了。人们对这些预言美好未来的人，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称呼。

的确，也并非人人都这样称呼他们。索莱瓦的州长骂他们是“下流的土匪”，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警察局长骂这些手上长老茧的先知是卑鄙的社会主义煽动者。上流社会还象以前追猎野味那样，派了密探去对付他们。他们走到哪里，宪兵就跟到哪里。他们有的人一直都蹲在监牢里，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由牢里

释放出来的人或者接替他们的新先知——下喀尔巴阡山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在继续干下去。这种先知茁壮如松树，多产似野兔。如果你把他们打得要死，抓棍子的手会变得不胜疲乏，而他们却还在动着。如果你成功地杀掉了一个，别高兴，十个人又出来代替他啦。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警察局长，就是这样描绘这些"卑鄙的社会主义煽动者"的。

宪兵、警察、法庭和牢房——都不能损毁这些新先知的新教义。但是，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武装人员无能为力的地方，那些微不足道、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却取得了成功。

一九〇九年，大学生们——神学院的学生，学法律的，学哲学的，——开始下乡巡回访问，来给村民们启蒙了。那些头发长长的大学生，都是身穿乌克兰罩衫，说罗斯话的罗斯人。这些罗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煽动者倒没有说什么，可对他们的损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大学生教导说：造成罗斯人的贫穷，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犹太人。犹太人吃、喝，还要扯破衣服。要是把犹太人消灭了，犹太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的食物，就归罗斯人了。"把犹太人赶出去，消灭他们！"他们坚决主张。

第二个原因是匈牙利人。下喀尔巴阡山，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这里，大学生们不能鼓吹把匈牙利人赶出去，并消灭匈牙利人。因此，他们只是攻讦那些掌管罗斯人事务的匈牙利市镇官吏，匈牙利的法官，匈牙利的宪兵，因为他们都不会说罗斯话，都不了解罗斯人的问题。大学生们说，要是由罗斯人官吏来代替这些人，那么所有的苦难就一了百了啦。

对于官场，罗斯大学生们倒是作了不少毫不含糊的谴责。不过他们把事实真相搞混了，以至于穷苦的罗斯人把所有的匈

牙利人——而不是匈牙利的上流社会——都看成了敌人。

这些大学生,不管来到哪里,他们都会发现有两个敌人和一个朋友。他们的一个敌人是匈牙利教师,匈牙利文化的代言人;另一个是匈牙利的镇长,他代表匈牙利的乡村政权。他们唯一的朋友,是希腊天主教的牧师。在学校里,教师痛斥他们;在教堂里,牧师赞扬他们。牧师说的话更有影响。镇长偏袒教师,可以采取断然的决定,也就是说,动用宪兵,轻而易举地扭转这一局面。但是由于镇长是上流社会中人,而大学生也都是准备成为这个阶层的成员的,因此,很难得会有个镇长愿意去调遣宪兵反对大学生。相反,他是请求、提醒、告诫大学生,叫他们不要扰乱人们精神的平静。大学生们感谢他提出劝告,就径直下乡去了。

短短一段时期,他们就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许多妇女特别信任这些大学生。现在是这些大学生被称作先知了。

大学生们倒可能很少提到社会主义者,但那些社会主义鼓动者却日益频繁而刻毒地攻击这些穿乌克兰衬衣的先知了。他们到处击退这种罗斯人的鼓动,重新把罗斯的、匈牙利的和犹太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可是,他们只取得了短暂的胜利;艾莱克·杜迪克斯一来到,罗斯人就都向大学生们蜂拥而去,而且实际上抱成一团了。

一九一〇年,艾莱克·杜迪克斯,索莱瓦希腊天主教牧师的儿子,法科学校的毕业生,开始来访问乡村。三四个月后,他在树木葱茏的喀尔巴阡山和蒂萨河之间那块地区,已成了最孚众望的人物。现在,他,而且只有他被称作"先知"了。他不仅受到罗斯人村民的敬仰,而且成了市镇上的匈牙利姑娘崇拜的偶像。

先知杜迪克斯是一个肩膀宽阔、身高六呎的大汉。他那两

只隔得很开的、象矢车菊那么蓝的大眼睛，梦幻似地凝望着世界。他那黄灿灿的长头发和金色的胡子，活脱跟耶稣基督的画像一个模样。他不管冬天夏天，出门时都不戴帽子，穿一双齐膝踝的靴子和一件用粗陋的亚麻布做的乌克兰衬衫。

这位先知有一副挺悦耳的嗓门，讲起话来象教堂里的风琴一样嗡嗡震响。他有一个习惯，讲话时会双臂向天上一伸，好象牧师在为他的教徒们祈求上帝的赐福。

这位先知难得在村子里讲话，一般都是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对从很远的村子里赶来的朝圣者布道。夏天，他睡在露天地里；冬天，他睡在最可怜的罗斯人的木头小房子里。他跟最穷的穷人共一个盘子吃饭，除了清新的溪水和泉水之外，不喝任何饮料。在教堂里，他跟穷人坐在一起。

童年时，我曾在索莱瓦见过杜迪克斯几面——那是在他成为先知之前——有一次，在布达佩斯，还跟他谈过天。在我们搬到佩梅蒂后，他没有到马拉马罗斯州来过。

实际上，冬季里，哪个罗斯大学生也不上佩梅蒂来，霍泽列茨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获释出狱后，工厂不肯再雇用他，于是长脚杆也就整天闲着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活的，但我可以肯定，他的生活很艰难。他瘦得皮包骨，还是成天价不住地到处奔波。他挨家挨户，一个又一个地跟人谈话。

当春天来临时，佩梅蒂的工人们准备战斗了。工厂里和森林里的工人已都编成十人一组。十个人里面，有一人担负的责任是：在进行工资争议时，一定要使他的小组渐渐减低产量，甚至连日子也定下了，星期一工人们就派一个代表团上柯勃尔经理那里去。

“明天，后天……”

先知杜迪克斯于星期六下午来到了佩梅蒂。他住在有一窝子小孩的伐木工戴维·普罗斯特尼克的家里。他跟普罗斯特尼克一家人一样，用同样的盘子吃玉米粥，共一个陶器杯子喝泉水。第二天早上，他带上普罗斯特尼克最小的四岁孩子米哈莱，让他坐在他的肩上，出门讲道去了。

美丽的春天早晨升起了太阳。山谷里和山坡上的雪早已融化，只在云遮雾掩的山顶上，还残留着一点积雪。潮润的黑黝黝的土地上冒着醉人的芳香，你似乎能听到蓓蕾正在爆芽萌发。那代表成百万朵雪花的斑斑白块，点缀着林中空地，早开的紫罗兰，已在树底下东一处西一处发出新枝嫩叶。

先知在我遇到熊的那块林中空地上讲话。村里所有的罗斯人都去听先知讲道了。人们甚至不惜花费四五个小时从邻近的小村上赶来一睹这位先知的风采，并听听他讲些什么。他们把病人都手携肩驮地带来了。

到林中空地来听讲道的人，有的并不信任这位先知。他们或者是被好奇心吸引来的，或者是心里暗暗希望有人会反对这位先知，那样，他们也就……

先知手里拿着一根新采的松枝，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在群众面前站了好一会儿。他的金黄色的头上，盘着一个由太阳光交织成的光环。杜迪克斯讲了两个小时。他一开头，并没有攻击犹太人和匈牙利人，而是责备那些想把罗斯人的命运和犹太人及匈牙利人的命运扯在一起的人。他训斥那些罗斯人，好象父亲在骂做了错事的儿子似的。他一边指责他们，一边又马上出来卫护他们了。

“我们能责怪我们穷苦、无知、饥饿和受压迫的罗斯兄弟吗？我们可以因为他们叫恶魔般狡猾、凶恶的犹太人引入歧途，把他

们带上了危险的道路而说他们犯了罪吗？”

接着，先知讲到犹太人了。他不是在讲，而是在雷鸣般地吼叫。他的脸上显出一副憎恨和轻蔑的表情；他好象面对面地站在魔鬼跟前似的，使劲地打着手势。在对犹太人严加申斥之后，他列举了匈牙利人的种种罪恶。

他讲话时，一会儿高声呼号，一会儿低声吟唱。他说的话，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他的声音，他的手势，却激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兴奋，使听众进入了催眠状态。妇女们为了让孩子们看看这位先知，把他们高高地举了起来。人群中不知哪里发出了一声长叹，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当先知演讲结束时，林中空地上一片肃静。杜迪克斯光着脑袋，站在他的信徒们面前。听众们都屏息静气。

“让我们来祷告吧，”先知下了命令。

祷告完毕，杜迪克斯同普罗斯特尼克悄悄讲了几句话，然后转向了依凡·米哈尔科。

“我听说，老大哥，你的儿子，有名的杀熊者，在为犹太人服务。”

老人不知道，承蒙这位先知赏光跟他讲话，他应该感到高兴呢，还是应该为他的儿子受了侮辱而发怒。他象一个姑娘似的，满面赧红，没有回答先知的问话。

“人家说你的儿子是个很强壮的人。”

“他是一个杀熊者嘛，”依凡·米哈尔科骄傲地说。

“你能不能去问问他，他接不接受我的挑战，跟我比一比摔跤？”

“他会接受的，”老人喊了起来，“他会接受你提出的挑战的。”

"我要听到他的回答。"

"我说会接受,他就会接受。格里戈里连魔鬼的挑战也会接受。"

"我可不是魔鬼,"先知笑道。

"对你也会勇敢地对抗的。要就走吧。"

"我们走,"先知道。

几百个人跟在艾莱克·杜迪克斯和依凡·米哈尔科后面,向铁匠铺走去了。他们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管它怎样,他们都决定上那儿去走一趟。

杀熊的铁匠看到杜迪克斯领了一长队人向他家里走来,感到很诧异。他们显然是不怀好意的。他犹豫了几秒钟,想拔脚逃跑。不过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钟;他抓起一把大铁锤站在那儿,准备高价出售他的生命了。

"依凡,"他吩咐他的儿子说,"马上到巴林特家去,不管出什么事,都留在那里。"

小依凡一声不吭。他捡起一根棍子,站在他父亲的身旁。

"喂,格里戈里铁匠,"杜迪克斯远远地喊道,"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名符其实,我来问问你,你敢不敢跟我摔跤?"

"一个人对几百个?你把这叫做摔跤?"

"一个对一个!你对我!我们的罗斯弟兄们只当观众和见证人。丢下铁锤,脱掉衬衣吧。"

格里戈里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这位先知要他干什么。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他哈哈大笑了。

"我会把你撕得粉碎的,"他向先知保证说。

"我也会的,"先知回答道。

人群团团围住了铁匠铺。许多人爬到树上,或者紧紧攀住

了铁匠铺的屋顶。观众既怀有对先知的尊敬感，也怀着对这个奇怪的滑稽场面的好奇心。人人都在心里想，这位先知将要请他们看一场杂耍，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先知和演滑稽戏的人，本来就是同行 。

一瞬间，先知和杀熊者都已脱掉衣服，打赤膊面对面地站在铁匠铺院子里的人圈中了。大家看到米哈尔科一身鼓凸凸的肌肉，并不感到惊奇，但一见先知那两条大力士般的光胳臂，可都感到很意外。

米哈尔科原以为一下子就能摔倒他的对手，他可估计错了。杜迪克斯是没有米哈尔科那样棒，但他有挺强壮的肌肉，并知道如何使用他的力气。他比杀熊者灵活而狡猾。他们一交上手，先知就在下面紧紧夹住了他，米哈尔科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才挣脱了他的擒拿。当他（米哈尔科）想扭住对方时，杜迪克斯很灵活地逃脱了他那强有力的胳膊的箍抱。最后，米哈尔科让先知跪到地上了——可先知那样一使劲，又一下子跳起了身，直搞得铁匠踉踉跄跄往后退。

五百个观众，怀着观看耶稣受难剧、或者人吞剑的奇观似的狂热劲，注视着这场摔跤比赛。

米哈尔科花了一个钟头，才摔倒了这位先知，把他的双肩按到了地上。杀熊者吁吁喘着气，携着他的对手站立起来。

“你们瞧，弟兄们，我是对的！”杜迪克斯转向敬慕的人群说，“看到罗斯人的胳膊多有力了吧。看看米哈尔科，你们就一定会承认，我宣讲的是真理。”

“你赢了，格里戈里·米哈尔科。”他现在对杀熊者说，“我不感到难为情。一个罗斯人打败了我。要是我知道你把你的力气用在正道上的话，我将为你的力气感到骄傲。”

"让我们来为杀熊者祈祷吧，"他对大伙儿说。

那天，先知睡在戴维·普罗斯特尼克的木头小房子里，在佩梅蒂过了一夜。黎明时，他动身上波切斯科村去，让三十来个佩梅蒂的罗斯人送了他一半路程。

当先知来到离佩梅蒂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人躲在树林里朝他开了一枪。子弹没有命中。没有人看见暗杀者，但三十个人都听到了枪声。

"为我祷告吧，"先知说，吩咐他的护送者回佩梅蒂去，由他一个人继续上路。

"告诉我们佩梅蒂的弟兄们，犹太人是怎样对付我的。同时也告诉他们，艾莱克·杜迪克斯不怕犹太人的子弹。说我随时准备为我们的罗斯弟兄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先知离去时，人们吻了他的手，吻了他的衣服的褶边。

先知在树林里消失了，三十个立誓要报仇雪恨的罗斯人向佩梅蒂走去。他们在村边上离铁匠铺只一石之远的地方，碰到了霍泽列茨，他们举起棍子，一棍击中了霍泽列茨的胸口。他大喊一声，就痛得倒下了。第二棍落在他的头上，血往脸上直流。

蕾蓓卡·桑费尔德正驮着他的布袋子要出门，看到霍泽列茨倒在地上，他举着他的雨伞就去打，冲过去救助长脚杆。他倒下了，他的头给打破了，倒在霍泽列茨身边。

米哈尔科听到霍泽列茨痛苦的呼喊声，急忙赶去救助他的朋友。他在路上抓起一棵小松树，象攻城槌一样端在前面。蕾蓓卡的凶手们逃掉了，可能是给米哈尔科吓跑的，也可能是看见他们已把人打出了血而吓跑的。他们躲进树林中去了。杀熊者挥起那棵小松树朝逃亡者掷去，结果掷在一棵大栎树上，砰的一

声回音，反蹦回来了。杀熊者向蕾蓓卡俯下身去，扶他挺起来，除掉了他的帽子。蕾蓓卡已经死了。他经常驮的那个绿布袋压住了他的头，他的脑浆溅在这个布袋上。

霍泽列茨还活着，他呻吟得厉害。米哈尔科象抱小孩似地抱起他，把他搬进铁匠铺。放到床上后，他给长脚杆揩洗了那张失血而苍白的脸。霍泽列茨的左眼变成了一个流血的伤口。

当米哈尔科正在护理霍泽列茨往他嘴里强灌松子酒时，宪兵来逮捕谋杀蕾蓓卡的杀熊的铁匠了。

父亲作为证人，提出了报告，谋杀的指控给驳回了。父亲证明他远远地看见了蕾蓓卡的死，那些暗杀者一见米哈尔科，都逃散了。

父亲无法举出暗杀者的名字。这样，杀熊者只在牢里蹲了三个月——那是因为他对宪兵班长粗暴无礼。

那个先知可也遭了难。他在佩梅蒂集会后一个星期，到维列克布道去了。在从维列克去伏洛克的路上，二十四个宪兵在森林中把他包围起来。他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索莱瓦，被州长关在一个马厩里。

那天后半夜，一些罗斯伐木工挖穿了马厩的墙壁。到早晨，先知不见了。两百个宪警搜索了森林，但没找到这个先知。

一个传说突然在山里人中间传了开来。有人看见，杜迪克斯在这里，接着又在那里。一会儿他在山巅上讲话，一会儿他又在云端里讲话。

古拉克西州长的公报结束了这个传说。古拉克西宣告艾莱克·杜迪克斯已取道加利查，逃往俄国。贝雷萨斯检察院发布了缉拿杜迪克斯的公告。

“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罗斯人悄声耳语着。“当他真的……”

成千上万的罗斯人天天都在为这位先知祷告。

佩梅蒂的施主，在我们到达这个村子的第一天，就憎恨我了。当我们在街上碰到，我向她问好时，她别转身就走。之后，我不跟她问好了，她又来对我父亲控诉了。

“别忘了，儿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辛内尔太太的，”父亲说。

我领会这个事实，于是，我如果见到辛内尔太太，不是转入另一条街巷，就是躲在一棵大树干后面，直等到她走过去了为止。

一开始，佩梅蒂的施主对我父亲非常之友好，但是，当格里戈里铁匠成了我父亲的家庭医生时，辛内尔太太就变得别别扭扭了。不过，当辛内尔集合信教的犹太人到他的客厅里去做祈祷时，他还总是邀请我父亲的，虽然他明知道我父亲并不信奉摩西的律法，而且甚至不知道这些律法是什么玩艺儿。父亲不做祷告，他是咕咕哝哝哼上一阵。不过，在他咕哝的时候，他会深深地打躬，砰砰地敲打胸部，因此，深得那位虔诚的宗教徒的赏识。父亲要不是为格里戈里作证，弄得他不配再参加纳塞恩·辛内尔主持的礼拜式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他是很可能获得圣徒的名望的。

父亲的作证，也危及了他在仓库里的职位。佩梅蒂锯木厂的仓库是个很大的露天院子，堆满了木材、木板和制家具的木头。这个呈现一片艺术性的杂乱无章的仓库，白天由四条狗看守。夜晚，除狗之外，还有两个武装人员守卫——一个名叫辛德

尔的跛脚犹太人，一个疯狂得象三月里的野兔一样的匈牙利人佐尔坦·巴拉茨。巴拉茨一个肩上扛自己的枪，另一个肩上扛他伙伴的枪。

我不知道干吗要守卫这个仓库。在佩梅蒂，倘若谁要木头，他才不会到仓库里去偷呐。父亲担任仓库管理员之职，有点儿象他在布达佩斯咖啡馆里当侍应生。他是搞接待工作。只是现在不是父亲先招呼陌生人，而是陌生人偶尔走进仓库来，跟父亲打招呼，他得回个礼。

父亲跟那四条狗很快就混熟了。但他老是抱怨那两个武装守卫。他不反对守夜人裹着毯子一夜睡到大天亮；但他坚持认为他们应按时起床，这样，免得老是要他早上去叫醒他们。他的抱怨不起作用，他老是发现两个守卫早晨还在呼呼大睡。于是，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决定作出牺牲了。他有一只古旧的闹钟。一天早晨，他拿着这只闹钟到仓库去了。他摇醒了酣睡的看守，对如何使用这口闹钟，作了实地表演和说明。待到两个看守掌握了这门复杂的技术后，父亲就把这只钟送给了他们，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在这项现代科学的杰出成就的帮助下，他们以后应在每天早晨七点钟父亲来上班时就起床。两个看守感谢地接受了这项礼物。辛德尔保证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床。当天晚上，在巴拉茨提议下，他们试验了这个闹钟。这只钟果真会响。他们对这项实验喜不自胜，就拿它又试了一遍。经过一个钟头的试验，闹钟停住了。辛德尔就把钟拆开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叫巴拉茨惊讶的是，他竟懂得怎样把它拆开来——却不知道如何重新装起来。第二天早晨，在父亲唤醒他们后，巴拉茨把这口闹钟的零件向蕾蓓尔·桑费尔德调换了两个陶制烟斗。仓库的情况也就依然如故了。

父亲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为格里戈里·米哈尔科作证后两天，柯勃尔经理来视察仓库了。他发现一切都乱七八糟的。他要看看仓库的帐本，结果，仓库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玩艺儿。父亲的习惯，是在一张纸上草草记下进仓的项目，在另一张纸上记下出仓的项目。他把这些纸头都塞在口袋里，偶尔就丢失了。

"那叫我怎么确定仓库里有些什么呢？"柯勃尔经理惊呆了，问道。

"实地盘点一下，"父亲提议道。

"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柯勃尔经理的意见。

柯勃尔经理视察仓库后第二天，就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当面把解雇书递给了他。这是四月底的事。我们被告知，六月一日就得搬走。

"现在我们怎么办哪？我们能上哪儿去啊？"母亲放声大哭。

"我们搬回布达佩斯去，"父亲宣告道，"在一个八十万人都能活下去的城市里，我们不会饿死的。"

父亲竭力想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但他没有成功。他一连两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轮到母亲来安慰他了。

"别折磨自己了，约斯卡。我们不管怎样也要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

母亲是对的。又有人来帮我们了——美国的费迪南。

费迪南五月二日来到了佩梅蒂，住在辛内尔家里。第一天，他没有理会我们，但第二天早晨，父亲上仓库去后，他到我们家来了。他吻了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没有睬我。

"伊莎贝拉，你怎么能容许你的儿子堕落到这种地步？"舅舅提出了这个话题，"一个百倍聪明的犹太教士的孙子，我的外甥，竟会变成匪徒、暗杀者和叛徒的同谋！当我一想到我妹妹的儿

子，将要在绞刑架上了结——"

我一下子向费迪南扑了上去，要不是母亲一声叫喊，突然插到了我们中间，我早给他一个耳光了。

"去叫你父亲回来，格查。"

一刻钟后，父亲来到了家里。

"唉，约斯卡，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费迪南招呼他说。

"你没想到我什么啦？"父亲莫名其妙，问道，"你真的不相信我晓得该如何管理仓库？"

"什么他妈的鬼仓库，"费迪南说，"柯勃尔知道你不会管理仓库，可才高兴呐。你的前任是记帐的，却偷掉了半个仓库。差错不在这里。我没想到的是，你竟急急忙忙去帮助那个杀人犯的铁匠，老弟。"

"可如果他不是杀人犯呢，费迪南？如果我看见是别人杀了蕾蓓卡呢？"

"错就错在这里！为什么你，一个体面家庭出身的人，以前的葡萄园主，几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妹夫和收入满不错的仓库管理员，要去操心这样的事？你挣钱拿工资，是叫你去操心这样的事吗？"

"我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死去啊，我能吗？"

"嘀唷，好朋友！要是你要营救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我就根本不值得跟你谈话。你不知道，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天天都在死去，而并没有人关心吗？你是不是发疯了？你连自已都管不了，还想成为无辜者的救世主？唉，对你来说，是谁更宝贵，是那个该死的铁匠呢，还是你自已的孩子们？你的几个孩子，除了格查，都无疑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给从这里赶走了，他们就会死去。你就这样没有一点儿良心，你能为陌生人担忧，

却不为自己的亲生孩子担忧？如果你的孩子们为了那个铁匠而饿肚子，你以为他会来管他们吗？你以为有朝一日他的良心会感到痛苦吗？不顾死活！约斯卡，你必须明白，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父亲没有回答。

“你不能帮我们一点儿忙吗，费迪南？”母亲恳求道。

“不能帮——也不想帮！但是辛内尔太太能够帮助你们；柯勃尔非常尊敬她。这个上帝保佑的女人，倒有意宽容你们对她的忘恩负义和卑鄙行径；她愿意去跟柯勃尔说一说，只是有一个条件：看格查是不是愿意立刻动身上布达佩斯去。要是我换了你，我会把这孩子送到美国去。他不会死在那儿的断头台上的，最多是死在电椅上。不过，他也可能最后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无论如何，如果他留在这里，他会叫你们大家都变成叫化子；至于他……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儿子要离开佩梅蒂，而约斯卡将保留住在仓库里的位置。”

父亲什么也没说。

“格查反正是要离开佩梅蒂的，”母亲说，“他过几天就要上布达佩斯去参加考试。在秋天，他会去上大学。”

“那行了，一切都解决了，”费迪南放了心，“自然，你永远不可能弥补你的错误了，妹夫。在佩梅蒂士绅们的社交界里，是没有你的份了。不过，辛内尔太太会给你保留住仓库里的位置。我马上去跟她说。今儿晚上我来你们这里吃晚饭。”

在苍茫暮色中，我走出家去，在森林里踯躅了半夜。费迪南吃晚饭时带来了五升葡萄酒，他兴致勃勃，竭力想使我父亲高兴起来。可他完全失败了。父亲拒绝喝酒。

“我不能违反自己的誓言，”父亲对他说。

第二天早晨，费迪南离开了佩梅蒂，四天后，我也到布达佩斯去了。

先知艾莱克·杜迪克斯让一些穷困而愚昧的罗斯伐木工人变成了宗教狂。这位先知的活动造成的一个结果，使我不得不离开了佩梅蒂。当时，我的聪明才智还不足以使我对这种种事件的奇怪的相互影响付之一笑。相反！我气愤得不得了。虽然，我本来就已打算秋天上布达佩斯去，靠白天做事，晚上学习来上完大学，现在，我却决定，我总有一天要回到佩梅蒂来。

自然，我不想使父亲丢掉饭碗。但我反正会想办法回来的。在跟瞎了一只眼睛的霍泽列茨和哭丧脸梅盖列告辞时，我说："再见了，下次见。"我是对的。没有多久，我又遇见了他们俩。现实生活有时很象小说里写的生活：它不能容忍不公正，它要报仇雪恨！

在布达佩斯，我一去就住在福洛普舅舅家里，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我很难得见到舅舅，而且，见到时也多半很匆忙。我到达时，他怀着年轻人那样的热忱，沉着地期待着未来，虽然他的头发已完全灰白了。我走时，他没有送我到车站——他得去找工作。他非常疲乏，不过也非常乐观。

当我在布达佩斯坐下来应考时，这个首都也正在经历着一场考验。我考得很好。布达佩斯却彻底失败了。

我在学校里的第一天，警察把反对党的议员赶出了议会，那些代表，都是反对扩充兵员的。我在八年级进行最后一场考试那天，一个反对党议员对议长依斯特凡·蒂沙伯爵开了一枪。

当我坐在那儿参加毕业考试，正在考数学的时候，布达佩斯街上已筑起了街垒，警察正在攻击那些红旗招展的街垒。工人

们示威游行，抗议扩充兵员，要求普选权。华奇路上的一家工厂着火了，一名踩倒了一个孩子的骑警，叫人在背上打了一枪。武装部队被派出来镇压游行示威。伤亡不少……

数学题出得很难。有个题目算起来又复杂又麻烦，但我还是立即解答出来了。这次考试允许我们考五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就考完了。这当儿，我甚至还有时间抛了一个答案给波洛尼，他就坐在我的后边。我在全体毕业生中，第一个向监考教师交了我做好的考卷。想想我的欢乐和骄傲吧！

当来到街上时，我发觉我有个地方弄错了。回家的路上，我脑袋瓜里又把那道题目从头到尾演算了一遍。现在我可得出正确的答案啦。在又默默地把那道题目算了三遍后，我终于发现错在什么地方了。有一处，我把八乘六搞成了四十六。由于这个愚蠢的错误，我把一切都毁了！我想，也许他们会考虑到那解答的方法吧，演算的结构和路子都没错嘛；可是，这种连小孩也不会犯的愚蠢的小错误，却把一切都搞糟了。就算他们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也仍然将得低分了。

我心里十分沮丧，对周围的事物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甚至对街上那一片异常的忙乱都没有觉察到。

不错，我是从拉科治大街和拉约什·科苏特大街往布达走，工人们是在城市的那一边游行；但是，要是我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会看到已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的。但是，我所看到的却只是 8 × 6 ＝46！是的，这是我看得到的！当我低着脑袋一路走去时，我似乎在发烫的柏油路上看到了歪歪扭扭地涂着8 × 6 ＝46！

我在快吃中饭时回到家里。只有艾尔莎舅母在家。吃过中饭，她也出门去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在一间屋里拉下帘

子，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我是多么丧气啊；我甚至不能为我的错误而找个人来出出气。

“怎么啦，格查？你不是在睡觉吧？”

福洛普舅舅把呆痴痴的我喊醒了。

“出了什么事，格查？”

“全完了！我把一切都毁了！”

“格查，你哭过啦。你做了什么事？你没有受伤吧，我希望？”

“我把八乘六写成了四十六！我再也没办法改过来了。”

福洛普舅舅哈哈大笑。

“我简直是个预言家呐，”他微笑着说。“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你老是爱充大人，我警告过你，待到成年了，你就会象个小孩子。现在你差不多是个大人了，可是你瞧！你在为这样一件小事哭鼻子。”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舅舅的衣服给撕破了。

“出了什么事啦，福洛普舅舅？”

“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傻乎乎的骑警向我冲了过来。用他的佩刀的平面打了我几下。没什么。”

“用佩刀打？你上哪里去了，福洛普舅舅？”

“在亚拉迪大街。我去包扎在街垒上受伤的两个工人，可那个猪猡却从后面暗算我们。”

“街垒？”

几分钟后，我已来到街上。在河的布达这边，一片静悄悄。煤气灯照耀下的大街，简直空空荡荡。我只偶尔碰到了一支警察巡逻队。我一直走到桥边，到那里就过不去了。一排士兵守在桥台上，不准人通行。

远处的火光，把黑色的多瑙河水映出了一道道红色条纹。

我望望维佩斯，看到那里正在燃烧。

“放聪明点，回家去吧，年轻人。”

一个警察巡逻队队长拿手电筒对我照了照。

吃早饭时，我坐在桌旁，象一个头上挨了一枪的人似的。

“振作起来，格查！你可以在口试时弥补你的错误嘛。”

“我躺在家里，而外面街上却在……”

“我现在可不去想它了。不过，至于说这次错过了，这你就不要烦恼了。在布达佩斯还会有街垒的！”

口试时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学校里一解放出来，我又卷进政治里去了。不过，我的政治活动却只限于浏览报纸和对看到的消息勃然大怒。

自从警察在议会里赶走反对派后，那个可敬的机构就投票通过了扩充军队，正式通过了一旦发生战争就调整国家生活的一系列法律。

这些法律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战争早已投下了它的暗影，政府却压根儿没来安抚一下全体居民，因此，人家就只好自己竭力宽自己的心。你不管走到哪儿，都听到人们在说：政府嘴上谈论魔鬼，假装准备打仗，那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可悲的国内情况的注意嘛。

“打仗？荒谬可笑。在二十世纪打仗？即使是开玩笑，也是个蹩脚的玩笑。政府马上会通过一项以备万一发生洪水时就付之实行的法律哩。”

二十世纪也来到了非洲，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那里还在进行一场战争。意大利已占领了的黎波里①！可是，那毕竟是

① 的黎波里为利比亚首都。利比亚曾于一九一二年沦为意大利殖民地。

非洲呀。用不着拿出证据来证明非洲并非欧洲，欧洲也不是非洲。

六月初，有一份下午出版的黄色小报登了一条消息，说四个国家——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①已经缔结了一项反对土耳其战争的盟约。

一些比较可靠的报纸，都驳斥这条新闻。半官方的消息提供者认为，发表这种毫无根据的消息，引起公众惊恐，与匈牙利的报纸是不相称的。同一位消息提供者还宣称，这种欺骗性的捏造，是对匈牙利读者的智力的蓄意侮辱。

那家断言将要发生巴尔干战争的报纸，不得不自我申明，承认它未将这条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加以核实。

这样一来，那些自己说服自己，认为战争不可能在"文明的欧洲"发生的人，又经历了一个新的自我信服的过程。舆论一致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动机来说，却各不一致。

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我的历史教师拉茨洛·马蒂索夫斯基，他对我说：

"欧战是不可能的，巴林特。三国同盟，——就是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远比协约国要强得多，这一点，不仅我们知道，连反对我们的英国、法国和俄国也都知道。不应该假设英国和俄国的政治家会如此愚蠢和不审慎，以致把他们的国家引向必然的毁灭。"

那个常到福洛普舅舅家里来的教师联合会职员艾莱米·西库拉，在谈到战争时，是这样一种态度：

"很可能，政府是在备战。也很可能，欧洲所有的政府都在

① 塞尔维亚当时是一个王国，现为南斯拉夫东部一个地区；门的内哥罗当时也是一个王国，现为南斯拉夫南部一共和国。

这样干！让他们去备战吧！他们若是采取这种中世纪的无信义的行径——宣战，那欧洲的工人们就会宣布总罢工！这是肯定的。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一旦总罢工了，战争就会被制止。”

“我不明白的是，”福洛普舅舅争论道，“干吗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谈论那并不存在的危险。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古怪吗，艾莱米？”

西库拉耸耸肩膀。

我们的许多熟人中，只有卡尔克西·波洛尼一个人相信，我们正面临着战争的危险，而他一想到这点就兴高采烈。波洛尼期终考试时数学不及格，眼下正在准备补考。他对世界政治，无论如何，比对考试资料要感兴趣得多。

“运气稍微好一点，战争在今年夏天爆发，那我就不用补考了。”

“学习吧，别说蠢话了，卡尔克西；”我警告他，“不会打仗的。”

“为什么不会？你又不知道威廉皇帝，也不认识弗朗西斯·约瑟夫。他们可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比我们的敌人强大，让机会错过了，是很愚蠢的。也可能，战争要在补考以后才会开始。不过，毫无疑问，它会开始的，我们将把俄国踩在脚底下，把英国淹在海里。我很高兴我是生在这个时代。”

“你是一头笨驴，只有你卡尔克西一个人认为文明的欧洲在这二十世纪会发生战争。”

“为什么不可能呢？”

“要是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吧。”

我引证了大量的论据，不容置疑地向他证明，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可卡尔克西却硬是不相信。他的顽固，跟他的愚蠢一样。他不顾这些最辉煌的论据，坚持他的荒唐意见。

"欧洲面临着战争！要是我这一点都不知道，那我数学不及格可就完蛋啦。但是，事实上，我是幸运的。"

我上维佩斯去，主要是去看看厄莎。那是傍晚的时候，我希望会碰到她正好在家里。

我没有在家里找到她。我也没有找出他们住的那幢房子。它已经拆掉了，老地基上已造了一幢新的经济公寓。

由于不知卡尔曼家的新地址，我就上工人之家去了。那里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唯一的新特征，是院子边上造了一个滚球场。正在起劲地比赛滚木球。

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恩德列·卡尔曼，他一个人坐在一张放着一杯啤酒的小桌旁，正在观看滚木球。我们握了手，于是他又继续观看比赛，好象我并不在那儿似的，理也不理我。我生气了，决定走了。但我一站起身，卡尔曼却开始说话了。

"你们喀尔巴阡山的事儿可搞得很糟啊。"

"卡尔曼同志，你这是指我们没有缴会费吧？"我一语双关地说。

"那当然也不好罗。不过，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是在考虑你们那个先知的事。电，飞机和先知……它们可合不到一块儿啊。我不了解详细情况，当然……"

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罗斯大学生煽动的事，特别是关于艾莱克·杜迪克斯的事告诉了他。他半闭着眼睛，静静地听我的解释，只在有一个投球手一下子击中九个红心时，他才激动起来。

"我想去看看厄莎，"我说，"但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儿。"

"泰特拉街十二号。"

“泰特拉街在哪儿？”

“在列普托逊米克洛斯。”

“列普托逊米克洛斯？厄莎怎么会住到那里去啊？”

卡尔曼喝了一大口啤酒。

“她结婚了。他们把她丈夫驱逐掉了，她也不得不走了。她嫁了列普泰克。”

这当儿，投球手们争吵起来了。钢铁工人索普科说裁缝凯莱曼不是投三次，而是想投四次。凯莱曼赌咒发誓，说这是胡扯淡，并且叫了几个见证人来作证。有一个见证人指责索普科自己就老是投四次，故意找碴儿跟凯莱曼争吵，免得人家怀疑他作弊。

卡尔曼干涉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话，护卫索普科，证明索普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具有运动员风格的投球手，这样一来，索普科和其余的人都忘掉了凯莱曼是攻击的目标。比赛的人都安静下来了。

“他们驱逐了列普泰克？那不可能啊，卡尔曼同志！列普泰克是出生在维佩斯的。”

“那倒是真的，但那不算回事儿。你不知道匈牙利的法律。每个匈牙利公民都有出生地和居住地。出生地事实上总是固定的。住处经常变动，是个争执不下的问题。而当局决定这种争执，唔，让我补充一句，可不是任何时候都支持寻找住处的当事人的，而且很少根据事实作出决定。那是真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个工人的时候！在确定住处时，事实只起很次要的作用。这就是说，并非每一件事都是事实。拿我们这个例子来说吧，列普泰克出生在维佩斯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列普泰克的父亲也出生在这里，也是不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列普泰克的祖父是

出生于列普托逊米克洛斯。如果列普泰克参加了列普托逊米克洛斯的工人运动，他们就会把他从那里驱逐出去，如果他抗议说，他的祖父是在那里出生的，他们就会笑他。但是，因为他参加了这里的运动，还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战争……你要喝杯啤酒吗？”

“那么……党不能给列普泰克帮点儿忙吗？”

“我是问你要不要喝杯啤酒？”卡尔曼说。

我喝了一杯啤酒。

“告诉我，卡尔曼同志，”我重新提起话头，“作为木业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你不能给喀尔巴阡山的同志们助一臂之力吗？”

“我不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了。我在牢里蹲了三个月，在那段时期，他们已新选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还要再来一杯吗？”

“就因为你关在牢里，他们忘了把你包括在执行委员会里了？”

“你还要再来一杯啤酒吗？”

“你现在担任着党的什么工作，卡尔曼同志？”

“我在观看这些投球手。还要来一杯吗？”

一封电报在家里等待着我。

祝你完成考试。速回家。至盼。父。

见证人费多尔·维尔霍文

马拉马罗斯州有两样东西驰名全国。一样是马拉马罗斯的熊，另一样是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马拉马罗斯熊稍微麻烦一点：你去找它，是找不到的。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却是另一码事了。许多人都赌咒发誓说，马拉马罗斯的熊是想象中的子虚乌有的东西；但从没有人怀疑马拉马罗斯见证人的存在。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有他的商标，象布鲁塞尔花边、法国香槟酒或者哈瓦那雪茄烟一样。而且，跟这些东西完全相同，他有价钱。凡是有钱而又不吝惜的人，都可以在马拉马罗斯获得一个见证人，掩盖他的一切罪行。

一个从来没有享有过人的权利的人，是不大看重一种随时可以作为对付他的手段的权利的。他从实际经验中知道，讲公道会自找麻烦，因为反复强调维护公道，经常是一道用来遮掩他本人犯下的某种罪恶昭彰的行为的帷幕——如果这就是他对公道的唯一理解，那他当然就不会坚持公道了。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正是由此而生的。

两个佩梅蒂的村民一起步行上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去。

“你去西格特干啥？”

“我是见证人嘛。”

“什么案子？”

“不晓得！不过总会有事情的。”

事情是总会有的。哪里的葡萄酒便宜，那里就有喝得醉醺醺的酒鬼。哪里的见证人廉价，那里的审判就频繁。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法院一直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审判。

譬如说吧，贾诺斯·纳吉对彼得·基斯怀恨在心。加上，贾诺斯·纳吉又需要钱用，他就会对彼得·基斯提出控诉，要求归还他欠他的一百福林。当这个案子提到法庭上时，满怀义愤的彼得·基斯会气得结结巴巴地否认他向贾诺斯·纳吉借过债；别说一百福林，他连一个克劳采也没有向他借过嘛。彼得·基斯可以爱怎么否认就怎么否认，那可没有用；贾诺斯·纳吉已带来了两个见证人，泰马斯·西凯莱和亚多尔夫·列伯松，他俩都宣誓作证，当贾诺斯·纳吉把一百福林借给彼得·基斯时，他们都在场。列伯松甚至还会回忆起一个很小的、但是很重要的细节：彼得·基斯收下了那一百福林时，当时他还说："愿上帝报答你的好意，贾诺斯！"贾诺斯·纳吉曾回答说："只要你报答①我这一百福林就行了，彼得！"法官根据两位见证人提出的证言，就会命令彼得·基斯偿还一百福林给贾诺斯·纳吉。彼得·基斯要是又有脑子又有一百福林的话，他就会交出钱来。如果他没有脑子，又没有一百福林，那法院就会公开拍卖他的家具、牛或者马。这样，贾诺斯·纳吉就既作弄了彼得·基斯，又到手了八十福林——只有八十，因为彼得·基斯所付的一百福林中，见证人西凯莱和列伯松每人应得十福林。

这一类审判，占去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法院很多时间。人人都知道见证人在扯谎。但光知道可没用，你得进一步证实它，而那又谈何容易。因为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可才精通他们那一

① "报答"和"偿还"同义。

行的诀窍哩。唯其如此，一个专业的见证人，很难得成为他那个行业的牺牲品，会因为作伪证而给关上两年三年。不过，职业上的风险，是行行都有的，何况别的行业，都比当见证人费劲，又不象这样有利可图。

据说，在马拉马罗斯法庭上，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对审判有决定性的影响，并非仅仅因为法官们不严格遵照法律条文，而是……我不想附和这种指控，甚至也不想用文字把它写下来，否则，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法官一旦以诽谤罪对我提出控诉，我就再也当不成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见证人啦。不过，有一件事我不能保持沉默：有个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法官，经常以他妻子的名义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入银行，凭他一年四百福林的年薪，居然每年要存上一万五六千福林。

正当法官、起诉人、舆论和报纸束手无策，眼看由于马拉马罗斯的见证人伙同作案，致使抢劫在他们面前公然进行的时候，一个有名的律师列波特·华达茨，却对以这种老一套方式进行抢劫的这一行业，给予了坚决打击。正是这个列波特·华达茨，也许是由于他的英勇业绩，使他一九一〇年当选为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国会代表，并且作为依斯特凡·蒂萨的司法部的次长，处理了那桩重大的罗斯审判案。

列波特·华达茨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当开业律师时，有个名叫依斯特凡·卡巴蒂的菜馆老板，也是圣伊米里天主教青年会的副会长，对家具商平卡茨·布鲁德曼提出了控告。卡巴蒂宣称他曾借了二千五百福林给布鲁德曼；布鲁德曼来向列波特·华达茨请教法律问题了。

“布鲁德曼先生，你到底有没有向卡巴蒂借过钱？”这个律师问他的委托人。

“确确实实，我没有借。一个子儿也没借！”

“好。那么，你一定得在法庭上承认，卡巴蒂确实借给了你二千五百福林。”

“哎，我亲爱的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我干吗要承认啊？我干吗要认下一笔并不存在的欠债呢？”

“承认了，你就用不着付款了，”律师答道。

布鲁德曼给弄糊涂了，但他相信他的律师，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法官面前承认卡巴蒂是借了二千五百福林给他。华达茨叫来了两个见证人。见证人一个叫拉茨洛·维克，一个叫米科拉·多巴特卡，他们都发誓证明，当布鲁德曼还卡巴蒂二千五百福林，外加一百一十二福林的利息时，他们都在场。法庭驳回了卡巴蒂的还债要求。卡巴蒂曾借给布鲁德曼二千五百福林，这固然确有其事，而布鲁德曼把这笔钱还给卡巴蒂，毕竟也是确有其事的啊。

列波特·华达茨凭着这勇敢而巧妙的一击，从此结束了马拉马罗斯这种最流行的审判模式。从那以后，一个人要想靠两个见证人的帮助来掠夺别人钱财，可就非有更大的想象力和更高明的技巧不可了。列波特·华达茨对这种高明的技巧是十分熟悉的。他在马拉马罗斯的那场惊人非凡的新型审判中，充当了纳塞恩·辛内尔和费迪南·西维拉的代理人。

这个诡计是辛内尔太太、西维拉设想出来的呢，还是华达茨设想出来的，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到今天都还是个谜。费迪南·西维拉是执行这个诡计的主角。进款大家平分。辛内尔太太负担费用。

一家布达佩斯的木材商行，在马拉马罗斯法院里，为要求赔偿三万二千福林，对佩梅蒂的居民纳塞恩·辛内尔太太、卡沙的

居民费迪南·西维拉提出了控告。木材商行另外还对辛内尔太太和西维拉提出了一份刑事诉讼摘要，控告他们犯了欺诈罪。按照这份诉讼摘要所说，辛内尔太太和西维拉把马拉马罗斯三百四十英亩森林的三年采伐权卖给了这家布达佩斯的木材商行。卖方曾提出一份证明拥有这片森林所有权的可靠的土地证。买方派来的专家证实，那三百四十英亩地上长满了很有价值的美丽的栎树和松树林，认为三万二千福林这个价钱很公道，事实上是很便宜的。成交后，卖主收下了价款；结果却发觉，那片易手的森林是不能采伐的，因为没法儿把木头从那里运出来。那三百四十英亩地全被包围在无路可通的国家森林中间，国家禁止在林中开一条路。买主一知道这个情况，就去向一位林务官和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行了一笔贿。那两位绅士接受了贿赂，但他俩谁也不能够开具一张筑路的许可证，因为那片森林是留着供王室成员当狩猎场用的。因此，那家布达佩斯商行是买了一项毫无价值的权利。最后，他们弄清楚这件事情后，就一面对贿赂事件保持沉默，一面对法院提出了控告。

刑事诉讼留待民事法院作出宣判后再行处理。

在民事诉讼案中，首先必须加以澄清的有两点：卖主是否知道他们的森林和外界无路相通？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知道，他们是否曾把这一点告知买主？这是第二个问题。被告的律师列波特·华达茨，代表辛内尔太太和西维拉，承认他的委托人是知道他们的森林的这种不利位置的。华达茨宣称，当卖主以此提醒买主时，后者曾一笑置之。

“那是小事一桩。我会铺一条路嘛。”他说这句话时，还拍了拍他放皮夹子的口袋。

代表布达佩斯木材商行的律师，根本不承认卖主曾向买主

提起过缺乏道路的问题。他否认买方曾经说过"我会铺一条路嘛"这句话，也没有拍他装皮夹子的口袋。

华达茨要证明他的断言，当然得有见证人罗。这个见证人，大名儿叫做费多尔·维尔霍文。

根据审判汇编文件记载，费多尔·维尔霍文是一个四十二岁的伐木工，出生于佩梅蒂；是个罗斯人血统的鳏夫，希腊天主教教徒。

就我记忆所及，维尔霍文是一个矮小而灵敏的人，骨瘦如柴，满脸皱纹，他有一个习惯：讲起话来，老是对人家眨眼睛。

维尔霍文当即宣誓证明，华达茨提到的，辛内尔太太和西维拉为一方，和买主的代表为一方的那场对话，他当时是无意中听到的。他证明买主的代表怎样拍了拍他那装皮夹子的口袋。

"那番对话是在哪儿讲的？"为受损害的木材商行辩护的律师问维尔霍文。

"在辛内尔先生的房间里，"维尔霍文答道。

"辛内尔先生的房间里正在商谈业务，你怎么会进去呢？"

"对不起，我随时都可以进入辛内尔的屋子，因为我是辛内尔先生的安息日异教徒。"

"安息日异教徒，是星期六为信奉摩西的家庭干活的基督教徒，因为信摩西的家庭禁止在星期六干活。譬如说，生炉子，吹灭蜡烛，等等。就某种程度来说，安息日异教徒是那个家庭的心腹。"华达茨律师老练地解释道。

"照此说来，这位见证人的确可能是谈判时在场的。"法官说。

无论如何，代表木材商行的律师却不同意。相反，他一边弄正歪在一边的领带，一边提出了那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双方谈话是用什么语言进行的？”

“用意第绪语，”维尔霍文回答道，对那位律师眨眨眼睛。

“好，那么，你怎么懂得他们讲的话呢？”

“我？请你原谅！”维尔霍文回答道，对列波特·华达茨眨眨他的左眼，“我讲意第绪语，比许多犹太教士都讲得好。甚至希伯来语我也懂得一点儿。要是你不信，先生——”为了显示他的意第绪语知识，维尔霍文突然吟唱起来了。

“Shema Yisroel Adonai ello henoo, Adonai ehod！”①

“行了！”法官喝道。

但是要维尔霍文静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

“Borooh atoo Adonai，”他吟唱道。

“行了！”

“如果我的渊博的同行怀疑见证人维尔霍文的话的真实性，我请求由专家们来对他进行审查。”列波特·华达茨提议道，“我要求聘请几个专家来检验一下，看看费多尔·维尔霍文是否确实懂得意第绪语。我建议聘请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犹太主教和犹太公会的主席作为鉴定人。”

根据法庭的要求，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犹太主教和犹太公会的主席，对费多尔·维尔霍文作了详尽的盘问。这两位绅士在他们的意见书中说：

> 费多尔·维尔霍文精通意第绪语，讲述流利。维尔霍文说意第绪语时之唯一错误，是以g代h，故其言谈颇为奇特，然并不妨碍对它的理解。

① 这句话和后面一句话，是犹太教徒们平时祈祷时常吟唱的祷词。参见本书第一九六页注。

专家的意见决定了审判的结果。维尔霍文的陈述的真实可信，不容置疑地被确立了。

宣布判决后，费迪南·西维拉毫不掩饰他的见解。

“在美国，对这样瞎说一气的毁谤者，他们会用私刑来处死的。”

输掉了官司的那家布达佩斯木材商行，把那毫无价值的森林采伐权，以一千二百福林卖给了一位真正的地产代理商。费迪南·西维拉用二千五百福林重新从那位代理商那里买回了这一权利。

辛内尔太太和费迪南拿这毫无价值的采伐权，先后卖给了四个不同的人，他们为了那三百四十英亩森林地，也被控告了四次。可是，这两个卖主依靠维尔霍文的证明，却都能证实，在这四个事例中，他们都是好心好意的。在第四次审判时，买主是一个英国木材商。法官心里想，这一回，这两个无罪的人可要倒霉了吧。英国木材商的律师同样向维尔霍文提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当事人谈话是用什么语言谈的？”

“用英语谈的，”维尔霍文答道。

“你的英语是从哪里学来的，维尔霍文？”法官问道。

“如果阁下跟我一样，也在彭西尔瓦尼亚的一个煤矿里干过五年活，那阁下也会懂得英语的，”维尔霍文回答道，对列波特·华达茨眨眨眼睛。

这样，在这次诉讼中，辛内尔太太和西维拉又被宣告无罪了。

这桩出售森林的事，开始于我们住在维佩斯的时候。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我从布达佩斯中学毕业的时候。费多尔·

维尔霍文在最后一幕中担任了主角。

维尔霍文以充当见证人进行掠夺，攒下了一点儿钱。他以聪明的深谋远虑，在休斯特一家储蓄银行里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他打算待他的钞票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就搬到休斯特去住，跟辛内尔太太在佩梅蒂一样，在那里给等钱用的人放点小额贷款。维尔霍文是个鳏夫。他在美国干活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当然罗，他每星期收到工资时，都在一个信封里装上三四块美元，邮寄给他的妻子，可是维尔霍文太太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些装钱的信。是谁在从彭西尔瓦尼亚到佩梅蒂的路上，把维尔霍文的美元装进了腰包，这是很难确定的了。不过，那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维尔霍文在一去五年之后回到佩梅蒂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家里人了；甚至谁也无法告诉他，维尔霍文太太和维尔霍文的两个孩子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打那时起，维尔霍文就孑然一身了。当他在森林里干活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在这世界上他已举目无亲。可是，当了三年安息日异教徒后，他开始感觉到寂寞了，觉得独自一个人是不好的。可是，他又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改变了。于是，当他存在休斯特的那一小笔钱渐渐多起来的时候，他在夜晚就开始想起女人来了。不是想他死去的妻子，而是想一个有鲜红的嘴唇、乌黑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的犹太姑娘。维尔霍文想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犹太姑娘，而是一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的犹太少女，这少女长有象他所渴望的那种嘴唇、眼睛和头发，又象辛内尔太太那样精明干练。他决定一俟他有了足够的钱，就要去寻找这个犹太姑娘，并娶她做老婆。不是他，而是他的妻子，将成为休斯特的施主。这个女人会做生意，会放债，会攒钱，而且出入法庭，那时，他维尔霍文将被称呼为“先生”，坐在马口铁屋顶的维尔霍文

的家里了；虽然，以他的宗教来说，星期六并不禁止干活，但他仍将雇一个可供差遣的安息日异教徒。

但在这会儿，维尔霍文却仍同林中居民一样过着可怜的贫穷生活——这些林中居民，跟他们那一伙芸芸众生一样，既不是安息日异教徒，也不是见证人。他虽然痴心梦想着奢侈生活，吃的却是燕麦饼、洋葱和玉米粥。童年时，维尔霍文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见过一个匈牙利绅士，脚上穿了一双黄色高筒靴。天晓得是怎么回事，那双黄靴子给他的印象之深，远远超过了看到一条大型远洋轮船或者纽约的摩天大楼。对维尔霍文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一双高筒靴。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伐木工人，要拥有那样一双靴子，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可是，作为一个安息日异教徒，他却老是想那样的靴子了——不过，也只限于想想而已。等到为出售森林而举行的第一次审判作出了判决，维尔霍文在休斯特银行有了第一笔存款的时候，在这个安息日异教徒的实感和他儿时的梦想之间，一场剧烈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在对第二次出售森林案作出判决后，他的童年时代的梦想——那双黄高筒靴——已占了上风。维尔霍文到鞋店老板拉约什·西沙尔那里买了一双最好的黄靴子，由于维尔霍文是个矮子，这双靴子高得几乎达到屁股沟了，因此很妨碍他走路。维尔霍文买这双黄靴子如果是为了穿它，那的确会使他象是上了脚镣一样。但维尔霍文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用一根麻绳把两只靴子捆起来，在他那木头小房子的墙上钉上一枚不知从哪儿偷来的钉子，就把这双靴子挂了上去，靴尖正好挨着挂在角落里的那张圣像。这样，每当维尔霍文在圣像前弯腰打躬时，他一眼就能看见这如愿以偿的理想。而且，他还会沉思默想起来：既然靴子已成了现实，那为什么不能同样也有那嘴唇鲜红、眼睛乌

黑、头发卷曲的犹太姑娘，由他来派她充当休斯特施主的角色呢？

正是维尔霍文在这样梦想着犹太姑娘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排犹主义者。他赞成排犹主义，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纳塞恩·辛内尔最近这段时期，胃口好得要命。他胃口好，竟把过星期六的炸熏鱼吃了个精光，连一口也没剩给他这个安息日异教徒维尔霍文。而维尔霍文可是一个进攻炸熏鱼的热诚的游击队员啊。在做梦时，他也常常脚上穿着他的黄靴子，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桌上摆着一大盘又一大盘的炸熏鱼。维尔霍文会接二连三吃光几盘鱼，但是不管他吃多少，却总还会剩下几大盘装得满满的鱼。做过这样的梦后，维尔霍文一觉醒来，鼻孔里还痒痒的有股炸熏鱼气味。可跟维尔霍文从梦中保留下来的只是这样一股子炸熏鱼气味一样，这个安息日异教徒从辛内尔家里得到的真正的炸熏鱼，也只是这股子气味而已。这股香味儿，这股吊胃口的、刺激人的鱼香味，是维尔霍文的排犹主义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根源是一顶帽子，一顶美国帽。或者不如说是蕾蓓卡·桑费尔德。更确切点说，是蕾蓓卡·桑费尔德对待维尔霍文的美国帽的态度。这顶方格子帽，是维尔霍文花了六十五个美分在美国买的。他戴着它在街上跑了一年，之后，在煤矿里干活，又戴了三年。由于几年来他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要把这帽子刷一刷，因此要说这顶帽子干净，那是谈不上的。维尔霍文不仅仅在煤矿里戴这顶帽；当他在一家大化学工厂里干活时，也还戴了四个月。在煤矿里的年头，维尔霍文的帽子沾上了颜色，在化学工厂时，沾上了一股独特的气味。那是一股叫有胃病的人闻了就会作呕的气味。

维尔霍文从美国带来的所有宝物，现在还可以夸耀的就只剩下这顶帽子了。另外一些东西，他早已卖掉。但无论如何，这顶帽子却仍旧保留着。它好象一件装饰品，挂在墙壁上的一枚钉上。当维尔霍文买来那双黄靴子时，他把帽子从墙上取下来，放到一个角落里，让它在那里散发芳香。这一来，一些精力比较旺盛的老鼠可就来品尝它了。维尔霍文注意到，这些穷凶极恶的老鼠不断地啃啊咬的，这顶贵重的帽子总有一天会遭殃，因此，他下了决心，要跟他这从美国买来多年的最后一件纪念品告别了。他把这顶帽子给了蕾蓓卡·桑费尔德，只求换一支樱木柄的陶制烟斗。

蕾蓓卡把这帽子里里外外细看了一番。他还闻了闻。然后把它递还了维尔霍文。

"我不能拿一个烟斗跟你换这顶帽子，"他对他说，"不过，要是你在这顶帽子之外再添十个克劳采，我可以换给你一颗裤子钮扣。"

蕾蓓卡这番话，是维尔霍文拥护排犹主义的第二个原因。

有很长一段时期，维尔霍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反犹派。他的排犹主义之所以会开花结果，成了有意识的感觉和斗争的信念，那是由于缺乏更好的消遣，又用不着花钱，因而他去听了艾莱克·杜迪克斯的传道，看了那位先知跟杀熊者摔跤所造成的事。维尔霍文听了那番传道并目睹了那场摔跤比赛后，竟变得如此狂热，以致当那位先知离开佩梅蒂时，他竟跟着其余的三十个人一起去护送他。那是他第一次穿上了他那双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买来的黄靴子。

当树林里一枪打来时，维尔霍文正好走在那位先知的身旁。跟他的三十个伙伴一样，这个辛内尔的安息日异教徒也立刻领

会到，这是犹太人一心想谋害先知。他气得嘴里直冒唾沫，一头向佩梅蒂冲了去，连荆棘扎破了他那双漂亮的黄靴子也顾不得了。

当时，一见他的伙伴们都已用棍棒武装起来，他也捡了一根很大的树棍。黄靴子妨碍他走路，他落在其余的人后面，只远远看见他们已团团围住了霍泽列茨。但正因为他落在后面，他也第一个面对面碰上了挥着雨伞冲上来救霍泽列茨的蕾蓓卡。

当蕾蓓卡头上挨了一顿乱棍倒在地上时，维尔霍文惊惶地掷下他的树棍，拔脚就逃了。他跌跌撞撞地穿过树林子，逃得离正在砍树的地方远远的。直到深夜，他才敢偷偷地溜回家去。在路上，他竭力不让人家看到，但是村子里竟然那样骚乱不宁，他不得不老是跟人家道“晚上好”。不多一会儿，他就弄清楚那骚乱的原因了：宪兵们已为蕾蓓卡·桑费尔德被害而逮捕了米哈尔科。维尔霍文上床睡觉了，他放下了心。

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法庭上当见证人。他被唤去宣誓作证，证明他看到米哈尔科用一根棍子击中了蕾蓓卡的头。维尔霍文能够看到米哈尔科弯腰坐在手持刺刀的看守中间的形象。

“见证人维尔霍文，跟我念宣誓，”法官命令道。于是法官大声地念了宣誓：

> 我，费多尔·维尔霍文，以上帝的名义宣誓：格里戈里·米哈尔科杀害了蕾蓓卡·桑费尔德。我敢断言，千真万确！

维尔霍文宣了誓：

> 我，费多尔·维尔霍文，以上帝的名义宣誓：格里戈里·米哈尔科

没有杀害蕾蓓卡·桑费尔德。是我，费多尔·维尔霍文杀害了他。我敢断言，千真万确！

维尔霍文宣誓时，又向刑事被告席上瞥了一眼。格里戈里已不坐在两个持刺刀的看守中间；是他，费多尔·维尔霍文坐在被告席上了。

维尔霍文吓得尖声呼叫，浑身发抖，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他有一种感觉，木头小房子里已没有空气，闷得要命。

他走到室外去了。村庄在酣睡中。费多尔·维尔霍文只想找个人聊聊天，但在佩梅蒂，他是唯一醒着的人。

他凝望长空；看到天上有那么多灿烂的星星，感到很惊异。他以前也常看到星星，但他第一次注意到，星星竟有这么多，照耀得又多明亮呵！它们是那样奇怪地盯着下方。他闭上眼睛，不去看布满星星的天空了，可是，他又怕面对黑暗。他宁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星辰，直望到它们的光辉渐渐暗淡，接着完全消失在明亮的蓝天中。

第二天一早，维尔霍文去看望依沙克·桑费尔德。桑费尔德老头，遵照古老的犹太律法，正穿着破衣裳，坐在地上，哀悼他的儿子。他双手捂着脸，在轻轻地啜泣。

"你要什么？"哭丧脸梅盖列正在火堆上为伤心的桑费尔德熬汤，勉强地向维尔霍文打了个招呼。

"我什么也不要，"维尔霍文结结巴巴地说。

桑费尔德老头尽管悲痛得肝肠寸断，还是搭了腔。

"没有什么事，维尔霍文，那你上这里来干啥？"他问道。

"我给你带来一样小小的礼物，依沙克，"维尔霍文说着，把那顶历史性的美国帽递给了他。桑费尔德机械地接过帽子，放

在面前的地上，看也没看一眼。

维尔霍文踌躇不决地站在那儿，看看老人，又疑惧地瞥了哭丧脸梅盖列一眼。当梅盖列尝了汤，加上盐，把汤从铁锅里倒进陶盘子里时，维尔霍文转身就走了。

“上帝保佑你，依沙克。”

“等一下，”桑费尔德说，痛苦地站起身来，“我知道，你们都欢喜可怜的蕾蓓卡，费多尔。人人都爱蕾蓓卡。这是他的东西，拿去做个纪念吧。”

他递给维尔霍文一只污秽的樱木柄的陶制烟斗。

一连四个星期，佩梅蒂的人都没有看见维尔霍文，也没有人去找他。可以说，一个森林工人不辞而别，突然失踪，这是很普通的事。过后，他又会象失踪时那样突然出现的，如果他回不来了，那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他们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晨等着他，可白等了一场。辛内尔太太不得不从街上请了一个人来生炉子。这个临时雇来的安息日异教徒，一个名叫索莫吉的伐木工人，干得挺不错，辛内尔太太也不觉得离不了维尔霍文了。后来，当人人都已忘掉了维尔霍文时，他却在森林里漫游了四个星期，又回到佩梅蒂来了。

在这四个星期里，他身上的粗绒衣已撕得粉碎，脚上的黄靴子也掉了颜色。维尔霍文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星期六来到了佩梅蒂，他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径直上了辛内尔家。

佩梅蒂那批虔诚的犹太人，正在辛内尔家里用单调的声音向耶和华吟诵赞美诗。辛内尔太太出门去了。索莫吉唯恐失去他那安息日异教徒的职位，心怀敌意地迎接了维尔霍文。维尔霍文安慰他说：

“我只是来告诉辛内尔太太一声，我以后不来了。”

“我也劝你别再想到这个屋里来生炉子了……如果你这样打算……”

维尔霍文没有理睬索莫吉的威胁。他在地板上啐了一口痰，走进厨房去了。厨房里空无一人。维尔霍文打开了贮存辛内尔一家假日午餐食品的壁橱。他闻闻炸熏鱼的香味，把他那只污黑的手往盘子里一插，就抓起一把鱼来，接着抓第二把，第三把。他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

“维尔霍文！你发疯了吗？”

辛内尔太太走进厨房时，那盘鱼已经吃掉了一半。

“住嘴！”维尔霍文一边咽下嘴里的鱼，一边怒喝道。

“疯子！疯子！救命啊！救命啊！”

正在提水的索莫吉，听到辛内尔太太高呼救命，奔进厨房来了。他一进厨房，看见辛内尔太太已躺在地上，她的头给劈开了，旁边搁着索莫吉砍柴的那把斧子。斧子上沾满了鲜血。维尔霍文背着尸体站在那儿，正在吃炸熏鱼。从那间屋里，传来了希伯来语的吟唱声。

维尔霍文被捕时，并没有否认他犯的血腥罪行。

“我宰了这条癞皮狗，”他毫不后悔地承认道。

从佩梅蒂去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路上，宪兵们把维尔霍文打了个半死，因为他是一个供认不讳的罪犯，还碰巧是个罗斯人。不过，维尔霍文如果否认自己的罪行，那他们也会打得他招供的。

“弟兄们，你们又把人家打得差点死去啦，”当宪兵们带进犯人时，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监狱长象父亲指责儿子似的温和地

责备道。

如果监狱长能预见未来，看到宪兵们只把维尔霍文打得半死，他责备他们就不会这么温和了。

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维尔霍文供认的事儿，比警察局要他供认的还多。他供认谋杀了辛内尔太太。他还承认，是他杀害了蕾蓓卡·桑费尔德。这一下可把警察当局搞窘啦，因为这番供认，彻底消除了格里戈里·米哈尔科的谋杀犯嫌疑。更令人发窘的，还是维尔霍文供出的辛内尔太太经营生意的记录。他不仅揭露了围绕出售森林而发生的事实真相，而且指出了辛内尔太太的合伙人：费迪南·西维拉、经理柯勃尔、政府专员亚柯斯·斯齐梅列，以及列波特·华达茨——他那时正好已被国王陛下任命为司法部次长。森林事件，在他们的交易中，并不是最奇怪的事。维尔霍文揭发的操纵法庭的内幕，使警察局长听了简直毛发悚然。

警察局长把维尔霍文的招供，给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检察长写了一份详尽报告。接下来，检察长又给司法部次长列波特·华达茨打了一份报告，列波特·华达茨就派了部里的法律顾问到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来“进行调查”了。

司法部法律顾问加波尔·冈伊·波茨，早有野心想当司法部次长，但叫列波特·华达茨捷足先登了。加波尔·冈伊尽管气得七窍冒烟，却百般奉承华达茨。华达茨看见有一个匈牙利的老派绅士来对他谄媚讨好，很是高兴，就把冈伊·波茨当作了心腹。冈伊·波茨看过维尔霍文的供词，亲自跟这个囚犯谈了一个半小时，便决心要搬掉华达茨。他知道，要是他向司法部长或者总理大臣报告，他们就会把这件事秘而不宣，以免承认他们任命了一个蠢流氓当司法部次长。因此，冈伊·波茨就采取

了别的办法。他召集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各报的编辑，宣称维尔霍文对专员亚柯斯·斯齐梅列和司法部次长列波特·华达茨的恶意控告毫无根据。

“维尔霍文的供词，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幻想曲，”他宣告道。这位司法部顾问要求记者们以最最坚定的态度，驳斥维尔霍文的控告。

记者们从记者招待会上知道，维尔霍文对新上任的次长提出了什么控告；他们根本不明了指控的内容，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否定那一控告。

于是，他们开始驳斥了。政府的报纸，满怀义愤地对它加以否认，反对党的报纸则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报纸的否认，引起了布达佩斯报纸对维尔霍文一案的注目。反对党的报纸都派记者上马拉马罗斯州来了。有一个记者还访问了佩梅蒂。

现在，要遮掩这事是很困难了。但是，由于反对党的报纸怀疑列波特·华达茨，开始攻击整个政府，这件事又非得遮掩起来不可。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检察院根据司法部的指示，下令对费多尔·维尔霍文进行诊断，以决定他的神志是否正常。为执行这一命令，布达佩斯的两位医师来到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

当这两位医师正在检查维尔霍文的精神是否正常时，斯齐梅列专员提出了辞呈，躲到疗养院去了。柯勃尔经理迁回了维也纳，把经营工厂的事交给了工程师特梅西。纳塞恩·辛内尔和费迪南·西维拉也已不知去向。

两位医师宣称维尔霍文不仅精神不正常，而且是一个对自己和公众都有危险的疯子。检察院下令把他关到卡沙的精神病院去。在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到卡沙去的路上，费多尔·维尔

霍文跳了火车，一跤跌死了，于是，司法部顾问加波尔·冈伊·波茨也退职了。

当工程师特梅西接管工厂时，父亲给我打了电报，叫我立刻返回佩梅蒂。

一连好多年，谁也不知道费迪南·西维拉的死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他还挺活跃呐——自然罗，是在美国。匈牙利的报刊经常报道他的消息，因为西维拉在美国已经变成百万富翁，他作为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导演，积极参加文学艺术活动。他跟西蒂舅母(她仍然留在匈牙利)离了婚，另娶了一个闻名全球的电影明星。

匈牙利报纸经常报道：费迪南·西维拉即使在美国，也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匈牙利人，他正在那里为同胞们争光。

团结的力量

柯勃尔经理离开佩梅蒂时，父亲很自然地感到，这一来，他可以平平安安过一阵子了。这是判断上的错误。新经理特梅西开始清理全体人员，第一个就打发我父亲走，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是辛内尔太太推荐我父亲担任这个工作的嘛，柯勃尔又觉得他很合用。此外，费迪南·西维拉还是我父亲的舅子。因此，特梅西把父亲免职了。

“生活反复无常。开头，他们因为辛内尔太太不欢喜我，要撤我的职。现在，他们却因为她欢喜我而解雇我了。”

生活到底如何反复无常，只有到了后来才见分晓。

米哈尔科因为殴打宪兵，被判了三个月徒刑，过了两个月，正好我父亲被免职的那天，他回到佩梅蒂来了。

第二天，杀熊者去拜访了新经理。特梅西热诚地欢迎他，请他坐，敬了一支烟。这位铁匠把烟点燃，说明了他的来意。

“你知道，先生，我已为杀人罪而坐了一次牢，虽然我并没有杀任何人。要是我真的因为揍死了什么人而要去坐一次牢，那对我很麻烦，对你也很麻烦的。瞧，用这个！”杀熊者把他的大拳头伸到经理的鼻子底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哈尔科先生？”吓呆了的特梅西问。

“不多也不少，就象我说的！随你自个儿去想吧！”米哈尔科回答道，他给了经理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解释，便扬长而去。

特梅西慌了。直到一个由三十名工厂工人和森林工人组成的代表团来访之后，他终于明白了米哈尔科威胁他的原因。哭丧脸梅盖列是这个代表团的发言人。

梅盖列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他那些伙伴老是七嘴八舌地插嘴，但这并不能帮他说明问题。尤其是独眼龙霍泽列茨，老是快嘴快舌地说个不停。

“你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先生，你该明白，即使是一条小狗吧，你碰撞了它的鼻子，它也会发火呀，一个人也一样，要是他的朋友受了伤害，同样会动怒的。”

“狗会汪汪叫，”霍泽列茨插嘴道，“人不会汪汪叫，但他会咬你。”

“住嘴，亚伯拉罕！”梅盖列警告霍泽列茨一声，继续讲下去，“你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先生，我只消告诉你这一点就行：如果有人要把米哈尔科送上绞刑架，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有人帮助格里戈里，那他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如同上帝在西奈山上对摩西说的①……”

“住嘴，亚伯拉罕！换句话说，我们要说的是，我跟你说……是要求你别去打扰约瑟夫·巴林特先生。这一次，就让一个诚诚实实的人住在这儿吧，这对佩梅蒂没有什么坏处。”

特梅西是个机灵人，他立刻明白了，他得答应这个要求才是。当他保证办到这一点时，他心里作出了决定，该好好利用约瑟夫·巴林特在工人中的声望。待工人代表团一走，他就把父亲唤去了，他通知他说，他已撤销解雇通知，并把我父亲管仓库

① 摩西应耶和华之召，在西奈山上面聆教旨后，下山传授给众百姓。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四章。

的工资，从每月七十五福林提高到一百福林。

第二天晚上，特梅西经理来拜访了我们，正是那一天，我回到了佩梅蒂。

“你也知道，巴林特先生，”寒暄了几句后，他对我父亲说，“我认为，佩梅蒂的人所以如此独特，如此愚昧、贫穷和无依无靠，都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缘故。得为这做点儿什么事才好啊。”

父亲惊诧地望望特梅西，我则怀疑地注视着这位经理。

“应在佩梅蒂建立一个政党，”特梅西以一种多少有点自负的口气说道。

“是一个独立党吧？”父亲想知道。

“独立党或者政府党，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应该团结一切正直的公民，对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施加影响。”特梅西停下来想了一下，重新说道，“我想，毕竟还是独立党适合一些。所以，我们应该组织这样的党。”

“在佩梅蒂，有选举权的人有多少？”父亲问道，这个独立党的竞选运动人又来劲了。

“我说不确切，”特梅西答道，“我相信有二十个光景吧。”

父亲沉思默想起来了。

“贾斯什①的党纲要求有普选权，他并且不赞成民族压迫。这样的党，无疑会得到工人的支持。”

“那是真的，”特梅西同意道。“贾斯什党纲在工人中很有影响，不过，在我看来，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是画饼充饥罢了。以前，还只有社会民主哄骗和鼓动工人；现在，那些贾斯什

① 盖拉·贾斯什（1850—1917），政治家、议员、国会发言人，独立党的左翼领袖。

派也在这样干了。唯其如此，所以一切正派的公民必须联合起来。巴林特先生，我想的是独立党温和的、庄重的、稳健的、爱国的一翼……”

“那当然更好罗，爸爸，”我插嘴说，“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工人们立刻就会知道，这个组织是专门对付他们的。”

“我们谁也不反对，”特梅西坚决声明，“谁也不！为匈牙利人的匈牙利，是我们的座右铭！巴林特先生，你是独立党的老战士，你眼下无疑准备为他们说说话吧！”

“永远，”父亲用充满感情的声音答道。“永远！为匈牙利人的匈牙利——在任何时候，用一切方法。不过你也知道，先生，”父亲停了一下，“你也知道，我已好久不搞政治了，在这段时期，我想得很多。我越想得多，我越确信，我们老是强调匈牙利人比其他民族的人优秀，匈牙利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不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利益的……我们那样搞的话，相信我，先生，只会给匈牙利人挣来一些敌人。先生，如果搞得左邻右舍都成了敌人，这对匈牙利人有什么好处，这对他们有什么利益？匈牙利人是很好的人，这是事实！但是别的民族的人也是好的啊。匈牙利人是热爱自由的人。但别的民族的人也爱自由啊。我们如果要让匈牙利人真正获得自由——”

“当然，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巴林特先生，”特梅西叫了起来，他不再用狡滑的谈吐，而企图用高声叫喊来驱散我父亲的忧虑了，“我们要、而且将为匈牙利的自由而奋斗。怎样奋斗呢？如陛下的座右铭所指出的——团结的力量①——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座右铭。如果我们要取得胜利，那么每个诚实的公民

① 原文是拉丁文。

都必须参加战斗。因此，我们一定得拟订出一个明智的、稳健的、每个诚实的公民都会赞同的纲领。我曾拿这些问题跟佩梅蒂的几个绅士讨论过。他们全都准备——为了匈牙利人民——建立这个党。——巴林特先生，谁也不怀疑，你会成为一个积极的工作者。你的合作很重要。这有两层原因：一方面，你以前是个竞选运动者，有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佩梅蒂的工人们，或者至少相当一部分工人，都很信任你。”

“先生，你是打算准许工人们参加你计划建立的这个党吗？”我嘲弄地微笑着问。

“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在场，显然使特梅西感到有点紧张不安，“只有有选举权的人才能参加政党嘛。不过，当然罗，党不会忽视工人的。它将教育他们；它将指导他们，而且将制止他们去干有害的、甚至危险的傻事。我们将安排演讲会。也许，我们会设立一个评议处——”

“你觉得这事怎么样？”特梅西走后，我问父亲，“我希望你明白，特梅西要的是什么？”

特梅西的来访，以及父亲眼下已感到很不习惯的那场政治讨论，搞得父亲兴奋激动，心烦意乱。他听到了我的问话，但不能领会我的意思。他回答了我的话，但答非所问。

“匈牙利人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他说，“可别的民族也不赖啊。”

“那是真的，爸爸。不过匈牙利人跟别的民族一样，主宰他们的命运的乃是他们的敌人，这也是真的啊。”

父亲现在已自称是贾斯什纲领的信徒，犹豫了一天后，就积极行动起来。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佩梅蒂村共有十四人有选

举权。这十四个人全都赞成特梅西经理的计划，其中热衷于组织政党的，大约有五人。但是，尽管如此，党组织在佩梅蒂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特梅西拥护一个温和的独立党的奋斗目标。他心底里想的却是，在定于一九一五年春季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他要凭这个党的纲领去对抗列波特·华达茨。工程师扎拉、会计哈默施拉格和出纳尼梅什都采纳特梅西的观点。

两个酒菜馆老板，村文书兰托斯，兽医蒂马尔和药剂师西波查都是政府党的拥护者。药剂师西波查公开宣称：只要是匈牙利人，就一定是政府党的支持者，因为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全世界都承认匈牙利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我不知道政府在为什么而奋斗，"酒菜馆老板莱波维茨对父亲承认道，"我只知道，我如果不拥护政府党的话，他们隔天就会吊销我的执照。因此，我是政府党的一个服服帖帖的信徒。"

希腊天主教牧师伏洛辛，也是一个政府党党员。七年前，伏洛辛曾支持过一个罗斯候选人；现在，他却在为政府党进行游说了，因为那个罗斯候选人胜利后，州长就对希腊天主教会的业务作了严格的调查。之后，当马拉马罗斯选举政府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府机构放手刁难罗斯人时，希腊天主教会就获得政府的袒护了。

父亲、加尔文教牧师和那位教师，是贾斯什的拥护者。父亲是被贾斯什纲领中的民主主张争取过去的。那位没经验的加尔文教的年轻牧师，是献身于争取佩梅蒂的罗斯人信奉加尔文教的。为了赢得罗斯人的信任，他拥护贾斯什为被压迫少数民族提出的要求。教师巴尔·肯尼迪娶了一个斯洛伐克姑娘；因此，肯尼迪也对贾斯什的少数民族的纲领变得很热心了。另外，他

所信奉的某种纯朴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也使他受到了贾斯什派的吸引。邮政局长也是一个贾斯什的拥护者。他是在昂格瓦工作时，因投了稳健的反对党候选人的票遭打击报复而被调到佩梅蒂来的。他开始高声为贾斯什派游说，希望因此而获得惩罚，再把他调离佩梅蒂。佐尔坦·塞波克大夫也同情贾斯什和他的支持者，但不是全心全意；这位大夫竭力想使两个独立党的追随者联合起来。

特梅西当上经理后，搬到红屋顶的柯勃尔别墅去住了，那房子的居住者已经易人，但房子的名字却并没有更换。现在，佩梅蒂的十四个选举人，为建党而在这幢房子里碰面聚会。

下午七点到十一点，党的创建者吃晚饭；下午十一点到上午两点，他们发表演说。在吃晚饭时，他们互相激励，十分兴奋；当开始谈到需要团结一致时，可就闹翻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吵起来的。特梅西第一个发言。他以富有说服力的一般原则，谈到爱国主义和匈牙利，需要为团结的力量而工作和战斗。特梅西的讲话获得了党的创建者们的赞同，这些人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已经精疲力竭，并且根据各自的气质，显然分成了厌世派或者乐观派，惊人的和平派或者罕见的好斗派。可是当那个被葡萄酒搞得气势汹汹的教师肯尼迪继特梅西之后起立发言时，团结就告吹了。

“匈牙利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奴隶和乞丐，”肯尼迪演说道，“如果想自由地呼吸并吃得好一点，就不得不移居到外国去。匈牙利人对奴役和贫穷已经受够啦。”

“凡是不愿为祖国忍受苦难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药剂师西波查高喊道。

肯尼迪称药剂师是捣蛋鬼；西波查回骂教师是斯洛伐克走

狗。到刚才为止，肯尼迪还都在谈论自由，眼下，他可开始讲到要狠揍犹太人了，要不是特梅西和加尔文教牧师把他拦住，他话音一落早就动起手来了。

伏洛辛牧师继肯尼迪之后讲话，对政府唱了一通赞歌，并在演说中加进了一些排犹主义名言。莱波维茨跟伏洛辛一样，也是政府党党员，听了这番排犹主义的鬼话，气得决定退出会场。他站起身就走，但我父亲这位热心的反对党党员，硬又把他推回到了安乐椅上。

“要是这位可尊敬的绅士讲的犹太人是指华达茨次长这样的人，那他也是对的嘛。”

这一句插话，可把镇长维拉吉给得罪啦，因为他正想通过华达茨次长的帮忙，为他那个学医的大学生儿子获得奖学金。

“排犹的无赖，”维拉吉对我父亲喝道。

“靠团结的力量！”当镇长谴责我父亲，说他跟囚犯格里戈里·米哈尔科情同手足时，塞波克大夫高喊起来了，“遗憾啊，我们就只会在吃吃喝喝上团结一致，”大夫继续说下去，“吃亏的是我们承担的事业！偏巧，我不得不走啦。我还得去看一个病人。”

不过特梅西的倡议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没有建立公民的联合组织，却成立了几个组织委员会。一个由药剂师西波查负责，着手成立政府党支部；第二个由特梅西牵头，准备建立一个温和的独立党；加尔文教牧师领导第三个委员会，为贾斯什派进行竞选。通过父亲的竭力帮助，这第三个委员会跟工人们略有一点儿联系。

三个委员会活动的结果，佩梅蒂的公民们在街上遇见时，彼此不打招呼了。

建党的人在柯勃尔别墅集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围聚在一个牧羊人的火堆旁。跟那些建党的人不同的是，我们既没有吃喝，也没有吵架。

格里戈里·米哈尔科整个晚上都绷着脸。他蹲了两个月牢，已大大地变了样。通常，佩梅蒂的伐木工人在牢里歇上一段时期，吃的伙食比森林工人要好，干的苦工也不及砍木头辛苦，一般都反而会增加体重。格里戈里·米哈尔科坐牢，体重却减轻了，不过，这不是他最明显的变化。现在，他会一连坐上几个钟头，默默无言，一动不动，朝前面凝望着。这种阴郁的情绪，已紧紧缠了他几个月，只在这位杀熊者终于再也控制不住时，他才开始谈话。

"你知道，格查，"他回家五六个月后，有一次对我说，"相信我，我不怕受绞刑。不，老兄！事实是，不管你身体强壮也罢，你有道理也罢，你都会被弄得处于一种毫无办法的境地……我要是确实干了什么坏事，我担保，他们就是把我剁成肉泥，我也不吭一声；可是，为了他并没干过的事，为了一桩他认为是卑鄙的勾当而惩罚他——"

"唉，格里戈里，还能为了敌人是下流坯而伤心吗？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杀害了蕾蓓卡……"

"现在是不伤心了，"格里戈里说，"敌人总是敌人，那是对的。但我以前却总以为敌人也是人，跟别的人一样。"

"你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这是件好事。"

"是呀。"

米哈尔科紧抿着嘴巴，默默地盯着火堆。格里戈里无言的痛苦，使我们大家都郁郁不乐。多次经受过格里戈里受的那种

折磨的霍泽列茨，为了鼓起我们的精神，开始讲起笑话来了。可是，他的强作欢颜并没有对大家起什么作用。当霍泽列茨沉默下来时，我讲起了布达佩斯的大游行和五月的街垒战。我想，我的听众们准会为布达佩斯工人的勇敢而惊愕吧。结果，大出我的意外，佩梅蒂的工人们认为，那是很自然的嘛，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斗的工人，就不该怕死。我想开导开导他们——结果却给自己上了一课。

破晓时，我回到家里。那天上午，我起不来了。我在布达佩斯准备考试时，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精疲力竭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没有消失。我回到森林里来，虽然已经一个星期，但这种疲劳感却始终存在。我虚弱得只好留在床上了。母亲给我测了体温——摄氏三十七度二。

"不要紧。在床上躺一两天。"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可是疲劳感仍然没有消除。我的体温照样是摄氏三十七度二，夜间还浑身出汗。父亲请来了大夫。

塞波克大夫对我作了仔细诊察，他一边给我测体温，一边扯谈起来。

"你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是怎么看的？厚颜无耻，是吧？"

"我承认，大夫，我从没有想到欧洲会爆发战争。"

大夫笑了。

"第一，格查，巴尔干并不是欧洲，在地理上，它们属于欧洲，但就文化来说，巴尔干所有的人都是半野蛮人。第二，在巴尔干发生的并不是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酒菜馆里的吵架。四个小小的喜歌剧式的国家，对抗土耳其！土耳其会把它们当早餐吃掉的！我可以打保票，她会一口吞掉它们。好，让我们看看温

度！三十七度二！唔！”

塞波克大夫诊断我害的是肺尖粘膜炎。遵照他的嘱咐，我躺在一张临时用松枝拼凑起来的躺椅上，在院子里一棵大栎树下躺了几天。

“在新鲜空气中，他会恢复的，”大夫说，“用不着别的药。过四个星期，他就能起来。”

事实证明，塞波克大夫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大夫，都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就他的政见来说吧，土耳其并没能把它的敌人当早餐吃掉。恰恰相反！那四个“喜歌剧式的国家”的军队完全不顾匈牙利报纸所持的类似塞波克那样的见解，竟节节胜利地向前推进了。匈牙利的同情对土耳其毫无意义，就象新鲜空气对我毫无作用一样。待到战争已经蔓延到查塔尔杰，逼近君士坦丁堡时，一天早上，我开始咯血了。

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请来的大夫，劝我上南方，到意大利或者埃及去。当然，这根本不可能，因为那得花钱。可我也不能上布达佩斯去读书了；于是，我就在佩梅蒂留了下来。

我在佩梅蒂经受了那些会使哑巴开口、盲人重见天日的大事变。说来也许荒唐，我还常常感激我生了这场病，感谢塞波克大夫没有把我治好哩。要是他把我治愈了，那么，我作为一个来自下喀尔巴阡山的受过教育的青年，在面临的两个抉择中，可能就不得不择一而从了：获得一张毕业文凭后，回到下喀尔巴阡山，拿我的知识去对人民进行讹诈、压迫、掠夺；或者，迁居别处，忘却我的故乡，要不，在我回忆起它的时候，就在快活的社交场合中讲讲下喀尔巴阡山人“天真可笑”的趣闻轶事。多亏生了这场病，我才跟下喀尔巴阡山人在一起，和他们一同经历了困难重重的时日。事实上呢，我已变成一个“卖国贼”，至少，贝雷萨斯

的中学校长是这样称呼我的，他在学校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宣读花名册时，大声读出那些已经当了将军、国会议员和银行行长，因而给母校增添光彩的学生的名字，他骄傲地宣布，在贝雷萨斯的中学生中，只有一个人背叛了这所学校高尚的教导：这人不是别人，是一个名叫格查·巴林特的人。那位校长点出他的名字，当众进行了侮辱。

我经常在书本上看到，说人在弥留之际，会在一瞬间重温他的一生往事。我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肯定，我是快要死了；可我对已经过去的事并无兴趣，我所关心的倒是我再也看不见了的未来。

未来……政治舞台上已发生了一种根本改变。匈牙利人民要求权利、土地、面包，已闹得沸沸扬扬。政府控制的报纸已发出了惊呼："俄国及其巴尔干走狗们一心想进攻匈牙利！"唯有未来，才能揭示出到底是哪一种战争首先爆发：是匈牙利人民反对匈牙利与德国统治者的战争呢，还是匈牙利的统治者反对俄国人的战争！

显然，俄国是当时人们大谈特谈的话题。来自俄国的消息，我们下喀尔巴阡山人所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艾莱克·杜迪克斯的消息。但报纸对这位先知的报道，多半是些无聊的蠢事。有关他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口头传来的。

有时，这些谣传是不足置信的，往后我们就会知道。比如，有谣传说，沙皇尼古拉已将他的小女儿许配给杜迪克斯，并送了半个王国给这位先知。有的喜讯说，沙皇已给了杜迪克斯一百万福林，让他帮助罗斯人，这话的真实程度，与前者相比，也是半斤对八两。若要把事后被证明为虚构杜撰的消息一一列举出

来，那未免太费事了。这里，我只说一下那些大体上是真实的报道。

在基辅，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杜迪克斯，成了有钱有势的波勃林斯基伯爵的被保护人，伯爵慷慨供养了这位流亡者。可杜迪克斯所关心的却不是他个人，而是下喀尔巴阡山的罗斯人的痛苦。他天天跟波勃林斯基伯爵讲述他们的忧虑和苦难，为他们请求帮助。而波勃林斯基可是一个怪人，你不求他，他也随时愿意帮助罗斯人。生活在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农民，如果胆敢发牢骚，他就会把他们交给宪兵，但是，对于生活在弗朗西斯·约瑟夫治下的乌克兰人，波勃林斯基却老是怂恿他们发牢骚和提要求。

杜迪克斯遵照波勃林斯基的嘱咐，写了几篇记述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痛苦的文章，在基辅的报纸上登了出来。他还以同样的题目，作了几次演讲，这些演讲在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位罗斯先知，通过波勃林斯基伯爵的介绍，在圣彼得堡受到了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公爵的接见。公爵送了杜迪克斯一张他的签名照片。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几家有插图的杂志，都刊登了杜迪克斯当时的画像。

这位先知在基辅跟波勃林斯基伯爵一起待了六个月。杜迪克斯发现，波勃林斯基伯爵原来是一个局长，他那个局是专门负责支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特别是罗斯人——对奥地利和匈牙利进行斗争的。杜迪克斯熟悉了波勃林斯基伯爵的方法后，帮助他改善了这些方法，并且制订出了新的方法。杜迪克斯在六个月内，完成了波勃林斯基伯爵白白搞了几年也没搞成的工作：在基辅和下喀尔巴阡山村民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得到波勃林斯基和一位上年纪的公爵夫人撑腰的杜迪克

斯，工作了六个月后，被伯爵派到巴黎去了。他是到法国首都去发表反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政策的演讲的。杜迪克斯带着大量的嘱咐、金钱和介绍信，首途华沙和柏林，向巴黎出发。他离开了华沙，但他没有到达巴黎。

他没有乘他要乘的那班火车来。他也没有乘下一班火车来。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到来！嗡嗡嗡嗡的电报，从巴黎打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打到基辅，从基辅打到巴黎，怎么也找不到杜迪克斯。是有过这个“先知”，但现在没有了。俄国的、接着是法国的秘密警察都忙开了。最后，在俄国驻柏林大使的要求下，德国警察也一起来寻找杜迪克斯了。德国警察确定杜迪克斯到达了柏林，当火车在弗莱德里奇斯特拉西站调换车头时，杜迪克斯曾上车站餐馆喝了两杯巴伐利亚啤酒，还给了一个侍者二十芬尼[①]小帐。但到此德国警察就断了线索。

当寻找杜迪克斯的一切希望都落空时，俄国报纸就先是隐讳地、接着公开地指责奥匈特务机关绑架了杜迪克斯，而且，很可能已杀害了他。几家法国报纸也加入了俄国报纸掀起的这场喧嚣，致使驻圣彼得堡的奥匈大使去拜会了俄国外交部，并以信誉保证：他所代表的大强国当局，既未对杜迪克斯施加暴力，也未有过任何敌意行动。根据这位大使的要求，他的声明在几家俄国报纸上刊登了出来。杜迪克斯事件至此才暂告结束。

读者可能已经猜到，我并没有死去。病了一年半，我康复了。我之能够痊愈，毕竟得归功于自然，归功于格里戈里·米哈尔科的熊腿和熊脂，或者归功于塞波克的医术，这些我就不准备

---

① 芬尼，德国辅币，百分之一马克。

说了。很可能是这三种医药团结在一起，把我治好的吧。

正因为康复了，所以我才能够在这里，把往往容易被官方历史学家忽略的一些事件讲述一遍。这样，在贝雷萨斯中学五十周年庆祝会上，他们就可以给我安上卑怯的叛徒的称号，而不必仅仅称我为叛徒了。

咸 鲱 鱼

佩梅蒂长驻有八名宪兵。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为了加强这支小部队，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又给佩梅蒂派来了二十四名宪兵。这些不速之客的来到，显然引起了颇大的骚动。要这么多人来维持治安，谁都不无忧虑呀。桑费尔德老头尤其着慌。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这一下可怜的犹太人要倒霉啦！”

“你是个傻瓜，依沙克，”杀熊的铁匠安慰唉声叹气的猪倌，“你忘了，在下喀尔巴阡山并没有犹太人，只有信奉摩西的匈牙利人。”

“如果犹太人都被看作是匈牙利人，那匈牙利人要倒霉啦，”佩梅蒂的猪倌坚持道。

“你这样看问题，是跟猪学的吧，依沙克。”

“如果我看问题是向猪学的，格里戈里，那倒没有关系。问题是那些猪正在向上流社会传授政治权术。”

格里戈里坚持认为，派宪兵到佩梅蒂来，那是因为他们已发现福蒂曾来过这里设法恢复工会。

“你最好把工会的报纸收藏起来，亚伯拉罕。”杀熊者告诫独眼龙霍泽列茨说。

“你觉醒得太晚啦，格里戈里，”独眼龙咧着嘴说，“宪兵想染指的那些报纸，早已不在佩梅蒂了。他们在我那儿只会找到几

张欠债的帐单。要是他们能替我还债——那倒不错，我脾气挺随和，我不在乎的。”

九月十六日后半夜，宪兵在佩梅蒂逮捕了四个罗斯人。格里戈里·米哈尔科是四个人之一。

第二天，从破晓到黄昏，持刺刀的宪兵一直在街上巡逻。人们为了避开宪兵，都躲到森林里去了。

你若是感到不知如何才好，就去听听森林的意见吧；你若是碰到了麻烦，就向森林去求助吧。森林是热情的、聪明的和有力量的。佩梅蒂的村民一旦来到森林里，就不再害怕宪兵的刺刀了。因为在森林里没有阳光，刺刀不会闪闪发光。

“如果宪兵跟踪追来的话，我们就在这里收拾他们，”梅盖列叹息着说。

“宪兵们跟你一样明白这一点，”霍泽列茨说。

森林里的人，派了一个由梅盖列和霍泽列茨率领的代表团去见镇长。镇长让他们在宪兵守卫着的屋门口等了几个钟头。中午时，他传出话来，说他没有空。

代表团回森林里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梅盖列提出，工人们应该举行罢工。霍泽列茨修正这个建议，说罢工应该好好地组织一下，叫工人们停止一切工作。

当代表团站在镇长家门口的时候，有个名叫西波斯的工厂工人，正好有事去找过镇长的厨师，他把米哈尔科被捕的原因，告诉了森林里的这一伙人。

“那个杀熊者收了俄国的钱。他们说，是沙皇给的。他拿那笔钱买了枪——一车子枪。他打算把这些枪分给罗斯人，准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杀掉佩梅蒂所有的匈牙利人。然后，他们就逃往俄国去。”

罗斯人赌咒发誓，这一番话没一丁点儿是真的，镇长的厨师决不可能说真话，即使偶尔说一次也罢；而那个西波斯，他本人向来就是个说谎者。但西波斯却诅天咒地，说他讲的是千真万确的实话。他甚至知道，那些枪放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火车站。

相信这话的，并非仅仅西波斯一人。特梅西经理的看门人，也到森林里来了，他提供的情况比西波斯的还多。他断言，米哈尔科打算拿这批用俄国钱买来的枪，杀掉佩梅蒂所有的罗斯人和犹太人。

梅盖列回到森林里，听到这片鼓噪，便抓起一把斧子，向西波斯奔了过去。幸好，他们及时制止了他。梅盖列厉声威胁，霍泽列茨甘言哄骗，但村子里的人却一只耳朵听霍泽列茨的，一只耳朵听西波斯和特梅西经理的看门人的。

"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宪兵保护你们，并不是跟你们作对，会挺高兴哩，"西波斯委屈地说，"要是你们不想叫他们保护，那我就回去啦。"

西波斯和经理的看门人回村子里去了。森林里的人商量了一整天，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第二天早晨，镇长自己派人来找工人们了。口信是由那个传布公告的人带来的，他念了写在一张纸条上的十五个匈牙利工人的名字。

"你们十五个人，马上都到可敬的镇长办公室去。"

"镇长要拿我们搞什么鬼名堂啊？"

"准没有好事。"

"不要紧的，弟兄们，"梅盖列说，"镇长如果想给念到名字的人找麻烦，他不会漏掉我的。"

"这倒是啊。他没有点梅盖列。到头来兴许他是一番好意

吧。”

“他肯定是怀着好意，”霍泽列茨反驳道，“问题是，对谁好？”

维拉吉镇长非常友好地迎接了十五个森林工人。他差一点儿要跟他们握手，不过突然及时停住了。

“哎，匈牙利人，”镇长训话了，“你们应该自己感到羞耻啊。最卑鄙的敌人，斯拉夫强盗，已经来到了家门口，你们却还在呼呼睡大觉。他们一心想推翻匈牙利人千年的统治，而你们却不肯为保卫你们的国家出一点力。”

赤脚的伐木工人们，因为没有衬衣，都用破破烂烂的大衣裹着赤裸的胸脯，他们毕恭毕敬地听镇长讲完了话。当镇长停下来，期待他们用好战的语言和行动来回答时，他们还是照样倾听着。

维拉吉镇长又继续讲下去，直讲得他脸上滚落了汗珠。他愤怒地喊出“屠杀”这两个字时，脸色发紫，脖子粗胀，口吐泡沫。可这些被胁迫来的匈牙利人还是呆呆地站着，一言不发。最后，镇长失去了耐性。

“滚！”他大喝一声，“我会收拾你们的！”

第二天，他把犹太人唤到了他的家里。

“罗斯人是犹太人的死敌，”他说。

“谁不是可怜的犹太人的敌人呢？”独眼龙霍泽列茨问道，他蓄着一把大主教般的胡子，穿的衣服象乞丐一样。

“你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牛奶呢，还是血，你们这些犹太人？”镇长哼着鼻子说，“罗斯人正在图谋杀害你们，你们还吊儿郎当地站着？”

“谁跟你说，先生，我们会袖手旁观呢？”独眼龙霍泽列茨问道，“要是我们忧心忡忡，那又会怎么样呢？”

"每当可怜的犹太人动了气，就有人想要他的命，"亚伯拉罕·桑费尔德插嘴道，"那时可怜的犹太人和一条疯狗相比，所不同的就只是狗有四只脚，而可怜的犹太人却只有两只脚。"

"滚！"镇长尖声喊叫了。

没有发生屠杀罗斯人的事。

· ·

正当镇长在煽动犹太工人去屠杀罗斯人时，我们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中午时，风尘仆仆、累得趔趔趄趄的马鲁莎奶妈，来到了我们家里。

她跟父亲和母亲默默地握了手。父亲立刻向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问她贝雷萨斯的事情，我们的朋友们怎样啦，米科拉怎样啦，恨不得把一切事情和一切人都弄个清楚，但马鲁莎却一句也没回答。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的躺椅边，用她起茧的手拍拍我病得很瘦弱的胳膊。

"你从哪里来，马鲁莎奶妈？"

"从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来的。"

"你乘的哪一班火车？"

"我走来的。"

"你走来的，你没有乘火车的钱？"

"米科拉也是走来的，他给反绑着双手，夹在两个宪兵中间，从贝雷萨斯走到马拉马罗斯西格特，"马鲁莎奶妈低声说。

"他们逮捕了米科拉？"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躺下，格查，躺下！叫你躺下就躺下嘛。你不能动。"

马鲁莎硬是用力强迫我躺在松枝躺椅上，小心地监视着不让我动一动。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眼泪从她腮帮上流下来，在她瘦骨嶙峋的脸上那一层厚厚的灰尘中留下两道条纹。

第二天早晨，父亲给无盖双轮马车套上马，就驱车上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去为米科拉请律师了。父亲聘请的律师认为，对米科拉不见得真的会有什么伤害。他对我父亲解释说，二十一岁以下的罪犯都提交少年法庭，法庭会根据法律的条文和精神从轻判决。他答应第二天就去看米科拉，待跟他谈过话后，再写信告诉我父亲。

两天后，信寄来了。律师没能跟米科拉谈一谈。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囚犯的权利，然而一涉及到罗斯囚犯，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法庭可就不管你法律不法律了。米科拉也罢，别的囚犯也罢，都不准跟律师商量。

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律师们打了份电报，向列波特·华达茨次长控诉，得到的回电是：

凡匈牙利人都应懂得国家利益高于法律条文。

九月里，下喀尔巴阡山给抓走了五十九个罗斯人。这五十九个囚犯全给押送到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警察夜以继日地对他们审讯。但是，如果说匈牙利警察知道如何对囚犯进行逼供的话，那么被捕的罗斯人也知道如何三缄其口。他们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从他们的木头小房子里搜出来的那些基辅印刷的乌克兰语的普拉伏斯拉夫《圣经》，都被当作他们的罪证。可是，拿出这些《圣经》给囚犯看，对警察却并无用处；他们否认跟基辅有任何联系；尤有甚者，他们大多数人还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国家。

匈牙利皇家警察是用拳头、皮鞭和木棍拷问囚犯的。不过，倘若试用了这些手段都不奏效，警察还另有急应的办法。比如，咸鲱鱼！

马拉马罗斯西格特警察局长下令对三个囚犯——索莱瓦的蒂姆柯、维列克的诺维克和佩梅蒂的格里戈里·米哈尔科——在二十四小时内剥夺一切饮食。在禁食二十四小时后，他们得到了食物——咸鲱鱼和洋葱。这一回，警察不加限制，三个囚犯愿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他们能吃得下去。这三个饿坏了的人，没有提出异议。他们狼吞虎咽了一个钟头，吃了大约八磅咸鲱鱼和四磅洋葱。当他们吃得再也吃不下时，警察就锁上了他们的牢房，牢里一滴水也不留。

当然，三个囚犯这样饱餐一顿后，再也不想别的东西，只想喝水了。下喀尔巴阡山的罗斯人，什么都抗得住，严寒也罢，酷暑也罢，都不在话下，可是对这样折磨他们的口渴，三个囚犯可受不了。他们渴得太厉害了！一上来，这几个罗斯人感到有针在扎他们的喉咙、嘴唇和舌头。接着，好象一把刀子在绞他们的肠子，他们的肚子在燃烧，眼前蹦跃着火焰。他们拳打脚踢地撞牢门，喊着“开门！开门！水！”

他们擂得拳头渗血，喊得嗓子发哑，但谁也不来。三十分钟后，蒂姆柯哭了，诺维克呕吐了，米哈尔科用拳头咚咚敲着胸部。折磨了一个钟头后，诺维克突然扑向蒂姆柯，朝着他的脸上就咬。米哈尔科把诺维克搡到了墙上，可蒂姆柯又向诺维克扑上去了。米哈尔科抓住诺维克和蒂姆柯的喉咙，好容易才把他们生生拖开。

“猪猡，坏种，卑鄙的吸血鬼！”

米哈尔科嘴里骂着他的两个狱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杀熊者一放开蒂姆柯和诺维克，他俩就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起来。他们已精疲力竭，只会呜呜咽咽地哭泣。

他们吃过这顿丰盛的晚餐后两个小时，警察局长命令把这

三个罗斯人带到他那里去。

“我的上帝！你们怎么啦，朋友！你们不至于打架了吧？”

警察局长凯梅尼斯的办公室，与其说是一个房间，不如说是个大厅。在这个大厅里，警察们东一伙西一伙地站着，警官们坐在局长的两侧。

局长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他面前放着一大坛子水，两瓶五升装的葡萄酒。

“水，”蒂姆柯喘着气说，他的喉管里响着咯咯的呼吸声。

“忍耐点，”凯梅尼斯答道，他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忍耐点，”他重复了一句，摘下他的金边夹鼻眼镜，细心地擦着镜片。“忍耐点，”当他把夹鼻眼镜重新按到那个很大的鹰钩鼻上去时，又第三遍说了这句话。

他透过亮晶晶的镜片，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这三个站在面前的、受尽折磨的人。蒂姆柯在哭泣，诺维克双手捂着脸。米哈尔科站在他的两个伙伴中间，痛苦地弯着身子。他的长长的深褐色头发垂在眼睛上。

“水！”

诺维克一下子朝那张办公桌冲了过去。三个警察把他拖回到了行列里。

“如果我对你们的了解是正确的，”警察局长拿腔拿调地说，“你们是想喝点儿什么吧。好，可以喝。你们要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水也行，葡萄酒也行，如果你们愿意，甚至还可以混起来——拿水冲葡萄酒。你们知道，我是关心你们的福利的。可罗斯人的神话故事是怎么说的，那个伐木工人是怎样对仙女说的？那个故事不也是这样说的吗？我会对你们好的，但首先你们要对我好啊！简单地说吧，我要求你们给我一桩情报，只要你

们回答了，我不反对你们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换言之，如果你们什么也喝不到，如果你们两天没有东西喝，那可全怪你们自己啦。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想从你们这里了解很多事情，只想了解几个人名和地址罢了。”

“水！”蒂姆柯喊道。

“只要你们招供了，就随你们要！”

“我说，”蒂姆柯尖声喊道。

“让我说！让我说！”诺维克用刺耳的声音喊道。

米哈尔科慢慢抬起身子，活象一头熊用后脚站立了起来。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狂怒的、野兽般的噗噗声。他攥紧右拳，兜着诺维克的脑袋就是一拳，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他对蒂姆柯踢了一脚，踢得他伸手摊脚地向一个警察扑了过去，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了。

十个人向米哈尔科扑了上来，但是杀熊的铁匠好象一头野熊闪开猎犬似的避过了他们。他们用枪托打倒了他。待他口鼻流血、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时，他们给他上了手铐，把他拖进了单人牢房，他在那个牢房里，两天两夜没有吃饭喝水。

米哈尔科被拖走后，警医就忙着用醋水和阿摩尼亚把诺维克和蒂姆柯弄醒。在警医的要求下，给他们俩喝了水。他们喝了以后，警察局长给了他们雪茄烟，警察把他们按进了扶手椅。“现在，快说！”

诺维克灌下了足足二升水，开始招供了。他说，他没有什么可供认的。他是在监牢里才第一次听说罗斯人正在组织起来。也是在监牢里，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审问他的那位警官的手中看到这本俄国《圣经》，这本书他即使要看也看不懂啊。他根本就不认识俄文；他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学会了一点儿罗斯话，可实

际上他并不是那里的人；他在下喀尔巴阡山才住了五个年头；他不是罗斯人，而是斯洛伐克人，甚至还不全然是斯洛伐克人，因为他母亲是罗马尼亚人，是在匈牙利南部的巴纳特出生，后来才到斯洛伐克地区去的。

诺维克这样一招供，叫警察局长亲自狠狠掴了一个耳光。

蒂姆柯用酒——不是用水——止了渴，接着就招供了。由他口述载入记录的，共有一百多个俄国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过后不久，警察就发现了，蒂姆柯提供的这些姓名地址全是瞎编的，要是蒂姆柯当时仍在他们的管辖之下，他这样开玩笑，他们肯定会把他活活打死。可是，在那场咸鲱鱼酷刑后一个星期，这几个囚犯已由警察转给检察官了。咸鲱鱼酷刑的消息已经泄漏出去，引起了公愤。很可能是由于警察曾经吹嘘他们开过这么一个卓越的玩笑。布达佩斯申斥了这位警察局长，并且提出了警告：匈牙利是一个文明国家，而在一个文明国家，折磨囚犯的事可不能泄漏出去。

匈牙利的报纸——包括反对党的报纸——对于这顿鲱鱼晚餐都保持沉默。

大　审　判

少年法庭在大审判之前对米科拉的审判，就好象大战前在巴尔干的"酒菜馆吵架"一样。大审判的刑事法庭被告席上，共有五十四个罗斯人。米科拉受审时，法庭审问的是三个罗斯小伙子。大审判时，提出了七本破破烂烂的《圣经》作为叛国的物证。审判三个罗斯少年时，一本诗集——一个反叛的农奴的不朽的诗歌，成了控告的证据。

米科拉十九岁，他读书读到十四岁，接着当了两年小马夫，做了三年小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高个儿，阔肩膀，面容瘦削。当他来到少年法庭上时，又平静，又勇敢。几年后，米科拉被控犯了死罪，他也以同样的镇静面对军事法庭，并且以同样的勇敢精神，领导了纳梅尼之战。

在整个审判中，米科拉不仅说话比检察官温和，而且也更富有智慧和逻辑。当检察官控告他"陪着雇农和懒鬼泰马斯·艾舍一起在乡村巡游，艾舍用匈牙利话煽动人民，他朗诵罗斯诗歌"时，米科拉对他说：

"泰马斯·艾舍不是出卖他的国家；他是在为他的人民赢得一个祖国。他带我走上那条艰苦的道路，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艾舍不仅一心要为匈牙利人，而且要为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赢来一个祖国。"

检察官怀着怜悯之心，指指那叛国的证据，一本从米科拉那

里抄来的、放在法官面前桌子上的书——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写的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名叫《八弦琴歌手》的诗集，并且宣称谢甫琴科是“沙皇最高新闻检查官”，这时，米科拉才在审判过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高了讲话的声音。

“谢甫琴科是沙皇的敌人，在这个方面，比这位起诉的律师他可差远了。因为谢甫琴科是一切暴政的敌人，并非仅仅是沙皇的敌人。”

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番话，少年法庭才以叛国罪给米科拉判了三年半徒刑，而给他的两个同伙犯各判了一年。

米科拉判决后，报纸就用头版报道大审判的准备工作了。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报纸对俄国冒出了火药味。接着，德国报纸发出了排炮，部分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报纸也如法炮制。

当德皇和奥匈王储正在商谈他们蓄谋已久的战争究竟是在一九一四年夏发动为宜，还是在一九一五年春发动为宜的时候，中欧的报纸大叫大嚷开了：

“俄罗斯帝国是欧洲的肇事者。”

“俄罗斯帝国雇用职业暗杀者。”

“俄罗斯帝国正准备进攻和平的奥匈帝国。”

大审判开始于一九一四年春天。准备工作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的，但准备得并不细致。在挑选囚犯上，就说明了这是一场拙劣的审判；这些囚犯大都啥也没有招供。那些知道点儿什么的，又无法诱导他们开口；那些想说的，又不容易叫他们保持沉默。格里戈里·米哈尔科说话了。

“你认识这本有沙皇像的《圣经》吗？”审判长问道。

“《圣经》！沙皇像！这全是废话！”米哈尔科说，“问题不在这里！阁下，倒不如问问罗斯人是怎样生活的吧。那是值得一

谈的。”

“回答问题！”

“罗斯人，”米哈尔科继续说道，“每个罗斯农民和伐木工人，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的工钱却只有人家的一半。他在挨饿啊！如果他想过好一点的生活，就不得不上美国去。事情这样下去，对谁有利？谁是杀害罗斯人的凶手？请你说说吧，阁下！”

审判长拼命摇铃，打断了米哈尔科十次，但米哈尔科可不让他给压下去。他那公牛吼叫般的声音湮没了铃声。

“如果你坚持用这种态度说话，我将警告你违反规则，判你犯侮辱法庭罪。回答问题！”

“我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米哈尔科说，“罗斯人，跟匈牙利工人一样，都应该怪他们自己。罗斯人是自作自受，因为他们忍受苦难，没有着手去改变这种苦难。唔，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拳头？是叫我们把拳头插在口袋里吗？”米哈尔科用扎耳的声音问道，“不，我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的拳头会拿来干什么……”

审判长命令把米哈尔科押出审判室。米哈尔科的这一场发作是激动人心的，但并不是审判中主要的轰动性事件。

波勃林斯基伯爵要求在审讯中作证的消息，把米哈尔科从大家的心头给抹掉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报刊上的反俄宣传正甚嚣尘上时，俄国驻维也纳大使要求奥匈帝国外交部给波勃林斯基伯爵发一张护照。波勃林斯基得到这张护照后，立刻来到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并作为证人在那里向审判长报了到。

被告席上，坐着五十四个穷苦的罗斯人。每个囚犯左右两边，都站着一个持枪的看守，枪上装了刺刀。在围着栏杆的记者

席上，坐着中欧各大报的记者。法庭上的官员们都穿着庄严的黑衣服。在他们对面的见证人席上，坐着一个绅士，他穿了一套不甚讲究的浅灰色服装，脚着一双棕黄色运动靴，一个钮扣上插了几支紫罗兰。这位穿灰衣服的绅士身上隐约地散发出来的香气，跟审判室里的汗酸味掺合在一起。

审判长对波勃林斯基伯爵说话时，态度恭敬，声音有点颤抖。

"我必须劝告见证人，要说实话，证言必须绝对真实，因为他很可能被叫出来宣誓作证。"

波勃林斯基点了下头，表示明白这一告诫。于是，他开始说话了，象个士兵一样，说得很简洁明了。

他认为，对这些罗斯农民提出指控，从头到尾纯属捏造。他说，在俄国，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引诱奥匈帝国的忠实臣民去犯叛国罪。这些被告，决不可能跟起诉当中所引证的俄国宣传局有任何联系，不存在这样一个宣传局，从来就没有这个局。

"也许，用不着我来说，我不是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宣传局的首脑了吧。"

波勃林斯基讲话时，几次用了"我以人格担保"这句话。被告的律师们建议请这位见证人宣誓。

"检察官有何意见？"审判长问检察官。

"在可敬的皇家法庭决定安排见证人宣誓之前，我建议把另一个见证人也叫来。"

"这个见证人叫什么名字？"

检察官站直身子，对审判室迅速扫了一眼，然后转向那个毫不在意、令人厌烦的波勃林斯基，直瞪瞪望住了他的面孔。

"我建议，"检察官伊莱斯提高嗓门说，"把皇家匈牙利警察

长艾莱克·杜迪克斯叫到见证人席上来。”

伊莱斯话音刚落，警察长杜迪克斯已出现在波勃林斯基身旁。这位从前的先知，已剪去了头发，剃掉了他那基督式的胡子。现在你看到的是以前用褐色胡子伪装起来的严峻的嘴巴和凶狠的下巴。这位以前的先知，穿着匈牙利警察简朴的藏青制服，显得仪表堂堂。

杜迪克斯出现时，有几个囚犯一下子跳了起来，震惊得不是喘气不止，就是发出了诅咒。太令人吃惊了，看守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审判长本人也惊愕得呆了几分钟。他一跃而起，瞠目结舌地直望着警察长杜迪克斯。检察官笑了——与其说是胜利的笑，不如说是歇斯底里的笑。那些首先领悟到这一幕的重要性的新闻记者，开始鼓起掌来。他们的掌声被囚犯们的喊叫声湮没了。

在审判室里，只有两个人保持着镇静——杜迪克斯和波勃林斯基。

当法官好不容易使审判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恢复了秩序时，他命令杜迪克斯站到见证人席上去。

杜迪克斯说话了。他告诉庭上，当他按照内政部的指示，在下喀尔巴阡山的乡村里周游时，他发觉那里有一股危险的、反政府的情绪，特别是在罗斯人中间。接着他讲了他的俄国之行，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他详详细细描述了波勃林斯基伯爵为首的那个宣传局，它的工作目的和方法。他一边查阅自己所记的笔记，一边揭露由基辅到下喀尔巴阡山的联络环节，指出了几个跟波勃林斯基有联系的人的名字。

杜迪克斯不是在讲话，而是发表了一通演讲。他说话从容、清晰，有严密的逻辑。他只是提出事实，直到讲到匈牙利国家，

呼吁忠于它的光荣的过去，忠于王朝、奥匈君主政体，忠于三国同盟的时候，才提高了声音。

“这位见证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杜迪克斯指证结束后，法官问波勃林斯基伯爵。

波勃林斯基回答时瞥了一眼杜迪克斯，而没有看法官。

“以后……走着瞧吧。”

波勃林斯基离开法庭，直接上火车站，经由齐诺维支回基辅去了。他到达基辅后，才给旅馆发了个电报，叫他们把他的行李寄往俄国驻布达佩斯领事馆。

审判长讯问了杜迪克斯之后，便宣布休庭。休息时，记者们站在走廊里抽烟，猜测着匈牙利警察干吗要露一手。警察干吗要摊牌？他们干吗要把雇用的一个先知，降格成为一个警察？大多数记者认为这是警察当局的一个大错。官方报纸的记者却对此持不同见解。

“警察干得很聪明，非常聪明，”他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他们是一拍子打死了四只苍蝇——而且是什么样的苍蝇啊！杜迪克斯在乡村里周游了一趟，给了那些社会主义者狠狠的打击，这是一。他离开俄国，到这里来阻击波勃林斯基，结结实实掮了俄罗斯帝国一个耳光，这是二。他弄清楚了波勃林斯基那个宣传局；这样，他们就把米哈尔科这样的人系上了锁链，他虽然跟波勃林斯基毫无联系，但是他们这些人比波勃林斯基还要危险。这是三。但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当罗斯人知道，他们宠爱的亲俄鼓动家，这个先知，原来是一个警探，他们就会象憎恨魔鬼一样，象害怕最残酷的宪兵班长一样，来憎恨和害怕那些罗斯大学生了。他们一见乌克兰罩衫，就会

拔脚逃跑！而我可敬的同行们却还在批评匈牙利警察哩！……”

法庭把五十四个被告都判了不同的刑期。米哈尔科判了十二年！在匈牙利，报纸实质上是一致赞同了这一判决。

不过警察既是无赖，也是笨蛋。就象歌德那些个做学徒的术士一样，他们能念咒召来妖精，却不能使妖精安定下来。①

五十四个罗斯人是给监禁起来了，但匈牙利的八十万罗斯人却知道，他们在东方有许多弟兄，数量超过匈牙利人，而且比德国人更有力量。

现在，罗斯人生起夜间的火堆时，都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生了。而且也只有罗斯人围聚在篝火旁这样谈话：

“那个大学生，那个在萨拉热窝枪杀王储的普林西勃，是个塞尔维亚人②。这下奥匈帝国可要严厉对付塞尔维亚人啦。”

“弟兄们，俄国人自会对这件事讲话的！俄国的声音传得很远……”

---

① 指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1749—1832）的剧本《浮士德》中的故事。

② 此事发生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后来即成了宣战的借口，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弗朗西斯·约瑟夫发出通知

几个星期后，我们听到了那件无可避免的事，那件我们多年来都以为不可能的事。在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这件事。后来，当我们知道这已不可避免时，我们又焦急地等待着它，几乎盼望它来到。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好象是由于害怕死亡而自杀的人。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王朝要求星期六下午六点以前答复。两天……

星期六是发薪日。特梅西经理发出指示：不象通常那样下午七时发工资，改为下午四时发工资。这一次，佩梅蒂的工人领到的工资没有一份扣了款的。

靠五点钟时，天暗下来了。在天空飘荡的蓝黑色雷雨云，低得擦着了白杨树。

当电光打闪时，一千多人聚集在镇长的房子前面。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

人群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了。

到六点了。接着，六点一刻，六点半，六点三刻。闪电击中了一棵白杨树，冒起了火焰。火被大雨扑灭了。

下午六点五十七分，维拉吉镇长走到他家的阳台上来了。他光着脑袋站在暴雨中。胸口佩着一条很宽的红白绿三色绶带。

“各位！匈牙利人！弟兄们！”镇长开始讲话了，接着静了下来。

“他唤我们弟兄们，准有麻烦啦，”桑费尔德老头悄声对梅盖列说。

“别吵！”梅盖列对他说。

“我接到马拉马罗斯西格特打来的一个电话，”镇长继续说道，“说奥匈帝国的大臣乌拉基米尔·吉斯尔男爵大人已经离开贝尔格莱德。”

“战争万岁！战争万岁！”

“……匈牙利人民对国王的传统的忠诚……匈牙利人热烈的爱国主义……匈牙利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镇长不顾雨点打进他张着的嘴巴，用演说的腔调喊叫着。

“战争万岁！”

风把雷雨云自南方吹去，星星在佩梅蒂的天空闪烁。

特梅西经理打开了三桶葡萄酒，加尔文教牧师开了两桶啤酒，希腊天主教牧师开了一桶白兰地。全村人都聚在学校运动场上喝起酒来。一只猪——莱波维茨送的——在铁叉上慢慢地焙烤。从四面八方送来的鸡、鸭、鹅，加了大量的辣椒粉，正在一口公用锅里冒着腾腾热气。他们是在为祖国而喝！葡萄酒、啤酒和白兰地不断地被喝掉——又不断地被掺在一起。桑费尔德老头倒了半杯啤酒，加上葡萄酒，又加了几滴白兰地。

“现在，”霍泽列茨说，“我至少懂得什么叫团结的力量了。”

全村都喝醉了。多年的仇人接吻拥抱了，老朋友们互相捅刀子了。有个人受了重伤，三个轻伤的逃跑了。

午夜过后不久，一队骑警来到了佩梅蒂，带来了动员令。

有一支歌，所有的匈牙利人打童年时起就会唱，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犹太人只消在死者的耳边悄悄提到他的名字，即使耶和华前来召唤，他也不会忘掉。对一个死去的匈牙利人，倒不必在他耳边悄悄地唱这支歌……

对这支歌，美学家准会给予真正的评价。它不大押韵，文体也粗糙，音调不登大雅之堂。美学家作这样的评论是正确的。但是，匈牙利人认为这支歌是神圣的，也是百倍正确的。因为这首《科苏特之歌》是在战斗中、在革命的火焰中诞生的；它表示一种他们对自由的爱，他们用鲜血去获取自由的坚强决心。

这支歌，是在匈牙利人以一当百，为争取自由而跟年轻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作战时诞生的。皇帝打赢了。他安排数以百计的争自由的匈牙利人在绞刑架上唱这首《科苏特之歌》，叫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在监狱里唱这首《科苏特之歌》。之后，过了六十六年，当年老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号召马扎尔人为"真正的信仰、王权和国家"而武装起来时，这首古老的歌又响彻了全国各地，只是歌词有了一处小小的改动：

弗朗西斯·约瑟夫发出通知①……

"现在我可知道狼是怎样变成羔羊的了，"父亲说，给《科苏特之歌》填上的新歌词，使他变成了战争的敌人。

星期一早晨，镇长率领下的宪兵们，把根据动员令为驻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那个师征募来的人，排成了四列纵队。大胡髭的匈牙利人，蓄胡子的犹太人和头发长长的罗斯人，肩并肩站在四列纵队里。

---

① 《科苏特之歌》的第一句是"拉约什·科苏特发出通知……"。

镇长发表了热烈的告别演说后，队伍开拔了，六个宪兵在前，六个宪兵殿后。在宪兵中间，行进着这些真正的信仰、王权和国家的保卫者。两旁站着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儿女。

匈牙利人突然唱起了歌："弗朗西斯·约瑟夫发出通知……"匈牙利人在唱，犹太人在哼，罗斯人没有作声，妇女们——匈牙利的、犹太的和罗斯的——都在哭。

饰着旗子的列车，以危险的高速度穿过了下喀尔巴阡山的隘口，向北方和东北方奔驰而去。公路上，一长队一长队的运货马车，向北方和东北方移动着。那些马都给戴上了鲜花，仿佛它们载的是新娘似的。

"弗朗西斯·约瑟夫发出通知……"

八月中旬，奥匈帝国的军队越过俄国边界，直逼卢布林。到八月底，战争的命运起了变化。九月五日，奥匈帝国统帅部得到报告："条件极为不利，然我仍坚守兰堡。"

读过这篇报道，父亲就急忙把我母亲和两个妹妹送到福洛普舅舅家里去了。他要我也走，但我没听他的话。父亲，马鲁莎奶妈和我留在佩梅蒂。我的病已痊愈，实际上已经复原。我从清早到夜晚，整天在森林里漫步，现在，男人们去服现役了，在那里代替他们砍树的，已都是些老头和妇女。村子里，除了工厂经理、村长和几个宪兵之外，已没有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兰堡陷落了。沙皇任命波勃林斯基为兰堡的地方长官。波勃林斯基发布了一道告罗斯人民书，号召他们为上帝、沙皇和国家拿起武器，反抗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波勃林斯基这份告人民书，如果到达罗斯人的手里，也许是会引起反应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爱沙皇，而是因为他们憎恨德国人和匈牙利

人。可是，波勃林斯基并没有努力散布这份告人民书。他只满足于彼得格勒会有人读到它，表示波勃林斯基并未玩忽职守睡大觉。不过，这份宣言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法庭根据这份告人民书，指控几百个罗斯农民犯了叛国罪，并把他们判处了死刑。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兰堡西面的格罗德克阻挡了俄军几天。一连七天七夜，格罗德克大炮轰鸣，机关枪劈劈啪啪扫射，受伤的士兵尖声呼爹唤娘。接着，“蒸汽碾路机”隆隆地向西面驶来。①

马拉马罗斯、昂格瓦和蒙卡契的团队，在格罗德克打了一仗。我们是在十月初听到这消息的，这天，邮递员给佩梅蒂送来了十九封盖了公章的信。十九封信的内容完全相同：

> 某师司令部谨沉痛通知你……你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为了上帝、国王和国家，为了抵御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并杀害妇孺儿童之野蛮敌人，已英勇献身。

四个名词——丈夫、儿子、父亲、兄弟——中的三个名词，给用红墨水打了叉。只留下了一个有关的词。不过，也并非一概如此。比如，十九岁的安娜·卡特科，丈夫在前线，她收到的一封信，说她儿子已经阵亡。依沙克·桑费尔德一直在为他的儿子玛格丽特提心吊胆，却被告知他的父亲已英勇牺牲。

这封报丧信的上端，印有一行外国文字：**为国家献身，心甘又光荣。**②镇长把这句话，对向他求助的人翻译成匈牙利语、罗斯语或者意第绪语时，结果却变成了：“收到此通知者，再无要求

① 意为俄军向西面的奥匈帝国挺进。“蒸汽碾路机”比喻“不可抗拒的力量”。

② 原文是拉丁文。

战争救济之权利。"

收件人可并不认真看待这一指示，总想弄几文战争救济款给服役者的家属。可是，分发战争救济款的镇长，坚持什么也不给英勇牺牲者的家小。战争既然给镇长增添了许多工作，他总要从中捞点油水，这也是人情之常嘛。

十月初，俄军越过了森林遍布的喀尔巴阡山，占领了马拉马罗斯西格特。

布达佩斯第一步兵团在佩梅蒂森林里守了八天。由于火车运转不灵，士兵们断了粮食。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了，他们就抢掠佩梅蒂村民的存粮。我在这些强行征粮的人中间，遇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以前中学的同学卡尔克西·波洛尼。

"嘿，格查，是谁对啦？"上等兵波洛尼问道，他容光焕发，"你还说欧洲不会爆发战争？"

"是你对了，卡尔克西。自然，你是志愿参军的吧？"

"那还用说。"

"你现在可快活啦？"

"快活？这叫我怎么说呢？坦白地说，当一个人热心于战争的时候，他不会去想，放枪射击的不光是我们——敌人也在放枪射击啊。"他停下来，好好思忖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以打赌，俄国人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匈牙利人寻衅这一天。有人说，莫斯科的姑娘长得挺美。以后我给你带点莫斯科的好玩的东西来吧。"

"谢谢你，卡尔克西。"

我的朋友波洛尼没有践约。过了六个星期，我在一份布达佩斯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死亡通告。

布达佩斯的士兵都是横征暴敛的能手。他们连一片面包也

没给佩梅蒂村民留下。不过，他们也知道如何打仗。他们据守森林，逐树战斗，仅在他们弹药耗尽时，才一步步退却。

俄国人开进了佩梅蒂。

匈牙利人在和平时期，把带有弗朗西斯·约瑟夫名号的兵，都看作是仇敌。现在，实际上人人都在军队里有了亲人，不是丈夫、儿子、父亲，就是兄弟……持枪的人已不意味着危险，因为他们都已处于危险中，是在外国兵的威胁下的人了。那些为儿子或父亲的生命祈祷的人，恨的是武装的外国人。他们也很怕他们，怀着面临一种不可知的危险的恐惧。

俄国人开进佩梅蒂时，匈牙利女人和犹太女人眼睛都哭红了。罗斯女人也并不感到高兴。

不过，俄国人的举止行动却比任何人想的都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俄国兵接到了命令，不准损害老百姓呢，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住在这陌生土地上令人生畏的山里的外国人，都懂得他们的语言，所以有意表示友好。无论如何，俄国人占领佩梅蒂的那五天里，并没有人受到干扰，这却是事实。只有桑费尔德老头一个人给打死了。为什么呢？匈牙利士兵把佩梅蒂的猪都吃光了。桑费尔德老头好不容易救出了一口唯一的小猪，他把它藏在床上。俄国人挨家挨户搜索隐藏的匈牙利士兵。当他们来到桑费尔德的木头小房子里时，藏在床上的小猪竟使劲地咕噜噜呼叫起来，自我暴露了。俄国兵发现一只藏着的猪，比发现一个隐藏的士兵还高兴，可是，当他们向猪走过去时，依沙克·桑费尔德操起一根棍子就向他们砸了过去。

巴伐利亚派兵来支援退却的奥匈帝国军队了。博瑟梅将军率领的巴伐利亚师，楔入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俄国前线，并占领

了这个城市。俄国人顽强地固守佩梅蒂。待到博瑟梅的军队占领森林时，佩梅蒂已夷为一片废墟。炮火连根拔起了巨大的栎树，倒下来的树枝，把大部分木头小房子都压毁了。那些没有倒坍的房子都是这样毁掉的。黄叶子、血污的纱布和衬棉，在秋风中打转。叫重炮弹轰击成的紧挨在一起的三个匀称的大洞，破坏了村上的主要广场。遗弃的弹药袋、水壶、军便帽和磨损的衣服，跟弹坑里几具士兵的尸体混在一起。没埋葬的尸体的恶臭，压倒了叶子的腐烂味。

俄国人在佩梅蒂北面掘壕据守，巴伐利亚军给挡住了。博瑟梅来到佩梅蒂亲自指挥进攻。陪他同来的有几个巴伐利亚高级军官，一个奥匈帝国军的军官，他是预备军的上尉，名叫艾莱克·杜迪克斯。

杜迪克斯看到佩梅蒂破坏殆尽，并不感到意外。叫他惊奇的是，这里的人口竟增加了。邻近的村庄已被夷为平地，那些村子里的人都涌到佩梅蒂来了。

根据杜迪克斯的意见，博瑟梅为确保获得居民的忠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他的措施之一，是在杜迪克斯断言伏洛辛是俄国的同情者之后，立即绞死了这位希腊天主教牧师。

巴伐利亚兵的这种劲头，不但吓坏了罗斯人，也吓坏了犹太人和匈牙利人。佩梅蒂村民对巴伐利亚兵怕得要死。他们甚至不敢去向他们报告，有几个害霍乱病的病人，正缺医无药地躺在即将坍塌的木头小房子里。他们怕博瑟梅会把病人和家属一起绞死。过了几天，巴伐利亚兵中也发生霍乱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这种好运气是谁造成的。

巴伐利亚兵开进佩梅蒂，就安置了行军厨房。村上的人——老年人、妇女和孩子们——在厨房前面排起了一条长蛇

队，叫那些士兵大吃了一惊。排在队伍里的人，个个手里都拿着一个器具，不是木盆子就是陶钵子。

“你们在等什么呀，娘儿们？”

“讨点吃的！”

“讨点吃的？到行军厨房里来讨？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啊？”

“敌人……那些俄国人……他们都给我们吃的。我们想，我们自己人也会……”

德国兵为难了。要是这可以由他们作主的话，他们也许不会吝惜给佩梅蒂村民一些食物。可事实上，他们却按照管厨房的班长的命令，把这伙人驱散了。有一两个老人，不知道他们无权在行军厨房附近徘徊，结果挨了枪托子的教训。

可是，当一个人饿着肚子，没有东西可吃时，总是不会尊重所有权的。有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正想从食器橱里偷一块面包，叫巴伐利亚兵抓住了。士兵们只会说德国话，那小伙子只懂得罗斯话。巴伐利亚兵把这孩子打了一顿，按军队的做法，把他吊在树上，让他的脚趾头刚好碰到地面。过了几个钟头，他们又抓住一个贴着肚子朝这个半死不活的孩子爬去的罗斯老农。老头手上的一把刀，暴露了他想割断孩子身上的绳索的意图。两个一直听说应当最严厉地对待罗斯人的巴伐利亚兵，把这老头打了一顿，还不感到满足；他们把两个囚犯，那孩子和老头，一起押到设在比较完整的柯勃尔别墅里的司令部里。那儿没有牢房，两个囚犯被放在有人看守的院子里。他们呆头呆脑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士兵去照顾更要紧的事情去了，若不是杜迪克斯正好这时来到那里的话，他们很可能就让这两个反抗者逃掉了。

杜迪克斯听到马拉马罗斯西格特前线传来的好消息，正兴

高采烈。他走上去跟两个囚犯讲话时，远比平常热诚。

“喂，喂！出了什么事啦，你们？你们干吗在这里荡来荡去？”

囚犯中年长的那个惊讶得睁圆了眼睛，瞪了杜迪克斯一眼。他没有回答。

“你是聋子吗，老朋友？你没有听见我在问你吗？”

老头没有回答，而是冲着杜迪克斯的脸啐了一口唾沫。

经审讯确定，那老头是依凡·米哈尔科，一个名叫格里戈里·米哈尔科的“亲俄惯犯”的父亲，那孩子是惯犯的小儿子依凡·米哈尔科。

进一步调查后，知道这两个米哈尔科，事实上还同全体村民一起，在俄军占领村庄期间，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当然，跟敌兵有过往来。

杜迪克斯想在佩梅蒂举行一次叛国大审判，但博瑟梅反对。

“这正是奥匈军队的懦弱所在，”那位巴伐利亚将军大声说，“奥地利人只是写呀讲呀，而不行动。要是我不想绞死什么人，我就用不着法庭。要是我要绞死什么人，我要的是刽子手和绞刑架，而不是法官和法庭纪录！”

不过，这位将军跟杜迪克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应该引起居民的恐怖，于是他下令逮捕了四十个罗斯人。他没有指名逮捕谁；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个人。德国兵以典型的德国效率，兜捕了四十个罗斯人——老头、孩子和一两个妇女。按照将军的命令，二十个被捕者给释放了，他们是什么人，那无关紧要。将军只是命令：“释放二十个罗斯人，绞死二十个罗斯人。”一个中士把捕来的人分成了两组，二十个一组。杜迪克斯只在涉及那两个米哈尔科时，才干预了一下中士的工作。

上午五点钟，四队兵士封锁了柯勃尔别墅前面的广场。围在警戒线内的，是二十个挑出来处死的受害者、一个中士衔的刽子手，两个下士衔的刽子手的助手。一个中尉负责执行死刑。

中尉戴上他的单眼镜，手里劈啪挥着黄皮鞭，下了命令："刽子手，执行勤务！"

两个下士反绑了米哈尔科的双手，中士在老人的脖子上校准了套索。正在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跳到中尉的面前，一个弯腰曲背的老犹太人，他提抗议，哭，喊，又是恳求，又是威胁。是我父亲！

中尉惊惶失措，呆呆地望着这个怪人。

"你这是干什么，偷偷越过了警戒线？中士！这人怎么到这里来啦？"

父亲扭绞着双手，用匈牙利话、意第绪话和罗斯话恳求着。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向中尉威胁地扬扬攥紧的拳头。

"下士！叫这个疯子见鬼去！给他吃点儿苦头。"

父亲自卫了，把抓他的那个下士的手咬了一口。血从他的齿印中流了出来。这个士兵朝我父亲脸上打了一拳。父亲一个踉跄，跪倒了。

他不再恳求和威胁，而是开始咒骂了。他张开双臂，带着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憎恨，用匈牙利话大骂这些杀人凶手。

中尉转过头来了。下士对这个咒骂的人兜胸一枪托，把他打得趴在地上，接着又对准他的脑袋打了起来。这时，米哈尔科老头正吊在半空中，两个刽子手的助手抓住了杀熊者的儿子。依凡对捉他的人又踢又抓又咬。

二十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处死了十七个。三个受害者，叫奥地利大炮救了命。这些大炮出于误会，开始轰击佩梅蒂了，榴霰

弹象下雨一般落在柯勃尔别墅前面的广场上。一块榴霰弹片撕裂了一个已被绞死的伐木工的肚子，另一块弹片划开了那个戴单眼镜的中尉的脸。

士兵都溜之大吉。刽子手和他的两个助手也已逃之夭夭。谁也不再管那三个还活着的受害者，其中的一个脖子已套上套索。他们愿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了。

马鲁莎和我把父亲抬回家里。密集的榴霰弹，在头顶迅疾飞过，但我们都没有受伤。

马鲁莎替父亲脱下衣服，把他放到床上，用海绵擦他的身体。父亲头上左耳朵边，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他嘴里、鼻子里和左耳里，流着一道涓细的血。他躺在那里，人事不省。

“他内出血了，”马鲁莎轻轻地说，一边在自己身上划十字。

我们不能去请医生，塞波克在马拉马罗斯西格特的军医院工作，去请德国军医吧，没用——他不会来的。

我整天整夜坐在父亲床边。当我注视着他时，他那晒得黑黝黝的脸，慢慢变得蜡黄，变得黄中带绿了。他两只眼睛下面的阴影加深了，加宽了。他的嘴唇铁青，搁在被子上的双手，显出一种蜡的光泽。

他虽已不再活着，但也没有死去。他仍在呼吸，盖在他胸口的被子，在缓缓地一起一伏。

破晓时，他睁开了眼睛。

“你很痛吧，爸爸？”

他想回答，但没有力气。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们目不转睛地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

父亲的眼睛象孩子的眼睛一般清晰。他的眼神中，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悲哀。他茫然凝视了好一会儿，眼睛闭上了，接着，

又睁开了，朝上望着我。他想跟我说些什么。

他又瞧瞧我，他的眼色很苦恼。我俯下身去，拿耳朵贴着他的嘴唇。这时，我听到他低声地说："……要顽强，坚定，勇敢……要做一个人……永远……要……"

他的低语消失了，喉咙里起了一阵咯咯声。

马鲁莎奶妈阖上了死者的眼睛。是她用一块手帕包扎了他的下巴。

马鲁莎奶妈用乌克兰话，向耶稣、马利亚和所有的圣徒作了祷告，请他们宽恕这位信奉摩西的热情的匈牙利爱国者的灵魂。

在我们头顶上，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大炮正在跟尼古拉沙皇的大炮交火。

第 三 部

格杰里·萨科维支的王国

回 到 家 乡

我前面讲过，一九一四年秋天，我在佩梅蒂时完全落在俄-德-奥的炮火射程内了。我父亲是那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那里去世的。葬礼过后，我收拾起父亲大部分遗物，包括两件替换衬衫和一只闹钟，放进我的背包，就徒步去马拉马罗斯西格特了。在那里，我向马鲁莎奶妈告别，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我到了布达佩斯，在福洛普舅舅那里待了一年半，或者不如说，是住在艾尔莎舅母那里，因为福洛普舅舅已到前线去当团队的后备军医，并且已被塞尔维亚部队俘虏了。艾尔莎舅母在军医院当志愿护士。母亲是医院雇用的拿工资的护士。我在大学里念书，一直念到一九一六年春天，才不得不回到下喀尔巴阡山去服兵役。由于我是在贝雷克州出生的，因此我被编在一个蒙卡契的步兵团里。这样，我不仅重访了我的故乡，而且还遇到许多童年时代的游戏伙伴，其中有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

米科拉为了藏有一本谢甫琴科的书而服刑两年后，被直接从监狱送到了兵役局。兵役委员会给他检查后，勾消了他未满的刑期，这才使他入了伍。

在训练期间，我和我的奶兄弟一块儿度过许多时间，但在派赴前线时就各奔东西了。米科拉分在一个开往俄罗斯前线的连队里，而我被送到了罗马尼亚前线。

在我们开赴前线之先，我们畅谈形势，推测德国的哪一个对

手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英国呢还是俄国。

那时，罗马尼亚军队已经深入特兰西瓦尼亚。我所在的那个营在奥尔特河流域第一次和他们干上了。上面的命令是要我们猛攻在周围筑有临时壕沟的罗马尼亚阵地。我们必须在罗马尼亚的炮火下冲过壕沟前面那一片阳光照耀下的旷野。在战争初期，每逢进攻之前，统帅部总要对士兵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现在他们却分发罗姆酒了。我们就喝酒。从那以后，我一闻到罗姆酒的气味，就仿佛听到了丧礼进行曲。

"为了祖国和国王！"一个年轻的中尉高喊道，"冲啊！"

"狗崽子，"几千个匈牙利步兵回答他。我们从壕沟里挤了出来。当我们猛烈地向敌人冲锋的时候，我的吼声消融在总的咒骂的激流中。我们并不是对罗马尼亚人发怒；我们是一般地对生活发怒，不过眼下是在对罗马尼亚人冲锋罢了。

罗马尼亚的机枪不停地格格响。不过他们的枪法蹩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子弹在我头上高高飞过。当我们到了旷野中间扑地卧倒时，没有一个人受伤。

"那些傻瓜会把我们头上的太阳也打下来呐，"躺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兵咕哝道，"至于我们，在暗中也能找到他们，这批该死的家伙！"

顺便说说，在一次袭击的几秒钟的间隙中，一个匈牙利老兵能够倒出这么一大堆亵渎神明的话来，是很令人惊讶的。

"冲啊！冲啊！"

我们离开罗马尼亚人的壕沟只有一百来米了，这时，突然出现了罗马尼亚一个团队，他们用刺刀向我们冲了过来。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但是罗马尼亚人的机枪扫射得太低了，从后面射中了自己人的脊背，因此向我们飞奔而来的步兵迅速地减少

了。罗马尼亚人的机枪格格地响着，罗马尼亚的伤员尖声叫着。奥地利的榴霰弹在我们头上飕飕飞过，发出刺耳的爆炸声，散播着呼啸的弹片。我们湮没在一片烟云尘雾之中。

后来好多年，我都一再在梦中重见这些时刻的情景。在我的梦中，每一个细节都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生动。

罗马尼亚军队和我们匈牙利军队一样摆开了广阔的阵势，敌我双方各有一千人，构成了一条长达一公里半的战线。因此，当双方相距还有三、四十公尺时，我们就能够看得见敌人——我们要对付的那个士兵。一个罗马尼亚兵向我跑来了：黑头发，瘦脸盘，比我十足高一个头，年纪也比我大许多，他大概是个雇农，牧人或者樵夫。他那双张得大大的栗色的眼直盯着我，他凝视着他的古老的敌人——我这个野蛮的、残忍好杀的匈牙利人，与其说觉得恐惧，还不如说是惊奇。他那双巨大的手中的武器在抖动，他的牙齿在打战，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向前十步，五步！罗马尼亚人喊着上帝保佑，我们咒骂他们！我的敌人的眼中流着眼泪；我的心已经跳到我的喉咙头了。

"冲啊！冲啊！"

那个罗马尼亚人举起枪，用枪托对准了我的头。我用刺刀向他一刀戳去，我把头转开了，以免看见他的脸。

那个罗马尼亚人的步枪枪托打在我的左肩上，沿着我的手臂滑下去了。这时，我觉得我的刺刀已插进肉里，接着就变得沉重起来，仿佛叫一副重担向下拖去似的。我想把刺刀拔出来，但是它粘住了，我只好丢掉了枪。那个罗马尼亚人向前倒下了，我觉得我听到死神在他喉咙里格格响。我闭着眼睛拔出刺刀。我浑身颤抖，开始呕吐了。

这时，我们营已经越过罗马尼亚的壕沟。我们缴获了八架机关枪，俘虏了四百一十个罗马尼亚人。

有二十六个人因勇敢而受到奖赏。我是其中之一。

我缺少勇气去拒绝执行讨厌的命令，他们却把这称为勇敢！

一九一八年一月，我们营驻扎在离利沃夫[1]不远的加里西亚的格罗台克附近。我们的兵员减少了，后来不断由那些不幸的可怜人来增补，他们一半是小伙子，一半是老头。

在我吃皇帝的面包的那十八个月中，军队中起了根本的变化。根据当时协约国发表的军事公报，奥匈帝国的军队损失的兵员已超过二百万人。而根据赫弗的报告[2]，说英勇阵亡的数字是五万人。很难确定哪一方说谎说得最厉害。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问题。决定性的变化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谁能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朝思暮想的是战争何时能够结束。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到，我们应该尽快结束它，以及如何才能尽快结束它。

有人出于烦闷，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就套用《上帝保佑皇帝》[3]的曲调唱了起来。诗歌是这样写的：战争开始时，白痴们免服兵役，而现在，只有白痴还在打仗！

格罗台克的森林中盖着一层厚厚的雪。闪闪的冰柱从光秃秃的树枝上挂下来。象一片乌云似的鸦群在我们头上盘旋，尖

---

① 即兰堡。

② 即由赫弗将军签发的奥匈军队的公报。

③ 原文是德文。"上帝保佑皇帝"是奥地利民族赞美诗的第一行，当时匈牙利人和奥匈帝国的其他民族听了十分厌恶。

叫，"呱，呱，呱！"

木头的营房是不暖和的，衣衫褴褛的步兵们围聚在战地厨房边取暖。卷心菜汤在锅子里滚着，汤里没有肉，没有油。不管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格罗台克森林是持续几天的三次血战的现场也罢，或者我们营房所在的那个小山头，是四万个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兵士的大坟墓也罢，这些都不如此时此刻的清汤加又黑又粗又硬的面包更能激起这些受尽折磨的人的革命情绪。

天空阴沉沉的，还不到黄昏时分，天色就渐渐暗下来了。营房里没有灯，雪地上也没有光，只是间或有一道可能是从军官营房的一个窗口射出来的光线落在雪地上。在黑暗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唱一支歌曲，这支歌是禁止的，唱的人有受到严厉惩罚的危险：

我的肚子空空，从来不饱，
当个小兵，我是何等苦恼，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要是在家里，那有多好！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要是在家里，那有多好！

我们的任务并不艰巨。我们驻扎在利沃夫附近是为了吓唬这个城市的工人。让我们住在市区之外，则是怕工人们瓦解部队的士气。每天早晨，一列货车把我们装运到利沃夫，我们在利沃夫街上游行，根据号令高唱战歌。通常我们在郊区行军，利沃夫的女工，总是以愤恨的目光望着我们。有时，她们会对我们威胁地挥挥瘦骨嶙嶙的拳头。我们在尽情地耀武扬威一通之后，就回到格罗台克去度过其余的时间，咒骂战争，推测战争何时结束，以及战争究竟是否会结束。因为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连这

种希望也不抱了。有几个士兵诅咒着牧师，已变成宗教狂。有的人成了酒鬼，他们无视加倍的警卫，到军官食堂的地下室去抢了三次，并到医院去汲取贮存着的酒精。也有些士兵，由于过于疲倦、饥饿、厌世和害怀乡病而变成了哲学家。班长斯伐克入伍以前是个牧师，他研究出了一种哲学体系，并广为宣传。

"动荡不安和受苦受难是人生的自然现象，而安宁与幸福的人生则是例外和不自然的。"他说。

"有件事必须干啦，"有一天早晨，米科拉对我说，他现在和我在一起服役了。

"什么事？"

"干俄国人已经干了的事。"

"只要知道他们是怎样干的那就好啦，"我回答。

米科拉在俄国前线被打穿了肺部，在蒙卡契的医院里住了七个月。他出院时，比少年时更加沉默寡言了。然而，如果你观察他，显然他的内心是沸腾的。每当我们绕着战地厨房一声不响地闲步时，米科拉常常在空中挥舞他的拳头，咬牙切齿，象一只狼被一群狗追得走投无路似的。

"有件事必须干啦，格查。你知道列宁是谁吗？"

"这件事我想过多次了，米科拉。列宁，列宁——"我把这个名字重复说了几遍。

米科拉咬着牙齿。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事情已经开始了。

利沃夫各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利沃夫市的警备司令官枪杀了九个罢工者，其中两个是妇女，子弹打穿了脑袋。铁路工人以罢工作为回答。当时，尽管有检查制度，我们还是知道了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人罢工的消息。

利沃夫的司令官看到工人们没有被死刑所吓倒，便准许他们在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据我们后来了解，司令官准许他们开会是遵照上级命令办的，指定开会地点是为了知道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以后就没有一个与会者能逃出他们的罗网。)

罢工委员会定于下午四时召开群众大会，不到两点钟，广场上就挤满了罢工工人和士兵们的老婆，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许多女人都带着孩子。大孩子安静地耐心等着。瘦得无法形容的那些默不作声的儿童，睁着无限哀怨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虚弱得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事有凑巧，一口婴孩的棺材和出殡的行列拐错了一个弯，走到通向广场的一条街上来了。送葬的行列——三个女人和一个独脚士兵，到发觉走错了路时，已经来不及回头。骑警队封锁了从广场出去的街道。死了孩子的母亲，一只手夹着小小的毛坯棺材，什么话都骂出来了。她把棺材放在地上，用拳头威胁警察。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女人。肮脏的灰白头发，从滑在一边的头巾下散了开来。她那示威的拳头象是一个男子汉的拳头。她用那双穿着军靴的脚，在地上跺啊跺的。她的伴侣，那个独脚士兵，竭力想使她安静下来，但白费劲。

“你们不让我们活，你们这些狗!”那位死去婴孩的母亲对着骑警队尖叫道，“我们死了，你们甚至连尸体也不让我们埋葬，可是你们等着吧，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这个女人用一种奇异的、野兽似的声音尖声喊叫，哭哭嚷嚷的，充满着一种威胁和警告的音调，听来怪刺耳。她的声音没有平息下来，但已和几百个妇女的悲伤而威胁的叫声混合在一起

了。几百个妇女对警察挥动着因工作而变硬的拳头。妇女们用乌克兰语、波兰语、犹太语、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发出的尖叫，汇合成一股令人惊恐的强音，音调越来越高涨，越来越壮大。

骑警队的马不安地用蹄踏着地面。只听得一声令下，骑警队员就拔出了马刀，逼近了滚滚而来的妇女大军。

我们这一连在对面靠广场的地方排成一条警戒线。当骑警队离我们不到二百呎的时候，莱斯蒂昂中尉发出了一道命令：

"上子弹！"

一百五十个士兵上子弹的时候，他们的来复枪卡嗒卡嗒地响起来，活象远处响起了一阵机枪的轧轧声。

这时，妇女们连我们也骂了，对我们威胁地挥动着拳头。忽然，有一个士兵的枪走火了。一个警察的马痛得一声嘶叫，用后腿站立起来，把警察摔下马来。

莱斯蒂昂用马刀的平面抽打他的士兵们，士兵们就对准警察们放了一排子弹，子弹越过了妇女们的头顶。警察的坐骑因受惊而狂跳起来，一下冲进了人群，把人们踩在脚下了。

前来参加群众大会的工人们，聚集在广场的末端，唱起了愤激的歌：

在我们头上是天际翻滚的狂风暴雨，
在我们身上是所有恶鬼最卑鄙无耻的咒诅，
我们最后战斗的阳光已经升起，
谁知道未来的日子带给我们的是甜是苦……①

火车都停了，因此我们只好走回格罗台克的兵营。我们前

① 此歌歌名为«瓦沙维安卡»。

面是一连骑警队，我们后面也是部队。我们到兵营已是深夜，我们被缴了械，成了俘虏！

第二天早晨，审讯开始了。四个委员审问兵士们。委员们用拳头和枪托来增加他们审问的力量。我们很快觉察到，委员们在我们身上一无所获：他们既问不出是谁放的第一枪，也不知道是谁在连里讲列宁的事。有几个士兵在挨毒打以后招供了，但是军事法庭从他们的口供中没有得到多少油水。这些士兵招供出来的，多半是些早已死掉的伙伴，有几个士兵甚至讲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作为口供。

"拉约什·科苏特第一个开枪，"一个士兵说。

"谈起列宁的是米哈里·卓孔奈·维特斯①，"另外一个士兵肯定地说。

一些士兵原来并不知道他们的长官害怕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神秘的名词，现在他们却从军事法庭上知道了这一点。被禁闭在宪兵看守的营房里的士兵们，不谈天则已，一谈就谈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许多人都把我当作"有学问的人"向我打听消息。

"什么叫布尔什维主义？"

"我想，那是和平吧。"

"那么列宁是谁？"

"他就是要结束战争的人——不单单是这次战争，而是所有的战争。"

"列宁！"

委员们严刑拷问，威胁恐吓，布达佩斯又来了一个中尉，给

---

① 米哈里·卓孔奈·维特斯（1773—1805），匈牙利著名诗人。

我们大讲布尔什维主义，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匈牙利国王、上帝、国家和人民的死敌。我们从这位中尉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知识。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和平时期的一个丝厂主。但是我们从几个给我们送中饭和晚饭的士兵那里知道了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知道发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①的内部消息：德国、奥匈帝国和苏联的代表们已在那儿举行和平谈判了。

“俄国人需要和平！军官们咒骂他们，原来是因为他们需要和平！”

虽然在奥匈军队中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而他们之中每一个人还是认为逢人就得把这个消息再说一遍。

“俄国人，俄国人——”

“列宁！”

昨天，他们还仅仅知道他的名字；可在几个小时，几天之间，列宁却在他们眼睛里成为巨人了。渴望生存的人们，象重伤员需要母亲一样，只想着列宁。

列宁就是生命！因此，我们准备为他而死！

“在这个腐烂的王国里，只有一个人有忠诚的士兵——就是列宁！”斯伐克班长咕哝着。

昔日的丝厂老板，现在的胖中尉，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传言，对我们作了演讲。

“俄国人对我们背信弃义。许多愚蠢的人把‘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儿译成了匈牙利文的‘和平’。现在我们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既不是‘和平’，也不是男子气概的直截了当的公开的

---

① 即布列斯特，苏联西部边境城市，靠近波兰边界。

战争，而是暗杀——”

“撒谎！”

米科拉气得发抖，粗声地说。他站在我旁边，第二排右面最后一个。

中尉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半张着嘴，呆了好几秒钟。接着，为了安心起见，他用手拍了拍他的马刀。

“这话是谁说的？”他声音激动地查问。

米科拉走出队伍，同时我也向前走了一步，三秒钟以后，另外三个士兵也走出了队伍。

“只有一个混蛋说的，”中尉叫道，“是谁？”

“我，”米科拉镇静地说，可是我们四个人同时也说，“我，”声音比他更响。

“你们乱说，”米科拉吼道。

一刹那之后，我们四个人叫道：“你乱说。”

米科拉火得跳了起来。

“中士，”中尉下命令，“把这五个人都抓起来，把他们分别禁闭，严加看管！”

一星期以后，我们五个人都到了下喀尔巴阡山，被关在昂格瓦军事法庭的监狱里。

师部的监狱，是一个出色的机关。一个士兵无论在哪里给抓了，迟早都得送到这地方来。这一师兵都是从同一地区来的，因此每个人不论在难友中和看守中都可遇到朋友和童年的伙伴。这里，给我的东西是用一个银盘子端来的，这些东西，在任何监狱里，我想尽办法也不会得到的。有一部分看守，司令官怎样命令，他们就怎样干，这样才免得被送往前线，可只要有人肯

出高价，他们就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诸如供给囚犯纸烟等等；其余的人，则什么犯禁的事都干。他们中有些人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厌恶司令部、战争和监狱，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出于对囚徒的友谊。

米科拉虽然对坐牢有丰富的经验，却依然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囚徒。看来我有当囚徒的才能。因为事实证明，在监狱里，正如在外界一样，关系好的人就是有才能的人。我在监狱里的好关系是通过监狱里的主治大夫，我的舅舅福洛普·西维拉建立起来的。福洛普作为一个狱医，已经一千次破坏了他领取医生证书时所发的誓言。当时他宣誓把他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医疗事业，现在他却绞尽脑汁要延长一个病人的疾病，以及如何使健康的人生病。

战争开始时，福洛普·西维拉年纪虽然已经不轻，却自愿上前线服务；他要去跟受折磨的人们一同受苦。他被塞尔维亚人俘虏了。他设法获得塞尔维亚当局的信任，任命了他为战俘营的医生，为各部队来的人治病。在那儿，他和其他战俘一样，挨饿，受冻，衣衫褴褛，满身虱子。当时在士兵中疾病——特别是斑疹伤寒——流行，猖狂肆虐，福洛普大夫在缺药的条件下——更谈不到医疗器材——与疾病作斗争。德国人占领了塞尔维亚以后，被俘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人可以重返家园，几百个俘虏以热情的言辞谈到西维拉大夫在俘虏营中的活动。有些报纸刊载了一些兵士们所传布的这类故事。因此，当军政大臣给军官们——他们没有动过一个指头去帮助在狱中受苦的兵士们——授奖时，西维拉——虽然他的行为完全是另一码事——同样也获得了作为高级的奖赏的铁冠勋章。他还被任命为蒙卡契驻军医院的主任医师。在他就任的那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信中通知

他，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他的独子卡罗莱已经在意大利前线英勇牺牲。

在西维拉主持的医院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福洛普舅舅完成了当时被认为是奇迹般的手术。他救活了在医药科学上认为无望的伤员。关于他的大胆的手术，起初只在医学杂志上刊载，后来，报纸上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登载有关西维拉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勇敢的医疗行为和高超的手术，这些文章充满了科学上的无知和过分的夸张。报纸给他起了"神医"的绰号。但这时，军部的刑事侦查员却开始来研究这位常常受勋的医生所领导的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了。在西维拉医生的医院里，据说，那种毫无希望的伤员能够起死回生，而轻伤员却永远也不会恢复健康。一个大腿受伤的士兵，在别的医院里，不出三个月或三个半月就可以回到战壕里去。然而同样的伤员，送到西维拉医生的医院里，过了六个月，还连站都站不起来。蒙卡契医院的病人虽然送到蒙卡契军人公墓去的不多，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回到战壕里去的。病人出院的时候，不是右手上少一个指头，就是缺一个足趾，或者带着一种慢性病，虽然并不危险，可是已经取消这位病家上前线服役的资格。正如士兵们所强调的那样，如果腿伤值二万克朗的话，这种性质的病就值几百万。

军事当局已经很清楚：西维拉在制造残废者，因为他认为：对于一个士兵来说，丧失一个指头总比丧失生命好。西维拉全靠自己的名望，才算挽救了他，使他免上军事法庭、降职、判处长期徒刑。他只是给调到了昂格瓦监狱，这样也就结束了他那一套做法。他们认为他到了昂格瓦监狱就没有多大作为了，就不会危害军队了。然而，西维拉大夫很快感到自己作为监狱医生对军犯也是大有裨益的。有一个犯人受到严厉的指控，要上法

庭，在受审的前一天，他病倒了。审判延期后，病人很快就复原了。后来，重新定出了一个审判日期，他又开始发烧到三十九至四十度。而且不仅仅昂格瓦监狱里的犯人意想不到地病了；连法官和检察官也病了。有一个军法官名叫科拉，因为有十一个士兵因为他的缘故而接二连三地被判处了死刑，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昂格瓦的“鬣狗”。他有点小毛病，要请这位“神医”医治。在西维拉的治疗下，他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最后总算起床了，但他衰弱得只好休假了六个月。

西维拉大夫的头发变白了，形容憔悴，瘦削的脸上满是皱纹。他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发着患热病似的光。他的细长的手指神经质地颤抖着。他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

我们被押进监狱以后，他检查我们有没有传染病。他安排米科拉和我住同一间牢房。同房另外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叫列普泰克，是维佩斯的装配工。列普泰克的审判延期了两次：第一次因为他病了，第二次因为科拉病了。我们第四个同房犯人是贝雷萨斯的葡萄园工人，后来换了一个名叫凯斯蒂卡洛的战俘。

马鲁莎奶妈在王冠旅馆的厨房里工作，从外面供给我们食品。如果她给我带来她认为特别精美的点心，碟子里总夹着一张条子。马鲁莎奶妈在条子里告诉我们：“这些甜点心是专给小格查的。”

众所周知，在监狱里的人，怨恨会迷住他们的心窍，他们憎恨那些关他们的人。既然他们不能对那些看守报复，他们就凌辱同狱的犯人。我们这个牢房也不例外。我们倒不是为了睡的地方、食物，或者偶尔私下带给我们的纸烟而争吵。所有这一切，我们之间象弟兄一样分配得好好的。米科拉和我是在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法官这个问题上有矛盾。当审问我的时候，我拒

绝承认对我的任何指控，一切我都否认。可是另一方面，米科拉却公开承认同情俄国人，同情布尔什维克，他企图使法官相信，他的信念不是犯罪，他是真正地在为奥匈人民的利益效劳。审判官要我们当面对质的时候，我声称米科拉在胡说，他控诉自己的事，连他自己也不懂。米科拉气得发疯，当着法官的面打我。他被惩处三天单独禁闭，两天不给食物，只有一张硬板凳给他睡。在这些日子里，列普泰克和我商量了对策。列普泰克告诉守卫，说米科拉已经疯了，说他吃污物，有幻觉，自己跟自己吵架。米科拉经过三天的单独禁闭，回到了我们牢房，知道我们所干的事以后，气得发狂。他唾沫四溅，暴跳如雷，还要杀掉我。我们请了两个人进来把他拉了出去。他们把他转到监狱医院里，由西维拉医生护理。福洛普舅舅对米科拉一直在进行"观察"，过了六个星期，就米科拉的神经状态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懂。法官肯定是不会理解的。根据这份报告，法官下令让一个医务委员会对米科拉进行检查，以确定他到底是否精神健全。由于这个医务委员会是由西维拉医生领导的，检查也就无限期拖了下去。这一来，我们的案子也挂起来了。

米科拉回到我们牢房里来，象一个弟兄一样分享我们的食物和烟草。但是他拒绝同列普泰克或者同我说话，只有当另一个犯人加入到我们囚房里来时，情况才有所改变。他是维列克的铁匠，芬兰人，名叫凯斯蒂卡洛。

尤哈·凯斯蒂卡洛，维列克的铁匠，出生于芬兰拉多加湖北岸的一个村庄。他象他父亲和三个弟兄一样，成了一个伐木工人，如果他不是把一个企图强奸年轻姑娘的林务员打得半死的话，大概他一辈子也是伐木工人。尤哈的英勇行为使他进了监

狱，又从监狱送到西伯利亚。他在那儿接触了流放的政治犯。他学到了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的激动人心的思想。尤哈于一九一三年回到欧洲，决定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他经圣彼得堡的同志们的帮助，在工厂里搞到了一个工作，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得到了应征的通知。尽管他提出声明说他是芬兰人，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在必要的身份证寄到之前，他已在去加里西亚边境的途中了。当他的师长决定他的确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命令他的营长把这个非法征募来的芬兰人送回老家时，他已经在参加第四次战斗了。等到营长具体执行圣彼得堡关于遣散凯斯蒂卡洛的命令时，尤哈已经成了奥地利的囚犯。他是因受伤而被俘的。

他在克拉科夫军医院里躺了六个星期，然后让他出院——并非他已复原，而是有个奥地利人需要床位。他从医院给送到拥挤肮脏的营房，这是草草建成的战俘营。他在没有医疗条件的战俘营里住了几个星期，他的伤都好了。凯斯蒂卡洛慢慢地恢复了力气，战俘营管理处的一个中士来问他是不是要工作，他不要。因此他们把他的伙食停了。他为了要吃，只好去干活——做榴霰弹。

在战俘工作的地下室工场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点着煤气灯。那个工场的工人全是战俘；监工则是一些奥地利的和匈牙利的老兵，他们自己过得也并不舒服。军官也监视他们。战俘们制造榴霰弹，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住的是简陋的小屋，伙食则保持一种叫人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

榴霰弹的任务是杀人。那些制造它的工人，是第一批牺牲者，它要了他们的性命。在凯斯蒂卡洛周围生产榴霰弹的战俘，象冲向一个伪装的机枪阵地的士兵们似的，全都倒下了。他们

给葬在公墓里。

凯斯蒂卡洛联合了一个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和一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几个疲倦不堪、愁眉苦脸的看守营房的匈牙利老年民兵的眼皮底下，逃出了围着有刺的铁丝网的战俘营，这才算逃脱了同样的命运。这几个逃亡者听见匈牙利兵说过匈牙利有充足的食品，因此他们就到匈牙利去了。

他们是在夜幕笼罩下逃出战俘营的。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在橡树林深处休息时，那个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呕吐起来了。他在战俘营里就得了霍乱。他的两个同伴看护了他三天三夜，他终于死掉了。留下来的两个人直奔匈牙利而去。他们一路上怕人觉察，避开了所有的村落，饿得死去活来，就是在战俘营中也从来没有这样饿过肚子。当他们到达匈牙利边境的喀尔巴阡山时，已经形容枯槁，衰弱不堪。

他们沿着一道弯弯曲曲的山脊走着，在一片矮松压着阔叶树的地方，忽然迎面出现了一支宪兵巡逻队。宪兵们是如此之近，他们已来不及逃跑了。

"对一个逃亡者来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想法钻进了凯斯蒂卡洛的头脑。

或者，也许他根本不曾停下来思考，只是受到了他祖先给他的本能的驱使，他象一只豪猪一样弯起身子，向覆盖着灌木的山坡滚了下去。荆棘抓破他的衣服和皮肤，但是他到了山脚下，从宪兵手里逃出来了。

他在山谷深处的一个军人墓地上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他喘息方定，就想起了鞑靼人，后者无疑地已经落到宪兵们的手里。他毫不犹豫地又回到山上去寻找那几个宪兵。他根本没有考虑，他单身一人，赤手空拳，面对着三个全身武装的宪兵，他能怎

么办。他唯一想到的，是要找到那几个宪兵。他沿着森林的小路走着，足足找了半天，可是毫无结果。那些个宪兵，你不想见到他们时，他们老在周围，可你要找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凯斯蒂卡洛把嘴唇咬出了血，恼火得哭起来了。

傍晚时，他站在一座山顶上，向下面南面的一片草地凝望着。他看到一个村庄，村庄里有许多茅屋和几所铁皮屋顶的房子，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山边。村子中央有一座红屋顶的教堂，在教堂顶端，矗立着一只铜制风信标以代替十字架。钟楼的一个窗口上，挂着一面红-白-绿三色的旗帜。

"匈牙利！"

从烟囱里出来的一缕缕青烟，在四处飘荡。

"他们在做晚饭了，"逃亡者想着，深深叹了一口气。当时，在维列克，只有一些妇孺和老人留在家里。如果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要想去讨一片面包，他在每一家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我们自己也什么都没有呐！"

不过乞丐还是肯定能从每一家得到一把煮过的燕麦或者爆玉米的。当他用"上帝保佑你"来道谢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他："你正好是个马医，或者是个铁匠吗？"

对这些用匈牙利话、乌克兰话或者犹太话向他提的问题，凯斯蒂卡洛总是用国际语言的"不"来回答——那就是摇摇头。然而这种反反复复的问题，使他深信这个村庄迫切需要一个马医或铁匠。他心里怀着可能获得更为丰盛的一餐的想法，用俄语回答一个用乌克兰语问他的人说："我是一个铁匠。"

他估计，如果他们发觉他说谎，最多是把他打死罢了，但总能让他先好好地吃上一顿，获得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美餐。

"我一辈子就干的是铁匠活，"他说，一边想着热乎乎的饭

菜，“是个远近闻名的铁匠。”

撒谎不仅给尤哈·凯斯蒂卡洛带来了羊奶玉米饼和燕麦面包的晚餐，还带来了住所，羊皮外套，甚至家庭。他还是回避着警察。没多久，凯斯蒂卡洛自己也觉得奇怪了，看来他对铁匠和兽医这两个行当还真是个好手哩。

维列克的铁匠和没有执照的马医安德拉斯·雅伏林，在加里西亚阵亡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伊凡·雅伏林，已为皇帝和国王弗朗西斯·约瑟夫战死在意大利伊桑佐河岸。铁匠铺是空着的。村民们想找一个铁匠，结果是白费心计，因为这当儿，铁匠不是在钉马蹄铁，而是都在为国王和国家送命。

新来的铁匠是“远近闻名的”，他是匈牙利的、犹太的或者乌克兰的上帝送到维列克来的，更可能是乌克兰的上帝送来的，因为他说俄语。他们把他安顿在雅伏林家里。那里住着伊凡·雅伏林的年轻寡妇和她的两个没爹的孩子。伊凡·雅伏林太太，娘家叫阿克苏莎·蒙德雅克，她不仅仅是铁匠的寡妇，铁匠的媳妇；作为伏洛克的铁匠最小的女儿，她还生来就是干这营生的。这位“最小的”女儿，长得几乎跟闯入维列克的这位芬兰人一样高。

凯斯蒂卡洛吃了一顿美餐之后，一觉睡了二十四个小时。他醒来以后，用伊凡·雅伏林的剃刀刮了胡须。到小河里洗了个澡，然后穿上了伊凡·雅伏林过节穿的衣服。这衣服穿在高个子芬兰人的身上稍嫌短一些，但比较宽大，倒也合身。维列克的村民们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们的铁匠原来完全是一个小伙子。喀尔巴阡山人的体格都长得很魁梧，但是凯斯蒂卡洛却比他们当中最高的人还要十足高一个头。他身材细长，肌肉既强壮又柔软，肤色白里透红。他的两只眼睛，分得开开的，是一种

变幻不定的蓝灰色的眼睛。他喜欢笑，当他笑起来时，那副晶莹洁白的牙齿一闪一闪的。再瞧瞧他那拳头的模样！如果佩梅蒂的猎熊者米哈尔科不是关在监狱里，维列克的村民们准会去请他来和他们的新铁匠比比拳头哩。村民们赌咒发誓：他们的芬兰人不会使维列克人丢脸的。勤劳的雅伏林太太生来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老是认为是乌克兰上帝给两个没爹的小孩子送来了这样一个好爸爸。

要是乌克兰上帝不作新的安排，宪兵队长卡尔曼·苏默其也不来检查，本来凡事都会顺顺当当地过去的。上帝把凯斯蒂卡洛领到铁匠家里，而苏默其却在两个宪兵的帮助下又把他从铁匠家里送到州监狱里。雅伏林太太十分明白，向上帝控诉苏默其的命令是毫无用处的。即使上帝肯帮忙，面对宪兵队长的命令，他也无能为力。在维列克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控诉——桑邦伯爵的管家。

这时，前线已从利沃夫向东延伸，维列克已在交通区之外，因此桑邦伯爵的管家萨鲍尔奇·卡瓦西重新又成了维列克的土皇帝。在农奴制废除了六十年以后，卡瓦西还是可以随便把一个农民捆起来鞭打，如果他一高兴，就可以立刻把杀人犯从监狱里放出来。

雅伏林太太向卡瓦西求救。伯爵的管家踮起脚来，拧拧雅伏林太太晒黑了的腮帮，答应把铁匠从宪兵手里救出来。卡瓦西真的使凯斯蒂卡洛获得了自由。一方面，因为维列克有一个好铁匠在干活，对领地有好处；另一方面，也要向苏默其显示一下：伯爵管家的权力不仅比所有的宪兵还要大，而且还有更多的知识。卡瓦西毕竟是知道芬兰人和匈牙利人是同一血统的。

“该死，队长，我不希望你这样。依斯特凡·塞契尼伯爵在

八十年前说过，当匈牙利人认识到芬兰人是他们的骨肉兄弟，而不是敌人时，他们就会富裕、幸福和自由。而你，队长，是个好匈牙利人，可你就不知道这些。这个不幸的芬兰人跑到他的匈牙利弟兄这儿来，要求避难，而你，不但没有伸出兄弟情谊之手，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

凯斯蒂卡洛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并得到了居住证。他的义务是每天到宪兵队报到，做苏默其指定的工作——当然是没有报酬的。他给卡瓦西管家干活，得到的也是同样的报答。给领地做工，他可得通常工资的一半。不过另一方面，卡瓦西称他为“我的亲爱的同胞”。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凯斯蒂卡洛还为自己和雅伏林一家谋生。仅仅在开始时，他还需要雅伏林太太指导他修理农村里的破马车。两三个月以后，他就指导起这个女人来了。等到雅伏林太太给在维列克出生的第一个芬兰人行洗礼的时候，凯斯蒂卡洛已经是一个远近驰名的优秀铁匠和马医了。他还成了熟练的锁匠、机械工和电工。

凯斯蒂卡洛只有很短一个时期被人叫做“可怜的芬兰人”。他在维列克村民中深受欢迎。这个新来的铁匠，在村子里立刻被称为“我们的芬兰人”了。但是这个亲昵的称呼也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冬天，凯斯蒂卡洛变成“芬兰的傻瓜”了。

下雪以后，维列克实际上就和外面世界完全隔绝了。村民们躲在小木屋里，足不出户，他们用干牛粪和从伯爵森林里偷来的木头取暖。他们除非有紧要的事才出门去，譬如柴火烧完了，必须再去偷。然而凯斯蒂卡洛却与众不同！在开始出现雪云迹象时，铁匠就削了两根长长的头上弯曲的橡树干子。当山上铺满白雪时，他把橡树干子缚在腿上，在山坡上表演了惊人的绝

技。这样的表演，维列克村民从来不曾见过。他爬上最高峰，然后从陡峭的山坡上滑下来，或者不如说，全速溜进了山谷。不仅如此，这个芬兰傻瓜在摄氏零下十度、十二度甚至十四度时，都光着头出门去，尽管他的妻子——勤劳的阿克苏莎恳求他，他还是不肯在他的红头发上戴顶便帽。

“在这样严寒的天气，芬兰铁匠总不可能只是为了滑下来才爬上山去的吧，”维列克村民们议论着。

敬神的人们坚持说他有点神经失常，疑心重一点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说他有魔术。

“我们应该侦察一下，铁匠在山上干什么。”

寒冷的天气不利于这个提议，而好奇心又促使他们这样做。于是，维列克的村民们侦察了铁匠的行动，结果一无所获。

凯斯蒂卡洛在山顶上没有去会见女巫，事实上，他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天。在冬季，天空从淡蓝色变成了铅灰色。于是他闭上眼睛，倾听松林的窃窃私语。喀尔巴阡山上生长的松树，跟遥远的芬兰的松树诉说的是同样的话语。

凯斯蒂卡洛听够了松树的声音之后，就张开眼睛，摇摇不戴帽子的脑袋，不看左边，也不看右边，一下就飞快地滑进了山谷，他的周围扬起了一片雪云。两个窥探他的老妇人痛骂派她们来的那些人。不过她们却更为猛烈地咒骂那个芬兰傻瓜了。她们说他没有和什么女巫谈天，他爬上狂风呼啸的山峰，是为了愚弄虔敬而诚恳的人民。一连几天，村民们对芬兰傻瓜非常愤怒。后来他们说，凯斯蒂卡洛除了一些愚蠢的举动之外，终究是个灵巧的、有用的好人，而两个老太婆徒然使他们增加额外的负担。于是他们就和芬兰人和好了。从此，大家都叫这两个老太婆为“搜查女巫的人”。

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天，这个顶呱呱的芬兰人被人称为“芬兰疯子”了。在那年早春，凯斯蒂卡洛眼看就要赢得“出色的芬兰人”的称号，可是后来……到了春天，警察局长把芬兰铁匠叫到他的办公室，和他握手，请他坐，给他烟，对他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愿意回芬兰老家吗？”

“我巴不得马上就走，”凯斯蒂卡洛回答。

“可以办到，”警察局长说。

他喋喋不休地对凯斯蒂卡洛说，在芬兰“赤匪”横行，必须把他们从“千湖之国”驱逐出去，或者，更好是把他们淹死在一个湖里。为完成这一事业，所有“正直的、爱国的”芬兰人都应该同心协力。奥匈政府是芬兰人的真正朋友，他们准备给所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芬兰战俘以自由。不但如此，而且凡是准备去和“赤匪”作战的结实的芬兰人，他们发给回家的旅费，并预支三个月工资。

当警察局长变得越来越信任他时，凯斯蒂卡洛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冷淡了。

“那么，你过两三天就出发？”警察局长把全部详细情况告诉了芬兰铁匠之后，问道。

“我不但过两三天不去，过两三年也不去了，”凯斯蒂卡洛回答。

起初，警察局长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或者凯斯蒂卡洛不大懂匈牙利语。但是当这个芬兰人用乌克兰语坚定地重复他的回答时，事情就很清楚了：维列克的铁匠不想帮助他们消灭“赤匪”。

“如果你不去，如果你拒绝当一名芬兰志愿兵，我就把你关

起来，你这个蠢猪！”警察局长看到甜言蜜语无法打动这个执拗的芬兰人，就用另外一种调子威胁说，“我凭我的名誉发誓，你将饿死在我的地下室里，让老鼠吃掉你的骨头，你这个卑鄙的叛徒！”

无论是甜言蜜语或者威胁恐吓都不能说服这个芬兰人参加芬兰白卫军。奥国政府把各国的战俘都送到白卫军里，干脆把他们当作芬兰人，因为芬兰的战俘人数不足。于是，警察局长把凯斯蒂卡洛关起来了，若不是卡瓦西管家再来营救他一次的话，他也许死在警察局的地下监狱中了。

在警察局长建议他参军之前一个半月，凯斯蒂卡洛已经在着手进行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决定建立一个水力发电站。溪流是伯爵的，建设电站必须得到卡瓦西的准许。获得卡瓦西管家准许的条件是，电站必须完全由他控制。那时候，下喀尔巴阡山一个电站也没有。卡瓦西不仅承担包括建设电站的一切费用，而且也获准让凯斯蒂卡洛去蒙卡契待三天，以便购置电站设备。凯斯蒂卡洛在蒙卡契待了三天，住在蒙卡契裁缝工会秘书摩根斯特恩家里。这三个晚上，维列克的铁匠和蒙卡契的裁缝到底说了些什么，双方都讳莫如深。凯斯蒂卡洛在蒙卡契采购时，摩根斯特恩向所有的人讲述关于他的客人的一件轶事。

“你倒想想看，那个维列克的芬兰人一下火车，一个搬行李的工人把他的拳头当成了手提箱，硬要把它从身体上拉下来。”

摩根斯特恩甚至说得出这个搬运工人的号码。那些听了这个笑话笑得前仰后合的人没有想到要问：摩根斯特恩是在哪里遇到凯斯蒂卡洛的，或者一个芬兰的铁匠为什么前来和蒙卡契的犹太裁缝待在一起？

警察局长逮捕凯斯蒂卡洛的时候，电站建设已差不多快要

完成了。当时卡瓦西被这个芬兰人设想的"神奇的计划""迷住"了。这个计划将供给全村电力，却几乎不要花一文钱，因为大部分材料来自伯爵的庄园，而且大部分劳力是无偿的。此外，卡瓦西还可以在建设电站费用的项目下，由住在维也纳的伯爵支付大量款子。

水电站只建成了一半，这是凯斯蒂卡洛的好运气，因此，卡瓦西告诫警察局长说，死了一个维列克的铁匠，不会加强芬兰白卫军，但是对于伯爵领地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以国家的名义、或者至少以州政府的名义统治人民的警察局长，二话不说，同意了伯爵管家的意见，就把这个已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饿了三天的维列克的芬兰人释放了。他从地下室里出来的时候，脸色稍稍苍白了一些，但是人还健康，而且精神饱满。

两个星期以后，他从维列克逃走了。宪兵在很远的地方——利沃夫附近把他抓住了。当他们把他押回维列克，转送到桑邦伯爵的领地上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的左足已被宪兵用枪托打碎。碎的骨头倒是治好了，但是凯斯蒂卡洛从此永远成了跛子。

人们听到凯斯蒂卡洛拒绝去打仗，都称他为"聪明的芬兰人"。但是当人们后来知道，给他护照、钱，让他乘车他都不愿去的地方，他却自己步行前去，从此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芬兰疯子"。

阿克苏莎要袒护她的男人也是徒然。

"尤哈不愿参加白的，他要加入红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一点也不清楚。红是一种颜色，白也是一种颜色，维列克的村民们议论着。

不过，这件事却使得有些人思考起来。如果象芬兰疯子这

样一个能干的人，当他们要他去芬兰参加白军时，他坚决拒绝，却一定要去参加红军，即使他们把他抓回来也罢——那人们对于红与白可就得辨别辨别啊……一九一八年八月来看他的泰马斯·艾舍，很可能和凯斯蒂卡洛是志同道合的。大家都知道艾舍是拉科治传说中的将军的后裔，也都知道这个雇农和塔巴村的前任村长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主义者，十年中有四年半给关在监狱里。

艾舍来看凯斯蒂卡洛后没几天，后者就被警察局长抓去了。电站早已完工，卡瓦西也就不再关心铁匠的命运了。

凯斯蒂卡洛在州监狱蹲了一天，第二天就转到昂格瓦军人监狱里。这个监狱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伙杀人犯，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卖国贼。监狱里的伙食贫乏可怜，同狱的犯人是各种各样的，刽子手忙得加班加点，但是饿死的人比他处决的还多。凯斯蒂卡洛逃过了这两种通常的死法。因为法庭上的积案过多，还轮不到提审他，所以他避过了刽子手的绞索。因为跟他同住一个牢房的人，有外面的一个名叫玛丽亚·彼特鲁塞维茨的女人送食品进来，因此他没有饿死。

维列克的铁匠第一天进来，就了解了我们牢房里的情况。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干预我们牢房内的冲突。他和米科拉之间，只有几个钟头就建立了坚强的友谊。这个维列克的芬兰人，只要用他那在维列克学来的匈牙利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语，讲起北方传说中推翻天神宝座的英雄们和为俄罗斯自由而战的勇士们，就能使米科拉把一切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他讲得津津有味，语言和情节都是混杂的。凯斯蒂卡洛把«卡勒瓦

拉》[①]中的英雄现代化了，而把工人运动的英雄浪漫化了。然而，既然我们知道现实超过了最荒唐的虚构，我们从这位新交的朋友所说的故事中，也就能辨认出我们自己和跟我们相类似的人。

凯斯蒂卡洛虽然只比我们大十三、四岁，却象父亲一样对待我们，我们也承认他的权威。因此他来到我们牢房两个星期以后，就顺利地结束了我们自相残杀的斗争。

他耐心地倾听了米科拉的指控和我的辩护。

"米科拉的做法是正确的，而格查是机灵的，"他作出判断。"如果米科拉认识到一个人对付敌人必须机灵；如果格查承认一个勇敢的榜样能使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睁开眼睛，那就万事大吉了。我什么也不想掩饰——因此，我说，我倒更喜欢米科拉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我处于你们的地位，我是会照格查那样做的。"

我想，凯斯蒂卡洛对他的这一套外交手腕，是动了很长时间的脑筋的，等我和米科拉重修旧好以后，他想到如何愚弄了我们，可能正在暗暗发笑哩。然而，后来当我更加熟悉了这个维列克的芬兰人以后，我不得不承认，凯斯蒂卡洛总是相信什么就说什么，永远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因此，米科拉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把维列克的铁匠当作最要好的朋友，是不足为奇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奥匈帝国覆灭。监狱门被打开了。第二天，福洛普舅舅陪我到布达佩斯去了。

众所周知，凡事都有一个变化过程。特别是往事，变化得最快、最彻底，正如每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所充分认识的那样。士兵

① 意为《英雄国》，是一部芬兰史诗。

的活动只限于前线，他要跟虱子斗争，跟班长斗争，使他更为难受的不知是饥饿呢还是腹泻，可当他去休假时，回想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幅情景了。到了家里，他总爱想到他曾经是个英雄，在火线上杀过敌人。后来，当大炮声停止时，这同一个士兵又会讲述一些哀婉动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说他怎样救过敌军士兵的性命。他救了几十个、几百个人！然后，我这位士兵会进一步回想起，他在整个战争时期，曾和真正的敌人——百万富翁的军火商和帝国主义制度——作过斗争。这个士兵没有说谎；他只是把往事改变一下，以适应现在的变化罢了。

简单点说，我的经历如下：当一个炸弹爆炸，或房子塌下来时，我相信我一定是遇到了火灾、洪水或者地震。不过我总是很幸运，没有流多少血，就安然无恙地逃过了灾难。此外，我还是个有经验的人。

当然，我的经验不是怎样躲开遭到火灾、洪水和地震威胁的地方；而只是作好精神准备，要是地从我脚下塌陷，或天花板落到我的头上，我决不惊慌失措，或者怒气冲冲。

福洛普舅舅陪我到达布达佩斯以后，我就立刻投身于形形色色激动人心的事件中去了。我在布达佩斯待了几天，就搬到了维佩斯的列普泰克家里。列普泰克和他的妻子厄莎·卡尔曼，跟恩德列·卡尔曼住在一起。恩德列的妻子最近死了。

我住在西维拉家的时候，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夜复一夜地争论着一个问题：列宁所走的道路，对匈牙利劳动人民是否适合。在卡尔曼家里，我已置身于那些勇敢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工人之中。在这里，问题已不是选择哪一条道路，而是如何才能尽快地“照俄国人那样干”了。

“喂，厄莎，你现在会说世界语了吗？”

“世界语不能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厄莎以郑重的口气回答了我这句开玩笑的话。

我在布达佩斯和维佩斯住了一个月后，在泰马斯·艾舍和米科拉的坚决要求下，回到下喀尔巴阡山去了。在我离开首都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当我到达贝雷萨斯的时候，那儿已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在那个时候，历史向前猛冲，而火车却象蜗牛一样。

一九一四年，从布达佩斯到贝雷萨斯，火车只要行驶十个小时；在一九一七年，要开十几个到二十个小时。到一九一八年，我从布达佩斯到贝雷萨斯，用了两天多工夫，大部分时间是在装牛的车厢里过的。这次旅程的最后两小时，因为车厢的轴承断了，我只好坐在一节货车的顶上。坐在车顶上旅行非但不安全，而且受到狂风冲击。

我们八个人都是遣散的士兵，一起坐在货车顶上。自然，我们开始谈政治。一个轻骑兵班长坐在那里，用皮带把身体系在一个烟囱上，我拉住了他那双穿长统靴的脚。他坚持认为匈牙利应该宣布为英国殖民地。要不，我们就会被消灭，饿死，被敌对的力量撕得粉碎。如果我们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一下子就会有金钱、鞋子和其他一切。匈牙利不会被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占领，而是我们占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

“匈牙利人只应该占领一个国家，”那个紧紧拉住我的左脚的大胡子士兵争辩说，“那就是匈牙利。”

“你要占领匈牙利？”轻骑兵班长问，“你大概喝多了吧？”

“是的，我喝过了，是水！我要占领匈牙利；是的，不错，我们总有一天要占领匈牙利的——从伯爵到男爵！”

“或者相反，”班长勉强一笑，“你也许吃过俄国蘑菇了？你很快就会吐出来的。”

“匈牙利若要得救，”一个衣着很奇怪的士兵出声了，他上身穿了一件水手的夹克衫，脚上却穿的是炮兵长靴，“要靠两个D字：金元和民主！①换一句话说，就是美国！如果美国帮我们一手……”

“谁帮一手？”大胡子士兵吼叫道。

“别这样激动；不管怎样你都来不及喽。”轻骑兵班长反驳道。

争论越来越激烈，含糊的辩驳很快变成了直率的威胁。但是直到火车进了贝雷萨斯车站，人们才大打出手，大胡子士兵对穿炮兵长靴的士兵巧妙地一脚，把他从货车上踢下去了。

我在贝雷萨斯只待了几个小时，就急急忙忙赶往蒙卡契——统帅部的中心去。我住在裁缝摩根斯特恩家里。

摩根斯特恩是个瘦子，身材比我矮一点点。他的一双手又白净又光滑，仿佛是从来不劳动的。他那没有胡子的、狭狭的、晒黑的脸，使他不象蒙卡契的裁缝，而象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艺术家。

他用清脆深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

“匈牙利政府已经准许下喀尔巴阡山自治，我们已不再住在下喀尔巴阡山。我们住在俄罗斯乌克兰了。那很好，因为匈牙利政府只要一答应分土地，我们就马上凭自治的权利分土地。因此我认为匈牙利的雇农是赞成罗斯自治的，而罗斯的地主会反对。情况是有点儿复杂。”

我听到摩根斯特恩那样热情地谈到米科拉，感到很惊讶。

① 这两个字，第一个字母都是D。

我是非常喜欢米科拉的，但是我却看不出他是罗斯工人的领导人。接着，在我们后来见面时，我可理解摩根斯特恩的热情了。

在革命的短短几个星期中，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成年人，多做事，少说话。他知道他要什么，并完成他下定决心要办的事。

“匈牙利农业部反对野蛮的土地分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迅速分配土地。等我们分了伯爵的地，凡是要地的人就都会反对他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波兰军团经过维列克隘口，到达下喀尔巴阡山时，米科拉率领志愿军部队把这些波兰人赶了出去。后来这些志愿军部队的残部组成了罗斯红卫军。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匈牙利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那些大地主，为了竭力保全他们的全部土地，曾经反对过自治，现在忽然变成拥护自治的人了，他们认为这样至少还能保住他们的一部分财产。

“脱离匈牙利，”这是匈牙利大地主提出的口号。

罗斯、匈牙利和犹太的雇农们是拥护匈牙利的，这就是说，是拥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

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我们收到一份布达佩斯打给摩根斯特恩的电报，电报通知我们：匈牙利共产党已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国家权力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电报到达时，我不在家。我到瓦尔帕兰卡去发表演说了。那天晚上，我回到蒙卡契时，街上挤满了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在摩根斯特恩房间里，我发现了一张条子：

“立刻到市政厅来。”

福蒂和摩根斯特恩坐在市政厅的一个房间里，几个月之前市长就在这儿办公。他俩在激烈地、几乎是敌对地争论着。在他们周围聚集着蒙卡契和附近各社会团体的代表。

“怎么啦,同志们?”

摩根斯特恩和福蒂齐声回答。

“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专政!”摩根斯特恩用崇敬的语调热切地说。

福蒂忧郁地、愤怒地叫道:“共产党解散了。它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了。”

即使有人平心静气地对我解释在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我可能也决不会理解。但是这……

我也参加了争论,不过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却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我们正在浪费时间，蒙卡契的劳动人民却开始聚集在市政厅前面了。群众大约有五千人。

“总得有个人去对群众讲讲呀,”我说。

摩根斯特恩和福蒂一齐说道:“你去说,格查。”

“我说什么呢?”

对我的问话没有人回答。我走到外面阳台上。

广场一片漆黑,听得见嗡嗡的说话声:有说罗斯话的,也有说匈牙利话和犹太话的。人群中传来一片低低的激动的欢呼声，到处喊着口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列宁万岁!”

从市长办公室里射出的一缕灯光照在阳台上。下面的群众看到有个人在阳台上,便开始欢呼。

“同志们!”

广场上的喧闹声慢慢地平静下来。

"向胜利的俄国工人阶级，向伟大的俄国共产党，向列宁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我讲了十分钟。对我的每一句话，人们都激动地喝彩喊好。但是，人们急于要听的关于在匈牙利发生的事，我却一个字也没有说。

等我讲完以后，摩根斯特恩出来演说。他把布达佩斯发生的事简短地告诉了群众。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摩根斯特恩结束了他的讲话。

群众离开广场，到镇上去游行了。我们又回到市长办公室去交换意见。关于将要做点什么，我们争论了几个钟头。我们有三十个人挤在这小房间里。近午夜时，米科拉和艾舍进来了。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米科拉惊奇地问。

"我们在开会，"我回答，"你们在哪儿？"

"我们占领了车站，缴了军官的械。"艾舍抢在米科拉之前回答。

米科拉听我们讨论了几分钟，然后高声地谈起来，仿佛他是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演说。

"下喀尔巴阡山东北边境，离苏维埃俄罗斯西南边界是二百九十公里。我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通了电话。明天将有四个师从布达佩斯来支援我们。我们明天早晨开始进军，从东北向基辅移动。"

"你知道布达佩斯的情况怎样吗？"福蒂问米科拉。

"我知道我们有四千七百名武装人员，都是可靠的革命者，雇农、伐木工人和工厂工人。我也知道，这点兵力是不够的。但是想要到哪儿去多弄点军队，这可没有多大办法。无论如何，如

果我们进攻……”

“两个星期内我们就可以和俄国人握手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十天就够了，”摩根斯特恩插嘴说。

“我们不要预言，还是行动吧，”米科拉说。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军事人民委员已经指定你当罗斯红卫军的政委。”

黎明时，罗斯红卫军在米科拉的指挥下，向东方进军。按照计划，我们要在喀尔巴阡山的马拉马罗斯跟蒙卡契、贝雷萨斯和昂格瓦等地来的先遣队联合起来，我们将在加里西亚同布达佩斯派来的几个师会合。

三月二十八日，我们打了第一仗，打败了罗马尼亚两个团。三月三十一日，增援的捷克部队向昂格瓦发起了猛攻。这个城市在两天中四次易手，最后为捷克人占领了。一支由摩根斯特恩指挥的分遣队撤回到蒙卡契去，以防止这个城市落入捷克人之手。福蒂为了接应匈牙利来的援军而到贝雷萨斯去了。四月四日，我们又打败了罗马尼亚人。同一天，捷克人对蒙卡契发动首次进攻。过了几天，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发动了联合攻势。匈牙利方面的援兵迟迟不来。

四月半，蒙卡契沦陷了。过了一个星期，捷克人已经进入贝雷萨斯。

四月三十日，开始了纳梅尼之战。

在明媚的蒂萨河畔

纳梅尼的战斗在日落时分结束，开始屠杀伤兵。一个罗马尼亚炮兵连布置在村庄外面，向蒂萨河左岸持续发了一阵子炮弹，但是对方没有回击，也就平静下来了。纳梅尼中心的加尔文教堂的屋顶燃烧着，火焰冲天。接着，忽然下了一阵大雨，把火扑灭了，剩下村子的黑色废墟，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只在天空偶尔掠过一道电光时，这才会把黑暗划破一刹那。连续的闪电，三次打在蒂萨河涨起的水面上。

罗斯红卫军在塔巴和纳梅尼之间与敌军作战，从黎明持续到黄昏，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经过六个小时的战斗，近中午时，罗斯红卫军看来就要战胜两倍于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了。可是，到了下午，强大的罗马尼亚先遣队袭击了进攻中的红卫军侧翼。

"我们面临的敌军比我们强大六七倍呐，"我说。我没有勇气说，我们必须撤退到蒂萨河左岸去。

红卫军司令员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坚决驳回了我的不曾说出来的提议。

"我们决不能想到撤退。"

"不能撤，"白头发的泰马斯·艾舍大声叫道。他穿着农民的服装，站在穿制服的总参谋部人员当中，"不能撤！"他响亮地重复叫道，"一只狼到了没有退步的时候，便会扑向狗群！"

"现在不是狼和狗的问题，泰马斯叔叔，"我开始解释，但是我的话被彼特鲁塞维茨的助手贾诺斯·福蒂打断了。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在有可能撤退的时候撤退，也许是最明智的。不过，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撤退等于自杀。我们曾对下喀尔巴阡山的人民起过誓，我们将保卫从贵族那里夺得的土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我们违背誓言，我们不仅办不成事情，而且将玷污我们的理想——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我们没有权利那样做！"

"别再讲啦，"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反对我们再争论下去，"眼前，我们只该谈防御刚来的罗马尼亚军队。我和摩根斯特恩来组织。我们要继续进攻精疲力尽的捷克人。福蒂领导进攻，艾舍和格查跟他去。"

总参谋部在纳梅尼教堂所在的土墩上召开的讨论会结束了。总参谋部的人员中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当时有一支新的部队在法国军官的指挥下，已经从贝雷萨斯开赴塔巴和纳梅尼，前来支援捷克人。

在发起进攻的红卫军的前头，响起了老泰马斯·艾舍刺耳的嗓音：

"冲啊，乞丐们，生虱子的乞丐们，污秽的乞丐们；冲啊，亲爱的弟兄们，狠狠地揍那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

长头发的罗斯人，络腮胡子的犹太人，大胡髭的匈牙利雇农以及伐木工人，嘶哑地呐喊着冲向敌人。白头发的泰马斯·艾舍，高举着一面大红旗在前面飞奔。

雷雨在九点钟停了。在蒂萨河对面，远远地还偶尔响起一声雷鸣。天空的云黑得象煤烟。胜利者在村子中央燃起了巨大的篝火。捷克和罗马尼亚的士兵拿着火炬来回走动着，收集他

们自己的伤员，用枪托把红卫军的伤员打死。来了一支卫生队，随同而来的有纳梅尼和塔巴的富农。他们得到总司令帕里斯将军私人准许，来尽他们爱国的责任了。

富农们一心想活捉他们仇恨的人。富农们要看着他们被处死。他们决定要把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贾诺斯·福蒂，伊格纳斯·摩根斯特恩、格查·巴林特，以及他们最痛恨的前塔巴村长泰马斯·艾舍折磨死。

他们首先找到了艾舍的尸体。这个老农民已经体无完肤，可是他那双农民的粗糙的大手，依然紧握着那根已被扯去红旗的旗杆。雨水落在他那长及肩膀的白发上，洗去了凝结的鲜血。头发可以证实死者确是这个勇敢的战士。摩根斯特恩的尸体躺在离艾舍不远的地方。这个蒙卡契的裁缝，是叫一把刺刀戳死的。富农们继续搜寻其余的人，一直搜到午夜毫无结果才罢休。

雷雨过去时，我躲在村子尽头的一个柳树林里，我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火柴，企图擦亮潮湿的火柴棍，照一照一动不动地躺在灌木下泥泞地上的同伴的脸，可是擦了几分钟，还是擦不着。潮湿的火柴不能生火，我只好厌烦地丢掉了火柴盒。我在黑暗中摸索，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福蒂的胸口上。我知道贾诺斯·福蒂是叫五颗子弹打死的。第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手臂，当时他因为艾舍倒在地上了，他正俯在艾舍身上。福蒂只是咬着嘴唇，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

“冲啊！冲啊！”

第二颗子弹打中他的膝盖，使他一头向前扑了下去。他痛得喊了起来，没有叫他的妈，而是叫出了艾舍在狂怒中喊出的那些话：“冲啊，乞丐们，生虱子的乞丐们，污秽的乞丐们……”

这时，红卫军的战线已经崩溃，他们退下来了，还在继续战斗，不过现在每个人都已自己顾自己了。

我未能制止退却，便落在别人之后了。我双臂抱着福蒂，他的叫声已经停止。他的口中流着鲜血。一块榴霰弹碎片打穿了他的肺部。

我在那重担的压力下，摇摇晃晃地走着，终于到了纳梅尼郊外最末一所房子里。这时，撤退的红卫军快到蒂萨河边了。只留下了一个孤零零的、精疲力尽的连队来保卫村庄，抵抗罗马尼亚步兵的刺刀。

若不是捷克部队用机枪射击纳梅尼村，罗马尼亚人早把红卫军肃清了，因为机枪的火力反而阻止了罗马尼亚人前进，使那个伤亡惨重的连队得以保卫村子，直到垮了的红卫军得以乘上木筏。

"到蒂萨河去，"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站在一株断了的白杨树旁向我叫道。他在那儿指挥防御。

"水，"福蒂喘息着。

我一步步来到了一所屋顶还完整的农民的大房子前面。这所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熟悉。

"水！给我们喝点水！"

"那边有的是水，"一个年轻女人，从一株枝叶茂密的桑树背后出来，指着蒂萨河，大声对我说。

一刹那间，我和那个女人对看了一眼。我们彼此都认出来了，或者，也许是猜出来了，我们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十二年前，我曾来过这所房子，这是村长华拉第的家。

"给我一杯水，伊洛娜！"

"蒂萨河里有的是水。你可以跳到河里去嘛。博德里，"伊

洛娜·华拉第命令一只高大的牧羊狗，“咬他。”

我拖着将死的福蒂，慢慢走开了。当我到了柳树林的时候，我把他放在地上。福蒂的喉咙里响着临终的格格声，令人难以置信地瞪着一双眼睛，凝视着远方。我把右手放在这位垂死的人的额上，轻轻地阖上了那双令人敬畏的眼睛。

“他死了！”

最后一只木筏离开了河岸。

我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柳林边。从我站着的地方，我看得见在村子中央教堂旁的广场上燃烧着的篝火。

火光照耀着捷克军人的制服，他们正在做晚饭。几个罗马尼亚宪兵手执火炬正向柳树林走来。

我回到死人躺着的地方，我俯在贾诺斯·福蒂的身上，用手向后抚摸他的湿漉漉的头发，吻了他冷冰冰的前额，然后，在树丛的掩护下，我轻轻地溜到蒂萨河边，踢脱了我的破靴子，在第一个罗马尼亚士兵到了柳林边的树丛时，小心地跨进了蒂萨河。

河水结成的浮冰，边缘锋利如刀。我本能地向岸边倒退了一步；接着，我一咬嘴唇，纵身跳进了河里。我把脸一直浸在水中。我很自负地、有节奏地游着，每划四下才露出头来呼吸一次。

福蒂，泰马斯·艾舍，米科拉，伊洛娜·华拉第……下午和晚上的流血事件，和过去十二年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穿短裤的孩子，坐在桑树底下，吃着青杏子，向穿着红袜子的伊洛娜·华拉第倾吐山盟海誓。

我浑身冻得麻木了，牙齿格格作响。

“你要死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不想死，”我喊道，“不！

不！”

我翻过身来仰游。现在，我只用一只手，一只脚，或者用头活动活动，就顺流而下，离开了敌人占领的纳梅尼。

头上的云渐渐淡了，在薄雾残云中，星星出现了。

我的脚冷得痉挛起来。我喷了一下鼻子，把涌进嘴里的一口水吐了出来。月亮高高地挂着，闪耀着比水还冷的光芒。

“我无论如何要死在这儿了，有这样多的——”

正在这当儿，我已到岸了。不知不觉地，流水已把我冲到河的对岸。挂在水上的柳枝拂着我的脸，我本能地抓住柳枝，用双手拼命紧握着，把自己拉到岸上。我手脚并用，从河边爬了几码路，倒在一株柳树旁边。几分钟之后，我就睡熟了。

等我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地升入中天。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想不起我是怎样到这儿的，或者我在何处丢掉了我的武器，我的靴子……接着，记忆象潮水般涌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的衣服还是湿漉漉的，但我并不感到寒冷。我刚才躺下去睡的时候，土地还很潮湿，此刻已经干了。天空是一片耀眼的蓝色。

“我饿极了！要是有支烟抽抽该多好哇。”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岸。我极目远眺，希望能看见纳梅尼，但怎么也看不见。蒂萨河已经把我卷得离那个村子很远。在右边，东北方向，我与其说是辨认出来，不如说是感觉到了：那是薄雾弥漫的贝雷萨斯群山。

这边河岸也有一个村子，我下了个决心，向这村子走去。

我来到村子边上第一家房子边，见一个老太婆正在围着篱笆的院子里忙着，就过去问她：

“告诉我，老奶奶，村里是白军还是红军？”

“匈牙利人，”老妇人想了一想，回答道。

“我问是红军还是白军？”

“匈牙利人。他们是夜里从布达佩斯来的。”

“布达佩斯来的？教区办公厅在哪里？”

老太婆用头指指方向，我就大胆地向村中心走去。我走了没有多远，就被一个红军巡逻兵阻止了。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要找司令员或者政委。”

“管你要不要，你会找到他们的，”巡逻队长回答，说的是低地人的方言。他是一个匈牙利农民，嘴上留着灰色小胡子。“你他妈的是谁，这一身打扮，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你莫不是个逃兵？”

“我是罗斯红卫军的政委。”

“如果你的身份证上有同样的记载，那你就是了。”

“我没有身份证。”

“我也这样想。好吧，孩子们，把这个口说无凭的委员带走。你可别想逃跑，因为……”

“给我一支烟。”

“可以给你一支，还可以给你火。不过，如果你想逃跑，那就要让你尝尝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火了。”巡逻队长说，用大拇指指指挂在肩上的枪。

巡逻兵把我押到红军的团长那儿，原来就是约瑟夫·列普泰克，维佩斯的装配工。

“你准会长寿，格查，”我们拥抱之后，列普泰克笑着说，“我不仅希望你长寿，而且我能保证你长寿。你晓得，俗话说：‘传说

死了，百岁到老'，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有十个同志都说他们看见你死了。"

"许多罗斯红卫军都过了蒂萨河吧？"

"一个连的三分之一还差一点。逃出来的人都在马蒂沙尔卡，离我们这里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他们派我们来支援你们。我们急忙赶来，但还是太迟了。今天我们在期待新的增援，然后我们才能反攻。我们不久将要去喀尔巴阡山。但是首先你得吃点东西。喂！米哈里大叔！来一锅菜炖牛肉——这一次就让禁酒令见鬼去吧！——给巴林特同志一罐葡萄酒。吃了，喝了，然后我们穿上衣服，骑马到马蒂沙尔卡去。今天晚上六点钟，罗斯同志们要庆祝五一节。"

"今天是五一？"我问道，叹了一口气，"我完全忘了。"

面对我的不幸，尽管我想竭力保持我的男子气概和军人的坚毅，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曾想重新组织红卫军，但是我估计错了。下午，我们正准备动身去参加罗斯人安排的庆祝五一活动，我突然闹病了。他们给我量了体温——摄氏三十九度。到傍晚，我的体温更高了，多高我已说不上来，因为我已经神志昏迷。直到八天之后，我才在维佩斯的卡罗莱医院里清醒过来，认识了周围的事物。

六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出了院。当天下午，挂着红白绿三色旗的军舰，从多瑙河上炮轰红色的维佩斯①，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第一线的恩德列·卡尔曼老人旁边。

"喂，喂，格查，"卡尔曼在短短的间歇中说，"你选个比较和平、比较有利的思想不是更好吗？"

---

① 见本书第二四六页注。

“生活比我梦想的还好，”我答道，痛苦地保持着当前的气氛和我的情绪。

“唔。”

卡尔曼用一块过于花哨的方格手帕擦掉了额上的汗珠。

“如果上帝显身了，来问你：‘巴林特同志，你有什么愿望？’那你要求他什么呢？”

“要一杯冷水。”

我果然得到一杯冷水，但不是全能的上帝给的。厄莎·卡尔曼提着一大壶水，沿着前线过来，把它给了我。用这壶水让我们解了渴后，她为了亲自试一试，就抓起一支枪，砰砰放了起来。

她当即在我身边倒下了。她没有受苦。三颗机枪子弹打穿她的前额，转瞬之间她就死了。

一小时之后，我又回到卡罗莱医院。医生立刻动手术，从我左肩上取出了两颗子弹。

我出院那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了，这给我的一生添加了最后一点悲喜剧色彩。

躲藏了三个星期后，我乘火车，乘农村马车，加上徒步走路，来到了维也纳。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纳梅尼战斗的结果已成定局之后，桑邦伯爵的管家萨鲍尔奇·卡瓦西，获准在捷克和罗马尼亚士兵的陪同下让塔巴和纳梅尼的农民去清理战场。过去几年的骚乱事件，使卡瓦西恢复了活力。他由于放荡的生活和太多的女人，虽然还不足四十五岁，却老得很快。他患有心脏衰弱和严重的痛风症，常常卧床不起，大家都把他看作老头儿。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下喀尔巴阡山的人民驱逐了村子里的市镇官员和警察，卡瓦西躲到蒙卡契去了，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后来，一九一九年二月，一个波兰军团经由维列克隘口，来到下喀尔巴阡山为波兰征服罗斯，卡瓦西这才从隐居处出来。他是把波兰人赶回加里西亚的志愿军的组织者之一。从那以后，他就和住在蒙卡契和贝雷萨斯的旧官员保持联系。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布达佩斯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贾诺斯·福蒂，泰马斯·艾舍，伊格纳斯·摩根斯特恩和格查·巴林特等组织了下喀尔巴阡山罗斯红卫军，卡瓦西就名副其实地转入了地下，他在纳梅尼村长华拉第家的地下室里安置了住处。他和从内部策划反革命的旧官员保持联系，从卡沙向东推进的捷克人以及马拉马罗斯西面的罗马尼亚部队和他也都有来往。他以“匈牙利爱国者”的名义请求这些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四月三十日晚上，他用蹩脚的法语欢迎进入纳梅尼的帕里斯将军。那个晚上，

他宴请捷克和罗马尼亚军官，到了半夜，也是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命令纳梅尼的姑娘都到教堂里去，当时教堂已充当军官们的食堂了。

帕里斯将军下达了一项命令，准许农民行凶杀人。但是农民们却有个相反的计划，他们打算活捉“五个赤匪”，“折磨他们，好让全世界知道所有的红狗会落个怎样的下场！”他们要让人们记住这个教训。

于是他们就点火去照每一个伤亡者的脸。“这是一个，”他们说，“这又是一个。”

这些人是被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杀死的。

他们找到“四个赤匪”中的三个的尸体。有一个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还是活的。他们要找第五个，没有找到。

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已失去知觉，三个伤口流着血。他躺在蒂萨河岸上，头和躯干搁在河滩上，脚浸在拍岸的水里。使纳梅尼和塔巴的农民们高兴的是，他还在呼吸。当罗马尼亚人看出了农民们打算救活这个红军的时候，一个罗马尼亚宪兵对纳梅尼的农民汤巴重重地踢了一脚，汤巴仰面倒下了。

“停！”汤巴用德语吼道。

一个捷克兵已经用枪瞄准伤员的脑袋；他象汤巴一样，在奥地利军队中待过四年。他听到这句用德语喊出的命令，本能地作出了反应。汤巴在他的这个魔法失灵以前，马上爬了起来，取出他的有穗的烟袋，递给了那个罗马尼亚人。另外三个农民也献出他们的烟袋来救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的命。

到第二天早晨，所有的死者都处理掉了。脱掉鞋子，剥去衣服，尸体一个接着一个地抛进了蒂萨河。这个办法使捷克兵和罗马尼亚兵在一小时中“埋葬”了二千一百二十九个红卫军

人。黎明时，打死的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都葬在公墓里。根据帕里斯将军的命令，兵士们象疯子似的完成了这一工作。

暴风雨之夜过去后，出现了一个美丽的五月之晨。事实证明，捷克兵杀害伤员、埋葬尸体是干得非常迅速的。翌日凌晨，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忙于修饰被摧毁的村庄。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的特别命令，法国的三色旗与捷克国旗和红旗并排挂在木屋上面。

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图萨，在派遣捷克和斯洛伐克部队去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宣布这场战争是“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反对“东方的”布尔什维主义。捷克政府为了维护这一观点，命令它的“为国家，为真正民主而战的军队”去“庆祝国际团结的节日”—— 五一节。鼓动家们到了前线。

“出了油锅，又进火坑，”塔巴和纳梅尼的农民叹着气说，他们看见捷克兵手中拿着红旗，都破口大骂。

华拉第村长的房子却象奇迹一般完整无恙，受伤的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就关在这间房子里。村长亲手把红旗从他房子上扯了下来。捷克兵把这个骂人的老农民抓起来，关在谷仓里。

伊洛娜·华拉第急急跑到卡瓦西那里。伯爵的管家拧了拧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但是拒绝为华拉第向捷克人去求情。

“那么在捷克人下面也是一样了？也是一样？难道捷克人是不信神的、抢东西的布尔什维克？”伊洛娜·华拉第尖声叫道。

“别谈政治，姑娘，尤其是，你不要叫，你的父亲太傻了，应该受到惩罚。”

“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卡瓦西打断她说，“一个法国将军命令把

红旗挂出来，我就向它脱帽致敬嘛。我想其他的人也都一样。”

在华拉第的房子里看守米科拉的农民们，从伊洛娜的口里知道了卡瓦西说的话，他们都很气恼伯爵的管家和捷克人，以至想一下子把他们的囚犯打死。汤巴又插了手，来营救米科拉了。

“停！”汤巴吼道，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了地板上的伤员。“如果我们出了油锅又进了火坑，”他指点他的同伴说，“那我们就必须象保护眼珠一样，保卫这个恶棍才是啊。他会做我们的代言人的。而且，照我看，要说卡瓦西管家尊敬这种红旗，那是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红旗……”

“我知道了，”当过四年担架兵的农民西蒙西斯拍拍前额喊道，“你不用再说了。他们害怕真正的斑疹伤寒，那是要死的，因此他们让士兵注射一种无害的斑疹伤寒疫苗，保护他们免受真正的感染。这里的红旗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把这种红旗交给士兵，免得他们去追求真正的红旗——”

“对了，”汤巴喊道，“让我们为此喝一杯吧。至于这个魔鬼，”他指指米科拉，“我将亲自把他挂到一杆红旗上去。”

“首先，我们要把他稍稍折磨一下，”西蒙西斯说。

“喝吧，弟兄们！”

这几个富农喝着酒，唱着：

他们用一根大棒
去打那法官，
要把他打得
一命归天……

罗马尼亚人在蒂萨河岸筑起了壕沟，时不时用机枪向对岸红军的前哨扫射几下。罗马尼亚人开枪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对

敌人毫无威胁。红军没有还击；他们节省弹药。

帕里斯将军勉强地发布了庆祝五一的命令。

“这种玩艺儿，从军事观点看来是愚蠢的；从政治上说，是完全令人作呕的，”他发牢骚说。

帕里斯将军根本不把捷克总理图萨放在心上。当一位上校提到总理的命令时，帕里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我一点也不怀疑图萨总理有权发布命令，他下命令，谁需要，谁就服从呗。我可不需要。我曾在摩洛哥服过役。摩洛哥的苏丹也有权发布命令。你去问问他，谁服从他的命令。”

在纳梅尼庆祝五一节，全靠欧内斯特·西德拉赛克。是西德拉赛克骗取了帕里斯的同意。他和帕里斯谈了三十分钟以后，比捷克共和国中任何人都能左右帕里斯了。西德拉赛克是捷克人，不是法国人。他不是一个兵，而是一个啤酒商人。他总是不忘记强调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绅士，红头发，狮子鼻，多少有点大腹便便。他的衣服上总带有一股啤酒和烟草味儿。

西德拉赛克一九一〇年参加商业雇员联合会布尔诺分会，一九一二年当上了分会的秘书，并且当上了联合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个优秀的鼓动家和老练的策略家。他引起了商业雇员联合会主席克莱恩的妒忌，因此，当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军事部长准许联合会中必要的领导人免服兵役，克莱恩忘记了把西德拉赛克的名字列入免役的名单之内。西德拉赛克应征入伍了，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卫生列车的班长。

在战争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共和国，几个右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当了部长，可是这位班长复员以后，却被人遗忘了。于是西德拉赛克动辄就批评“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以迫

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注意他这个人。他的妻子，在战时做食品生意攒了点钱，曾警告过她的丈夫，可是不起作用。

“你何必去骂你的同志们，他们比你精明得多，何不向他们讨一个赚钱的差使？”

西德拉赛克可不屑去趋奉他的部长朋友们，反而开始煽动人反对他们。他的盘算很好。他们要他到布拉格去了。克莱恩象父亲似的跟他谈话。西德拉赛克提起他过去在卫生列车上度过的岁月，装得象个战斗兵一样。当克莱恩问他为什么不把他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成立的共和国时，西德拉赛克对他说：

“我没有心情在布拉格城里大摇大摆，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指望我的军刀出力。”

“你要一个军事上的职业？”克莱恩惊异地问。

“我至少还是个内行。”

西德拉赛克希望克莱恩收买他，给他一个能够有点作为的位置，如军需部或者军运部。可是他给了他一个不很愉快的职位：在一支与罗斯红卫军作战的军队中担任鼓动专员。

西德拉赛克知道克莱恩的居心何在。

“如果我拒绝去，他会对每一个人说，我是个胆小鬼。如果我去了，鼓动人反对布尔什维克，那就有损自己与左翼的关系。”

他对这件事考虑了一阵子，决定就任。这件事激起了他的战斗的怒火，他要痛痛快快地打败他的朋友克莱恩。克莱恩在和他分手时，给了他严肃的忠告，并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把他介绍给帕里斯将军。西德拉赛克在动身之前，搜集了关于法国将军生平的详细情报。要得到满意的情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布拉格的银行，自从帕里斯将军到布拉格以后，立刻就从他那里得到了殷实有利的生意，自然对这位将军的经历是很感兴趣的。

路易斯-菲利普·帕里斯，法兰西共和军的将军，荣誉军团的骑士，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生于科西嘉岛的首府阿维克修。他喜欢说，他和拿破仑一世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上。路易斯-菲利普的父亲查尔斯-菲利普·帕里斯，是一个海关高级官员。他由于难以查证的巧妙的贪污行径受到惩戒而被撤职。后来他迁往土伦，享受他那罪恶的果实：不受干扰的富裕生活、社会地位以及财富带来的声望。他把自己活泼强壮的独生子路易斯-菲利普，送到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在这个学校从一个孩子变成炮兵军官的。路易斯在军校毕业时成绩还过得去，毕业后他在马赛的一个炮兵团服役两年，又在凡尔登一个团里服役四年，然后参加非洲的外国军团。在那里，他被提升为大尉，后来又晋级少校。若不是几家巴黎的报纸吵吵嚷嚷，宣称这位帕里斯少校把七名犯了小小军规的外国军团的士兵鞭打致死，此外还禁闭了二名法国军士的话，他迟早会当上外国军团的司令官的。他以撤职少校的身份回到了巴黎。他把父亲的遗产花在香槟酒、女人和其他世俗的奢侈品上。他挥霍完了他的财产以后，就债台高筑了。等到他借贷无门的时候，他和一位养尊处优的寡妇结了婚。她是凯劳克斯总理夫人的侄女，年纪比他大五岁。凭着这层关系，路易斯-菲利普·帕里斯又以中校的军衔重新回到了法兰西军队里，在陆军部分配了一个职位。

这位中校用他老婆的钱到证券市场搞投机，到手的钱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还积了很大一笔财产。于是他就和他老婆离婚了。这无损于他的前程；事实上，这是对他有利的，因为在这当儿，凯劳克斯总理已经下台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这位中校多少对欢乐的生活厌倦了，想起了他是生在拿破仑故乡的，他请求到前线服役。他在后勤部队

混了四个月以后，回到首都，进入陆军部宣传司工作。当克里孟梭总理指控前总理凯劳克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从而以叛国罪把他交付审判时，帕里斯提供的证词是足以给他从前的亲戚和保护人定罪的。这件事使他获得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以将军衔当上了法军某后勤部队的委员。

一九一九年三月底，法国外交部派帕里斯将军到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去，受该国政府支配。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战争。帕里斯四月一日到布拉格，四月十三日到卡沙（东斯洛伐克）。四月十九日，他指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和罗斯红卫军作战。

西德拉赛克怀着对他的党的切齿仇恨来到了蒙卡契。他一到那里，就去找总司令部。但是帕里斯已经把司令部移到贝雷萨斯了，于是西德拉赛克不得不上那儿去一趟。

总参谋部已经征用了匈牙利旅馆，西德拉赛克只得在比较简朴的狮子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帕里斯请求接见，并封入了一封克莱恩给他的介绍信。他在等待回音的时候，整天待在狮子旅馆的咖啡室里，抽烟，喝啤酒和浓咖啡。出于长期的习惯，他总要把调咖啡的两块糖藏起一块放在背心的口袋里。但是他空等了，帕里斯没有回答。

这间咖啡室，一个星期以前还是供匈牙利苏维埃儿童服装分配中心使用的，现在聚集着吵吵闹闹的贝雷萨斯中产阶级的公民们。每一个住在贝雷萨斯的人，喝了两三瓶葡萄酒之后，就会回想起红军曾经打算把他们吊死的情况。五瓶葡萄酒喝了四瓶以后，每个人都发誓说，如果在关键时刻白军没有赶到，他已经站在绞架下面了……药剂师拉约什·基斯勃喝完了六瓶加白

兰地的葡萄酒，跳到台子上，捶胸高叫：

“狗娘养的，不但想要吊死我——而且他们已经干了，我在绳子上吊了五个小时，整整五个小时……”

西德拉赛克对于帕里斯迟迟不作回答，渐渐地有点不耐烦了，每隔一分钟都要看一看他的表。总是不见回答，他一杯接着一杯地喝啤酒。在这批喧闹的喝葡萄酒的人群中，这个默不作声的人，喝完了啤酒，来回踱着。气氛显得非常不协调，结果，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招来了怀疑和敌意。

药剂师基斯勃——就是在绳子上被吊过五个小时的那个人——第一个和他争吵了起来。

“如果你喝啤酒是因为你买不起葡萄酒，”基斯勃脚步不稳地站在西德拉赛克的台子边，嘲笑说，“那么你就找我帮忙，告诉我，亲爱的先生，漂亮可爱的、仁慈的先生，我恭恭敬敬地求你……”

基斯勃摇摇晃晃地向西德拉赛克的台子上歪了下去。在倒下去时，他的手缠住了台布；把台布连同两只啤酒杯、各种咖啡杯和一只满满的烟灰缸都拖下去了。

“他在谋杀拉约什，这只喝啤酒的猪。匈牙利人！救救拉约什！”

狮子旅馆的老板在窗外喊道：“巡逻兵！巡逻兵！”

捷克的巡逻兵立刻进来了，但为时已晚。西德拉赛克头上受了两处伤，大量流血。喝葡萄酒的匈牙利人把啤酒壶打到红头发捷克人的头上。

大约有二十个匈牙利人作为“布尔什维克嫌疑犯”被巡逻兵捉进了军人监狱。西德拉赛克被送到了军医院，经诊断，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一个军医用绷带把他的头包起来，使他显得格外

英勇。

帕里斯将军分别打电报给法国和捷克政府，报告他平定了“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他在报告中说，一个捷克人“单枪匹马地和大约一百个武装的赤匪作战”，然后他召见了那个捷克人。

等到将军知道这个受伤的人，就是曾经写信要求接见的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心里就不太高兴，那封信早被他扯掉了，他说，“我们这里正好需要一只多嘴的猪。”西德拉赛克没花多少工夫就消除了将军对鼓动家的反感。他和帕里斯谈了半个小时，帕里斯就明白了：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想当独裁者或者皇帝的将军，可先得和左翼搞好关系。另一方面，西德拉赛克也意识到了，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所作为，就得亲近法国人。

帕里斯将军任命西德拉赛克为他的“政治顾问”，并且决心要做一个将来的人民之友。西德拉赛克穿上了步兵制服和一双装有靴刺的骑兵靴。他翻领上的红玫瑰徽章，使世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他包绷带的头，等于宣布他不是为布拉格报社进行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在纳梅尼战斗的时候，他在贝雷萨斯，五月一日黎明，他又从贝雷萨斯到了纳梅尼。自然，他是庆祝五一节的主要演说人。

西德拉赛克和帕里斯站在纳梅尼教堂所在的山丘上，西德拉赛克站在将军的左边。当那位将军把戴白手套的手举到金饰的帽边上向游行者致意时，西德拉赛克脱下了帽子，挥动着向群众致敬，同时喊道：

“伟大的兄弟盟邦，民主法兰西万岁！”

“万岁！万岁！”

在游行队伍前列，大步走着一个手擎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的结实的军士，一个拿着一面捷克三色旗的排长和一个高举着

一面装饰着花朵的红旗的班长。随后是乐队，奏着《马赛曲》，接着是八人并排，共三个连的捷克军。纳梅尼的农民们零乱地跟在后面，他们都换下了平时的破裤子和后跟磨损的鞋子，穿上了靴子、蓝裤子和钮扣亮晶晶的背心，大摇大摆地走着。

教堂前面的广场上，有一个临时搭就的讲台，装饰着法国和捷克的三色旗和红旗。士兵们围着讲台，形成了一个正方的四边形。

纳梅尼的农民们和一大群孩子，站在士兵后面听西德拉赛克用捷克话演说。他们连一个字也不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否认这个"波希米亚人"①的肺部很发达，因为他的嗓音实在洪亮。

士兵们显然很喜欢他讲的话。值班中尉做了个手势，排成四方形的三个连的士兵，爆发出一声万岁，使整个贝雷萨斯都听得一清二楚。西德拉赛克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演说时，即使是罗马尼亚的机枪格格声也不能把他的话压倒。

一个年轻的少尉，直挺挺地立正站在讲台上，把西德拉赛克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以三分钟的时间，十分明快地译成了斯洛伐克话。在斯洛伐克少尉翻译完毕以后，桑邦伯爵的管家作了一番演说。

卡瓦西不象西德拉赛克是个演说家，也不象斯洛伐克少尉是个军人，不过他却说得一样好。

"不论是瓦拉几亚②人，波希米亚人或匈牙利人，只要他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就是我们的弟兄，"他说。

纳梅尼的农民都喜欢那个声明。他们赞成卡瓦西对于新秩序的远见。使他们惊讶的是卡瓦西也象称呼听众一样自称为斯

---

① 波希米亚是捷克的一个地区。
② 罗马尼亚南部一个地区。

洛伐克农民。

“斯洛伐克，我的宝贝，”西蒙西斯轻轻对站在旁边的汤巴说。

“你的宝贝首先是斯洛伐克，然后才是你自己，”汤巴回答，“现在轮到我们了。卡瓦西自称是斯洛伐克人，不是平白无故的。一个精明的人为了钱，连大粪都会吃。不过，他仍是一个匈牙利人。”

卡瓦西演说之后，又奏起了《马赛曲》，这场官方的庆祝仪式结束了。接着，开始了一般的娱乐活动。

捷克兵表演了体操，观众都不感兴趣。于是，下一个节目显得好一点了。一个班长，他在入伍前是一个巡回马戏团的演员，要了一个鸡蛋；他当着观众的面把鸡蛋吞下去，然后从一个捷克兵的鼻子里取了出来。班长吞了五次鸡蛋，五次都把它们变了出来。但是他们要他表演第六次，他怎么也不肯，他说，他已经吃得太饱，再也吞不下去了。

“如果所有的捷克人都象这个家伙一样，”西蒙西斯说，“那么在捷克的统治下鸡蛋就会便宜了。一个鸡蛋他吞了五次——你想想！”

仅仅这个想法就使他十分悲伤，以致那个捷克马戏团艺人所表演的最有趣的玩艺儿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

在捷克人表演了他们的才能以后，他们就要求匈牙利人来显一显身手。这是全体农民所等待着的！

“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汤巴自信地说，“我们搞到一个布尔什维克，关在华拉第村长家里。”他继续说，“我们把他带到这里来，把他活活剥皮，教训教训人民。”

汤巴这番夸耀的话，由一个说匈牙利话的斯洛伐克兵士翻

译成了捷克话。

“匈牙利人看守着的是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西德拉赛克问。他留下来看大家的娱乐表演，希望能接近群众。

“一个红卫军伤员，”汤巴告诉他。

“他不是普通的红军，”西蒙西斯脱口而出，“他是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罗斯红卫军司令。”

西德拉赛克侧起了耳朵。嘿！一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的脑海里立刻闪现了一百种计划。怎样把这个俘虏变做无价之宝？也许，进行一次轰动的审判，或者来一下赦免的动人表演？哪一样最有利？——那是说，对西德拉赛克！他的结论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俘虏一定大可利用。

西德拉赛克借翻译的帮助，打算说服农民们把俘虏交付军事当局。可他的花言巧语全都是白费唇舌。这一切，只落得西蒙西斯用肘碰碰汤巴的肋骨，嘲笑说：“你瞧，我的话不错吧。出了油锅，又进火坑了！”

西德拉赛克求助于帕里斯将军了。将军派了一个军士和四个士兵到华拉第村长家里。汤巴和军士争论起来了，他提出要求，如果他们一定要带走他们的俘虏，必须归还那天晚上农民们为交换米科拉所付出的烟草。这位捷克军士对匈牙利话一个字也听不懂，因此他推想匈牙利人是要找麻烦，就飞起一脚，踢得汤巴翻了一个筋斗。

汤巴费劲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个纳梅尼农民对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翻筋斗，最好在教堂广场上表演一下。”

这时捷克兵已经把米科拉放在一张担架上了。帕里斯命令一个团里的军医，把这个著名俘虏的伤洗一洗，包扎一下。

“他的伤是危险的，但不一定致命，”军医向将军报告说，“经

过良好的护理，这病人多半能够恢复。”

西德拉赛克对将军说明了他要利用这个俘虏的各种想法。将军最喜欢举行轰动性审讯的主意，就把这个意思告诉西德拉赛克。但是他没有提到：在法庭判处布尔什维克将军死刑以后，到了他或者被选为总统，或者宣布为罗斯独裁者那一天，他——帕里斯——将同意赦免他打败的敌人。他不能确定，但他听说过，不知是凯撒，还是拿破仑，或者是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

帕里斯用他那一辆飘扬着法国国旗的私人轿车，把伤员送到贝雷萨斯医院。西德拉赛克急于到布拉格去招摇一番他的包扎的头，也钻进同一辆汽车到贝雷萨斯去了。

帕里斯将军叫护送伤员的人带给贝雷萨斯医院院长一件“公文”，威胁他说，如果不把伤员治好，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

全罗斯民族大会

纳梅尼战斗之后，我不是奔跑，而是游泳，离开了我的故乡。在我回家那天以前我上哪里去了，我干了什么，我逃过了什么，这我在下面再讲。我的目的不是叙述我个人的经历，而是记载祖国命运的变化。因此，我必须把我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件报道出来。要描写这些事件可不容易。不会有两个活着的人对这些事件作出同样的描绘。每一个权威，都能证明所有其他的参考书籍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满篇皆是蓄意伪造。我羡慕未来的历史学家，他将抱怨缺乏当代的参考资料。我拥有十七位目击者的亲笔叙述，我重复一下，其中没有一个说法是这些资料的作者全都同意的。且让我们举一个次要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为例，看看这十七个人是怎样描写帕里斯将军的吧。

八个目击者说，帕里斯是高个子；五个目击者坚持说，他是中等身材。还有四个看到他矮得引人注目。按照六个目击者的说法，帕里斯的头发又长又浓。七个人写的资料则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四个人指出他是个秃子。至于他的头发的颜色，有八种分歧的意见可供你挑选。

六个目击者断定，帕里斯这个人，只要抓得到手的东西，他都要偷。十一个目击者坚持说，他只偷贵重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可就不能老着脸皮说下述的回忆录是属于我的了。我还是根据目击者的口头回忆来写这段历史吧。这

些回忆，在各个细节上并不是一致的，但听了以后，我可以把事情重新组织，判断故事中的矛盾，并加以调整。

我描写的“全罗斯民族大会”是根据费克斯凯叔叔转述的。当我回到下喀尔巴阡山的时候，我遇到了独臂的费克斯凯，他是我父亲从前的朋友，我童年时的保护人。以后我会回头来谈我是什么时候，是如何和为什么回到下喀尔巴阡山这个问题的，但是此刻，我必须说明一下，为什么费克斯凯叔叔来找我。

我刚回到蒙卡契几个小时，就来了一位客人。费克斯凯叔叔来看望我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打扮真是完美无缺：格子裤子，一双黄色浅口鞋，黑茄克，一根紫色领带和一顶黑礼帽——当时一般都叫宽边毡帽。手里拿一根又粗又沉的手杖。

“格查，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对我们亲爱的死者默默怀念了几分钟。

“喂，你看我的制服怎么样？”费克斯凯叔叔问我，打断了回忆的感伤气氛。

“什么制服？”

“你没有看见我穿的什么吗？格查，格查，你的眼睛到哪里去了？你住在什么地方？在月球上？你认不出来这是秘密警察的制服吗？”

费克斯凯叔叔是帕里斯将军的秘密警察的侦查员。

“我是来骗取你的信任，暗中监视你的。我奉命来侦查你到底是俄国红军还是匈牙利白军的代理人，或者，也许你是罗斯民族主义者，一个波兰间谍，罗马尼亚的代理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的分裂主义者！我的孩子，现在你明白了吧，花样繁多，罪名可以随你挑选！”

“真是乱七八糟，”我冷冷地评论说。

“他们付钱的，格查，付钱的！如果我证明你是匈牙利的代理人，他们会给我法国法郎；如果你是个俄国的代理人，我还能得到更好的硬币。”

我们草拟了费克斯凯叔叔给警察局长的一份关于他前来访我的报告，我的客人便坐下来喝葡萄酒，一面给我讲了有关全罗斯民族大会的情况。

比尔逊的牙医生诺瓦克是团部的预备军医，又是贝雷萨斯军人监狱医院院长。他接到帕里斯将军的信，吓了一跳。难怪他要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帕里斯的习惯，对任何人他都要以送交军事法庭相威胁。不过诺瓦克医生即使知道这一情况，他也还是要担惊受怕的，因为正如威胁人是法国将军的天性一样，这位比尔逊的牙医生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诺瓦克医生一看到这封信，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他要是真上军事法庭，他准会痛哭流涕，坦白认罪。他会承认他贪污了二万一千七百克朗，这是医院伤病员的伙食和设备的经费；不过落入他腰包的却只有三分之一。贝雷萨斯卫戍司令得了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给了帕里斯将军的随从副官。他第二次仔细读了这封信后，就决定把这个危险的俘虏转移到昂格瓦去。他命令一个中尉医官给米科拉的伤口换上干净的包扎物。

诺瓦克从医院的现金中取出三千克朗，去拜访了卫戍司令，把司令应得的一千克朗交给了他。司令见钱眼开，情绪极佳。诺瓦克院长和司令对饮了几杯从病员的供应中克扣来的白兰地，在这过程中，诺瓦克使司令相信，把象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这样重要的战俘关在离前线这样近的地方是十分莽撞的，应该赶紧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才是。

这就是米科拉转到昂格瓦医院的原委。米科拉已经恢复知

觉，但是因为流血过多，还是极端衰弱。他在五月二日转到昂格瓦医院。帕里斯将军在同一天到了昂格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是到乌日哥罗德来创造世界历史的！"

这时，他们已经把昂格瓦这个城市称为"乌日哥罗德"了。

一个一万八千人口的城市，它的全部工业，是一个有一百二十名工人的砖厂，一个有九十二名工人的家具厂和一个有三十二个女人和孩子做工的纸袋厂。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乡下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了"下喀尔巴阡山罗斯"这个虽已在计划中但尚未被确认的自治区的首府。帕里斯赶到乌日哥罗德来创造的"世界历史"，就是来建立这个国家。

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马萨里克，在四月底对下喀尔巴阡山人民发布了一份公告：

> 亲爱的弟兄们，遵照民族自决的神圣原则，你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下喀尔巴阡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无权影响你们的决定。他们的责任是使你们的决定具有权威。

当马萨里克的公告贴在乌日哥罗德、蒙卡契和贝雷萨斯的房屋的墙上时，帕里斯将军收到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发来的一份电报：

> 无论如何，下喀尔巴阡山的领土必须并入捷克斯洛伐克。

帕里斯的第一个行动是指定新国家的首都。早些时候他想到的是位于全省中心的有三万人口的蒙卡契，但是他最后决定设在乌日哥罗德。乌日哥罗德的王冠旅馆的床比蒙卡契的星星旅馆的床要好得多，而且臭虫也少些。

因此，法国将军决定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乌日哥罗德

召开"全罗斯"民族代表大会。

"我怕,阁下,"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来乌日哥罗德的部长顾问利奇告诫帕里斯说,"我怕阁下规定的时间太早了。今天是五月二号了。在四号之前无论如何都来不及选举啊。"

"你说的是什么选举,先生?"帕里斯怒气冲冲地问。

"选举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

"谁告诉你,先生,代表必须选举?你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先生?"

"这是不言而喻的啊。"利奇反驳说。

"对于平民来说,也许是的;可是对于军人来说,当然就不对了。"帕里斯将军回答道,"看来,你不太懂得政治,顾问先生。"

利奇那个长雀斑的白脸一下子红了。

"我相信我的知识,"他嘶哑地说。

"你是个极端谦恭的人,"将军反唇相讥,接着微微一笑,继续说,"如果顾问、首席顾问、教授和主任教授都来参加最高司令部,我也不反对,但是请他们别来和我谈政治。顾问先生,请不要忘记,"将军说到这里,声音变硬了,"我在摩洛哥服役多年,依靠我的经验,我要会议明天召开也办得到。不过,我不想那样干,那是因为我要让我们开民族大会的那所中学全部打扫、装饰一下,而且我还要给你一点时间,准备一篇极出色的演说,因为你要主持大会开幕仪式。民族自决的权利……民主……持久和平……我相信你了解我了吧,顾问先生?"

当这两位先生握手道别时,利奇也微笑着。

帕里斯恭恭敬敬地送走利奇以后,就派人去请卡明斯基。卡明斯基这时已经成为乌日哥罗德的律师,充任将军的政治顾问。这位律师总是兴高采烈的,声音洪亮,法语说得极好。他在

大学期间，在法国住了一年。回来后创办了《昂格瓦周报》，支持亲法政策。一九一〇年，他竞选议员，但是只得到几张选票。一九一四年总动员那一天，他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被拘留。不久，他就成了拘留营里向营长告密的人。他希望他们赏识他的功绩而释放他。但是他作为密探的贡献太可宝贵了，以致拘留营长不能少他这个人。一九一七年夏天，该营长以贪污罪被捕，这样，卡明斯基才获得了释放。奥匈帝国瓦解以后，他大谈他在集中营度过的岁月，宣扬他的献身精神。他是喀尔巴阡山活着的风云人物。卡明斯基担任法国一家化学商行在下喀尔巴阡山的代理人。他凭借化学商行的介绍信，获得了帕里斯的好感。由于帕里斯的帮助，他为法国商行争取到了定货。

卡明斯基提议大地主艾莱克·贝斯基德为民族大会的主席，他自己和萨鲍尔奇·卡瓦西为副主席。在这两位先生来到之前，卡明斯基约略把这情况向将军作了报告。

“我不了解，贝斯基德是否真的和沙俄外交部有联系？”帕里斯将军打断了卡明斯基的报告，急切地问。

“我不知道，但是那无关紧要，”卡明斯基回答，“重要的是人们会想，他既然拥护大俄罗斯化，他就在下喀尔巴阡山代表沙皇帝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增加了他的威信。希望沙皇马上复位的人，都把贝斯基德看作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唔。”

“至于卡瓦西，他在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中是真正有功绩的。我想到报答他的贡献，任命他为副主席，对此他是有资格的。他精明而不危险，因为，如果他要追随独立政策，我们可以立刻控告他是匈牙利人。”

“唔，知道了。”

“真的，我忘记提了：贝斯基德是个慢性酒精中毒者，有点瘫痪，但是不至于妨碍他的工作。他刚刚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持久和平》。”

“是他亲自写的吗？”将军问道。

“不是不可能。”

“唔，知道了。”

因此，帕里斯想，许多有预见的法国智慧已经灌输到卡明斯基的头脑中了。好吧，一有机会，帕里斯就要让这位自命不凡的家伙知道，受法国雇用，可不会使一个人变成法国人。贝斯基德和卡瓦西同时来到了。

“如果阁下使俄国伏特加免税，那么，罗斯人民会把你当作圣徒，向你欢呼。”贝斯基德是一个灵巧矮小的人，经过介绍以后，他说。

帕里斯带着一种疑问的神气，向卡明斯基惊异地瞟了一眼。卡明斯基没有领会将军的眼色，却在贝斯基德背上打了一下。

“这事会办的，艾莱克，老兄，会办的！我们喝俄国伏特加、法国香槟酒、比尔逊啤酒、东京葡萄酒、牙买加罗姆酒和苏格兰威士忌。下喀尔巴阡山有朝一日将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

经过短短的讨论，罗斯的宪法草拟好了。民族大会包括一百二十个代表：其中一百十四个罗斯人，四个匈牙利人，两个犹太人。关于犹太人的问题还有过一点争论。卡明斯基坚持要十个犹太人；卡瓦西则一个也不要；帕里斯看到贝斯基德已经戴上眼镜，在草草地记他的笔记——他显然在准备一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长篇演说——就专断地结束了讨论。

“两个犹太人够了。”

“要保持亲犹太的人的好感，两个犹太代表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民族大会干出令人不能满意的事来，有人就要为此受过。”卡明斯基解释说。

足足有百分之五十的罗斯代表是希腊天主教的神父。四个匈牙利代表中有两个是大地主，第三个是牧师，第四个是卡瓦西。两个犹太人代表，其中一个是贝雷萨斯砖厂老板马诺·柯霍特，另一个是昂格瓦储蓄银行的行长莫尔·西波克。

“四号早晨六点钟，我到中学院子里来查点会议的代表，”帕里斯将军说着结束了讨论。

“我担心这里的交通条件，怕有许多代表要迟到。”卡明斯基说。

“一个也不会迟到的，”将军冷冷地说。

现在是早晨近三点钟。将军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王冠旅馆的房间里了。他在烟味弥漫的房间里来回踱了几分钟，深深地皱着眉头思考着。他的思想显然愉快起来了，因为他发出一阵尽情的笑声。他打铃叫了他的随从副官，副官进来了，他命令他去叫醒乌日哥罗德的宪兵司令斯克列巴少校，叫他立刻来报告。帕里斯在等着少校时，喝了两杯很浓的黑咖啡和几杯白兰地。他还是沉浸在愉快的思想中，不时地微笑着。

“少校，”帕里斯迎接着斯克列巴，后者刚从床上给拖起来，显然还很困倦，“这里有张一百二十个人的名单。每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注明了职业和准确地址。所有名单上的人，都必须在五月四日早晨六点钟在中学院子里集合。”

少校扫视了一下帕里斯递给他的名单。

“很抱歉，阁下，我想我不能如期执行你的命令。名单上的人有的在城市，有的在农村，彼此相隔很远，我能支配的部队很少，交通工具又很原始……”

“罗斯这地方就这么点大嘛，少校。如果有困难，你的责任是作为一个军人去克服困难。再则，我不是同你争辩。你有责任迅速执行我的命令。”

帕里斯打发斯克列巴走了以后，他忽然想起，刚才忘记告诉少校，他要他们来的这些人是大会代表，不是犯人。他打铃想叫少校回来，但是等到他的随从副官进来时，他已改变了主意。他在摩洛哥得到经验，如果有一帮人害怕他，一切事情就好办。

“如果斯克列巴对待代表比通常粗鲁些，他们以后反而更易于合作。”他想。

“我不要什么，中尉，”他告诉他的随从副官，“我要去睡了，劝你也去睡。”

将军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几分钟之后，沉沉睡去了。

斯克列巴少校在和平时期是驻扎在波斯尼亚的奥地利团的一个中尉。战时，他在奥匈军队里当宪兵，证明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精明人。由于他会说流利的捷克话，因此一开始就委派了他处理捷克“叛国”案件。等奥匈帝国夸台以后，他参加了捷克军队，给派到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执行职务了——因为他说得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话。

他仔细地研究了从将军手里接过来的名单，然后，在下喀尔巴阡山的军用地图上找出要去召集的那些人的地方，做上星的标记。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打乱了正常的铁路交通，这一事实，使他的任务很棘手。匈牙利和罗斯的铁路工人拒绝开车，而代替他们的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又只能对付开军车和装军需品的列车。就是这样的车辆也是不正常的，要耽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终点站。所有的汽车和马车都征作军用了。斯克列巴少校只有一百二十个步兵和二十四个骑兵。他命令他们

在早上五点集合。

他预先准备了一百二十张传票，五点三十分，斯克列巴少校的宪兵就出发了。斯克列巴为了他们便于执行任务起见，给他们每人都发了“军用通行证”，让宪兵们不仅有权乘军车，还可以征用马匹和马车。斯克列巴是无权采取这些措施的，但是他希望被他的宪兵征用车马的人不会发觉这点。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敢反抗宪兵。

出发的宪兵在五月四日破晓回到乌日哥罗德时，少了六个人。这六个人一去不返了。其中两个是到维列克去的，两个到波莱纳，两个到伏洛克。后来，六个中有一个被发现了，尸体在蒙卡契与索莱瓦之间的公路旁的水沟里，喉管被切断了。其余五个消失得无影无踪。宪兵们带回乌日哥罗德来一百零六个代表。维列克、波莱纳和伏洛克的代表没有消息。还有六个也不见了。其中四个听到宪兵来找他们，偷偷从后门逃走了。四个人都逃到森林里。其中一个名叫维列奇卡，是多尔赫人，永远没有回家。他在森林里组织了一帮强盗，两年中他这一行干得非常成功，以致成了名闻全国的人物。一九二一年他在绞架上结束了他的生命。索莱瓦的代表杜迪克斯牧师也没有到乌日哥罗德来。他一见传票就心脏病发作了。索莱瓦的医生给他开了一张医生证明，证明他不能旅行，而且索莱瓦的宪兵队长本人负责担保，杜迪克斯决不会逃跑。最后一个没有找到的代表是比尔克人博多，他没有到会，是因为进行外汇投机，已被关在罗马尼亚军人监狱里。

早晨六点钟，一百零八个代表分两行站在中学的广阔的院子里，等着帕里斯将军。

个子最高的代表卡明斯基是站在前排左边最末一个，贝雷

萨斯的希腊天主教神父，身高不到五英尺，正好和身宽相等，站在第二排的最右边。希腊天主教神父轻轻地祈祷着，只要全能的上帝能帮助他回到家里，他起誓把他的所有都献给上帝。在两排人的后面，提包和箱子堆得高高的。代表们都以为他们要被送到集中营去了，所以都带了食品和被褥。

“立正！向左看齐！”斯克列巴少校一声吼叫。

四名随从副官和三名最高级的捷克官员护卫着帕里斯将军，在代表们的行列前走了过去。

“集合——成四行！”

叫值班军士懊恼的是代表们都不知怎么办好。帕里斯和他的护卫者看到那几个军士花了许多力气，还是徒劳无益，都咧着嘴笑了。在一顿枪柄打和包着钉铁的靴子的一顿踢的帮助下，代表们才算排成了四行，这时，斯克列巴下了命令：

“通过开着的门，到体育馆去，开步走！”

当代表们跑过去拿提包和箱子时，队伍又乱了，大家慌慌张张，争先恐后，互相踩着脚，冲进门去。

体育馆已经过细心打扫，擦过地板，墙上饰着松枝，还挂有捷克和法国的旗帜。

正对大门，一个高台上，沿墙摆着一张铺红毯子的长桌。桌边放着三张高背椅子，桌上放着一只铃，这是学校的校工打上下课铃用的。给代表们准备了课桌。这些为学生设置的课桌，让这些大多是胖子的成年人来坐，是不太舒适的。不过凳子下放置提包和箱子，倒挺宽敞。

五月三日利奇顾问没有遇到帕里斯将军。他足足紧张不安了一天。利奇这个人，向来有啥说啥，看到将军谈起“人民的意

志”、民主的神圣原则时的那副神态，他非常生气，实际上深为反感。不过，他不敢显示他的愤怒，因为他怕自己成为笑柄。他自我辩解说，将军毕竟不过是开了点玩笑嘛。不能设想：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会去嘲笑法国人民及其同盟者为之流血约四年半的原则。

大战爆发前，利奇顾问是一个植物学家，是这门科学中的杰出人物。他当过大学的副教授，是几份纯科学报纸的撰稿者。这位青年教授对政治发生兴趣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民已流了三年血，威尔逊关于民主、民族自决权以及国际联盟的咨文悄悄越过戒备森严的国界传到布拉格的时候……当时利奇曾不惜为了威尔逊的原则而欣然献身。但是他没有去死，他梦想实现这些神圣的理想。于是，当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时，他就放弃了植物学，去为捷克政府服务了。捷克政府立刻接受了他。最初派他的工作，是要他同国外科学界通讯联系，向他们提供有关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情报。后来，派他来到了注定要“从红色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下喀尔巴阡山。

当将军通知利奇要召开全罗斯民族大会时，这个植物学家兼政治家怀疑会议是否能够在五月四日召开，但是为防备万一，他还是开始写他的演讲稿了。

当他关起门来，背诵他写好的赞美正义和永久和平的极其动人的演讲稿时，他那蓝色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后面闪闪发光，灰白的有雀斑的脸也变成绯红了。

五月三日晚上，利奇虽然在临睡以前吃了许多安眠药，还是几个小时辗转不能入睡。当他终于睡着以后，却睡得那样熟，以致闹钟响了都没听见。当帕里斯一个副官粗鲁地把他摇醒，通

知他要在二十分钟内赶到，代表大会等他开幕时，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来不及修面或吃早饭了，匆匆穿上衣服，一面扣着背心的扣子，一面就冲上街，向中学奔去。

帕里斯和他的卫队在学校院子里等着他，不耐烦地来回踱着。

"喂，顾问先生，"法国将军迎接他，"我的话做到了。代表大会已经召集起来，其余的事就归你来办了。你必须使罗斯人民的代表相信，下喀尔巴阡山是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我就靠你了。如果代表们很顽固，你可以指望我的帮助……"

"阁下，你不是想用武力来干涉吧……"

"上帝不许！"将军打断他的话说，"顾问先生，我答应你，连一个手指也不会去碰代表。用暴力来对付大会？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先生？"

利奇放心了。当他走进体育馆的时候，几个代表正坐在书桌上吃快餐，举行仪式的地方散发着一股大蒜味。其余的人紧张不安地在书桌之间走来走去，三五成群地低声讨论着。贝雷萨斯的神父在地板上打开铺盖，脱了鞋子，躺下睡了。

在这房间里只有卡明斯基一个人敢于大声说话。高嗓子的律师力图说服站在他周围的十一二个人，要他们相信没有出什么事，捷克人召集他们来是要商议下喀尔巴阡山的命运。自然，没有人相信卡明斯基的话，大家都知道他是整个下喀尔巴阡山最无耻的说谎者，大家称他为"昂格瓦的赫弗"①。当卡明斯基宣称他曾听将军解释过为什么把罗斯人的精华集合在昂格瓦时，蒙卡契的希腊天主教神父以上帝的惩罚和地狱之火来威胁

① 赫弗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将军，奥匈最高统帅部发表的战争公报由他签署，文件中包含很多十分荒谬的谎言。见本书第四二四页注②。

"昂格瓦的赫弗"了。一个瓦尔帕兰卡的名叫米霍克的农民甚至更厉害。为了回答卡明斯基因无人相信他而愤然提出的抗议，为了回答卡明斯基说的"五月四日是一个对于罗斯永远神圣的日子"，米霍克安静地说：

"如果你不立刻从这儿滚出去，我就要在你这个酒鬼的屁股上狠狠踢你一脚，让你的头从肩膀上飞出去。"

卡明斯基掐住了米霍克的咽喉，米霍克乱扭乱踢，想从"赫弗"的手中挣扎出来。

卡瓦西站在窗边吸着烟。他叫帕里斯将军迷住了。贝斯基德坐在房间后面的一张书桌旁，涂写草稿，大概是打算发言。

利奇走进房间，看到眼前的这幅景象，不禁愣住了。这景象，你说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象民族代表大会。他拧了一下自己，以证明他不是在做梦。他抓住自己的头，好象怀疑自己是否神志清醒。

"天啊，"他叫道。

这时，站在体育馆一扇开着的大窗子下面的军乐队，奏起了《马赛曲》。洪亮的乐曲声把打盹的贝雷萨斯的神父从平静的美梦中惊醒了。当他坐起身来，擦擦惺忪的睡眼时，自由之歌引起了他脑子里奇异的和激荡的回忆。

"他们正在把一个人提出去枪毙，"他叫道，急急掏出十字架，为死者的灵魂而祈祷。

卡明斯基看见利奇，就松手放开了给掐得又窒息又气喘、只想透过一口气来的米霍克。

昂格瓦的赫弗一边拉着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国的代表的手臂，领着他向讲台走去，一边对贝斯基德做个手势，叫他跟着走。

随着音乐停止，贝斯基德已踏上了讲台。他把利奇推进他右手的一张扶手椅里。利奇这时还是弄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贝斯基德又打了个手势，叫卡明斯基坐在他左手的位置上。他自己在中间一张椅子上就了座，就双手捧起铃子，发狂似地摇了起来。

屋里的喧闹声慢慢停息了。只有米霍克还在继续咒骂着，但他周围的人终于使他静了下来。

“弟兄们，”贝斯基德甜言蜜语地说，“让我们来为那些为罗斯人民的自由而献出了生命的人祈祷吧。”

“我想他该不是傻瓜吧，”留在窗子边吸烟的卡瓦西想着，“要是我问他是谁为罗斯人民的自由而死去了——”卡瓦西的脑子里闪现了过去五年来在罗斯土地上作战的那一大批人，他们人人都声称要使罗斯人获得自由。

当他在思考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一阵阵低低的声音。有的人在轻轻咒骂，因为他们是被迫参加的，有的人在祈祷，让他们快点回家才好。

“让那个波希米亚人发言，”卡明斯基低声对贝斯基德说。

“首先，当然，我要说明……”

“不用说明了。利奇代表捷克人民请求发言，你可以代表罗斯人答应他的请求。”

贝斯基德正在犹豫时，卡明斯基下了决心，以洪亮的声音宣布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代表利奇顾问发言。”

利奇听见提到他的名字，就一下站了起来。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使他激动得脸都灰白了。他站在那里，嘴唇颤动，张着双手，好象他要拥抱民族大会，拥抱全体解放了的罗斯人民似的。

“尊敬的代表们，”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屋里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卡瓦西把烟蒂从窗口丢到院子里。

“我代表你们的兄弟——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向你们——解放了的罗斯人民的代表致敬。”

听众忽然明白了，他们原来认为是愚蠢的、挖苦人的笑话，现在竟是真实的事哩。

“我们不是囚犯了。”贝雷萨斯的柯霍特喃喃地低声说。

“卡明斯基那口猪，算第一次没有说谎，”米霍克声音比较响。

“哦，那么他们为什么派宪兵来带我们呢？”贝雷萨斯的希腊天主教神父问道。

“难道他们必须派宪兵把爱国者赶拢来当罗斯人民的代表？”

“那么，我们是猪，是吗？”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布尔什维克吗？”

利奇的演说以诗一样的热情滔滔不绝地描绘了光明的未来。他不懂罗斯话，还以为不时打断他的演说的叫声，是对他的热情赞许。他奇怪，为什么贝斯基德如此剧烈地摇着铃。热情鼓舞了顾问，无论是人们的叫声还是刺耳的铃声，都不能阻止他嘴里涌出滔滔不绝的言辞。

“我的亲爱的罗斯兄弟们！”

米霍克倒不是对利奇发怒，而是对卡明斯基，因为卡明斯基就是这次讲了真话，使他上了当。然而，他从座位底下拾起一个空的沙丁鱼罐头，却没有瞄准卡明斯基，而是瞄准了利奇。他一下打中了他的靶子；沙丁鱼罐头落在激动的演说者的胸膛上了。但是，彼列克西尼的托马塞克瞄得更准，他把一大块面包扔在利

奇的脸上，立刻打得他的鼻孔流血了。

演说者的身体向后晃了一下，不过他继续讲着，他自己也听不见他说的话了。

大厅里一部分听众高声喊好，另外一些人愤怒吼叫，对着演说者的讲台挥着拳头。这时讲台已成为面包皮、空罐头、洋葱头和骨头的靶子。卡明斯基躲到一张椅子后面去了，贝斯基德趴在桌子底下，在那里继续摇着主席台的铃。

利奇坚持阵地——但是没有多久。

刹那间，他想到了殉难，一秒钟以后，他决心逃跑了。如果他缺乏殉难的天赋，那他当然就有逃跑的才能嘛。他看了一眼，就对形势作出了判断：他到不了门口，但是他能从窗口出去。他从窗口跳到了院子里，十五分钟后，就在帕里斯将军的办公室里了。

大法兰西共和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之间的谈话是秘密举行的，没有目击者。后来，利奇虽然详细地谈过和写过他在下喀尔巴阡山的经历，但是从未提到那次谈话。帕里斯将军却经常和知心朋友谈起那次和利奇的争论。

"你想想，"将军大声说，"这个目光短浅的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一个反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坚持要求我派一队机枪手、大炮和坦克去对付全罗斯民族大会。我告诉他，'亲爱的利奇先生，我们不应使用暴力去影响大会的代表，'可是毫无用处，他一定要射击那些不幸的人民代表，并不惜任何代价要把他们置于死地。我只好给他吃溴化物，多得足够供应一家药店，这才使他平静下来。随后，当他吃了溴化物，在半醒半睡的状态时，我对他说，军队不是用来影响大会的意志，而是用来增加决议的力量的，他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从那时起，我就说，"最后将

军结束他的话，“最残忍好杀的人就是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教授，当他试图拯救人类的时候，得到的是头上挨揍。”

利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帕里斯将军却听不进去。帕里斯拒绝对罗斯代表大会使用武力。相反，他加强了体育馆门前和窗口的武装守卫，下了严格的命令：不准人进去！他宣称没有人有权妨碍“人民代表”的讨论。当然，兵士们不但不许任何人进入体育馆，而且也不让一个人离开房间。

实际上大会的代表没有理由要离开体育馆。他们的饮食供应可以维持几天，而且他们绝大多数还带着被褥。因此他们可以好好地过几天。至少代表们是这样想的。然而他们估计错了。在体育馆里就是缺少一个厕所，这对每一个能吃能喝的人来说都是决不可少的，而大会的代表们都吃得很多，而且从他们的细颈坛子里大量喝酒。因此他们很快明白过来了，厕所是人们生活上的基本必需品。

卡明斯基后来回忆起这次民族代表大会时说：“一个人痛饮了白兰地，可以忘记一切需要，——除了厕所。”

几年以后，当卡明斯基不论鼓动拥护捷克人或者反对捷克人时，他总是怀着他的反捷克情绪，一再坚持说：大会所以一致决定宣布下喀尔巴阡山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就是由于缺少了一个厕所。

卡明斯基和卡瓦西制订了这个鼓舞人心的决议，他们也是把决议送到布拉格去的九人代表团的领导人。

“乌日哥罗德在摩洛哥”

在纳梅尼战斗结束几个星期之后，帕里斯不再从事军事活动而转入了政界。他参与战争的唯一行动，是在发到法国去的公报上签个字。他把干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就是指挥从东方进攻被包围的小国——交给了罗马尼亚将军马达列斯库。马达列斯库又把战争任务交给了几个上校，而他却忙于劫掠“被肃清区”。不过，他完成这些事业更加顺手，更加积极，更加熟练。当他去拜访一个模范农庄时，连一头牲口、一架机器都逃不过他那敏锐的眼睛。如果他对一个工厂下手时，那就只会让空荡荡的厂房留下。如果他有权进入一个城堡，他就会把全部家具搬走，此外还会把硬木地板挖掉。虽然他把这些东西廉价卖给了一个名叫安多尔·莫尔多凡的经纪人，他还是靠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圣战”积起了一大笔财产。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是不折不扣地指定给帕里斯将军“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思想斗争”作经费的。这样，帕里斯和马达列斯库订立的协议就既使这位将军有时间去从事政治，又有钱支付他那奢华的家庭费用。

卡明斯基还使将军注意到了另一种进益的来源。

“你可以卖国家森林。”

于是帕里斯把一大片北喀尔巴阡山的昂贵的森林卖给了瑞典火柴厂的老板。由于上述的事实，如果有人请将军只把售价的极小一部分送给卡明斯基，我想是不会遇到困难的。但是，将

军没有这样做。甚至当"昂格瓦的赫弗"坦率地向他要求规定要给他的"份儿"时，将军也不肯。帕里斯对卡明斯基发怒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意见。卡明斯基明白了将军的意思，就通过第三者，告知了利奇关于捷克政府的森林资源的命运。利奇在全罗斯民族代表大会以后对帕里斯产生了怨恨，就写了一份报告到布拉格，不但提到国家的森林，还揭露了帕里斯将军在"解放了的省分"的所作所为。

"看来帕里斯认为乌日哥罗德是在摩洛哥，"这是利奇写在报告中的一句话。

布拉格的官员看了这份报告，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不去相信利奇的话。但是当有关帕里斯的行为的新闻在布拉格以各种渠道流传开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有所作为了。如果不反对帕里斯的行为，那就得预防他的事情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毕竟捷克政府怕法国人，也怕工人运动，后者越来越激烈了。马萨里克总统打心眼里痛恨贪污。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才好？法国将军是派来帮助捷克政府的，捷克政府能对他采取什么办法呢？

幸亏那时候捷克的政治家是在奥地利的学校里学习过的，因此，他们懂得，如果处于一种绝对必须采取行动而又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的情况下，就应该任命一个拥有充分的力量而无权威、但是有更多的责任的特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任命了"纳梅尼的英雄"为"罗斯问题"的特命全权大使。

欧内斯特·西德拉赛克有充分的权利被称为"纳梅尼的英雄"，因为捷克人在纳梅尼战斗中取得胜利是事实。西德拉赛克当时在纳梅尼也是事实。他从纳梅尼回到布拉格时，头上包着绷带也是不能否认的。不管怎样，每一个交战的国家都需要英

雄，在哪里得到英雄，就在那里利用。

英雄是战时必要的工具，但是战争过去以后，他们却成为累赘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一个不稳定的政府什么也不敢拒绝他们。一般人相信这样一句话：愚蠢的英雄招致世上最多的麻烦。西德拉赛克的情况证明这一规律也有例外。没有一个人指责西德拉赛克是愚蠢的，但是他给捷克政府招来的麻烦比最笨的英雄还多。

他写了一连串题为《我的战争经历》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批评了战争的领导和政府政策。按照西德拉赛克的意见，战略上太人道，而政府的政策又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和它的伟大盟邦法国的政策充分协调。

这使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不能向捷克舆论揭露它应负的责任：他们在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中，烧光整座整座村庄，杀死伤员，吊死妇女甚至儿童。捷克总理也不能让捷克人知道法国支配捷克的政策，或者让捷克人知道他这个捷克政府的首脑，如果没有得到以“观察家”身份派驻布拉格的法国银行家的准许，简直寸步难行。

西德拉赛克象古罗马的领袖离开战场解甲归田一样，他也回到了他的咖啡室里，他在那里每天坐四、五个小时，一面喝着啤酒和浓咖啡，一面玩骨牌，抽烟，骂骂政府。他总是把调浓咖啡的两块糖放一块在背心口袋里。咖啡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处理事务时，既是英雄又是啤酒推销员。他作为英雄，发表声明；作为啤酒推销员，他积下了很多的钱。他是比尔逊啤酒公司的总代理人。但是他对钱还是不满足。他贪财是为了军事上的野心，象在纳梅尼战斗以前一样，他有当陆军部长的野心，在和平主义者的共和国当陆军部长是个好差使。

要是他不老是去挪揄克莱恩同志的话，他可能十之八九已经达到目的了。克莱恩为了要让这位纳梅尼英雄滚蛋，就推荐了西德拉赛克去当罗斯问题的特使。克莱恩煞费苦心地使反对派的报纸发动了一次战役，吵吵嚷嚷说，"困难而非常重要的罗斯问题"应委托纳梅尼英雄去解决。反对派的报纸遵照克莱恩的要求，把罗斯问题说得极为重要，拚命使舆论相信，"解放了的罗斯弟兄们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他们的命运应该依靠纳梅尼英雄的铁腕"。

西德拉赛克在罗斯报刊上看到这些文章，立刻理会到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他想出了一个挫败克莱恩的可耻的进攻计划，但是没有时间付诸实施。来了一份电报，命令他到比尔逊去汇报。

啤酒公司总经理热诚地接待了这位总代理人。

"西德拉赛克先生，一个巨大的、非常巨大的任务在罗斯等着你，"总经理对他说。

"我不知道，诺瓦克先生，您竟对政治发生兴趣。"

"对政治？胡说！我只对啤酒有兴趣——对戏院也有点兴趣，我得承认我是个小歌剧迷，《莱赫》，《陷落》，《斯特劳斯》……相信我，西德拉赛克先生，正如比尔逊啤酒胜过一切啤酒一样，维也纳的歌剧也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让我们言归正传吧。如果你成为特使，在喀尔巴阡山有了充分的权力，我们的啤酒同业公会就会脱离严重的危险了。"

"得啦！在这个全是虱子的、讨饭的、喝葡萄酒的国家里，我们能卖出多少啤酒！"西德拉赛克神经质地反驳说。

"少得很！实际上根本卖不出去！不过，问题不在这里，西德拉赛克先生。喂！嗯！我看你那支烟不好，请另外点一支。

好……您知道我，西德拉赛克先生，你知道我是一个诚实的捷克爱国者，并且是一个忠诚拥护共和政体的人，我在哈布斯堡王朝接受皇家顾问的官衔，是被迫的。是的，的确如此。因此，共和国解放了下喀尔巴阡山，我是由衷地高兴。我高兴，不仅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还因为我是捷克啤酒工业的一个守分的从业人员。下喀尔巴阡山有丰富的木材，那就是说，捷克的啤酒厂有便宜的木桶。啤酒厂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然而，不幸的是，下喀尔巴阡山对啤酒工业来说，恰恰又意味着是一个危险。下喀尔巴阡山生产大量特别便宜的葡萄酒。要是布拉格和布尔诺的菜馆都出售那种便宜的葡萄酒，捷克的啤酒工业会发生什么情况？有节制的、勤劳的、有文化的捷克人会变得怎么样？你，西德拉赛克先生和我怎么办？我们就会变成象咒骂人的、动刀动枪的布尔什维主义者那样的匈牙利人了！另一方面，要是你成为下喀尔巴阡山的最高领导人，你就可以控制那个地区的葡萄酒生产……”

就这样，按照公众的意见，捷克政府任命了纳梅尼的英雄为它的罗斯特使。此外，欧内斯特·西德拉赛克也在啤酒同业公会的压力之下，接受了这一任命。于是，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四个星期，解放了的罗斯人民的身上骑上了两个头头：一个法兰西将军和一个啤酒推销员，两位先生都有无上的权威，互不相干，各自为政。

在森林中相遇

西德拉赛克到下喀尔巴阡山后，发觉他被利用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对付帕里斯，是因为利奇顾问坚持谴责布拉格的这位法国将军。他在从布拉格到乌日哥罗德的火车上，决定要和利奇建立友谊。后来，等到他认识利奇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

“得先制服利奇才是，”西德拉赛克决定。

利奇把布拉格的特使当作一个同盟者。在西德拉赛克到达十天之后，两个人进行了一次密谈。利奇喋喋不休地、坦率地对西德拉赛克谈了在下喀尔巴阡山的普遍的“摩洛哥”情况。

西德拉赛克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然后对他那富于战斗性的人道主义的忠告，热情地道了谢。他告诉利奇，早几年的事件是为军事独裁作好了准备，因此，军事独裁也正是在为真正的民主政权铺平道路。西德拉赛克的话说得模棱两可，利奇听得迷迷糊糊。西德拉赛克谈话结束时，断定军事独裁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要直到民主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理论家找到一条联系广大群众的道路为止。

利奇一面听西德拉赛克讲，一面点头表示同意。等西德拉赛克说完了，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对，对，我同意你的全部观点，先生。你的计划很好，惟一麻烦的是人民对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很迟钝，——无论如何，这里的人民是这样的。你曾经到过罗斯人的村庄吗？没有？嗯，

我到过。我曾试图让罗斯人获得民主。结果没有成功，那不是我的错，——那是罗斯人的耻辱，我已经竭尽了我这方面的力量。

“我第一次访问一个罗斯人的村庄，”利奇用他通常发表演讲时的调子继续说，“他们把我当成法警，我差一点儿挨打。第二次，为了安全，我带了六个宪兵去，我发觉村子很荒凉。只有一个老婆子在家里。这个丑婆子蹲在教堂前面，等着我们。宪兵问她，但是不能说服这个丑婆子用文雅的语言谈话。因此，这些宪兵忘记了我们是到村子里去宣传崇高思想的，他们打了那个老太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她没有受伤。老太婆懂得我是要行好的，于是她用不同的眼光望着我了。她用我递给她的手帕擦掉了脸上的血。她向我讨一个小钱，好去买一支蜡烛——我忘记了她要去点蜡烛的那个圣徒的名字了。我告诉她，宪兵队长曾对我解释过，有了他的帮助，圣徒对人民就毫无用处了，并说明了宗教的反动性。我向她表明，只有一个药方可以医治人民的苦恼，或者不如说两个：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你要对村民们做好事吗？’老婆子问我。

“‘那当然。’

“‘那么，我告诉你，我们村里的人在哪里？——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告诉你。’

“先生，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变成现实的民间故事的世界了。

“‘我会回答的，老太婆，’我告诉她，‘当然，我会回答你的问题。说吧，你问我吧！’你倒想想看，西德拉赛克先生！那个丑老婆子弯下身去，竟从尘土中拣起两把粪来，伸到我的鼻子底下，鲁莽地问我，我！‘如果你要帮助人民，那么，告诉我哪一只手是马粪，哪一只手是牛粪？’

"够了，"利奇停止了他的叙述，没有说后来宪兵是怎样对付这个民间故事中的老太婆的。"西德拉赛克先生，人道主义是一个神奇的、崇高的、神圣的原则；但是人民，先生，人民——"利奇顾问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

西德拉赛克用一种慈祥的、几乎象父亲一般的声音，安慰这不幸的人道主义者，劝他不要失去信心。他对利奇说：从别的生活环境、从文化较高的工业国家来到下喀尔巴阡山的人，把落后的罗斯人从几个世纪被外国统治的泥坑中解救出来，倘若他们要履行这个历史使命，就必须获得那些了解人民、又为人民所了解的人的帮助才是。

"罗斯的知识分子是捷克民主共和国和罗斯人之间天然的中间人，"西德拉赛克说，"然而，很遗憾，我们不能靠他们作中间人。这是可悲的，不过这是事实；他们拒绝提倡我们高贵的抱负，他们一心想利用我们。对罗斯的知识分子来说，罗斯的解放，意味着他们将取代匈牙利上层分子的地位。罗斯知识分子利用我们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匈牙利大地主作斗争；他们利用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打算把我们赶走。"

"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

"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相信，他的个人利益不是和公共利益一致的。因此，很不幸，我们不能依靠罗斯的知识分子。我现在要说的话，不管你觉得如何荒谬，却是无比正确的，而且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棘手问题。先生，如果你愿意把事情好好地想一想，你就会认为我是对的了。

"捷克民主共和国在罗斯土地上唯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失去了权力的匈牙利上层分子。先生，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匈牙利人不可能再希望骑在罗斯人的头

上了。既然他们没有这样的希望了，他们就只有在两者之间择其一：或者是捷克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文化，或者是饥饿而落后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愿意挑选我们！我们有几个人自称罗斯人，但是最精明的匈牙利人自称斯洛伐克人——表示他们要做我们的亲属，他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应该赞赏——而且要利用——他们喜欢做我们的亲属这一事实。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为什么卡瓦西要自称是斯洛伐克人？因为他要跟我们捷克民主党人一起工作，他们不愿去和阴谋反对我们的罗斯知识分子一起干，这就是答案，先生，当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让匈牙利的上层分子利用我们，而我们要利用他们。可以肯定，我们如此进步的文化，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事实上我们还掌握着宪兵！即使如此，还是必须小心，非常小心！”

他们谈话后一个星期，西德拉赛克从帕里斯将军那里知道了一件事，可真大吃了一惊：据秘密警察报告，利奇顾问在深更半夜关门闭户和卡瓦西作了商谈；卡瓦西虽然自称是斯洛伐克人，而且是罗斯民族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却肯定是个可疑的人物。自从他不断和国外电报往来的时候起，他就受到怀疑了。这些电报之所以可疑，就是因为它们看起来似乎一点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看来，很可能，他们处理事情，根本就不是表面上那么一回事。

秘密警察准备监视卡瓦西。然而，帕里斯听了西德拉赛克的劝告，下令立刻逮捕了卡瓦西。卡瓦西企图从监狱里偷偷带一封信给利奇，他在信上称帕里斯为“摩洛哥的拿破仑”。

将军看了这封信，要把利奇也抓起来。西德拉赛克费尽口舌，才算阻止了帕里斯采取这一步骤，他（西德拉赛克）坚决认为，那未免太严厉了。帕里斯同意不逮捕利奇，条件是要西德拉

赛克签个字，共同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一份电报，要求政府立刻来电召回这个可疑人物。

电报发出了。在这同时，西德拉赛克给图萨也送去了一份关于下喀尔巴阡山的详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为利奇作了辩护，断言不管利奇的表现怎样，他不是叛徒；他只不过是一个愚笨的、惹人厌烦的书呆子罢了；他由于干预了政治，既损害国家，又毁了自己。西德拉赛克恳求图萨总理不要毁了这个年轻的学者，他应该有较好的命运。

利奇知道是西德拉赛克使他在乌日哥罗德免受逮捕，并挽救了他在布拉格的政治生命，就给西德拉赛克写了一封词藻华丽的长信，向这位罗斯特使保证他永志不渝的感激之情。

帕里斯因为西德拉赛克让利奇逃走了，对他很有点恼火，但当这位啤酒商人给他一个去征服人的机会时，他的怒气很快就平息了。

西德拉赛克提醒将军，罗马尼亚的军队，现在仍旧占领着战争时期攻打匈牙利和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时夺来的下喀尔巴阡山东部，按照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发布的命令，他们本来早该撤走了。帕里斯一听这话，叫了起来："这正是合我心意的任务。"

西德拉赛克圆滑而坦率地对帕里斯说，他不想参预这解放下喀尔巴阡山东部的事业，光荣将归于将军。作为回报，他只希望他的独裁的同僚，让他这个旧日的社会主义者搞些必不可少的福利措施。

于是，西德拉赛克就很快行动起来，迅猛地提高了工资。开始时，他没有给全体工人增加工资——只提高栽培葡萄树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做得格外彻底。他公布了一道命令：凡是贝雷萨斯、纳吉索洛斯和蒂萨乌依拉克的葡萄园工人，一律按他们的

原工资提高十五倍。同时，每天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减为七个半小时，他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全权宣称，以前从来没有人曾这样大幅度地提高过工资。西德拉赛克也注意到了不要让这命令成为一纸空文。他公开宣告：如果雇主付工资低于标准者，或者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都要受到严厉判决。

这种惊人的提高工资的命令，使得纳梅尼的英雄又一次声名远扬。在西德拉赛克旧的功绩上增添了新的光彩。

"保卫共和国的英雄现在为了劳动人民战胜了共和国！"

关于西德拉赛克提高工资一举，那位新闻记者写了上面这句美好的辞句，但是一个星期后，他自己问自己：到底是自己疯了，还是世界疯了。是这世界疯了，他断定，要不，准是下喀尔巴阡山的居民疯了。否则你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贝雷萨斯、纳吉索洛斯和蒂萨乌依拉克的葡萄园工人都反对提高工资，并且还进行了游行示威？

"如果人民与自己的利益为敌，"西德拉赛克宣称，"我就独自保护人民的利益，不惜反对人民！"

宪兵驱散了葡萄园工人的示威游行，抓了十四个游行的人。

葡萄园主人也派了反对提高工资的代表团到西德拉赛克那里。他接待了代表们，但是他不能接受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他的这种异想天开的提高工资的办法，既毁了业主，也毁了工人。葡萄的收获将要浪费，如果工人的工资增加十五倍，那么采葡萄的费用将比卖出葡萄酒的收入还多。

西德拉赛克用温和而坚决的措辞拒绝了葡萄园主人的请求。于是，他们就派代表团去布拉格，在那里由于克莱恩部长的帮助，他们的事情办得比较成功。

西德拉赛克得到命令，要他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包括业

主、工人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协商出一个公平、合理、适当地提高工资的标准。西德拉赛克只好服从。提高工资的命令是九月十六日发布的；西德拉赛克于十月四日接到布拉格的命令；十月二十九日，西德拉赛克经过一番深思远虑而组织起来的仲裁委员会开始工作了。十二月八日，该委员会通过决议，提高葡萄园工人工资一倍半，而不是十五倍。

在西德拉赛克下命令和委员会作出决议之间那段时间，大部分的葡萄都留在树上，而已经采下来的葡萄，好多都腐烂了。

啤酒同业公会送了纳梅尼的英雄相当大一笔现款，以感谢他发布的命令。不但如此，而且报纸也称赞西德拉赛克的所作所为。左翼报纸称纳梅尼的英雄为“理想主义者”。银行界控制的报纸则以严肃的“科学的”论据指出，工人的工资斗争即使成功了，不说会毁灭收成，主要的还是打击了工人自己。

> 西德拉赛克的乌托邦野心是有价值的证据，证明工人们的真正朋友是那些阻塞追求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有一份名叫《赖亨堡的伏尔瓦兹》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德文报纸，是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唯有它发表的文章，认为西德拉赛克决不是理想主义者。

> 要是有人在布拉格干了西德拉赛克在乌日哥罗德干过的事，他们准会杀死他的。

这是《伏尔瓦兹》的评论。

“不错，”西德拉赛克看到《伏尔瓦兹》的文章时自言自语地说，“只有我知道，赖亨堡的人民是不会知道的——乌日哥罗德是在摩洛哥嘛。”

当西德拉赛克正在忙于提高工人工资，以及在他的战争经历上增添新的荣誉的时候，帕里斯正在忙于征伐。他给马达列斯库将军写了一封信，开始了他的战役。他要马达列斯库撤离下喀尔巴阡山东部。罗马尼亚的外交部代马达列斯库作了回答。答复没有送给帕里斯将军，而是交给了布拉格的政府。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在复文中申辩说：正是帕里斯将军所提到的最高级会议命令罗马尼亚军队留在下喀尔巴阡山东部，一直留到该地区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罗马尼亚皇家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国政府确切地解释了什么叫做“正常的政治生活”。复文的最后一段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感头痛：罗马尼亚政府通知捷克政府，一份备忘录即将送交最高会议。

根据克莱恩部长的提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西德拉赛克写了一封训斥信，认为未能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全应由他负责。西德拉赛克把信给他那位独裁者同僚看了，独裁者告诉纳梅尼的英雄，在他一生中，他也曾经历过一些麻烦的事儿，但是他认为，一切都可以凭策略加以克服。也许同一天，帕里斯已想出了一个计划，这对他的未来有决定性影响。他的意思是想把下喀尔巴阡山自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来，与喀尔巴阡山北面的乌克兰地区合并，组成一个由皇帝统治的独立国家。另外，帕里斯将军还同意由他自己来充当未来的皇帝。

不过，他暂时还只好勉强地收拾起他的计划，去忙于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帕里斯收到了最高会议的命令后大发雷霆，足足生了一个小时的气。他们不仅命令他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而且阐述了什么叫做“正常的政治生活”。他并没有气恼得破口大骂；他喝了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那是王冠旅馆的老板特地为他从法国买来的。一个人如果喝够了真正的科涅克白兰

地，是会变得对世上任何事情都和和气气的——包括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我们这个例子中，不仅科涅克白兰地是真正的货色，而且喝酒的人也是个天生的酒鬼。帕里斯将军对酒是抗得住的，若说他在清醒时并不是永远都能控制他的舌头，可在他喝醉了时，却总是知道怎么办的。

他和科涅克白兰地商量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打发人去叫卡明斯基了。他已经几个月没有看见卡明斯基。“昂格瓦的赫弗”不是个问心无愧的人。因此，他在来王冠旅馆之前，就飞快地把一个人在拘留营里的生活必需品塞进了一只手提箱，来到旅馆里，就把手提箱寄放在旅馆的帐房间里。然后，他这才去向将军报到。帕里斯分外热情地接待他，喊他“我亲爱的朋友”，一定要他喝科涅克白兰地，吸雪茄烟。当卡明斯基舒舒服服地喷着烟雾时，他开始谈实质性问题了。

“告诉我，朋友，组织一个政党要花多少钱？”

“阁下，这第一要看这个党是否得到宪兵的支持，第二，要看这个党的影响如何。”

“我心目中的党，当然可以指望得到宪兵的支持。至于力量问题，这个党倒并不需要多么强大。为了便于你考查起见，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党的问题，而是十五或者二十个——我说，就是二十个！二十个党将全部得到宪兵的支持，一个也不需要强大的。”

“我不懂，阁下！说真的，我不懂！”卡明斯基说着，简直愣住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说的真话。

将军不喜欢解释，他放下这个问题，在喝白兰地了。他喝酒的时候，卡明斯基不知道是乐意还是不乐意，眼睛一直盯着挂在墙上的拿破仑像，仿佛正在等着拿破仑对他发出某种忠告的征

兆似的。半小时以后，酒力发作了。卡明斯基害怕将军要把他灌醉，到那时他就没法控制自己，将军会哄得他把一切想过的、说过的、以及犯过的罪行都招供出来的。于是，他就说，他了解将军心里的意思。

"这是一个出色的计划，阁下！我起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计划。"

将军派人去把赫德拉叫了来，他是秘密警察的头子，人们管他叫宣传部长。

"纳茨达尔①！"赫德拉进来说。这是他的习惯，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用捷克民族主义者所习用的称呼。

赫德拉是一个乌发黑眼的矮子。面孔修得光光，穿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强烈的香水味儿。他不象一个警察，倒象一个教舞蹈和礼仪的教师。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他领导过一个捷克小镇上的刑事侦缉部门，保卫帝国，对付捷克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诸如此类的卖国贼。在战争时期，他揭露了捷克反军国主义者拟定的一两个秘密计划。在帝国崩溃以后，为什么主要的密谋者不能证明赫德拉在反帝国密谋中既是发起人又是奸细呢，无非因为被军事法庭处死的人不能指证杀死他们的凶手罢了。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经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全体警察接收下来)觉得赫德拉的名声太臭了，不能在捷克的土地上使用他，决定送他到斯洛伐克，后来又送到了下喀尔巴阡山。

赫德拉对整个世界怀有仇恨。他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因为他们不能保住哈布斯堡帝国；恨捷克人，因为他们撵走了哈布斯堡；恨工人，因为他们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对一切人

① 捷克语，意为"您好"。

都彬彬有礼甚至颇为友好，恰恰是由于他憎恨人类，他在等待时机。

“纳茨达尔！”

赫德拉早已知道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互换照会的事，因此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帕里斯将军需要政党。他衷心赞成这个计划。

这三位先生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要建立的各政党的名单。卡明斯基提名，帕里斯同意他提出的建议，赫德拉记录下来。赫德拉把写下的名单大声念出来：

1. 捷克共和党。
2. 罗斯共和党。
3. 匈牙利共和党。
4. 犹太共和党。
5. 捷克革新党。
6. 罗斯革新党。
7. 匈牙利革新党。
8. 犹太革新党。
9. 捷克民主党。
10. 罗斯民主党。
11. 匈牙利民主党。
12. 犹太民主党。
13. 捷克农民党。
14. 罗斯农民党。
15. 匈牙利农民党。
16. 犹太农民党。
17. 捷克工人党。
18. 罗斯工人党。

19．匈牙利工人党。

20．犹太工人党。

卡明斯基在会谈期间一直不停地喝着酒。等到这件事办完了，他还在喝，他高声大笑，然后用一种单调的孩子似的嗓音说：

“二十个党比一个党少二十倍，二十个党比两个党少十倍，二十个党……”

“够了！别做声了！”

帕里斯气坏了，而且十分认真——也许是因为卡明斯基猜出了他的心思，或者是因为这个喝醉了的罗斯人竟又胆敢开玩笑了。

但是卡明斯基还是不肯安静。

“二十个党需要二十个党纲，”他讥讽说，“每一个党纲都要很出色，很高尚，很正确，比以前所知道的任何党纲都伟大。二十个纲领——”

“一个纲领就够了，”帕里斯笑着大声说，“住口。”

这声吆喝是对卡明斯基而发的呢，还是为了说明二十个党只要一个纲领就行，这位将军没有说。

卡明斯基不做声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接受将军的命令才不作声，而是因为他睡着了。赫德拉摇醒了他，护送他到街上，把他交给一个警察，送他回家。

第二天，赫德拉征得帕里斯的同意，放掉了卡瓦西，让他来帮助组织政党。赫德拉接受卡瓦西的意见，吸收了犹太人贝雷萨斯的砖厂老板柯霍特来一同工作。

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个星期后，赫德拉报告帕里斯，二十个政党全组织好了。

帕里斯很满意。但是当赫德拉详详细细地报告他工作是如

何进行时，他就开始厌烦了。赫德拉立刻察觉到这位统治者对细节是不感兴趣的，因此他就把报告的后半部分吞到肚子里去了。于是将军就不知道，各种匈牙利党在创立的第一天就有几百人参加，也不清楚各种捷克的党，除了十二个或十五个执行委员和若干雇员以外，一个党员也没有。实际上，他们能够组成执行委员会，也仅仅是靠了把几个捷克官员同时变成两个党的执行委员。

通常，到下喀尔巴阡山来的捷克人仅是一些宪兵、士兵、官员或商人。宪兵和士兵都禁止参加党派，至于商人，他们也不喜欢参加党派；他们只是到野蛮的地区来贩卖各种东西，同时推销一切在家乡卖不掉的货物罢了。

赫德拉命令官员们参加各党派，并一一告诉大家，他可以在哪个党内找到位置。有几个人，可以在两个党里得到位置。

赫德拉对各党派曾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是失望了。他原来想党派会创办报纸，举行会议，开始行动，这样能让他有充分的机会，去揭露那些越轨的人和危害共和国安全的人。然而帕里斯不准各党派创办报纸，举行会议，有所行动。他以发出建立政党的命令时所表现的那种坚定性，决定政党只有一种作用——除了存在，没有别的事。帕里斯这一明确的命令，使得大批人得免于下狱；但是却夺去了赫德拉拯救共和国的机会。这位有着舞蹈教师外表的警察头子不能原谅这批政党——它们丝毫也没有违抗将军的命令，同时也不能原谅发命令的将军。

建立政党以后，帕里斯又发了一个照会给马达列斯库将军。结果又由罗马尼亚外交部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了回答。罗马尼亚人下决心不顾匹兹堡协定，不肯放弃马拉马罗斯盐矿，坚持要求下喀尔巴阡山居民的权利。在第二次照会中，他们引用了

匹兹堡条约，该条约曾保证下喀尔巴阡山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自治。

当帕里斯看着他那份复照抄本时，又一次想到了他出生于那个征服世界的拿破仑降生的市镇，而且出生在同一条街上。于是他明白了，要怎样才能把下喀尔巴阡山变为独立国家。第一步，是自治，那会赢得罗斯人民的感恩。而后……

在王冠旅馆最好的那个房间里，帕里斯摆出一副拿破仑的姿势，在挂着的那面已失去光泽的镜子面前站了一会儿。

自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声张出去。不过，西德拉赛克注意到帕里斯对于罗马尼亚的复照既没有表示愤怒，也没有拿监狱和绞架来威胁罗马尼亚政府，他就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当帕里斯细心地问他由谁负责任命自治省省长时，西德拉赛克就一切都明白了。

“如果下喀尔巴阡山获得自治，它的长官——我不知道自治的下喀尔巴阡山的首脑叫省长还是总督，但是不管叫什么，它的长官都要由人民选举。”

将军从西德拉赛克的回答中领会到他必须树立名声。他记起他童年时所读过的书，那上面说，拿破仑为了要赢得一个被他征服的城市的人心，给了一个哭着的流浪儿一块巧克力。

想到这个故事，他就叫他的随从副官去买了六百磅巧克力，命令赫德拉把乌日哥罗德所有的儿童在星期日中午集合在大广场上。这六百磅巧克力由军车运到广场后，将军亲自把它们分给了站在军队警戒线内的几百个儿童。

这仅仅是帕里斯将军为争取民心而发动的战争的开头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超过了第一个战役。

将军在广场（从前叫拉科治广场，后来更名为马萨里克广

场)上造了一个很大的木头讲台。台上挂了法国和捷克的旗帜。然后，帕里斯命令赫德拉去召集二十五个人来。他们可以求得他的大恩大惠，但并不要他花钱。

“我将亲自在马萨里克广场的讲台上同意请愿者的要求，亲笔在请愿书上签上‘同意’字样，”帕里斯宣布说。

将军的计策使深谋远虑的秘密警察头子很感兴趣。他不仅执行了帕里斯的命令，而且超额完成了。他不是召集了二十五个请愿者，而是为仁慈的将军制造了二十六个请愿者。其中二十五个请愿者，提出的请求都得到了帕里斯的许可，他们不是便衣警察，便是便衣宪兵。第二十六个是一个衣服散发着厨房气味的罗斯老太婆。

将军身穿镶金边的制服，光彩夺人，闻到这股厨房气味时，憎恶得鼻子都皱起来了，但是一瞬间，愁眉就已变成了笑脸。

“赫德拉真是一个出色的家伙，”他心里不觉想着。

他为了表示法国人的礼貌，向微微驼背的老太婆深深鞠了一躬，叫她“夫人”。他伸出戴白手套的手，从老太婆那双棕色的、满是皱纹的手中接过了那份折皱的请求书。为了快点把这个有臭气的女人打发走，这份请求书，他没有象其余的请愿书那样交给他的助手或赫德拉看一看，就在那一页请求书的反面很快地签了“立即同意”几个字，交给他的随从副官盖上他的图章。

他把请求书还给老太婆，向这个带有厨房气味的“夫人”举手敬了个礼。

一刻钟之后，马鲁莎奶妈把帕里斯将军的命令交给了军人监狱的监狱长。原来有个神秘的陌生人说服了马鲁莎奶妈去见帕里斯将军，而且他已给米科拉的母亲铺平了道路，显然很迅速地办好了军人监狱方面的手续。米科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没

有丝毫阻挠地出了狱。

这个神秘的陌生人按照赫德拉的指示，取得马鲁莎的同意，把米科拉直接从监狱里送到了火车站；然后让他乘火车经由查普去卡沙、布拉迪斯拉发，最后到维也纳。赫德拉布置了四个侦探在查普等待米科拉。赫德拉指控米科拉打算逃跑，希望以此证明布尔什维克又在下喀尔巴阡山行动了；他要逮捕米科拉，以此证明他是坚决保卫共和国的。四个侦探在查普等待米科拉，可是没有等到。有一个侦探，分配到的任务是在这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离开监狱后钉住他，暗暗地跟踪他到查普，可是米科拉没有在查普出现，他也就无法到警察总局去报告了。直到过了十个月，在拉沃茨涅起义之后，赫德拉才又见到了这个侦探——维列克的罗斯小伙子的尸体。赫德拉到这时才知道，原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替警察局跟踪布尔什维克，而是照布尔什维克的指示监视了警察。

马鲁莎和米科拉来到了街上，他们没有向右转，走那条通向车站的路，而是向左转，匆匆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了昂格河边。有一辆农民的马车等在那儿。马车夫穿着羊皮大氅，戴着羔皮小帽，拉下帽边，盖住前额，坐在驾驶座上，吸着烟斗。

马鲁莎瞟了一下车夫的脸，车夫喃喃地含糊答了一句，马鲁莎和米科拉迅速地爬进了马车。

“快，凯斯蒂卡洛！快！”马鲁莎奶妈悄悄地说。

马萨里克广场上广施恩泽的举动带来了痛苦的结果，这使帕里斯十分恼恨。他下令要对这一事件作严密调查，严惩罪犯。按照惯例，他又把这一调查工作交给赫德拉去办。赫德拉侦查是谁把这个老巫婆私下混在请愿者里，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敏。

但调查毫无结果。赫德拉对将军作了报告，叙述了秘密警察为侦查罪犯所采取的种种步骤。他的报告冗长无比，絮絮叨叨，搞得帕里斯对这案子厌烦极了，便气呼呼地告诉赫德拉，别再去干这件蠢事了。赫德拉欣然从命。

将军争取民心的战役给搁置了数天，然后，又恢复了。将军听说西德拉赛克办报很成功，很懊悔没有把这位啤酒商人列入组织这许多政党的工作人员名单之中。他又恢复了跟西德拉赛克商谈事情的老习惯，只是对米科拉一事，却闭口不提。可是，西德拉赛克一谈就谈起了这个话题。

"这是个错误，"西德拉赛克对将军说，"我看错误是无法挽回的了，现在该怎么办呢？事情很清楚，我们必须否认那个错误是一个错误！米科拉逃走了？他是个傻瓜！如果他不逃走，我们也要放他的。毕竟，在下喀尔巴阡山是谁也不会因政治罪而受到迫害的。"

"谁也不会，"将军热情地同意说。

两天以后，帕里斯和西德拉赛克给图萨总理送去一份联合备忘录，讲到推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后，几个月来，匈牙利白色恐怖一直猖獗；不过下喀尔巴阡山的实际敌人不是工人运动，而是匈牙利沙文主义者之间发生的骚乱。如果工人运动能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将是对付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最宝贵的武器。

两个独裁者建议让工会合法化，并来一次彻底的大赦。

当时，一个法国将军的建议，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说来，等于命令。然而备忘录不是帕里斯将军一个人签署的，而是和一个捷克社会民主党人联名寄发的，这就大大贬低了它的威力。因此图萨只同意了帕里斯一半要求。他准许工会活动，赦

免那些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至今未搜捕到的人。至于那些在监狱里或者在集中营里的人，可仍旧留在那儿。

总理的决定，使帕里斯和西德拉赛克二人都觉得满意。

“这就是我起作用的地方，”当工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恢复了活动时，西德拉赛克想。

“我不久就可以摆脱这个喝啤酒的酒鬼了，”帕里斯同时也在想。

西德拉赛克期待在工会外围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运动，有足够的力量对待横蛮愚蠢的军事首脑。另一方面，帕里斯也作出了决定：如果工人不再捣乱，那就用不着西德拉赛克了。在他看来，西德拉赛克仅仅是图萨的挡箭牌；如果布拉格的社会主义左派批评下喀尔巴阡山的形势时，他可以回答说：下喀尔巴阡山的全权特使是一个老资格的、可靠的共和国的政治家。

帕里斯和西德拉赛克骑在下喀尔巴阡山人民头上的时候，我正住在维也纳。我最初当个报贩，然后做堆木场的守夜人，后来在香肠厂当看门人。我就以此谋生。我要不是全靠这样干活，获得一点点可怜巴巴的食物来维持生活，我很可能已经死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支撑着我。我瘦得象一只赛跑的狗，苍白无力，眼圈发黑，身体衰弱得可怕，几乎走路都走不动。我总是断断续续地发低烧，体温摄氏三十七度二、三。这种讨厌的低烧，搞得人精疲力尽。我肯定我快要完蛋了。后来我得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书记的指示，叫我到下喀尔巴阡山去参加当地开始的工人运动，并给了我护照，还发了旅费，我一下就恢复了健康。说我体重也增加了，那倒是夸张；不过，在我准备起程的时候，要是说我象一条赛跑的狗，与其说由于我

骨瘦如柴，还不如说由于我步履轻快。我在蒙卡契下了火车，就到理发店去修面。当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时，我注意到我眼睛下的黑圈已经消失了。

“先生，您的脸，我看上去很眼熟，”胖理发师一面用剃刀给我修面，一面说。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理发师的剃刀一滑，割破了我的脸。

“别生气，等一等。这止血药管能立刻止血的。”他一面用止血药管在伤口上轻轻涂着，一面继续说，“真使我感到惊奇……毕竟，我想……人人都说您早已绞死了！”

“我也听说了，”我回答。

理发师叫我的话吓了一跳，马上改变了话题。

“您听到过彼特鲁塞维茨先生的消息吗？”他一面给我修面，一面问我。“彼特鲁塞维茨先生从监狱里逃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多数人都认为他去俄国组织一支军队，然后，到春天……您认为怎么样？”

“我想最好给我在脸上洒点花露水。”

“当然……当然……彼特鲁塞维茨先生呢？”

“他通常都自己修面，不过，我记得他是不用花露水的。”

我来到了星星旅馆，他们对我说有一个空房间。我在登记簿上签了名以后，结果他们搞错了，并没有空房间，而且在短期内不会有。

我去找我以前的同学费尔德曼，在他家里得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费尔德曼曾在大战的第二年被俄国人俘虏，在我到蒙卡契之前几个月回到家里。他现在蒙卡契的犹太学校里教书。他的地址是在维也纳时给我的。

很凑巧，大约在一八六〇年，另外一个费尔德曼也住过这间

房子，那人是拉比①·塞缪尔·费尔德曼。在这古老的平房的墙上，挂有一块金字的大理石饰板，歌颂这位一度住过的房客。

拉比塞缪尔·费尔德曼，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是拉约什·科苏特的忠诚的士兵，一八四九至一八五六年是库夫斯太恩②城堡的上镣铐的囚徒，曾居于此屋并死于此屋。他作过一支歌：

公鸡在叫，
黎明将到。③

费尔德曼太太请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西伯利亚式饭菜，就听任我们自由自在，不来管我们了。她是跟着她的丈夫从巨大的叶尼塞河的两岸来到浅浅的拉托里卡河的。

我们两个，锁起门，关上窗，谈了一个通宵。费尔德曼说的匈牙利话中常常夹杂着俄国术语。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描述着下喀尔巴阡山和俄罗斯的情况。他谈话时有个习惯，老是捋他的在西伯利亚长起来的胡子。

第二天早晨，费尔德曼带我到工会总部去，把我介绍给贝雷克州工会主席斯捷潘·洛科。

在这些事情之后一个星期，我在潘娜·青卡的森林里遇到了米科拉。正当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米科拉在莫斯科时，我那奶兄弟却被迫住在森林里闲得发慌。我们见面时，我来下喀尔巴阡山还只有一个星期；而他已经在潘娜·青卡的森林里住了两个月了。

---

① 拉比，是犹太教士，教授《法典》的教师。

② 现奥地利西部城市。

③ 这支歌已成为真正的民歌，是匈牙利民歌中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潘娜·青卡的森林伸延在索莱瓦和维列克之间，离铁路只有一箭之遥。这座森林大约有三十至三十五公里长，十五至二十公里宽，上面点缀着一个个小村落，或者一块耕地，人们以费伦茨·拉科治传说中的歌女的名字称呼这个森林，因为大家相信这样的传说：美丽的吉普赛姑娘在这个森林的深处第一次遇见这个英雄。有些人把整个森林都叫做潘娜·青卡，另一些人只把森林北段称作潘娜·青卡，因为北段的许多大橡树已长了几百年，在拉科治时代就已浓荫蔽日了。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宗教战争的年代里，这个森林成了受迫害者的一个荒野中的堡垒，后来，在拉科治的起义军与亲奥地利的雇佣军打仗时，这个森林又成了居民避难的堡垒。那些在森林中避难的人，既逃过了皇帝的牧师们的拉丁语《圣经》，又逃过了皇帝的刽子手的利剑。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这座森林属于巴索里家族。以后当了波兰王的依斯特凡·巴索里，为了夺取这个森林，烧掉了几个村子，因为那几个村子里的人声称对这个森林拥有所有权；他并且把一些地主降为农奴的地位。

在特兰西瓦尼亚王子加博·巴索里被杀以后，这座森林又归属于哈布斯堡了，不过仅仅是名义上而已。实际上它是被隐藏在与世隔绝的荒野中的亡命之徒接管过去了。打了很久的官司，花了很大的代价，这个森林才传到了拉科治手里。在费伦茨·拉科治失败以后，利奥波德皇帝把这座森林零零星星地送掉了。为了酬报桑邦伯爵在对匈牙利人战争中的骑士气概，给了他森林中一块很好的土地。还有一大片地则留作皇家的打猎场。有一片较小的森林，一共有几千亩，通过辗转出售和交换，慢慢地分散成一小块一小块。当皇家的打猎场和桑邦的产业经受了各种变化而保存下来时，那些一块块较小的森林地，由于

把锯木厂暗暗引进了森林，已变成新生活的前驱。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日，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下令组织了一个樵夫和农民的委员会来分配森林，但是那个委员会还没来得及进行认真严肃的工作，帕里斯将军就把米科拉抓走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帕里斯将军把留作皇家打猎场的那一块森林地卖给了一家股份公司，得到了一笔瑞士现金。

将军还想把桑邦的那块森林地以好价钱卖给外国人，以获得一笔外币，但是使帕里斯大为震惊的是，买方却提出，只有住在维也纳的桑邦伯爵在卖契上签了字，才肯买那块地。帕里斯在怒气平息下来以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他愿意把森林的价格削减百分之五十(原来的价格就低得荒唐)。然而那个瑞士人却不在乎削价不削价，而只是要桑邦伯爵的签字。他们提出这个条件时，还告诉帕里斯将军，桑邦伯爵已不住在维也纳，而是到美国去了。将军根本不管伯爵在哪里，也不管他在干什么。他决定把桑邦伯爵的森林地，除了保留几千亩作为他私人的打猎场之外，其余的就零零碎碎地卖给森林边上各个村子里的人和锯木厂的老板们。

第一个主顾出现于十月中旬。一家法国的股份公司从索莱瓦锯木厂的老板手里买下了他的厂子，又买了一家奥地利的银行。法国人打算让一个化工厂重新开张并加以扩展，这个厂是德国人在大战时在索莱瓦建立的。他们要向帕里斯将军买九千亩的森林地，帕里斯正求之不得。法国商行的代理人，一个昂格瓦的工程师，带了一个包括两名工人和四名警察的小组，到森林去勘察和划分森林的产业了。他们去了以后，无论是工程师也好，工人或者警察也好，从此都没有回来。

由于失踪的工程师之妻哀伤不已，帕里斯不得不派了一个

军士和八个宪兵到森林里去搜寻失踪了的考察队。八个宪兵，象他们要找的人一样，也不见了。帕里斯命令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连去搜查和扫荡森林。他命令他们抓到“土匪”就不加审讯，全部吊死。

这支远征军正准备出发，帕里斯撤消了他的命令。因为法国人取消了这笔交易，如果再到森林里去扫荡，就只会对那些只买打猎场、不买桑邦伯爵的土地的瑞士鬼有利了。

“这批猪，活该他们自作自受，”将军发怒说，“除非瑞士人付给我的扫荡费跟伯爵那块地的价钱一样多，我才会派人去扫荡那座森林。再加上利息，妈的！”

将军和另外几个乌日哥罗德派来管理这个小乡村的官员，都以为那是村民们占据了这个森林，在抵御城市居民的侵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有一支小小的军队在潘娜·青卡森林的树下驻屯下来了。这支部队是由两支败军的残部和一些孤独的亡命者组成的。他们忘了，不久以前，军队还象伐木工人和葡萄酒小贩承平时期惯常行动的那样，在喀尔巴阡山来来往往，所不同的是，军人履行他们的责任没有商人那样老练和小心。

彼特鲁塞维茨将军的残部，是隐蔽在潘娜·青卡森林中的第一批人。彼特鲁塞维茨将军和米科拉没有亲属关系，命运开了个玩笑，让在喀尔巴阡山北面和南面作战的两位司令姓了同样的姓。在北面与波兰部队和冒牌的法国部队作战的是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共和国的首脑。在南面与罗马尼亚部队、捷克部队和法国部队作战的是罗斯红卫军司令。波兰将军西科尔斯基前后两次利用了这种名字的巧合。一九一九年，西科尔斯基对乌克兰共和国进行灭绝人性的战争，惨无人道地屠杀乌克兰农民，他为了替自己辩解，说乌克兰人是由布尔什维克彼特鲁塞维茨

指挥的；波兰的公众能充分理解，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要无限残酷才行。后来，在一九二〇年，当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这个重伤员面对波兰军事法庭时，西科尔斯基那些刽子手法官又把彼特鲁塞维茨将军对波兰士兵犯下的罪行归到了米科拉的名下。

彼特鲁塞维茨将军在一九一九年四月遭到了彻底失败；他抛掉他的军队，自己逃到了布拉格。西科尔斯基把他手下绝大部分的军官都争取过来了，但他的部队大部分都四散逃走了。然而，他的军队有一部分却通过维列克隘口，来到了下喀尔巴阡山。大约有一千五百个人逃过了那历史上有名的关隘，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背着枪，另外的人却因更看重一些"贵重物品"，如塞在袋子里的被单或衣服，把武器抛掉了。兵士们穿着旧的奥地利制服，戴着象沙皇军队中的士兵常戴的小帽一样的贝雷帽。有个士兵穿着一件草绿的猎装，一条红色轻骑兵裤子和一双军靴；另外一个炫耀着鲜艳的乌克兰长袍，波斯尼亚裤子和鹿皮鞋。有的兵士年龄显得太小了，有的又显得太老了，衰弱不堪；不过所有的人都精疲力尽，又脏又饿。

"在匈牙利，人人都能尽量吃饱。"

这句口号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处于同样肮脏、疲惫的状态之中。他们中有些人隐约地想到：在喀尔巴阡山南面的战争也是他们的战争；那另一个人，"红色的彼特鲁塞维茨"，也许会给喀尔巴阡山人民带来彼特鲁塞维茨所搞不到的、也许是不想为他们去搞的那一切。

他们在四月三日黄昏到达维列克，就在那一天，红色的彼特鲁塞维茨在纳梅尼附近被俘了。维列克房子上的烟囱烟雾缭绕。

"他们在做晚饭了。"

疲倦的人们加快他们的步伐，连行军路上睡着了的人也开始走得快了。

到了林子的进口处，迎接他们的是机枪子弹。占领了这个村子的罗马尼亚军队，起初并没有放枪，直到这批没提防的乌克兰人走近了才开火。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大约有四百个幸存的农民士兵逃到了森林里隐蔽起来，罗马尼亚人没有追赶他们，他们太害怕这个森林了。

四百个人中一大半是伤员。几天之后，活下来的伤员已不多了。有几个伤亡人员，如果得到医疗护理，本来是几个星期就会恢复健康的。

两百多个乌克兰兵慢慢地向南前进，去寻找食物。在森林的南段，他们偶尔碰到了凯斯蒂卡洛红军的零星部队。象受到共同的命运折磨的人所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两支精疲力竭的军队，立刻在一场生死搏斗中互相扭住了。

维列克的铁匠凯斯蒂卡洛带着他的残部逃进潘娜·青卡的森林。他的军队，在内战时成了红卫军的北翼。当时捷克军从西面，罗马尼亚军从东面进逼蒙卡契，他这支部队被派去支援正在保卫拉科治古城的摩根斯特恩。这个犹太裁缝焦急地等待着凯斯蒂卡洛，但是没有等到。在凯斯蒂卡洛之前，已派去过一个红军轻骑兵连，但是也没有回来。于是只好放弃了这个古老城市，撤退到米科拉率领的红卫军主力驻扎的贝雷萨斯。

红卫军的北翼没有去支援摩根斯特恩，是因为军队里出现了意见分歧。红卫军中那些不是维列克附近的人，拒绝承认凯斯蒂卡洛是他们的司令，因为他们认识这位芬兰铁匠还没有多久。凯斯蒂卡洛打算让索帕科来指挥，但是他们又不承认。因

为索帕科本人当伐木工人时，他们就已认识他，对他可太了解啦。为了决定谁来当司令，他们开了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议。这期间罗马尼亚军队封锁了通往蒙卡契的道路。三天的秘密会议结束，凯斯蒂卡洛重新当了司令员，可是已经太迟了。凯斯蒂卡洛打算向南突围，与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和他的部队会合，但是在通过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防线时，受到了重大伤亡。于是他带着他的残部逃进了森林。

这两支凄凉的残余部队的前哨在森林中部相逢。接着，那里发生了零星的战斗，也发生了一些友好往来的事。开始时，他们多半是战斗，后来，友好往来越来越多了。没多久，他们人人都听从凯斯蒂卡洛了。

凯斯蒂卡洛感觉到了他已能牢牢地控制他的军队的时候，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他把军队委托给一个名叫戈利基的伐木工人指挥，自己就离开森林走掉了。兵士们认为他准是去找食物了吧，事实却并非如此。过了一个星期，凯斯蒂卡洛回来了，同来的有两个人——一个青年，一个老太婆。年轻的是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老太婆是马鲁莎·彼特鲁塞维茨。

我和米科拉在结成硬块的雪地上来回走着。他问我，我回答。我对每一句问话，回答的总是这两句中的一句：不是“他已死了”，就是“他成了叛徒”。

米科拉只要听说他的一个老朋友已经死了，就默默无言，闭上了眼睛，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米科拉听到他原来认为是同志和兄弟的某个人出卖了革命，他就会握紧拳头，向空中打去。

四周一片死寂。大橡树的压满白雪的秃枝在微风中无声地摇曳。

"我们中有几个人还活着,"我叹了一口气。

米科拉哆嗦着,把披在肩上的粗毛农民大氅拉紧一点。

"那么福洛普·西维拉呢?"他几乎是恐怖地问道。

我迟迟不答。

"说吧——他死了,"米科拉对我叫道。

"他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垮台,他就被逮捕,关在马吉特·波尔瓦特街上的监狱里①。他们严刑拷打,折磨了他三个月。和他同监的人说,他身上的肉一条条挂了下来。他们挖掉了他一只眼睛!不论他们怎么对付他,他总重复说,他的行为是出于信仰,惟一抱憾的是不能做得更多。"

米科拉舒了一口气。

"你真的一刻也没想到,西维拉……"我说,但是米科拉打断了我。

"福洛普·西维拉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断然地说,几乎是在叫喊。"你只有在我们的人里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出现这样的人,我们这里是唯一的地方,"他异常庄严地加了一句。

亡命之徒用橡树枝和松树枝搭成的简陋的小屋,出现在森林中,好象沙漠中的牧人帐篷。这些小屋同牧人的帐篷一样通风。

凯斯蒂卡洛用罐头做的一盏灯,在屋里罩上了一抹鬼火一样的暗淡的微光,并没有使米科拉的小屋明亮多少。当我们围

① 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反革命时期的臭名昭著的军人监狱,今日这条街,名叫"烈士们的波尔瓦特"。

着桌子坐下来时，这灯光没有辜负我们，而是鼓舞我们。马鲁莎奶奶从我的背包里找到一些佐料，给我们做了晚饭，吃饭时，她给大家喝了一瓶杜松子酒。米科拉和马鲁莎奶妈坐到桌子边来，都穿着羊皮大氅，我还穿着城市的上装，但凯斯蒂卡洛脱下自己的大氅，把它披到了我的肩上。接着，表示他太热了，又脱下了帽子。

晚饭后，米科拉、凯斯蒂卡洛和我就谈论着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很难说服米科拉，使他相信，我们这些没有警察追查的人，应该回家去。我的话无法打动他那顽固的脑袋，凯斯蒂卡洛比较懂得米科拉的脾气。

"你说人们如果回到家里，他们就会忘记自己是红军。我看，米科拉，如果他们留在森林里，他们才更会忘记自己是红军呐。不错，你来了以后，纪律是抓紧了，但是我不相信在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之间纪律能长久维持下去。这是办不到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回家，只要他们斗争，一定能谋得生计的——只要他们参加工会工作。"

"你别真的以为那有名的大赦会真正兑现，你能依靠这个吗？"米科拉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我们不能依靠大赦，不过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利用大赦。情况一清二楚。哈布斯堡王朝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无论经济问题或民族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前是匈牙利的老板剥削斯洛伐克和罗斯的农民和工人，现在是捷克的老板剥削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斯的穷人。也许他们不太残酷，但是他们的手法更笨。他们没有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老板那样丰富的经验。如果一个匈牙利州长偷了一万福林，公众只会听说是一千。如果一个捷克州长偷了一千克朗，公众却相信是一万。"

“那是不重要的，”米科拉反驳道。

“不是唯一重要的，”凯斯蒂卡洛校正他。“不过那也是重要的。那会削弱捷克的老板们，使他们不能同时与共和国的各少数民族(加起来占人口的大多数)和工人作战。自然，当捷克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太薄弱的时候，他们就会和德国匈牙利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捷克、德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斯的工人。但是，当资产阶级之间彼此作战的时候，我们的情况就要轻松些。这就是捷克政府不得不批准一次大赦的缘故。也就是我们必须立刻好好利用这次大赦的缘故。锯木工人和雇农就要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今天或明天……现在，既然我国发生了革命，工资斗争就跟过去有点不同了。工资斗争只是一个起点。”

“如果警察注意到我们在活动了，他们就会抓我们。”

“你错了——他们要有可能抓才会抓。不过他们没有力量抓人。你，米科拉，总是把残忍和力量混为一谈。下喀尔巴阡山的新老板们因为很衰弱，所以才这样残忍。他们内部也在争吵。你忘记费尔德曼讲过的话了。”

“费尔德曼不能说牛的奶是从角上出来的。”

“你又错了，米科拉。费尔德曼总知道，一个人在用右手做事时，也会想用左手试试的。问题是，”凯斯蒂卡洛对我解释，“你冒险到这里来是否对，米科拉说赫德拉要抓你，费尔德曼的意见是我们不必怕赫德拉，因为赫德拉太狡滑。他揭露的密谋是他虚构出来的。他也善于此道。他喜欢干这种事儿，而且很卖力气。这花了他很多时间，因此他任何事情都没有空去干了。”

黄昏时，灯芯很早就灭了，我们在黑暗中谈着，时时听到远处的狼嗥声。

当我们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取得一致时，天已破晓了。马鲁莎奶妈在我们这次漫长的偶尔有热烈争论的会议期间一直坐在我们旁边，一言不发，现在她说话了。

“一切都好好的，格查；我们必须忍受上帝给我们的苦难。不过你回到这个不幸的国家来，又打算住在这儿，这可就不对了。你走吧。”她叫道，“离得远一点，到别的地方去吧，到那人与人不象野兽那样彼此残杀的地方去。象天上肯定有一个上帝一样，一定有一个国家，人们是彼此相爱的。”

“有，妈妈，有这样的国家。”米科拉抢着说，不让我有机会回答。“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也会象那个样子，我们将要使它变成那个样子！”

“你们是一帮该死的傻瓜，”马鲁莎怒气冲冲地对他说。

第二十八

贝雷克州工会的总部设在蒙卡契。主席是斯捷潘·洛科。他如果不老是提心吊胆，唯恐好景不常，那就是活着的人中最幸福的了。这位身体健壮、已经秃顶的五十来岁的砌砖工人，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间在蒙卡契唯一穿戴上过浆的笔挺的硬领的本地人；他自从升迁到他认为掌握大权的位置以后，就显得怕一切东西，怕一切人了。就是在坐到椅子里之前，他也要小心翼翼地用他那双近视眼检查一下椅子。

洛科参加建筑工会已二十二年，而且每星期按时缴纳会费。他虽然从来不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但是他捐款给报纸。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在工人运动中会变成一个超过普通会员的人。革命中出现了一些新人物，他们并不十分强调按时缴纳会费，洛科在新的陌生的世界中感到不安。后来，当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摩根斯特恩和凯斯蒂卡洛开始组织红军，洛科就离开了运动。因此，当工会恢复以后，他可以老老实实地说，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在革命时期不曾“有损”自己名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作为工会主席，签发工会证；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把工会图章看得太神圣了，不敢用肮脏的手去拿它。他尝惯了当工会官儿的美味，就老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件什么事，有一个什么人把他扔回旧日的生活中去。“二十二年来，我一直是工人运动中的普通一兵。”他自豪地说。可是当

他想到如果重新去当普通一兵时，他的牙齿就打战了。

当我回到镇上的时候，洛科肯定我到蒙卡契来的目的是要来当工会主席。他怕我，所以决定吓唬我。

“捷克人是十足的两面派，”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就对我说，“他们宣布大赦是引诱侨民回来。不过，如果有人想重新参加工人运动，肯定立刻就会给抓起来的。”

“换句话说，洛科同志，你不赞成巴林特同志补缴过去的会费吗？”费尔德曼问。

洛科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之后，收下了我的会费，发了我新的会员证。

费尔德曼省悟到洛科为什么烦恼，想了一个法子来对付这一形势。

“老头子的妒意使事情好办得多，等到他知道你不打算留在蒙卡契，他就会准备给你所要的一切帮助。这个老头子是能够影响当局的。”

费尔德曼猜得对。当我告诉洛科，我因为肺不好，不能住在这个城市，请他帮我当个索莱瓦工会书记的时候，这个老家伙几乎快活得搂住了我的脖子。用不着我催促，他表示愿意给我搞旅行许可证；没有这个许可证，我不能调换住处。他还给我搞了居留证；没有居留证，一个人不能定居。洛科交给我两张许可证和一份工会决议，决议的文字虽然含糊，但是可以看得出我已被任命为索莱瓦及其附近地区新组织的工会书记。

“我要求你答应我做两件事，巴林特同志，”洛科在我们将分手时对我说，“听听我这个有经验的人说的话。第一，一个不按时缴会费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种可疑分子越是快点清除出工会，对工会和工人阶级越是有好处。第二，我要提请你

注意，对于那些在革命时期有损他们自己的人，不准他们加入工会。这样的人只会给工人运动带来麻烦和危险。”

我听到他竟会这样警告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费尔德曼代我作了回答。

“你不必担心巴林特，洛科同志。他一生坎坷，如今只求小小的平安。这就是他要求当个工会雇员的真的原因。而且巴林特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知道，在当局发给他旅行许可证时，洛科同志，你会给他担保。想必你不会猜想他会做任何损害你的事吧，洛科同志？”

在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我今天在铁路售票处看见的挂着的牌子，牌子上用捷克文、法文、斯洛伐克文和罗斯文四种文字写着：

> 售票员不懂匈牙利语或意第绪语。如用这两种语言询问，他将不予回答；用这两种语言要求购票，也不予出售。

捷克人是匈牙利沙文主义者的忠实信徒。捷克人所唯一需要的，是去编些故事，证明为什么菜炖牛肉不宜吃，为什么马扎尔人不是人，为什么要快点恢复老样子。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到了目的地。天下着大雪。我们四个人一下火车，十个宪兵就围住了我们。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的宪兵办公室，检查我们的旅行证件和居留许可证，检查我们的行李。除我之外其他三个旅客都是农民。我表面上多少象个绅士。因此宪兵们先结束对我的检查。他们认为我的证件都合适，就准许我走了。

我到了蒂姆柯家里，找到了蒂姆柯。洛科给了我一封介绍信。他不识字，要我念给他听。

蒂姆柯和他怀孕的老婆以及三个小孩，住在一间低矮然而

宽敞的房子里，有一扇长窗——这房间还可以当厨房，关山羊。我接受蒂姆柯的邀请，暂时在他家住下来。

我还没有脱下大衣，就有人来看蒂姆柯了。一个犹太老婆婆来求他帮忙。老婆婆诉苦还没有诉完，一个装假腿的士兵又进来向蒂姆柯求教。我的主人，五十岁上下，身体结实，白发苍苍，棕色胡子，是个极得人心的人。他蹲监狱蹲白了头发，使他赢得了声望。他让他的胡子长到了腰部。在马拉马罗斯审讯的咸鲱鱼事件中，他把警察引上了歧途，并在审讯室表现了非凡的勇气。蒂姆柯象米哈尔科一样，对法官谈到人民。米哈尔科强调人民的力量；而蒂姆柯则坚持说，不仅老板们、而且人民也是上帝的儿女。

蒂姆柯被判了五年半徒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救了他。他没有卷入革命。在捷克人占领索莱瓦时，有一个被俘的罗斯红卫军的母亲曾来向他求助。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我的老太太？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工人。"

"你是被匈牙利人关进监狱的，捷克人不能说，你是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走狗。"

"这倒是真的。他们最多叫我生虱子的罗斯人，"蒂姆柯想了一会儿说。

蒂姆柯去见占领索莱瓦的捷军司令官了。值班的上尉若不是个非常大方的人，就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当蒂姆柯告诉他，他怎样受匈牙利人的迫害，他们逼他吃咸鲱鱼时，上尉高声大笑。他硬把烟递给蒂姆柯。他凭蒂姆柯的担保，就把那个红军战士放了。自然，那以后，有十个女人围住了蒂姆柯，求他去替她们的儿子、丈夫或兄弟说情。现在蒂姆柯上捷克司令部去，

就象到自己家里去一样了。有一天，一个中尉值班，当他知道了这个形迹可疑的罗斯人是来求他做什么时，便把他轰出了司令部。第二天，蒂姆柯又去了，原来那个上尉又值班了。他听也不想听蒂姆柯要说些什么，而且在把他赶出去之前，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掉了他两颗牙齿。

从此以后，索莱瓦人知道蒂姆柯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女人们从四方来向他求助或请教。他什么人也帮助不了，因为接替部队司令部的是宪兵司令部，大门也不让他进去。不过他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出了些主意。

几个星期以前，洛科到索莱瓦来了一趟，委任蒂姆柯重组工会。蒂姆柯的工作是夜里守夜，早晨睡觉，下午可以自由地从事他的事业。我来到镇上后，他立刻向我报告了他所做的有关工会的工作。他谈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匈牙利话中夹杂着罗斯话，谈工会问题时常引用《圣经》。他时不时地停下他的报告，去给来访者出些主意。他的报告真不好懂；不过我还是能作出结论：他对工会工作什么也没干。

“如果现在我们一起来干，”我的主人结束时说，“工作会进行得更快一些。”

到了晚上，又有几个人到蒂姆柯家里来，那是来找我的。他们说，他们要跟米科拉的奶兄弟谈谈。蒂姆柯、我和四个客人围着盛满爆米花的面包篮坐着。在我们谈话时，除了蒂姆柯的孩子们不时从面包篮里抓一把爆米花之外，没有人来打搅我们。

我记不得这四个客人了。他们说，他们记得我的童年时代。其中一个名叫维霍拉特，因为头顶上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脂肪瘤，村子里都管他叫双头维霍拉特；他甚至提出了一种表示认识我的证据。

"同志,你当时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双头维霍拉特搔着他那个小头,回想着。

话题转到了福洛普·西维拉。我注意到他一生善行没有白费,也没有被人忘记,深深地受到感动。福洛普舅舅的形象在村民的记忆中越来越高大了。在他死后,村民们编的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他那寓言般的一生经历。维霍拉特说,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一线生机。每个人都认为新生的婴孩已经死了,他的父亲、神父的马车夫已经决定把他送到墓地里去。但是米科拉的母亲马鲁莎把他送到了犹太医生那里。西维拉医生从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向那个闭眼躺在那里的婴儿又青又硬的嘴里倒了几滴血红的药水。婴儿的眼睛睁开了。米科拉的第一次眼光就落到了犹太大夫身上。当时西维拉对苏醒过来的孩子说:"活吧,儿子,你要永远这样活下去,别让我懊悔把你救活了。"

"他的话并非完全如此,"蒂姆柯告诫维霍拉特说,"犹太大夫告诉米科拉,'儿子,你要活得和死得不让我懊悔把你救活。'"

"犹太大夫根本就没有说到死,"维霍拉特抗议道。

"不过他知道——他是一个机灵的有学问的人,他知道有生必有死。"

话题又从西维拉转到革命,从革命转到捷克人,从捷克人又转到了索莱瓦的形势。虽然我提的问题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但是这番谈话使我知道了事态的大概。

锯木厂停了七个月,又开工了,当机器闲着的时候,工厂换了两次老板。七月初,法国人从以前的老板维也纳的股份公司那里买下了这个工厂。到了九月里,法国人又不想干这买卖了,工厂又回到了维也纳银行家手里。十二月,前厂长米哈莱又回

到了索莱瓦。在革命时期，当工人要杀他的时候，他逃得无影无踪。厂里两个以前的工程师跟着米哈莱一起回来了，还带来了两个新的工程师，都是捷克人。此外，在工厂管理处还有六个捷克人，都是退伍军人。到一月份，工厂复工了。米哈莱付给工人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前一样的工资。

"这是天公地道的。"米哈莱说，"经过一次革命你们没有得到好处，革命失败我也没有多赚钱。所以毫无变化！"

因此，米哈莱付给工人们的是他们在一九一八年收入的那几个克朗。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件事不公平。然而没有一个人靠这点工资能够生活。因为在这一年半当中，克朗已经贬值到从前五分之一的价值了。

工厂复工后，米哈莱把木材一车一车装起来，集中运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人又出现了。

两个法国公民和一个法国军事工程师来到了索莱瓦，这批先生们上上下下察看了这个工厂之后，通知米哈莱，他们准备买这个厂。然而米哈莱断然拒绝了，出售的事连谈也不想谈。法国人打了电报给维也纳，回电来也不肯卖。他们很生气，甚至没向米哈莱道别，就离开索莱瓦，到乌日哥罗德去了。

蒂姆柯早就走开了，他的太太也已把三个孩子安顿上床，可我们还在谈话。有几次我打算把话题转到工会上去，但是我的几个新朋友对此不太感兴趣。我想，这些人是把工会看作一个危险的题目吧，所以生怕在我面前公开谈起。不久我就发觉了，他们对此沉默，是另有缘故，因为他们乐意谈的一些问题倒确实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喜欢问我关于米科拉的事，关于他住着的国家——苏俄的情况。关于这个话题我知道得不多，或者不好说，我不愿意谈，于是维霍拉特接过了话题。

“索莱瓦人无论在哪儿都能找到出路。”维霍拉特说，这个伐木工人，因为偷猎，已经蹲过四次牢。“无论哪里，他都拿得准。他需要钱，就上美国；他要寻求正义，他就去莫斯科。米科拉到莫斯科去就是因为他需要正义。这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全体人民，为喀尔巴阡山人民，也为其他一切人民。因此，废话少说，我只说这一点就够了：米科拉一挣脱把他捆在监狱墙上的铁链，就杀死把守牢门的刽子手，逃出监狱，径由维列克一直逃到莫斯科去了。他不吃，不喝，不睡，赶了七天七夜的路。一路上，他得爬过两座大山，游过两条河流，米科拉在第八天早晨到达莫斯科时，列宁在等着他。我们的列宁和我们的米科拉在一间金墙壁的房间里谈话。这个房间是从前沙皇接待他的客人法兰西国王和土耳其苏丹用的。列宁紧紧地拥抱了米科拉，吻了他。列宁让他坐在土耳其苏丹经常坐的那张椅子里，还用那只法兰西国王经常使用的盘子装东西给他吃，等米科拉吃饱喝足了，我们的列宁对他说：

“‘呃，米科拉，我的孩子，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们下喀尔巴阡山的弟兄们在干什么，他们过得怎么样？’

“于是米科拉谈起来了。

“列宁听了米科拉第一句话，脸上就惨然失色了，听第二句时，流下了眼泪；听到第三句时，两手握紧了拳头。

“‘够了，’他对米科拉叫道，‘我一切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他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声调继续说，‘说说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米科拉问。

“‘人的信仰，人的力量和人的勇气，’列宁答道，‘这三者有了，地狱会变天堂。下喀尔巴阡山有信仰、力量和勇气吗？’列宁问米科拉。‘肯定有。’米科拉说。‘那你就可以告诉我们下喀尔

巴阡山的弟兄们，不久一切都会跟过去不一样……'"

客人说声明天再来，都走了。房间里留下了一片烟雾。蒂姆柯太太在地板上铺了一件羊皮大氅和一件普鲁士军官的厚大衣，让我睡。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科拉在莫斯科？"上床之前，我问。

"大家都知道他不在莫斯科，"蒂姆柯太太回答，"那个吹牛的双头老家伙比谁都清楚，他知道米科拉在哪儿。他每逢星期日都给米科拉送饭去。"

"那么……呃……那么……列宁答应过，情况不久会好起来这句话是假的罗？"

"他答应过的，"蒂姆柯太太说，"这也是谁都知道的。就连那个老流氓维霍拉特也不敢造列宁的谣啊。"

蒂姆柯第二天早晨叫醒了我。

"米哈莱经理要和你谈谈，巴林特同志。"

"工厂的经理！要同我谈？"我以为是我的听觉不灵，可是蒂姆柯重复说了一遍。

"米哈莱要找我干什么？"我困惑地问。

"上帝知道，"蒂姆柯说。

我没有浪费时间多加考虑，决定到米哈莱那儿去，看他要我干什么。从蒂姆柯的房子到工厂得走完整条大街，工厂管理处就在种着冬青的院子里。

说到索莱瓦这个市镇的外表，在我离开的十八年之间，一点也没有变化。在那些熟悉的街上，还是那些房子。房子前面还是放着旧木头凳子，就象我童年时代一样。就是新造的房子，也和旧房子一样小，一样暗。只有一所房子才算得上是新的，就是建筑在锯木厂后面的那座三个烟囱的化学工厂，它并不比以前

那个厂大，不过看起来更象一个工厂罢了。在我童年时，觉得环抱索莱瓦的群山象巨人一样，现在它们似乎已经缩小了。但是依然满山白雪，艳丽如故。

在我童年时，米哈莱还没有住到索莱瓦来，但是估计他不久就到了索莱瓦，因为——根据他后来对我说的——他清楚记得福洛普·西维拉(他称他为“不幸的西维拉”)。米哈莱倒梳着一头白发，留着灰色的匈牙利式的翘胡髭。他的蓝眼睛晶晶发亮，活象孩子的眼睛。这位厂长说话扼要而坚决，行动惊人地敏捷，很难令人相信他已经是年逾六十的老人，而且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

“巴林特先生，我请您来，是因为听说您是不幸的西维拉医生的外甥，我衷心地为您的舅舅感到惋惜，虽然我知道那只能怪他自己。我真不懂，象西维拉那样一个聪明人竟会这么傻。”

厂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言归正传……如果我说话坦率，您不见怪吗？”

“决不会——我宁愿您如此，先生。”

“好！那么，我们厂不需要任何工会，也不赞成任何方式的团体。我们已经够啦。如果工人们没有从他们的经验中受到教训，我们可已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受到教训啦。因此，您必须离开索莱瓦，您可以去您愿意去的地方。我亲自给您办一张旅行证。如果您今天离开工厂，我，将送您一百块钱。钱虽不多，到底是钱。当然，我们两人之间的协议是保密的。如果您明天走，只有五十元。如果您后天走——那您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因为不管您愿意不愿意，后天您就必须离开这个市镇！”

我听了他的建议，惊讶得目瞪口呆，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这种公开的威胁却多少使

我从麻木中清醒了过来。

“请问，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明天下午两点钟不离开镇上，我就在明天晚上请宪兵司令和索莱瓦驻军军官吃饭。如果我告诉那两位先生说，布尔什维克煽动者已经到了索莱瓦镇上，我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那两位先生如果结束您那套买卖，那不过是尽他们的职责。我的话说清楚了吗？”

“十分清楚，请您告诉我，先生，在匈牙利人统治的时代您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我讲话吗？我相信您是一个匈牙利爱国者，可是您向捷克宪兵告密。虽然您的三个儿子——”

“别提我的儿子，”米哈莱厉声说。“说到我的爱国主义，年轻人，我是一个工厂的厂长，这工厂是处于捷克斯洛伐克势力下的股东交给我管理的，在匈牙利统治的时代，也许我会用不同的口气，但是，相信我，我是会照样行事的。虽然，不幸的是：对于我们现在必须知道的东西，当时我们却懂得不多，好吧，我们的话结束了，先生，您要一百块钱吗？”

当我惊讶得发呆的时候，我极力克制自己，差不多可以说到了无能的地步。因此，一旦怒气激发，我就完全爆炸了。我怒火中烧，使用了我可能从来不曾用过的语言。

米哈莱脸色发紫，握紧拳头。我想他要打我了。然而，在我还怒气冲冲时，他却恢复了自制。他打了一下台子上的铃，几秒钟后，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开了门。一个姑娘走进房间来，我猜她是个打字员。

“请你把巴林特先生送出去，维塔斯小姐。”

为了消除我的怒气，我爬上了双峰山。我觉得和十八年前，

当“罗斯军”和“匈牙利军”在山坡上用剑交锋的时候相比，这条山路显得短了许多。除了贴近山边的村庄，以及平分村庄的小河，看上去都小得多了。我没有走到山峰上，因为折断的大树干把路阻塞了，我得绕着走，越走越疲倦了。为了避开一株老橡树，我一个失足，膝盖陷入了一个积雪的炸弹坑里去了。

半路上，我停下来在军人公墓歇一歇。竖立着的十字架，几乎已埋在雪下，象士兵们一样，排成整齐的一行。这些士兵们都是前几年来此为弗朗西斯·约瑟夫而丧生的。英雄们的名字，经过日晒、雪洗，早已磨灭了，但到处有一顶破破烂烂的旧军帽挂在十字架上，说明在一九一四年秋天，蒂罗尔①皇家步枪队曾经为了保卫索莱瓦而跟沙皇的军队作战。我虽然不能看到这座山的北坡，但是我知道，那儿也同样整整齐齐地竖立着一排排希腊十字架，十字架下面躺着的是到喀尔巴阡山来为沙皇而死的人们。我很想对死亡作点哲学研究，死亡这件事是非常悲惨的，即使有千百万人为之牺牲的理由和目的，它也已经不再可怕，而变成了悲喜剧，只令人厌恶……后来我想到了米哈莱，我的哲学的情绪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

“我们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把敌人当作是傻瓜、瞎子、聋子和残废。”

山坡上很冷，我浑身已经湿到膝盖了，我急急地赶回家去。当我几乎是跑着穿过山谷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叫唤我。

“格查·巴林特！格查！”

直到那人报了名字，我才认出了，原来这个面孔修得光光的、穿一件德国大衣、戴一顶灰色宽边软帽的独眼人，是我从前

---

① 蒂罗尔，奥地利地名。

的同学沙拉达的弟弟小沙拉达。沙拉达和我在学校里共坐一张书桌，他已死在塞尔维亚前线。他的弟弟，在阿尔巴尼亚损失了一只眼睛，现在是索莱瓦的教师。

“我听双头维霍拉特说，你当了俄国的俘虏，你见到了列宁，还听过他的讲话，”小沙拉达说。

“我没有当过俘虏，我不懂为什么维霍拉特要说谎，”我激动地说。

“他是出于好意，你可以相信。你已经很久不在这儿了，因此你会说他说谎。”

“我很久不在这儿了？那么，难道你不知道我参加过罗斯红卫军？”

“我知道，维霍拉特也知道你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过米科拉。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尊敬你，说你看见过列宁的缘故。”

“老实说，我没有用身体保护过米科拉。”

小沙拉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已经很久不在这儿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不过你现在在这儿——而且打算留在这儿，这才是重要的。”

“你在罗斯学校里教书吗？”我换了一个话题。

“我只是说我是教师，我没有说我在那里教书。现在，学校当作宪兵营房了，已经有九个月。他们答应把校舍腾出来，可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拖着，他们答应……到目前为止，我和另一个布拉格来的青年教师只好下象棋。”

小沙拉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你有时间的。自从捷克人接管以来，工厂工作时间缩短了两个小时，不过中间没有休息，四点钟停工。”

我们在吃炖肉午餐的时候，我遇见了另一位教师，约罗斯拉

夫·斯坦涅克。他和小沙拉达都在匈牙利邮政局长的寡妇家里搭伙。斯坦涅克是个又高又瘦的灰色眼睛的年轻人，一身穿得象个运动员，是布拉格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虽然斯坦涅克培训出来是当中学教师的，但是他为了在解放了的斯洛伐克弟兄之间传播文化，自愿到小学工作。他在喀尔巴阡山区的环境里并不象他原来所预期的那样，但是困难反而激励了他的斗志。他接二连三地发电报到布拉格，催他们腾出校舍来。他每星期两次去乌日哥罗德，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捷克人，他比罗斯人小沙拉达一月多拿四百克朗。他把这笔钱花在取回校舍的斗争中。他把大部分的薪金花在买书送人上，他恳求人们读书，研究，成为有文化的人。他在布拉格学了二年俄语。他在这里跟小沙拉达学习罗斯话。他说罗斯话，可是不懂捷克话的人却很难听懂他的话。他跟我讲法语。

他相信我是从俄国俘虏营逃回来的，他很高兴终于能够听到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谈谈“伟大的斯拉夫兄弟”帝国所发生的一切。当我否认我被俘虏过时，他感到十分失望。当他“明白到”是我不信任他，因而不肯告诉他我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时，他涨红了脸，几乎要哭了。我对他讲了一些我在索莱瓦求学时期的轶事，作为对他的安慰。不过我的轶事没有使他发笑，反而使他凄然。

“我为我的罗斯弟兄们受到这么多的痛苦感到难受。不过我也的确很骄傲，”他稍稍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捷克人解放他们，给他们带来文化。到了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罗斯文化攀登了高峰，他们会怀着感激之情思念我们的，是我们创办了第一个罗斯学校。”

这种想法使斯坦涅克怀着这样的激情，使我不忍提醒他，眼

下可是宪兵们在学校里传播文化，用的是他们那种特别的、十足国际上的方法。过了十一年，我陪着斯坦涅克同志观光莫斯科时，我向他提到了这段往事，斯坦涅克脸红了，然后笑了起来。

“宪兵们并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坏的教师。如果不是他们教训得我青一块乌一块，也许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他们第一次用橡皮警棍审讯我的时候，我才看到了学校的内情。”

刚过五点钟，我们二十来个人就都来到了技工萨穆·伊科维支家里，他住在村子边上。当我和蒂姆柯一同到那里的时候，所有被伊科维支和蒂姆柯邀请的人，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全都到了。伊科维支太太把两个孩子带到蒂姆柯家里，好让我们空一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很挤。

伊科维支给每个客人一把煮熟的玉米，并且给大家斟了一瓶家酿的杜松子酒。一瓶酒喝完，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蒂姆柯要以祈祷来开始会议，但是我们主人叫他走开，自己来主持会议。伊科维支身上穿的那件别人丢掉的轻骑兵上装，跟他那乌黑的胡须，灰黯的杏仁眼，特别是跟他的粗呢裤子和软拖鞋形成了奇怪的对照。伊科维支声调柔和，然而说得很坚决。他以面包、玉米、大麦、烟草、火柴和煤油的过去和现在的价格作比较，证明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一九一八年的五分之一的程度，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虽然我没有核对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索莱瓦或哈斯法尔瓦或波莱纳，一年来没有一个工人买过鞋子或衣服。许多工人的孩子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钱给病孩子买一杯牛奶，更不用说请医服药了。”

“萨穆，你不用拿这种话来教训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开动脑筋的。你倒不如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局面，”维霍拉特问。

“这实际就是我们所要谈的，”伊科维支不慌不忙地说。

当我在小沙拉达家里时，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米哈莱；伊科维支讲话时，我也一直在想着这个人；他的威胁，是不能轻易忘却的。我脑子里闪现着无数的冒险计划，但是我知道，任何一种举动都不能阻止米哈莱去告发。直到伊科维支在叫我发言了，我已没有时间再加考虑，我这才作出了该怎么办的决定。我此刻如果提出重建工会是首要任务，那是人人都会同意的；不过那样一来，我可以肯定，到了后天，我就会给撵出索莱瓦，我知道，那样的话，工会还没有复活就会夭折。

“第一步是为增加工资而斗争，”我说，“我们要求把现在的工资提高六倍。”

“提高十五倍，他们贝雷萨斯的就是这样办的！”双头维霍拉特插嘴说。

“六倍，”我重复一遍。

“别讨价还价，你这狗崽子！……这里不是市场。”维霍拉特吼叫道。

“我们该要求些什么，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巴林特同志比你知道得多，”伊科维支规劝道。

“可是挨饿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赤着脚。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饥饿的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我要杀死出卖我的权利的人，我发誓要杀死他！”

“安静！”伊科维支的声音出奇的有力和尖锐，压倒了二十个人的喧闹声。说也奇怪，顿时一片寂静了。

“维霍拉特——你说你比谁都清楚该怎么办。可巴林特同志亲眼见到过列宁，亲耳听到过列宁讲话。难道你比他更清楚吗？说啊！你比他更清楚吗？”

维霍拉特不作声了。

“说啊，要不就打我吧！喂……说下去啊，搞点名堂！”

维霍拉特愁眉不展地坐着，神经质地摇着他的小脑袋。

“就这样，我们要求把现在的工资提高六倍，”蒂姆柯说，“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干的话，一定有希望——上帝保佑。现在请说下去吧，巴林特同志。”

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下喀尔巴阡山的工资斗争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怠工。我还知道怠工运动一旦开始，就是把我抓起来，也阻挡不住了；抓我的话，只会使怠工火上加油。

当我演讲时，维霍拉特恢复了沉静，等我讲完，他又开口了。

“巴林特同志，你的话讲得好，讲到我心坎上了，”他说。“我们要求现在工资的六倍，一个小钱也不能少。同样，巴林特同志的讲话中也有点小错误。他告诉我们怠工。他是对的。我们的人理解他的话，他们也高兴这样干。不过，我们也学到了另外一点东西，巴林特同志；你不在这儿时，我们学到了一点东西。”

“说给我们听听，”我鼓励他，觉得他在转弯抹角说话。

“呃……我怎么说呢？我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吧。如果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譬如说，等大家睡了，我们就放把火烧掉米哈莱的房子，待他逃出房屋的一刹那，有个人，有个象我这样勇敢的人，马上把这个杂种杀了——嗯，那岂不是跟怠工一样好吗！”

“我要不是看到你只喝了一杯酒的话，我一定要说你喝醉了，维霍拉特同志，”我对维霍拉特说，没去理会这昏暗的房间的几个角落里传来的对维霍拉特讲话的低声附和。

“相反，”伊科维支抢在维霍拉特前面说，“问题是维霍拉特没有喝够。幸而这里另外还有一瓶。”

“把酒瓶也灌满六倍的工资吧，”维霍拉特叫道，“六倍算不了什么——不过总还是有一点儿。因此——”

在讨论别的问题时，他就不吭声了。到了分派任务的时候，我打算让他免了，但是伊科维支派他到住在离村庄最远的伐木工人那里去送消息。

维霍拉特在回家去时，紧紧跟着我。陪我在去蒂姆柯家的漆黑的街道上走着，我们默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是维霍拉特终于谈起来了，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话。

“想一想，格查；我求你想一想！如果你愿意想一想，你迟早会明白双头维霍拉特到底不是一个傻瓜。一个人脑壳里没有想到的，另一个人脑壳想到了。提到打枪，我可以和今天全体来的人比一比，你听见吗？在伊科维支家里，在那些象我一样的村夫俗子面前，我不愿多费口舌。我为什么要说呢？但是，你是亲眼见过列宁的人，我求你想一想，免得我们失去幸福的时机。”

我为了摆脱他，答应他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信守诺言。我躺在蒂姆柯的羊皮大氅上，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我脑海里闪现着一件件事情，我不知道宪兵今晚会不会来抓我。

他们没有来，第二天早晨仍是蒂姆柯叫醒了我。

“告诉你一个大新闻，巴林特同志！特大新闻！昨晚宪兵把米哈莱厂长抓去了。他们说他和下台的国王一起搞阴谋。”

蒂姆柯的新闻证明是确实的。昨天后半夜宪兵逮捕了米哈莱和工厂的两个匈牙利工程师，据说这三个人给装进卡车，送到蒙卡契或乌日哥罗德去了。

昨夜我们开会决定散布怠工消息，以迫使工厂提高工资，这一番努力算是白费了。宪兵关闭了工厂，一个卫兵守着大门。

三天后，工厂复工了。在这三天中，维也纳联合股份公司已

把工厂卖给了法国人。一个法国军事工程师被任命为厂长。另外雇了两个捷克工程师代替被捕的匈牙利工程师。其中一个穿中尉的制服。米哈莱被捕后几个小时，他们就到了索莱瓦。

人们很快给新厂长起了个绰号，叫他“法国米哈莱”。他是个矮小灵活的黑头发的人。身穿草绿军用布制的便服和一件军大衣。胸前佩着各式各样的勋章。他戴一副黑眼镜，当他在昏暗的房间里把眼镜摘下时，他那双眼睛由于中过毒气，混浊而发红，又没有睫毛，看起来真有点怕人。

工厂显然已经军管了。我们难以决定马上对工厂的军事领导挑战是否明智。我们还没来得及对此作出决定，这个问题就已变得毫无意义了。

工厂复工后两天，“法国米哈莱”派人来叫蒂姆柯。蒂姆柯作了最坏的准备。当他看到宪兵司令和厂长在一起，他肯定这下可糟了。但是，他错了。宪兵司令请他坐下，“法国米哈莱”还递给他一支雪茄。宪兵司令一反常态，喋喋不休地解释说（不大象是军人作风）：新厂长不象从前的厂长。他不把工人当作敌人。“法国米哈莱”是工人的朋友，但是他和索莱瓦工人不熟悉，因此，不清楚他们的需要；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谁有权代表工人说话，这他首先要了解，这样，他才可以询问他们，他怎样才能帮助工人。蒂姆柯为了有时间考虑，假装不懂他们要他干什么。当宪兵司令直截了当地要他讲出工人代言人的名字，以便他记下来时，他脑子里归结了两个计划。但是他不知挑选哪一个计划好。

“蒂姆柯先生，我知道，在这儿人家把你当做领袖看待。因此我想你一定知道哪些人是厂长能够同他们谈判的。”

蒂姆柯一下子想到的计划，是再重复一次他当年在马拉马

罗斯西格特受咸鲱鱼酷刑后的把戏：报几个根本没在索莱瓦待过的人的名字，或者，以前在这里住过，但已在战争中死了的人。等到宪兵司令拿起笔来时，蒂姆柯却又决定采取另一个计划。他报了十二个工人的名字，全是支持杜迪克斯神父或者支持弗兰克尔拉比的人；这样，万一宪兵按名单去把这些工人领袖抓起来，工人们也很容易找到替他们求情的人，而且不难证明他们一生都在对老板们奉承拍马，即使老板们经常变换，他们的马屁工夫是至死不渝的。蒂姆柯在"交代"时心里想，即使宪兵把这些工人代表稍稍责骂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

蒂姆柯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戏弄"法国米哈莱"，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明白，我在这里所遇到的问题，决不是按照我从维也纳所接受的指示所能加以解决的。我没有费多大劲，就明白到了这一点。十二个拍老板马屁的人怎能去为工人谈判呢……天晓得他们将谈判些什么，或达成什么协议，订契约又会给"法国米哈莱"以什么样的武器用来对付我们。另一方面，如果我提出一个人去参加谈判，他一去，在谈判时，他们准会打掉他几颗牙齿，打断他几根骨头的，到那时候，我若要恢复人们对我的信任，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宪兵打掉我的牙齿，打断我的骨头，比他们打我派去谈判的那个人多上一倍才行。

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容我作出决定了，可是，在我正沉默着的短时间内，维霍拉特和蒂姆柯已争吵起来了。

"你没有推举我们村子的稻草人去为我们谈判，还算不错呐！"维霍拉特嘲笑说。

"稻草人可不会谈判，"蒂姆柯平静地回答。

"那就是它胜过你的地方，"维霍拉特大声说。

伊科维支制止了他们的口角。

“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去冒险参加谈判，”他断然地说。

“我去，”维霍拉特说，“如果哪一只猪胆敢说我们不用提高工资，我就当着厂长的面，把他宰了。”

“那么‘法国米哈莱’就会举双手同意提高工资啦，”伊科维支说。

“如果你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也一起去，去显显你的本领吧。”

“好！我和你一块去！”伊科维支回嘴道。

“好。没有你，我们十三个人去参加谈判。我不是胆小鬼——不过十三这个数字要倒霉的。”

莫里茨·哈吞斯坦，一个弗兰克尔① 的支持者，知道他不得不去见厂长，马上就生病啦。因此，即使多了一个伊科维支，出席的还是只有十三个人。不过这一次，十三这个数字没有预示不祥。

这次，宪兵司令仍旧坐在厂长旁边。新州长，一个过去的军官，也参加了会谈。州长把“法国米哈莱”的话翻译成了罗斯话，那种忧郁的声调，和厂长的激动的语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宪兵司令把工人的话译成了法语。

厂长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米哈莱和他的两个同犯已经被放逐到匈牙利去了。“米哈莱是工人们的敌人，”新厂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没有这种人的容身之地的。我们在战争中流了四年半的血来结束战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继续说，在两星期内，化学工厂将要开工，管理部门正在从捷克斯洛伐克调来熟练工人，以帮助本地工人。最后，他问工人们有什

① 利奥·弗兰克尔，匈牙利人，巴黎公社的人民委员。

么要求。

“我们要活下去啊,”维霍拉特叫道。

伊科维支列举了一些数字,向厂长陈述了索莱瓦及其附近一带的苦难深重的情况。“法国米哈莱”感到很吃惊。

“有些事是该办了,”他对宪兵司令说。

伊科维支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该办了:工资应该按照工人的敌人米哈莱所定的标准增加到六倍。

“这是最低限度,”维霍拉特大声说,“不这样,我们就要饿死了。我可以打赌,如果我们要饿死,那饿死的就不只是我们了。”

宪兵司令没有答理维霍拉特;他只是注意着“双头”。

三位先生商量了几分钟,然后宪兵司令通知工人们,从三月一日起,工厂将付现在工资的六倍。伊科维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宪兵司令重复了一下他的声明。很快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我们知道工人们打算组织一个工会,”他说,“不论工厂厂长、州长或者宪兵,对此都不反对。我们将承认工会——只是有一个条件。”

“只要工会保证什么都不搞,”维霍拉特插嘴道。

宪兵上尉有两分钟没有做声,接着,没有回答维霍拉特的插话,又继续说下去了。

“我们将承认工会,工厂管理处愿意和工会商谈有关工人的各种问题——只要工会的书记不是俄国的战俘、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而是真正的罗斯人。”

“谁给宪兵这样的权利,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谁当我们的书记?”维霍拉特咬牙切齿地说。

宪兵司令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接受这个条件，”伊科维支说。

“怎么？那么你也是反对犹太人的？”维霍拉特冲着伊科维支嚷道。

“我就是这样的人，”伊科维支对他说，“诸位，”他对开会时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十一个农民说，“那么我们就接受这条件吗，增加工资和一个罗斯人的书记？”

“我宰了你，你这条犹太人的狗，如果你反对犹太人！该死的，我要把你杀掉！”当维霍拉特发觉他只是单枪匹马地在保卫匈牙利人和犹太人时，他怒吼了。

工资提高后几天，费尔德曼来看我，带来了消息和指令。我们猜测了好一会儿：“法国米哈莱”为什么对工人这么好，而且别的锯木厂也照索莱瓦锯木厂同样办理。我认为这是捷克左翼社会党人知道了下喀尔巴阡山发生的事情，对捷克政府施加了压力，而捷克政府又压了一下下喀尔巴阡山的实业家。费尔德曼坚持说，“马克思主义者左翼”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也不会行使这么大的权力，让工厂把工资轻易地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他的意见是：提高工资是帕里斯将军的作用，因为他急于要在下喀尔巴阡山赢得声誉。我不能接受他的观点；为了沽名钓誉拿出巧克力来是一回事，同意提高工资可又是另一回事啊。

“虽然工资提高了很多，但还是低的，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工资低得多，现在木材的价格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锯木厂大量赚钱。”费尔德曼说。

“这是事实，”我说，“不过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工厂的老板会想到他现在比两年前要多赚多少。他想到他今天付的工资要

比两个星期以前多，他才痛心呐。”

“这也是事实，”费尔德曼承认，“不过，还是不能说明问题。”

我在波莱纳森林里遇见了凯斯蒂卡洛，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已经到了乌日哥罗德，但是凯斯蒂卡洛还是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肯提高工资。我们还知道，德国工程师从一九一四年春天开始修筑的公路和铁路，现在正在法国工程师的监督之下重建。凯斯蒂卡洛认为捷克实业家需要推销次品的市场，就要牺牲下喀尔巴阡山工厂的老板，增加下喀尔巴阡山工人的收入以购买他们推销的商品。凯斯蒂卡洛说，米科拉告诉他，老板们害怕穷人们会想起红卫军。

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们都没有猜中全部事实。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能够反驳凯斯蒂卡洛的设想。

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有自然的原因。即使这些原因并不总是很容易发现的。

不论是米科拉还是费尔德曼，都不知道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有一次，我梦中在下喀尔巴阡山充满了传奇和公墓的森林里散步，当我正在为完全不同的问题而绞尽脑汁时，我才想出了提高工资的真正原因。就是现在，我也还常常梦中在森林中散步，在潘娜·青卡森林和昏暗的佩梅蒂树林的枝叶茂密的大树下，听到许多声音用三种语音喃喃地和我谈话。那些树木，用父亲、马鲁莎奶妈、米科拉、西维拉大夫、杀熊者米哈尔科和独眼龙霍泽列茨的声音跟我谈话。父亲对我讲他的经历；马鲁莎奶妈向我诉苦，并安慰我；福洛普舅舅向我解释。米科拉和米哈尔科发出战斗口号，霍泽列茨笑啊笑的，他那响亮的声音把我惊醒了。

喀尔巴阡山森林用许多声音来说话，有许多故事要说。古老的橡树看得多，知道得也多。有祖国过去的阴暗的故事，也有关于人民未来的光明喜庆的故事。正如我所说的，它们知道得很多，不过，有一天，我为了找寻另外一些消息，在翻阅旧报纸和旧书时所发现的事情，可连它们也不知道了。这些报上的作者和书籍作者，并不知道"法国米哈莱"，也不知道有个名叫索莱瓦的村庄。但是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个消息："法国米哈莱"到索莱瓦，是因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法军总参谋部作出决定，通过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道路，可最方便地为在加里西亚的波兰军队供应物资。"法国米哈莱"提高工人工资是为了遵照克里孟梭总理的命令。命令中说：

> 凡对战事协定有重要关系的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予以提高，以免布尔什维克煽动者把他们引入歧途。

克里孟梭的后台是威尔逊总统，威尔逊的后台则是金元。

如果有一天，我不仅是在梦中，而是真的到潘娜·青卡森林去散步，我一定要对那古老智慧的树讲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悲惨而残酷的故事。故事的题目叫做《金元》。

我从维也纳来到了蒙卡契。我在蒙卡契确实并没有碰到什么事情。几天后，另外又有六个政治流亡者从维也纳回到了下喀尔巴阡山。其中四个，二月里就在工资提高后很快成立的工会获得了工作，第五个在乌日哥罗德一个生产合作商店找到了职业，第六个则在贝雷萨斯的一个生产合作商店工作。我仍留在索莱瓦，在工会书记蒂姆柯身边当办事员。

我们两人同一天步行来到奥沙新村北面的森林里，那个新

村坐落在一块突出在潘娜·青卡森林之外的荒地上。我们在贝雷克的守林人卡特科的小屋里会晤。三月二日星期日下午，我们一大群来自祖国的各个角落的人，到这小屋里集合了。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和尤哈·凯斯蒂卡洛来了，蒙卡契的费尔德曼、索莱瓦的伊科维支和贝雷萨斯的贾诺斯·福蒂的寡妇也都来了。我们一共聚集了三十四个人。对每一个人作过介绍后，我们商谈了四个小时，最后，各人都象来的时候一样各自回去了。

“好，下喀尔巴阡山的第二十一个政党建立起来了。”当卡特科小屋里只剩下我们六个人时，我说。

“第二十八个，”费尔德曼校正我说，“看起来，你还不知道，在过去六个星期内赫德拉已经积极地组织了七个政党啦。”

“我们第二十八个政党是唯一得到群众支持的，”我笑笑说。

“我们是有党纲的，”凯斯蒂卡洛补充说。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实现我们的纲领，”米科拉坚定地说。

金 钱 的 气 味

那年春天来得真快，令人难以置信。二月中旬，大地上已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到二月底，雪就开始融化了。三月一日晚上，双峰山开始隆隆地响了。我童年时，人家对我说，双峰山的隆隆声意味着战争就要发生。我七八岁时，渴望双峰山发出声音，好让战争到来，但是它一点声音也没有。现在它隆隆地响了。它的响声——也许是叹息——是那样有力，不可能是人的声音；但是这声调又如此象人的声音，使我不得不相信马鲁莎奶妈有一次对我讲的故事。她说山里锁着一个巨人，他坐在黑暗中，一面哭泣，一面展望着未来。

第二天早晨，拉托卡河上的冰发出一连串雷鸣似的碎裂声。冰块堆积起来，把整条河流都封闭了。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这样的流冰壅塞，会造成索莱瓦北部的水灾，有时冲走了整个整个的村庄。现在壅塞的流冰被捷克的工程师炸毁了，所以没有水灾。

我以为索莱瓦的人都要谈论双峰山的轰鸣，迷信的习俗会使人看不清前途。然而，没有一个人为双峰山、或者山中锁着的巨人操心。让他隆隆响吧，如果他高兴的话！这一天，正好是工厂第一次按较高的比率发给工资的一天。谁还有工夫去想到山，想到隆隆声，或者想到战争？酒店老板通常只订一桶啤酒，前几天搞错了，给他送来了十桶，现在事实证明，十桶啤酒也不

够卖。过不了几天，又有一车捷克服装运到了索莱瓦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

捷克皮鞋、内衣以及凡是能赊购的东西——人们都大肆抢购。有事到蒙卡契去的村民们带回来的新闻是：在蒙卡契能买到法国肥皂、法国香水和法国葡萄酒。

确定提高工资以后不久，币值就不断下降，这一情况是没有人注意到的。生活标准又低于两年前的水平了，但是人们经历了这两年的苦难与损失，却都以为现在的生活比他们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好。他们嘲笑伊科维支热心于数字。

森林里长出新绿，山坡上铺满了紫罗兰。在战士坟墓的周围，鲜花开得特别茂盛，花瓣也更加鲜艳，它们的香气比任何别的花都强烈而芬芳。

每逢星期日，在酒店的院子里，一个残废军人弹着琴，索莱瓦的罗斯姑娘们就会聚集起来，和捷克兵跳匈牙利的查达斯舞。乌日哥罗德、蒙卡契和贝雷萨斯也都在跳舞。在贝雷萨斯的狮子旅馆里，法国军官跟匈牙利姑娘和犹太姑娘在跳舞。法国人多么会跳舞——他们多么会接吻啊！银行里又有了钱，人们又学会笑了。

全乌日哥罗德的人都在嘲笑一个名叫哈特曼的旧商人。因为他在他的请求书中申诉对他征的税太高。他在请求书中写着，他穷得只好把枕头卖掉了。乌日哥罗德州政府的税务官在回答他的申诉时，干脆向哈特曼征收一笔“出售枕头所得税”的新税款。

砖瓦厂老板马诺·柯霍特和犹太法典教师特拉茨克·纳汉曼之间爆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斗争，贝雷萨斯的人们引为笑谈。柯霍特是犹太工业党主席。特拉茨克是一个久经考验的

独立党的支持者，现在是匈牙利共和党的执行委员。柯霍特在三月一日那一份匈牙利文的犹太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他宣称犹太人在旧的匈牙利是受压迫的。特拉茨克作为回答，在犹太教堂的大厅里大骂柯霍特是个流氓。柯霍特去和贝雷萨斯州长一商量，州长封闭了特拉茨克·纳汉曼的犹太法典学校，出了一张布告，说特拉茨克在宣传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特拉茨克对于封闭他的学校的命令和动机非常气愤，可他手里没有报纸可以发泄他的怒火，因此他写了一封通函给各政党的领导人，还把副本分寄给帕里斯将军、西德拉赛克和赫德拉。特拉茨克在信中说出了柯霍特热心拥护土地改革的缘由。在某种程度上，帕里斯已经执行了马萨里克所答应的土地改革。一小撮匈牙利大地主为了躲避捷克人，已经逃到匈牙利去了。帕里斯把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了捷克退伍军人。然而这些军人不想变成农民，特别是不想在匈牙利边境的下喀尔巴阡山区当农民。他们觉得共和国分给他们的土地对他们毫无价值，就把它们卖给贝雷萨斯新近开办的农民银行了。马诺·柯霍特就是这家银行的行长和老板。

“马诺·柯霍特煽动分配土地，因为他能得好处，他是唯一受益的人，”特拉茨克写道。

这位热情的匈牙利犹太法典教师眼看他的信没有得到反应，甚至连封回信也没有，他就去拜访萨鲍尔奇·卡瓦西。后者已不再是个斯洛伐克人，已经变成捷克共和党的副主席了嘛。

“那么，您想捉弄一下柯霍特吗，先生？”卡瓦西问道，咧开嘴笑着。“可以办到；不过不能照你想的那样办。首先你必须退出匈牙利的党，加入一个捷克的党——依我看，捷克农民党。然后控告柯霍特亲匈牙利人……”

“我该加入一个捷克的党？我？一个匈牙利爱国者？”特拉茨克·纳汉曼愤慨地大声说。

“好啦，别孩子气，你是个匈牙利爱国者还是捷克爱国者，对您有什么两样？”

特拉茨克·纳汉曼又写了一封通函谴责卡瓦西出卖匈牙利人，称他为肮脏的叛徒。这封信倒带来了明确的后果。

特拉茨克被捕了，送进了伊拉瓦监狱——这件事在贝雷萨斯引起了一片笑声。

蒙卡契也有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个斯洛伐克学生代表团来到拉科治古堡，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庆祝堡垒的会议。一位大学教授演说，滔滔不绝地讲了关于费伦茨·拉科治这个题目。说他是斯洛伐克的英雄，说他为了斯洛伐克的自由而对皇帝和匈牙利贵族作战。这位斯洛伐克演说家，为了唤醒拉科治精神，号召向一切匈牙利人或布尔什维克宣战。蒙卡契州长为这批斯洛伐克客人开了个招待会，蒙卡契的村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参加了这个集会，尽情欢笑。

除了这些当地的轶事，还有一些在全国流传的笑谈。这些传说中的主角是两个美国牧师。这两个牧师到乌日哥罗德来的时候，没有排场，没有仪式，挺象个上帝的仆人。他们首先到西德拉赛克的办公室。他们希望他们的奉承会得到他的青睐。西德拉赛克怀疑这两个美国人是代理商，命令赫德拉“把他们送出”下喀尔巴阡山区。

然而，赫德拉没有折磨这两个牧师。他根据帕里斯的指示，帮了他们的忙。传教士使法国将军回想起了他的青年时代和在摩洛哥的愉快的日子，因此他乐于让这两个牧师留在下喀尔巴阡山。

初初一看，这两个瘦长的美国人长得彼此很相象，但是当他们脱下帽子的时候，显然，戈登牧师有一头剪得短短的淡黄头发，而布朗牧师则是个秃子。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人们看到戈登有一副美丽的雪白的牙齿，而布朗镶着金牙。他嚼口香糖，把它吐在和他谈话的人的脚上，或者怪灵巧地从他的右肩上吐过去，他的这一绝技博得了许多人的赞赏。

这两个传教士派到下喀尔巴阡山来的人，一直认为这两个布道者是到野人那儿去的，因此给了他们相应的装备。两个传教士来的时候，带来了半车子乌克兰文和匈牙利文黑面小本《圣经》，一车子礼物——玻璃珠子、小镜子、小刀、缎带。这两个传教士一来到乌日哥罗德，就立刻觉察到了，玻璃珠子在下喀尔巴阡山并不能使《圣经》的道理具有说服力。于是，他们便把礼物售给了一个名叫布鲁德曼的乌日哥罗德商人。这个商人不信长老会教派，但是他告诉这两个传教士怎样才能使下喀尔巴阡山的人们信教。这两个美国人自从跟布鲁德曼谈过话以后，就觉得在罗斯人的土地上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了。

长老会教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下喀尔巴阡山区。没有任何补助的失业者，靠求乞为生的残废军人，战争造成的孤儿寡妇，他们为躲避匈牙利人而逃到了捷克占领区，住在露天里，全都乐于改信这种新宗教。有些人称这种新宗教为“美国教”，因为是美国人在传播这种宗教。另外一些人称它为“金元教”，因为每一个加入长老会的人都能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一本《圣经》和五美元。当时，五美元值三百捷克克朗，也就是说等于一个熟练工人一星期的工资。在下喀尔巴阡山有很多人都两次加入新教——一次参加戈登牧师的，一次参加布朗牧师的。有些人参加过五六次……

有一个名叫彼得·松卡的残废军人，他加入过七、八次金元教。他到奥沙新村去旅行了一次。这地方，这两个漫游的传教士，由于疏忽，把它漏掉了。他对奥沙的居民说，如果有人要加入新教，每个人都付给他松卡一美元作为介绍费的话，他就同意把其中一个传教士怂恿到他们的新村来。可是奥沙的居民从戈登牧师那里每人得了五元以后，就用不着松卡了。这一来，松卡就到法院里控告了这些新近受洗礼的长老会教徒。赫德拉却把松卡送进了伊拉瓦监狱。

开始时，希腊天主教神父，加尔文派教徒和犹太教牧师都很激烈地反对这两个美国人；但是他们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们向每一个改信金元教而又重新皈依旧教的人收一美元，由此做了一笔好买卖。那些把从戈登牧师口袋里得来的美元换成捷克币的人，生意也不坏。

这两个美国人一定都是瞎子，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人家是在欺骗他，愚弄他。他们雇了两个在美国住过的罗斯人当他们的秘书和翻译。这两个罗斯人真是泡在金元里了。当两个教士在忙于传布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秘书和翻译却对人们大谈美国的金元多得象喀尔巴阡山的臭虫和虱子一样。

布朗牧师的秘书是索莱瓦人维霍拉特的堂兄弟。虽然他没有左耳，但是人们并不叫他独耳维霍拉特，他们叫他"双舌维霍拉特"。双舌维霍拉特不仅到过美国，而且由于用刀劈人而蹲过两年半监狱。维霍拉特给唤作"双舌"不是平白无故的——他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令人百听不厌。在布道大会上，他总是在布朗牧师之后走上讲台。

"朋友们，在美国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他们把你抓住关起来，你的生活还是高人一等，因为在美国，监狱里的生活，我

说，也比这里的主教还要好。你们知道吗，弟兄们，我在纽约监狱里吃的什么？早饭是：咖啡，牛奶，茶，干酪，火腿，熏肉，鱼——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我在那儿吃的东西一一列举。我在监狱里吃的菜，大多数你们连听也从未听到过，它们的滋味，连我们州长都要流出口水来，这样的菜，你们想想。”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进那个监狱呢？”一个独臂士兵问。

“这个容易，你只要刺伤一个人，或者用斧头打伤他的头，你就进去了。”

“如果我打伤你的头呢，双舌维霍拉特，我也会关到那里去吗？”

“如果你打我的头，你要下地狱。无论如何，你别想杀死我！让你看看吧。”

传教士的助手脱下衬衫，让他的听众看了他的肌肉。有几个观众甚至过去把他的二头肌又向大家显示了一下。“象铁一样，”他们同意说。

“好，谁要讲反对新教的话吗？”维霍拉特得意地哈哈大笑说。

没有，没有一个人对新教有任何反对的意思。那些重新皈依旧教的人，对于他们为了换取五美元而参加了几天的宗教，心中已经丝毫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那些加入长老会的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他回复到旧教以后，他们却不会忘记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如果象战前一样可以去美国的话，全国一半的人都会迁居到那儿去。然而，迁居美国之门现在已经关闭，他们只能做做梦，希望更多的美国人随着这两个传教士之后发现到喀尔巴阡山来的道路，就是那些不在乎五美元，仍不愿受长老会洗礼的人物，也高兴看到更多的美国人。

在维列克举行的一次布道会上，双舌维霍拉特告诉信徒们，美国威士忌比罗斯的杜松子酒又好又强烈。信徒们要求证据——看看威士忌的样子。维霍拉特没有威士忌，但是为了表现一个在真正的美国监狱里受过锻炼的人的气派，他打开了一小桶罗姆酒让大家尝尝。当穿裤子的信徒们喝着罗姆酒时，穿裙子的信徒们都围住了一个奏手风琴的人，姑娘跟姑娘跳起舞来了——因为男人们都在考虑别的事情。随后，乐声引诱得一些捷克兵跑进了酒店院子。等到小桶空了的时候，穿裤子的信徒们就来跳舞了。不过，那时候，一些最漂亮的姑娘已经有人请她们跳了。一个捷克兵和一个酒醉的信徒开始吵了起来，姑娘们都怂恿那个捷克兵。后来吵得厉害了，姑娘们又转而反对捷克兵了。

维列克的长老会教徒打死了两个捷克兵。宪兵按照帕里斯的电令，拘留了四个罗斯人和两个匈牙利人。民警又根据西德拉赛克的命令，逮捕了三个匈牙利人和两个犹太人。

维列克的居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乌日哥罗德。不论帕里斯还是西德拉赛克都不愿见他们。于是他们通过维霍拉特的介绍，求助于布朗牧师了。曾经遭到下喀尔巴阡山人嘲笑的秃头布朗牧师，原来是一个有特殊影响的人物。经过牧师的请求，法国将军立刻接见了代表团。

“请你别把维列克事件当做一种敌意的行动，”代表团的发言人辩护说，“我们就是那样的人，那是我们的习惯。知道我们的、看到过真正的贝雷克酒会的人，一定会了解，村民们仅仅是在证明，他们把捷克人当做自己人，当做自己的血肉兄弟。”

下喀尔巴阡山的两个独裁者因“维列克事件”而发生龃龉了，一个坚持犯人应在临时法庭受审，另一个反对铁拳政策。在

当时，无法确定是谁采取了哪一个步骤。后来，帕里斯和西德拉赛克这两个独裁者都下了台，他们就彼此指责对方要绞死犯人。大概帕里斯在这件事中说的是事实，因为当时他在发生维列克事件时是处于戈登牧师的影响之下的。

两个独裁者之间燃起了战火。他们都要找同盟者，两个人都找到了。帕里斯找到了戈登牧师，和他商议了半夜，西德拉赛克和卡明斯基商量，而卡明斯基又是布朗牧师的朋友。帕里斯寄了一份备忘录到布拉格去，攻击西德拉赛克；而西德拉赛克直接向法国政府控诉了帕里斯将军。

住在昂格河岸的两个独裁者，无论从塞纳河岸或者从布拉格都没有得到回音。他们两人都怒气冲冲地等待着，彼此都喜欢对方也不得不等着。他们两个人，仿佛商量好了似的，把他们的指令发给了各级领导——给州长、镇长，而州长、镇长都感到左右为难，不知道服从谁才好。他们不知所措，只好拖延着，什么也不干。在两位独裁者争吵后两个星期，他们在布拉格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等于对他们作了回答：

>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鉴于下喀尔巴阡山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认为实施匹兹堡会议所通过的有关下喀尔巴阡山的决议之时机已经到来。匹兹堡会议已任命格雷戈里·萨科维支为“下喀尔巴阡山罗斯”的总督，不久将自纽约乘船赴乌日哥罗德就任。

布拉格的报纸刚过中午就到了乌日哥罗德。到晚上，帕里斯和西德拉赛克的友好关系又恢复了。他们私下谈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去请卡明斯基。这位昂格瓦的赫弗让两位独裁者等了整整半小时。最后他来了，心怀警戒。他吸自己的烟，不喝酒。

当他知道两位独裁者要召开民族大会时，他同情地一笑，摇了摇头。

“真是异想天开，先生们——谁来召集民族大会？”

“当然是主席团。”西德拉赛克说。

“主席团？这倒有点困难。先生们大概已听说了，主席团主席，可怜的老艾莱克，精神多少有点失常，已经给送到卡沙的精神病院去了。”卡明斯基的嗓音恢复了他的正常的声调，“原来艾莱克那个老头儿参加了贝雷萨斯的酿葡萄酒者成立大会。当他们重组他们的团体时，他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这个老人——我们敬爱的主席，对喝醉的酿葡萄酒者作了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演讲。我们都知道，艾莱克是一个坚信永久和平的人。他在会上作了演说。他说所有的军队应该解除武装，军工厂应该摧毁。简单点说，艾莱克现在在卡沙。说到副主席，其中之一，卡瓦西，自从被阁下下令逮捕之后，按照您所表示的意愿，已经辞去了他的崇高的公职。至于另一个副主席，就是鄙人，我现在辞掉这个职务。”

“您疯了吗？”将军叫道。

“疯了的是民族代表大会的主席，”卡明斯基故作冷淡地说，“我只是副主席。”

“请您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辞职。”西德拉赛克问。

“好吧，”卡明斯基回答，“我辞职是因为我的良心要求我这样做。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服从良心的支配而受到责备，也不能怪我操之过急。我在下决心以前，有好几个月，我夜复一夜地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成眠。我决定我应该辞职，因为民族代表大会不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手续召开的。”

“你是参加召开的，”帕里斯怒气冲冲地说。

“是的，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我在改正错误。真的吗，阁下，你不会由于我承认错误又想改正错误而生我的气吧？”

卡明斯基和来时同样彬彬有礼地跟这两个独裁者告别。帕里斯咒骂全世界，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而西德拉赛克却在考虑是否要揭露民族代表大会的喜剧来牺牲帕里斯的脑袋，借以保全自己。当将军喋喋不休地说罗马尼亚军队还没有撤出东下喀尔巴阡山区，说要对他们采取有力措施时，西德拉赛克只用半只耳朵听着。

格雷戈里·萨科维支

格雷戈里·萨科维支是纽约律师和美国通用公司的法律顾问。他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日生于匈牙利贝雷克州维列克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伊凡·萨科维支是维列克镇长。他能担任这个职位是由于他是匈牙利热情的爱国者，虽然他是罗斯血统，而且是虔诚的希腊天主教徒。伊凡·萨科维支在他的性格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他不能控制喝酒。他常常喝酒，只要喝上三四升葡萄酒，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有一次，他在酒店里喝了三瓶葡萄酒和五杯白兰地，由于酒的影响，他说俄罗斯比匈牙利强大。萨科维支这番不爱国的话是当了他的敌人——教师米克洛西的面说的。教师向州长告发这个不爱国的镇长。州长有个朋友，朋友有个远亲想谋镇长这个差事，于是对伊凡·萨科维支采取了行政处分。四个月以后，卸任的镇长携带着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格雷戈里上美国去了。但是，伊凡·萨科维支不能继续再吃他的葡萄酒了，他没有到达目的地。

伊凡·萨科维支在船上得了肺炎，等到移民们看到著名的自由神像时，他就永远和葡萄酒告别了。他的寡妻和儿子上了岸，多亏发生了一场误会，才使他们在这个有无限机会的国家里保证了生活。当寡妇在死了的丈夫的病床边扯着头发的时候，一个斯洛伐克女人安慰过她。他们上了岸，这个热心的女人为萨科维支太太搞到了一个住处，是一个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的另

一个斯洛伐克女人的家里。这个斯洛伐克裔美国人住了二十年，还不会说英语，但是斯洛伐克话和匈牙利话她又都忘记了。萨科维支太太第一次不做梦地过了一夜之后，她先用匈牙利话后用罗斯语谈起了她为什么不得不离开匈牙利。好客的斯洛伐克主妇不大听得懂她的故事；但是她的义愤已被激起，她用她那种特有的杂乱无章的语言，对萨科维支太太的并不认识的有势力的坏蛋狠狠咒骂了一通。

"走吧……走吧……"她忽然用几乎是清楚的匈牙利语叫道，"快！"

她领着萨科维支太太到了一个纽约长老会教的头头那里。萨科维支太太只要哭就行了——其余的事全由那个斯洛伐克女人来安排。她喋喋不休地告诉那个头头，说那个哭着的寡妇，为了躲避那些逼迫长老会教徒改信宗教的野蛮的匈牙利人，不得不带着孩子从下喀尔巴阡山逃了出来。

就这样，萨科维支太太成了长老会的殉道者，当了禁酒菜馆的厨师。她的薪水虽然不太丰厚，但是在菜馆里一个负责采买的人，进益却很不错。

格雷戈里·萨科维支在长老会教会学校念书，后来靠教会的奖学金入了大学。他得到法科的文凭后，教会把他介绍给了通用公司。他在公司里由于工作勤奋，凭着专业知识和计谋，当上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大战期间，通用公司扩大了对英法军队的贸易以后，这个法律顾问的职位，不仅有利，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了。

萨科维支个子瘦小，淡蓝眼睛，稀疏的黄褐色头发，他是纽约基督教素食主义者协会副主席，又是反酒的反烟主义者。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他一方面储蓄了一部分薪金，同时在证券市

场进行巧妙而小心地投机，因此积聚了一笔很大的财产。

当然，他记不得他出生的地方了，不过，他从他母亲那儿听说过，喀尔巴阡山覆盖着密密的森林，住着匈牙利人、罗斯人、犹太人和熊。他从来没有想到喀尔巴阡山可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因此他对这些绿色的群山丝毫不感兴趣。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通用公司的一位经理史密斯先生，美国参议员，为了排遣排遣一次冗长无味的会议给他带来的头痛脑胀，就开车出去兜一下，把萨科维支也带上了。待各种谈话的题目都讲完以后，萨科维支提起了他是在喀尔巴阡山出生的。“喀尔巴阡山”这个异国情调的名字，引起了史密斯先生的兴趣，于是，萨科维支不得不跟他谈了些有关这个中欧山区的情况。法律顾问用一种枯燥无味的客观的腔调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有关他出生地的一切。有两件事使参议员最感兴趣：一是在萨科维支故乡，人们拿了刀子去杀熊；二是晚上人们聚集在篝火周围。

“他们是拜火教徒吗？”史密斯先生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吧。”萨科维支说。

史密斯先生怀疑喀尔巴阡山区是不是有油井，大约那就是许多野火的来历。

“有趣，真有趣，萨科维支先生。我们以后再来谈这件事。”

大概史密斯先生本人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重提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却发生了。

一九一八年夏天，在美国匹兹堡城召开了一个“欧洲人民期待解放”代表大会。英美银行家所安排的这次会议，有些参加的民族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例如，有两个代表是代表布涅瓦茨族的，这是匈牙利南部的天主教塞尔维亚人），有些代表虽然自称代表某些民族，却从未看见过他们那些人的

皮肤和头发。大会的组织者——健谈的外交家和沉默的金融家——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想到了,不知怎么却漏过了下喀尔巴阡山的罗斯人。到了最后一分钟,史密斯先生这才突然想到了下喀尔巴阡山。他身居参议员高位,又代理通用公司经理,是匹兹堡大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安排萨科维支来匹兹堡作为罗斯人的代表。

大会代表通过了英美人提出的所有提案。外交家推荐全部由英法银行家预先决定的提案。他们在一、二个小时之内就通过了消灭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帝国的决议;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讨论了复兴几个世纪之前就不存在的国家。对于一二个国家的命运还是有争论的,因为英美的利益并不永远一致,有些条款同法国银行的利益也有分歧。下喀尔巴阡山的情况恰恰如此。

史密斯先生主持了商议下喀尔巴阡山命运的会议。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史密斯先生在打牌,在两局之间喝了一点儿酒。因为下喀尔巴阡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家,既没有金矿也没有石油。参议员史密斯主持了开会式以后,就把会议交给了做报告的人,自己打起盹来。一阵可怕的吵闹声把他惊醒。在匹兹堡会议上,关于下喀尔巴阡山的命运,展开了一场争论。

史密斯虽然不无酒意,而且非常困,不过他这个人,重实际的意识继续在起作用,即使他那参议员的地位需要睡眠。参议员从代表们争吵的叫声中,迅速地明白了:下喀尔巴阡山地方虽小,却很重要,而且还明白了罗斯地方的真正意义,这一点,是谁也没有提起过的。

"通向喀尔巴阡山的军队往来的要隘在下喀尔巴阡山地区,要隘通向东北,可到一个国家,那里有一个名叫列宁的人建立了一个奇怪的可怕的敌对国家,"参议员史密斯的重实际的意识在

告诉他。

史密斯自己没有说什么。他摇着主席的铃，好容易才恢复了秩序，耐心地听了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发言：证明捷克对下喀尔巴阡山的主权。捷克代表坚持说：从前，在一千年以前，这块土地是属于斯瓦托勃鲁克的莫拉维亚王国的。他又听到筹划中的波兰的代表对下喀尔巴阡山的要求，宣称这片土地与波兰南方毗邻，它的居民说的是和未来波兰南方各省的加里西亚人的同一种语言。他还听了有待筹建的大罗马尼亚的代表的发言：要求下喀尔巴阡山归并大罗马尼亚。据说大约有四千个罗马尼亚人住在这个地区，无论如何，这个小国是罗马尼亚东北的毗邻。

史密斯半闭着他那双微睡的绿灰色大眼睛，但是两只耳朵却竖得高高的，保持着沉默。他还递给萨科维支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别做声！史。"

下喀尔巴阡山人民的代表服从了他这个命令。他依然闭眼坐着，看起来似乎正在睡觉，只有他那个大喉结在神经质地颤动着，说明他是活着的。

大会讨论了几个小时，然后决定下喀尔巴阡山成为将要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自治区。这个决议宣布以后，参议员史密斯对全体代表一致同意的议案提出一个修正案，唯一弃权的是捷克人。

就此，大会选举了格雷戈里·萨科维支为"下喀尔巴阡山罗斯"的第一任总督。

大会闭幕后，萨科维支和史密斯一起到了纽约。史密斯午饭吃半熟的肉，喝烈性酒；萨科维支吃菠菜和苹果，喝苏打水。史密斯觉得和萨科维支一块吃饭是一种娱乐；看见法律顾问把

那份贫乏的伙食吃个精光，就激起了他吃半熟肉的胃口；另一方面，参议员午餐的气味，却没有一次不使萨科维支感到大倒胃口。就这样，史密斯洋溢着乐观主义，而萨科维支倾向于怀疑主义——以他在通用公司的职位所允许的程度为限。因而，当他提到在匹兹堡被选为总督一事时，话中带有讽刺之意。

"他们可能也会选我当达赖喇嘛哩。"

"当然可能，"史密斯说，带着点骄傲和喜悦。"不过今天当达赖没有意思。我可希望您这次选举是有意思的。"

"您真的把这次选举当作是认真的事吗，史密斯先生？下喀尔巴阡山跟我有什么相干？"

"也许现在没有。不过，要是通用公司的利益所及，那时……您知道吗，萨科维支先生？别去预测未来了，那是吉普赛人的事。让我们明天再谈吧！"

萨科维支尽管小心谨慎，但在匹兹堡大会以后，却在股票市场遭到了很大损失。战事工业股票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稳步上升，一九一八年八月，萨科维支因拥有大量军工厂的股票而感到喜不自胜。九月份，战争在欧洲虽然还很激烈，股票开始下跌了。到了一九一九年夏天，萨科维支加倍地取回了他的损失。几天以后，德国同意协约国提出的和平条款，于是就结束了人类的"终止战争的战争"。参议员史密斯劝萨科维支竭其财力尽量买进军火工业方面的股票。萨科维支很迟疑，犹豫不决地接受了在他看来是讲不通的意见，只买了与他的财力远不相称的一点点股票，这样他还是净得了一笔可观的利益。和平条约订立以后，军火工业的股票立刻又重新开始上涨了。

萨科维支请教史密斯股票市场别的消息，史密斯忠告他，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时候，一个人必须谨慎小心，不要买进股票

或卖出股票。

“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萨科维支先生，我宁可考虑要在下喀尔巴阡山干点什么。您不仅向下喀尔巴阡山负责和对自己负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通用公司负责。”

萨科维支听从史密斯的指示，送了一份备忘录给马萨里克，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他打算就任下喀尔巴阡山总督之职。萨科维支寄出备忘录以后，觉得自己象个学生，虽然明知同学是在愚弄他，还是干了他的同学要他干的事情，因为他怕揭穿了这个玩笑，同学们就会打他。

“让史密斯笑我，总比他变成我的敌人好，”他思索着。

马萨里克不理这个备忘录。史密斯让时间过了六个月，也没有来干预这个问题。随后，到了一九二〇年二月，史密斯发了一个电报叫萨科维支到华盛顿来，他告诉萨科维支，威尔逊总统要会见他们。

“威尔逊总统为了你的总督的位置将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极大的压力，”史密斯告诉萨科维支。

“威尔逊总统对下喀尔巴阡山感兴趣？”萨科维支感到很惊讶。他没有见过威尔逊，但非常尊重他。

“总统很可能连这个所谓国家是否存在也不知道，”史密斯回答。

“那么，史密斯先生，你怎么认为总统会干预这件荒谬的事呢？——对不起，这是我的意见。”

史密斯迟迟不答，并不是在考虑怎样回答，而是到底他是否要回答。

“通用公司董事会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对下喀尔巴阡山问题讨论了三十分钟，”他最后说。

萨科维支这才想到了，他的出生地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个毫不足道的地方。同时，史密斯决定指示戈登牧师，好好帮助萨科维支，因为这位罗斯总督既诚实又愚蠢。

一九二〇年四月三日，格雷戈里·萨科维支以下喀尔巴阡山罗斯国家元首的名义，从纽约向下喀尔巴阡山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呼吁书是通用公司公共关系部起草的。该部还准备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史密斯交给萨科维支，指示他在到达巴黎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读。参议员说，记者招待会由通用公司的一个乌克兰出生的代理人召集。史密斯用自己的汽车把萨科维支送到码头，在路上，他劝告下喀尔巴阡山的总督，一旦到了乌日哥罗德，就要好好听戈登牧师的忠告行事。

“戈登牧师充分熟悉下喀尔巴阡山的情况。此外，他也象您一样颇得通用董事会的信任，萨科维支先生。”

当他们在甲板上来回散步时，史密斯告诉萨科维支虽然通用公司主要是制造和出售汽车，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衷心为通用公司服务的话，他必须认识到，在今日的形势之下，他不能让自己限制在汽车范围之内，不管这一事业多么好，多么重要。

“我们要关心整个世界，关心全人类的命运，”史密斯说，他那悲天悯人的调子，令人想起他在参议院的演说。

萨科维支到巴黎后，由一位淡黄色大胡子的乌克兰人介绍，接见了记者，他向记者们读了通用公司公共事业部起草的声明。

萨科维支在声明中说，他打算在下喀尔巴阡山建立一种美国型的国家。有几家巴黎的报纸还登载了萨科维支的照片。

声明发表后，引来了一大群住在巴黎的乌克兰人向他告别。他带着一种显示权力的纡尊降贵的态度热情接待他的同胞。大

多数人称他为“总统先生”，但是有几个人在向他借十个美元之前，还把“沙皇”这个字眼加到了这个纽约律师的名字上。下喀尔巴阡山的总督微笑着辞谢这种称呼的方式，但是乌克兰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称总督为“沙皇”的人都得到了十五美元的借款，而不是十元。

萨科维支特别喜欢其中两个巴黎乌克兰人。一个是波勃林斯基伯爵，他对于下喀尔巴阡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深爱这个地方。

“那地方是真正的天堂，”他热情地说。“如果那地方没有匈牙利人和犹太人，而只有乌克兰人，那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

伯爵竭力要说服萨科维支，他说下喀尔巴阡山不仅仅比美国小，而且也是另一种国家。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将考虑在下喀尔巴阡山建立一个有点象俄罗斯沙皇帝国的国家。当然，下喀尔巴阡山要成为一个沙皇帝国是不够大的。但是它作为起点是足够的。一个有资格、有能力、土生土长的沙皇，能够得到西方列强的信任，特别是美国的信任，就很容易把边界推向北方和东北。”

波勃林斯基煞费苦心地想让萨科维支知道“沙皇的宝座是空着的，冒险者都能赢得这个宝座”。这位纽约律师觉得伯爵是在胡说八道；不过，在他的反驳之下，伯爵又言归正传了，这还是使他很高兴。

他直截了当地盘问伯爵何以为生。当他知道伯爵很贫困时，就硬要伯爵从通用公司控制使用的基金中，接受了一笔慷慨的借款。

第二个获得萨科维支欢心的乌克兰人，就是那个淡黄色大

胡子的高个子，是他给介绍了记者，并把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这个乌克兰人不是贵族，他夸耀他的平民出身，他父亲是下喀尔巴阡山的穷困的乡村牧师。

这个名叫艾莱克·杜迪克斯的淡黄胡子的人，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他说起有关喀尔巴阡山昏暗的森林的神奇故事来，萨科维支觉得一直可以听到世界末日。故事中提到栖息在森林中的熊，罗斯的伐木工人和铁匠，他们用斧头和刀子杀熊，还有晚上燃烧的篝火。

作为一个罗斯人，杜迪克斯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作为通用公司一个分公司——一个军工厂的巴黎代理人，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他对萨科维支说，萨科维支在下喀尔巴阡山找不到一支可以信赖的部队，因此他必须设法从巴黎带一支部队去。

波勃林斯基和杜迪克斯偶尔在萨科维支的客厅里见了面。刹那间，下喀尔巴阡山的总督预感到这两个乌克兰人仿佛是关系不好的老相识。当杜迪克斯看到波勃林斯基时，他就摆出了一个拳击家提防对手可能给他危险的一击的姿态。然而，伯爵却亲切地向杜迪克斯伸出手来，作了自我介绍：

“波勃林斯基伯爵。”

“杜迪克斯，”淡黄胡子的人紧紧地握着波勃林斯基那只修过指甲的手，他握得那样重，痛得伯爵把手缩回去了。

波勃林斯基和杜迪克斯一起为萨科维支工作。他们从住在巴黎的乌克兰流亡者中挑选了三百名旧沙皇的军官，要他们起誓为萨科维支效劳。下喀尔巴阡山总督离开巴黎到了布拉格。他支付了他的卫队去乌日哥罗德的费用。他命令他们和乌日哥罗德的长老会教长——戈登牧师取得联系，他（萨科维支）本人并不认识牧师，但是他已听到过许多有关他的善事。

萨科维支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有一支私人卫队，而且是由旧沙皇的军官组成的，其中包括几个男爵，伯爵，甚至一位公爵。纽约的摩天大楼似乎也缩小了几层，萨科维支想到，他可以稍稍违背史密斯的命令了。

他在布拉格向报界发表的不是他在巴黎公布的同一个声明。他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打算把下喀尔巴阡山改造成为介于美国和老沙皇俄国之间的国家——可以说是这两种国家类型的综合体。

当萨科维支知道《工人日报》登了一篇题为《金元和伏特加》的文章嘲笑他的这个声明时，他又重新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下喀尔巴阡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戈登牧师看了这篇声明，忍不住发火了。他把报纸向地板上一丢，就恶言恶语地咒骂起来，那副样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传布福音的美国牧师，还不如说象一个匈牙利的轻骑兵。

“这个蠢货，想擂鼓捉鸟呐。”

旋　风

萨科维支原来计划在布拉格逗留三天；结果住了十天，和图萨总理进行会谈。总理坚持要萨科维支保证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命令管理下喀尔巴阡山。究竟包括些什么样的保证，图萨自己也没拿定主意，而且因为萨科维支拒绝作出保证，因此十天的会议，只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出了一个政府公报，宣称一切有关下喀尔巴阡山的问题，图萨和萨科维支已取得一致意见；二是在萨科维支到达乌日哥罗德之前两天，在当地工作的捷克官员会接到图萨的命令；不得妨碍萨科维支的工作。图萨没有叫他们支持萨科维支。

萨科维支向布尔什维主义宣战的声明，在下喀尔巴阡山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卡明斯基遇到了几个萨科维支从巴黎派来的卫士以后，第一个挂出了旗子，并且和波勃林斯基以前的副官加利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昂格瓦的赫弗为了庆祝这件事，披上了大礼服，并在王冠旅馆——就是住着帕里斯将军的旅馆——的大厅里请了许多客人，向他们宣布，说他的纲领是"下喀尔巴阡山人的下喀尔巴阡山"。

"我不想掠人之美，"卡明斯基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口号。这是我们的领袖格雷戈里·萨科维支想出来的。"

听到萨科维支的名字，听众都站了起来。昂格瓦的赫弗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这位下喀尔巴阡山总督的历史。

“格雷戈里·萨科维支生在下喀尔巴阡山。他的父亲，是保卫罗斯人自由的最热心、最勇敢的先驱者之一，被犹太人逐出了这个国家。他离开祖国的时候，由于心情过于紧张，心脏停止了跳动。年轻的格雷戈里必须依靠可怜的工资维持自己和他的寡母的生活。他五岁时，就在纽约街头从早到晚卖报。十岁时就在一家工厂做工——晚上勤学苦读。中学毕业后，他就进了威尔逊在那里教书的大学，就是今日当了美国总统的那个威尔逊。”

当提到威尔逊名字的时候，客人们又都站了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停息下来，客人重新就座，卡明斯基继续讲萨科维支的生平。

“威尔逊立刻看出了这个年轻罗斯学生的内在的特殊天才。在和他见了几次面以后，总统注意到在这个例子中，天才是和一种纯洁如雪的品质混在一起的。

“‘亲爱的学生，我预料你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有一次威尔逊对萨科维支说。

“‘亲爱的教授，’萨科维支说，‘我承认我很想成为一个智慧的伟大人物，使我有力量能够解放在外国专制主义下奄奄一息的祖国，使她幸福、繁荣、强盛。’

“萨科维支向威尔逊描绘了喀尔巴阡山人民的生活。威尔逊闭着眼睛，倾听着这位伟大的罗斯流浪者的话。眼泪从这位强有力的美国人眼睑上流了下来。”

当卡明斯基说到这里时，他自己也几乎要哭出来了，但是他勇敢地抑制住他的感情，继续说下去。他说威尔逊如何依照美国人民的意志成为总统，以及萨科维支如何使总统注意欧洲被压迫人民悲惨的命运。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赢得了战争，我们感谢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因为欧洲开始了一个幸福的新时代。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格雷戈里·萨科维支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是他说服威尔逊尽力捍卫欧洲的自由。”

卡明斯基详细地描述了在世界大战时，萨科维支怎样使威尔逊的注意力转到下喀尔巴阡山的命运之后，话题就转到罗斯人所面临的任务上来了。

“罗斯人必须使自己摆脱犹太人，使世界摆脱布尔什维主义，”他说。

他引用了统计数字，说明罗斯人民是能够完成那个任务的。他的这一段演说很沉闷，但是令人信服。人家不是相信他引用的数据，因为没有人注意数字；那些可能注意的人，反正也听不懂。证明卡明斯基的真实性，那就是他说得令人厌烦。要是他说谎，那他就会作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了——对这一点谁都不怀疑。

卡明斯基在贝雷萨斯和蒙卡契又作了这番演说。在蒙卡契，当他演说完了时，进行了讨论，萨鲍尔奇·卡瓦西发了言，他在提到帕里斯将军的名字时，责骂那些把一大片古老的土地交给犹太人、企图把下喀尔巴阡山改变成为一个摩洛哥的人。卡瓦西引用了特拉茨克·纳汉曼所写的关于马诺·柯霍特的农业银行的文章，号召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一次圣战。

村子里的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双舌维霍拉特是萨科维支开创新时代的宣扬者，他开着他的汽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村庄飞快地奔驰。他开会时，先给听众祝福，会议结束时他给听众分发口香糖，宣称这是“长老会教教主所赐的口香糖”。维霍拉特在蒙卡契附近一个叫做瓦尔帕兰卡的村子里作了一次演说以后，发

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吵。

维霍拉特的信徒杀死了戴维，戴维是纳梅尼战斗中阵亡的裁缝摩根斯特恩的弟弟。

第二十八党的领导人在波莱纳森林里讨论了几小时，费尔德曼做了形势报告。他认为长老会传教士的活动和萨科维支的狂妄表明，有些地区已决定象对待黑人一样对待下喀尔巴阡山人。金元已经在下喀尔巴阡山获得立足点，如果我们和当局冲突，那我们就不仅要跟宪兵和警察斗争，而且还得跟下喀尔巴阡山社会上那一部分崇拜一个新上帝，也就是名叫金元的人斗争。费尔德曼表示希望美国和法国的利益不久会发生冲突，两国代理人之间最终导致对立。他建议我们应该继续留在地下，限制我们的活动，只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宣传，直到他们的内部发生斗争，解除对我们的压力为止。

费尔德曼发表了单调的演说，它那干巴巴的幽默完全没起作用，米科拉对他讲的话老是提出诘问。米科拉坚决赞成公开斗争，他得到福蒂夫人的支持。她说费尔德曼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凯斯蒂卡洛觉得费尔德曼所说的情况是对的。“如果我们不承认金元已在下喀尔巴阡山获得立足点，或者不承认我们还没强大得足以抵抗新的敌人，我们就是自己骗自己，”维列克的芬兰人说。但是他也赞成斗争。“不管我们要不要斗争，斗争总要爆发，”他说，“战斗的主要结果不能决定下喀尔巴阡山的命运。你真的认为，费尔德曼，法国军官是来为我们修路的吗？你以为英国军事代表团到乌日哥罗德来是为了吃杜松子酒？”

“我们隐匿起来，而我们的敌人靠制造骗局来获得土地——我们就失去土地。现在我们必须开始战斗，在战斗中取得力量。”

费尔德曼固执地坚持他的观点，但他是少数。执行委员会指定费尔德曼、福蒂夫人、一个蒙卡契的砖瓦工人、一个乌日哥罗德铁路工人和我组织一次战斗。我和福蒂夫人奉命在萨科维支到达的前三天前往乌日哥罗德。没有多少时间了。花了几分钟工夫，我就以"工农协会"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呼吁书，号召下喀尔巴阡山的人民在萨科维支到达那天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释放一切政治犯，要求出版自由和集会的权利。我们浪费了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没有人把呼吁书翻译成捷克文。我得回到索莱瓦家里去一趟。到索莱瓦后，我和斯坦涅克教师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小心地向他说明萨科维支狂妄的严重性；他远比我坦率，直言无讳地谴责了那些把斯拉夫弟兄出卖给银行家的人。我请他把我们的呼吁书译成捷克文。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出于对他父亲的关心，第一次要我起誓不泄漏译者的名字。我向他一再保证，我不仅会忘记是谁把呼吁书译成捷克文，而且还会忘记有没有这份呼吁书。我很快把呼吁书译成德文，斯坦涅克又把德文译成了捷克文。那天晚上快到十点钟时，底稿已经到了在蒙卡契的费尔德曼手中。蒙卡契的印刷工人通宵工作，把呼吁书排好版，在一张纸上印了罗斯文、匈牙利文、犹太文、捷克文和斯洛伐克文等各种文字。到黎明，费尔德曼要把一束束的传单分发到全市各地。

过了几个小时，整个宪兵队和警察部队已待命出发。赫德拉布置了一个大举搜查传单的行动。他没收了一部分传单；但是这一来，却反而使传单家家相传，村村相传，更加宝贵了。到了晚上，搜捕开始了。

费尔德曼在大街上被捕。军士们对他彻夜拷问，要他说出呼吁书是在什么地方印的。他们更急切要知道的是谁把呼吁书

译成了捷克文。

费尔德曼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他被橡皮棍子打得昏过去三次，每次他们都用水把他浇醒过来，重新再打，但他一次也没有叫过痛。他的淡黄胡子上留下一丝丝的血迹，肿胀的眼睛闭着，他痛得弓身坐着。当军士们失去了从他身上问出口供的希望时，他对他们说："可怜的人，你们永远要做奴隶！难道你们从来没有明白过，那些要你们来反对我们的人，明天……"

一枪托把他打得昏过去了。

赫德拉干起事来比实际需要更为彻底。他从每个村子抓了一些人，宪兵在街上打他们，吓唬老百姓。起初，村民们痛苦、害怕得叫了起来；但是后来就咬牙切齿了。

一卡车军士离开蒙卡契到索莱瓦来抓我；他们太迟了。我已经同双头维霍拉特上乌日哥罗德去了。维霍拉特带着我避开公路，沿着森林小径和不能通行的野路奔向罗斯的首府。当军士们把枪口对着怀孕的蒂姆柯夫人时，她对他们说，我是坐马车到蒙卡契去的，那天深夜，宪兵和军士在蒙卡契捉了六个格查·巴林特，其中一个是斯洛伐克记者，他顽强地坚持说他不是格查·巴林特，但是等到他们挖去他一只眼睛，他就"供认"了。

这时我已在乌日哥罗德，住在离王冠旅馆不远的一家底层裁缝铺里。在萨科维支到达前两天，我在裁缝铺得到一个消息，说波兰白军已经侵入苏俄。也是在裁缝铺，我写了一份呼吁书，开头和结尾都是这句话："不要把武器给苏俄的敌人。"

在乌日哥罗德印的这份传单，对狂怒的赫德拉来说，是火上加油，但是却给我们的斗争注入了新鲜的色调和新的内容。

"这是指的什么？苏俄？列宁？"

随着这份传单，不知怎的传出了这样的消息：米科拉·彼特

鲁塞维茨已经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列宁给下喀尔巴阡山人民的信件。许多人发誓说，他们已背熟了这封信的全部内容。

卡明斯基歇斯底里大发作，当天晚上急急赶到警察总局，要赫德拉制止那个传说，使得赫德拉迷惑不解。

“托儿所的故事，我们无法去捉的，”赫德拉说着哈哈大笑，“我们也用不着害怕托儿所的故事。”

“你不了解我们人民，”卡明斯基粗声粗气地说。

“可我了解我们的宪兵啊，”赫德拉平静地回答。他还是对卡明斯基的惊慌感到迷惑，继续说，“无论如何，这些魔鬼一张报纸也没有，他们无法召开群众大会，拿不出再多的传单了，因为我已经控制了印刷所，因此，即使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一个愚蠢的故事会产生政治影响，这些流氓也没有任何办法来传布他们的故事。”

这时，卡明斯基称之为传说、赫德拉叫做托儿所故事的谣言却广泛流传，遍及了全国。无线电、电话、电报传递的新闻，没有人民幻想的翅膀飞得迅速。卡明斯基清楚地觉察到，传说具有比赫德拉的宪兵更大的力量，不过，即使他也没有估计到，传说还比金元更有力量。

米科拉，红色的彼特鲁塞维茨，已经回来了……列宁送了一封信给下喀尔巴阡山的人民……这一来，谁还会对萨科维支的到来感到激动？

萨科维支来到了乌日哥罗德。他派到下喀尔巴阡山的两百名捷克兵、五十名警察和三百名乌克兰军官在车站欢迎他。乌克兰军官穿着老沙皇军队的制服。纳梅尼的英雄西德拉赛克也在车站出现。他已经病了五天，本来还打算继续病两天，后来听说，前一天对他说要参加欢迎的帕里斯将军在最后一分钟也

病了，他这才改变了主意。除了西德拉赛克，还有五位穿便服的人等在车站欢迎萨科维支总督：两个长老会牧师、赫德拉、卡明斯基以及萨鲍尔奇·卡瓦西。没有捷克官员参加；他们“犹豫不决”，符合图萨的命令。

波勃林斯基的前副官加利泉，曾任萨科维支的秘书，后来又当了他的副官，发了一个准备好的电报，电文是：“格雷戈里·萨科维支，首任下喀尔巴阡山罗斯总督，进入首都车站。民众的热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赫德拉给萨科维支献了一束花，告诉他，布尔什维克在下喀尔巴阡山号召总罢工，不过警察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赫德拉把西德拉赛克介绍给萨科维支。他没有跟西德拉赛克说话，然后赫德拉介绍了卡瓦西，总督向他转达了住在纽约的桑邦伯爵的问候。还有卡明斯基，赫德拉介绍他是最激烈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士”之一。

萨科维支对于为庆祝他而组织起来的罢工感到特别不安。不过在他游览了首都之后，才真正大吃一惊。他心里很生气：难道这真是他居住的所在地吗，这个肮脏的小镇，东倒西歪的房子，弯弯曲曲的小街，以及它的破破烂烂的居民？

他那耀眼的乌克兰卫队为前导的队伍，经过寂静无人的街道，军乐队的喧闹声惊动了在安静地吃草的牛，嘎嘎叫着的鹅，在沙土上大摇大摆的母鸡，捕雀的猫。他觉得，那些派他到这里来的人是在欺骗他，那些说什么沙皇宝座的人是在戏弄他，把他当成傻瓜。他心情激动，想立刻回去，走最短的路程，回纽约去。

当天晚上，在王冠旅馆大厅里举行了庆贺总督的宴会。西德拉赛克在车站欢迎总督回来后又病了，没有参加宴会。帕里

斯将军病好了，参加了宴会。

大厅里点着蜡烛，因为电厂工人也罢工了。出席宴会的都是在车站欢迎萨科维支的那些人——乌克兰军官和警察。乌克兰军官们吃啊喝的，警察代替罢工的侍者招待客人。

卡明斯基发表了一通激动人心的演说。他欢迎萨科维支，因为他是“威尔逊的朋友”，罗斯人民杰出的儿子。下喀尔巴阡山第一任总督闭眼坐在那里倾听着这篇甜言蜜语的演说。他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只有他的喉结神经质地抽动着，才表示他在呼吸。他没有回答对他的颂词。可这一次他却打破了自己的原则，要求喝威士忌。乌日哥罗德没有这种酒，因此他只好满足于白兰地。他实际得到的是一瓶装在科涅克牌白兰地瓶里的最蹩脚最便宜的罗姆酒，他喝得酩酊大醉，吵吵嚷嚷。然后，他用英文作了演说，称乌克兰军官为“我亲爱的人民”，他保证要在乌日哥罗德大广场建立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和纽约港的那个相比，将毫无愧色。

他在第二天中午醒来，头痛得要命。当他要修面时，人家告诉他，理发师也罢工了。他要洗个澡，才知道这里旅馆没有浴室。他整天穿着睡衣裤和拖鞋，坐在房间里。下午赫德拉来报告，大庄园的农民也参加了工人的罢工。他们甚至连牲口也不喂。傍晚，他和戈登牧师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后，他送了个信到工人之家，他要跟工人代表谈一谈。

罢工的人派了三个代表来谈判：一个犹太锁匠，一个匈牙利农民和一个罗斯伐木工人。萨科维支接待了代表们，在座的有赫德拉、加利泉和五个乌克兰军官。赫德拉首先要知道谈判者的名字。锁匠考虑了一下，就说出他的名字叫麦凯布，农民说他叫拉约什·科苏特，罗斯人头上有个大脂肪瘤，羞怯地说，他的

名字叫伊凡·波契克。

"总督先生,"麦凯布开始说。他只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他的同伴们反对他这种彬彬有礼的语调。

"你叫他先生?"伊凡·波契克叫道。"让我来和这只狗谈谈!你这个拖鼻涕的,你,"他对萨科维支说,"你以为你能把我们吓倒,呃?我们会被一个拖鼻涕的吓倒,象……"

谈判破裂了。萨科维支的乌克兰军官逮捕了代表。三人中只有波契克奋起抵抗,用手,用脚,又用牙齿。他在一个军官的脸上咬了一口。

一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工人代表团来到了乌日哥罗德,支援罢工。

由于罢工,铁路工人无所事事。一马车啤酒在乌日哥罗德车站爆炸了。事情是这样的:铁路工人想喝酒,一天晚上,他们闯进了一辆装啤酒的马车。这辆车上标明装的是"比尔逊啤酒",指定经布拉迪斯拉发和下喀尔巴阡山运往加里西亚。当他们进了马车后,一个工人抽起烟斗来,——啤酒就爆炸了。三个人死于爆炸,七个人受伤。爆炸的气浪把车站上的玻璃窗都震碎了,损坏了铁轨,掀倒了四根电杆。

出事后不久,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帕克上校半夜里去访问了戈登牧师。戈登和他的同胞商量了一刻钟之后,就去拜访萨科维支。他们谈了半小时,然后总督派人唤来了赫德拉和加利泉。四位先生商谈了几分钟,于是戈登走了。萨科维支又把帕里斯将军召来。等将军来到后,萨科维支又送了一封信给工人之家,说他准备谈判。得到的回答是:他应该继续与开始时谈判的人谈判。当萨科维支的信使匆匆往返的时候,赫德拉正忙于以萨科维支的名义起草一项声明,然后他准备把三个代表——麦凯

布、科苏特和波契克——接出来谈判。警察局的医生为三个代表洗了伤口，包上绷带，换下被警察的棍棒毁坏了的衣服，穿上了新装。然后带领他们去见萨科维支。麦凯布知道要他谈判，他说，他不了解过去三十个小时所发生的事件，除非他接到工人之家的指示，否则不能谈判。萨科维支第三次派了信使去工人之家。工人之家增派了两名代表，来加强最初三个人的阵容。一个是名叫西科尔斯基的斯洛伐克工人；另一个就是贝雷萨斯的福蒂夫人。天晓得，她不知道从哪里临时弄来了一件黑缎子衣服。帕里斯看到一个代表是女人，感到很惊讶；但使他更惊讶的是，他注意到这个娇弱的金发女人在萨科维支的大厅里，一举一动竟和在家里一样。

萨科维支穿了一条灯笼裤，这样的裤子在下喀尔巴阡山是从未见过的，因此倒象一个微不足道的超龄的学生。他对五个代表高声宣读他的声明，保证对工人的一切都作出最好的安排。其中也答应不消灭苏俄。

“喂，你这口猪，”波契克嘟哝着，声音并不太低。可随他怎么叫，都没有什么用，因为萨科维支和赫德拉不理他的插嘴。只有总督的喉结威胁地颤动了一下。

萨科维支在结束他的声明时说了一段话，对那些企图限制人民自由的人提出了警告。

“咳，你这头猪！”

工人的代表觉得声明是可以接受的。萨科维支想，可以结束谈判了，但是谈判还仅仅开了个头。

被赫德拉称为“马丹”的福蒂夫人说，还必须和总督解决几个具体的问题。萨科维支坚持工人应该先恢复工作，然后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福蒂夫人和她的四个同志坚持必须把次

序颠倒一下。

“你瞧，大人，次序是不重要的，在小问题上，君子是不对女人说‘不’的，对吗，将军？”

在萨科维支读声明时，帕里斯请工人们喝白兰地。工人们拒绝喝他的酒——将军独自一个人喝，装做他完全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于福蒂夫人仓促提出的问题，他有点迷糊，在迷糊中，他做了个肯定的手势。

萨科维支让赫德拉继续谈判，自己走到窗户边，神经质地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敲打着，凝视黑暗的街道。

福蒂夫人第一个提议是：提高全下喀尔巴阡山工厂工人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以补偿捷克克朗贬值百分之十五。赫德拉对工人竟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显得很吃惊。

“那不是我们的事，马丹。我感到很惊讶，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不许干涉雇主与雇工的关系的。我们的确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福蒂夫人承认没有，她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但是她听到这样的话也感到高兴。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继续罢工就不用怕警察干涉了，现在是一种工资罢工，而不是政治罢工。

福蒂夫人的温和的彬彬有礼的话，引起了波契克一阵喧闹的胜利的狂笑，这使萨科维支吃惊地回过头来。赫德拉悄悄跟他说明了这个问题，然后大声通知代表们，说总督保证负责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要求是释放全部政治犯。不仅是那些因罢工而关入监狱的，而且包括自从红卫军失败后入狱的人。福蒂夫人要求总督保证对罢工者不进行报复。

赫德拉又不敢决定。萨科维支对这个要求也答应由他来办。

“必须保证三个人不受惩罚，在协议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福蒂夫人说。“费尔德曼，巴林特和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

“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哦，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在莫斯科，”赫德拉说。

“那么豁免他的罪就更算不得什么了。”

第三个要求是要萨科维支允许出版一份罗斯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赫德拉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要求帕里斯和加利泉证明这个要求是违反常识，违反国家利益，甚至违反工人本身利益的。

“好吧，如果总督不许工人有一份报纸，那么他也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报纸全都禁止，”金发的福蒂夫人嫣然一笑，讥讽说。

萨科维支如坐针毡，只想去睡，他烦躁地要赫德拉快点结束谈判。赫德拉耸耸肩膀。

“呃，现在还有什么为难的事？”萨科维支问。

“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可以，让他们办一份报纸吧。”

协议到天亮才签字，萨科维支、帕里斯和赫德拉代表老板；麦凯布、科苏特、波契克、西科尔斯基和福蒂夫人代表工人。

在场的八个人中，只有赫德拉知道，按协议保证不受惩罚的费尔德曼，两天以前就已经埋葬在蒙卡契的犹太公墓中了。

赫德拉和工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他考虑协议的某些条款还是必须遵守的。萨科维支千依百顺，因为他认为他不必履行他的保证。

赫德拉和萨科维支的算盘都打错了，他们不得不信守诺言。

戈登牧师坚持协议，说不能朝令夕改，本杰明·弗·帕克和萨科维支谈的也是同一腔调。总督无可奈何地屈服了。赫德拉试图象工人一样跟戈登讨价还价，但是戈登要他安分些。

"一个美国人是说话算数的。"他冷冷地说。

"即使他是对付一个罢工工人，一个讨厌的布尔什维克？"

"在上帝面前是不分警察局长和讨厌的布尔什维克的，"戈登牧师圆滑地说，然后他瞟了一下赫德拉的脸色，心里想，这个狡滑的捷克人明明知道谁是下喀尔巴阡山真正的领袖嘛，他给他上了一次政治课。

"当然，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反基督的运动，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衷心痛恨；但是每一个精明的人都知道，下喀尔巴阡山可不是战胜布尔什维主义的地方。如果下喀尔巴阡山的实业家只要有时少得点利益，布尔什维主义就没有市场了，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使工人贫困绝望，我们将要危及加里西亚波兰军的供应。而这是当前的重要大事，局长先生。"

这一番话使赫德拉听了很满意。他很尊敬戈登。决定以后，就用嚼口香糖代替烟草。他口香糖虽然只嚼了两天，不过从此，他就一点一划地遵守戈登的指示了。

监狱腾空了。红卫军的战士在集中营关了十三个月，被释放回家了。跟着米科拉和凯斯蒂卡洛藏在森林里的十七个人也回家了。米科拉和马鲁莎奶妈迁往索莱瓦了；凯斯蒂卡洛回到了他维列克的铁匠铺。他也出门到四乡去干零活，有时越过边界，到波兰的拉沃茨涅村去。

我留在乌日哥罗德编报纸。

罢工过后，赫德拉只抓了一个人——欧内斯特·西德拉赛克，抓他是得到戈登牧师同意的。

萨科维支到乌日哥罗德前两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解除了西德拉赛克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当总督在车站上明显对他不友好时，他已经想到他是旧时工人运动的一员。庆贺总督的宴会在王冠旅馆举行时，他到工人之家去了。

“如果可能，我要终止罢工，我将成为今日的英雄，”他在盘算，“如果办不到，我就领导罢工。回到布拉格，当一个工人运动的左翼领袖。”

工人之家没有一个人和他讲一句友好的话。他们没有揍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正是为此而来的；可他们都避着他。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话。不过，一个头顶上长一个大脂肪瘤的罗斯伐木工人，到底还是告诉了西德拉赛克一声：“大菜”在王冠旅馆，不在工人之家。

西德拉赛克回到家里，决定离开这不值一顾的下喀尔巴阡山，回到布拉格去。在布拉格，一个人总能找到点事做。在他准备好行装的时候，铁路工人也罢工了。等到又通车时，赫德拉把他拘留了。

他等待审讯，仅仅等了三天。第四天，他被带到赫德拉的办公室。告诉他已经对他提出控告，他被指控把号召罢工的传单译成捷克文。西德拉赛克了解控告他的实情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无罪的话，西德拉赛克先生，我很高兴。”赫德拉对他说。

这使西德拉赛克怒火中烧。

“我怎样才能证明我没有做某种事情呢？”他问。

“那是你的事情，前特使先生！”

在两个星期中，每隔两三天，赫德拉就把这位下台的特使审

问一次。然后，当戈登牧师觉得这出喜剧演腻了时，用两个宪兵把西德拉赛克护送到卡沙，把他放了。西德拉赛克登上了第一趟上布拉格去的火车。火车一到捷克首都，他就直接到了总理的办公室。几天前，图萨已经把政权交给非党派的所谓看守政府。抑制越来越倾向激进主义的工人运动，那是看守政府的事了。西德拉赛克是落在内阁国务大臣手中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务大臣不耐烦地倾听了这位纳梅尼英雄的申诉。国务大臣提醒他许多次，要他说得简短些，因为时间就是钱。在西德拉赛克详细地说完他的故事以后，国务大臣对他说，虽然事实上他不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他还是自由了，这他应该高兴。在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处，他们劝他脱离政治运动，因为他在警察面前否认支持罢工工人，在群众眼里，他已损害了党。

西德拉赛克最可悲的还是收到了比尔逊啤酒商行的一封信。比尔逊啤酒商行管理处写道：鉴于西德拉赛克的活动对共和国如此重要，他一分钟也不应分心在私人的商行里。因此，他们很遗憾地通知这位纳梅尼的英雄，解除他总代理人的职务。

西德拉赛克四处奔走，但是毫无用处。无论他是老社会民主党员也好，或者在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行为也好，都不能帮他找到职业。老朋友、熟人和同志都抛弃了他；只有利奇，他现在在一个大学教书，想了点办法帮他的忙，但是没有成功。当西德拉赛克觉得他在布拉格和布尔诺已无路可走时，他灵机一动，写了封信给戈登牧师。他坦率地谈了他的处境，要求牧师帮助他恢复职业。

戈登牧师果然使西德拉赛克重新得到工作，虽然没有象纳梅尼英雄所希望的那样。由于长老会牧师的请求，贝雷克酿葡萄酒者协会雇用了西德拉赛克为布拉格代理人。

这位纳梅尼英雄变成了葡萄酒的推销员。他对这一工作显出了非凡的才能，贝雷克的葡萄酒得以行销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个老喝啤酒者的故乡，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德拉赛克的功劳。

萨科维支在统治着

戈登牧师把西德拉赛克赶出了下喀尔巴阡山，又以同样迅速而有力的行动，让帕里斯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唯恐法国政府考虑到波苏战争而打算把帕里斯调走，再换一个罗斯人所不熟悉的将军来，以免为罗斯人所痛恨。他防止了这种不测之事。他依靠通用公司的帮助，让华盛顿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延长帕里斯的任命，同时强迫法国政府同意捷克的要求。

如果有谁认为戈登赶走西德拉赛克，保留帕里斯，是因为一位将军比一个啤酒推销员在传教士眼里有价值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戈登唯一的想法，是这里不需要啤酒推销员，但是需要将军——确切点说，是需要一位人民所看不起的法国将军，从而不会给他的对手萨科维支带来危险。戈登认为帕里斯的摩洛哥作风稍稍有点蠢，这增加了看中他的理由。

于是，将军留在乌日哥罗德了。赫德拉信心百倍地告诉将军，说戈登牧师十分尊重他，心目中要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帕里斯去问了本杰明·弗·帕克上校关于这重大任务的事。帕克立刻责备戈登牧师不该许诺这位法国将军。

“这是你所说的皈依吗？我看你还是称为背叛吧。”激动的上校怒气冲冲地说。

“我以后给您解释，上校。”戈登回答，突然离开了上校的办公室。

一小时以后，萨科维支把上校叫到他办公室里。

罗斯的总督告诫本杰明·弗·帕克说，如果上校坚持要干涉下喀尔巴阡山的内政，他作为总督，只好被迫向华盛顿提出控诉。萨科维支不愿听上校的争辩。几天之后，上校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赫德拉的人跟着他，这使他感到震惊。他向戈登牧师求助了。传教士替萨科维支和帕克讲和，当着上校的面申斥赫德拉，不该监视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向感激他的上校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喜欢让帕里斯留在下喀尔巴阡山。

“我们到这个森林地带来，不是来花钱和休息的。可以设想，”戈登继续说，“我们打算有所作为。我们是精明能干、精神饱满的人民，而且还有钱，我们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恰恰由于我们精明，我们知道，我们有时也会做错事情，我们一上来就失败也是可能的，为什么要把失败记在我们自己的帐上呢？如果我们失败了，就说是帕里斯的错误。他这人贪污而又愚蠢。如果我们成功了，结果完全属于我们。一个人必须全面考虑，上校，如果我们知道某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话。”

“然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帕克十分震惊地问。

“只有上帝知道，”传教士回答，“如果我是你的话，上校，眼下我所知道的，已经很满足了，不想去探测天意认为最好是保守秘密的事。那些企图探索天意秘密的人容易遭到不幸。一个好的基督徒是谦逊的，准备随时服从命令。”

萨科维支注意到了下喀尔巴阡山的情况，他那短暂的想当沙皇的好梦突然惊醒了。乌克兰的王位，几乎已危及他作为法律顾问的位置。为了挽救这一点，他急切要证明尽管他眼下是罗斯的元首，但仍旧是通用公司的人。供应波兰军队是政府最紧急的任务，他却完全无所作为。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总参

谋部把军火运到下喀尔巴阡山。帕里斯安排转运而已。因此，萨科维支得另外找个用武之地，证明他之善于当一国的元首，并不逊于法律顾问。

“我们应该做点推广通用公司汽车的工作，”他对戈登说，“我要几个按本地标准算得上富翁的人来买林肯牌汽车。”

“你犯不着干这种事，”戈登说，“几辆汽车在这里卖得出去，别浪费大好光阴。此外，你现在是国家元首，而不是汽车推销员。你必须关心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命运。”

萨科维支听了他的劝告，大吃一惊。戈登和他谈的是跟波勃林斯基一样的调子。

“你，萨科维支先生，是住在下喀尔巴阡山的罗斯人的领袖。因此，你也是下喀尔巴阡山乌克兰人的领袖，从这里做工作，以解放全乌克兰民族。这就是你必须演说的理由。你必须尽量多谈乌克兰的自由。在喀尔巴阡山北部也住着乌克兰人，那个地区有石油。为了告诉你现在有些什么关系重大的问题，我这会儿就不谈石油了。如果你说呀写呀，那住在喀尔巴阡山北面的乌克兰人就会把你当作他们的解放者，那样，你也才有机会领导东面那些受布尔什维主义灾难的乌克兰人为自由而斗争。自然，你的计划可以依靠通用公司；而通用公司希望你这位忠诚的法律顾问为乌克兰民族的自由而全力以赴。把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深受拥有二十五亿元资金的通用公司所喜爱的任务。但是，推销几辆汽车——

“卡明斯基会帮你写，帮你说。”戈登结束对总督的说教时说。

过了几天，第一次传来消息，说波兰白军正在从红军那里逃

出来，于是戈登又来教导帕里斯了。

“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波兰人取得胜利。如果经过我们帮助，波兰人还是打败了，那么我们必须用别的办法，使布尔什维克遭受一次决定性的失败。”

帕里斯吃了一惊。通过刹那间的直觉，他意识到了，原来不仅是他一个人要干一番解放乌克兰人的事业，传教士们也有同样的心意。他以极大的控制力克制住自己，摆出了一副傻面孔，是那样令人深信不疑，以致鼓励戈登紧紧钉住了这个问题。

“如果在波兰的旗帜下，不能打败布尔什维克，那他们必将在乌克兰的旗帜下被消灭。”他说。

“我是一个军人，”帕里斯对他说，“如果是我的责任，我就发布命令。如果责任要求我，我就服从，我不懂政治。”

“非常正确，将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是生在拿破仑出生的那个城市的吧。”

“还是在同一条街上。”

“谁知道什么任务在等着你啊，将军！”

“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说，我已经打过一支红军——匈牙利人。我知道仍然有一支红军处于备战状态……”

“不错，将军。”

戈登和帕里斯都非常满意他们的谈话。戈登确信，帕里斯会做他要求的一切事情，不会提出疑问；而帕里斯也肯定知道，传教士会供给他实行计划所需要的钱。

当戈登专注于世界政治的时候，布朗牧师却在从事更为重要的事业。因此，他把改变宗教的工作交给了他的秘书双舌维霍拉特。维霍拉特虽然并不浪费时间，而且能说会道，可是工作完全失败了。原因也许是：在罢工以后，改信新教，只能得到那

位长老会教士恩赐的一块美元和半打口香糖了。从那时起，在下喀尔巴阡山已绝少有人参加长老会。

布朗和金融家有来往。他替乌日哥罗德商业银行和马诺·柯霍特的农业银行搞到了大笔美元贷款。由于某种暧昧的原因，布拉格的银行停止了蒙卡契银行的信贷，蒙卡契银行倒闭了。柯霍特在蒙卡契开了一个支行。柯霍特的得力助手萨鲍尔奇·卡瓦西被选为农业银行的理事。柯霍特的银行联合乌日哥罗德银行，成立了拉托里卡股份公司。一个住在蒙卡契的前基辅银行家担任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除了下喀尔巴阡山的金融家以外，有两个加里西亚的白色流亡者——一个兰堡的银行家和一个斯特鲁伊的律师也当了经理。拉托里卡公司获得了买卖桑邦伯爵产业的特权，伯爵在萨科维支到乌日哥罗德之后的两星期也回来了。

那时候，我那费迪南·西维拉舅舅已成为美国的电影巨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和树木茂密的下喀尔巴阡山有点儿关系。当他读到威尔逊总统把马萨里克在匹兹堡会议上坐过的椅子作为美国人民的礼物送给捷克人时，他就买下了萨科维支在匹兹堡会议上坐过的那把椅子。他用廉价买来了这把历史性的椅子，用美国人民的名义送给罗斯人。费迪南·西维拉出钱雇的一个电影明星组成的三人代表团，把礼物从匹兹堡运到了乌日哥罗德。当地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会来欢迎他们。赫德拉召集了大约三百个人赞美这把椅子。萨科维支看见这礼物吃了一惊；这椅子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回想起在匹兹堡会议时他坐着打盹的是一张皮椅子，而这礼物却是一把老式的橡木高背椅。他看到人民很喜欢这把椅子，他也就和蔼地接受了这件礼物。

在王冠旅馆举行了一次豪华的宴会，对历史性的椅子和代表团表示敬意。除了两位高贵的军人，帕里斯和帕克，以及两位传教士缺席之外，下喀尔巴阡山的名流都参加了。因为红军已夺回基辅，军人们都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帕克到布拉迪斯拉发去加快运输军火了；帕里斯到了维列克，又从那儿越过边界到拉沃茨涅，去核对发给波兰人的军需品。法国将军在拉沃茨涅住了三天。两位传教士到加里西亚去陪伴六位新到那儿的长老会传教士。布朗把传教士介绍给了帮助创办拉托里卡的加里西亚的金融家。

宴会十分成功，上了第一道菜后，萨科维支作了一次热情的演说。总督特地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他没有系皮带，因此不时拉裤子，这颇妨碍他的演说。不过他的话依然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桑邦伯爵提议为萨科维支祝酒，为"乌克兰人民的领袖"干杯。卡明斯基为"具有全部欧洲文化的罗斯土地的儿子"桑邦伯爵干杯。轮到向卡明斯基祝酒了，柯霍特欢呼他为"无畏的和平战士"。柯霍特穿得象年轻人那么雅致，说话很激动，由于体重增加了，头发就脱落了。卡瓦西向柯霍特祝酒，称他为"我们经济事务的圣乔治"。美国人中一个电影喜剧演员感谢对他的热诚接待，提议应该发一个电报感谢费迪南。卡明斯基起草了电报稿。

戈登牧师从利沃夫回到乌日哥罗德，要萨科维支给马达列斯库发了一个强烈的照会，要求他们立刻撤出下喀尔巴阡山东部的部队。几天之后，罗马尼亚人开始撤退了。

萨科维支发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不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得踏入新解放的罗斯土地。他说这道禁令是为了保护解放了的人民不受投机者之骗，因此是正确的。只有他的卫队和少数吹捧

他的人，才发给去那儿的旅行护照。他派了一大部分乌克兰军官到新的地区去。

第二十八个党的领导人命令我立刻出发到那个禁区去。还有九个熟悉该地区的共产党员，也得到了同样的命令。我的任务是到斯拉蒂纳和佩梅蒂去。命令里没有说明，一旦我到了那里，应该做点什么。我要靠自己考察当地的情况，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我到的第一个地方，由于罗马尼亚的检查，那里的男男女女已一年多没有看报纸，也收不到书信，实际上是给封锁起来，与世界其余部分完全隔绝了。因此，必须把外面世界以及即将发生的大事的新闻带给他们。

要回避萨科维支的命令是并不难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旅行到基拉里哈扎车站。警察当局在基拉里哈扎设了一个检查点，查看旅客有没有再往前去的通行证。我充分知道这个情况，因此在到达基拉里哈扎之前，我已从客车转到了机车上。火车司机是一个蒙卡契的同志，机车把两个司炉带到了靠近斯拉蒂纳的一站——当然我是第二个司炉。

当我下机车时，还不到午夜。幸亏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的黑暗之夜。可我还是不敢沿着公路走，因为公路上有宪兵巡逻。我赶紧穿过小径对面的森林，向盐矿走去。这些小径使我回忆起多年前我在佩梅蒂的生活情况。

过了三个小时，我才到斯拉蒂纳。盐矿村的狭窄街道弯弯曲曲地伸向山坡，街上萤火虫闪烁不已。矿工们正提着点亮的手灯走向矿井。我叫住了他们中的一个，问："老兄，请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能找到贝拉·特尔克斯？"

矿工指指他的同伴。

"你是贝拉·特尔克斯吗？"

特尔克斯斜眼看着我。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我身边的这位矿工；我只知道他在战时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但是我说不出他脑子里眼下在想什么。他是一个结实的宽肩膀的汉子。我从摇晃的手灯的昏暗灯光中，能够隐约看出他是一个大胡髭、眼睛凹陷、目光锐利的人，他的眼微微有点斜视。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以后再告诉你，有一封给你的信，是从昂格瓦来的。"

"一封信，谁给我的？"

"伊洛斯瓦，他过去在斯拉蒂纳矿上工作。"

"约诺斯·伊洛斯瓦？是在俄国当了俘虏的那个？"

"是的，现在他又回家了。他住在昂格瓦。"

"嗯，"特尔克斯若有所思地说，把灯在我面前一闪，大概是习惯了，因为这时差不多黎明了，用不着灯光再照我了。

"信在哪儿？"他问。

"在我交给你以前，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是贝拉·特尔克斯？"

"哦，那么这是那种信罗？"特尔克斯不必要地高声问，又拿灯在我面前一闪。"坐在路边，同志，"他低声说，"等一等，我一会儿就来。"

我很高兴听他叫我"同志"。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特尔克斯所表现的不信任和谨慎。我找对了地方！我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等着，十五分钟之后，特尔克斯又出现了，带来了两个伙伴。三盏矿工的灯向我脸上闪动着灯光，虽然已没有必要了，因为太阳已经升起，而且光芒四射。

"跟我们来，"特尔克斯说。

他们把我带进一所房子的一个小间里，有几个人睡着，特尔克斯让我看了他的工作证，我把伊洛斯瓦写在一块麻布上的信交给了他。在他们三个人看信的时候，我很快地穿上了特尔克斯给我的肮脏的工作服。他们看完信以后，三个人低声商量了一阵子，他们全都显得极度兴奋。

“你有什么身份证没有？”特尔克斯问我。

“哪一种身份证？”

“有五角星的，”特尔克斯说。

“我有的，”我说着便脱下左脚的鞋子，拿出一张用衬布做的证件来，上面有一个五角星。我把它递给特尔克斯，他们一个一个传看了这张证件。

“这是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签的字吗？”特尔克斯问。

“是的。”

特尔克斯在把证件还我以前，用他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把弄皱了的麻布摸了摸平。

“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忠告道，“现在跟我们走。路上别说话，到了矿坑，把这张工作证——这人生病了——给宪兵看一下。”

在拉约什矿井的入口，宪兵略略地看了一下我的工作证，就让我们走进了开着的罐笼。

罐笼开始下降了，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待了一会儿，接着，一片令人昏眩的亮光向我的眼睛射了过来。弧光灯在矿中照耀着，盐墙闪烁发光。

虽然罐笼下降得很慢，用了二分多钟工夫才到达一千二百呎深的坑底，可等我跨出罐笼时，却感到头昏眼花。也许比任何海滨疗养地都要清洁鲜明的带盐分的空气使我不适，但是更可

能的是闯入我眼帘的情景：二十世纪的舞台，在盐矿里保存了一个已被人忘却的中世纪的片断。

巨大的弧形灯、电泵、钢轨以及轨道上滚着的无盖小货车或者载重车，正在把开采下来的盐送到升降机上去，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可是其余的一切都象通过魔法显现出来的乌拉斯洛一世①王朝时代的景象。矿工们赤着膊，跪着用锤和楔砍劈盐墙。汗水从赤裸的背上流下来。每个人都选定自己的地点，独自工作。工人们都拿计件工资，因此都急急忙忙疯狂地干着。如果一个人干得精疲力尽，或者昏厥过去了，他就躺倒在工作的地方。如果他长久不恢复过来，工头们就会在他脸上泼一盆水。

锤子劈盐矿的喧闹声，在这些大洞穴里的湿气腾腾的、高达几百呎的墙壁间回荡，使声响扩大了一百倍。

特尔克斯好象是要找一个地方工作似的，走得离罐笼越来越远了。我跟着他。几分钟后，我们在一座由盐堆成的教堂的阴影中停下来，离开其余的人已经很远了。

"小心，"特尔克斯警告我。

一架没有扶手的狭狭的梯子插在陡峭的盐墙上。我只得跟着特尔克斯踏到梯子上去，梯子大约有一百二十呎高，直通到一个废弃的坑道进口处。坑道里一团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到我们在很滑的地上走着，左右转了二三次。又转了一次弯，我们就来到亮光中了。我们到了一个方形的大盐洞里。

有几盏达维安全汽油灯放在地上，照亮这个盐洞。洞里散置着稻草。稻草上躺着几个人。当我们走进洞里时，他们都爬了起来。

---

① 乌拉斯洛一世(1440—1444)，匈牙利国王。

三个留胡子的人穿着破烂的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红军的制服，五个穿着所谓西里西亚乌克兰人民军的制服。其中两个没有靴子，四个人穿着罗斯农民的宽大的羊皮大衣，赤着足。两个罗马尼亚兵也是全身武装，就是没有枪。

用不着说明，他们的服装已经说明他们是从哪儿逃到这儿来的！

特尔克斯拿起一盏灯来，提到一垛盐墙面前。墙上只刷了一个字，是用红色的长体字母写的："列宁！"

那天我和洞里的人待了一整天，我们谈过去的斗争，又谈未来——怀着巨大的希望。

傍晚，大约有五十个矿工，都爬到这座废弃的矿穴里来了。我告诉他们，是谁派我来，为什么来，在过去一年中外面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说明为什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了，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又如何正在走向胜利。我的说明几乎既不确切，也不清楚，但是那些被判处到盐矿来服刑的反叛的农奴子孙，却马上明白了，如果情况不是象过去那样，现在应该干点什么。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斯拉蒂纳党支部。因为我不得不再把我的话向一百多个矿工重新讲一遍，因此，到第二天我们才选出了执委会。

我等事情安排好以后，深夜就离开了斯拉蒂纳，上了佩梅蒂。斯拉蒂纳人告诉我：佩梅蒂的村民们对世上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即使透露到斯拉蒂纳来的少得可怜的一点消息也不会传到佩梅蒂去。

这是个月夜。我谨慎地避开公路，在一条路旁的沟渠里走着。沟是干的，但是崎岖不平，我走不多久就走累了。我坐下来休息，一面拿苹果充饥；沿着公路除了两条沟之外，还有两排苹

果树。

从我休息的地方，我能看见公路。这条公路此刻沐浴在月光之下，蜿蜒曲折，穿过一个个起伏的山头，象是一道熔化了的银流。也许这就是杀熊者米哈尔科的父亲多年以前那么爱提到的银河吧……当我想到这些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杀熊者。我明天又要见到他了。四年半的监狱生活有没有损坏他那巨大的身躯？现在他在想着什么？我有点疑惑。

当我站起来继续走时，在我左边路中央的土丘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它看去活象一座移动着的塔。我很快卧倒在地上。

按照一般的情况，一个渐渐接近的物体，在一个人的眼睛里总是越来越大的。这一次，情况却并非如此。也许是月光的缘故，或者是小山的缘故，这座塔移近时就缩小了。我看见，他过来了，接近了，原来只是一个人。不过，说是人，却是个巨人，我立刻认出他来了。

"晚安，铁匠格里戈里！你上哪儿去？"

杀熊者米哈尔科不认识我了；自从我上次到这一带以来，他并没有变得小一点，可我在过去的六年中却多少长高了，这样，比例就改变了。

米哈尔科迟疑地握着我伸出来的手，不相信地凝视着我的脸。

"格里戈里，你真的不记得那个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孩子，名字叫格查·巴林特的？"

米哈尔科想说话，但话卡在喉咙里了。他瞠目结舌地看着我，我想他要哭啦。后来，他以一种胜利的音调高声地笑了。

"我们听说你给绞死了，我们是多么悲痛啊！"他最后终于说

话了。“那个懦弱的独眼龙霍泽列茨哭了。我大叫大骂。你到底没有死！事实上，你长大了。你这两件事，都干得不错嘛。你从哪儿来？”

“我到佩梅蒂去。你这样深更半夜到底是上哪儿去啊，格里戈里大哥？”

“我出来散散步，”杀熊者回答。“如果你上佩梅蒂，我们一块走吧。”

我跟他一起沿着公路，翻山越岭。两个人都不做声。我犹疑不决，不知该不该坦率地告诉他我是为什么来的。我决定先探探他的意见和观点。当我正在考虑如何向他开口时，他忽然说话了，他问我：

“你知道，孩子，莫斯科在哪里？”

“在苏俄。”

“对，那么你知道苏俄有多大呢？”

“知道……全地球的六分之一。”

“如果你只算森林地和耕地，那么你是对的，格查。可是如果你想到，居住在那儿的是那样的人，那这国家就不是地球的六分之一了——而是比整个世界大六倍。”

“那是可能的。”

“不是可能，而是就是这样。”他说话的语气不容人反对。“看来你没有听到过列宁。请竖起耳朵，我来告诉你列宁给全体穷人的信——”

我们到佩梅蒂时，天刚破晓。不过我还是立刻注意到了，村子已经重建过——都是木头房子，建在森林中。不过房子已不隔开那么远了；看来人们已经懂得，他们是相互依靠的。房屋还是跟我童年时那样，一副贫穷不堪的样儿。到处都是折成两段

的大树的损坏了的树干，象征着森林的破坏，树基上已都长出嫩枝，预示着未来的希望。

到了米哈尔科家里，我们立刻坐下来吃饭。杀熊者没有面包，但是有大量的熊肉香肠和杜松子酒。我们又吃又喝，畅谈往事。

我上床时，太阳已出来了。但是我很久不曾入睡。铁匠铺的气味，森林里的香味，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象新鲜牛奶那样甜蜜而刺鼻，象陈葡萄酒那样浓烈，使我一点也不瞌睡了。这种香味令人陶醉，令人精神振作，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轻松感，我仿佛要展翅飞向远远的云层。

我醒来时，已经午后了，发觉霍泽列茨已经坐在我的床边。他的两眼已经失明，他用颤抖的手摸索着我的脸，试图探测我是否已经改变得很多。他送给我一只英国水手的烟斗作为礼物，这只烟斗在到达佩梅蒂以前无疑经历过无数奇遇。

霍泽列茨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一同到了公墓，我在覆盖着红色、黄色、淡蓝的花朵的低陷的坟堆中寻找我父亲的坟墓，但是直到日落都没有找到。

“你记得他，格查，”霍泽列茨安慰我，“这对他和对你都是有价值的，对你说来，甚至比对他更有价值，你知道他躺在这儿喀尔巴阡山我们的树下。如果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没有忘记这一点，那你的思想就会老是转到喀尔巴阡山家乡来。当你疲倦，或者悲伤，或者受到忧愁和烦恼折磨的时候，佩梅蒂的空气会清醒你的头脑，给你新的力量。”

我从来没有听见霍泽列茨这样严肃地说过话，老人也感觉到自己的声调有点异样。也许是为了解释，也许是为自己辩解，他开始诉起苦来了。

"我老了，格查；我已经老得可怕了，"他的声音又变得自然了，"甚至想到我将看到一个较好的未来也不能得到安慰。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格查，当他们叫我'独眼龙'时，我将把它当作赞美。我已经老了，孩子。"

在明朗的阳光中，我注意到米哈尔科也老了，他还象松树一样挺拔，象橡树一样坚强，但是他的行动已经迟缓。他的眼睛和从前一样明亮，但是在浓密的眉毛下显得更深陷了。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种熟悉的杀熊者的低音。但当他静下来时，他的头稍稍向一边侧着，他的长长的银发披在他的眼睛上，使人想到，即使是橡树也不能永远挺立。

那天晚上，他带我来到了篝火那儿。篝火正在为缀有红星的布琼尼的骑兵照亮道路，不再为拉科治的人照明了。许多老拜火教徒一个一个从圈子边消失了。他们被那场大火消灭了。

篝火的光照出了许多我初次看到的新面孔。

"你在这里说话，不用怕，格查，这里人人都是跟列宁的。"

于是我谈了起来。我想，我作了一篇很好的演说。我的演说充满激情，这激情，只有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的流浪者回转家园时才有，我的演说充满勇敢，这勇敢只有领导本国人民沿着新的、大胆的、危险的和希望的道路前进时才有。

一片沉寂笼罩着篝火，扰乱这片沉寂的只有篝火的毕剥声、远处猫头鹰的叫声以及我的听众偶尔一声痛苦的叹息。

当我继续描述下喀尔巴阡山的情况，提到帕里斯和萨科维支的名字时，瞎子霍泽列茨——这里每一个人也都叫他"独眼龙"——打破了沉寂。

"总有一个人骑在我们头上，他走着下坡路，却要成为爬山者，这是怎么回事呀？"他问。

“你从来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亚伯拉罕。”米哈尔科骂他。

“要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象我知道我在谈些什么，那就好了，”霍泽列茨反唇相讥，“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却象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样。格里戈里，美国律师跟你名字相同，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这个该死的独眼龙，狗崽子。”米哈尔科大发雷霆，“世界上别的地方有这样的傻瓜吗？”杀熊者求助于我了。

“哭丧脸梅盖列哪儿去了？”我换了一个话题，问道。

“他耍了一次愚蠢的把戏，不过我们不用为他感到害羞，”米哈尔科回答，“你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却徒步到蒙卡契找人去了，不知是否能在那儿找到我们信得过的人——我的意思是列宁主义者。”

米哈尔科和我在两天中访问了三个村子。然后我动身回乌日哥罗德了。我不得不徒步回去。杀熊者领我沿着人迹罕到的小路走。我们走了一天半。走得这样久是因为我坚持要小心谨慎。米哈尔科称之为懦怯。

当我看到我们必须通过的桥上有一个捷克宪兵在巡逻时，我就建议远远离开这座桥，去寻找一个涉水的地点。

“绕过去？为什么？你在这里等我十分钟——最多十分钟。当心——躲在树林里，然后你可以安全地过去。”

“你去干什么，格里戈里？”

“我到那个宪兵那里去，向他要一个火。等他去掏口袋时，我就抓起他来，把他扔到河里去，水流很急——他起不来的。”

“你疯了吗，格里戈里？来吧，让我们找一个过河的地方。”

“你跟那些外国人在一起，变得非常软弱啦，格查。你真是软弱得要命呀。”

我到了基拉里哈扎，一路上毫无麻烦。

萨科维支威风凛凛地进入了从罗马尼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斯拉蒂纳。宪兵们已用旗帜把市内的房屋装饰起来。然而隆重的进城仪式没有给罗斯总督带来运气。

萨科维支进城前两天，宪兵逮捕了贝拉·特尔克斯。这个矿工被控告在自己房间里把一个莫斯科煽动家藏了两天。在萨科维支到达斯拉蒂纳两小时以前，盐矿的矿工们四百六十年来举行了第一次罢工，要求释放特尔克斯。

共和国的保卫者

自从苏波战争发生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反对运输军火而进行斗争。事情一开头就没搞好。那些准备立刻拿起武器去为列宁的国家战斗和牺牲的人，却不能、或者不愿意去干琐碎事情——例如从列车上拆下一节车厢。其中最难办的是，不能使我们的人明白到：要是某件事必须在六点钟完成，他们不该在八点钟才到。更麻烦的事是他们所熟悉的领导人如米科拉、福蒂夫人、凯斯蒂卡洛和我，都不得不待在离铁路线甚至公路较远的地方。

铁路工人大多是捷克人。要把我们的传单译成捷克文，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我们有一个翻译在索莱瓦，他是个无可怀疑的坚定不移的人。但是要叫来自大工业中心的捷克铁路工人相信衣衫褴褛的（照他们想，是半野蛮人）罗斯伐木工人是他们的同志，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波兰人的进攻受到挫折，红军肃清了波兰白卫军，情况这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拒绝和罗斯人握手的捷克铁路工人，甚至在开会时和罗斯人拥抱了。如果一个人早晨六点钟有事，他在三点钟就到了岗位上。我倒并不是说，弱者只会得到同情，强者总是得到支持，但是我们的情况却正是这样。

当红军到达加里西亚边境时，在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切断了通过喀尔巴阡山而来的枪支弹药的供应。起初，到边境的火车

误点，或者中途少了几个车厢。后来，火车干脆不到边境了。假如发生一件事故，道路阻塞，交通就整天停顿。或者，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抢劫了停在轨道上的火车。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些了，因为帕里斯非但没有加强，而是削减了火车上的警卫，只派遣两三个兵士来护送一列长长的军火车。

波兰将军西科尔斯基绕过乌日哥罗德和布拉格，直接去向法国政府诉苦了。法国政府立刻行动。一小时之内，就把下喀尔巴阡山的铁路工人全部撤了下来，用以前的罗马尼亚王国地区的罗马尼亚铁路工人代替了他们。来自摩洛哥的黑人法国部队增援了军火车上的捷克兵。

当我们在寻找罗马尼亚文的翻译，而且不知道如何才能接近黑人士兵时，乌日哥罗德附近一列火车翻了。第二天——我还是猜不出是谁干的——伏洛克至维列克一线的一座高架桥炸毁了。没有一种布拉格的流行病能比爆炸流行得更快，这次是一列火车，然后又是一座桥梁炸毁，爆炸事件层出不穷，铁路交通阻塞。捷克的工兵架起临时木桥以代替炸掉的桥梁。木桥又倒塌了。有一天，在通过下喀尔巴阡山东区的铁路上有六处地方爆炸。

由于爆炸，有两个人离开了下喀尔巴阡山的政治舞台：一个是萨科维支，另一个是我本人。当工兵也不能使铁路交通恢复正常时，萨科维支精神崩溃了。他在床上睡了三天，然后到塔特腊山的疗养院去疗养了。当他上了火车时，他并不知道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的首都的这些破败的房子了，而是很快将回到纽约的摩天大楼去。

我离开乌日哥罗德在萨科维支之前，这不是出于我的自愿。在伏洛克高架桥炸毁以后，赫德拉把我抓了起来，虽然这件事跟

我毫不相干。他为了防止下喀尔巴阡山的工人们要求释放我，立刻把我转移到了斯洛伐克的卡沙。当两个宪兵把我押送到火车站时，我没有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了，也没有想到，不久我会见到红色莫斯科。

我乘上从乌日哥罗德到卡沙的火车，相当舒适地坐在一个分隔车厢里。一个押送我的卫兵坐在我的身旁，另一个站在外面的过道上。通常在这种旅程中，被押送的人是不会发生什么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事情的。宪兵也认为这样。然而就我来说，恰恰是宪兵，他注意到了我即将遭遇到的事情，是相当令人激动的事情，可以说是战后时期很多特殊事件中如同西德拉赛克的经历一样典型的事例。

在当时，我们总是带一只小提箱，装好行李，随时准备被捕。我的箱子里有几本书和几件衣服。等火车一开出车站，我就取出一本书来看看。这本书叫《群众罢工》，是露莎·卢森堡写的。宪兵坐在我旁边，他是一个淡黄头发、没有胡子的人，戴着厚厚的眼镜，比我大几岁，他一直看着我的书。我想，他是打算把我的书拿走吧。

"这书是露莎·卢森堡写的吗？"捷克宪兵忽然问。

"是的。"

"露莎，"宪兵说着，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惊讶地看了一下押送我的人的脸。眼泪凝聚在那双厚镜片后面的蓝眼睛里，正从他那瘦削的、有雀斑的脸上一滴滴流下来。我想，这个人不是喝醉了，就是发疯了。

"我认识露莎，"他轻轻地说，又叹了一口气。

片刻之间，我怀疑是不是有一个暗杀露莎·卢森堡的人坐

在我旁边，因此我不理解，凶手怎么来到了捷克宪兵队里，特别是，他为什么会哭。

这个宪兵不是露莎·卢森堡的刺客，他把一切告诉了我。

“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宪兵告诉我，“一个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九一二年入的党。当时我在莱比锡做工。露莎·卢森堡对我们当时已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十四个人讲过话。露莎说得太好了。你听过她的演说吗？看到过她没有？我见过她，听过她的演说，和她握过手。露莎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人，流氓们杀害了她！”

宪兵沉重地呼吸着。

“我入党的时候，巴尔干正在打仗。露莎对我们说，‘也许明天他们要强迫你们穿上制服，同志们，也会给你们枪。穿着皇帝的制服，你们也要继续保持无产者的样儿，别忘记，你们的枪不要打弟兄，而要打敌人——你们一定要掉转枪口，打真正的敌人。’露莎说得太好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露莎对我们的教导。我成为奥地利皇帝的一个可怜的小兵——我虽穿军装，仍是一个工人。后来我们赶走了皇帝，来了共和国——我对党说，‘我听你们的安排，同志们。’他们告诉我，‘加入共和国宪兵队；这就是你能对共和国敌人、反动派、君主主义者作斗争的最好的地方，’我就服从分配了。许多老社会民主党党员，所有的工人都服从了他们的命令。现在我们就在跟共和国的敌人作斗争——可是敌人却看露莎和列宁的书。”

宪兵不做声了，我迟疑着；我想要对他说明他的责任，但是当我想到西德拉赛克和洛科，我就改变了主意。当时我还是不能区别叛徒和被叛徒引错路的人民，我怀疑人人都是特务。

我坐着睡了几个小时，当我醒来时，在分隔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了，宪兵的枪放在角落里，但是宪兵不见了。我们快到卡沙时，另一个宪兵，一个高个子的莫拉维亚青年农民，走进车厢来。他发觉他的同伴没有在我身边，感到很惊讶，他问我，他的同伴到哪里去了。

“他大概到厕所里去了，”他思索了一会儿说。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这样，他的伙伴不在时，我不至于无人看管。但是戴眼镜的宪兵没有回来。当我们到了卡沙车站后，铁路警搜查了列车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没有发现戴眼镜的宪兵，他在途中跳下火车，抛下他的犯人、他的武器、他的同伴走了。

这个莫拉维亚人的宪兵把我押送到警察总局，路上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在警察总局我住在公共牢房里，同房还有五个犯人。这五个人都是斯洛伐克农民，他们对我有点怀疑，以为我是贵族。后来，当我从臀部口袋里掏出烟草袋来，一个个递给他们，他们跟我热乎起来了。他们这才知道我不是贵族。

他们表示他们的友谊，主要是问我偷了什么，杀了谁。当我说我想不到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时，他们都笑我，根本不相信。

“如果你还要害羞的话，小伙子，在这一行你是个新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什么都不用害羞。”一个眼睛一眨一眨、垂着胡子的秃头农民指点我。“如果你认为我问你是出于好奇，那你就错了。我们都是为你好，大多数新手不知道什么他们应该否认，什么他们应该承认，小伙子，你得好好学习，牢牢记住：否认一切同承认一切一样，都不是好办法。”

给我聪明的忠告的那个人是因为造假钞票给抓起来的，还

有四个人是因为持刀伤人。那时候，人们喜欢夸口他“刺进某人的肚子”，在战前他们以同样若无其事的口气谈论着从牧师花园里偷苹果的事。现在人们谈论着没有必要把人刺得那么深，口气之间，就跟战前他们谈到某人喝干了三瓶葡萄酒而不是两瓶一个样。

我到监狱的第二天就被提审了。审问我的年轻的警官没有说为什么把我带到卡沙来。他只谈从乌日哥罗德至卡沙旅途中发生的事情。他要我告诉他关于戴眼镜的宪兵的情况。当我坚持说我不知道时，他不相信。我给押回了牢房，不过当晚又来传我了。

“好好想想，”他警告我，“告诉我，不要等到太晚了。”

我拒绝承认杀死我的护送人，两个宪兵用拳头打了我两个小时。在他们把我送回牢房时，我遍体鲜血。

五个斯洛伐克人象弟兄一样护理我。

“瞧，你应该听我的话，”造假钞票的秃子责备我。“你不应该说，你在酒店里用过假钞票；你应该对他们说，你在集市上把一只长弯角的牛卖给了一个黑胡子的犹太人，钱是他给你的。如果你曾经骂那个黑胡子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你把牛卖给了布尔什维克，你顶多挨一两个耳光罢了。”

我从睡着的床上，穿过加窗户的栅栏可以看到一幢房子。当我的费迪南·西维拉舅舅在卡沙当舞蹈教师的时候，他就住在这幢房子里。这幢房子使我想起我的表兄乔治·西维拉就住在卡沙。他是一个律师，照报纸上看，他是一个著名的刑事律师。我问我的造假钞票的朋友，怎样才能把一封信私下送出去。

“通过他们的邮局，”他吹牛道。

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信就私下送出去了。第四

天提审了我，这一次警察局长克利马亲自审问。

克利马是个历史书上的人物。这个专搞阴谋诡计的人，多年来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亲信。后来他当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同时也成了许多作家的题材。作家们把他描写成流氓和恶棍，总的来说是一个傻瓜。他们错了。克利马是一个非常精明而又谨慎的**警察**。

他是一个机灵人。他对于上级的指令，不但细看它的文字，而且更善于推敲字里行间的含义；对于上级不敢用文字布置给他的命令，他都认真对待，果断执行。一九一四年，他当布拉格的警察局长。他接到奥地利内政部长的命令，要他亲自对付俄国间谍，他就残酷镇压了捷克爱国者。几百人被他送上了绞架，几千人下了狱。是他，逮捕了年老多病的马萨里克教授的妻子，正确地说，把她严刑拷打死了。教授已流亡国外，继续进行着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到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共和国，马萨里克当上了总统，捷克政府就派了克利马到斯洛伐克，命令他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君主主义者。克利马明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期待他的是什么。他把不满的农民和反抗的工人塞满了斯洛伐克的监狱。

克利马长得身材很匀称，不过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太胖了，而且秃得很厉害。他的穿着朴素时髦，说话很注意措词。我进去时，他叫我坐下，给我抽烟。当我拒绝纸烟时，他并不见怪。他表示抱歉，说他只会讲德语，没有时间学匈牙利语，虽然他称赞匈牙利语是一种丰富优美的语言。他在审问之前，告诉我那个在乌日哥罗德到卡沙火车上不见的戴眼镜的宪兵，他们已在夏托罗约维黑伊找到了。

"可怜的人，他疯了。"克利马说，"你想想，巴林特先生，我们

把他送到宪兵营里，他号召他的同伴掉转枪口打他们的压迫者。这个可怜人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巴林特先生，这也是你的罪，很遗憾，这件事你是有罪的——那没有疑问。巴林特先生，我只请你告诉我，你怎样能使他的脑子转变得这样快？你对他讲了些什么，你给了他什么，或者给他吃了什么没有？这个可怜人怎么会发疯呢？这是怎么回事，巴林特先生？他是因为良心责备吗？换句话说，因为他看管得你不够好吗？巴林特先生，什么原因？你认为，他是因为他被用来反对工人，他的良心使他苦恼吗？总而言之，我决没有想到，我们的宪兵是这样神经过敏的人。

"你仍旧认为共和国的保卫者是野兽吗？"克利马改变盘问的题目了。"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我并不断定你曾经说过，但是我知道那是你写的。你没有把这封信寄给乔治·西维拉律师吗？"

说着，克利马挥了一下我写给表兄的信。糟啦，我想，那些鬼把这封信扣留了。实际上，事情比这还要坏。

"我的朋友西维拉把这封信给我的时候，我们为你的事作了一次长谈。巴林特先生，我的朋友西维拉告诉我，你出身于一个精神道德都受到腐蚀的家族，在你之前，你们家族里就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你的一个舅舅。那可太糟了。巴林特先生。作为一个人，我衷心地为你难过，但是作为共和国的保卫者，我不得不想到一个有变态的遗传的人，对社会的危险不下于一个罪犯——甚至常常更为危险。我知道，如果我为了保护社会——事实上，也保护了你本人——把你严格隔离起来，你一定不会奇怪的，我将把你严格隔离起来。"

克利马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我被单独禁闭了四个月零十八

天。除了狱卒之外，我看不到一个人。我就是要跟狱卒谈话也不行，如果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不回答。因此我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开始几个星期，我推测着红军已推进多远，他们的战线在哪里。我力求不要太乐观，估计到通过喀尔巴阡山道路是困难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现在他们已到利沃夫啦，接下来，到了斯特鲁伊，维列克，索莱瓦，蒙卡契……

他们应该到卡沙了，但是他们没有到来。街上有军乐声。我倾听着：莫不是《国际歌》？不，这是别的音乐。

我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我哀悼我的同志，肯定他们全都牺牲了。我为他们哭泣，然后我又重新再推测一遍，他们何时到达卡沙。

天气渐寒，然后变得很冷了。秋雨后第一次飘雪，可我白白地等待着俄国同志的到来。

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当我随同我的父母从贝雷萨斯到布达佩斯去时，米科拉就退了学，那时他十四岁。他去给醋场老板马科维茨管马厩。十五岁，他得到一个工作，是建筑索莱瓦和波莱纳之间的工业用狭轨铁路。他在十六岁时，陪着老泰马斯·艾舍走访了各个村庄。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贾诺斯·福蒂给了他几本书，劝他每一行都要仔细阅读。米科拉全力倾注在这些书上，但是看不懂，毫无成效。偶尔，他写信去向福洛普·西维拉求教；西维拉既给他忠告，又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谢甫琴科的《八弦琴歌手》，当他访问各村庄时，成了他的《圣经》。在格罗台克我和他一起服役时，我借给了他一本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米科拉看了以后，这个从来不向人要求什么的人，求我把这书送给他。从那时起，米科拉有了两本《圣经》。在师部监狱里，他又开始看福蒂给他的那一类书。

米科拉在凯斯蒂卡洛的帮助下，现在已能够领会他所看的书了，虽然他常常是用他特殊的方式去理解的。我当时知识浅薄，因而自命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自然我是很急于教教米科拉的，但是凯斯蒂卡洛制止了我。

“让他一个人去读，格查。时间到了，他总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时间证明凯斯蒂卡洛的话是对的。米科拉时来运转，他把

土地分配了，建立了一支军队，不屈不挠地作战。他虽然打败了，但是他的名字已成为传奇，深深地印在下喀尔巴阡山人民的心中。他的失败为胜利作了准备。如果人民不领会这一事实，他们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不仅多森林的下喀尔巴阡山怀着崇敬和热爱在期待着红色彼特鲁塞维茨，而且远远超越这个小小国家边界的地方也都在期待着他。

他把土地分给人民，为此被统治者监禁起来。他出狱以后，许多人起誓说他住在森林里，就是拉科治遇见赤脚的泰马斯·艾舍和奏着神奇的小提琴的吉普赛女郎的那个森林。别的人说，米科拉已经到莫斯科向列宁要医治人民困苦的良药去了。

米科拉这个坚强、聪明、勇敢的罗斯雇农，已经成为传奇中的英雄。传奇产生得比野草还要快，比橡树还坚韧。这种传奇有两种广泛的来源：对于过去十足的误解，以及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幼稚的想法。英雄的形象是按照过去的模式塑造出来的。因此，造出一个类乎宗教圣徒的传奇式英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们的想象而神化了。人们希望未来会带来些什么，因此未来又给传奇中的英雄增加新的内容，指示他去为什么而战，命令他去夺取胜利。

米科拉之所以受人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过去的德行。然而，米科拉——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之成为人民的领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钢铁意志和毫不动摇的信仰，还不如说是由于围绕着他的名字的传奇。

这些传奇，并没有因为萨科维支解决罢工之后，米科拉回到索莱瓦当伐木工而消失。一个圣徒——干的是伐木工，吃的是玉米粥和谷物。米科拉的举动没有想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圣徒的自私动机。也许他是下喀尔巴阡山唯一不知道传奇中的英

雄——红色彼特鲁塞维茨是圣徒的人。米科拉作为一个伐木工人去工作，分享人民的命运，他爱每一件事，爱每一个人，因此他生活在那里，感到如在家里一样。如果要说服他放弃伐木的工作，到蒙卡契去当工会主席，以代替被撵走的洛科，那要比让他获得大赦还难。

“听我说，米科拉，如果你当了工会主席，工会立刻就会具有革命的性质，你作为工会主席，最后就有了一个合法的地位。”我对他说。

我的话没有说服米科拉，直到党明确地命令他到蒙卡契当工会主席，他才去了。

工会在他的领导下，为改善工人的条件而斗争。但是远为重要的是：工人参加工会以后，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志愿参加了红军，工会会员认为自己是休假的红军。当时，党员极少，我们在吸收党员时显得过分小心。不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的工人，还是通过工会，执行了第二十八党的命令。当局所知道的党的一些领导人都没有参加反对运输军火的斗争——然而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场斗争。

米科拉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大骨骼的高个子。他的修得光光的宽阔脸上，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雀斑。他那褐色的头发又粗又浓，象是狮子的鬃毛。他的嘴唇又大又厚，笑起来时露出两排珍珠似的牙齿。他纵声大笑，无拘无束，象个快活的小孩。

他在城市里也依然是个伐木工人，是一个穿着便服的军人。他总是用不惯硬领和领带，把它们塞在口袋里，只有当他要去会见当局的时候，才从口袋里掏出来戴上。他当了工会主席以后，常常应邀去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充满了来自森林生活的比喻，穿插一些森林中的故事。有一次米科拉要在工会大会上讲话，

我给他写了一篇演说稿。可他在那次大会上实际上说的，好象一株枝叶茂密的活橡树，而我的稿子，就象一段刨平的橡木。

他演说的内容，表达思想的方法，洪亮的嗓音，自然还有说故事的技巧——他说的故事就是编织在传奇中的故事——使听众着了迷。他狂热地恨，狂热地爱，狂热地信仰，反过来，也鼓起了成千上万人的狂热，准备赤手空拳去对付刺刀、机枪和大炮。

然而他不打算驱使手无寸铁的人民去冲锋陷阵。他先跟凯斯蒂卡洛、跟福蒂夫人、跟我作了商量，就把他的全部精力和谋略献给了开创一种他称之为“真正的”战斗的事业。他的计划是取道维列克和拉沃茨涅，去袭击与红军作战的波兰白军的后方。当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经由维列克向加里西亚推进时，杀熊者米哈尔科将通过马拉马罗斯群山攻击波兰部队。米哈尔科到蒙卡契去了两次，察看地势，决定在什么地方跟进入加里西亚的米科拉会合。甚至考虑到了什么地方欢迎进入下喀尔巴阡山的布琼尼骑兵。

米科拉不要我陪他到加里西亚去，他和凯斯蒂卡洛坚持要我起义时留在蒙卡契的岗位上。待起义军到达拉沃茨涅时，我们就在下喀尔巴阡山号召总罢工，以牵制赫德拉的宪兵、帕里斯的官兵，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考虑在加里西亚发生的事情了。

在伏洛克与维列克之间的高架桥爆炸以后，我被捕了，他们把我送到了卡沙。我们的计划的唯一改变，是指派福蒂夫人接替我的任务来领导总罢工。

不仅在下喀尔巴阡山已作了全面准备，就是越过边界，凯斯蒂卡洛常常去当铁匠的拉沃茨涅，也同样准备好了。我们把日期和钟点通知了熟悉内情的人民！

当局又聋又瞎。布琼尼的骑兵越过边境进入加里西亚以

后，无论帕里斯或者赫德拉都无心来对付下喀尔巴阡山的工人了。他们甚至连军火运输也已顾不上。另外有件事情也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帕里斯关起门来，坐着和赫德拉谈论了大半夜，又和戈登密谈了半天。

电报传来了布琼尼骑兵接近利沃夫的消息，估计两三天内就要到达。

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在规定时间之前，米科拉给叫醒了，不是宪兵，而是一个维列克来的青年把他叫醒的，青年带来了凯斯蒂卡洛一封信。

>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拉沃茨涅发生了革命，波兰国旗已经从市镇大厦扯下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挂红旗，他们挂上去的是乌克兰旗。我立刻去那儿，我们在那儿见。
>
> 尤哈

近中午时，米科拉和加里西亚人加加特科一同到了拉沃茨涅。若不是拉沃茨涅如此喧闹，若不是加加特科对这个城市如此熟悉，米科拉本是立刻就会落入敌人之手的。加加特科把他领到了一个伐木工人的小屋里，要他待在屋里，直到找到凯斯蒂卡洛。过了一个小时，加加特科回来通知他，"凯斯蒂卡洛和我们的人"在森林里。加加特科还带来一个消息：拉沃茨涅已为"乌克兰国民军"所占领，他们的头头是两个法国军官和一个名叫贝克斯的律师。

加加特科在拉沃茨涅森林里跟米科拉在潘娜·青卡森林里一样自由自在。森林十分热闹，挤满了人，他们都是逃避乌克兰国民军的人，和几个月前为逃避帕里斯强制征兵而逃到森林里来的几百个乌克兰工人和伐木工人。米科拉终于找到了凯斯蒂卡洛。这时凯斯蒂卡洛已建立了森林中人和留在拉沃茨涅的人

之间的联系。孩子们跑来跑去的，正在拾蘑菇和野草莓。

“事情很清楚，”凯斯蒂卡洛对米科拉说，“拉沃茨涅一直传布着‘大乌克兰’这个名称。至于这是谁干的，那是无可置疑的。肯定是帕里斯派了法国军官，和司令贝克斯律师，他就是拉托里卡公司的一个理事。现在问题是：帕里斯的人要干什么？”

“等我们有时间再来操心吧。现在我们另外有事情要做，尤哈。”

“对！不过抱歉的是我们对‘另外的事情’也没有准备。我们得准备一千五百个武装人员，还要以总罢工来保卫后方，而现在……”

“我们首先要占领拉沃茨涅，”米科拉大声说，“然后再讨论该做点什么。”

天黑以后，森林中的人从三方面向村庄发起了进攻。他们的武器只有斧头和棍棒，全靠战斗的勇气。几分钟工夫，就解除了“国民军”的武装；原来，那支部队一共只有八十二人。没有放一枪。那两个法国军官乘汽车逃到下喀尔巴阡山去了，可是那个律师，他不是比军官们笨，就是比军官们勇敢，却仍旧留在拉沃茨涅。两个伐木工人把这个年轻的、但已秃了顶、戴着眼镜、穿运动衫的人押送到了市政厅。凯斯蒂卡洛在大厅里审问了他。

“先生们，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律师十分悲伤地说，“全能的上帝啊！现在，自由的时刻正要到来，竟在乌克兰人中间制造分裂！两个敌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波兰贵族，正在彼此拼杀，如果每一个乌克兰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就可以一举把他们双方都解决。”

律师能说会道，试图为“大乌克兰”而争取凯斯蒂卡洛。

“只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先生，”凯斯蒂卡洛说，“为什么法国军官来指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帕里斯给你们武器？”

“在我们跟两个敌人进行的战争中，有这样可贵的盟友，你应该感到高兴，”律师回答。

“不过，难道你真的还不知道，先生，此时此刻，在你面前是两个敌人之一，或者不如说是真正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吗？”

“请别开玩笑！布尔什维克在利沃夫附近，他们永远不会到这里来。”

“永远？口气不小，先生；不过，暂时别作预言吧。还是对我说说，你追求的是什么；是谁唆使你干这种肮脏的把戏的？谁给你钱，多少？”

律师终于领会了当前的情况。

“我感到不舒服，”他说，“能给我一杯水吗？”

“我从那个傻瓜律师那里所知道的，只是他受帕里斯将军的指挥，并由两个传教士供给资金，鬼知道他们想搞什么名堂。这些我们虽然没有弄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清楚自己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行动，尤哈，”米科拉说。

凯斯蒂卡洛向四处派出了人。米科拉把武装人员分配到了各个小组。当他正绞尽脑汁考虑如何把一个人同时派到两三个地方去时，双头维霍拉特带了二百个武装人员来到了。

“我永远想不到这个拖鼻涕的萨科维支竟会玩如此愚蠢而肮脏的花招，简直胜过十个总督干的坏事，”双头维霍拉特涨红着脸报告道，“他搞到我们头上来啦。他逮捕了安娜·福蒂和伊科维支，并且追捕米科拉和凯斯蒂卡洛，鲁莽的赫德拉已经抓了

那么多人，我们已用不着去发动罢工——一切都已自动停止。我们只消稍稍发动一下，火车也会停驶。”

米科拉把维霍拉特的人编成了四个连。人数并不太多，但它们是真正的战斗连队。

凯斯蒂卡洛送信给米哈尔科，他告诉送信的人，如果找不到杀熊者，就告诉梅盖列。凯斯蒂卡洛还派人给乌日哥罗德和蒙卡契送了信。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的军队在市政厅前集合了。一部分兵士穿着波兰和捷克的军服，或者穿的是老式奥地利军服；其余的穿便服。有些兵士戴了便帽；有些穿便衣的戴着轻骑兵的帽子，或者是老式德国军帽。他们携带的武器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带枪，其余的用草耙当武器。然而大多数人带着长柄斧头。

拉沃茨涅的村民们对军队感到很惊奇。那天晚上没有人睡觉；天色黎明了，还是没有人想回家。村民们发誓说，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一定就在附近。人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可每个人还是要把这消息传给他所遇到的任何人，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每个村民都在传布这个消息，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肯定自己说的是事实。“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在第二天早晨的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拉沃茨涅的伐木工人依凡·梅斯科。

“上帝保佑你们，红色的士兵们，”梅斯科说，“别的由红色的彼特鲁塞维茨对你们说。”

米科拉走到市政厅的阳台上。看了这个精疲力尽、没有修过面、衣衫褴褛、微微弯曲地站着的人，没有人认得出他就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们睁大着两眼凝视着他，将信将疑。难道

这个人真是他们期待已久、老是挂在口中的人吗？人群中一片寂静；没有一个声音对这个已变成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传奇人物欢呼。

"同志们！"米科拉嘶哑的嗓音沉重地回荡在山边，"同志们！距离这里几天的路程，在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列宁还在跟波兰的贵族和宪兵作战。这一次战争要决定我们是享有自由的人，还是一群牛马。这一次战争将决定，这里的喀尔巴阡山森林将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园，还是将给我们遮荫的坟墓。"

米科拉的外表、姿态和说话的方式，跟住在喀尔巴阡山的樵夫没有两样。他从人民学习语言，不过靠谢甫琴科的书，使它变得更优美了。他说的话，人人都听得懂，而且有所感受。他谈到人民珍爱的土地，谈到折磨他们的痛苦。虽然他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却使听众感到惊异。他的话使人消除了疑虑，激动了听众。

广场上到处发出一声声的叹息。一个在角落里站着的金发女人，把哭着的孩子举到头顶。

"别哭，凡耶。别怕，瞧——那是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一个老妇人尖声叫道。刹那间，这叫声被几千个嗓门接了下去："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人们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斧头、草耙和枪支，尖叫着："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雷鸣似的声音吞没了米科拉的嗓音。

他的脸红了，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他伸出右手，指着东方。

早晨，戈登牧师得知拉沃茨涅已落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惊奇。他早就多次说过：所有在喀尔巴阡山与德涅斯特之间的地区，必须转到他的上级通用公司手里。只要挂上乌克兰的旗帜，他相信，无疑会得到胜利。他通知了布朗牧师，布朗牧师在几分钟后，就发了电报给他在伦敦、苏黎世、巴黎和布拉格的代理人，命令他们把加里西亚石油股票全部买进。这种股票在红军进入加里西亚之后已经不值钱了。

第二天早晨，双舌维霍拉特叫醒了戈登牧师。

"糟啦，牧师先生。"

传教士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去拜访帕里斯了。将军已穿上军装，就要上前线，正在一面研究加里西亚的地图，一面发布命令。

"大人，"戈登以少有的强烈口气，打断了他的话，"在加里西亚，布尔什维克……"

"一切我全知道了。喝一杯白兰地，牧师。你不喝？太扫兴了；在这样一个时刻……"

"大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让我给你一个出色的提示，牧师，你好去作星期日的传道。"帕里斯说，"凡是怕石头不能落在他瞄准或打算瞄准的地点的人，他最好不要抛石头！一个多么好的计划啊，不是吗？我想，凭着在加里西亚升起的那面乌克兰的旗帜，我，主要是我的资产，可要完成出色的事业啦。萨科维支以为他就要当乌克兰的沙皇了。你想当什么，我出于礼貌，就不提了。萨科维支和我都是傻瓜；另一方面，你不懂世上的事务。无论如何，要是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和布尔什

维克作战，可大错特错啦。不过，既然我们必须和布尔什维克作战，我就要向波兰人求助，就是被你、被我、被萨科维支出卖的波兰人。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坦率了。你瞧，牧师，所以说，跟军人搞工作是不好办的。一旦出了麻烦，他们就不想弄脏裤子，——他们已明讲了。”

戈登——一个反酒主义者——一连喝了两杯白兰地。

“通用公司能经受这个损失。至于你，牧师，你付出的并没有你将要得到的多。所以你也能忍受这次失望。还是可以遇上许多机会的。就在我们周围，许多匈牙利人都热中于一场小小的战争，还有罗马尼亚人，也喜欢石油的气味。我已经给他们送了一封信去。”

将军的副官选择这个时候来报告说，马达列斯库要和帕里斯通电话。

象喀尔巴阡山的神话故事一样，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

第一天，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下令进攻。远方隆隆的炮弹声标明了方向。彼特鲁塞维茨的部队推测着那是波兰人的炮声还是列宁的炮声。伯爵的城堡冒起了火焰。两个村庄的居民都拿起了武器。夜间的篝火在森林里燃烧；在遥远的南方，牧羊人的自古相传的篝火在向新的篝火致敬。

“远远看去，它们真象五角星啊，”双头维霍拉特说。

“是啊，”加加特科同意，“只是它们是在我们后面照着。可只有当它们在我们前面发出火焰，我们和我们的俄罗斯弟兄站在一起看着它们燃烧时，它们才是真正的星星啊。”

“睡一会儿吧。到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第二天，从克拉科夫派来的波兰骑兵突然袭击了凯斯蒂卡

洛指挥的梯队后卫。维列克的芬兰人为了避免交战，撤退到了森林里。骑兵猛攻森林。——军刀碰上了斧头。斧头战胜了，波兰人撤退了。说得精确一点，是波兰人试图撤退，可是当他们冲向森林时，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从后面伏击了他们。波兰骑兵一下崩溃了。农民开始屠杀伤员。彼特鲁塞维茨对农民讲了话，说明波兰士兵也是工人和农民，是他们的穿了军服的弟兄。

“有的弟兄比陌生人还坏，”依凡·梅斯科说。

米科拉解除波兰俘虏的武装，把他们遣送回家。有三个兵不肯回去，参加了米科拉的军队，一个被俘军官企图逃跑，米科拉开枪把他打死了。

那天晚上全军大吃了一顿马肉。没有面包，也缺少盐。

第三天，彼特鲁塞维茨向东推进，停驻在马拉马罗斯群山南边，寻找米哈尔科的增援部队，他们耽搁了半天，可还是没有找到米哈尔科。他们继续向东走了。午饭后，有几个双头维霍拉特的兵抢了一家农民。当晚彼特鲁塞维茨审判犯人；他们被判决枪毙。他们的同犯给赶出了军队。村民们给红色彼特鲁塞维茨带来盐和面包。米科拉的兵向农民要烟草和火柴。农民没有好给的。晚上，米哈尔科的部队赶上了米科拉。

米哈尔科的头上扎着一条有血迹的绷带。

“我们跟波兰宪兵打了两个小时，要不是罗马尼亚的大炮射过来，我们早把他们全杀光了。”

“你损失了多少人？”

“出发时二百四十个，我们还剩下三十七个。”

第四天早晨，因为米哈尔科的人的缘故，我们无法前进了。他们休息时，别的人去采蘑菇和野草莓。罗马尼亚部队从公路上来了。夜幕降落时，发生了一场小接触。奇袭很成功，罗马尼

亚人逃跑了。米科拉俘虏了四百二十个人，包括一百零九个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和四十二个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他们全都加入了米科拉的部队。其余的俘虏，除了他们的军官以外，米科拉都准许他们回家。

晚饭是马肉和蘑菇。

第五天，堆木场的工人参加了起义军，他们带来了苏波战争的消息。

"昨天他们说，我们的人逃跑了，"一个机械师报告。

"胡说，"米科拉回答。

"从前天起，大炮不打了；至少这儿听不到大炮的声音了。"机械师说，"我们日日夜夜一直在听。"

彼特鲁塞维茨在跟凯斯蒂卡洛、米哈尔科以及加加特科简短地商议了一下后，发出了命令：

"向东北，前进。"

彻夜行军。

第六天，继续前进，没有停下来休息，没有食物，但是溪里的水多得很。

"快些！快些！快些！"

第七天，黎明时，四架法国飞机轰炸了加加特科的部队过夜的村庄。几间茅屋冒起了火焰。村民们都躲到森林里去了。下午，捷克军团攻击凯斯蒂卡洛，凯斯蒂卡洛发起了反攻。捷军的兵力占优势。彼特鲁塞维茨派部队增援凯斯蒂卡洛，但是敌人也得到了支援。法国飞机又出现了。捷克人进攻森林，但是彼特鲁塞维茨的人把他们击退了。

大橡树密密的树枝投下阴影，森林里天黑得早。

到处燃起了营火。但是大多数人太疲倦了，没有生火。反

正无饭可做。他们就在站着的地方倒下了。

米科拉亲自分派了守夜的任务。派加加特科的部队去守卫森林的西段。派米哈尔科的部队去守卫南面；他们在近黄昏时和罗马尼亚部队发生了一场短短的混战。

"象在家里一样，"米哈尔科在向米科拉报告情况时说，"瞧——橡树，土耳其橡树和松树。"

米科拉得到报告：波兰部队正从北面和东北面逼近森林。

"我们应该撤退，"加加特科提议。

"太迟了，我们已被包围了，"另一些人指出。

"我们要冲出去，"米哈尔科说。

"叫精疲力竭的饥饿的人冲出去？"凯斯蒂卡洛想要知道，"我们没有弹药了。我们必须搞到些吃的，如果我们别的地方都搞不到，地狱里也要去搞。"

"如果地狱里有吃的，他们也不叫它地狱了，"杀熊者说。

"我们要冲出去，"米科拉说，"加加特科和凯斯蒂卡洛保卫森林，抵抗捷克人。米哈尔科挡住罗马尼亚人，我来对付波兰人。"

"你能够使他们恢复健康，米科拉？"凯斯蒂卡洛问。

"我能。"

"你到哪儿去搞弹药？"

"我们用刺刀和斧头进攻。"

米科拉到各个营火处走了一圈，在每个营火旁停下来，讲几句话，和所有的人握手。

"我们正在前进，列宁在等着我们……"

森林被唤醒了。没有发布一个字的命令，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责任。没有什么响声，到处是悄悄的细语："列宁在等着……

莫斯科……”

天亮后，红色彼特鲁塞维茨发出命令：

“起来吧，去打波兰贵族……跟我来！”

于是，这支军队挥动着刺刀和斧头，从森林的隐蔽处冲杀出去了。迎着他们的是嘎嘎的机枪。第一次射击就倒下了许多人，有几个爬了起来，伤口流着血，脸痛得变形，他们蹒跚地冲向敌人。

“来吧，打他们，冲呀！”

机枪一架接着一架不响了，维霍拉特猛击波兰机枪手的头部，把机枪转了个向。嗒——嗒——嗒——嗒……波兰人一连接着一连地逃跑了。大炮开始从东北方面向森林轰击，新到的波兰部队投入了战斗。

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的军队没有打败……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的部队人数越来越少了，战士流血而死。最后，在米科拉军队里已经没有人了。不时有一个战士站起来挥动他的斧头，他蹒跚地向前走几步，然后向前仆倒在地。

出现了一架飞机，低低地飞着，用机枪扫射着血流满地的战场。几个伤员向森林走去，一个帮助一个，没有人追赶他们，波兰兵也精疲力尽了。待到波兰生力军来到时，几个伤员已经到了森林里。

波兰生力军猛攻森林。他们遇到一阵机枪子弹。战斗继续两小时。最后，波兰人才觉察他们是在攻打盟友捷克军团。这样耽搁了许多时候，波兰人才去追赶向南逃的彼特鲁塞维茨的溃军。

米哈尔科为他们杀出了一条通过罗马尼亚防线的路。他用一对拳头打死了第一个进入森林的罗马尼亚人。他的兵士们把

第二个进来的罗马尼亚人撕碎了。杀熊者的战友受到了米哈尔科吼叫的鼓励："杀死这些贱狗，前进，小伙子们，前进！"

罗马尼亚人丢下武器逃走了。杀熊者象赶羊一样追赶他们。"前进！前进！"

凯斯蒂卡洛在森林边界守了好久，以抵抗捷克人。待伤口流血的彼特鲁塞维茨到达了凯斯蒂卡洛阵地，凯斯蒂卡洛才下令缓缓撤退。他也穿过米哈尔科开辟的缺口向南逃去。米科拉躺在担架上，由他的两个兵抬着。

赫德拉认为当然是由于帕里斯组织了"肮脏的拉沃茨涅事件"，这才激起了下喀尔巴阡的起义。他很喜欢将军的宏伟计划，感谢上帝给了他这样一个聪明的上司。

帕里斯守着喀尔巴阡山隘口，因此，在波兰部队追赶下逃跑的人都落入了他的手里。在维列克关了六十七个俘虏，但是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米哈尔科和凯斯蒂卡洛不在其内。

米哈尔科、加加特科和凯斯蒂卡洛沿着小路逃跑了。这种路一般只有飞鸟才能过去。他们带着受伤的米科拉，到了潘娜·青卡森林。他们把他带到了卡特科的屋子里。没过几个小时，米哈尔科就离开了他的朋友们，出发到马拉马罗斯去了。凯斯蒂卡洛和他手下的八个人在森林深处隐藏了下来。加加特科留在米科拉身边，甚至当赫德拉的宪兵占领了卡特科的屋子时，他也不肯离开米科拉。

赫德拉仔仔细细地修了个脸，洒上了香水，穿上一套黑色衣服，前去报告帕里斯："著名的匪帮司令"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已经被俘。

帕里斯对于宪兵的工作大为满意。这位法国将军和波兰将军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天。波兰人曾经给法国政府发了一个电

报，报告拉沃茨涅起义是由帕里斯的代理人策划的。帕里斯要求波兰人承认这个报告是错误的。起初，帕里斯坚持传证人证明他的话；后来，当他看出波兰人不想听证人的话，他就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同时他警告西科尔斯基将军，争吵下去他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帕里斯说，红军已在撤退，毕苏斯基将军将使全世界相信，是他拯救了波兰。西科尔斯基唯一希望能和毕苏斯基竞争的是告诉全世界，拉沃茨涅已发生了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起义。贿赂和争论，终于说服了西科尔斯基，他给法国政府送去了一个新的报告。为了取回这番好意的报酬，他不仅要求一笔钱，还要帕里斯把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交给他。

然而那时彼特鲁塞维茨还不在帕里斯的手里。赫德拉俘获米科拉太晚了。捷克内政部长已经下了一个命令给赫德拉，禁止把这个罗斯人交给波兰人，因为他是捷克公民。在捷克国会内，社会民主党人吵吵闹闹，掀起了一场关于拉沃茨涅事件的轩然大波。在布尔诺和克拉德诺举行了支持下喀尔巴阡山人民的群众大会。马萨里克总统派了个亲信的代理人到乌日哥罗德去了解有关喀尔巴阡山事件的非官方情况。赫德拉知道马萨里克不是在开玩笑，虽然这是一个伤脑筋的任务，他不得不通知帕里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决不能交给波兰人摆布。

面对帕里斯的威胁，警察局长告诉将军，送走土匪，他将何等高兴。但是马萨里克在这件事上却采取了特殊立场。必须想出一个好主意，尽可能不去冒犯马萨里克，在这情况下，才能答应帕里斯的要求。赫德拉自愿去发明一个“妙主意”。

赫德拉打电话给维列克州长，通知他第二天他上维列克来审问俘虏。然后他锁起门来，和双舌维霍拉特密谈了一个半小时，命令他到维列克去。

“要机警，勇敢。”当他送双舌维霍拉特走时，对他说。

俘虏们关在桑邦伯爵庄园的大谷仓里。其中四个在加里西亚受了伤，现在已经死去。他们又押进了八个新的俘虏来抵补死者，因此，赫德拉一共有七十七个俘虏了。俘虏们一天只给吃一顿饭。不供应他们洗用的水。谷仓里没有稻草，他们都睡在光地板上。他们关押的第一天，就想破墙而出；可是失败了。第二天，他们想掘一条地道逃跑。卫兵看见四个人在那里掘地，便把大约二十多个人痛打了一顿。

谷仓内空气闷热沉浊，充满了汗酸气和伤口腐烂的气味，俘虏们日夜争吵不休。有的人相信红军已经撤退。有的人肯定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已经越过边界，到了喀尔巴阡山；他们没来维列克，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越过乌若克前进了。

“他们已突击占领了乌若克隘口。”双头维霍拉特叫道。

维霍拉特每个小时都要讲点新消息，在俘虏中灌输新的力量。

谷仓的门开了——宪兵们来提双头维霍拉特。

“尽量揭露，”五十个声音在维霍拉特后面响着。

宪兵们把双头维霍拉特押送到市政厅。他发觉他的堂弟双舌维霍拉特在一个空房间里等他。

“肚子饿吗？”

“象十只狼一样饿。”

“要喝吗？”

“比吃更需要。”

“好吧，这儿是吃的和喝的……”

双舌维霍拉特从篮子里拿出一大块撒了很多红辣椒的熏猪肉、香肠和白面包，堆在堂兄弟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瓶酒，打

开软木塞，摇了一摇，放在桌子上。

"自己做的，"他骄傲地说。

双头维霍拉特象疯子一样狼吞虎咽，贪婪地吃着，当他认为他的堂兄弟没有注意他的时候，他把大块大块的熏猪肉塞进了裤袋。

"红军在哪里？"他嘴里塞得满满地问。

"波兰军队昨天已经开进莫斯科，"双舌维霍拉特告诉他。

食物塞住了双头的喉咙。这只有一秒钟的时间——然后他省悟双舌是在说谎。他喝了一大口酒，要了一点烟，关于波军进入莫斯科的事一个字也不提。

"有火柴吗？"他问，把烟塞进他的烟斗里。

双舌不加理会。

"告诉我，兄弟，"他轻轻地问道，"你的枪法行不行？"

双头维霍拉特搔搔他的小头，他知道这口气里有什么肮脏的勾当了。

"你那脏脑子里打的什么龌龊主意，直接对我说吧，不过在倒出污水来之前，先给我一根火柴。"

"你要自由吗？"双舌问道，"你要一个高工资的轻便工作吗？"

"你要谋杀谁？"双头维霍拉特问。

双舌悄悄地约略说明了计划，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这不难，是吗？"

"孩子的玩艺儿，"双头藐视地说。

"那么，你愿意干啦？如果捉住你以后——因为他们要放你先得捉你——你只要说，你是无辜的，罪犯是教唆你干这事的人，他该上绞架，而不是你。"

“我说什么呢？叫我去干这肮脏事儿的是谁？”双头问，他的嗓音有点嘶哑。

“还有谁呢，除了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米哈尔科和维列克的芬兰人？为了容易让人相信些，再加上一两个犹太人。你等等，我还要把你变成个象样的人。”

两个维霍拉特热情地握手。

“你怎么不抽烟呢？”双舌问，递给他的堂兄弟一盒火柴。当双头燃起了烟斗，一阵疑窦涌上心头……也许归根结蒂真的是波兰人到了莫斯科……

他伸手去拿酒瓶。

“谁给我手枪呢？”他问，声音有些颤抖。

“我给你，我立刻就给你。瞧，这是一把崭新的勃朗宁。如果他们问你从哪里搞来的，你就说是彼特鲁塞维茨给你的。一把出色的手枪，是不是？小心！装了子弹的。”

“我预备在他头上十公分处射击。”

“那太近了。朝他头上十公尺处射吧。你暂时留在这儿，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看见那株七叶树吗？”双舌问，从窗口指向街上，“站在树后，从那儿开枪。我再对你说一遍——别搞错了，不是十公分，是十公尺。你是容易失误的；赫德拉是个又矮又瘦的人。”

双头维霍拉特一个人留在那儿，他闭起眼睛，沉思着，把烟斗柄咬成两段，把它丢在地板上。

半小时以后，一辆大轿车驶来，停在市政厅前面。赫德拉平白无故地微笑着走出暗绿色的轿车。当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时，枪声响了，近在咫尺。赫德拉倒在地上。

双头维霍拉特大踏步走到他跟前，又打了两枪，距离很近，

打在警察局长的背上。

"我算没有白活，"当三个宪兵捉住他时，他叫道。

又过了几个钟头，捷克军团执行帕里斯将军的电话指令，把俘虏们押送到边界，交给了波兰宪兵。俘虏们拖着疲倦的、受伤的身体，穿过历史上闻名的维列克。他们走着，只有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用担架抬着，一个宪兵扶着鼻嘴流血的双头维霍拉特。

帕里斯的计划完成了。他被召回法国是依照捷克政府的请求，而不是根据波兰政府的要求，也不是由于拉沃茨涅事件，而是由于次要问题：他把红色彼特鲁塞维茨交给了波兰人。他相信，如果指控他对布尔什维克太严厉，那他到法国不会受罚，反而会受奖。他高兴地微笑着。要是有人跟他说，一个微不足道的索莱瓦教师使将军结束了他的光辉生涯，他会哈哈大笑，并将邀请这个预报噩耗的人去和他喝酒。然而，事实是：将军的脖子的确被一个卑微的索莱瓦教师折断了。

当约罗斯拉夫·斯坦涅克相信宪兵不打算在合情合理的时间内让出学校时，他就到布拉格去了。他在布拉格写了一本关于下喀尔巴阡山的小册子，详细描写了拉沃茨涅事件，帕里斯如何操纵，赫德拉如何为自己打算，计划如何落空，结果一命呜呼。小册子被没收了，但是按照捷克的法律，在国会里的发言或在国会宣读过的文件是不能禁止的。自从"马克思左翼党"的代表在国会中宣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小册子又再版了。

两天后，法国政府召回了帕里斯将军。

帕里斯离开乌日哥罗德前，只拜访了一个人——戈登牧师。实际上也无需告别，因为两位牧师是和回巴黎的帕里斯乘的同一辆火车。萨科维支早已和他的王国不辞而别，回到纽约去了。

他自纽约写了一封短信给马萨里克，辞去总督职务；一星期后，他回到通用公司，仍旧当他的法律顾问。

载着帕里斯飞驶法国的快车挂了三节货车。三节货车装的是帕里斯的赃物。这位将军到乌日哥罗德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只小提箱。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装满各种物品的三节货车。两位牧师到乌日哥罗德来的时候，带来了满满两节货车的礼物，离开时，他们只带回去两只中型提箱和一只公文包。不错，布朗牧师先生片刻不离的那只公文包里装的是贵重的文件。加里西亚石油股票的时价，天天稳步上升！

“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殖民地里是很容易掉脑袋的，”在火车里，帕里斯对戈登牧师说，“我还想过，在这儿什么事情都可能避免，可是结果，没有一件不可能发生。”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当然，这局棋还未结束。我希望德国人拒绝放弃他们的复仇的战争，然后……顺便说说，我们不必完全靠德国人。牧师，我不知道，你是否研究过小小的匈牙利。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光辉的发现——发现了犹太问题。他们决心杀死每一个犹太人。想想，多么好的机会啊！三四个国家为了争夺杀犹太人的权利而打仗，而其余的国家却拿起武器来保卫犹太人。换句话说，不论怎样，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他们迟早又会需要将军——和传教士的。你说什么，牧师？美国人需要和平？你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毒化了，牧师。人民需要什么，与你什么相干？”

凯斯蒂卡洛

一天早晨，我心里正在想：他们完全把我忘掉啦，这时，来人把我领到克利马的面前。

警察局长示意我坐下。过了几分钟，宪兵把凯斯蒂卡洛押进克利马办公室来了。我们交换了一个深情的(同时又是惊惶的)眼色。凯斯蒂卡洛的样子很可怕。他的左臂用绷带吊着，脸上满是乌青块。

“你认识这个人吗，巴林特先生？”克利马对我说。

“可能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我记不起他来了。”

“那么你，凯斯蒂卡洛先生，你认识这个人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是的，他是格查·巴林特，乌日哥罗德的一个新闻记者，”他用奇怪的嘶哑声音回答，“是的，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个人是格查·巴林特。”

“你的记忆力很好，凯斯蒂卡洛先生。如果你愿意想想，你甚至可能想得起巴林特在拉沃茨涅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

“决没有的事。巴林特先生不在拉沃茨涅。”

“这我知道。那件肮脏的事儿进行的时候，他不可能在那里，因为他已成了我们的客人。我这话对吗，凯斯蒂卡洛先生？要是你们在拉沃茨涅横冲直撞的时候，他没有被捕，他肯定会成为你们这个贼帮的领袖，不是吗？对吗，是不是？”

凯斯蒂卡洛并不急于回答。当他终于开口的时候，我才明

白，为什么他的声音这样奇怪，原来他们把他大部分的牙齿打掉了。

“告诉我，先生，”芬兰人问，“我如果说，我没有参加费伦茨·拉科治的革命，你相信我吗？”

“并没有人指控你参加。”

“多谢！不过，我必须承认，如果他们指控我参加，也不会使我感到惊讶。你可以说，‘凯斯蒂卡洛是拉科治的同谋犯，他没有参加战斗，是因为他还没有生下来。如果他已经生下来了，拉科治可能要他做大将！’粗略地说，这就是你的逻辑，你就凭这样的逻辑，要把格查·巴林特拖进拉沃茨涅事件中去。”

克利马发出一阵笑声。

“你自己暴露了，凯斯蒂卡洛先生。你已不自觉地泄露了你对匈牙利历史有很大的兴趣。根据这点，问题很简单，你不仅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雇用，而且也受匈牙利君主派的雇用。你是一个很狡滑的家伙，凯斯蒂卡洛；不过，这一次你却弄巧成拙了。现在我知道你是霍尔蒂①的代理人。”

对质过后，我被带回牢房时，两个侦探在等着我。他们一刻不停地拷打了我三个小时。他们知道，关于拉沃茨涅事件，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说的，但是他们决意要我供认在那地方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打我毫无用处，可还是打掉了我两颗门牙，根本没有具体的理由——而是出于十足的唯心主义。

三个星期后，我又被带到了克利马的办公室。警察局长通知我，要把我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驱逐出境。

---

① 米克洛斯·霍尔蒂，匈牙利的反革命摄政者（1920—1944），是匈牙利沙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捷克资产阶级可怕的敌人。

“你无权这样做，”我抗议道，“我生在贝雷萨斯，按照共和国的法律，我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再按照捷克的法律，也不能把我从共和国的领土驱逐出去。”

“如果你能证明你是出生在贝雷萨斯，那么我自然无法把你驱逐出去。好吧，你证明吧，巴林特先生。”

“我被逮捕时，他们把我的文件都拿走了。”

“这个调子我很熟悉。你没有证明文件，没有证件，到处流浪，这不是你的错；这该怪警察。你没有证件，我感到很抱歉；一般说来，我虽然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共和国的法律不容许我相信你口说无凭的话啊。巴林特先生，你为什么这样惊讶？如果你把事情好好想想，你会感到惭愧，因为你打算用你那孩子气的方法来把我引入歧途。你常常写，常常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有权便是法。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吧，你是何等正确；你可以看出，我并不是问：‘我有没有权力把你踢出共和国领土？’我仅仅证明，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看起来，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相信；现在使你惊讶的是，你说的却是真理。看来，你是打算愚弄人民的。你真不知害臊，巴林特先生！你怎么说的？你相信你写的文章吗？嘿，真出色！你一定很高兴罗，你在理论上所深信不疑的事情已由实践证明啦；事实上，你现在正在亲身体验嘛。”

当然，克利马是在侵犯共和国的法律，这我毫不吃惊。使我惊讶的是，我能够如此轻易地出去。在克利马把我的前途通知我之前一星期，我的律师曾来看过我。我的律师是捷克斯洛伐克国会议员约瑟夫·普雷劳博士，左翼社会党委托他作我的辩护律师。律师告诉我，对我起诉的罪名是炸毁伏洛克高架桥，组织拉沃茨涅起义，企图杀害赫德拉。

在克利马审问我之后几天，普雷劳又来看我了。

“你不会再受审了，”他说，“因为捷克政府终于认识到这类审讯会把一切都暴露于世，其中许多问题要使政府为难。下喀尔巴阡山是不重要的，但是近来关于它的舆论很多，几乎没有好话。”

普雷劳告诉了我一些在我被关入单人牢房后发生的事情。斯坦涅克的传单引起了一场轰动，跟利奇教授写的一系列以《我们的共和国——摩洛哥》为总标题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暴不相上下。斯坦涅克的传单印刷三次后，政府已批准了内政部长的建议，要举行一次政治大审判，我将是这次审判中的主要被告。我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们能证明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恶棍，受外国雇用的代理人，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把我收拾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煽起迫害匈牙利人和犹太人的情绪。由于我在单人牢房里已关了几个月，我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受审时，我的辩护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个超级阴谋首先是被凯斯蒂卡洛，然后是被捷克的工人所破坏了。当政府的报纸登出审讯的消息时，那个维列克的芬兰人就离开森林，到卡沙警察局长那里自动投了案。不过，在自首之前，他详详细细地向社会民主党左翼——“马克思左翼”的代表报告了下喀尔巴阡山发生的事情。当克利马的人用棍子打得他失去知觉时，“马克思左翼”发动了一次广泛的反对共和国“殖民政策”的运动。

国会中开过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以后，内政部长打电报给克利马，叫他准许普雷劳律师到牢房去探望格查·巴林特，和他个别商量一下。

当布拉格、布尔诺、克拉德诺的工人们游行示威抗议下喀尔

巴阡山事件时，下喀尔巴阡山的反动势力也没有睡大觉。卡明斯基、柯霍特、卡瓦西和洛科等成立了一个叫做“自治战士”的委员会。卡瓦西退出捷克党，建立了匈牙利民族党。洛科和双舌维霍拉特联合起来，组织了罗斯工人党。被以前追求沙皇皇位的萨科维支所抛弃的卫队，现在已都追随卡瓦西和洛科。萨科维支实际上都给他们任命了好差使，如市长、镇长、督学、收税官等；这批受前“沙皇”支持的官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自治战士”跟波兰的将军和匈牙利的某些集团都建立了联系。卡瓦西定期和杰拉·格姆伯斯①通信；卡明斯基在王冠旅馆大舞厅作了一次演讲，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以此说明民主政权的软弱无能），并称赞波兰的统治者和杰拉·格姆伯斯。这次演说，使乌日哥罗德的居民们在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听到了阿道尔夫·希特勒的名字。

下喀尔巴阡山的问题开始打扰了政府。总理求助于罗斯问题专家西德拉赛克，请他想想办法。结果，内政部长又给予了工会公开活动的权利。西德拉赛克坚持说，工会能套住柯霍特和卡瓦西的脖子，这样一来，那些先生们也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煽动人们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了。西德拉赛克又说，事实上，一旦工人运动获得力量，“自治战士”就会吵吵闹闹地要求布拉格帮助，以对付工会和工人党。

西德拉赛克还建议政府应该取消对格查·巴林特的审判。他断定，否则“马克思左翼”将会尽量利用巴林特的案子。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多嘴多舌的家伙驱逐出共和国。一旦他到了国外，他可以爱怎么叫就怎么叫；那就对谁都无损害了，西德拉

---

① 杰拉·格姆伯斯（1886—1936），匈牙利法西斯政客。

赛克说。

内政部长命令克利马把他的俘虏释放一个，驱逐一个。部长忘了指出俘虏的名字。后来，他考虑，如果有人问他，他有什么权利把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驱逐出境，那他就可以回答，他的意思是指凯斯蒂卡洛，把这个非捷克公民驱逐出境，而且命令把我释放。但是克利马把事情搞颠倒了。克利马理会他上司的意图，曲意迎合，却放掉凯斯蒂卡洛，而把我驱逐出境了。

不久以后，克利马就发现了一个驱逐我的法律根据。不错，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生在贝雷萨斯，但是我的曾祖父却生在马特索耳科，而马特索耳科是在匈牙利。因此，我得从我的曾祖父继承我的公民权。

可是克利马失算了。我不能做凯斯蒂卡洛所办得到的事。这位维列克的芬兰人干起工作来，考虑才周到哩，他有耐心，又有毅力，他教导下喀尔巴阡山劳动人民，除了用斧头之外，另外还有的是斗争的方法，而革命可不是以一场突然爆发的行动开始的。他甚至成功地说服米哈尔科当了工会的工作人员。当米哈尔科第一次参加修改伐木工人合同的谈判会议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了几句话，如："我宁可在森林里对付十头熊，也不愿在灯火辉煌、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对付一个工厂经理。"

一九三九年年底，红军进入加里西亚，解放了西乌克兰。反动的波兰政府逃往巴黎。

在解放加里西亚的红军中有一个名叫尤哈·凯斯蒂卡洛的老上尉。然而，在一九二四年秋天，尤哈·凯斯蒂卡洛却蹲在卡沙监狱中，而波兰的将军们正在西乌克兰毫无节制地抢掠。他们很快地把帕里斯将军交给他们的罗斯人解决了，不听申诉，不

经审讯，不加宣判，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就处死了七十来个俘虏。这七十个牺牲者葬在一个公墓里。

公墓在离拉沃茨涅不远的森林里。只有一个俘虏提交审讯：红色彼特鲁塞维茨。

给米科拉提供了专门的医疗。伤口虽然好了，但是留下了暗疾，他一直昼夜发烧。疾病搞得他身体非常衰弱，行动都感到痛苦。他经常头昏。这就是将军们审判他时他的健康状况。他们需要这种政治审判，以证明他们已把加里西亚从"红祸"中拯救出来。

规定在十月七日审判，但是九月十八日就开庭了，因为事不宜迟。米科拉在斯特鲁伊秘密受审。出庭的都是预备军官和政治警察的代理人，群众中只有两名记者。

十七日晚上，他们通知米科拉应于第二天早晨到庭。当晚他睡不着觉。他怕他体力太衰弱，在法庭面前不能表现得象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这使他很苦恼。到了黎明，他终于昏昏睡去了。他梦见他在索莱瓦，和列宁一起在爬双峰山。

下午四时开庭。正式的仪式省略了，检察官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问道："你服罪吗？"米科拉在回答时站不起来，依然坐着说：

"我被控告要把乌克兰农民从波兰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承认，这是我的目的，我被控要把工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我承认，我就是为此而活着的；为了解放事业，我至死不渝。"

在整个审判中，他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着。只有一次，当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年轻的炮兵中尉要求法庭严厉判决的时候，他高声笑了起来。

当法官们回到座位上时，庭长问被告，是否要利用最后说话

的权利。

“我要说的，”米科拉回答，他好容易才站直了身子。他的扭歪的脸由于发烧而绯红，眼睛闪着不健康的光亮。

“检察官指控我是上流社会的敌人，”红色彼特鲁塞维茨说，“我不但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不仅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我将同他们战斗，直到……”

庭长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了解你，彼特鲁塞维茨。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你死了以后，怎么能和我们战斗？难道你没有听见，少校要求把你判处死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法律规定死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吗？”

“我知道你们的法律将夺去我的生命，”米科拉继续说，“法律能够这样办。不过，正义还是在我一边！是的，我在死后还要继续战斗。你们认为这不过是空自夸口。你们错了！我在死后还要战斗，我将取得胜利。你们将会看到的，绅士们；喀尔巴阡山的橡树是不可能被连根拔出的。”

米科拉回到他的座位上时，他那苍白的嘴唇上出现血泡沫。

他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凌晨三点被处死。当他站在绞刑架的阴影里时，少校检察官重新宣读了起诉书。然后他又读了几行审判记录：

> 当问到定罪的人是否要求宽赦时，他回答道：“我不要求也不接受敌人的仁慈！”

“警长！执行你的职务！”

在宣读判决书时，米科拉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当绞索套到他头上时，他喊了：“莫斯科——”

他没有时间再说下去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罗斯农民们把米科拉·彼特鲁塞维茨的尸体从绞刑台下掘出来，从林中小路秘密运到了索莱瓦。红色彼特鲁塞维茨的喀尔巴阡山人民把他的尸体埋葬在山坡上的索莱瓦公墓里，让他安息。据传说，那下面长眠着阿提拉王的战士……

再　　会

我不想去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又不肯给我入境证。于是普雷劳给我搞来了一张进入苏俄的许可证。德国的内政部长给了我一张过境签证。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监狱里最后一天的早晨，马鲁莎奶妈来看我了。

马鲁莎·彼特鲁塞维茨没有因她儿子的死而垮下来。米科拉母亲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这是真的，不过她那长年累月弯曲的身躯却挺起来了。

她给我带来一份礼物——两个苹果和一包纸烟。她表示抱歉，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我了。她说她已几个月没有工作。她急于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凯斯蒂卡洛已经去蒙卡契了，准备住在她的房子里。凯斯蒂卡洛太太最近养下了第三个下喀尔巴阡山的芬兰人。

"一个漂亮的孩子，"她说，"几乎跟你小时一样漂亮，一样聪明，格查。"

然后我们并排坐着，好久没说一句话。马鲁莎奶妈一直不做声；她知道我懂得她在想什么，在感觉什么。

我也不说话，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真的，有什么可说的呢？是不是我应该告诉她，不管怎么样，我们将是胜利者？或者告诉她，我们的胜利被推迟的短短几年，跟人类生活在愚昧、贫

穷和受奴役的几千年相比，只不过是几分钟；而跟人类未来的光明、自由、欢乐的世世代代相比只是几秒钟？或者，也许我应该告诉她，米科拉还活着，无论在什么地方，被压迫的人民都在和奴役他们的人战斗？也许我该和她说说生活对我来说是何等美好；即使我们失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斗争要胜过消极观察生活千百万倍。不，我决定什么也不说，告诉她这一切是浪费时间。马鲁莎奶妈和我息息相关，但是她不会懂我所说的话！

到了许多许多年之后，我再遇见马鲁莎·彼特鲁塞维茨的时候，她已经是彼特鲁塞维茨同志了，她用自己的语言，向我说了所有我怕跟马鲁莎奶妈说的话。因此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有说，轻轻拍着奶妈满是皱纹的晒黑的大手。

等到应该分手的时候，马鲁莎吻了我一下。

"你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人，格查，你也是个好孩子。你总是使你的老奶妈感到高兴——就象米科拉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再在这儿见到你。别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儿凡是正派的人必定都要遭殃。"

"到时候我要回来的，马鲁莎奶妈。我发誓以后一定要回来！我知道，喀尔巴阡山的西面，太阳要比我们东面的地方升起得晚一点；但是没有力量能够使它停止上升。总有一天它也会把我们这儿照亮的。那时候我会回来；那时候那些要做好事情的人也有权利生活了。你懂吗？没有关系！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再会，亲爱的，亲爱的妈妈。"

当晚，两个侦探陪我到火车站。其中一个押送我到国境线。

1937—1939年写于莫斯科

英译本编者说明

伊雷什·贝拉小说的情节大部分发生在如今属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从前的匈牙利地方。为了忠实于历史，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城镇、乡村等的名称，在很多场合仍用了匈牙利旧名（例如：贝雷萨斯现名别烈哥沃；卡沙现名科希策；蒙卡契现名木卡切沃；昂格瓦现名乌日哥罗德等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作者＝（匈）伊雷什·贝拉著汤真　　万紫译
页数＝６５５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８６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